

“大党治理与大国兴衰研究”丛书（第一辑）

高民政 主编

Revolution from the Top:

Th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n the

Period of Gorbachev

来自上面的

革命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  
政治体制改革

薛小荣 王萍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大党治理与大国兴衰”研究  
高民政 主编

Revolution from the Top:  
Th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n the  
Period of Gorbachev

革命  
来自上面的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  
政治体制改革

薛小荣 王萍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来自上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  
薛小荣，王萍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11(2018.6重印)  
(大党治理与大国兴衰研究丛书 / 高民政主编. 第  
一辑)

ISBN 978 - 7 - 201 - 12497 - 1

I . ①来… II . ①薛…②王… III . ①政治体制改革  
- 研究 - 苏联 - 1985 - 1991 IV . ①D751.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9653 号

## 来自上面的革命

LAIZI SHANGMIAO DE GEMING

---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黄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策划编辑 王康  
责任编辑 郑玥  
特约编辑 王玲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3  
插 页 2  
字 数 6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15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 ( 022-23332469 )

我们目前改革就可以称做“来自上面的革命”。是的，改革是根据苏联共产党的倡议并且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党认为自己有勇气，有能力制定新的政策，并能够领导和开展社会的革命进程。党首先是从自己，从纯洁自身开始的。

在历史学中和在政治生活中都有这样一种说法——“来自上面的革命”。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少，只是不应该把这种事情与国家政变和宫廷政变混为一谈。这里指的是那些深刻的，实质上是革命性的改造，这种改造是根据当局本身的倡议进行的，尽管它是由于客观形势和社会情绪发生变化而不得不进行的。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 目 录

导言 “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人论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 .....	1
一、深刻总结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重大意义 .....	1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原因分析 .....	4
三、对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判断 .....	10
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 .....	13
第一章 “不能这样下去了”——改革的社会背景 .....	19
一、“勃列日涅夫现象”与社会停滞 .....	20
(一)赫鲁晓夫的改革 .....	21
(二)权力的共同协定 .....	27
(三)停滞的社会状态 .....	32
二、“安德罗波夫现象”与社会心理 .....	37
(一)安德罗波夫其人 .....	38
(二)短暂的安氏改革 .....	41
(三)安德罗波夫现象 .....	45
三、“戈尔巴乔夫现象”与社会期望 .....	47
(一)受挫的心理:契尔年科上台 .....	48
(二)戈尔巴乔夫:精力充沛的人 .....	51

## 2 来自上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三)政治代沟:不用为过去负责 .....	54
-----------------------	----

## 第二章 “多一点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原则 ..... 60

一、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	61
--------------------	----

(一)破除对外部世界的扭曲观念 .....	62
-----------------------	----

(二)选择自由和不干涉他国内政 .....	69
-----------------------	----

(三)要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 .....	75
-----------------------	----

(四)总书记:社会主义的新特征 .....	77
-----------------------	----

二、新思维:意识形态改革 .....	79
--------------------	----

(一)列宁改革的政治象征 .....	80
--------------------	----

(二)赫鲁晓夫的改革意义 .....	85
--------------------	----

(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	88
--------------------	----

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	92
--------------------	----

(一)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	93
----------------------	----

(二)全人类利益:避免核战争 .....	96
----------------------	----

(三)要使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 .....	101
----------------------	-----

四、总书记“战胜”了马列主义 .....	107
----------------------	-----

(一)《苏共中央纲领》.....	110
------------------	-----

(二)《苏共民主纲领》.....	110
------------------	-----

(三)《马克思主义纲领》.....	111
-------------------	-----

## 第三章 “让人民参与政治”——改革的动力机制 ..... 113

一、公开性:人民有权了解真相 .....	114
----------------------	-----

(一)赫鲁晓夫式“梦魇” .....	117
--------------------	-----

(二)绝不同意隐瞒真相 .....	119
-------------------	-----

(三)应该向人民讲真话 .....	125
-------------------	-----

(四)公开性能造就干部 .....	128
-------------------	-----

(五)如实恢复历史面目 .....	132
-------------------	-----

二、民主化:要从下面发动起来 .....	140
----------------------	-----

(一) 打破经济官僚垄断 .....	141
(二) 要给社会输送氧气 .....	144
(三) 选举就应该是选举 .....	149
(四) 要给新闻界以自由 .....	152
(五) 保障游行结社权利 .....	156
三、知识分子:体制内的异见者 .....	160
(一) 知识分子与异见者 .....	161
(二) 报纸:意见多元化 .....	168
(三) 舆论:思想的背弃 .....	175
四、政治话语:从胜利走向失败 .....	179
(一) “胜利式话语”的特征 .....	179
(二) “胜利式话语”的成因 .....	184
(三) “胜利式话语”的失败 .....	189
五、消极的大众:沉默的大多数 .....	194
(一)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	195
(二) 台上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	197
(三) 沉默:我们不需要改革 .....	200
 第四章 “没有现成的药方”——改革的方法策略 .....	205
一、“对纪律的强调”:沿袭过去的传统做法 .....	206
(一) “新阶级”:行政命令体制 .....	206
(二) 纪律与道德:反酗酒运动 .....	209
(三) 障碍机制:向新状态转变 .....	212
二、“不要崇拜计划”:要跟上现实生活节奏 .....	215
(一) 从经济到政治:改革转向 .....	216
(二) 学会在民主的条件下工作 .....	221
(三) 要用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 .....	226
三、“改革的杠杆”:发起对官僚特权的反对 .....	228
(一) “官名录”:特权阶层的形成 .....	228

#### 4 来自上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反腐败”:改革的政治杠杆 .....	241
四、“政治的考量”:谋求保守与激进的平衡 .....	247
(一)焦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 .....	248
(二)领导者与裁判者:改革中间派 .....	251
(三)改革:既所以说开头也所以说结束 .....	256
第五章 “破除社会阻碍机制”——苏联共产党的改革 .....	262
一、改革的保证人:苏联共产党 .....	262
(一)共产党与政权 .....	263
(二)改革就是革命 .....	267
(三)更新干部队伍 .....	268
(四)策略:拉住党 .....	274
二、上面的革命:党的自我纯洁 .....	278
(一)不改革就得靠边站 .....	280
(二)允许政治派别存在 .....	287
(三)向多党体制的过渡 .....	294
(四)竞争选举下的失败 .....	298
三、政治局、书记处与中央委员会 .....	302
(一)政治局:从团结到分裂 .....	304
(二)书记处:从执行到空置 .....	313
(三)中央委员会:咨询机构 .....	320
四、全党意志:关键的代表大会 .....	327
(一)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 .....	329
(二)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 .....	334
(三)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	343
五、党的反抗:反对戈尔巴乔夫 .....	350
(一)尼娜的信:《我不能放弃原则》 .....	350
(二)苏共纲领派的形成与政治主张 .....	357
(三)为什么不能放弃戈尔巴乔夫? .....	368

第六章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国家政治制度改革 .....	378
一、政治制度改革的目标:建设法制国家 .....	379
(一)重塑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	382
(二)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款 .....	392
(三)不能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 .....	397
二、苏维埃制度改革: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	406
(一)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	409
(二)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	416
(三)第三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	418
(四)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	419
(五)第五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	421
三、部长会议—苏联内阁—苏联国务会议 .....	423
(一)部长会议 .....	424
(二)苏联内阁 .....	426
(三)苏联国务会议 .....	430
四、权力转换的中介人:“总书记—总统” .....	432
(一)领袖:中央总书记 .....	433
(二)新职业:苏联总统 .....	437
第七章 “志同道合者的事业”——改革领导集体分析 .....	450
一、三驾马车: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与雷日科夫 .....	451
(一)戈尔巴乔夫 .....	451
(二)利加乔夫 .....	457
(三)雷日科夫 .....	464
二、左膀右臂:雅科夫列夫与谢瓦尔德纳泽 .....	466
(一)改革的“灵魂”:雅科夫列夫 .....	466
(二)外交“新思维”:谢瓦尔德纳泽 .....	478
三、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竞争对手 .....	485
(一)莫斯科市委书记 .....	485

## 6 来自上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政治局的出局者 .....	492
(三)政治反对派领袖 .....	494
(四)俄罗斯首位总统 .....	497
四、政治智囊:博尔金、格拉乔夫与切尔尼雅耶夫 .....	504
(一)博尔金 .....	506
(二)格拉乔夫 .....	510
(三)切尔尼雅耶夫 .....	512
五、“天使们的起义”:改革精英的集体背叛 .....	513
(一)苏联政治体制不可挽救吗? .....	514
(二)苏联共产党是否不可改造? .....	520
(三)戈尔巴乔夫有改革计划吗? .....	528
(四)改革是否受到西方的诱惑? .....	533
(五)叛变流行病:精英的共谋? .....	542
第八章 “建立主权国家联盟”——党一国联邦化失败 .....	551
一、联邦党、联邦国:戈尔巴乔夫新构想 .....	551
(一)民族分裂与国家联邦化的构想 .....	552
(二)政治离心与苏共联邦化的构想 .....	564
(三)全民公决与主权国家联盟努力 .....	568
二、保卫联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 .....	575
(一)举棋不定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	577
(二)挽救苏联的三天:“八一九事件” .....	584
(三)“跪着的骚乱”:胜利还是失败? .....	589
三、政治的冷漠:危急关头的苏联共产党 .....	602
(一)分裂:中央书记处 .....	602
(二)辞职:中央总书记 .....	607
(三)取缔:苏联共产党 .....	609
(四)自辩:戈尔巴乔夫 .....	612

四、主权独立：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大分裂 .....	615
(一)别洛韦日协议 .....	617
(二)阿拉木图宣言 .....	621
(三)苏联总统辞职 .....	623
结语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 .....	625
附录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记 .....	633
参考文献 .....	673

# 导言 “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人论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

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引发的苏东剧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是 20 世纪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之一。这一事件从 1989 年东欧国家剧变开始，到 1991 年底苏联解体基本结束，大体只经历了两年时间，其来势之凶猛、时间之短暂、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sup>①</sup>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透过纷繁复杂的表层现象，揭示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深层根源，从而在吸取苏联改革失误以及由此引发的苏东社会主义剧变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思维，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中国怎么办”的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朝着既定的方向坚定前进。

## 一、深刻总结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重大意义

全面深刻地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既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现状及发

---

<sup>①</sup>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3 年 11 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91 页。

## 2 来自上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展趋势的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走向的高瞻远瞩与战略思考,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讲,加强对苏东问题,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是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真理性的必然要求。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西方舆论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破产了”,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理想已“被埋葬”。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 1989 年出版的《大失败》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在思想领域”,是对历史发展作出了“根本错误的判断”。曾流亡英国的波兰哲学家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则称“马克思主义是本世纪最大的空想”。同时,苏东剧变造成各国共产党内部思想的大混乱,集中表现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泛滥,党内对有关党的性质、作用、前途、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产生分歧,出现许多模糊认识和错误想法。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已经过时? 社会主义是否已经失败,而资本主义已经获胜? 共产党还有无必要存在下去吗? 怎样才能存在下去? 还要不要实行民主集中制? 等等。敌对势力别有用心的谬论和共产党内部思想的混乱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究竟还有没有现实的指导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人类解放的道路还是否科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但是如何解释苏东剧变这一“历史之谜”呢? 这是我们在思想理论战线上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sup>①</sup>。江泽民指出:“总结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有新的发展。”<sup>②</sup>总结的不好,就有可能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就会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从现实意义上讲,加强对苏东问题,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为当前正处于深水期和攻坚期的中国改革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20 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的

<sup>①</sup> 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学习”(1999 年),《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86 页。

<sup>②</sup> 江泽民:“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0 年),《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6 页。

兴起以及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国际经济竞争和科技进步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展开的长期较量与激烈斗争。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等一批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格局。而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的发展遇到了严重挫折。这样一个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进程,向人们、向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提出了许多重大课题:世界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应该如何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开辟光明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应该怎么加强自身建设才能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对于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来说,科学地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正确地回答苏东剧变带来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年摆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面前的“怎么办”问题,又一次严峻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对于我们来讲,汲取的最为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必须在实践中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寻找一条真正符合本国实际的建设道路,而不是从书本中、从模式里简单套取。苏东剧变的沉痛历史教训说明,“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sup>①</sup>。在中国,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江泽民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在新的世纪、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下带领中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在于党能够深刻总结我国和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我们党能够继续执政和发展,社会主义

<sup>①</sup>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 4 来自上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中国能够充满新的生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条宝贵经验。”<sup>①</sup>

##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原因分析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1. 体制因素

邓小平认为:“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sup>②</sup>这是邓小平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总的看法。“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政治体制“不是很成功”<sup>③</sup>,缺乏民主和监督,违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造成个人崇拜,导致精神生活畸形

“不是很成功”的地方主要表现在:高度集中的党内外体制,使权力过分集中,各级政府机关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党政机关容易脱离群众;事实上的干部委任制和干部终身制,滋长了官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党和国家监督机关的职能被削弱,专政职能加强,等等。同时,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模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苏联社会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之中,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由于政治权力的强行干涉,整个苏联社会的精神生活畸形发展。高度集中的文化体制严重压抑了学术理论的民主,剥夺了人们独立思考社会生活现象和创造性地分析事实的权利,造成了党和人民思维意识的保守与惰性,使苏共理论全面滞后与僵化。

(2) “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sup>④</sup>

这是邓小平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总的

① 江泽民:“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2000年),《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② 邓小平:“解放思想,独立思考”(1988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③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④ 邓小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8页。

认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发展阶段上的一种体制模式,它对促进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对于发展生产力而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纵向与沙俄时代比较,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面貌,经济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横向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快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是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这种体制统得太死,缺乏活力,地方和企业积极性受到扼制,职工积极性得不到发挥,更主要的是违背经济自身发展规律;工业化和全盘农业化的发展道路,使农、轻、重比例极不协调,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无法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造成工业生产效益低、投入产出比不佳等问题。从赫鲁晓夫开始,苏共领导人曾经试图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与歪曲,对社会主义认识得不清楚,苏共领导人只能对这一体制作一些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不可能进行根本性的体质改造。至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不是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而是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 2. 理论原因

理论上的优势是无产阶级执政的首要条件,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就没有政治上的坚定。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思想原因就在于苏联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与曲解。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1) 理论上的僵化与教条主义

邓小平认为主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搞清楚。1985年5月16日,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sup>①</sup> 在这里,邓小平明确了两个意思:首先,无论是苏

---

<sup>①</sup>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

## 6 来自上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联还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还没有认识清楚;其次,必须在实践中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七十多年的历史而观,苏联共产党一直没有真正搞清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社会主义运行机制的关系,也没有真正弄懂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导致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斯大林模式一直在苏联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苏共既想改革,破除这一僵化体制,但又囿于没有正确认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误把作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表现形式的运行机制看作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使这一体制在实践中与根本制度发生冲突,日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戈尔巴乔夫虽倡言改革,但是和他的前任领导人一样,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一问题,因此在改革的实践中,使改革与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即要么实行改革,那就意味着要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要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那就是说要反对改革。这种错误的改革心理发生的根源就在于对这一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

### (2) 理论上的曲解和偷换概念

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不仅没有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进一步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反而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曲解和偷换概念,从而导致了苏联社会的思想大混乱,以致无法有效抵御西方势力的思想入侵。江泽民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最近南斯拉夫政局的演变等事件,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执政党内和群众中发生思想变化、思想混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sup>①</sup>从斯大林时期的中后期开始,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存在着严重的理解误区和形而上学的曲解,导致党的指导思想日益僵化与混乱。赫鲁晓夫时期,“三和两全”的路线方针更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这一路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抽象的人道主义,对以后的苏共领导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影响至深。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继承了赫鲁晓夫“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全盘接受了他的“人道主义观”,声称改革就是要“最充

---

<sup>①</sup>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2001 年),《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588 页。

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在其各个决定性方面,即经济方面、社会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sup>①</sup>。同时,戈尔巴乔夫还继承了赫鲁晓夫的“核时代观”与“三和”路线,并将其发展成为所谓的“对外政策新思维”。戈尔巴乔夫把这一认识理论化、系统化,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使苏共彻底抛弃了认识和辨别事物的思想武器。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指引下,苏东各国共产党进行了彻底的政治改造,根本改变了党的阶级奋斗目标、指导思想、组织原则,从而由共产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蜕变成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党的性质方面,把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成为“全民党”,否定了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奋斗目标方面,把共产主义改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要把苏联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在指导思想方面,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党,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旨在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在组织原则方面,抛弃民主集中制,主张“普遍的民主”,即没有集中的民主。实际上是想使共产党失去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成为一个派别林立、自由组合的组织和松散的政治议论俱乐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推行,使党变质,使社会变色,在苏东剧变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 3. 党的原因

1989—1990年,东欧国家相继出现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物价上涨,拖欠西方国家大量债务,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羽翼日渐丰满,执政党内部陷入分裂。西方国家借机公开支持东欧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成立组织,并直接向东欧国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条件,召开圆桌会议。波兰的团结工会在这种背景下上台执政,拉开了东欧国家政治剧变的帷幕。接着如多米诺骨牌一般,东欧国家的执政党相继改组并在大选中下台。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此形势,邓小平明确指出,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出现,问题首先出在东欧国家的执政党身上。他说:“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

<sup>①</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 8 来自上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sup>①</sup>随着 1991 年苏联的解体，邓小平在次年的“南方谈话”中更是提醒中国共产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sup>②</sup>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1) 苏联共产党指导思想混乱

苏东剧变之所以能够发生，在邓小平看来，主要是苏共长期忽视执政党自身的建设，缺乏一条坚定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一套健全的、马克思主义的抵御“西化”“分化”的战略与策略，因而导致党内和社会上思想混乱，继而使党组织涣散、分裂、失去战斗力。江泽民也认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垮台，最后苏联也解体了。除了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和国际敌对势力长期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等原因外，关键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危机时刻党内在政治上发生重大分歧，导致政治局面一发不可收拾。”<sup>③</sup>

### (2) 苏联共产党内部政治分裂

“苏共从党章中取消民主集中制后，党也就四分五裂了。”<sup>④</sup>江泽民指出，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一些人更是想在我国搞出一点乱子，以图乱中取胜，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还采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中的办法，一些人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已钻到了相当的岗位，准备十年后同我们算账。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这还不值得我们极端注意和高度警惕吗？我们的同志头脑要清醒，而且要站在斗争的前线。”<sup>⑤</sup>他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牢记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给世人

<sup>①</sup>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1989 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44 页。

<sup>②</sup>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 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80 页。

<sup>③</sup> 江泽民：“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001 年），《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30 页。

<sup>④</sup> 同上，第 226 页。

<sup>⑤</sup> 江泽民：“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1998 年），《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12 ~ 113 页。

提供的深刻教训”<sup>①</sup>。同时江泽民特别强调，领导成员之间最忌讳的就是有人不但不去维护团结，反而挑拨离间、两面三刀，专门在班子里面搅和。海外有些报刊经常搞出一些挑拨离间、无中生有的东西，有的人往往不辨真假，信以为真，甚至加以散布，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有的人整天不干正事，专门造谣诽谤，写份材料用复印机一复印，到处发送，看起来好像各个方面都有反映，其实谣源就是他一个人。“对我们内部、对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这样的害群之马，一定要严厉查处，不能放任不管、姑息养奸。对搞挑拨离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大家务必保持警惕，绝不能让这种人钻到领导岗位上来。如果让他们得势，就会误党误国误民。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苏联党的历史上，都有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大家要牢牢记取。”<sup>②</sup>

### (3) 苏联共产党严重脱离人民

苏联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不仅表现为指导思想上的混乱，更为关键的则在于党与人民的分裂。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割裂了党群关系，弱化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sup>③</sup>。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领导力量，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政治设计者、组织协调者、思想引导者和行动带领者，其力量源泉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离开了人民群众，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中国没有一种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很牢固，但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有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人心向背事关重大，失去了民心，党就有危险。”<sup>④</sup>

共产党执政后，如何防止党脱离人民，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

<sup>①</sup> 江泽民：“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1998年），《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

<sup>②</sup> 江泽民：“领导干部要在思想、作风建设中作出表率”（1998年），《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9页。

<sup>③</sup> 江泽民：“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2000年），《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7页。

<sup>④</sup> 习近平：“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页。

人”，如何更好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共产党一个严峻考验，也是共产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综观苏共执政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缺乏法律化的民主制度，即民主的选举制度、罢免制度、监督制度，无法从具体制度上保证党能够切实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反却在党内形成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特殊要求、特殊地位和特殊工作方式的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使苏共日益走上了腐化变质的道路，造成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中断，使党的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盛行，党缺乏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敏锐性，僵化保守、不思改革，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又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削弱了党的凝聚力，涣散了党的组织，弱化了党的战斗力。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民主化”“公开性”的旗帜下，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势力借此大肆诋毁、攻击、否定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成就，进而否定“十月革命”，破坏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使党在改革的大潮中失去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造成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

### 三、对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判断

如何看待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呢？中国共产党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 1. 一个现状——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

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引发的苏东剧变，其直接后果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首先，从思想上来说，由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受到冲击与质疑，科学社会主义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究竟走向何方？等问题困扰着人们。其次，从现实力量对比上来说，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世界上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从政治地图上消失了，它改变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就世界范围内来说进入了低潮。同时，也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究竟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了强劲挑战。所有这一切都

表明,目前社会主义运动处在历史发展的低潮期,但是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暂时现象,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是真理,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仍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苏东剧变,对中国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关键是我们精神状态要振奋,要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把握世界形势变化的本质,不被历史长河中的漩涡和逆流所迷惑。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低潮孕育着高潮。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低潮将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预示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只要我们坚守住社会主义阵地,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就是我们的贡献。

## 2. 一支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

以苏联为代表的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虽然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力量,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强力量。苏东剧变发生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去何从,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邓小平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他明确表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sup>①</sup>,“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sup>②</sup>。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早在苏东剧变的时候,邓小平就强调:“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只要“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只要中国“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sup>③</sup>

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

<sup>①</sup>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sup>②③</sup>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0~321页。

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深刻的变革。1991年7月5日，江泽民在会见葡共总书记阿尔瓦罗·库尼阿尔时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是新生的社会制度，出现曲折是难免的。他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重要的是各党要认真总结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正是秉着“担子重，责任大”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不能因为苏东剧变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既定政策，而是要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江泽民说：“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的全部成果。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sup>①</sup>1991年10月，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原主编博奇格雷夫的采访时，就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后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确表示，一些人预言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会失败，这起码是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欧模式，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与摸索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 3. 一个趋势——社会主义长期性与艰巨性、必然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苏东剧变的发生只能说明苏联和东欧所实践的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失败，而不能说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失败。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划时代的新生事物，从其建立之日起，就处于一种摸索的过程之中，其间出现一些失误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凡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

<sup>①</sup>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sup>①</sup>

## 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

苏东剧变留给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建设党。江泽民强调:“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在党和国家面临严峻考验的重大政治斗争中,我们党的队伍、党的组织总的来讲是好的,但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不及时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不消除党内存在的隐患,党和国家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从反面给我们提出了这个严肃课题。”<sup>②</sup>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着眼于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 1. 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

思想建党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与发展。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或放弃,也是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必然。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首先是从思想上的胜利开始的,“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九十多的奋斗历程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也是从思想理论的僵化落后开始的,苏东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失败为我们提供了惨痛的教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这一原则。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活发

<sup>①</sup>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383页。

<sup>②</sup> 江泽民:“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2000年),《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7~548页。

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还将进一步发展。改革和建设中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特别是改革的深化引起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和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都带来深刻影响。旧的平衡打破之后，新的平衡尚处于建立和完善过程之中，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党如何才能在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呢？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要求我们党首先必须在思想上有清醒的认识，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关键是要加强党性修养，严格党内生活。党性是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不可能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增强，也不可能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一个领导干部党性强不强、威信高不高，跟是否经受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密切相关；一个班子党性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也同有没有严格的党内生活密切相关。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这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观点，也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要求。

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做法，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执政党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会损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甚至失去民心，丧失政权。那么面对这些严峻挑战应该怎么办？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能不能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 2.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在苏联政治体制中，苏共名义上是执政党，实质上是国家政权组织。

“整个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活动都以共产党一个党做骨干。整个国家的公共生活是停滞或前进，是倒退或转向，完全由党的会议决定。”<sup>①</sup>统一的苏联共产党不仅肩负着捍卫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重任，而且也肩负着维护联盟国家统一的重任，因此改革必须依靠苏共的力量来进行。这既是现实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

然而苏联政治体制的这一结构性特点不仅决定了苏共既是改革的倡导者、领导者和推动者，是改革的主要领导力量，同时也是改革的主要对象，是改革的客体。因此在改革时期，苏共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也更为敏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苏共成为其政治上的反对派——苏共党内和社会上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势力和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各加盟共和国中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共同敌人。苏共既阻碍着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争夺国家政权，扭转国家发展方向企图的实现，又阻碍着各加盟共和国“地方精英”和民族主义势力摆脱联盟中央控制、走向完全独立的“雄心”的实现。而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发动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的地位，实际上就是使国家政权陷入混乱和瘫痪。维系联盟国家的支柱——苏共的瓦解直接导致国家政权的失控，造成社会制度的剧变，随后便是联盟国家的解体。这是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根本之处。因此，“苏联的制度之所以垮台，并不是因为那里有太多的国家，而是因为根本没有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政党取代了国家”<sup>②</sup>。而“把共产党清除出政治舞台以后，一下子就使苏维埃社会失去了支撑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活动体系的基座”<sup>③</sup>，使改革失去了控制。

在中国，邓小平在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之时便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

① [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第91页。

② [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当代欧洲政治思想》，黄华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6页。

③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序言第3页。

党的领导。”<sup>①</sup>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主要原因是:首先,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党的领导。在改革中,要明确地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如何执政和如何领导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样的改革是党自己的事,不能靠别的什么力量来领导,只能而且必须依靠党来领导。其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核心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涉及党政关系,而且涉及党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的关系,还要解决领导干部终身制、干部队伍实现“四化”和发扬人民民主等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进行统筹处理,这些问题很难解决。再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特殊复杂性,涉及面广,关联的问题多,又直接牵扯很多人的利益,需要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下进行。这就需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及时解决可能引起不安定团结的因素,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些国家搞所谓‘休克疗法’,结果引起了剧烈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教训是很深刻的。”<sup>②</sup>而中国的“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为稳步推进改革、顺利实现目标提供了保证”。“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失误,一旦出现就无可挽回、无法弥补。”<sup>③</sup>可以说,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 3. 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苏东剧变,其根源在于执政的共产党砍了列宁主义的旗帜,推行一条错误的思想路线。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亡党首先是从思想上开始的。从斯大林时期的中后期开始,苏共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存在着严重的教条理解和形而上学的曲解,不是根据现实

<sup>①</sup>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

<sup>②</sup>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3页。

<sup>③</sup>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2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4~35页。

生活的要求进行发展创新,而是在更多时候恰恰犯了列宁所说的“制定”社会主义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设想不分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全盘照搬,忽视苏联国情,在主观主义与唯意志论的作用之下,大搞社会主义的“直线式”进攻,企图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立即建成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适应了改革对马克思主义要求创新的现实需要,但他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只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抽出一些他认为“有用的东西”,连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费边的社会主义著作中的“积极内容”,社会党国际的纲领中“合理的内核”一起,甚至与康德哲学中的“伦理观念”、基督教教义中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一起,把马克思主义“融化”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使苏共失去认识事物、辨别是非的能力而成为理论上的“侏儒”,丧失了执政的思想根基。正如普里马科夫所言,由于苏共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具有不容争辩之科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转变成一种特殊的宗教,被宣布为唯一正确的科学流派,而一切其他流派均为异端邪说。马克思主义被反复确认为万能的学说,对千变万化的现实不需任何适应地保持着自己所有结论的正确性——而与之争辩的尝试均宣布为离经叛道。最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被神化了,实质上变成了圣像”<sup>①</sup>,使马克思主义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最终导致思想的枯竭。

“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使苏共丧失了理论创新的意识和勇气,丢掉了改造主客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弱化了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与解决重大问题的理论能力。社会主义大厦的崩溃正是从苏共思想理论上的贫乏开始的。正如曾担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博尔金所言,导致党被削弱的最深刻原因是,苏共和社会失去了一个全民族的伟大思想。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教条。正是由于能够在苏联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把群众联合起来的创造性思想已消耗殆尽,党不能得到新的理论武装,而戈尔巴乔夫又提不出能够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切实有效的新思想,最终导致苏共彻底失去了社会领袖的地位并被迫解散。

---

<sup>①</sup>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焦广田等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在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结合时代条件的变化，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最终形成了指导中国改革的伟大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更是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时刻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能把这说成是不改革。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有领导有步骤推进改革，不求轰动效应，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sup>①</sup>

#### 4.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只有把党自身建设好，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带领中国人民阔步前进，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所言：“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在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sup>②</sup>

---

<sup>①</sup>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sup>②</sup>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 第一章 “不能这样下去了” ——改革的社会背景

作为一种物质形态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走的是一条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的特殊道路,即革命和建设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前提,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与长期性。从整个社会主义改革历程来看,列宁最早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真正揭开政治体制改革帷幕的却是在他身后近三十年的赫鲁晓夫。尽管他的改革本身存在着很多失误和问题,且因其 1964 年的下台而戛然而止。但却在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种下了改革的“种子”,它在等待合适的环境破土而出。

20 世纪进入 80 年代以后,适宜改革的苏联社会政治环境日渐成熟。而成熟的标志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高层领导人的老化去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心理上的强烈耻辱感。从 1980 年开始,苏共中央高层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1980 年 12 月 18 日柯西金<sup>①</sup>逝世。1982 年 1 月 25 日苏斯洛夫<sup>②</sup>去世,11 月 10 日则是勃列日涅夫去世。1983 年 5 月 29 日佩尔谢<sup>③</sup>去世。1984

---

①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1904.2.21—1980.12.18),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 世纪 60—70 年代与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并称,是当时的三驾马车之一。以经济专家和务实派著称。

②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1902.11.21—1982.1.25),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号称“灰衣主教”。

③ 佩尔谢·阿尔维德·雅诺维奇(1899.2.7—1983.5.29),1966 年 4 月—1983 年 5 月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去世,12月20日乌斯季诺夫<sup>①</sup>去世。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这一切颇具象征意义。那个体制本身也濒临死亡,它那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再具有生命活力。”<sup>②</sup>苏维埃政权的衰退对党和社会提出了警告:不能这样下去了!

1985年3月,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改革的“种子”由于新鲜空气的注入而开始萌动。“实际上,正是为了改革才选上他的。当我国仿佛在敬老院里度过了数十年之后,一个年轻、有教养、‘活泼好动的领导人’在苏联舞台和电视屏幕上的出现,便在仿佛对一切都已失去信心的社会中引起了新的希望的真正爆发。致戈尔巴乔夫的贺电和祝贺成功的信件纷纷寄往中央委员会。有些特别兴奋的公民还赋诗祝贺。当然,对于一个飞快变成偶像的新国家领导人,千百万人都抱着某种希望,却不知道究竟希望的是什么。有人希望多一点秩序,有人希望少一点虚伪和国家谎言,还有人希望出现新人,希望开始某种运动。不过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摆脱那种因最高领导人的外貌和水平而蒙羞受辱的感觉,都期待着命运改变。他们对戈尔巴乔夫要求是:将这些向他发出的不清晰的、却很执着的全国信号译成政治决定和政治行为的语言。”<sup>③</sup>

改革,成为苏联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 一、“勃列日涅夫现象”与社会停滞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勃列日涅夫现象”的显著标志就是“老人政治”。从1964年10月14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后恢复为总书记)后,直到1982年11月10日逝世。

<sup>①</sup> 乌斯季诺夫·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1908.10.30—1984.12.20),1976年4月—1984年12月任苏联国防部部长。1976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76年3月—1984年12月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

<sup>③</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在长达 18 年的执政生涯中,勃列日涅夫从谨慎地恢复和调整赫鲁晓夫改革带来的政治动荡开始,再到过度地强调政治的稳定性以谋求推迟政权危机的爆发。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开始形成了一种怪诞的现象:依靠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来更迭国家政治领导人以维持超级大国的正常运转。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为例,平均年龄接近 70 岁。更让社会感到厌烦的是,“其中许多人并无特殊的才能,已在台上呆了二三十年,如今由于自然规律的关系已不能履行职责。尽管如此,至今他们全都占着位子不下来”<sup>①</sup>。“老人政治”由此产生。苏联国内的“政治时钟”停止了走动。而让时钟走起来的标志是,“这些老人们步履蹒跚的身影几乎每天晚上都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们的胸前挂满了金星,或者互相祝贺又一个纪念日的到来,或者给别人授予奖章,或者自己接受奖章,或者口齿不清地照着稿子发表简短的讲话”<sup>②</sup>。国内累积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人们希望结束这种难堪的政治局面的心理越来越强烈,各种政治笑话因此而层出不穷,表达着社会对“老人政治”的拒绝。苏共二十六大之后,人们开始讨论召开二十七大时,有人问:“党的二十七大怎么个开幕法?”有人回答:“请代表全部起立,政治局委员都是抬着进去的。”<sup>③</sup>

### (一) 赫鲁晓夫的改革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治形成了短暂的以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为首的集体执政时期。1953 年 12 月 23 日,贝利亚以背叛祖国、组织反苏阴谋、从事恐怖活动、积极反对工人阶级和工人革命运动、在国内战争期间充当反革命穆萨特政府间谍机构的特务的罪名被判处死刑。1955 年 1 月 25 日,苏共中央全会同意解除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赫鲁晓夫大权独握,开始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主要集中在干部制度和党的领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0 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460~461 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1 页。

导体制等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

首先，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内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一报告着重批判了斯大林的专横暴戾，不仅涉及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而且涉及了50年代的一些重大案件。赫鲁晓夫认为，造成这种非法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在于他个人的品质及其对个人崇拜的赞赏和迷恋。3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决议，向各级党组织通报赫鲁晓夫的这一报告，3月28日，又作出向各国共产党代表通报这一报告的决议。随即，秘密报告在苏联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整个世界引起轩然大波。苏联国内掀起了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和崇拜的高潮。但是秘密报告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报告没有分析，没有‘推论’，甚至可以说带有个性鲜明、激烈揭露的性质。没有论证，而是刺激人们的神经。将许多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社会经济过程、社会心理过程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领袖’本人不良的个人品质。本来应当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sup>①</sup>。不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却在思想上打破了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为突破和改造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而正是这一点，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时全面调整苏联内外政策触动尤大。“无论如何，二十大给社会一个极大的推动，它为重新评价内外政策、分析历史事实奠定了基础。”<sup>②</sup>

其次，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1953年3月5日，就在斯大林即将逝世的时候，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主席团执行局合并为中央主席团。主席团的委员定为14人（10名委员<sup>③</sup>、4名候补委员）。在1953—1957年间，苏共中央主席团基本上实行集体领导，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由10人领导核心讨论决定。苏共中央主席团定期开会，每周一次，苏联部长会议也如此。主席团如果遇到某些有分歧的问题，就以简单多数票作决定。同

<sup>①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sup>③</sup> 10名委员分别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

时,赫鲁晓夫还主张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充分发挥中央全会的作用,以便扩大党内民主。在赫鲁晓夫执政的11年内,苏共召开了3次代表大会,34次中央全会。赫鲁晓夫还指出,中央主席团是中央全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上级机关,重大问题不应由主席团决定,必须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审定和批准。这一意见对改革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有积极意义。当然,赫鲁晓夫这样做并不完全是出于对实行党内民主的必要性的自觉认识,因为后来随着自身地位的巩固,他也走向了个人专断。事实上,赫鲁晓夫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也意在扩大自己在党内的支持基础。赫鲁晓夫的政治生命,可以说是成也中央委员会,败也中央委员会。1957年6月18日,由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作出了解除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提议。从6月18日到20日,赫鲁晓夫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被撤职3天”<sup>①</sup>。但是在苏斯洛夫和朱可夫等人的帮助下,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们的支持下反败为胜,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被指责为“反党集团”。然而赫鲁晓夫的改革触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在1964年10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面对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们的指责,赫鲁晓夫黯然退出了苏联政治舞台。尽管如此,赫鲁晓夫执政前期通过大力提高和增强中央委员会的地位与作用,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扩大党内民主,克服少数人专权的现象仍是做出了贡献。

再次,改组党的体制,加强干部制度建设。具体来说,主要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一是改变干部队伍,强调内行领导和干部知识化。赫鲁晓夫说:“不仅应该选拔称职能干的人,避免让那些刚愎自用的人混到领导岗位上来,而且还得物色那些深明事理、懂得业务的人来领导工作。”<sup>②</sup>二是规定干部任期,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1961年赫鲁晓夫实行干部更新制度,硬性规定:上至苏共中央委员,下至区委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三届;基层党的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两届;如果超出这些规定限制再连续当选,必须有3/4以上的选举人投票赞成才行;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及主席团委员

①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362页。

②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2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23~1324页。

至少更换 1/4，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的成员至少更换 1/2。通过这项改革，使党的领导队伍处于经常更新的状态，使更多的有知识、有能力的党员走上了领导岗位。三是按照经济发展和生产原则改组党的领导。1962 年 11 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发展苏联经济和改组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决议》。决议强调：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克服空喊和忙乱现象，必须用经济的办法，用生产的原则改组党组织，来进行党的领导。简言之，就是按生产原则改组党组织。按照决议要求，“在现有的边疆区、州的范围内一般成立两个独立的党组织”，“在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分别设立领导工业生产的边疆区和州的党委会和领导农业生产的边疆区的党委会”。改组的主要方向不在基层组织，而在边疆区和州的领导机构。

1962 年 12 月 20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补充决议：《关于改组州、边疆区、自治共和国和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赫鲁晓夫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党组织改组运动从最初的边疆区和州党委会为改组对象，迅速蔓延到国家政府机构、苏维埃机构和一系列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立即引起了全国的混乱和不满，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的强烈不满。戈尔巴乔夫就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 1962 年十一月中央全会后赫鲁晓夫所搞的党的改组、即边疆区党组织和州党组织按照生产原则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做法，同样必须有所分析。从边疆区的经验我知道这次分开完全是矫揉造作，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勾心斗角和无谓的争吵。边疆区党委是自己地区实际上的国家政权机关，它手中集中了国家管理的全部杠杆和线索。必要时它可以集中边疆区的力量和资源去完成某项任务。一分为二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比方说，我就曾经目睹边疆区农业党委第一书记库拉科夫与边疆区工业党委第一书记 H. B. 博先科之间没完没了的明争暗斗。”<sup>①</sup>这种纷乱的情况引起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极度不满，以致在 1964 年的 10 月中央全会上，苏斯洛夫代表中央委员会宣读对赫鲁晓夫的解职意见时就对其改组党组织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赫鲁晓夫同志的大量意见书以及随之而来的频繁改组，简直把我们从上到下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折腾个够，瓦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58 页。

解了地方各级党组织,使它们丧失了信心”,“赫鲁晓夫同志简直是患了热衷搞五花八门改组与改革之癖,迷信某种神奇的力量”。在所有的改革中,苏斯洛夫认为“用政治部来取代生产管理局的党委”“按生产原则对于州和边疆区党和苏维埃机关进行的所谓改组”“分别设立工业的和农业的州党委以及工业的和农业的州苏维埃执委会两套班子”是令人不能容忍的。<sup>①</sup>这成为赫鲁晓夫最终下台的关键原因。然而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对赫鲁晓夫的批评性论据已足可为“宫廷政变”开脱了,在“人民福利”的漂亮辞藻后面,仍然首先是党的“将军”和“军官”保住自己权力的愿望。<sup>②</sup>

最后,恢复法制建设,对司法机构进行部分调整和改革。在吸取斯大林忽视社会主义法制和搞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教训的基础上,赫鲁晓夫为完善法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取消了第一书记个人专权的工具——“内务办公室”和“特工局”,恢复了政治局在确定大政方针方面以及书记处在领导日常工作方面的职能。二是改组、整顿了居于党和人民之上并成为斯大林个人专制工具的国家安全机关。1954年3月12日,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内务部的一系列职能转交给这一部门。1957年又将内务部所传统管辖的边防部队转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1962年7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准予国家安全委员会扩大编制,并特别强调,国家安全委员会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和各级党的领导机构进行协商。三是扩大了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权限。1955年5月颁布了《苏联检察长监督条例》,规定:检察长对审判机关作出的判决、决定和裁定要实行监督,以减少和避免各种非法审理和判决事件的发生。同时规定,一切刑事案件的审理要按正常法律进行。另外,为了减少错判案件,从1954年8月起,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法院还设立了主席团。1962年1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组建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以反对党内官僚主义者。不过,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由于“赫鲁晓夫不想去深入分析极权主义的原因,而且大概也无法进行这种分析,因为这就要求他打破那些业已成为他

<sup>①</sup>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407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的信仰象征的旧框框。所以对个人崇拜的批判看似言辞激烈，其实并不彻底，事先已设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实际民主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陷于停顿”<sup>①</sup>。

然而从赫鲁晓夫的全部思想和精神素质来看，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产儿”<sup>②</sup>。因此，赫鲁晓夫的改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彻底性。“在赫鲁晓夫的活动中有许多与他的生活道路的特点（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说他是斯大林派的活动家，在他的良心中也有斯大林制度的罪恶的阴影）以及他的个性相联系的矛盾。他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儿碰碰，哪儿撞撞。”<sup>③</sup>但是作为改革的第一人，赫鲁晓夫的改革成为苏联以后改革的滥觞。“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既是最后一个革命者，又是第一个改革者。”<sup>④</sup>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的开端是赫鲁晓夫揭开的。他同斯大林主义的镇压政策的决裂是一项伟大的功绩。赫鲁晓夫也曾企图在经济中实现转变，尽管没有取得成功。在所谓柯西金改革的框架内，也曾进行过不少的尝试。后来则是长期的停滞和安德罗波夫的使社会形势好转的新的尝试。”<sup>⑤</sup>然而改革却导致了赫鲁晓夫个人政治生涯的结束。1964年10月12日，决定赫鲁晓夫政治命运但他本人却缺席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召开，勃列日涅夫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决定撤销赫鲁晓夫党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10月13日，赫鲁晓夫被迫提出辞职。中央主席团作出决议：出于年事已高和健康恶化的原因，兹满足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解除他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并确认今后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集中于一人是不适宜的。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的各种高级职务。赫鲁晓夫为什么会被解职？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是因为“赫鲁晓夫在屈从党和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sup>②</sup>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72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sup>④</sup> [俄]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著：《克里姆林宫秘史》，徐芳夫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90页。

<sup>⑤</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压力的同时，并不想完全放弃改革的阵地。如上所述，即使在他后期进行的杂乱无章的改革中，也可猜出他是力图削弱党和国家官僚的无上权力。这样的领导人为党和国家官僚所不容，他被赶下了台”<sup>①</sup>。

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因心力衰竭猝死于家中。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讣告，称他是“领取特别养老金者”。

## (二) 权力的共同协定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全会选举时年58岁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开始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

为什么选择勃列日涅夫呢？固然因为他是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在争夺第一书记职位时有着天然的优势，与之竞争的政治对手尚不足以对其构成威胁。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此时的苏联高层领导人出于对赫鲁晓夫改革的惊恐而表现出来的政治妥协。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勃列日涅夫是和他们一样的“自己人”。1964年11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宣布了自己的政纲：“列宁曾经指出：‘我们有很多人喜欢改革一切，结果遭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灾祸。’列宁教导说，关键不在于机构，不在于改组，不在于新的法令，而在于人和检查执行的情况。”<sup>②</sup>因此，“对于不少人来说，勃列日涅夫走上领导岗位并不是理想的解决办法。显而易见的是，这个人也非常平庸，过分热衷于旧的传统作风，人们早已研究清楚这个人的本质，从内心里就不支持他。但是他宣布的纲领却比较讨人喜欢，这首先是因为他本人态度镇静，信心十足，讲求实际”<sup>③</sup>。

按照这一政治宣言，勃列日涅夫开始着手对赫鲁晓夫时期对党的体制的激进改革进行调整和停止。勃列日涅夫确定了非常具体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措施，明确宣布必须发展个体农业。他还废除了某些最易使人产生不快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6页。

<sup>②</sup> [苏]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大会上的报告”（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页。

<sup>③</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63页。

和不理解的规定,如撤销了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因为它破坏了国民经济中业已形成的纵横联系;取消了对城乡个体劳动活动的限制;制止破坏冶金工业等。勃列日涅夫停止把党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喜欢稳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是渐进式改革的拥护者,在汲取赫鲁晓夫改革的教训时,他主张在实行变革时不要匆忙、不要动荡、不要有革命性的大起大落。不过,在 1965 年 11 月 2 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改进规划和加强对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后,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发起的旨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柯西金的性格比较执拗,为了捍卫自己的思想,往往表现出罕见的顽固,也忍受不了任何反对意见。无论对谁,只要对他所提的规划和决议提出任何不同看法,他都非常敏感。然而这一改革却因为触碰了中央管理机关的权力而引发了激烈辩论,在没有勃列日涅夫的支持下,柯西金改革最终沦为苏联政治博弈的棋子而被迫停止。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仍然很快收到了效益,国内生活慢慢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不过,作为“自己人”,身处权力核心的勃列日涅夫明白,总书记的权力来自于党的组织、党的机关。因此,不仅是出于自身的喜好,更是出于深刻的政治考虑,勃列日涅夫对党的各级领导和机关人员给予了特别关照,并逐渐形成了“特权”——出现了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定的各种不同待遇的等级制度。比如,工作人员根据不同职务到不同的专门医院就诊。丘科夫斯基 1965 年春天曾在中央临床医院住院治疗,他在日记中记载:“这家医院很无耻: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达官贵人为他们自己建造了天堂福地,而对平头百姓则不屑一顾。普通民众躺在简易病床上,吃着不足以果腹的份饭,到处是垃圾,没有所需用的药品,任随粗暴的护理员和忙得晕头转向的护士支配;而为当官的和他们的老婆却提供超级的饮食、超级的医疗,对待他们极度谦恭有礼,各种条件无比舒适。我的病房隔壁是建设部长妻子的病室,这是一个庸俗透顶的女人,将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来与她 50 岁的年龄作斗争,其实身体完全健康。”<sup>①</sup>

<sup>①</sup> [俄]列·姆列钦:《勃列日涅夫时代》,王尊贤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年,第 322 页。

勃列日涅夫时期还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供不同规格的别墅等。当时还有按职位等级供应食品的制度,一部分工作人员每周可在食品商店得到(当然要付钱的)特供食品,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每天都可以得到这样的食品。有一部分行政人员每年享受优惠疗养和休养并提供路费,其余的工作人员可以在疗养院休假,但并不是每年都能去,也不是在较好的季节,而且自己要负担一部分费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恢复机关的特权,这绝非偶然。“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身为机关出身的人非常清楚,他们能否顺心如意主要取决于执行最高领导层路线的人员是否富足,因此最初几年不只恢复被赫鲁晓夫取消或限制的规定,实际上还建立了新的庞大的系统。领导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务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sup>①</sup>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更明白,总书记的权力来自于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第一书记们。“谁都知道,‘勃列日涅夫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共和国的‘大臣’与中央之间的‘协议关系’体系。第一书记们保证自己的共和国效忠莫斯科,作为交换,莫斯科对于他们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实际建立的专制制度视而不见,听之任之。”<sup>②</sup>因此,勃列日涅夫从赫鲁晓夫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恢复了农村中的区委会,发挥了地区党委会原先的作用。苏共二十三大上他恢复了总书记职务,并亲自担任此职。他的主要支柱依然是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不过如果说斯大林时期是靠清洗来维持,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就靠权力的主要载体之间独特的‘共同协定’来维持。这个‘协定’从未诠释过,从未记录在案,更从未提起过。然而它确实存在。其含义是,第一书记在各自地区内几乎被赋予无限的权力,而他们又应当支持总书记,把他当成首领和领袖来赞美。这便是‘君子协定’的实质,它得到严格的遵守。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勃列日涅夫即使在病入膏肓、谈话都很困难的时候,也仍然亲自与列位第一书记保持联系。”<sup>③</sup>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56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20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在废除了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改革措施后,党的领导干部是否退休,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关系。“这种规矩(确切说是无规矩)必然要加重地方领导人对中央和莫斯科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而言,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换句话说,是否退休问题取决于主观因素。”<sup>①</sup>对于所有的“第一书记”们来说,能够建立和保持与总书记,哪怕是总书记周围的人的亲密关系也是其谋求更大政治权力的必需品。“所有的地方领导人自然都依靠与高官的直接接触、依靠经常出入于党中央和政府的办公室,人人各显神通,一再地邀请、招引某个政治局委员去自己管辖的地段,如果走运的话,可以请到总书记。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诸如利用老乡关系、建市的周年纪念日、其他纪念日、向共和国和州授予勋章和流动红旗等等,全都利用起来了。”<sup>②</sup>而建立与“第一书记”们的密切联系也成为勃列日涅夫高度关注的政治问题。据勃列日涅夫的私人的摄影师穆萨埃良说,勃列日涅夫“是一位天才的心理学家,能看透谈话对象的心思,与所有人都能找到所需要的语调。他的电话对那些第一书记们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遥远的边疆区。那些人忠于总书记,哪怕他身体孱弱。勃列日涅夫在政治上长寿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sup>③</sup>。

通过无孔不入的政治监控,以及普遍性的政治腐败,勃列日涅夫掌握了“第一书记”们的政治命脉。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秘书格拉乔夫在分析戈尔巴乔夫成为斯塔夫罗波夫边疆区党中央第一书记时就认为:“戈尔巴乔夫39岁当上就对国家经济贡献而言具有战略意义的、最大的边疆区(论面积斯塔夫罗波夫边疆区等于比利时、瑞典外加三个卢森堡的总和)最年轻的领导人之后,他已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环境之中。像他这样的‘党内大佬’,尽管从理论上讲莫斯科仍然在盯着他,他却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统治权。当然,中央委员会的‘惩罚之剑’——党的监察委员会和组织部门都睁大了眼睛,对于各州和各边疆区的第一书记,比对于像诸侯一样独霸一方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盯得更紧。尽管如此,达到地区第一书记级别的干部都知道,此后他们

<sup>①</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sup>③</sup> [俄]列·姆列钦:《勃列日涅夫时代》,王尊贤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332页。

就属于‘不可触动者一族’，检察院甚至克格勃都不得动他们一个手指头，至于党的监察委员会内部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针对他们每个人的‘黑材料’，除非总书记亲自点头，否则就派不上用场。”<sup>①</sup>在这种政治“互利”下，苏联的政治生态日渐恶化。“许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设法在党内发展‘黑手党’。只要他们通过贿赂而使其莫斯科上司高兴，服从于莫斯科的政治和经济独裁者，他们就可以慷国家之慨去营建自己的小圈子。各加盟共和国和各省份领导人的地位，就像中世纪的贵族一样：只要他们忠于莫斯科的总书记（他们的国王），并吹捧莫斯科的政策，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为所欲为。”<sup>②</sup>于是，“党的寡头政治体制逐渐建立起来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外界很难对之施加影响的系统。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孤立的体制（排除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效监督）都将走向衰败。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决定着一个人的境遇，他职位的升迁，都取决于他的顶头上司。但是除了受公务关系制约的公开结构之外，又出现了一个隐性的、暗藏的结构，这个结构不仅受到职务关系的支配，而且受到诸如亲戚、民族、同乡等关系的制约。在争夺职位的过程中，每一位长官都可以因为置身于忠诚于他的人们之中和提拔水平不如他的人而得到好处。不仅如此，而且如果能收罗一些历史上有污点、听任摆布的人也不错，这样就可以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里了。其结果造成了反向淘汰和不称职干部体系的扩大。于是，建立家族式统治的基础逐渐形成了……渐渐地，地方上的苏共上层变成了家族势力和地方势力的集合体”<sup>③</sup>。

因此，从改革的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认为：“勃列日涅夫主义不是别的，它对于赫鲁晓夫改革当时国内极权模式的尝试是一种保守的反动。”<sup>④</sup>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②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44页。

③ [俄]B. A. 利西奇金、Jl. A. 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9页。

④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5~96页。

### (三) 停滞的社会状态

为什么所有的官员都喜欢勃列日涅夫？

因为在他手下可以享受生活而不必劳累工作。“下级捞钱给上级，上级收了钱再转送更高一级，不过也不会忘了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职位、军衔、勋章甚至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奖章，统统都变成了商品。”<sup>①</sup>

这种政治生态环境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结果：

首先，这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正如勃列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时人们的想法一样，选择勃列日涅夫，不是因为他的政治能力，而是因为他的政治类属——“自己人”。从 1964 年到 1972 年，勃列日涅夫经历了一个不短的执政历程，在这期间，他清除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并且使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上风，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有效改善。这一切的成就，对于一个热爱生活、喜欢美酒佳肴和礼物奖章的政治领导人来说，已经足够了。“目标都没有了，他只想获取人生的乐趣。”<sup>②</sup>早在 1966 年 7 月 28 日，在勃列日涅夫的倡议下，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成员工作制度的内部决定。工作日从早上 9 点至下午 5 点，中间必须休息，用于吃午饭。休假为每年两个半月。勃列日涅夫更是提醒他的战友们必须遵守这项规定。他说：“有些同志违反我们自己所通过的决定。本来已有决议禁止中央委员会机关将上班时间拖延至下午六点。可是有些同志，包括中央书记，却对决议置之不理。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这是不守秩序。请大家遵守已经通过的决议。”<sup>③</sup>

思想上的松懈，对生活的享受，使得勃列日涅夫非常热衷于迎来送往的“体面生活”。“当时总书记收到的礼物数不胜数。赠送礼物的传统是通过国际交往传到我们这块罪恶土地上来的，并且立刻找到肥沃土壤，发展到顶点。况且，谢德林和果戈里时代官吏的习惯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绝迹，像亲吻一样，大家又开始交换礼品。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每逢出行，必带大批礼品，从手表到金银饰品、香烟和器皿。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叶·克鲁奇纳曾

<sup>①</sup> [俄]列·姆列钦：《勃列日涅夫时代》，王尊贤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年，第 345 页。

<sup>②③</sup> 同上，第 407 页。

向我讲述给地方领导人和外宾送礼的情况，礼品的价值是相当可观的。勃列日涅夫最后一次出行乌兹别克，给共和国所有领导人都准备了礼物，包括他们的副手、副手的副手、助手、速记员、打字员，甚至包括给速记员开车的司机，为此花费数十万卢布的经费。我好奇地看着那个时代的各种货单和清单，不由得为这些工作人员的远见而惊叹。既然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能赠送这么贵重的礼物，那就不能责怪地方官员了。他们回赠的是贵重的胸花、宝石项链、戒指、配有金银枪套的手枪、各种黄金饰品及其他贵重礼品。这些礼品多半没收进国库，当时也不时兴把这些小玩艺儿上交国库。相反，却从国库中按废金银的价格拿出大量珍宝。”<sup>①</sup>在这种“体面生活”中，总书记与各地的第一书记们建立了亲密的“战友”关系以及由此而得到巩固的权力关系。

其次，这是苏联政治领导集团巩固权力的需要。根据负责苏共高层领导人身体健康的恰佐夫院士的观察，自1972年春天以来，勃列日涅夫就开始周期性地出现神经系统功能衰弱，并伴有失眠症状。慢慢地，由于对镇静和催眠制剂的过量服用与过度依赖，勃列日涅夫的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开始加速发展，其外在的表现就是开始丧失自我批评能力，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下降，并且常常多愁善感。尴尬的情况从一开始的间歇性偶发，慢慢变成了一种政治常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越开越短。戈尔巴乔夫回忆，为了不让勃列日涅夫受累，有的会只开上15~20分钟。也就是说准备的时间比开会的时间还长。契尔年科事先就讲好了，只要提出某个问题，马上就会有人插话：“全明白了！”与会者刚刚跨进门槛，就得向后转了，人们还以为问题都已通过政治局的审议。<sup>②</sup>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大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为了尽快作出结论和提出提案，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场面，契尔年科出面结束会议，大家急忙通过各种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2页。

议案,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政治局会议室。”<sup>①</sup>

按照勃列日涅夫的健康和智力状况,本应当提出他退下来的问题。从仁爱的角度和国家利益出发,这是人道而且相宜的。然而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根本不愿考虑告别权力的问题。他们要让自己和别人相信,勃列日涅夫离职会破坏平衡,破坏稳定。总之,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尽管自己已经行将就木。<sup>②</sup>作为“不可替代的人”,无论是政治局委员,还是第一书记们,抑或是中央各部的部长们都不愿已经年老体衰、已成病态的总书记离职。一方面“因为他们成了自己教区内的绝对主人。换言之,这里也同勃列日涅夫获得权力时一样,有个上述的‘共同协定’在起作用。照他们的意见,为维持风雨飘摇的稳定,也需要借助于受到仔细维护的等级制度,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地盘’,不可有非分之想。这种等级制度有时搞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它为一切都作了规定,甚至包括政治局开会时的座次。绝非戏言!似乎是同僚、战友在一起开会。何需客气?然而不,每个人都应各就各位。”<sup>③</sup>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总书记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于是,总书记成了象征!戈尔巴乔夫说:“他们联合起来拥护他,甚至处心积虑地吹捧他,提高他的威信。我在中央农业部工作的同事们向我讲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对待给他起草的报告的态度,通常同一题目的报告要起草两个,有时是三个。起草工作结束后,勃列日涅夫把写作班子召去,他先问,哪个报告写得短,然后给他读一遍。他自己不喜欢阅读,也很少提意见,一般总是最短的讲稿入选,于是总书记便拿着报告登上讲台。”<sup>④</sup>另一方面,尽管勃列日涅夫对管理党和国家愈来愈不感兴趣,甚至几次提起自己打算退休的话题。然而“党的王位周围的‘同志们’不肯让老爷子退休。一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摇摇欲坠,把体制的稳定当靠山,二是那些内心里设想过黄袍加身的可能性的接替者,不愿意让自愿退休的先例对权力终身制原则构成威胁”<sup>⑤</sup>。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0页。

<sup>②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sup>④</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1~32页。

<sup>⑤</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因此,为了向国内外人民显示勃列日涅夫仍然是健康而又睿智的,仍然能够带领伟大的苏联人民战胜腐朽的资本主义,他的亲信经常要完成一项政治任务:模仿总书记十分活跃的创作活动和组织活动。由于勃列日涅夫已经无法产生新的思想,已不能写字,更不能发表讲话,于是代理人、助手、顾问就以他的名义讲话。他们不断巧妙地编造报告和便函,发出信件和电报。每一次这样的(自然是“历史性的”)讲话肯定要引起极其广泛的反响。中央的每一个部都撰着这样的“反响”,那都显示了全民和全球的“反映”。<sup>①</sup>

最后,这是苏联封闭僵化体制自我保护的需要。1968年8月发生的旨在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领导的改革事件,成为勃列日涅夫调整苏联内外政策的重要标志。1968年8月20日,苏联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逮捕了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并最终将之逐出政府和捷共。1970年12月,勃列日涅夫支持的胡萨克成为捷共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新领导人。“布拉格之春”的发生,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一方面,勃列日涅夫下定决心中止了国内的改革。在勃列日涅夫沉闷的执政史上,柯西金的改革就像一道亮光闪过,绚丽但又短暂。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这一刺激经济活力的改革被迫中止。“布拉格之春”被扼杀是新政权同政治经济改革思想调节的真正结束。另一方面,苏联的对外政策迅速朝向保守主义退化。“具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这一离经叛道的构想,在莫斯科看来就无异于可与北约侵略相提并论的战略性威胁。<sup>②</sup>苏联不仅失去了改革的动力,更失去了改革的希望。“高级领导层对改革无动于衷和消极等待的态度,像危险的病毒一样出现在社会上,并很快传染开来。不管谁有大胆的设想,或有新奇的建议,都不想冒昧地去实现它。大家就这样在原地踏步,在沉默中等待。同时,社会紧张加剧的潜在条件在国内已经成熟,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危机现象不断增多,这一切都证明我们的社会已经重疾缠身,病入膏肓。这种疾病首先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化身。”<sup>③</sup>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1~92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sup>③</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伴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年事已高，政治上稳定高于一切的要求也应运而生。为了适应政治订货人的需求，作为体制仆人的党的机关的职能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原来的主要任务一贯是捍卫体制，使之免受震荡，免受外部世界变革的影响，因为这种变革可能动摇和削弱体制。如今对党的官僚来说，这样的“外部世界”渐渐地不是国外、西方，而是本国了。党的官僚感觉到，像原先那样依靠尚未消失的公民对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信仰以及斯大林式的恐怖来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已不可能，于是便开始营造自己的可以堵住外来“过堂风”的官员小天地。模拟生活的向上面传递安慰性的信息就成了机关的第一要务。这样的情形中央对地方的唯一期望就是报告“劳动成果”，而集中在党的智囊团——中央委员会以及为之服务的科研机构内的官僚精英，则终日冥思苦想，为总书记在党代表大会或者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硬凑出新的提法。“不仅国家政治生活，而且包括其他生活领域的日历，已渐渐地不是按照四季交替甚至不是按照日出日落来确定，而是按照总书记的公开讲话以及他那愈来愈少的国内巡视来确定。”<sup>①</sup>

由政治稳定而带来的全面的社会停滞<sup>②</sup>，成为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代特色。一则政治笑话以其独特的方式阐述苏联的历史。这则笑话：“列宁在知道了有关建设铁路的事情后，扛起一根枕木，与战友们一起，把枕木送到了工地；斯大林什么也没有扛，他是沿着新铁路坐车来的。他乘车前进着，而周围的一切都颤抖起来；赫鲁晓夫知道铁轨到头了以后，下令从后头拆铁轨，再向前面铺路；而勃列日涅夫把自己关在车厢里，下令放下窗帘，命令警卫人员摇晃车厢，以便造成车在行走的感觉。”<sup>③</sup>

社会的停滞掩盖了苏联社会不断累积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它压制了改革的冲动，蓄积了国内政治危机。“决定对我国政治史上的勃列日涅夫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② 也有人认为，对勃列日涅夫时代标以“停滞”的标签，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伎俩。“勃列日涅夫时期并非什么停滞的时期。‘停滞’一词是改革派及其西方教师爷口中的意识形态陈词滥调。”——[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③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61页。

主义的评价的主要之点，则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班子在时代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他们盲目地固守旧教条观念，对于标志着新文明诞生的科学技术中以及人们、国家和地区、整个国际社会的活动和生活条件中深刻变化的来临，竟然视而不见。对国内的变革设下重重障碍，整个国家走进了死胡同，注定要长期落后下去并且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sup>①</sup>但在另一方面，社会停滞暴露出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却也不断地培植着改革的社会期望。体制再怎么强大，“要冻结两亿人口大国的生活是不可能的，这种生活按照自身的逻辑，正裂解、分开、分离为现实与假象两个部分。在这个愈来愈大的缝隙中，非官方的影子经济和并行的隐蔽政治各得其所。宣传鼓动部门的宣传愈来愈难以抹平现实生活与其宣传画形象之间日益扩大的间隙”<sup>②</sup>。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然而对于苏联社会来说，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尽管来得很突然，却没有人因此感到震惊或失去自制力。社会各界也并不认为这是沉重的损失，尽管宣传机关十分卖力，但也许正好适得其反。“那些日子我们每个人当然都在以某种方式思考未来，思考国家处于怎样的境地、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前景。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当时大部分人都期待着锐意改革，改弦更张。”<sup>③</sup>

## 二、“安德罗波夫现象”与社会心理

1982年11月12日，苏共中央召开非常会议。时年68岁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安德罗波夫时代开始了。

然而令人难堪的时代虽然结束了，但是下面的路该怎么走呢？刚刚在1981年苏共第二十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满怀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6~97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5页。

疑问：“勃列日涅夫的去世提出一个问题：是否一切都将原封不动，我国社会是否将继续走向衰落，还是将出现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政治领导人的更新。因为我国是整个世界结构基础之一，不仅我国公民，而且国际社会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在回首当年的印象时，应当说当年的主要人物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勃列日涅夫变成又一位‘经典作家’，最伟大的‘权威’，借助于这个可以保住他过去的亲信，并且马上给新的领导人套上死框框。另一种倾向是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上保持克制，以便为激进改革哪怕创造一点机会。”<sup>①</sup>

1982年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主持了勃列日涅夫卸任之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他在报告中坦率地承认，“五年计划头两年的计划任务没有完成”，问题的关键是：“经济效率的主要指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能使我们满意。”因此，安德罗波夫要求加强工作者的责任心，要“整顿秩序”<sup>②</sup>。

从1982年11月12日至1984年2月9日，短暂的15个月<sup>③</sup>成为安德罗波夫的改革绝响，“但这段时间却给人们以希望”<sup>④</sup>。

### (一) 安德罗波夫其人

安德罗波夫于1914年6月15日出生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中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积极参加共青团工作。1936年起，安德罗波夫成为一名职业的共青团工作者，193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其后，历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共青团雅罗斯拉夫尔州委第一书记、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指导员（1950年起）。1954年，安德罗波夫担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担任大使期间，他成了镇压匈牙利1956年骚乱的关键人物之一，由此进入苏联高层领导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sup>②</sup>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459页。

<sup>③</sup> 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安德罗波夫有半年处于急救状态，有3个多月的时间在医院的重症病房做透析。

<sup>④</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人的政治视野。1957年，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1961年，安德罗波夫当选苏共中央委员。1962年11月，安德罗波夫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联络事务。1967年6月，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时，他被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4月，安德罗波夫成为政治局委员。这是“国家政治警察领导人第一次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在勃列日涅夫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安德罗波夫与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一起，在许多方面决定着苏联的政策。”<sup>①</sup>1982年5月，安德罗波夫放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成了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1982年11月12日，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对于他的当选，人们并不意外。“他担任多年苏联克格勃主席的职务。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在知识界和军界有广泛的联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国共产党中有很高的知名度，曾任驻匈牙利大使，后来主管同这些国家共产党进行联系的部门。他同许多国际问题专家、大使、外交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苏共各边疆区委和州委第一把手交往甚密，任命他担任总书记并没有使人感到意外。不仅如此，许多人把这件事看成是整顿国内秩序、严肃纪律、同犯罪现象作斗争的一次机会，但也有不少人对此心惊胆颤。”<sup>②</sup>

那么安德罗波夫到底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呢？他执政后会采取什么样的政治措施呢？这是安德罗波夫当选总书记后国内外普遍关心的主要问题。根据多勃雷宁的观察：安德罗波夫的感觉和观点是混杂的。他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在他的工人同伴和朋友中有许多带有犹太血统的人。“我从来没有听他讲过有关犹太人的笑话和轶事，这与其他一些领导人相反。他会在私人谈话中发表一些自由主义观点，但他又不是自由主义者。他坚决反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认为这不仅在国内，而且对我们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在所有人当中，正是安德罗波夫提议把萨哈罗夫流放到高基市。在政治局讨论萨哈罗夫案子时，我碰巧出席了这次会议（我是被召来汇报其他问题的）。安德罗波夫提出的主要理由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65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是，萨哈罗夫和他的夫人已成为国外反苏运动的经常性焦点问题，因此，只有把他们流放到对外国记者关闭的地方，才能切断他们同外国人接触的各种渠道。”<sup>①</sup>不过，实际的政治倾向与政治举措却得由安德罗波夫本人对苏联社会现状的观察分析结果来决定。作为曾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相比于其他领导人，安德罗波夫能够更为深入详细了解苏联社会的真实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是苏联社会发生危机的时期。每一个苏联公民都能亲身感觉到发生危机的明显迹象。此时，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城市里、乡村里到处都在传说着杀害苏联士兵的巴斯马奇分子的可怕故事。一边是电视台大讲“国际主义援助”，另一边则是死亡通知书接连传回国内。商店里空无商品。商品出现了“脱销”。商品不是去买到的，而是去“搞到”的。甚至连鞋子和蛋糕、衬衣和书籍、汽车和洗衣粉、电视机和药品，都需要人们去“搞到”。人们向往着“搞到”进口的录音机和避孕用具。一些商品是在“跳蚤”市场，在全国各个城市到处滋生的旧货市场上，花上超过国家规定价格一倍的价钱搞到的，而另一些则是通过在商店工作的“熟人”搞到的。许多城市实行了凭票证供应的制度，人们凭票买肉、油。日子好过的是那些有权在商店订购商品者。机关和组织（从厂矿企业工会到科技文化机构）要向“商业机构”，也就是有权给各个商店分配商品的国家企业打申请报告。在申请报告中请求：“以领导帮助的形式，批准我们购买紧俏商品给我在我单位工作的退伍老战士和劳动模范。”而日子最好过的是那些有权在机关内部供应商店、在国营百货商店特别供应部“提货”的人。党和国家的高级官员属于这一类人。当贸易被分配所取代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违法现象。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钱的问题。准确地讲，钱是一样的钱，但是用一样多的钱，普通老百姓能够买来的东西，比官员能够买来的要少得多，而一般官员，要比他们党内的同事能够买来的要少得多。因而，所有的人都羡慕那些由公家的黑色伏尔加车送货上门的人，并且在心里仇恨他们。部分给“老战士”准备的商品，从商店流进了“黑市”，在旧货市场上被以原价二倍、三倍的

<sup>①</sup>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583页。

价格倒来倒去。“影子经济”成了现实,各阶层的民众都参与其中。<sup>①</sup>

对于上述种种情况,安德罗波夫深深了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会议曾经多次讨论过这些问题。会议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些贪污腐败的行为和风气,“不是组织社会生活的社会主义原则是错误的,而是罪在贪污和钻营这些几十年来附着于国家船体上的毒瘤……贪污,欺诈,露骨的阿谀奉承在权力的高层发生,并且像地火一样在权力的各个阶层游荡”<sup>②</sup>。安德罗波夫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普遍的腐败必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于是,被称为“戴丝织手套的铁腕人物”的安德罗波夫,采取纪律整顿不仅是他任职国家安全委员会时提供的可靠路径选择,而且也成为当时情况下能够迅速取得社会成效的必然措施。“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目,安德罗波夫与党的最高领导层内的其他人相比,有着更好的情报保障。他从整顿国内秩序着手,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掌握着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任何一位领导人所没有的权力。只有他能够办成贝利亚因之而受到指责的事情:拉拢国家和党的机关,用人们对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极度恐惧,将他们捆绑在一起。整顿秩序,这首先要求党和国家机关按照他安德罗波夫提出的要求,根据党的领导人本人的愿望,进行工作。”<sup>③</sup>

安德罗波夫的政治方针已经确定了,这就是:“完善社会主义,以人民劳动创造出来的一切最好的方面为基础,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同时还要坚决摈弃消极的东西。”<sup>④</sup>

## (二) 短暂的安氏改革

1982年12月3日,安德罗波夫出席全苏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工作人员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1983年1月2日,《真理报》发表社论说,国家的战略是加快社会生产的集约化,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广泛应用科技。“所承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59页。

<sup>②</sup>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467页。

<sup>③</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65页。

<sup>④</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担的带来具有崇高的责任感”，乃是实现这一加快战略的条件。1983年1月7日，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了“关于按照中央11月全会(1982年)指示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尤·弗·安德罗波夫同志的指示和论断加强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的问题”。一连串的举动表明，安德罗波夫决心开始“整顿秩序”。“在俄罗斯，在这一口号下隐藏着许多内容。‘整顿秩序’，表明了国家政权机关严格遵守国家要求的决心。安德罗波夫试图复苏和恢复行政命令式的国家管理方法，恢复过去在斯大林时代曾经存在过，但在赫鲁晓夫时代，甚至是勃列日涅夫时代遭到了相当程度削弱的直接命令式的机制。”<sup>①</sup>具体来说，安德罗波夫“整顿秩序”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调整组织人事，激发党内活力。每次总书记的更替总是带来党内人事的组织调整，这已经成为苏联政治生活的常态。“党的总书记的职务或其他形式的领袖地位，一开始就给新领导人提供很多权力和可大有作为的条件，同时也要求他们承担重要的义务和重大的责任。但是这时候他个人的权力在很多方面还很有限，他在政治局中虽处于领导地位但还只是平等成员中的一员，因为随同新职务也同时继承了全部原先的党政行政机关，不可能很快组建起已由自己的‘班子’来领导的新的行政机关。”<sup>②</sup>在1982年11月22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全会“因健康状况”解除了基里连科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选举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利耶夫为政治局委员，并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安德罗波夫就组织问题简要发言时，向中央委员们通报说，鉴于现况必须特别关注经济，政治局认为有必要设立一个主管经济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职务，他推荐尼古拉·雷日科夫担任这一职务。全会同意了总书记的建议。其后，雷日科夫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经济部部长。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推荐，在此前当了17年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的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被任命为中央干部部部长。在利加乔夫的参与下，安德罗波夫加快了党的机关干部更新的过程。到1983年底，全国已更换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66~467页。

<sup>②</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20页。

了约 20% 的州委第一书记和 20% 以上的部长。<sup>①</sup> 为了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继续进行人事调整,中央委员会根据安德罗波夫的提议于 1983 年 8 月作出了基层党组织和区、市、地区、州、边疆区党组织于秋冬季进行总结改选的决定。该决定要求:“决不容许总结改选会议走过场,不进行认真的直言不讳的讨论,不容许事先审查与会者的发言,不容许压制首创精神和批评。”<sup>②</sup> 按照该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进行了以更新干部和改进工作作风为目的的总结改选运动。在区一级党代表会议上已经常常出现尖锐的批评性发言。在一些州和大城市,区党委领导成员更新了 25% ~ 30%。莫斯科市的各个区党委也进行了相当大的更新。总的来说,通过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一批具有改革意向的年轻干部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层,这为其后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奠定了一定的人事基础。

二是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反腐力度。党的作风直接关系苏共的形象。安德罗波夫就任总书记后,下了大力气整顿党和国家机关的作风。安德罗波夫要求党的机关必须按时上班,他每天早晨 9 点前准时到达办公室。一般召集会议时都是开的短会。更为重要的是,安德罗波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直存在并恶性膨胀的领导干部“特权”进行了有力遏制。他不仅结束了克里姆林宫的丰盛宴会,而且也停止了高级领导人奔赴全国各地的猎场和禁猎区打猎取乐以及向领导赠送价值几万甚至几十万卢布的习惯做法。同时,安德罗波夫下令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报关于党政机关高级干部拥有私人别墅和国家别墅的材料。这一举动引起了在莫斯科郊外和南方拥有豪华别墅的领导干部的惊恐不安。第一批登记造册的是勃列日涅夫及其家属的别墅。这个人数不算太多的家庭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拥有 8 座别墅。<sup>③</sup> 与此同时,从 1982 年 12 月起,安德罗波夫展开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偷盗国家财产的斗争。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审理大批经济案件。其中反响最大的是莫斯科一些商店经理的案件。结果是,有好几个人被枪决。对舞弊、腐败现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 年,第 338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342 页。

<sup>③</sup> 同上,第 318 页。

象实施的打击,以及在服务与商业领域开展的镇压行动,规模越来越大。之所以选择在商业领域开展反腐运动,这是因为:在这一领域,人们对危机现象的感受更加直观。“因为制度本身是没有罪过的,所以就要在商业领域找到有罪者。”<sup>①</sup>

三是整顿劳动纪律,提高生产效率。根据安德罗波夫的倡议,从1982年12月就开始了加强劳动纪律的运动,反对在生产岗位上酗酒。整顿劳动纪律,安德罗波夫从“令行禁止”入手。他采取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常用办法:增加民警巡逻队的规模和民众纠察小组的数量,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公园里,在普通的莫斯科澡堂、美容厅、高级理发厅、排队买紧俏商品的队伍里,在郊区火车上和电影院里,进行广泛搜捕和检查证件。没有带证件的公民常常被带到附近民警分局去“查明身份”。这种极其粗暴的整顿秩序的方法引起了受到这种搜捕的人们的极度不满。在党员大会和党的代表会议上引起了不少批评。所以在1983年1月决定取消这种代号为“拖网”的群众性的检查运动。对于酗酒,安德罗波夫没有妄想改变苏联老百姓的生活习惯,他曾说过:“光喝汤不喝酒,不是傻瓜就是木头。”因此他没有开展全面的反酗酒运动,也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提高酒价。他甚至让一种普通牌子的伏特加酒降价,老百姓马上管这种酒叫作“安德罗波夫卡”。为了从源头上控制酒,安德罗波夫规定:商店开始售酒的时间从每天上午10时推迟到中午12时。俄国酒鬼今日有酒今日醉,当天买酒当天喝,12时才开始卖酒,让酒鬼一早醒来无酒可喝,只好去上班。

四是改革经济体制,刺激增长速度。经过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长期停滞,计划经济下劳动者的积极性难以调动、物质普遍短缺的弊端越来越严重。为了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安德罗波夫在三个方面推进改革:第一,推行农业集体和家庭承包制,鼓励多收获者多得;第二,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推广承包作业队;第三,扩大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自主权,努力提高质量、提高效率。一连串的改革措施下来,苏联经济取得了初步成效:1983年苏联工业产值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扭转了多年来增长率不断下降甚至完不成计划的消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68页。

沉局面；工业产值增长了4.7%，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9%；职工报酬有较明显增长；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的景象得到明显改善。<sup>①</sup>

1983年12月26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全会主要讨论国家当前的经济问题，对当年的社会问题和经营管理问题进行总结。安德罗波夫因病没有出席全会。但是与会者都拿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呼吁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经济杠杆的作用，提高经济效益和集约化程度，更好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提高国家的科技潜力和保护大自然。然而此时的安德罗波夫已是病人膏肓，无法理事。1984年2月9日16时50分，安德罗波夫去世。苏联又面临着一个未知的转折关头！

### (三) 安德罗波夫现象

安德罗波夫去世了，但是其短暂的改革却给世人留下了无限而又遗憾的希望！“他的所作所为被视为普遍的更深刻的变革的开端。”<sup>②</sup>一种盼望革新的社会心理日渐成熟——这就是“安德罗波夫现象”。

什么是“安德罗波夫现象”？“就是一种期待和盼望新领导上台开始出现好的变化的普遍气氛。也可以说就是对那些在人们头脑中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的负面现象的拒绝与排斥，就是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坚信不疑。”<sup>③</sup>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安德罗波夫意识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如果不进行变革，那么这个体制本身就将面临灭顶之灾。但是“安德罗波夫毕竟是一个仍然停留在他所处时代的人物，属于未能挣脱旧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樊篱的那类人。我常想：他可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斯大林的种种罪行，但从来不曾提出过这类问题。他识破了勃列日涅夫一心想让斯大林的形象及其社会结构模式一并复活的企图，却甚至没有试图对此加以阻止。他在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阿富汗战争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在与‘异端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22页。

<sup>②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

思想’和‘不同政见’所作的斗争中呢？当时人们只要试图提出关于自由和人权的问题，便会被视作刑事犯罪。显然，多年在克格勃工作的经历以及这项工作的特点，给他个人的整体面貌、生活观念打上了烙印，使他变得事事多疑，并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他必须为这个制度效劳。”<sup>①</sup>

作为一个过渡性的领袖，“安德罗波夫现象”的出现也集中反映了当时苏联社会的感伤情绪和怀旧心理。“直到今天‘安德罗波夫改革方案’在党政机关里，尤其是在护法机关系统还有不少支持者。这里必须强调指出，这不是指机关里那些营私舞弊的人，他们常常与阻碍改革的主要原因有牵连，而恰恰是指坚定的反营私舞弊的斗士和思想上拥护专制体制的人……与此同时，如果认为只是行政机关的上层人物在怀念‘安德罗波夫时期’，那就大错特错了。遗憾的是，最广泛的社会阶层都染上了这种怀旧病。这里有好几个原因，首先是安德罗波夫办事比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果断和合乎情理，其次是他的政策没有触及社会制度的基础，没有破坏人数众多的各类社会群体已习惯的生活方式，也没有触犯他们的利益，再其次是在社会心理方面，这个政策没有破坏已僵化的群众意识，而是依靠了这种意识。”<sup>②</sup>

无论如何，安德罗波夫的去世，给戈尔巴乔夫极大的触动。从个人感情的角度而言，“对安德罗波夫的去世我倍感沉痛。国家领导层中又少了这么一个人，我同这个人曾经那么亲密和持久地联系在一起，我在许许多多方面都要感激他。在多年的岁月里，我总是向他倾吐自己的思想和疑难。我时刻感受到安德罗波夫那经久不渝的友善态度。他任何时候都不曾流露过一个老练的早已习惯于决定他人命运的政治领袖的屈尊俯就之态。我不能说他在我面前全然敞露了心扉，向我倾吐了他心中的全部积愫”<sup>③</sup>。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发展而言，安德罗波夫的确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和帮助。1983年4月，安德罗波夫委托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纪念大会上作了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sup>②</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420~421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

关于列宁的报告。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一次会议，同样受安德罗波夫的委托由戈尔巴乔夫主持。1983年秋季的苏共总结改选运动也是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进行的。甚至在1983年底的苏共中央冬季全会上委托戈尔巴乔夫致闭幕词。一连串的政治举动，“对全党来说是一个重要信号”<sup>①</sup>。

然而安德罗波夫的去世，却使戈尔巴乔夫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失去了强力支援。

### 三、“戈尔巴乔夫现象”与社会期望

1984年2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吉洪诺夫第一个发言，建议选举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一致同意。2月13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契尔年科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支持下，戈尔巴乔夫作为第二书记受命主持书记处会议并在契尔年科缺席的情况下主持政治局会议。

契尔年科的当选，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说其在情理之中，是就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而言。因为“安德罗波夫‘班子’的某些成员只是在两个月前才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所以在这个‘班子’已经没有自己领袖的情况下他们十分清楚，他们战胜老政治局委员（这个老既是直义上的老也是转义上的老）的机会太少。”<sup>②</sup>对于政治局的老近卫军们来说，“把契尔年科推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可以为确定合适的领袖争取一些时间。况且考虑到契尔年科品行端正，不是个卑鄙小人，也不冲动冒险，总的说，是个不会弄出乱子的人。那时候，候选人是戈尔巴乔夫的说法已流传开来，一些人对他知之甚少，另一些对他却非常了解。但这两种人对他又都有不少疑问，谁也不百分之百地信任他。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56页。

<sup>②</sup> 同上，第414页。

奇·契尔年科走上了权力顶峰”<sup>①</sup>。说其在意料之外,是就当时的社会心理而言。“契尔年科的领导能力和他的健康状况一样糟,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事实上,他已经是第三个这类领导人了。在他前面,勃列日涅夫庸庸碌碌,尤里·安德罗波夫在短暂任期内疾病缠身。从一切客观标准来看,人们早就期望着出现一个新的不同类型的政治领导人。10年来,苏联的国家政治领导人都是年迈而自满,他们缺乏创造力并坚决镇压任何有新思想的人。”<sup>②</sup>

事实上,“期待戈尔巴乔夫到来”的气氛早在1985年4月之前就形成了,也就是从知道安德罗波夫身体已不行之时开始的。在勃列日涅夫时人们就已为国家有羞辱感。“在契尔年科时整个社会生活变成了一出令人感到羞耻的滑稽戏。”<sup>③</sup>

### (一) 受挫的心理:契尔年科上台

对契尔年科个人及其家庭来说,当选为总书记有何意义呢?在契尔年科成功当选后,他的妻子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问这位年已73岁的总书记:“你这是怎么搞的,科斯佳,干吗答应这件事呢?”契尔年科无奈地回答:“应当这样,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年迈的契尔年科被推上苏联政治神坛的无奈辩解,也是逐步老化的苏联政治体制的妥协之举。“这个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无论从健康状况,还是从政治和生活经验来看,他都不适合占据苏共中央总书记职位。他的悲剧在于,在某些势力的压力下,他同意当选总书记,而且是在他的生命力殆尽的临终时期。”<sup>④</sup>

一方面,安德罗波夫短暂的改革使党内保守势力感到了危险,和当年选择勃列日涅夫一样,契尔年科是“自己人”。对大多数政治领导人、共和国、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19~220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50页。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4页。

<sup>④</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边疆区和州党委第一书记来说,这是当时最容易接受的方案。安德罗波夫短时间的统治让许多人感到害怕,害怕他的激进做法,害怕他改变和修正勃列日涅夫方针的尝试,因此选举契尔年科为总书记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契尔年科是一位与现存的党和国家权力制度血肉相融的人物。”<sup>①</sup>在高层领导中,大部分人是当年的老近卫军,虽然他们在极力延长自己的历史和生命期限,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在考虑尽快挑选一位新的领导人。此人一定要具有某种继承性,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继承性呢?客观地讲,老一代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充满担心和忧虑。他们都经历了赫鲁晓夫(他在个人品质、政治目的和业绩方面曾引起种种争论)时代,担心一个冒险主义者上台,那将使国家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要知道,正是赫鲁晓夫对破坏联盟与国家政体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苏联多数高层领导对戈尔巴乔夫也有过同样的顾虑,尤其是在安德罗波夫从未指定自己可能的接班人的情况下。安德罗波夫逝世后,在高层领导中的确找不出一位毫无争议的人、能让所有人或是大多数人满意的人、能获得大家信任与不负众望的人。年迈的领导人在自己这个圈子里找不出一位那时能令人接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年轻的政治家还没脱颖而出,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表现的机会。这样就选择了契尔年科,说他:“老马识途”,不会误事。<sup>②</sup>这样的做法使得中央政治局里保持了暂时的平衡。“元老派”——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葛罗米柯、谢尔比茨基、库纳耶夫、格里申,以及中央和地方那些支持他们的党的机关,努力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自己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和为数不少的党的机关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实际可能排挤“勃列日涅夫一代人”。然而不论是哪一派,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元老派”的时代在结束。任命契尔年科,只不过是将“长者掌权制”延续一段时间,这是提前为自己培养接班人所必需的。同时,许多党的干部、苏维埃干部和经济工作者、著名文化活动家和意识形态机关干部也对这个结局表示满意。“这些人中有一些是大把大把往自己袋里捞钱的影子经济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

的代表人物。”<sup>①</sup>

另一方面,契尔年科的当选表明:僵化的政治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苏联的社会新形势了。戈尔巴乔夫认为:“简单地说‘人性脆弱’是不够的。问题的实质更加深刻。社会未能掌握必要的信息进行选择。要是全社会都了解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的真实状况,得悉将近10年之久为国家掌舵的人竟然工作起来体力不支,那又该当如何!不过这种了解本身还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国家并没有权力更迭的正常的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入膏肓,甚至智力欠缺的人也能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sup>②</sup>接近高层的人们对契尔年科的情况都很了解,并且为此而感到痛心。他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身患肺气肿),根本无法掩饰。“堂堂一个大国,它的领袖原来不仅身体衰弱,而且重病在身,实际上已成残废。这对任何人都不成其为秘密,凭肉眼便可以一望而知。”<sup>③</sup>国家面临着许多困难,却由一个病人来执政。有人说契尔年科是个好人,现在“老好人”已经成为国家的一种工作方式的代名词。但在一个一人独揽大权、实际上是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国家,如果“老好人”是第一把手的话,绝不是什么好兆头。“所有人都期待着变化,这种令人忧虑的状况又持续了整整一年。契尔年科的不幸也证明我国社会和整个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如果我们还必须等更长时间的话,是否仍要感谢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潜力和储备呢?不知为何,我们总是很少从这方面去考虑我们的历史与现实,考虑社会的能力及其可能性。”<sup>④</sup>

登上大国政治权力的顶峰对契尔年科来说只是个人的胜利,是当时具体形势使这个几乎无法实现的愿望得以实现了。很难理解,一个73岁高龄、体弱多病的老人竟决定迈出这么不明智的一步。他成为拥有千百万党员的政党的领袖,成为这个大国危难之时的领袖,用正常心理是无法理解这种决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53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sup>③</sup> 同上,第110~111页。

<sup>④</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21页。

定的。对于契尔年科同意当选总书记的这个举动只能解释为他缺乏现实感,有太强烈的,甚至在垂暮之年还这么强烈的权力欲望。“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契尔年科是在战友们的劝说下才占据这个职位的,以便不让那些有可能改变力量对比和当时政治局许多人制定的传统方针的人上台。”<sup>①</sup>无论如何,“契尔年科执政的13个月是一个奇怪的时期。政治局选择了‘最不合适的、最不方便的人’,这种实用主义近乎恬不知耻(这哪里是近乎恬不知耻!简直远远超出了政治上恬不知耻的界限!)”<sup>②</sup>。

1985年3月10日19时20分,苏共中央总书记康·乌·契尔年科去世。晚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建议戈尔巴乔夫担任契尔年科治丧委员会主席。按照苏联的政治传统,这意味着下一任总书记就是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11日下午5时召开的苏共中央紧急全会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了礼节性的讲话。“但会场气氛中没有丝毫的伤心和悲痛:人们想的是,这是一个偶然处于不应有地位的、摆脱了磨难的……使安德罗波夫赋予国家的那种飞速发展停歇下来的可怜的人。在场的人眼中有一种如果不是明显的,那就是深藏在心里的‘喜悦’:俄罗斯摇摆不定的时代结束了,俄罗斯该有真正的领导人了。”<sup>③</sup>

## (二) 戈尔巴乔夫:精力充沛的人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戈尔巴乔夫?难道就没有其他人选了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苏联解体以后,人们对这一问题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

1985年3月11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详细记载了戈尔巴乔夫当选的经过。在恰佐夫院士报告了契尔年科病故的医学结论后,主持会议的戈尔巴乔夫说:

我们今天开会要解决有关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的葬礼、人事

①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②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94页。

③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安排以及提前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的问题……考虑到除谢尔比茨基同志外,他现在正在途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苏共中央全体书记都出席了会议,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人选问题。请同志们就这个问题发言。

葛罗米柯首先发言。他说:

当你考虑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人选时,你当然会考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以我之见,这是绝对正确的选择。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和他一起共事了七年。我记得,当年讨论调米·谢·戈尔巴乔夫到莫斯科工作时,列·伊·勃列日涅夫曾征求过我和其他同志的意见。我毫不怀疑,当时我们大家都正确地支持了这一建议。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他才华横溢,渴望多做工作,做好工作。

第二,待人的态度。一个人的地位越高,越要注意人际关系,讲原则,严于律己。我从未听说过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刚愎自用。没有,他总是把党的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第三,米·谢·戈尔巴乔夫有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这就是在边疆区以及中央工作的经验。他做过中央书记,做过政治局候补委员,最后是政治局委员。他主持过书记处会议,后来在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不在时主持政治局会议。做这项工作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沉着、党性。这是非常可贵的品质。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恕我直言,我们中许多人不可能未卜先知,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无权容许我们的团结一致遭到丝毫破坏,无权让世人发现我们关系中的裂隙,以防国外利用这个问题兴风作浪。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对我们伟大事业的责任,应当团结一致行动。

我不认为自己提到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全部品质。不过我认为,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选举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我

们不会错。我想再次强调,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不过,这些经验应当再加上我们的经验。我们保证给予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以尽可能的协同和帮助。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可以完全指望这种协同和帮助。<sup>①</sup>

葛罗米柯的发言一锤定音,决定了讨论进程。葛罗米柯是党的领导人中的元老,不久前,勃列日涅夫本人也不得不倾听他的意见,在政治局的“老人”中,他是毋庸置疑的首领。他的支持意味着,“老人们”支持把戈尔巴乔夫推到党内最高职位上。他们与戈尔巴乔夫事先达成了妥协。作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竞争对手的格里申也支持葛罗米柯的提议,从而“结束”他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权力之争。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切布里科夫的发言则进一步给予了戈尔巴乔夫强有力支持。他意味深长地说:

今天我来参加全会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商量过。我们的部门是这样一个部门,它不仅要精通外交政策问题,而且还有内部的、社会性质的问题。正由于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契卡工作人员委托我推荐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的候选人。你们知道,契卡工作人员的声音,我们的声音——这就是人民的声音。<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在最后讲话中感谢政治局对他的一致肯定。他指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很复杂的转折时期。我们的经济需要有更大的推动力,我们的民主和对外政策也需要这种推动力。”他还说:“我们不需要改变政策。它是可靠的,正确的,真正列宁主义的。我们必须加速前进,揭露缺点并加以克服,看到我们光明的未来。”<sup>③</sup>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02~503页。

<sup>②</sup>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475页。

<sup>③</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05页。

在随后召开的苏共中央紧急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

### (三) 政治代沟: 不用为过去负责

从上述记录可以分析出,戈尔巴乔夫的当选得益于以下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首先,就体制威信来说,再选一个像契尔年科一样高龄多病的领导人出来已经行不通了。“契尔年科的统治也变成了笑料,变成了对勃列日涅夫的丑化,也变成了对安德罗波夫的丑化。”<sup>①</sup>选择强而有力的领导人,不仅是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苏联体制外在形象的具体表征。一个强壮精明的领导人,往往代表着体制的活力和威信;一个衰弱多病的领导人,往往预示着体制的虚弱与无能。“已成电视系列片<sup>②</sup>(如果将我国当时所经历的国葬叠加在一起的话)的党的领导人的亡故已经像是体制的濒死状态。几个苏联官僚‘家族’担心新的权力交接会变成政治纷争,那不仅会有损纷争参加者的声誉,而且会有损体制本身声誉,他们立即开始竭力推荐他们认为最有前途、可给老化的机体血管注入新鲜血液的王位继承人。他们选中的人是戈尔巴乔夫,这完全顺理成章。”<sup>③</sup>作为政治局的老人们,必须考虑到勃列日涅夫之后连续发生的党的总书记的短暂政治生命带来的社会情绪的强烈不满,虽然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关键时候往往会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在“上层”那里会有而且确实有不满戈尔巴乔夫当选的人,但是没有人具备他那样的条件:担任党的最高领导成员的时间较长,1983—1984 年期间在两三个地方做党的领导工作,因而有影响干部配置的实际可能性。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他的年龄,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54 岁简直是青少年!对于那些曾经因国家领导人年迈而感到惭愧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因论资排辈移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495 页。

<sup>②</sup> 注:1980 年,阿·尼·柯西金去世,1982 年 1 月——米·安·苏斯洛夫去世,1982 年 11 月——列·伊·勃列日涅夫去世,1983 年 5 月——阿·雅·佩尔谢去世,1984 年 2 月——尤·弗·安德罗波夫去世,1984 年 12 月——德·弗·乌斯季诺夫去世,1985 年 3 月 10 日,康·乌·契尔年科去世。全国到处流传着一个恶意的笑话:苏联发明了一个新的体育项目:灵车追逐赛。

<sup>③</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69 页。

交国家权力而痛心的公民来说，“这一情况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党机关不能不考虑这种情绪”<sup>①</sup>。人们再也不想看到苏联掌握在一个衰老无能领导人的手里。所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一事确实得到人们的赞成：其中既包含兴趣，又有好奇，还有期待。“人们一致赞成年轻领袖上台，因为这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年迈的老人担任这一职务的传统。”<sup>②</sup>

其次，就党内情绪来说，对现行体制以及苏联社会实际状况真实的了解，让党内许多干部产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的想法，必须改变现状的情绪在苏联庞大的官僚体制机器中开始蔓延并不断滋生着改革的土壤。苏共二十大使苏联体制经受过一次重大的变革，但并未完成；随后又着手对体制搞过一些革新的尝试，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开始阶段。但有一样事实，即党内不断成长起来一批或者一个阶层的潜在的革新者，这个阶层一次比一次行动更加大胆，而且能得到苏共党内更加广泛的支持。后来担任戈尔巴乔夫政治秘书的博尔金就认为：“在党内，在人民中间，相信新领导精明能干、思想解放的人越来越多。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前几年里说话根本没有人听。我还想重申一下，戈尔巴乔夫在1985—1987年间的讲话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的大业，应该继续建设它。社会主义的原则没有改变，而且将来还要实现主要目标——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最初，这些公理就是戈尔巴乔夫所有构想的基础，而且我认为，他当时也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对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的态度无疑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心愿，国内所有的人确实盼着转变，而且是彻底的转变。他们期待着经济、外交、社会民主化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希望有新的刺激办法，希望解除对各级党委和党组织的活动的束缚。”<sup>③</sup>因此，契尔年科的去世以及戈尔巴乔夫竞争总书记的优势，让人们看到了这种希望，并因此而愿意为之付出努力。政治局的“老人们”懂得：“如果非要从年迈的领袖中推举出一个人来，他们也得不到中央委员和人民的支持。舆论当时也倾向于较年轻、较有朝气的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01~502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27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95页。

总书记,于是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sup>①</sup>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认为:“我们当时安葬了一个又一个,接连三个。社会上人心惶惶。地方党委书记的情绪也倾向于选一个更年轻的人。”<sup>②</sup>况且,作为在中央高层任职多年的戈尔巴乔夫,对于党和国家的许多高级领导人来说并不陌生,就像葛罗米柯在推荐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时所说的,他是一个注意人际关系的人。所以“党和国家精英的各个家族(从州委书记、各部部长和高级将领到科学院圈子的自由主义者)把他们那不仅相去甚远,而且往往相互抵触的希望同可能的新领导人联系到一起。不过,因对自己未来命运担心而联合起来的他们,准备齐心协力地支持一个人,此人与其说是以外表和年龄,倒不如是以行动纲领令人产生了走出困境的希望。”<sup>③</sup>

再次,就权力流动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历极大地刺激了党内高级干部的权力欲望,“老人政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在党的机关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表现出来,那就是“社会电梯”完全陷于停顿,即干部的上下流动大大减缓了。由于实际上的党的寡头的王朝式统治,干部流动系统受到破坏。那堵塞党和国家血管的血栓,不仅使中央临床医院的主顾,而且使整个体制都开始面临梗塞的危险。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些几乎相信自己长生不老的党内高层,迫于子孙的压力,悄悄地开始将国家别墅,甚至位高权重的职务即权力本身也遗留给后代。如果说在斯大林时代,体制所培养的最有活力、最骄矜的人的提升,是通过定期进行的、可以创造新的空缺的‘清洗’和迫害来实现的话,那么到了停滞时期,职务升迁的机会就得等上几十年。”<sup>④</sup>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消息传来时,不仅勃列日涅夫衰败时期思念年轻“铁腕人物”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而且苏联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深表赞许。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秘书格拉乔夫着重分析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这种政治心理:“他是属于他们那个圈子的人,曾几何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1~12页。

<sup>③</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69~70页。

<sup>④</sup> 同上,第48页。

时,他也在处理应对他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他眼下尚未变成可望而不可即的莫斯科天人。此外,陷于停滞的克里姆林宫精英尽管很不情愿,却不得不让这位来自‘旁门左道’、来自外省的人进入自己的圈子,这个事实本身就让许多人感到有了希望:患硬化症的党的系统中即将恢复干部流动,新的任命也不会带有王位继承的性质,也就是说那些在党的田野上‘耕耘’的人有了晋升的机会。况且大多数书记认为,若是出现另外一种‘牌局’,那么他们每个人都可能登上他的地位。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青云直上引起诸如叶利钦这样的人的嫉妒(叶利钦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这个更加重要的工业洲的书记呢?’)的话,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说,他的成功就是一个令人抱有希望的明证:他们的努力不会白费。机关的中下层期待着年轻有为的领导人上台会带来变化……有些人(这种人占多数)希望进入必不可少的干部革命的主流并利用腾出来的空缺,另一些人则指望领导年轻化本身即可恢复党在社会中业已丧失的威信。”<sup>①</sup>

最后,就苏联社会来说,渴望领导人年轻富有活力的心理是很强烈的,生活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这一点正是戈尔巴乔夫的优势所在。早在契尔年科去世前,人们在地铁里、在电车上、在饭厅里不顾“人还活着”,大声议论着支持戈尔巴乔夫。人们对天灾人祸和官方的无能已感到疲惫不堪。可是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却寄予很多希望,就像当初期待安德罗波夫一样。“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了20年七八十岁的老人之后,他看上去相对年轻,代表了占全国人口大部分的另一代人。这是个不用讲稿讲话的人,这简直是个奇迹,因为像他这样级别的党魁,似乎完全丧失了不看讲稿‘当众’讲几句话的能力。人们把戈尔巴乔夫视为一个正常的、活生生的、自然的人,仅此一点,就使人们对他的巨大好感。”<sup>②</sup>所以相比较于其他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的上台,都没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受到国内外的普遍欢迎。老百姓都兴高采烈。开车的说,“司机们”都很高兴,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还说,要治理我们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76~77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05页。

这样的国家,需要马匹那样强壮的身体,而那个人(死者)——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痨病鬼。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上,推我出来,我就会说:“伙计们,算了吧!我干不了!”<sup>①</sup>而对于西方而言,正像一位美国记者达斯科·多德尔当时所说:“他步履矫健,谈笑风生,衣着合体。”因而他使世界感到惊奇和迷惑。<sup>②</sup>

可以说,改革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主客观条件。

一方面,戈尔巴乔夫的周围已经开始聚集了他的“志同道合者”。安德罗波夫短期上台执政的主要结果,是他吸引了新一代干部来担任国家领导工作。他在戈尔巴乔夫周围集聚了尽管在观点上五花八门的一批人——从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到雅科夫列夫还有叶利钦。表面上郁郁不乐、谨言慎行的安德罗波夫,在誓与勃列日涅夫主义一刀两断的人起跑时推了一把,这些人在这方面可以比他自己走得远得多,“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历史的包袱,也不必为过去的事情负责”<sup>③</sup>。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相对于赫鲁晓夫的优势。“赫鲁晓夫尽管有一些不错的天性,但他自己原来就是一个打手。他在残酷年代是斯大林在乌克兰的仆从之一,他在投入非斯大林化的任务时自己的双手也不干净。相比之下,戈尔巴乔夫是在比较平顺的时期作为律师和官僚沿着权力的阶梯升上来的。”<sup>④</sup>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承认:“我当时想,原教旨主义者那一代正在退出,我们新一代正在接替他们,我们这一代人不应该为众多的过去承担责任。”<sup>⑤</sup>

另一方面,当戈尔巴乔夫成为新任总书记的时候,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有时被称为后工业化时代,有时被称为信息时代。而当时苏联还没有走完工业化阶段。它越来越落后于国际社会的生活,使更新成为可能的进程。当生活在苏维埃制度下的人们突然发现:“这个制度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亞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53页。

<sup>③</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sup>④</sup> [美]《波士顿环球报》1988年6月8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88年6月13日。

<sup>⑤</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9页。

明显地没有效率,对美好生活的允诺都是骗人的话时,他们就对政权和党失去了信任。政权和公民之间的断裂不断扩大,这是这个制度变弱的根本原因。”<sup>①</sup>当然,缓慢的腐朽还可能持续若干年。但是解开结子的结局还是越来越快地逼近了。于是,根本改变国家的发展取向的条件,不仅是经济条件,而且是政治心理条件,都已经成熟了,进行改革的条件成熟了。“从苏共 20 大一直到 1985 年,正是在精神领域中进行着形成雏形的公民社会的进程,这时在官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旁边,对生活、社会组织和人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另一种不同的看法正在为自己奠定基础。当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他的改革政策的时候,正是这个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精神领域中发生的变化和社会上积聚的一批持批判态度的、要求改革的人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sup>③</sup>。

---

①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32 页。

② [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张达楠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134 页。

③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 年,第 21 页。

## 第二章 “多一点社会主义” ——改革的思想原则

戈尔巴乔夫认为,观念是改革的“发动机”。在苏联这样的国家里进行改革,首先要从变革社会观念起步。“重要的是开动‘改革的发动机’,并且要‘行驶到’已经无法再掉过头来走回头路的那个点位。”<sup>①</sup>

那么改革的观念是什么呢?从1985年4月的中央全会一直到1991年7月的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始终强调改革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多一点社会主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认为:“不能说改革是有严整的理论为指导的,但它的基本轮廓是设定的。改革基本原则的依据是列宁的论断:如果不迈向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前进。由此产生一个口号:‘社会主义成分越多,民主就越多!’由此产生的时代关联,政治继承性,社会在苏维埃框架下、在不改变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基础上的完善。这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允许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存在;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在制定改革政策时,我们依据的是经济和民主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理论(一个推动另一个)。由此,要求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同时进行改革。”<sup>②</sup>然而“全部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sup>③</sup>。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多一点”又包含了哪些内容?从坚持列宁式的社会主义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嬗变,戈尔巴乔夫坚持的“多一点社会主义”的改革原则其实在其内涵上已经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8页。

②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350页。

③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38页。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本质变化。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一部什么都按照章节、条条、规则和原则分别写好的教科书。它将随着社会主义本身一起形成，将随着促使国家变成一个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文明、精神生活丰富、自由幸福的国度。“随着我们重新掌握全人类的价值观念，不是把它作为某种阶级方面异己的东西，而是作为正常人应有的正常的东西来掌握。”<sup>①</sup>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多一点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政治民主化、意见多元化和权力的分权与制衡。

## 一、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一个渐进的嬗变过程。

在 1985 年 3 月 11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加速”并不是要来一场革命，而是“要改善这个制度”。在 1986 年 2 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前夕，戈尔巴乔夫在同前来参加大会的各国领导人会见时又对改革思想作了新的阐释：“我们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主义的潜在条件。诚然，在西方那些等待我们摒弃社会主义的人最终将失望。我们是不会摒弃社会主义的。相反，我们需要多一点社会主义、多一点民主、多一点自觉性。而这就意味着需要多一点思想上的积极性。”<sup>②</sup>1987 年 11 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是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的转折标志。在书中，戈尔巴乔夫一边强调：“我们是按照社会主义的选择进行各种改造的，我们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而不是在社会主义之外去寻找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案的。我们是用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各项成就和错误的。那些希望我们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一定会大失所望。我们的整个改革纲领，不管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38 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74 页。

是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从各个部分来说,完全是建立在多一些社会主义和多一些民主这样一个原则基础上的。”<sup>①</sup>但是戈尔巴乔夫却又在“完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自发的过程,而是这样一件工作,它要求作出极大的关注,要求正确地、不抱成见地分析问题,要求坚决抛弃过时的东西”<sup>②</sup>的旗下,不断地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丰富发展”,直接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坚持固守的以阶级观点为根基的社会主义引上了通向以全人类利益为核心的新思维的道路。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文章,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具体论证,提出了“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sup>③</sup>紧接着,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的新年讲话中说:“过去的一年,我们受益匪浅。许多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今天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已经与一年前不同了。现在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我们为之奋斗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建立自由的和公正的社会。”<sup>④</sup>

至此,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所必须遵循的思想原则已经被彻底地改头换面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么,这一切又都是怎么发生的呢?

### (一) 破除对外部世界的扭曲观念

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思想突变,有其形成发展的客观基础。当戈尔巴乔夫想推行国内改革的时候,他面临着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如何看待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世界,更准确地说,如何看待西方世界。能否解决好这一问题,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这一问题既是苏联传统国内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② 同上,第48页。

③ 康绍邦等编:《苏联东欧近期资料选编(1989—1990.3)》,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内部参考资料,第4页。

④ 王正泉:《戈尔巴乔夫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外关系整体认知的直接反映,而且也是为实现和维护这一认知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的主要塑造力量。“极权主义的对外政策遗产就是这样的。就其本质而言,极权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也无论有什么样外包装,都不可能没有一个严格的意识形态体系和政治体系,也不可能没有一整套清规戒律,而这些清规戒律是歪曲现实的,只有一个用场,那就是为制度服务,创造条件巩固它,使‘它的忠臣和信徒们’形成一种对这种制度有利的思维方式。”<sup>①</sup>只有把这一问题搞清楚了,戈尔巴乔夫才能说服他在政治局的战友们,才能带领整个党开始改革。

事实上,从“新思维”的字眼在代表大会出现的时候开始,戈尔巴乔夫把任何国内大事都同苏联对外政策联系在一起了。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在代表大会召开后,我们立即着手坚决在国际事务中贯彻代表大会的路线,尽管我们于1986年1月15日提出的纲领事实上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我们的确想达成裁军的协议。在这些问题上玩不诚实的游戏是不可能的。相互欺骗是谁也不能得逞的……这不只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这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这里就清楚地看出了新思维的必要性。它的迫切诞生,是因为我们走到了一个极限,超过这个极限将开始无法控制的进程,这是我们多次指出的。”<sup>②</sup>具体来说,破除对外部世界的扭曲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戈尔巴乔夫既有其现实考量的政治考虑,又有其变革认识论的思维考虑,也有其个人的情感认知。

从现实考量的政治考虑来说,作为“冷战”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苏联的国内政策从来都是与国外政策紧密关联的。甚至在相当意义上说,国内外政策实质上就是苏联国家政策的一体两面。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如果他想使任何国内的改革计划——无论多么温和的计划——获得成功,他就必须创造一个更为缓和的国际环境”<sup>③</sup>。基辛格也指出:“戈尔巴乔夫面临恢复官僚机构的纪律性和使之重新具有活力的艰巨任务,因而不想在对付国内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11~212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85页。

问题的同时又遇到国际紧张局势。他还需要一个平静的国际环境,以获取西方技术和信贷。”<sup>①</sup>正如戈尔巴乔夫在争取无核世界国际会议上所言:“我们的国际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取决于国内政策,取决于我们关心集中力量完善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持久和平,需要国际关系的预见性和建设性方向。我们希望,整个国际社会最终能认识到我们希望使自己的国家变得更美好,谁也不会因此而变坏,全世界由此只会得到好处。”<sup>②</sup>而就当时戈尔巴乔夫面临的情况而言,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国际局势的缓和,以便集中精力推进国内的改革,就需要苏联作出积极主动的举措。这首先表现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变化上。戈尔巴乔夫认为,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则是不可能的。“这个道理大概不证自明。作为开头,至少也得把‘冷战’的积雪扫除干净,把由于我们被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靡费精力的军备竞赛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所造成压力缓解下来。必须认识到,无论就国内而言,还是就国际而言,‘长此下去是不行了’。”<sup>③</sup>而外交政策要缓和并取信于西方世界,就必须调整国内的军事政策,即降低军费开支、减少军工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追求在军事上一下子对所有可能的对手都占优势(而这样的方针是有过的),结果是在一些年份里,用于军事准备的开支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5%~30%,也就是说,比美国和欧洲北约国家的同类指标高出了4~5倍。很明显,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应该停止奔向深渊。必须最严肃地关注对外政策问题,这已经是一件紧急的,刻不容缓的事情了。”<sup>④</sup>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紧急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同时重申了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平和进步的方针”)。指出:“今天人类面临的如此可怕的威胁,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摆脱现状的唯一理智的出路,是对立的势力谈妥立即停止大气层军备竞赛,首先是核竞赛,不允许在外层空间进行这种竞赛。在诚实

① [美]《新闻周刊》1986年10月13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年11月4日。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87年2月20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2月26日。

③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3页。

④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和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不去企图‘胜过’另一方,不要求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sup>①</sup>1985年4月的苏共中央全会第一次对国家对外政策将要发生的变化作出了界定。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说:“我们主张基于真正尊重国际法准则的,平衡的,有分寸的,也可以说是文明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应该十分清楚的是:只有在帝国主义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两种社会体系之间的历史性争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把国际关系引入正常合作的轨道。”<sup>②</sup>1985年11月,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会晤。在总结这次会晤时戈尔巴乔夫说:“国际关系现阶段的特点是各个国家更加相互联系在一起了,它们更需要相互依存,在这个阶段上需要有一个新的政策。我们认为,新的态度需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现行政策最好能从当今世界的种种现实中吸取营养。这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富有建设性的最主要的前提。这也将会导致改善世界局势。”<sup>③</sup>1987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访美。8日,苏美两国首脑签署《中短程导弹条约》。条约本身是变化了的形势下结出来的第一颗成熟的果实,是走出“冷战”的开端,<sup>④</sup>也是戈尔巴乔夫引导苏联在重新认识西方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1990年初,苏联领导人声明要逐步改革欧洲力量平衡的旧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冷战”年代形成的,而且首先是建立在军事对抗基础上的。表示准备通过和盟国谈判把部署在外国领土上的苏联军队撤走或减少。声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苏军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回国内。稍晚些时候,又决定将苏军从德国撤回。

从变革认识论的思维考虑来说,戈尔巴乔夫认为,多年以来形成的苏联对外政策,与其说是在于苏联的对外政策本身、在于苏联外交官的活动,不如说是在于作为对外政策和活动的基础的那些观念。“那些观念依据的是教条的世界观,而不是现实,不是对局势的清醒分析,也不是要保障国家和人民的现实的切身利益。是这些观念在引导苏联对外政策同整个周围世界保持强硬的对抗(当然,那些被看成是盟友的国家除外,但是他们在我们的

①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22页。

② 同上,第225页。

③ 同上,第227~228页。

④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61页。

政治理论框架里多半只占有从属地位)。”<sup>①</sup>1985年3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前来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外国代表团团长。戈尔巴乔夫在和法国总统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到了该提出这样问题的时候了:继续走向何处,是不是到了该停下来考虑做出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不让世界滑向后果甚至难以预言的核灾难的决定的时候了。”在和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以及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谈话中指出:“苏联将根据对自己作为一个大国的作用和责任,推行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我们和所有国家的关系中促进国际局势的健康化,创造条件拓宽国际联系,拓宽文化珍品和科技成果等的交流……每个国家都有始终不变的利益。可能在推行自己政策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利益。不能以有力量就有理作为出发点……”<sup>②</sup>1985年5月8日,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今天唯一理智的出路,是为着大家和平的未来安排所有国家的积极合作,建立、利用和发展可以找到民族、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最佳的相互关系的国际机制和建制”。这个提法的推出说明,苏联对外政策观念不同于过去的年代,已经开始脱离狭隘的阶级立场并考虑到新的世界现实。<sup>③</sup>在同苏联驻美大使之后作为苏共中央书记分管外交事务的多勃雷宁的私人谈话中,戈尔巴乔夫表现出他本人既持有传统观念,同时又对苏联教条主义方法极不信任以及采取灵活性的潜力。据多勃雷宁观察:“戈尔巴乔夫的两个思想比较突出,而且对于一位苏联领导人来说,这些思想也并不那么新鲜。首先他坚信我们不能靠武器的威力来取得战胜‘帝国主义’的胜利,同时不结束军备竞赛也无法解决我们的国内问题,再者我们必须想办法最大限度地把美国军队从西欧撵出去,而达此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减轻世界紧张局势,并一步一步地从欧洲撤出苏美军队。对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越洋返回家园,而对我们而言,撤退仅仅是回到几百公里外我们的边界内,这样欧洲国家依然明显地感到

①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② 同上,第223页。

③ 同上,第226页。

这些军队的存在。这是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方面最初的一些想法。”<sup>①</sup>

从个人的情感认知来说,以党的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西方国家(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联邦德国)的最初数次旅行,对于戈尔巴乔夫和陪他去“休息和疗养”的赖莎来说,才是真正到了开阔的国外宇宙空间。戈尔巴乔夫至少有了两个重要的发现:“第一,原来苏联人远非生活在最好的世界里(党的宣传机关总是十分卖力地作这样的鼓吹)。热情接待来自社会主义祖国的使者的,不仅有照例靠剥削劳动人民致富的剥削者,而且还有被剥削者本人,至于被剥削者的生活和劳动条件,那是苏联的领导阶级只有在梦中方可得见。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发现是,那个使我国人民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不得不节衣缩食的帝国主义包围圈,到了近处一看,非但并不是那么充满敌意,而且有时还相当的友好。”<sup>②</sup>这种切身的感受更是让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传统外交政策大加鞭挞,并力主用新的思维开启外交新局面。1985年5月底,戈尔巴乔夫召开关于苏联外交新作用问题的外交部会议,并邀请驻各国的使节、在莫斯科的“外交界精英”到会。戈尔巴乔夫非常重视此次会议,“把这次会晤看作全面贯彻新思维工作的开端”<sup>③</sup>。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对外交部门进行了严厉批评:外交机构跟不上步子,滞后于政治领导班子的构想和实际步骤。在1987年12月1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作了关于访问美国的报告。他说:“在华盛顿,我们也许第一次这样明显地在国际政治中感觉到什么叫人的因素。在这之前我们只满足于一句老生常谈:在对外政策中国家领导人政府首脑之间的个人接触以及总的说在决策者层次上的交流很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这背后大家仍然认为,这里说的即使是个人接触,但也是对立阶级的和不可调和的制度的代表人物并且仅仅是‘代表人物’之间的接触。对我们来说里根仅仅是美国资本主义和军工集团最保守的一部分人的代言人。不管怎么说,政治家、包括国家领导人,如果他们真的是有责任感的人,他们也会体现最普通老百姓的那些单纯的

<sup>①</sup>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646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4页。

人的品质、利益和希望,这一点也是有意义的。特别是体现那些在选举中投了他们的票的人和同胞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个人才能有关系的人的利益和希望,还有国家的尊严和爱国主义。因此他们也有可能遵循最正常的人的动机和感情。我们时代的所有这一切,对做出某种政治决策看来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对此作好了准备——自己也想往这方面努力——以便响应与美国领导人这方面的接触,以及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接触,也就是把直接意义上人的因素带进国际大政治中去。这也是新思维的重要细节。它也提供了自己的成果。这一点我们在华盛顿好像第一次如此明显地感觉到了。”<sup>①</sup>

正是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戈尔巴乔夫认为:“我们认识到了必须破除对外部世界的扭曲观念,它几十年来使我们和外部世界对立,这不仅仅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对社会意识,对科学和文化,对国家的知识潜力,都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当代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闭关锁国、思想封闭、与全球的发展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在和其他社会互动而又保持本色时,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我们认识到,不顾及他国的安全利益,就无法保障本国的安全,而在核时代不可能用军事手段建立起可靠的安全。这促使我们提出了全新的全方位安全观念。全方位安全囊括民族间关系和国家间关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人权。”<sup>②</sup>戈尔巴乔夫决定用自己的真诚来感化他所会见的那些外国客人。他们看到,这个人真正想做的,正是他呼吁这些人去做的事情。他们相信他的为人,但是不相信他能做到他所说的。因为他的背后有着一个过分强大的、以实力对抗为目标的军事思想庞然大物。让戈尔巴乔夫感到气愤和吃惊的是,西方对他那勇敢和真诚的建议的反应是迟钝和怀疑的。戈尔巴乔夫就他的政治方针与外交部门具体贯彻这个方针的差距问题,在政治局发表愤慨的声明:“在我们的政治宣言与谈判立场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里有问题。要知道如果有了政治决定,就应该去相应地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15~216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5页。

行动。应该很快地在政治决定的基础上提出创造性的建议,而我们却留恋老一套的处理办法。在哪些问题上出现冲淡政治决定的?为什么?让部门领导人来搞清楚。这多半是惰性。但如果有人抵制,那么我们无法与这样的同志在一起工作。如果我们将破坏我们的政治决定的威信的话,我们不会取得多大的成绩……不能让世界上有人认为我们的政治决定是投机。我们绝不会拿我们的安全来做出让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谈判可以取得实际进展的时候应该睡觉或者原地踏步。”<sup>①</sup>

于是,为了消除这种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是政治宣传与实际工作脱节的现象,苏联采取了行动。1987年5月,苏联停止对美国之音以及其他反苏广播电台的干扰;6月,简化苏联公民出国手续的决定开始生效。“窗帘”外的生活开始涌入苏联社会。

## (二)选择自由和不干涉他国内政

按照戈尔巴乔夫对“多一点社会主义,多一点民主”的理解,就是要求在改革时期苏联要正确处理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而从其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现实政治的发展情况来看,戈尔巴乔夫的主张就是:让他们自己选择自己的路吧!我们不要干涉!戈尔巴乔夫的这一主张背后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这是国内改革的政策延伸。戈尔巴乔夫主张“多一点社会主义,多一点民主”的国内革新思维,要求他在对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改革的要求时,也必须同等对待,以树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形象。在过去,苏共认为自己是完成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义务的主要保证,并认为这是苏联作为大国的力量源泉之一。但是改革使这一切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改革的意义就在于让自己的人民有自由,苏联领导人开始了这个改革之后,就不能再对中东欧国家的关系采用另外的标准了。对邻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停止了。莫斯科不再发出劝告,更不会有指示了。苏联在实施改革,而且坚信到处都需要摆脱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但是并没有力图‘输出’自己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的经验和自己的打算。”<sup>①</sup>1985年10月22日，戈尔巴乔夫到索非亚参加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戈尔巴乔夫在发言中指出：“共产主义运动正经历着一个艰难时期。各国共产党尚需认识当代的进程，并制定新的方针……要用理解的态度对待各国共产党的困难，这种困难很多，还有许多新问题，不管各国共产党情况怎样，要尊重它们的独立性。”<sup>②</sup>1989年11月，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发言人格拉西莫夫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记者的采访时发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勃列日涅夫的理论已经过时，我们用西纳特拉理论<sup>③</sup>代替了它。”他解释说：“应由每个国家来决定它们自己要走的路。”<sup>④</sup>

其次，这是国内改革的利益考虑。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不仅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领航者和保护者，也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存续的现实维护者。然而随着苏联国力的衰弱，苏联能够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物质援助的压力越来越大，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政权延续的政治保证越来越吃力。仅仅是苏联对越南、蒙古和古巴三个国家的军事或经济援助就达70亿美元，几乎占苏联给经互会国家援助的2/3。<sup>⑤</sup>而从1985年开始，由于国际石油价格暴跌，苏联在1985年损失了62亿美元，在1986年损失了50亿美元。<sup>⑥</sup>不仅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东欧国家对苏联的社会心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对苏联把他们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感激之情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老人一起消失，由于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捷克人经常访问西方，思想宣传已失去影响。新一代人向往西方的时装、音乐和价值。许多西方人仍倾向于把东欧看成铁板一块，然而除了地区性动向外，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50～251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sup>③</sup> 西纳特拉理论，又译为辛纳屈主义，是苏联戈尔巴乔夫政府用来戏称其允许周边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自己决定自己的内政的政策的名称。这个名称来自于法兰克·辛纳屈的歌《My Way》——苏联允许这些国家走他们自己的路。

<sup>④</sup> [法]《快报》1990年7月6日文章“戈尔巴乔夫的秘密计划为什么失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9月11日。

<sup>⑤</sup> [法]《青年非洲》周刊1987年10月7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10月16日。

<sup>⑥</sup> [瑞士]《日内瓦日报》1987年3月8日文章，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3月11日。

民族问题也正在考验着戈尔巴乔夫是否能使像西欧国家那样千差万别的东欧国家的忠诚保持下来。”<sup>①</sup>此时,面对暗流涌动的东欧社会,苏联唯一能够提供的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后,苏联还会再出兵吗?戈尔巴乔夫的回答是:不要指望苏联出兵!面对民主德国的民主呼声,戈尔巴乔夫对当时的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态度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苏联军队都始终留在兵营里。”<sup>②</sup>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既然苏联要进行改革,那么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也要在外交政策上实现大的转变。这种改变实质上就是: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想在整个社会主义世界领导“改革”。作为戈尔巴乔夫政治助理的切尔尼雅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隐隐约约地、尔后自觉地感到扮演“主要的和起引导作用的社会主义力量”的角色是繁重的任务。这妨碍了他完全直言不讳地推行“新思维”的世界政策。他唯一指望的是,东欧各国领导人“会理解他”,并各自在国内尝试运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精神。也就是说,“在这儿也有一个原则,即可以自由选择”。<sup>③</sup>1986年5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正统思想意识妨碍了我们的工作。“所有与我们不同的或者我们感到不习惯的东西,都会引起怀疑,对这个或那个活动家是否正派、能否真诚地同他处事产生怀疑。应该停止这样做了。承认选择道路的自由,应该成为实际政策的方法,而不是宣传口号。”<sup>④</sup>更何况,面对东欧地缘政治的剧变,大多数苏联民众由于正忙于应付严重的物资匮乏和日常生活问题而无暇他顾。多数人并不关心外国,因为这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毫不相干。“许多人确信,东欧人由于苏联的支援,生活得比他们还要好;果真如此,甩掉更好。”<sup>⑤</sup>因此,即便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苏联国内的极大不安,但是戈尔巴乔夫始终坚持“新思维”的基本政治原则——选择的自由

①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6年6月2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年7月2日。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94页。

③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④ 同上,第87~88页。

⑤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01页。

和不干涉内政。

最后,这是国内改革的价值考量。戈尔巴乔夫坚持不干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固然是出于现实的政治考虑,既不愿把精力过多地关注东欧国家,又担忧由于苏联的干涉而引起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但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理念认知,和对他正在进行的改革的价值考量。戈尔巴乔夫认为,如果社会主义真是一个好思想,一个好制度,那么它就应该能够在东欧国家的改革中发展壮大,而不是走向消亡,更不应该依靠苏联的力量来保存。切尔尼雅耶夫记下了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心路历程:从安德罗波夫时期起我们好像主张现实主义。然而我们不想承认,按过去的文件理解的共运已不复存在,也不会再产生了。由此就产生其他的一切,这就是:在同各国共产党会谈中要运用柔和和克制语言,坚持合作以图搞好关系,避免分裂,同所有的党——同意共、同中国人……达成某种私下的对分歧的暂时妥协办法,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的普世教会运动……而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持以苏共为首的神话存在……是为了意识形态上的世界大国的“需要”!但是在保留神话的同时,我们支撑着许多“兄弟党”的可怜、衰弱和孤立无援的存在,它们指靠我们的庇护和在我们的国际威望(吓唬人?)的掩护下继续混日子。如果我们“解散”国际共运,它们将会被迫振作起来工作。自然,许多党会立即销声匿迹。但还具有能力和良好生存条件的另一些党会在新的基础上复兴……这是可能的!然而我们是“为了自己”而考虑它们,甚至不是为了国际主义的思想……所有那样一些思想都是为了“我们”、大国。<sup>①</sup> 在 1985 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在正式会议讲坛上谈到世界的共同性和多样性问题,讲到和平共处,认为这是“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发展规律(而不是我们的策略)”<sup>②</sup>。戈尔巴乔夫概念中的和平共处主要指的是——承认别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不装傻,也没有骗人的企图,要去进行工作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16~17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60 页。

并最终赢得胜利。”<sup>①</sup>1987年2月4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基辛格等人时说:“世界是复杂而纷繁的,它由几十个独立国家组成,这些国家有着往往极为尖锐的问题和不幸,有着自己的利益,也有着保护自己利益并参与共同事务的权利。企图压制这些利益,想使其他国家服从自己并像过去一样利用这些国家的资源,这都是过去留下的残余,它会给文明社会带来危险。所以我们才坚持要有新的思维,这需要冷静,需要作出正确估计,首先是要懂得,不管你有多么强大,也不能对现代世界发号施令。”<sup>②</sup>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发表讲话。他说:“谁也无权要求在社会主义世界中居于特殊地位。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其自身的具体特点,各兄弟党都在根据本国的国情制定政治路线……每个党都是独立的,都对本国人民负责,都有其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主权——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无条件的原则。”<sup>③</sup>实质上,这是对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sup>④</sup>的否定。

然而让戈尔巴乔夫想不到的是: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让每个民族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作出这种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却是可怕的。事实上,一旦没有了外来的政治杠杆,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力量马上便积极活动起来。“最终赢得胜利”的不是社会主义在东欧国家的全面胜利,而是彻底的大溃败。

面对指责,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政治辩解:

首先,这是东欧人民的自由选择。戈尔巴乔夫指出东欧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它的背后是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意愿。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的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姆林宫一个个主子的脸色行事”<sup>⑤</sup>。最重要的是:世界意识到俄国没有压迫任何人,没有将朋友和盟友强行攥在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sup>②</sup> 塔斯社莫斯科1987年2月4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2月6日。

<sup>③</sup> 美国《华尔街日报》1987年4月19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4月29日。

<sup>④</sup> 勃列日涅夫认为,如果共产主义在某个盟国受到了威胁,共产党国家就有权,甚至有义务进行干涉。

<sup>⑤</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6页。

手里。马克思常说：“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会自由的。”当戈尔巴乔夫决定还“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自由”时，戈尔巴乔夫自认为他严格遵循了马克思的这句格言。“他们的自由和我们自己的自由——这就是我为自己所推行的政策进行辩护的主要理由。”<sup>①</sup>

其次，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曲解。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社会主义不是强迫，而是民主。“左派”批评家们最常说的话，就是东欧剧变的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损害了社会主义，有利于资本主义。这同样是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不愿意而且不善于了解，这种“二进制”的思想方法已经绝对过时了。“外面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为了生存和在阳光下能有一席之地而斗争的人不光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许许多多具有其他思想观点的人。现代政治生活是极其丰富多彩的，除相似之处外，在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文化形式的架构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最后，就我们所谈的话题而言，最本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本身需要重新考虑……共产主义，是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写的那样，像列宁所解释的那样，还是像斯大林模式所体现出的那样？怎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几百种理论哪一种才是呢？民主的概念也不简单。”<sup>②</sup>

最后，这是落后政治思维的体现。戈尔巴乔夫认为，指责人的政治思维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所谓的“断送了社会主义各国”，失去了东欧盟友，就是削弱了苏联的防御能力，这话是不对的。首先是因为，苏联所有这些过去的盟友实际上都愿意保持和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苏联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俄国只是想要在自己的东欧政策中更充分地实现这些可惜迄今未能实现的可能。而如果要听“鹰派们”的话，把原先的盟友们再拴在我们的“战车”上，那么这样在集体防御的基础上，在全欧结构的框架内，才真正会损害我们的安全。戈尔巴乔夫认为：“这种指责本身就使指责的人露出了马脚。他们是一些帝国思想的信徒，是相信用强权可以将别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运的人。所以这些问题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7页。

<sup>②</sup> 同上，第318~319页。

是挺气人的。它们反映了过去时代的政治思维。”<sup>①</sup>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熏陶下，苏联人表现出了政治上的无动于衷。“如果苏联老百姓相信失去东欧将影响国家安全——或者说他们仍然认为美国及其盟国是潜在的侵略者，他们无疑会有另一番感受……这并没有发生。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倡导的‘新思维’已经扎根，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人完全了解西方对苏联政策变化所作出的适应性反应，更清楚从前苏联那些东西在西方看来是富于侵略性的政策。”<sup>②</sup>

所有的一切都表明：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承认选择自由应当成为我们的实际政治方式，而不是宣传口号”这番话，成了他始终遵循的原则。这就是说：“他起初打算用作拯救社会主义的工具的新政治思维和民主，对他说来已经从手段变成了独立的、具有自身价值的目的。于是，在结束‘以阶级观点’处理外交事务（为达到其最高目的——推行或者保住社会主义可以不惜任何手段）的阶段时，他再次无可挽回地同名义上仍是他的政治上领路者的那个人——列宁决裂。”<sup>③</sup>

### （三）要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

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呢？是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是使人民过上体面的生活。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社会主义思想”的前提是追求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权利，人人都有可能表现自己的才干、能力和事业进取心，与此同时，国家关心居民中社会弱势群体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sup>④</sup>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认为，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他说：“工业化和集体化是必要的。否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4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01~302页。

<sup>③</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sup>④</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9页。

则我国就振兴不了。但是进行这些改造的方式方法并不是始终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符合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理论的。这首先是受外部条件影响所致——我国一直遭受军事进攻的威胁。但是也有我们自己的过火行为,行政强迫的办法盛行,人们吃了苦头。”“这就是历史上遇到种种矛盾的人民的命运,既有伟大的成就,又有悲剧性的错误,还有惨痛的篇章。”<sup>①</sup>在戈尔巴乔夫看来,造成这种错误和悲剧的不仅仅是“行政强迫的办法”,而且是支撑这种“行政强迫的办法”背后的制度。这种制度否认和压抑人的正常需求,使人屈从于意识形态的说教,并强迫人成为空洞的信仰的牺牲品。

作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设计师”,雅科夫列夫给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就是:改革首先要进行准确的价值定位。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宣扬的“和平、民主、自由”价值的社会主义制度会逐步演变成以冷酷无情著称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呢?其根源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雅科夫列夫说:“在目前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弄清楚把建设体现社会公正的社会的最初蓝图转变成兵营式官僚主义专政的原因和后果,这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有很多原因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过去许多世纪留下的智力遗产中在对社会结构的理解上有着惯于作直线性理解的沉重包袱。例如,在19世纪,人们把进步同克服生活的分化和多样性联系在一起,常常把它们同社会生活的无法控制的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等同起来。实质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进步就是通向社会生活的‘明晰化’的前进运动,就是社会结构的不断的简单化的论断,从一开始就是与生活相矛盾的,生活的逻辑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它促使人们懂得,历史的本质在于从最简单的关系向更复杂的关系发展。”<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接受了雅科夫列夫的思想,并坚定地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改革措施。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他说:“改革已近5年,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体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

<sup>①</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sup>②</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仅是说,而且要在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以及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等方面实际实行。”并且进一步表示:“我们把改革看作社会主义历史道路的一个长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要放弃专制的官僚主义体制,并形成真正民主的、自治的社会机体。”<sup>①</sup>

在维护制度与保证社会公正的选择中,戈尔巴乔夫不是尽最大努力通过改革使二者实现“体”与“用”的结合,而是用彻底否定苏维埃制度来达成对社会公正的政治价值的实现。已经染上了“政治洁癖”的总书记,下定决心同旧的制度决裂。“我只不过是不太相信近二百年内能够把一切社会斗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达到理想的和谐状态。再说,共产主义概念本身在当今世界许多人的脑子里是和斯大林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几十年后这一点会过去,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把自己同暴力、专政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不想把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口号联系在一起。”<sup>②</sup>

#### (四) 总书记:社会主义的新特征

1988年6月28日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时,全面提出社会主义要具备7个特征。他说: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人真正是“万物的尺度”。社会的整个发展,从社会的经济到精神思想领域,目的都是在于满足人的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而且所有这一切都要经过人们本身的劳动,创造和努力来达到。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它采取科技进步的优秀成果和具有最高的劳动生产效率;是一种直接服从于满足社会需要和灵活适应这种需要的经济。公有制和个人所有制以及生产组

<sup>①</sup> [苏]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1989年11月),《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9页。

织的多种多样的形式是这种经济的基础。在这些组织形式当中劳动人民实际上是生产的主人，保证劳动收入和劳动成果直接挂钩。对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的出发点是要使中央在解决结构问题时的作用同作为商品生产者的生产单位的广泛自主性有机地结合，这些生产单位实行经济核算和自主的原则并为市场而工作。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公正的制度，这种制度把人们对劳动、保健、教育和住房、社会赡养等十分重要的需求的社会保障，同始终不渝地实施按劳分配的原则、铲除任何形式的平均主义和社会寄生现象结合起来。在这个社会中对人的能力、人的卓有成效的劳动、技能和天才给予最高的评价和给予应有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高度文明和道德的制度。它继承和扩大人类精神发展的优秀成果和人类丰富的精神阅历。这是一种劳动者的生活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生气勃勃和极为丰富的社会，这个社会否定消费主义、精神颓废和文化原始主义……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真正的人民政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保证了全体劳动人民有充分可能性来表达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参与社会进程的管理，人们与政权的隔阂得到克服。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治、在管理经济和社会进程方面深入和彻底的民主化以及法制、开放性和公开性的社会。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是各民族社会与精神繁荣和互相充实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任何民族间仇视的表现以及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偏见都没有存在的余地，占上风的是族际主义和各民族的兄弟情谊。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制度，它的本质和利益必然渴望和平，渴望加强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合作和协作，渴望在平等、互不干涉、承认各国人民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主权等民主原则基础上，在各国人民之间建立正常和文明的关系。<sup>①</sup>

---

<sup>①</sup> 尧凌洲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97～98页。

## 二、新思维：意识形态改革

改革的思想原则开始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引导下发生着变化。

1986年2月22日，戈尔巴乔夫就其准备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对外政策方针进行了“小范围”讨论。在讨论中，戈尔巴乔夫对“新思维”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理解。他说：“世界是多维的。这使我们想起列宁：在他的论述发表100年之后，我们又重新来理解他关于社会利益往往高于阶级利益这个论断……我在谈话中多次反复提到世界多维性、它的多样性和多种特点的问题。这是正确的态度。确实应该认识处于各种内、外相互关系中的整个世界。如果对这个共同的东西认识不清，我们就不能制定对内和对外战略。和平共处在每个阶段都要求我们对它做出评价。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仅要制定对外政策方针，而且还要通过宣传和执行政策来加强它。最要紧的是，我们抓住了转折时刻，并据此制定了我们的路线。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主要的趋势和主要的方向上不犯错误。什么是新思维？要有根据地回答这个问题。”<sup>①</sup>

1987年初，美国两家出版公司“哈泼－罗”与“雷蒙和舒斯特”建议戈尔巴乔夫写一本关于其改革政策的书。戈尔巴乔夫经过思考后同意了并开始着手搜集资料整理提纲。戈尔巴乔夫确定了书的宗旨和性质：“我们应当搞清楚一个问题，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改革的基本思想已经通过官方出版物得到传播。而这是思考、解释意图、说明我们是怎样走向改革的，说明这不是出于某些人或一批人的自尊心。重要的是要从本书中可以看到，社会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来到了这个阶段，改革的要求早就在‘敲门’了；可以看到我们所处的环境的矛盾性。一方面，似乎是‘极度的文明社会’（就教育程度而言）；而另一方面，经济、政治、党的状况、精神领域——一切都不如人意，都僵化了。社会的潜力受到扼杀。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饱经苦难而找到了改革之路，这一点应能从书中使人可以看到。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71~72页。

总之,这本书谈的是改革政策的哲学基础。”<sup>①</sup>

1987年11月,《改革与新思维:为了我国和为了全世界》正式出版。“这是他个人的思想体系和改革作风。这里是他本人:他的个性,他的性格,他的本质,他的特点,他深藏在心的意向,他准备真正远行的意愿(他自己还不知道往何处去和如何去法)。但他已经‘感觉到’这个‘远方’将完全不同于60年来所提倡的并已成为社会遗传因子型的东西。”<sup>②</sup>

### (一)列宁改革的政治象征

不过,戈尔巴乔夫虽然向全党全社会提出了自己对改革的“新思维”,但是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还是“沾染了浓厚的意识形态的和阶级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了当时已经过时的对现状的评价”。“现在当你翻阅自己的正式的有关戈尔巴乔夫那时谈话的记录时,在戈尔巴乔夫的言论中,你常常会发现新与旧的混合物、模糊的和现实的矛盾和不一致。”<sup>③</sup>于是,在戈尔巴乔夫思想逐渐演变的初始阶段,他提出要向列宁请教。据博尔金观察,在改革的第二年和第三年,戈尔巴乔夫忽然对列宁的著作发生了浓厚兴趣,从中寻找对自己有教益的段落。“我常去他的办公室,总看到他那宽大的桌子上摆着几卷《列宁全集》。他经常当着我的面拿出一本书,把列宁的观点读给我听,然后同今天的情况加以比较,不住地称赞列宁有远见。”<sup>④</sup>

在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提出“向弗·伊·列宁求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sup>⑤</sup>。不过,戈尔巴乔夫并不仅仅是请教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新经济政策对列宁来说,并不像有些人常说的那样,只是一种策略上的后退……我在列宁的晚期著作中看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懂得,他在把国家带向革命的时候犯了许多错误。这是革命的悲剧。我懂得这一点,这给予了我强烈的影响。但是列宁的一些思想、他的一些主意和新经济政策,完全被斯大林抛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90~191页。

<sup>②</sup> 同上,第189~190页。

<sup>③</sup> 同上,第72页。

<sup>④</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24页。

<sup>⑤</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2页。

弃了。”<sup>①</sup>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政治。他说:“列宁的著作、列宁的社会主义理想,对我们来说仍然是辩证的创造性思想、理论财富和政治洞察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而列宁的形象本身就是崇高的道德力量、无所不包的精神文化以及对人民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无限忠诚的永放光芒的典范。”“党内和社会上都求教于列宁,这在寻求对所产生的问题的解释和答案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列宁生前最后几年的著作特别受到重视。”<sup>②</sup>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些著作实质上是他的政治遗嘱。在他身患重病时,他曾对社会主义的命运感到十分耽心。他看到了新制度将要遭受的危险。我们应当懂得这种耽心。他看到,社会主义遇到大量问题,社会主义必须解决资产阶级革命所不能解决的许许多多问题。因此,要利用那些好像是社会主义本身‘非固有的’,至少与公认的社会主义建设概念有某些差异的形式”<sup>③</sup>。

那么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向列宁请教呢?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寻求政治上对改革支持,增强改革的政治合法性。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其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党的认同与肯定。因此,当戈尔巴乔夫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本身将会对党和国家的体制带来深刻影响的时候,寻求以往党的领袖的支持就成为一种政治上趋利避害的选择。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人,不仅有着丰富的改革资源,“列宁当时毅然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在劳动中实行物质利益原则,鼓励成立合作社、私营企业和建立租让企业。列宁晚年意识到了民主的问题,也曾考虑过改革政治体制。……由此还产生了改革以及对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更新和实行公开性的想法。列宁很喜欢‘多一些光亮’这句话,它的含义是,必须在政治上照亮国家的所有阴暗角落,使其无法藏污纳垢”<sup>④</sup>。而且,坚持列宁思想所能提供的政治庇护更是其他领导人所不能相比的。对于那些批评戈尔巴乔夫的人,戈尔巴乔夫往往以列宁为掩护进行自我辩解:“‘请听听十月革命4年后列宁怎么说的:我们走的不是那条路,我

①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2~23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2页。

③ 同上,第23页。

④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21页。

们犯了错误,应当彻底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为什么你们允许列宁改变自己的看法,不去责骂他,不认为他是犹大、是叛徒,却认为我是呢?为什么列宁能做的事情你们却不让我做呢?的确,当年有些曾与列宁并肩战斗的人也认为他背叛了革命的思想,有的人甚至自杀了,因为他们不同意列宁的做法,同时又不能反对他。其实问题既不在于我,也不在于列宁。生活本身就在不断地改变对社会主义的看法。”<sup>①</sup>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愈来愈空洞抽象的关于在不背叛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改变社会主义的讨论,就日益局限于口头宣言和苏联领导层内部争论的范畴,它只能引起直接参加者的兴趣。至于在实际政治的范畴,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在效仿自己的偶像列宁的话,那么首先在于他是个绝对的实用主义者,为了达到所追求的结果,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弃几乎一切意识形态公式,其中包括他昨天还赌咒发誓对其矢志不渝的公式。“如此‘弹性’的行为举止还具有重要的政治优越性:这样他往往可以把自己意识形态方面的追随者和对手搞得晕头转向,不管他们来自左边还是右边,因为他可以像一个布尔什维克那样去思考,像一个地道的自由派那样去行动,暗地里却以经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居。”<sup>②</sup>

其次,借助对列宁思想再阐发,充实添加改革的新理解。对列宁思想的丰富完善已经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政治传统,也是历任总书记发展列宁主义的政治要求。不过,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种政治传统却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他可以在列宁思想的旗号下阐释自己的看法而不招致党内同志批评。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说,他的很多思想其实来源于列宁:“列宁的著作我读过许多,也思考了许多。我的关于全人类价值的想法就是在读他的著作时产生的。在需要解决实际问题时,就认真读读他的著作。这种阅读可给人完全异样的感觉……列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或在某一历史时期中必须把全民族的利益置于阶级利益即无产阶级的利益之上,我在读列宁的著作时,把涉及这个问题的地方都标了出来。其实,他这里所说的全人类的利益,这种利益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我们防止不了核战争,解决不了环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66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19页。

境问题,那我们必将面对一片废墟。”<sup>①</sup>而据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助理格拉乔夫观察,最初几年的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尚处于“列宁阶段”,因而任何同过去政策的决裂或者对于过去政策的重新审视,都只能在引证列宁的著作或者他的某个主张的情况下进行。雅科夫列夫就曾十分幸运地“突然发现”这样的一条语录,列宁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把全人类的利益放在狭隘阶级利益之一。从上下文中将这个主张拿出来,并借用某种编辑修改对其进行校勘,就完全可以用作新政治思维的“科学依据”。当然,列宁本人肯定不会同意将他说成抽象人道主义者的做法,他曾无情地、毫不妥协地反对过抽象的人道主义者。此外,新政治思维的出发点,是确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核时代为阶级对抗划出了“客观的界限”。“认为列宁早在世纪之初就能够预见到核武器出现的可能,这就无异于把他说成又一个诺斯特拉达穆斯。”<sup>②</sup>

最后,对著书立说喜好的偏爱,扩大戈尔巴乔夫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热衷于公开演讲和发表文章。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早已发现,戈尔巴乔夫喜欢“说”多过喜欢“做”。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向列宁请教,就是要通过对列宁的学习,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其结果就是戈尔巴乔夫对个人的理论声誉的过分关注。博尔金指出,在1986—1987年间戈尔巴乔夫受到列宁著作很大影响,这使人感到:他是想提出一个发展伟大领袖思想的构想,而且是比列宁当年所做的一切更令世界震撼的构想。戈尔巴乔夫作报告或发表文章,总要从理论上论证自己的许多建议,意图表明它们同马列主义创始人学说的密切联系。“从总书记的大量著作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我已经谈过,他非常热衷于著书立说,这是他的一大嗜好。在短短的时间里别人为他写了许多东西,这些著作被编成一卷又一卷书,而书皮不知为什么都是浅蓝色的。”<sup>③</sup>在这位天才的指引下,连篇累牍地出版了以“改革”为题材的书籍。“戈尔巴乔夫先生作为总书记也出版了自己的选集,得到了最大的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21~122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实惠。不到两年时间就写成了一册册关于如何建设发达共产主义的奇文。”<sup>①</sup>

那么戈尔巴乔夫向列宁请教后学到了哪些“有益经验”呢？

一是经济政策上的模仿。1986年是经济政策试验的一年。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开展大量的日常工作。但是这些做法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它们反映了当时他希望通过“提高要求，加强纪律和在全国建立起起码的秩序”来启动有效的经营管理机制。切尔尼雅耶夫指出，在那个阶段，在缺乏一个整体的改革构想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就曾依靠政治局中最“先进部分”的支持，尝试哪怕去掉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某些行政强制的枷锁。诚然，这些与经济改革有关的最初的“牛刀小试”绝不能算作革命措施。戈尔巴乔夫忠于自己“回归列宁”的思想，他在这方面也认为“最好是回到列宁借助新经济政策和鼓励全面合作化来挽救社会主义的计划”<sup>②</sup>。但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从思想上来说，整个这项工作暂时没有超出新的新经济政策的框框。”<sup>③</sup>

二是政治路线上的觉悟。切尔尼雅耶夫找到了为戈尔巴乔夫对于共产主义主要传播人之一列宁的几近非理性的眷恋之情进行辩护的说法：戈尔巴乔夫确曾反复阅读过列宁的著作，列宁让他着迷的，不仅是智力，而且还有令人敬仰的义无反顾地改变自己观点的本事。“列宁只相信一个上帝——政治现实，为了它，可以牺牲一切理论教条和公式，包括自己的教条和公式。”<sup>④</sup>而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向列宁学习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列宁的政治勇气和政治知识。在他和斯拉文的对话中他说：“我们首先是想继续进行列宁未能完成的创造性活动。我已经对您说过，我非常敬重列宁。当局对列宁的不尊重的态度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这不仅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人物，也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列宁与斯大林的区别在于，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他认为，在我国直接实现共产主义原则为时尚早，如果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41~142页。

<sup>④</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97~98页。

这样做,什么也不会得到。他当时说:我们犯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我们应当改变这个政策。对他来说,这样做是需要巨大勇气的。”<sup>①</sup>

实际上,无论戈尔巴乔夫学到了什么,他都在打着“列宁思想”的旗号,“已经在发挥自己的思想了”<sup>②</sup>。

## (二) 赫鲁晓夫的改革意义

从列宁身上,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学到了政治的精髓:政治现实主义。那么,在列宁之后高举改革旗帜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又是怎么认识的呢?他从赫鲁晓夫身上又学习到了什么呢?对赫鲁晓夫的作用,戈尔巴乔夫一直是有“他自己的看法”,同官方的即“党的”看法并不一致。戈尔巴乔夫认为:“赫鲁晓夫是改革的先驱者。他第一个推动了改革进程。这个进程只有作为民主的进程才能得到发展并取得成功。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件。赫鲁晓夫留下的主要东西就是使斯大林主义失掉了声誉。勃列日涅夫时期采取的报复企图都失败了。斯大林主义的秩序没有能够恢复起来。这是改革得以开始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因此,我承认,改革是同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是有一定联系的。一般说,我对他的历史作用是有较高的评价的。”<sup>③</sup>

在改革的功绩评价上,戈尔巴乔夫认为赫鲁晓夫是苏联改革的起点。如果说戈尔巴乔夫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改革上发现了政治现实主义,那么在赫鲁晓夫的改革中,戈尔巴乔夫发现了他与赫鲁晓夫在政治思想上的共鸣。一方面,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禁锢的僵化体制中注入了些许活力。“我赞成赫鲁晓夫的大无畏行动。我并未隐瞒自己的观点,当众表明了立场。但我发现机关中对于报告的反应相当混乱,甚至可以说是张皇失措。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整个党的工作、我国社会的整个体制都是建立在斯大林的威信之上的。一切都靠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这个来说明和辩解。可如今‘基础’垮掉了。每个机关工作人员所遵循的铁的纪律精神要求服从中央的新方针。”<sup>①</sup>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认为，赫鲁晓夫给了社会一点儿自由，后来他自己又拧紧了水龙头。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清楚地说了为什么。他写道：“苏联领导决定开始解冻时期，并自觉地走去的时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同是对解冻感到担心：‘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这就将很难处理。’”害怕民主，这是极权主义制度的产物，是对任何认真的进步行动的障碍。<sup>②</sup>但是无论赫鲁晓夫本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就其意义而言，“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这是使我国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sup>③</sup>。

在个人的道德评价上，戈尔巴乔夫认为赫鲁晓夫是有良心的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心理的变化，戈尔巴乔夫给予了积极肯定，认为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赫鲁晓夫是个有政治良心的人。“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赫鲁晓夫揭露‘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行动。的确，他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分析太少，主观的成分太多。将极权主义问题归结为外部原因和独裁者的坏性格，这是个便当而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揭示出其深刻的根源。赫鲁晓夫的个人政治算盘也是一目了然：他率先揭露‘个人崇拜’，立刻就将最亲密的竞争者和对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冻结起来，这些人和他恰好都是斯大林的亲信。所有这一切都不错，然而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说来，他的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仅暴露出整个我国社会极其严重的状态、其中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扭曲性质，而且暴露出缺少最起码的法制。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43~44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应当算作赫鲁晓夫的功劳、他的支持者的功劳。”<sup>①</sup>雅科夫列夫也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要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创造幸福的不屈不挠的献身者。他毫不犹豫地向共产主义，而且只是向共产主义迈步前进。他总想尽快地到达目的地，可是他越走离目的地越远。他看到了我国的落后，可是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乌托邦主义者，他总是在寻找能使国家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如种玉米、开荒、搞农业化学化等等……他是一个大老粗，爱幻想和心地善良的人，但有时过于严厉和专制。他是个试验家，常常是雷厉风行和变幻莫测，态度粗暴和蛮不讲理，善于领悟和机智过人……总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sup>②</sup>

在对改革中断原因分析上，戈尔巴乔夫认为是体制集体反动的结果。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不仅结束了赫鲁晓夫的政治生命，也结束了赫鲁晓夫的改革。那么，戈尔巴乔夫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在他看来，赫鲁晓夫扩大共和国和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这些都得到了普通中央委员、党内“将军”的公开赞同，他们坚决支持赫鲁晓夫与“反党集团”的斗争。军队也支持他。然而赫鲁晓夫后来对党采取的措施却使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将州的党组织一分为二、干部的频繁变动、经常让干部易地任职等触犯了干部的利益，在这一级权力集团中造成了不稳定的局势。换言之，“将军”阶层中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此外，当时作出了基层组织书记每年改选一次的决定，本意是加快干部轮换、使干部无法“扎根”和长期盘踞在自己的岗位上，这项决定又在党的“军官”中引起了消极的反应，直接把劳动集体在开展工作的重担都压在他们身上。不过当时就不由产生一种想法：赫鲁晓夫的意图绝不会如乍一看时那么简单。实际上许多州委书记都是中央委员。地区里出现了两个第一书记，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可能对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来个大换班。不仅如此：赫鲁晓夫是否打算通过这个措施、通过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村的地域生产机构多少削弱一下党对权力的垄断，取消昔日“省长”或“有封地的公爵”的无限权力，让懂得的人、专家和内行来熟练地主事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sup>②</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呢？当然，赫鲁晓夫并不反对党的领导作用，他只是想使这种领导作用现代化，削弱党对一切的垄断。“但是他在这里却遇到了强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最终使他惨遭失败。”<sup>①</sup>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赫鲁晓夫的失败其实就是体制的胜利。“整个‘赫鲁晓夫时期’的主要特点在于赫鲁晓夫想强迫体制工作，却仍然沿用体制的办法。赫鲁晓夫力求进行实际的变革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变革、提高经济效率、加大社会发展力度的意图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体制不接收新事物，而且还进行抵制。”<sup>②</sup>

无论是对改革前途的政治忧虑还是对赫鲁晓夫改革后果的个人担忧，戈尔巴乔夫都与赫鲁晓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苏联历史中，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那么离戈尔巴乔夫最近的当属尼基塔·赫鲁晓夫。实际上，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唯一前辈，此人所留下的政治思想遗产，正是后来戈尔巴乔夫反共‘公开性’的基础。”<sup>③</sup>

### (三)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从列宁到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在不断地学习请教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对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政治蜕变，并在反对教条主义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开始他自己的创造性发展——“新思维”。据格拉乔夫对戈尔巴乔夫思想历程的观察：1988年是转折的一年，这一年标志着一个新的界限：与其说是在国内形势的发展方面，倒不如说是在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内心变化上（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至少在初期“党所开始”的改革是顺从地跟着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走的，有如“线跟着针”，他让去哪儿就去哪儿）。按照他的表白，他与自己的追随者在对于“并不令人宽慰的1987年”进行总结时，他显然已经做好了扔掉列宁指示和语录这副“拐棍”的准备。然而他尚未下定决心彻底离开“马克思主义码头”，开始独立航行，尽管无法纳入语录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sup>②</sup> 同上，第60页。

<sup>③</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8页。

的生活愈来愈执着地促使他这样做。<sup>①</sup>

那么是哪些因素促进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形成呢？按照戈尔巴乔夫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三个方面因素：

首先，不带偏见地，甚至是无情地分析苏联的对外政策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所作所为，这是促成新思维的第一个因素，同时也是它的第一个源头。这里说的是，需要不带成见地重新评价苏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明确国家真正的民族利益，涉及它的安全的各种实际参数和必须考虑到的因素；清醒地分析国际社会的现状，它的发展的基本取向和趋势；最后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对外政策实践的各个基本方面，制定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具体行动纲领。改革开始前，就已经在思考所有这些问题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对积累下来的问题作了研究，在这个范围内，也对国际事务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改革一开始，这项工作便积极展开，已经不是避开社会舆论秘密进行了。各个学术中心（首先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等研究单位）提供了大量很有意思的材料，也有学者和专家个人提出来的想法。不能说这项工作是一件轻松的事，更不能说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时期的对外政策的观念是早就决定了的，也就是说，是由不断灌输的意识形态的各种设定已经做了“定位”的。说到底，要重新审议这些观念就得修正这些设定本身，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基本原理体系本身进行修正。1986 年 7 月，戈尔巴乔夫在授予符拉迪沃斯托克列宁勋章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利益不是想要谋求某些特权和特殊地位，不是出于自私目的想要依靠牺牲别人来加强自身的安全，不是靠损害别人来寻求好处。我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在于共同努力，在于充分尊重每个国家的人民按照自己的选择而生活在和平条件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情况下进行合作。”<sup>②</sup>

其次，深入地思考和分析世界政治和它的实施手段和方法，这是促成“新思维”的第二个因素，同时也是它的第二个源头。这里说到要克服的“旧思维”，不仅是苏联历史的产物，而且也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我们的思维也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79 页。

② 塔斯社莫斯科 1986 年 7 月 28 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 年 7 月 30 日。

完全是这样的。首先涉及的，是暴力的作用、军事力量的作用，不仅把战争作为是保卫国家而且是实现国家的政治意图的一种通常手段。自古以来，国际法承认战争的合法性。承认战争是政治的“合法”手段。核武器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局势。它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制造出了一种可以用来进行集体自杀的武器，这样一来，似乎就不得不放弃原先的立场了。但是正像大家都知道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的这个时期充满了无休止的军备竞赛，首先正是核军备竞赛。学者，尤其是苏联和美国的学者，在20世纪70—80年代进行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一旦发生核灾难，等待着人类的将是什么。他们发现的可能发生的“核冬季”现象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很明显，这需要根本改变各个国家的原则立场，根本改变它们对待政治及政治手段、对待放弃实力地位政策等问题的实际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带来的，如果不是整个人类消亡的话，也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死亡。这种转折不可能是简单的、轻松的，这是很清楚的。首先是由于历史传统在起作用的缘故，由于那些在新的条件下已经过时，但在人们的意识和政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还在起作用的缘故。接着便是由于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的总体状态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相互不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中贯穿着一种观念，就是把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看作“敌人”，看作一种常在的致命危险。最后，是由于物质（和政治）利益在起作用的缘故，一方面是靠生产大规模杀伤武器发财致富的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那些认为这些武器是保障自身优势的可靠杠杆，是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可靠工具的人的利益。但是转折势在必行。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核宇宙时代，生活在复杂、相互制约和矛盾的世界上。必须学会共同相处，不管我们有什么不同之处，其他国家有它们自己类型的民主，但愿它们长命百岁，主要的是，我们或是生存下去，合作和保护土地、海洋、天空和整个环境，或是使文明受到灾难性后果。必须摆脱把世界看成是某某的世袭领地这一过时概念。必须努力来建立国际事务的新型关系。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能指挥世界。世界已发生了变化。不承认这一点，就可能在政治上犯大错误。”<sup>①</sup>

<sup>①</sup> 塔斯社莫斯科1986年7月14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年7月22日。

最后,对战后年代世界生活的基础本身发生巨大变化进行分析的结果,这是第三个促成因素。经济的技术和工艺基础发生了变化,计算机技术在蓬勃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全世界信息交流的新渠道和新方法,出现了新的交通手段——这一切都决定了各个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真正革命性的变化。实际上,世界性的经济、世界性的信息和文化场地都正在形成。在这种条件下,所有的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所有的问题,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世界性的问题,都绕成了一个团:为了我们的民族利益(它们是和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利益相吻合的),也为了保障整个人类能够生存下去,需要把这个团解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关于周围世界的观念,关于当代世界的实际和它的前途的理论概括逐渐丰富起来了。

《改革与新思维》的出版及其风靡全球,让戈尔巴乔夫意气风发的同时也出现了自我感觉良好的政治错觉:认为经济上强大政治上软弱的苏联能够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对“全人类价值”的呼吁、“放弃使用武力”以及与纽约居民见面,既能对美国起作用,也能对全世界起作用;认为在苏联已明显变成现实的“军备领域完全开放和公开”的呼吁,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准则。<sup>①</sup> 在 1988 年 12 月 27—28 日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在贯彻路线、倡议、落实新思维方面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同志们,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提出的建议已成为强有力的因素,对他们触动很大,它使许多人猝不及防。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对,不仅考虑周到,而且提出了实施计划的策略。我们没有坐等谈判,而是主动出击……我们这样主动出击使美国政界的保守分子惶恐不安,忧心忡忡,甚至畏惧。不光美国人,撒切尔夫人也是如此。他们议论纷纷,无非是想压低期望值,散布怀疑情绪,阻挡摧毁‘冷战’根基的进程……”<sup>②</sup>于是,戈尔巴乔夫向全世界宣称:“不管共产主义的敌人是怎么想的,这一运动已经产生,它的存在是为了人、为了人的自由和维护人的真正权利,为了地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06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599 页。

球上的公正。它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巨大潜力。”<sup>①</sup>

那么戈尔巴乔夫又是如何推动国内社会的“新思维”呢？

据切尔尼雅耶夫观察：戈尔巴乔夫早就发誓忠于“新思维”，一心一意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名新型的政治家。于是，“新思维”作为“思想进化”的体现，开始在对苏联历史的重新评价中展开。“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敢说是我国 70 年苏联历史的全盘性的毁灭进程开始了。所有一切无一例外地被重新评审。现在说的已经不是替被斯大林戕害的布哈林、托洛茨基等活动家恢复‘本来面目’和公正的问题，而是说这些人虽然问题各异，但也完全是不正确的。而且，十月革命本身也渐渐变成了历史错误，对列宁本人也已悄悄地动手。各种见解毫不客气地在报刊、广播和电视屏幕上不断发表。在评价苏联制度时已用上了‘极权主义’这样的字眼。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已经不仅仅是错误，而且是罪行。所有移民国外的移民都是好人，他们是我们国家幸存下来的唯一的‘精神财富’。在屏幕上不断出现男女儿童‘虔敬地’称颂大主教们的图像。正是这些主教每天都在谕示人民，说人们过去的生活是造孽，等等……被戈尔巴乔夫称作改革进程中的‘最艰巨’和最关键的‘思维革命’正是这样开始并全速铺开的。”<sup>②</sup>并引起了“精神上的动荡，以政治震荡的连锁反应方式动员起了从布达佩斯到上海，从里加到第比利斯的各族人民，世界终于懂得，不能用武器，而只能用思想——自由的理想——把共产主义逼入防守地位。对付武器是有办法的，但没有办法对付思想，思想是没有国界的。”<sup>③</sup>

### 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990 年 7 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

<sup>①</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 年，第 198 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310 ~ 311 页。

<sup>③</sup> [联邦德国]《时代》周报 1989 年 6 月 15 日文章“思想没有国界”，转引自《参考消息》1989 年 6 月 26 日。

央向大会作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运动的目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主导思想——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使社会深刻民主化和人道化，使其成为自由的社会，为人应该过的生活创造条件。”为此，“制定了进行根本经济改革、根本改造政治体制和联邦以及建立法制国家的思想。制定了新的政治思维的基础，其核心是全人类价值占优先地位”<sup>①</sup>。

### (一) 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戈尔巴乔夫从来都不认为对人道的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相反，他始终坚定地认为，实现人的完全自由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价值。在总结自己政治观点演变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向斯拉文坦承：我不过重复了像列宁这样的巨人、革命家、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在短时期内走过的历程。总体上说，列宁是一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带有俄罗斯特征，而这只能更加说明他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相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而言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我们往往忘记了早期马克思和他在人类学方面作的探索。”<sup>②</sup>

作为战后的一代人，戈尔巴乔夫随着体制的升迁而开始本能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来后，既造成了“全国某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动”<sup>③</sup>，也使戈尔巴乔夫产生了心理震动。“如果认为苏联社会历史上悲剧事件的原因仅仅在于‘恶棍’斯大林的个人品质，那就相反地无异于成为‘个人崇拜’的俘虏。既然问题在这里，那么只需将坏领导人换成好领导人，我们就可以保证不会重犯错误。赫鲁晓夫仿佛在对大家说：我老老实实地讲出过去的事情，没有任何隐瞒，相信我吧，跟着我吧，一切都会好的。换句话说，建议大家以一种崇拜来代替另一种崇拜，却无意去触动体

<sup>①</sup> [苏]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向苏共二八大提出的政治报告和党的任务”（1990年2月），《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5期。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制的基础。”<sup>①</sup>戈尔巴乔夫慢慢地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原来被他奉若神明的苏维埃体制。当开始改革的时候,在号召人们向列宁请教从而寻求对已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解释和答案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突然明白了,“当列宁意识到现实并不是他此前为之毕生奋斗的理想时,他是多么的痛苦。我试图理解,列宁关心的是什么?他在最后几篇著作中想提示什么?为什么这些著作被禁止?显然,有人害怕。这表明,那里潜藏着什么东西”<sup>②</sup>。

潜藏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向列宁请教,特别是向他的最后几篇著作请教,就是“依靠列宁的遗产,依靠他的方法学,对积累起来的理论问题和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观念进行分析。这一任务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在列宁去世后的时期里,我们并非在一切方面都遵循了他的思想。那些曾经迫于形势而采取的和反映我国具体历史条件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式和方法,被奉为典范和被理想化了,并被当作普遍的不可更改的教条”<sup>③</sup>。于是,本来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在个人崇拜时期,斯大林的权威把在非常条件下形成的苏联社会发展形式绝对化了,把它们看作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采用的形式”<sup>④</sup>。这个“唯一可行的形式”,在雅科夫列夫看来,实质上是一个“对现实的活人漠不关心并且敌视的体制”<sup>⑤</sup>。于是,在苏联的“蒸馏瓶”培养出来的几代知识分子的头脑里,“那种认为真正的、尚未被实用的政治行情搅浑的马克思主义素来具有人道主义的信念,有如密封小瓶中香水的香味存放了数十年”<sup>⑥</sup>,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被释放出来,然后迅速在思想僵化干涸的社会引起了思想大狂潮。

戈尔巴乔夫首先发生了变化。他承认,当成为党的领袖——这在当时意味着也是国家领袖——时曾抱有一种幻想,以为可以对现存制度进行改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6~57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sup>③</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49页。

<sup>④</sup> 同上,第53页。

<sup>⑤</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39页。

<sup>⑥</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革了。而改革可以使现存社会主义获得第二次生机,以为“多一点民主”就意味着“多一点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说:“在开始阶段,我们,其中包括我,曾说:改革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我现在说:这句话既包含有正确的成分,也包含有迷误的成分。说是正确,是在于我们想实现十月革命提出的初始的,但没有实现的思想:克服人与政权和财产的异化,把权力(从官僚权势阶层的上层那里夺过来)交给人民,巩固民主,确立真正的社会公正。说是幻想,是在于当时我,正如我们中多数人一样认为,这可以通过完善现存的制度来实现。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袭击我国的危机具有并非局部的,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发展的逻辑导致这样的认识,即应该不是完善这个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础本身,改变这些基础。这所指的就是向市场经济,向建立在法治和充分保障人权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制度逐步过渡。”<sup>①</sup>

于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戈尔巴乔夫准备深入体制的内部,以克服异化为名,对改革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改造。在 1988 年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开过后的 8 月,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助手切尔尼雅耶夫进行了一次谈话,阐明了他的这一打算。

戈尔巴乔夫说:

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决定意识形态状况的主要路线。在社会上人们已经从各个方面触及这个问题了。它已经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它正在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涉及生活的实践。该是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但是首先当然是个理论问题。不把我们的经典作家提出的概念都清理清楚是不行的。应该分解他们设想中的社会主义这个题材中的所有东西……

第二阶段——列宁。但是也要清理清楚他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发展,特别是革命后,在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发展……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71 页。

概念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苏联的建设经验。对之应该予以考虑,但当然要从原则上去看……

下一个阶段——在改革过程中从理论上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

第一章或者第一讲就是这样构思的。它是以后所有讨论的基础……

然后提出问题,我们是如何设想改革过程中和改革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的。应该重新审视发展的方方面面,首先当然是经济方面。但是到处都涉及一个主题……这就是克服异化,即解决如何使人回到经济中去、生产中去、社会实践中去、社会精神生活中去的任务。克服生产资料的异化,生产民主化过程中所有制关系方面的异化,确定人在商品关系方面的地位,当然还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公正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应该从改革政策的角度好好弄清楚,改革的核心是各个方面的民主化……

需要深刻地揭示一个公式: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需要明确在一党制条件下确保居民多种多样的众多利益的那些机制的特性。这里首先是公开性。须知归根到底这就是竞争,但不是政党的竞争,而是人的竞争(人的才能、智慧、意志、性格、思想性、目的性的竞争)。这方面要记住列宁关于骄傲了的党必将因此而垮掉的著名论断……

一句话,我想打开所有的闸门。<sup>①</sup>

## (二)全人类利益·避免核战争

戈尔巴乔夫认为,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sup>②</sup>。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承认这一点,不仅是出于国内改革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更是出于对更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不结束“冷战”,国内的改革就无法正常进行下去。“如果不对国家面临的问题进行检查和深刻的批判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09~211页。

<sup>②</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

性的重新思考,不对国家的和国际的现实进行重新思考,改革简直就是不可能的。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过去我们对世界及其发展趋势和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的概念,是建立在很深的意识形态教条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教条使我们根本无法实行务实的政策。需要打破这些概念,制定对国家和周围世界发展的崭新的观点。这件事是很不简单的。须得抛弃几十年来认为是不可触动的真理,重新考虑进行领导和活动的方法和原则。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根据由意识形态的偏见所留下来的公式)重新思考周围的一切。这项工作的结果就是新思维。它成了改革年代国家全部内外政策的基础。新思维的出发点就是不从狭窄的阶级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而是人的利益优先的立场上去评价一切。从日益扩大的世界整体性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相互依存性的立场上,从经过许多世纪形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上去评价一切。”<sup>①</sup>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冷战”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部缺点和弊病的无法遏制的、强有力的增长和加深。国家事实上变成了“冷战”的工具。“冷战”吞噬了国家几乎 80% 的智力、思想、政治和物质资源。所以“他开始改革而从事的工作,是拯救国家于崩溃,同时也是使全世界免除核灾难的最佳方案”<sup>②</sup>。

1985 年 4 月 10 日,戈尔巴乔夫接见美国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正处于冰川时期。我们主张苏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我们的这种立场的基点,是我们理解到了,并不存在两国利益必定要发生冲突的任何可能性。而且我们有一个相互的共同利益——避免核战争,保障苏联和美国的安全,保全我们国家人民的生命……这个出路就是和平共处,承认每个民族都可以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其他的选择是没有的……”<sup>③</sup>

1986 年 1 月 16 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关于争取在 2000 年实现无核世界的声明。“看来他真的是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结束军备竞赛。他敢于冒那

①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73~74 页。

②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14 页。

③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223~224 页。

个‘险’，这是因为他勇敢地看到，这不会有危险，因为即使我们彻底裁军，也不会有人来进攻我们。为了将国家引上路面坚实的道路，必须抛弃沉重的、耗尽经济实力的军备负担。”<sup>①</sup>

1986年3月24日，戈尔巴乔夫就暂停核试验问题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他对局势作了这样的分析：“很难说新思维将什么时候出现。但是它将出现，而且甚至可能迅速地突然出现，因为生活使我们懂得这一点。历史上曾有过许多局势出现突变的先例……我们是被迫中止暂停核试验。我们不能就这么简单地宣布中止暂停核试验。我们不能不考虑来自全世界最广泛的各界人士对我们这一行动巨大的支持浪潮……‘星球大战’计划自然使我国人民感到不安。对此我考虑过，并与我的同事们讨论过：也许不要再害怕‘星球大战’计划？……当然，在对待这一危险的计划方面，我们不能漠不关心。但还是不应该有自卑心理。要知道赌注正好押在苏联在精神、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害怕‘星球大战’。因此，也就在这个计划上使劲，以便拖垮我们。我们决定说：是的，我们反对‘星球大战’计划，因为它使和平变得更加不稳。但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害怕的问题，而是责任问题，因为后果将不堪设想。‘星球大战’计划不会巩固安全，而只会破坏尚能成为安全因素的残余……我决定再次指出，我们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回答将是有效的。美国指望我们将建立类似的武器系统，希望在技术上同我们拉开距离，并利用技术上的优势。然而我们苏联领导人懂得：为了消灭‘星球大战’武器系统，只要有10%的费用就足以反对这种武器的体系了……”<sup>②</sup>

1986年7月18日，戈尔巴乔夫在与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会见中说：“世界处在独特的十字路口，事态将怎样朝前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美关系的状况……正是我们两国巨大的军火库，其中包括核武器库的存在，是今日世界最严峻的现实。如果我们从错误的前提和理由出发，来建立我们的相互关系政策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的话，那么，事情会发展到对抗的极点，以致会给我们大家和全世界带来最悲惨的后果。我想强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sup>②</sup> 同上，第79~80页。

调说，在苏联社会，而且不仅在领导层，形成了坚定的信念——寻找苏美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找到和扩大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以便最终建立友好关系……要知道现在形成了确实是离奇的局势。甚至如果一国将不断地搞武装、扩充军备，而另一国什么也不搞，那么，搞军备的那个国家也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要知道较弱的一方会干脆地引爆所有自己的核弹头，甚至在本国的领土上，这对它自己将意味着自杀，同时也意味着慢慢地杀害对手。所以您说的要取得军事上的优势是无稽之谈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甚至如果美国政府不再对解决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我们是不会让它得到安宁的。”<sup>①</sup>

然而当戈尔巴乔夫把“全人类价值”引入苏共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库时，最初为的是要“淡化”苏共传统的意识形态提法。这个概念只是用来作为“对外使用”，因为这里边还包括维护和平、裁军、防止生态灾难等思想。但是右派激进主义大众新闻媒介在社会上不注意的时候将这个概念“抛”到社会关系范畴上来，“与阶级利益相对立”。<sup>②</sup>于是，在“全人类价值”中又加入了法制国家的原则，即西方民主的基本要素。可以认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党和国家的首脑向“西方价值”的转变。这种情况几乎对所有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对外政策方面、意识形态方向、经济方面，等等。戈尔巴乔夫思想观点的变化在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中引起不同的反响。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这一转变，意识形态专家、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拿着到处鼓吹，说这是根本性的、“指标性的”转变，特别是跑到国外去鼓吹。雅科夫列夫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用哲学术语作掩饰，而且不时选用复杂的句型说：“人类共同利益不是哪一位思想家在象牙塔中通过苦思冥想而假设出来的抽象的哲学范畴。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整个地球似乎已小得不可思议之时，当人类的命运与历史只要按一下按钮就会结束时，当不用几个时辰全球50亿人便对某一事件家喻户晓时，这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就是具体而又生动的了。这些的确是全人类的利益所在。这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因为我们是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13~115页。

<sup>②</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

人类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优先考虑人类共同的利益,这个观点很有价值,因为它包含着发展的客观趋势。它要求放弃僵化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它有助于我们现实而又理智地把政体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共处看成是历史的要求,是国际主义者追求全球发展的体现。”雅科夫列夫的讲话让人大吃一惊!以至于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惊讶地问道:这是《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吗?用雅科夫列夫的话来说,当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的确确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凌驾于其他阶级的利益之上。而且,这一基本理论还导致了他的许多其他错误。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人类的确有它的共同利益,如果苏联领导人能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也包含在其中,那么冷战就会成为历史。”<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把“全人类利益”作为新思维的核心呢?

1986年的《共产党人》杂志刊发了原苏联驻美大使、苏共中央书记多勃雷宁撰写的《争取无核世界,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文章。多勃雷宁指出:“新思维的根据是什么呢?共同生存下去的相互依附性——这种世界各国面对着可能的核冲突的历史命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具有根本的意义。这种相互依附性决定了对国家安全问题采取崭新态度的必要性,这种态度也就是新的政治思维的特征之一。”“对大家来说,真正可靠的安全只能通过消除现代世界上不信任,紧急局势和敌意的根源的办法来取得。”“人类在核启示录面前已开始认识到一个简单的真理: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在国际关系中不是从使我们相互对立的、狭隘理解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我们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愿望出发。”<sup>②</sup>按照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解释,这是因为:随着国际社会各国日益增长的互相依存的趋势愈来愈强烈,出现了越来越尖锐的全球性问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69页。

<sup>②</sup> [苏]多勃雷宁:《争取无核世界,迎接二十一世纪》,《共产党人》1986年第8期。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年7月13日。

题。特别是人类在进入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的了。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在军备竞赛中取胜,从而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所以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作为出发点的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sup>①</sup>由此,戈尔巴乔夫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今天武器的性质决定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指望比如说通过构筑国防,甚至是最强大的国防,就能保护住自己,只要有军事技术手段,保障安全越来越成了一项首先是用政治手段才能解决的政治任务。而政治手段就是谈判和再谈判。谈判就需要有耐心,要始终不渝地寻找能够相互接受的、相互妥协的解决办法。

第二个结论:在当代,实力政策根本就是注定要失败的。从实力立场出发的和平,无论对它怎么说,都存在着内在的不牢靠。就其本性而言,它的基础是冲突——隐蔽的或者明显的冲突,是不断有爆发的危险,是总要试图用使用武器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个结论:它是前两个结论的逻辑上的继续。在当代条件下,安全(特别是说到大国,首先是核大国时)只可能是相互的,而如果拿整个国际关系来说——那就只可能是大家共同的安全。<sup>②</sup>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上述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sup>③</sup>。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同战争与和平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而且力图把对世界事务的政策和道义伦理态度统一起来。“过去曾作为一种经典公式的克劳塞维茨公式——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它应藏在图书馆里。在历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sup>④</sup>于是,“第一次出现了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今天的,而不是遥远的全人类的利益——使人类文明免于毁灭”<sup>⑤</sup>。

### (三) 要使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

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就是要克服人与政权的异化,实现人的精神解

<sup>①③④</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77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37~239页。

<sup>⑤</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85页。

放,使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不调动人的因素,也就是不考虑人们、劳动集体、社会团体、各个社会集团多种多样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吸引他们进行积极的创造活动,要解决任何一项任务和改变国家的状况都是不可思议的。”<sup>①</sup>

他在回答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奥基托提出的“苏联社会处于何种阶段,苏联革新进程走的是什么道路”问题时说:“我们今日所处的时期——这是对列宁的方法论、辩证法、列宁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年代的政治措施加以开拓实施的时期。我们应当将我们的概念从过去扭曲和变形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应当从列宁的观点出发,开始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但是将要到来的正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社会。对此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确信无疑。犯错误的完全不是社会主义,它之所以不成功,是变形和悲剧性时期的结果。如果要问改革的主要涵义,那就是克服人对经济和政治进程的疏远,通过彻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达到人的精神解放。”<sup>②</sup>

在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伙伴们”看来,苏维埃体制下存在的人对经济和政治进程的疏远、人与政权的异化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民对权力的无力与屈服。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就是要对行政指挥体制进行变革。因为这种体制是强加于人民头上的。“最初谈的是社会主义的个别扭曲现象,后来当看到制度同斯大林体制联系在一起,模式是强加给人民的,是依靠镇压来保证的,人民被剥夺了管理国家的权利时,我们明白了,应该走另一条路。因此提出了必须改革政治制度的问题。”<sup>③</sup>但是面对强大的体制,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是很难成功的。甚至在最开始改革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表现出了相当的担心。特别是在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时候发生的表面上看来不怎么起眼的一件小事,却更是让戈尔巴乔夫感到愤怒。在诺里尔斯克的大街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对他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不想去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有意思;不过,很遗

<sup>①</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31~332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憾,不说还真不行。这已是六年前的事了,我们家房子周围堆着一堆垃圾;里头有好多金属刨屑,现在还原封未动。鞋子划破了,都不敢放孩子们到院子里去呀。”像这样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是典型的事件。可怕就可怕在这“典型”二字。这就是体制,真是丑陋至极!为了把房子周围的地方打扫清理,竟然还要向总书记、向国家最高领导叩求,向稍低一点的领导反映就无济于事!使戈尔巴乔夫震惊的还有别的事:一个普通人在无所不能的官员面前竟命中注定是如此孤立无援。到底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使人们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尊严呢?做不到这一点,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sup>①</sup>于是,戈尔巴乔夫建议诺里尔斯克人要“更加坚定地去对付自己的上司,因为没有他们这些普通的平民百姓,我是永远也无法将官僚主义者从安乐椅里拉下来的”。但他们怎么才能在公民的行为方面尽快地成熟起来呢?难道说驯服的屈从会永远盘踞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吗?不,这不可能。戈尔巴乔夫相信:“民主化的进程将唤醒人民的觉悟。”<sup>②</sup>

二是人民对苏共的盲从与盲目。戈尔巴乔夫认为,形成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体制已经结成了罗织严密的思想网络,牢牢地束缚了苏联社会的正常思维,在全社会培养了人民对苏共的神话——党的英明伟大正确,从而使驯服了的人民心甘情愿地按照苏共的指示前仆后继。“斯大林主义的最危险的表现之一恰恰在于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企图使人们丧失思想能力,依靠无情的镇压和无所不在的宣传把人们变成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上的没有思想的螺丝钉。”<sup>③</sup>格拉乔夫描述了党—社会之间的关系演变:在苏维埃人的幸福受到党和政府“慈父般关怀”的年代,除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以及全民一致投票造成共产党人与非党人士的联盟(人人都知道不听话者会有怎样的下场)之外,他们已经不会以其他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公民情怀了。此外,每天都受到宣传工具灌输的“基层群众”,自然不掌握有关国内真实情况的可靠信息。即使“高层人物”所获得的关于国内和世界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77 页。

② 同上,第 177~178 页。

③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 年,第 6 页。

真实情况的情报，也是支离破碎，有一定的“公差”，而且往往整理得面目全非。在“成熟社会主义”时期，苏联社会好像一场声势浩大的列队行进，人们全都蒙上眼睛，由一些眯着眼睛、自己都不知道去向何方的向导引领着，向导不时高喊雄赳赳气昂昂的口号，并要求大家齐声高呼“乌拉”。安德罗波夫一不留神猛然冒出的一句话，印证了这幅超现实主义图画的真实性，他大概要算是国内消息最灵通的人了，上台伊始，便当众承认：“我们还应当弄清楚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里面。”<sup>①</sup>

三是人民思想贫乏与丧失判断力。在“乌拉”的高呼声中，苏联人民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却在沙漠化的思想土壤中产生了思想分裂的怪胎——双重思想、双重生活。在麦德维杰夫看来，“从 1917 年开始，在俄罗斯就建立了一个邪恶帝国，而列宁则是这个帝国的精神化身，列宁的头像被到处摆放、悬挂、绘画、印压和雕塑。国内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该宗教规范了人际关系的三个基本准则：对上级奉若神明，卑躬屈膝；对同级憎恶猜忌；对下级命令施压。只有做到这三点才可以苟延残喘地活着……人们为偶像修建了一座陵墓，崇拜者们不断前来瞻仰，并发誓永远遵循他的反人类训诫……同时成立了许多进行崇拜领袖仪式的机构，被称为区党委，各个城市还有市党委。人们放弃了劳动与休息，终日被迫为领袖及其学说祈祷，这就是所谓的‘开会’”<sup>②</sup>。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承认，改革之难就在于旧的政治思维太强大。他指出：“大多数苏联人多年来已习惯于保持‘双重思想’的状况——在公开场合都支持当局的行动，而在家里、在私下或在朋友圈中就说出他们的怀疑，甚至愤怒。双重思想的状况只是在改革中才得到了消除。”<sup>③</sup>

不过，严丝密封的闷罐式生活毕竟无法持久。在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中，一丝丝新鲜的空气开始不断涌入，并使苏联社会悄然发生着变化。戈尔巴乔夫就说，“布拉格之春”在我们社会中播下了深刻思考的种子。由对“民主传染病”的恐慌而引发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不仅是对捷克斯洛伐克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02 页。

<sup>②</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面》，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85 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24 页。

人民的主权和权利的粗暴侵犯。它也把在我们自己国家中和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已经成熟的变革阻挡了好多年。也应指出那样一些现象，诸如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或“欧洲共产主义”对新的社会进步道路的探索所起的作用。“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国人们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对民主、自由和和平的价值的思考，对通向这些价值的道路的思考。”<sup>①</sup>

于是，在1987年的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总结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说：

我们已重新把在某个阶段已经放下的旗帜，即把人道主义目的状况作为社会主义最高价值观的旗帜紧握在手。人是改革的中心。关于这一点我们是说得很负责、很明确的。从中也得出了对当代社会主义概念来说非常重要的理论结论：只要在经济中、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在管理机制中以及总的在制度的运作中，一切都为了人，这就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应该有人的参与。为了人本身应该让人参与这一切过程……

如果从大的范围来看所谓的“叶利钦案件”，那么这一案件正好突出了改革过程的这一个时刻，即从改革的集会阶段，从大力发扬公开性和批评的阶段向务实过渡的时刻。这个人的个人特点正好反映出“幼稚的”自尊病，这种自尊病在不同寻常的变革之初的欢快气氛中显露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应该及时加以克服。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善于把这种自尊贯彻到实际行动和日常工作中去，那里便会出现政治活动家的危机……

我们尖锐地感到，现在能否务实这一点将会表明谁是什么样的人，谁真的能够在改革条件下工作。在群众集会上只需要一种品质，而现在当需要提供住房、食物时，则需要另一种品质……

正是在这个时候，特别是显现出党组织落后于事件过程，落后于需要加以具体体现的那些思想……

---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70页。

国际会晤<sup>①</sup>是十分重要的事件。会上,说实在的,实现了突破,首先表现在,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70年来第一次聚到一起,坐在一张桌子旁,进行心平气和的理论讨论和政治讨论……

也应该承认,要不是我们以新思维观点看待这次会晤的话(新思维方法使我们得以用新的方法分析当代世界问题),这次会晤什么结果也没有。还有一点并非不重要,我们以亲身的体会确信,我们摒弃不与某些人往来的决心是正确的,那种不与人交往的做法是基于多年来存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理由,认为我是共产党人,因此我永远是正确的……我们不做任何删改和限制地刊登了所有人的讲话,坦率地说,也增加了人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我们自己的权威。虽然有人担心这一点,但除了我们再次表示准备进行真诚的对话和把各种观点,不管是怎么样的观点加以比较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也不怕我党和我国人民了解他们……

在政治层面上和在领导层面上提出的一些思想,甚至具体方针,在执行中往往碰到了阻碍机制。这也涉及对外政策机构。比如,提出必须解决欧洲(武器和军队)不平衡问题,已过了5个月至6个月,但在谈判层面上什么也没有做。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推动、新的指示……

中国人用两年的时间做到养活10亿人口。而我们却老怕这怕那。我们已说过: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只要能有产品就好。已经开辟了承包和租赁的可能性。这样就应该去干,应该让人们有可能去干。如将踏步不前、左右观望——什么结果也不会有的。给人民以自由,这样就会有产品。技术为生产粮食、增加产乳量、增加饲料服务。剩下的就是给人以自由。<sup>②</sup>

<sup>①</sup> 在克里姆林宫官方庆祝后,这些日子里来访莫斯科并表示愿意参加这种“非正式”会议的所有外国代表团立即举行了会晤。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04~208页。

#### 四、总书记“战胜”了马列主义

1991年6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挪威奥斯陆发表诺贝尔和平奖演说：

当我同意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认识到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

完全由中央控制的国家所有制，无处不在的独裁的官僚主义体系，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思想和科学中的垄断，攫取了我们最好的资源，包括具有最好的智力资源的军事化工业，军事化工业负担着难以承受的军事开支，危害着我们社会的进步，我们也曾为此骄傲。后果是，我们的社会在经济和精神两个方面正在衰败下去。然而对于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这个国家看起来仍是一幅相对健康、稳定、有秩序的图景。在宣传魔力错误引导之下的社会很难知晓正在发生什么，它所面临的不远的将来是什么。最微弱的抗议表示也被镇压下去，绝大多数人将抗议者视为异类、诽谤者和反革命。这就是1985年春天的形势，仍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让人们维持现状，只做一些表面的改变。这就意味着继续欺骗我们自己和人民。

我们想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人类的普遍价值和谐一致，遵守国际标准。当社会被给予了自由后，它就无法认识它自己了，因为它“在镜子背后”生活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承认每个民族的合理选择，如果一个民族通过公正的全民公决真的决定退出苏联，我们对此理解。

在一个世世代代人民都相信那些所有权力或武力的人能够把持异议者、不同意志者排除在政治生活甚至是投入监狱的国家里，领导一种和平进程并非易事。世世代代以来，这个国家的问题已经习惯于最终用暴力手段来解决。

果断并不意味着回到压迫、压服对方，或是对权利和自由的压制。

我永远不会同意将我们的社会分离为一部分人宣称“代表人民”说话和行动，而一部分则是“人民的敌人”。

在多党制、思想自由、重提各共和国的民族特征和主权的新的氛围中，社会的利益必须绝对置于各个政党、各个团体的利益之上，置于其他任何局部的、地方的或个人的利益之上。

苏联领导人，无论在中央还是各共和国，以及苏联公众的大部分，都明白这种需求，尽管在我们社会的一些地方，也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种想法的。有一些挥舞旗帜的人，他们宣称唯有自己才是爱国主义，认为这就意味着不与外部世界“纠缠在一起”，这种爱国主义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怎么追求。

我们在与西方的一般性政治合作中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在东欧剧烈变化和寻求德国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时刻，它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波斯湾危机这样高度紧张的局势中，它也站稳了脚跟。

冷战已经结束，全球性核战争的危险实际上已经消失。铁幕已经撤去，德国重新统一，这是欧洲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真正和平的世界政治的未来前景依赖于通过共同努力，去创造一个民主空间，在其中，各国的指导方针是人权的优先和它们自己国民的福利。

#### 和平意味着“普遍的商谈”

一个现代国家，它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都追求一种能够将自己人民的利益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的政治。

.....

通过授予我诺贝尔奖，我看出了对我的愿望、我的追求、我国业已开始的深刻变革的目的、新思维的思想的理解和你们对我坚持以和平手段实现改革任务的赞许。为此我对委员会成员心怀感激并想请他们相信：如果我对他们的动机估计得正确的话，那么他们并没有做错事情。<sup>①</sup>

<sup>①</sup> 郑建新：《在历史祭坛上——戈尔巴乔夫的命运》，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230~232页。

戈尔巴乔夫的和平演说表明：他已经彻底抛弃了马列主义最后的精髓，虽然此时马列主义仍然是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础。马特洛克分析了戈尔巴乔夫的精神裂变之路：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经常被外国观察家们所误解，其中包括将他视为朋友的西方政治家们。他们说戈尔巴乔夫仍表示忠诚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他们认为他对市场经济一无所知。他们的错误在于，虽然戈尔巴乔夫一如既往地延用这个词（社会主义），但他其实是害怕一旦抛弃这个词，那些潜在的支持者就可能拂袖而去。但从1988年到1989年，他已经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70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中，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也毫无觉察。“仔细研读戈尔巴乔夫的诺贝尔和平奖演说，你就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已经转变。在这篇演说中，马列主义的传统概念已经荡然无存。但戈尔巴乔夫思想转化的最有力的证明以及他对未来的设想是出现在7月份，奥斯陆之行几周之后。等到苏联共产党新党纲草案发表时，不仅仅是马列主义的概念没有了，甚至连一点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都找不到了。”<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的诺贝尔奖演说，“是他与马克思社会主义信仰的一次告别”<sup>②</sup>。同日，苏联《独立报》给予报道：《戈尔巴乔夫对马列主义的胜利》。<sup>③</sup>

其实，这种“胜利”早在1990年7月召开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无论是戈尔巴乔夫代表的苏共中央纲领派，还是叶利钦代表的苏共民主纲领派，抑或是利加乔夫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围绕着“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了激烈斗争，力图在党的大会上伸张各自的政治观点。只不过，戈尔巴乔夫取得了胜利。此时的戈尔巴乔夫，不过是借着诺贝尔的讲台发表他的“胜利”感言而已。

---

<sup>①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55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563页。

### (一)《苏共中央纲领》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向苏共二十八大提交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这个纲领草案是在 1990 年 2 月 5—6 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通过的。关于马列主义。《苏共中央纲领》认为：“我们重申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法的创造精神，并以这种忠诚为指导，坚决抛弃对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和不容忍态度。”关于社会主义。《苏共中央纲领》认为：“我们首先要与同社会主义原则不相容的专横的官僚主义制度决裂。我们的理想是建设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忠于社会主义选择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仍然是毫不动摇的。”未来的社会“将在民主条件下，在文化和科技巨大进步的基础上形成，将建立在我国各族人民和全人类价值观的基础上。”关于苏联共产党。《苏共中央纲领》认为：“如果党本身进行改革，它就能够保持先锋队地位。”“苏共将推行自己的政策并在民主进程范围内维护自己的执政党地位而奋斗，在选举中争取选票，使自己得到人民的委托来组成中央、共和国和地方领导机构”；党不再“觊觎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巩固自己的特殊地位”。“我们设想的革新后的苏共是一个作出了社会主义选择的党，它反映了工人阶级，全体劳动者的利益，根据对新的现实进行科学分析制定自己的政策。”<sup>①</sup>

### (二)《苏共民主纲领》

这个纲领是“民主纲领派”在 1990 年 1 月 20—21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苏党的俱乐部和党组织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 102 个城市和 13 个加盟共和国 162 个党俱乐部和党组织的代表。这个在党内首先提出的纲领反映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的观点。关于马列主义。《苏共民主纲领》认为：“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使用马克思主义遗产只在当代条件下仍然有意义的那些部分。”“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sup>①</sup> 路曼：“苏共党内三个纲领的比较”，《参考消息》，1990 年 6 月 5—6 日。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关于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关于没有政治多元化的人民政权的可行性,关于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必然增长,关于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和国际主义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等,这些教条主义的认识需要根本修改。”关于社会主义。《苏共民主纲领》认为:“科学地确定所进行的改革的目的,彻底消除极权制度和向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民主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全人类利益和价值观优先的基础上,即建立在民主、人道主义、多元化、社会公正、不使用暴力、团结、对其他世界观和社会制度采取容忍态度的原则基础上。”关于苏联共产党。《苏共民主纲领》主张“苏联共产党的彻底改革”。可分为两个基本的阶段。第一阶段,把政权从垄断政党手中转到苏维埃手里,实行党的民主化。第二阶段,苏共变成在多党制、法制和议会制国家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议会党。在这个阶段,“党内激进派和保守派将彻底划清组织界线。在前一阶段出现的各种思潮、纲领、派别,可以成为产生若干个提出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建设途径的政党的基础”。<sup>①</sup>

### (三)《马克思主义纲领》

“马克思主义的党俱乐部联合会”提出了《苏共内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这个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党俱乐部联合会”在1990年4月14—15日在莫斯科市郊的一个小城举行的代表会议通过的。参加会议的有来自54个城市的308名代表。这个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内“传统派”的观点。关于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纲领》认为:“我们赞成恢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它主张对自己的奠基者及其继承人的理论遗产采取批判态度,随着世界的变化不断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革命化。”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纲领》认为:“只有按自己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社会主义选择的民主运动才符合社会的根本利益。”关于苏联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纲领》认为:“必需消除把苏共作为‘兵营式共产主义’党的那种现行模式,但不是取消共产党本身。”主张“党内关系民主化”和“党的组织结构民主化”。并强

<sup>①</sup> 路曼:“苏共党内三个纲领的比较”,《参考消息》,1990年6月5—6日。

调：“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并不一定导致多党制、议会民主制甚至苏维埃体制。它要求真正的人民政权，保障每个人在各个层次上能直接参加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sup>①</sup>

无论上述三个纲领在各自主张上有多大区别，但是对欧洲共产主义思想——民主社会主义——的接受与认可却是其共同之处，并导致了相同的政治后果：放弃苏联体制。正如谢·卡拉—穆尔扎所言：“苏联是在精神领域和社会意识领域中遭遇失败的事实特别重要。首先是在执政精英和文化精英的意识中。严格地说，是苏联的党政精英在自己的意识中实现了那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精英已经完成的转变。在西方，这种转变意味着放弃支持苏联体制。”<sup>②</sup>

---

① 路曼：“苏共党内三个纲领的比较”，《参考消息》，1990年6月5—6日。

②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09页。

## 第三章 “让人民参与政治” ——改革的动力机制

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的特殊性和力量在于,改革既是“来自上面”也是“来自下面”的革命。这是改革成功和不可逆转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sup>①</sup> 改革是人民的事业。只有人民,只有具备多种多样创造力的人才是历史的主角。因此,改革开头的任务、改革必要的条件和成功的保证,就是唤醒人们,使他们真正积极起来,关心改革,使人人都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是自己的企业或机关的、自己的研究所的主人。同时,戈尔巴乔夫又认为,完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自发过程,要完善社会主义,就必须给予巨大的关注,正确地、不抱偏见地分析问题,坚决抛弃一切过时的东西。在这一方面不能仅仅局限于采取一些不彻底的措施。那么这就要依靠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依靠最广大的劳动者阶层积极参加实施既定的改造,也就是民主化,并进一步民主化。简言之,需要全部社会生活的广泛的民主化。这就是业已开始的过程不可逆转的主要保证。只有通过始终如一地发展社会主义固有的民主形式,扩大自治,我们才可能在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觉的纪律。“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能实现。”<sup>②</sup>改革正是以民主变革的进程开始的,必须争取做到实现改革的手段同样是民主的。“实质上,公开性也就成了吸引人们参与政治和使他们参与建设新生活的手段,他们的参与完全符合改革的实质。公开性不仅创造了实现已确定的改革的条件,而且有助于克服对改革政策的抵制。由于公开性,我们得以在社会意识中实现有利于民主、自由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② 同上,第31页。

文明的人道主义价值的深刻的心理的转变。对于那个时期的基本成就不可逆转的保障之一就在这里。”<sup>①</sup>在执政的头几年，戈尔巴乔夫是真诚“相信人民”的，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后盾。但是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戈尔巴乔夫开始发觉，人们对他推陈出新的种种做法不感兴趣了。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他们已经落后，不理解他所提出的各项改革，于是他越来越不相信他们了”<sup>②</sup>。

人民，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牺牲品。

## 一、公开性：人民有权了解真相

什么是“公开性”呢？

从字面上看，意为“公开讲话”或“公布事实”。据马特洛克分析：“这个俄语词没有确切的英语对应词，这就使美国弄不清楚该政策的真实含义。它并不像某些外国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是指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而是指官方机构的运作应该是开放的，因而它同我们的概念‘透明度’相似。其目标不是新闻媒介的自由，而是为政策的变化进行更有效的宣传。”<sup>③</sup>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助理看来：“公开性已成为国际上的称谓。它是伟大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象征，并成为世界语汇中与‘改革’一词一起排列的词汇。”<sup>④</sup>

为什么需要“公开性”？戈尔巴乔夫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这是由苏联改革的制度特性决定的。苏联改革的制度特性——党和国家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决定的。戈尔巴乔夫指出：“在苏联的条件下根本性的改革只能由上而下，由党与国家的领导开始。这是由这种制度的‘性质’本身决定的，那就是对社会和国家生活的超集中领导。这同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30～131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sup>④</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样是由于习惯于执行‘上面’作出的指示和决定的群众的惯性。从改革一开始，国家的领导人就特别重视坦率地、开诚布公地并通过同群众直接交往的途径解释新方针。因为没有公民的理解和支持，没有他们的参与，就会寸步难移的。”<sup>①</sup>

其次，这是旧的生活再也无法维持的需要。当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苏联当局已经无法阻止“窗帘外面”的生活洪流，于是便尽量封锁来自“山那边”的消息。出国几乎成了主要的职务特权。进入图书馆的珍品部和专用阅览室，同进入特殊供应商店一样受到严格控制。在科技进步一日千里和全球通信联系飞速发展的时代，苏联当局通过克格勃对复印和传真严加禁止。电话簿上带有“用于公务”的字样，地图和大城市的平面图出版时故意出错，以便迷惑潜在的侵略者。问讯处禁止向普通公民提供外国大使馆的电话号码。对“敌对之声”的无线电干扰开到最大功率，苏联曾经向世界贡献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葛罗米柯代表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一条主要外交倡议却是禁止卫星电视广播，因为据说它侵犯了国家的边界。“安装卫星电视天线自然被定为政治上持不同政见、也就是刑事犯罪的一种方式。”<sup>②</sup>但是生活的洪流汹涌而又澎湃，改革要求打开国门，重新认识“窗帘外面”的世界，对“山那边”的迫切认知提供了“公开性”的生存土壤。

最后，这是获取人民支持改革的必然要求。根据改革政策的发展逻辑，要求公开性的另一个因素也就出现了：需要人民真正了解改革并支持改革。从 1985 年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到 1986 年初的近一年时间里，戈尔巴乔夫突然发现：改革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因为许多人仍将这一政策视作昙花一现的例行运动。这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个极为不好的现象。因此，迫切需要采取必要措施以排除诸如此类的怀疑，使人们坚信已经采取的改革方针的必要性。于是，戈尔巴乔夫释放了“公开性”这一话题。他说：“没有公开性就不会有民主。”“必须使公开性成为不停顿地发挥效力的一种制度。公开性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76 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46 页。

中央需要它，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地同样需要，甚至可能还更加需要。”<sup>①</sup>在初始阶段，戈尔巴乔夫本人还没有把它同言论自由等量齐观。那时在他的态度中，尚有许多传统的、“列宁的”东西——从党（被正式宣布为改革的先锋）的教育宣传作用的立场出发、为“动员群众”来实现新的政治方针。<sup>②</sup>

1986年7月底至8月初，戈尔巴乔夫去了远东。这次巡视带来的更多的是失望：戈尔巴乔夫感到人们期待着巨大和迅速的变革，他们充满了热情。但特别让人感到失望的是，不管是这些人，还是各级领导人，都不会、不知道、也不想按新的方式来做任何事情。戈尔巴乔夫说：

谁也没有现成的药方，政治局没有，政府也没有。大家都要去想，大家都要学习、试验、冒险。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开始！在工作里会领悟到真理。主要的是一切都要凭良心办事，每人都要负起责任，努力战胜自我。我们对缺乏公开性和批评的局面已有所习惯。这里涉及的既有普通的工作人员，也有主管人员。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民主，而现在应该运用它和重视它。如果有人开始折腾人们、把他们的积极性变成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那么，这些人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要给地方新闻部门充分的自由。公开性——这就是社会主义……从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来说，这是真正的革命事业……很多东西要取决于领导人自己的行为。我们将坚决反对把自己的职权看作世袭领地、看作对权力和真理的垄断的态度……<sup>③</sup>

1989年5月，《苏共中央通报》公布了苏联社会科学院在前一年年底进行的一次关于“公开性”的民意调查结果。<sup>④</sup>结果表明，80%以上的苏联人认为“有必要”发展“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只有6%至8%的人认为公开性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sup>③</sup> 同上，第100页。

<sup>④</sup> 法新社莫斯科1989年5月10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9年5月15日。

“走得太远了”。《苏共中央通报》指出：“恐惧综合征”正在慢慢消失，“害怕”批评领导人和官方机构的情况也在慢慢消失。

### (一) 赫鲁晓夫式“梦魇”

如果仅就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政治命运而言，提倡“公开性”的背后还隐藏着戈尔巴乔夫自己的政治盘算——“公开性”能够为他提供必要的政治庇护，并从而可能使他摆脱赫鲁晓夫当年被迫下台的“梦魇”。戈尔巴乔夫说：“制度产生的官僚会抵抗到底的。制度通过这个官僚系统保护自己。这个制度吞噬并清除了赫鲁晓夫，恢复了勃列日涅夫的新斯大林主义。我经历了这一切，亲身感到了这一切。我看到，官僚进行着彻底的抵抗并最终走上叛乱之路。”<sup>①</sup>赫鲁晓夫曾试图通过提高国家机关的作用的办法来削弱党管一切的状况，却因此丢掉了总书记的职位。

1964年10月13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遭到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党内高层的猛烈抨击，指责他破坏集体领导原则，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他人，不理睬其他领导人的意见。与会者要求赫鲁晓夫以“自动退休”的办法解除其担任的党和国家职务。赫鲁晓夫被迫接受这一提议并发表讲话：“你们大家在这里对我的不好品质和行为谈了许多，也谈到了我的好的品质，为此我感谢你们。我不打算和你们进行斗争，当然我也已无能为力。我与你们一起与反党集团作过斗争。我珍惜你们的真诚。而我却用另一种方法来对待你们，请原谅我犯下的粗鲁……在这里所讲的许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但我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我表现得软弱，没有注意行为不端的现象。我曾试图不拥有两个职位，但这两个职位正是你们给我的！即使我是个有才能的人，我也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把这个问题提交苏共二十二大……现在，我激动和高兴，因为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可以监督第一书记的活动并能公开讲话的时代已经到来。今天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就是党的胜利。我想我是应当离开了。”<sup>②</sup>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sup>②</sup>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405页。

中央委员们一致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

赫鲁晓夫有反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能力吗？1957年，他依靠中央委员会赢得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内部斗争；1964年，赫鲁晓夫还有机会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的儿子解释道：“无论是权力机构、军队还是克格勃，他们都是这出戏的实际参与者，都不可能支持父亲。人民只是处在观众的地位，他们被深深的‘乐池’与舞台隔开了。”<sup>①</sup>

1964年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无疑在戈尔巴乔夫的意识中留下了阴影。如果戈尔巴乔夫走得太快，那么，他作为总书记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马特·洛克认为：“毕竟，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倡议。但当改革开始触及特权分子的利益及赫鲁晓夫同僚们的舒适习惯时，他就被无情地抛弃了。这段历史在每一个想要进行改革的人的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教训在于，除非苏联领导人能够避免被保守的共产党领导人赶下台，否则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sup>②</sup>作为戈尔巴乔夫曾经的战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在总结改革失败的原因时也指出：“‘戈尔巴乔夫之谜’的答案之一是他被巧妙地有预谋地灌输进了‘赫鲁晓夫综合征’的思想。1964年十月中央全会上，改革的领袖被解职。这个痛苦的教训被戈尔巴乔夫周围的激进派所利用，他们创造怀疑气氛以加强对总书记的影响……但只用‘赫鲁晓夫综合征’还不能解释与戈尔巴乔夫名字紧密相联的政治方针所遇到的挫折。这里有一个互相联系，互为条件的原因综合体在起作用。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sup>③</sup>

当改革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党内和社会上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运动感到紧张不安的情绪越来越多。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指出：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党和国家机构的官员感到伤心。对他们来说，实行选举的主张相当于在美国大学废除终身任用制”。对苏联军方来说，苏联国防部官员认为他们自己的地位降低了，对此感到不满。对苏联工人来

<sup>①</sup> [俄]谢·赫鲁晓夫：《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第761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sup>③</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

说,一直以来的改革只是意味着他们要比以前多干活,可是却比以前更糟。“在他们看来什么都没有改善。食品供应和住房条件跟以前一样糟糕,已经发生变化的则是变得更糟了。”评论继续指出:危险在于戈尔巴乔夫可能步赫鲁晓夫的后尘。“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赫鲁晓夫当时也曾试图限制党和国家官员的权力;他曾建议对官员的任期作出限制,他曾试图强行削减军费;他支持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改革。他在 1957 年曾平息了一次党内造反,但一个新的联盟终于在 1964 年把他搞下了台。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支持者担心保守派可能会占上风。”<sup>①</sup>

那么,戈尔巴乔夫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避免这种结局呢?在他看来,“公开性”既是目的本身,也是在各个生活领域进行改革的强有力手段。它就是一把粉碎顽固守旧分子阴谋的利器,是在改革初期支持改革进程的唯一机制。正像格拉乔夫所观察到的那样,“在那个时期,公开性的口号所唤醒的知识界和媒体,向作为自己所领导的党的人质的戈尔巴乔夫提供了更为切实的支持”<sup>②</sup>。于是,戈尔巴乔夫作了结论:“目前改革的其他机制还没有安排就绪,还起不到作用,只有公开性这一机制在支持着改革过程。”<sup>③</sup>

## (二) 绝不同意隐瞒真相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公开性”就是要把一切事情都摆在明处,这是破除僵化的专断体制、防止社会谣言形成的有效方法。“封闭的社会相信谣传。由于正常的信息来源不可靠,人们就转向亲友、家属、同事,甚至是道听途说,信口开河。尤其是,出自某某认识的某某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嫂子或小姨子的话可能比政客和大众传媒更为可信。”<sup>④</sup>同时,这又是在改革形势下对国家管理方式提出的新要求,更是社会民主的价值体现。“社会的正常的民主

<sup>①</sup> [美]《华盛顿邮报》1987 年 3 月 8 日文章“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会紧张不安”,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 年 3 月 15 日。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33 页。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169 页。

<sup>④</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310 页。

发展不允许把处处保密,处处搞黑箱操作当作国家管理方法,它要求有透明度、公开性、公民获得信息的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宗教与其他观点与信念的自由、充分进行批评的自由。”<sup>①</sup>

就戈尔巴乔夫的现实政治需求而言,提倡“公开性”,就是要向政治局的战友们表明:生活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按照政治局的分工,涉及军事相关的一切情况都是由苏共中央总书记亲自掌握。举凡牵涉实际军费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不仅是老百姓,就连政治局委员也不了解真相并实际上成了“人质”,对高度秘密的问题只能在现成决定上签字画押,根本无权提问和讨论。在乌斯季诺夫主管国防口的时候,实际上他就一手垄断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敢过问一句,更不必说要求了解这方面的什么情况了。”<sup>②</sup>这种做法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军事力量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中的历史作用的思想原则,也符合十月革命以后逐步形成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军队的政治传统。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改革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就是:与军事相关的领域特别是军事工业过多地侵占了有限的国家资源,从而导致改革无论在资金来源还是智力支持方面都无法获得有效支撑。戈尔巴乔夫说:“全国只有两三个可以接触军工综合体的数据资料。当然,我们都明白不堪重负的军费开支对经济的影响是多么严重。但只是在当了总书记后,我才了解国家军国主义化的真正规模。最终我们还是克服了来自军工综合体头头们的阻力,公布了这些资料。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 16%,而是 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 6%,而是 20%。250 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 200 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sup>③</sup>戈尔巴乔夫决心改变这一切。然而苏联国民经济强烈的军事化特征,并不是刚刚升任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一己之力所能改变的。因为这种经济特征的形成不仅仅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77 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49 页。

<sup>③</sup> 同上,第 159~160 页。

是出于国家安全的军事需要,更是由传统的以阶级对抗为内核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戈尔巴乔夫面临着现实政治压力和意识形态禁锢的双重挑战。“公开性”越来越成为戈尔巴乔夫冲破旧的社会政治思维的“思想杠杆”。一年以后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让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有了用武之地。

1986年4月26日1时23分50秒,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

一般来说,按照以前的做法,发生这样的重大事故是要严密封锁消息的。所以在事故刚刚发生的时候,“苏联老百姓从刊物上发表的严加控制的消息里对这起事故了解不多”<sup>①</sup>。但是当“公开性”成为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的策略手段并被他赋予社会主义内涵的时候,如何应对核电站爆炸所带来的国内外对于改革质疑的政治危机,就成为戈尔巴乔夫必须慎重考虑的政治问题,而不再是一起单纯的安全事故。一方面,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地的乌克兰来说,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加剧当地的离心倾向。乌克兰是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反对莫斯科和“反对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措施失当,这起事故“可能会促使当地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掀起的运动造成的不满情绪,演变成一股得到工农有力支持的,有着广泛基础的舆论”。另一方面,这起事故的处理态度也会影响到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东欧国家会问,既然苏联在发生核事故时采取这种做法,一旦爆发战争,它会怎么做呢?“这场危机和克里姆林宫处理这场危机的方式使东欧领导人感到愤怒。”<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必须考虑采取新的处理方式。在他的主持下,苏共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紧急商讨对策。

1986年4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非常会议。

1986年4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消除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事故后果问题的行动小组。其成员有:雷日科夫(主席)、利加乔夫、切布里科夫、多尔吉赫、苏联内政部长弗拉索以及雅科夫列夫。

1986年5月1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话讲话,介绍切尔诺贝利灾难。

<sup>①</sup> 美联社莫斯科电1986年4月30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年5月2日。

<sup>②</sup> [英]《外事报道》1986年5月15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年5月19日。

1986年5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清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的措施。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我们见到了司空见惯和令人吃惊的不负责任的态度的影响。应该十分严格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处在本国人民和全世界的监督之下。已经发生的事件关系到所有的人。在这儿我们看到了本位主义的后果:人们看待问题时不能超越自己的直接技术责任。而大家都应该知道,谁要是玩忽职守、道德败坏,谁就别指望得到宽恕。我们什么都不会规避。要给轻敌思想最沉重的打击。我们要对全世界公开宣布所发生的事情……在科技革命时期,决定性的因素……是纪律、劳动素养、专业知识和责任心。一切都要按科学办事。”<sup>①</sup>

1986年6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例行会议,讨论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问题。

1986年6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消除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事故后果问题行动小组召开第21次会议。会议批准了《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与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4号机组事故原因和消除事故后果有关问题的指示》。

1986年7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相关科学家和原子能专家也应邀出席这次会议。会议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原因进行了第一次广泛的讨论,提出了核动力的前途问题。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30年来一直听到你们这些学者、专家和部长说,那里一切都很可靠。你们指望我们像敬神一般看待你们。而结果却轰然垮塌了。原来有关部委和科学中心并未加以监督。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人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sup>②</sup>政治局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信息应当逐渐增多,以免造成恐慌,从而带来更大的危害。但是另外一种观点占了上风:有关信息随到随即发表,原原本本,不加限制。戈尔巴乔夫明确说:“无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还是向社会舆论说明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94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情况时,我们都绝不同意隐瞒真相。我们有责任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估并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现在是在全国和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工作的。谁要以为可以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提供与事件有关的全面信息。”<sup>①</sup>对这一结论,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全都表示支持。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个后果是它再次证明了旧有体制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管理作风上都存在很多弊端,必须要加以彻底改革。戈尔巴乔夫指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一个最直观可怕的例证,不仅证明了我国技术的陈旧,而且证明了原有的那个体制已经奄奄一息。“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任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是又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论据。”<sup>②</sup>另一个后果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成为对公开、民主、坦诚等精神的严峻考验。在开始商讨事故对策时,无论是乌克兰当地政府还是苏共中央政治局都希望把这件事情按照以往的做法“照此办理”,以免影响苏维埃国家的形象。“试图自己弄清悲剧的真正规模的政治局那难堪的沉默,乌克兰地方当局按照习以为常的条件反射缩小悲剧规模、‘以免莫斯科伤心’的做法,那些对于反应堆的设计和运行负有责任者的本位主义恐惧——惊惶失措、并未彻底弄清所发生事件的人们所有这些渺小的、见风使舵的忙碌和操心,打成了一个机关和本位主义的利益与阴谋的死结,除非表现出必不可少的政治意志,否则就无法将死结劈开。”<sup>③</sup>政治局开始采用的“有控制的公开性”,“不仅仅败坏了自己的名声,而且从准确的法学意义上讲,掩盖真相就是犯罪,因为秘而不宣或者不及时通报,对数十万人的健康和生活造成了危险”。<sup>④</sup>戈尔巴乔夫决定公开事故的真相。结果却发现:“坦白承认”不仅减轻了改革在政治和道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9~140页。

<sup>②</sup> 同上,第141页。

<sup>③</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sup>④</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43页。

德威望方面所遭受打击的后果,而且也放开了手脚,可以在所出现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在实际运用所宣布的“公开性”理论的过程中,“开诚布公可以成为最宝贵的政治王牌”<sup>①</sup>。

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相信开诚布公、“公开性”就是那把珍贵的钥匙,可以用来打开通往体制的城堡和装甲保险柜密码的路径:“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开性就是社会主义。”此后,不仅是关于切尔诺贝尔的话题,在涉及更多的社会事件时,戈尔巴乔夫都高举“公开性”的旗帜,宣称这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民主的体现。格拉乔夫回忆说,有一次切布里科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反对发表瓦西里·贝科夫的中篇小说《苦难的标志》,警惕地认为小说是在“挖集体化的墙角”,戈尔巴乔夫大声地抱怨说:“不错,过激的东西是会有的。大浪一起,泥沙俱下。会有泡沫,会有垃圾,可这都是春天的标志,革新的标志,民主的伴生物。但民主的飞轮要转动起来……不要害怕。主要是人民做出了反应,昂起了头。打他们的头,再来发号施令,那就是对民主的背叛。”<sup>②</sup>

然而无论戈尔巴乔夫是否相信,只要他是真诚地释放“公开性”,那么人民也会以真诚对待他,从而按照他的改革路线跟着他走。但是政治现实是残酷的。当戈尔巴乔夫决心打开封闭已久的“房门”时,也许最初他根本没有想到在一个充满了“人民敌人”的国度里,“公开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上,1986年,切尔诺贝尔核电站事故的揭露,对共产党官员在公众中的形象甚至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因为它表明苏共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参与了大规模隐瞒危及几百万人生命的事实在真相的活动。对许多人来说,大多数人只知道过去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这些年不断曝光的那些具体证据则激起了全国民众对当局的憎恨。利加乔夫的一个判断是绝对正确的:“新闻媒体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sup>③</sup>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sup>②</sup> 同上,第135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 (三) 应该向人民讲真话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改革是人民的事业。没有了人民的支持,改革是进行不下去的。“应该向人民讲真话,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sup>①</sup>因为列宁早就说过:“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群众、人民、大众将在事实上即在斗争后作出究竟有没有力量的解答。”<sup>②</sup>所以提倡“公开性”,它的政治要求就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经常性地与人民保持紧密联系。没有接触,就没有公开;没有公开,又谈何改革?

1985年5月15日至17日的列宁格勒之行,是戈尔巴乔夫倡议“公开性”的第一个行动。这次行动在两个方面突破了苏联领导人的政治常规:

一是突破了领导人的讲话常规。按照苏联的政治传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明总书记就有了为所欲为的独断专权,虽然这在事实上并未奏效,比如斯大林和执政后期的赫鲁晓夫。但是在理论上,苏联共产党奉行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苏共中央总书记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政治局集体意志的共同体现。可以说,总书记就是党的代言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饱含政治深意,都需要经过中央政治局事先讨论同意之后才能执行。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列宁格勒之行开始打破这一政治常规。戈尔巴乔夫的即兴讲话,“既无任何底稿,又未在事前与同事们磋商,这给政治局出了个很大的难题”。3月和4月中央全会未经公布的材料中本来按照惯例在高层按“内部方式”传达的许多东西,第一次直接“扩散”到了全体百姓。<sup>③</sup>这一举动在以往苏联领导人中是比较罕见的。因为它打破了官僚体制的内部信息流转规律,在创造一个相对独立于既有体制的传播渠道的同时,却在事实上损害了官僚体制的权威。戈尔巴乔夫说:“‘多一点光亮’,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列宁常常这样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政治活动经验愈来愈使我确认,列宁的这个口号

<sup>①</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64页。

<sup>②</sup> [俄]列宁:“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1905年),《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33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4~145页。

被忘得无影无踪绝非偶然。原来,它非常不合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口味,不合所有那些与权力有瓜葛的人的口味。相反,‘少一点光亮’这才是他们的原则和内心的愿望。某位高官显宦也曾喜欢过公开性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当时他需要揭发论敌或者诋毁其竞争对手的声誉。也就是说,是出于一心追求名利的目的,而绝非将其视为社会生活的管理机构正常运转中不容剥夺的要素。”<sup>①</sup>政治局恼怒了,但是人民欢喜了!对于听到戈尔巴乔夫讲话的人看来,党的新领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是一个有活力的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描述了人们的喜悦心情:在他的前任们——绝非年轻的前任们公开演讲时离开“稿子”就不行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的即兴演说能力,尽管有点蛊惑人心,甚至有时空洞且言之无物,但是由于看起来不同凡响,非常有吸引力。“这种新现象明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普通的苏联公民对有关刻不容缓的问题、对有关当时社会生活许多领域实行真正变革的必要性的冗长讲话特别喜欢。那种停滞、腐臭的空气确实让人窒息,国家当时极其需要强劲的新鲜空气,需要经济改革、合理的政治自由、社会领域改善的清新空气。”<sup>②</sup>

二是突破了领导人的接触常规。按照苏联的政治传统,总书记的活动范围、接触人群、交往礼仪等一系列政治活动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其用意在于:保持领导人的高度神秘感和威权感,同时又能使领导人避免可能的突发事件而造成的尴尬。在“老人政治”时期,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时期就出现过类似的有损国家形象的事件。勃列日涅夫在接见外宾的时候,由于中风导致记忆力急剧衰退,往往是照着讲话稿念着念着的时候就突然不知道念到哪里了,只好求助于身边的助手。这种国礼上的失仪让苏联丢了大国民脸面。契尔年科上台后,既是由于其年老体弱无法参加各种活动,更主要的是其几乎全部的机关生涯已经使他丧失了对新鲜生活的体验和接触的愿望。“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像常说的那样,是位典型的机关工作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2页。

<sup>②</sup>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页。

者,从头到脚乃至骨髓。他几十年工作在办公室里,远离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他与勃列日涅夫一起先是在摩尔多瓦,然后到中央,接着到苏联最高苏维埃,而后又重新回到中央。在这条机关工作道路上,契尔年科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就。要我说,他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机关工作者,有着这种职业对政治活动家来说所有的缺点,同时也有优点。或许应该这样讲,当契尔年科处于勃列日涅夫的影子里的时候,机关技巧是他的强项。但当他转变成独立的政治活动家时,脱离生活则大都帮了他的倒忙。”<sup>①</sup>戈尔巴乔夫则不同。他第一次走上街头与群众见面;他让政府车队停下,接着下车走向群众,回答他们的问题,并试图解释国内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结果给保卫人员带来许多麻烦。后来,过了两年,人们发现他不再回答问题了,而是训人,他“躲着问题”讲话。但是戈尔巴乔夫走到群众中来了!他的讲话令人惊奇,令人高兴。在报刊不久前掀起一场谴责“私有者本能”的运动之后,他说,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人们有没有从事某种副业的权利,有些理论家说,副业——这是资本主义。他面带苦涩地说:这算什么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人干自己事的正常愿望。“这一番话改变了人们以往对总书记的看法。站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正常的、用‘自己的话’实事求是评价形势的人。”<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在国内获得了高度评价。干部和工人们头一次见到一位不用别人搀扶、“有口才的”总书记,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着人们提出的种种问题,时常离开讲稿、凭着记忆并根据听众的兴趣、结合自己参观各地企业和社会设施后的感受滔滔不绝地讲着。“不过他的这种做法是不同寻常的,是向过去时代的一种回归,那时的天才革命者讲话根本不用稿子,却能用话激励人们去做许多事情。”<sup>③</sup>切尔尼亞耶夫也在 1985 年 5 月 22 日的日记中记载:“人们观看了昨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在列宁格勒的演说和会见的电视转播,简直是惊呆了。今天人们都在问:‘看了电视吗?’我们终于有一位这样的领袖:他熟悉事态,对工作专心致志,善于用自己的语言把自

①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35~36 页。

②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506 页。

③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129 页。

己的想法告诉人民,他不拒绝与人交往,不怕给人以一个不够伟大的形象,他确实想推动一下这部停滞已久的大车,给人们鼓鼓劲,解除他们身上的羁绊,使他们无拘无束,保持清醒的头脑,让他们去思考和创新,创造。”几天以后,关于戈尔巴乔夫访问列宁格勒的小册子出版了,购买者排起了长龙。这是斯大林逝世以后从未有过的现象。但是到了6月底,切尔尼雅耶夫再次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几乎天天都在发表演说。不错,这都是他自己的演说,不是别人替他起草的。“总之,这颗‘明星’一下子大放光彩。社会上所有健康的力量都被它吸引过去了。”<sup>①</sup>

1986年7月31日,戈尔巴乔夫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明确指出:改革要从自己做起。“过去年代,在没有足够批评、没有足够公开性和责任心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习惯于某些东西,习惯于那些根本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我说的这一点,既适用于普通工作人员,也适用于负责人员。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应当抖落掉‘积垢’。”<sup>②</sup>戈尔巴乔夫对干部提出要求:“应该改变工作作风。应该表现出尊重人民,尊重人民的意见,真正地接近人民,而不是装模作样。应该真正到人们中间去,倾听他们的呼声,同他们会面,把情况告诉他们。当解决某项任务时,越是困难,越应该更经常地同人民会面,同他们在一起。我们的人民是富有同情心的,人民是极好的,再没有这样好的人民了。最大的支持是我们人民的支持,最大的政治积极性是我们人民的积极性。现在这种积极性正在日益增长。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并千方百计地加以鼓励。”<sup>③</sup>

#### (四) 公开性能造就干部

戈尔巴乔夫认为,造成苏联社会出现“停滞状况”,“党的领导以及党和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48页。

<sup>②</sup> 塔斯社莫斯科1986年8月1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年8月6日。

<sup>③</sup> [苏]戈尔巴乔夫:“改革刻不容缓,它涉及所有人和所有方面”(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1987)》,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国家各级干部,对此都是有过错的”<sup>①</sup>。在发现了“公开性”的好处之后,他下定决心要把它深入持续地推行下去。因为他发现,“公开性”可以使他在遭到党内保守势力的批评时绕开他们,或者直接把批评他的人置于公开的政治环境以接受人民的评判和监督。戈尔巴乔夫指出,发扬“公开性”,“我们现在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反而只有好处。人民感觉到力量骤增,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更大胆、更积极了。而且,你们也知道,那些企图避开我们法律的人全都立即安静下来了。因为当舆论的力量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没有任何力量能比它强大。而舆论的力量只有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广泛的公开性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我们需要用公开性来保障代表大会任务的完成以及像弗·伊·列宁所希望的那样让人民真正参与管理国家的所有事务。”<sup>②</sup>“公开性”由此获得了深刻的政治意义。尽管戈尔巴乔夫预测到这一举动会遭到党内的反抗,但是他相信,人民始终会站在他的一边并毫不动摇地跟着他的改革走。

一方面,“公开性”对党和国家机关造成了极大的舆论压力。“它成了党政机关激烈攻击的对象,因为党政机关既不想要客观信息,也不想要社会监督。”<sup>③</sup>党政机关开始抱怨并采取反制措施。当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召开各州和地方报刊负责人会议的时候,这些负责人叫苦连天:领导上不断施加压力,动不动就撤销职务,想方设法进行迫害,指使人败坏那些将家丑外扬的记者的声誉。而从党政机关方面来看,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对克里姆林宫的抱怨纷至沓来。听到的都是一片诉苦之声:墙角快给挖空了,有人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戈尔巴乔夫对此很生气:“我们的这帮土皇帝,无论是企业、集体农庄、区或州的领导人全都一样,对来自上级的批评习以为常,总是逆来顺受。但是每个人,而且是他的下属,都能自由地品评他的所作所为——这种事从来不曾有过,就会被当作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亞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43~144页。

<sup>②</sup> [苏]戈尔巴乔夫:“改革刻不容缓,它涉及所有人和所有方面”(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1987)》,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sup>③</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83~184页。

脚底下发生了地震一般。”<sup>①</sup>为什么宣称是人民的“公仆”的党,竟然无法接受人民的批评呢?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因为斯大林之后对党加强控制——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后果。他说:在列宁时期,党内还有相当强的民主传统。那时候党的各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记录有会上的尖锐讨论和不顾情面的批评,这些记录可证明当时正在通过决议时是有真正的表决的。所有这一切后来都消失了。而封闭性、对所有具有不同观点的人的排斥、毫不宽容、保密、铁的纪律,这一切都在斯大林时期产生了,而且越来越得到加强,斯大林把党称为“圣剑骑士团”<sup>②</sup>,这暴露了他的真正思想。<sup>③</sup>但是“公开性”的闸门一旦开放了,人民就不会仅仅满足于舆论民主化,而是会提出自己的改革要求。

于是,“公开性”产生了另一个逻辑结果——政治民主化。戈尔巴乔夫指出,正如改革本身一样,“公开性”也是经过很大的困难才为自己打开道路的。各级官僚权势分子,一直把领导的、不受下面批评的、严格的保密性和封闭性,看作这种体制的神圣的东西,极力抵制公开性,在地方报刊上公开地和不声不响地压制最初的公开性浪花。甚至改革的最真诚的支持者也受到了多年来一切都保密的传统的影响。“我们高高在上的一些人,或是处在某些领导岗位上的人,听取劳动人民、普通党员和工程师、专家的建议和意见时没有表现出耐心,甚至没有把人家的话听完。这已是各行各业的普遍现象,甚至是各级党的机关的普遍现象。他们以为,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对这一切都厌烦了,他们疲倦了。他们以其全部表情表明,你别再说下去了。如果讲话者继续说下去,他们就会说:你走吧,干你自己的事情去吧。没有你,我们也会弄清这里的情况的。”<sup>④</sup>但是“正是公开性把人们从普遍的沉睡状态中唤醒过来了,帮助大家克服了漠不关心和对一切都消极的态度,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2页。

<sup>②</sup> “圣剑骑士团”是1202年为掠夺波罗的海东岸地区而建立的德意志天主教僧侣骑士团,因该团成员的斗篷上绘有红宝剑和十字而得名。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7~28页。

<sup>④</sup> [苏]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时的讲话”(1986年9月),《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1987)》,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感受到变革对自己的切身利益，自己与改革的切身关系。公开性有助于弄清和思考新的现实和新的政治方针的实质。简言之，没有公开性，也就没有改革。”<sup>①</sup>雅科夫列夫也认为：“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起初，不仅想把公开性用在出版自由上，而且把它看作是打开监督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活动的钥匙，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个人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实现这项任务，就能炸毁作为现行制度最重要支柱的官僚机关的保密系统。公开性把民主制思想远远向前推进了。在人们的意识中，开始清楚地认识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彻底改革。”<sup>②</sup>这种“彻底改革”的民主要求就是进行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通过选举使干部真正地成为改革的力量。

1986年秋，戈尔巴乔夫开始准备专门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研究党的干部政策的筹备会。筹备工作由戈尔巴乔夫亲自领导。筹备阶段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有两个：一是推行干部政策的原则；二是实施干部政策的方法。经过一年半的改革实践，党的领导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在党政机关中究竟有多少人忠于“改革”呢？又怎么衡量这些人的改革“忠诚”呢？戈尔巴乔夫决定采取新办法——选举、真正地让人民来选举。1986年12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筹备工作时在自己的圈子里说：“大家以为不会那么艰难，却原来是艰难的——在经济方面、在社会领域、在党的自身、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甚至——在党内。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头，厉害的还在后头……存在着对改革工作的结果的悲观主义。守旧思想、满不在乎、消极怠惰、不愿走新路压倒一切。这些陋习已蔓延到社会，但还未能引起社会的波动。有人认为，我们过分坚决、过分严格、过于急躁。而局势就是这样，我们不能慢慢腾腾的，生活迫使我们加快节奏感。这里就产生了干部问题。它具有关键的意义……如果不创造公开性、批评的气氛，我们就不可能造就真正的干部。‘上流社会的秘密’会带来损害……干部问题——这是进行领导的道德权力问题。而在我们党的机关里，累积了许多这样的问题，它们削弱了在其他领域调动干部的可能性。也不要害怕正视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情况……社会民

①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76~77页。

②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84页。

主化——这是最困难的过程……我们所有的人似乎都赞成‘民主化’，而当我们自己应该实行民主化时，才感到非常困难。因为这涉及每个人威信问题。每个人都怕：这场民主化是否会影响我的地位？”<sup>①</sup>

具体来说，戈尔巴乔夫打算实施两个选举新方法：一个新方法是推动中央全会必须确认共产党员能直接差额选举“一把手”——从基层组织的书记到州委书记和共和国的党组织书记。从理论上讲，苏共一直实行的就是这样的选举，但在实际操作上，从基层组织到任何一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都不是通过直接投票选举的，而是根据党组织的规模，在党总支、党委、党委常委或者政治局会议上“商定”的。另一个新方法是选举过程要处于社会监督之下。也就是说，允许公开批评成了检验党内职位候选人是否符合“改革”思想的办法。“毫不夸张地说，这两种新办法都是革命性的。苏共领导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试图放弃由上级任命干部的原则，即放弃影响国家生活各个方面最为重要的手段。苏共领导人希望依靠媒体的社会舆论、依靠普通共产党员的选票作为干部‘清洗’的手段，并通过差额选举实现‘清洗’，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完全没有先例的。”<sup>②</sup>

#### (五) 如实恢复历史面目

“公开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在舆论上使党政干部处于被批评和监督的位置，而且在政治上将党政干部的前途命运第一次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赢得选票，更深远的影响则发生在思想上——如何看待苏共和苏维埃的历史。

对党的历史的态度是苏共坚持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评判标准。戈尔巴乔夫回忆说，他之所以在契尔年科时期获得德·弗·乌斯季诺夫的政治支持，关键就在于两人在对待苏联历史的态度方面立场相近。1983年7月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对待苏联历史的态度问题。这次讨论非常重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37~138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49页。

要,因为它证明,当时的思想形势决定必须进行“改革”,实行“公开性”。对过去的历史作出评价的起因,是契尔年科讲的关于他与莫洛托夫会面的故事。政治局作出决议,恢复了莫洛托夫的党籍。从完整意义上讲,这些讨论表明,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惊人的一致。而在这方面也有领头人物跳了出来,乌斯季诺夫就是这样的领头人。很明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乌斯季诺夫和其他老态龙钟的政治局委员随声附和。从这种随声附和行为的背后,人们可以听到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话:“我是自己人,我的想法和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sup>①</sup>

当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他需要的共识却不是在尊重党的传统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戈尔巴乔夫要破旧立新,重塑改革共识。于是,在“公开性”的号召下,苏联掀起了“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历史大清查运动。戈尔巴乔夫采取这样的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戈尔巴乔夫思想发生转变。当戈尔巴乔夫着手进行改革并且遭到党内不断的批评时,他认为,“改革道路上最大困难是我们在以前的年代里形成的思维”<sup>②</sup>。他需要借助于“公开性”来重新分析评价苏共的过往历史,为改革提供强大的思想共识和动力。“我的出发点是:通过认识自己的历史来明辨是非的过程是必要的,人们应当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本来面目。”<sup>③</sup>戈尔巴乔夫认真阅读了私下出版物和在外国出版的读物,以及进步出版社出版的供内部阅读的“非公开”出版物,这对他在“事实材料”上进行准备、以同党内对苏联历史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简单化和不真实的看法决裂起了作用。在1987年11月7日所作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对布哈林个人及其作用的重新评价,打开了重新审视实际上以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基础的整个意识形态的闸门。掀起了彻底重新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82页。

<sup>②</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76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7页。

评价各种价值观的第一次浪潮,它“拆掉了所有的铆钉”<sup>①</sup>。1988年4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与州委书记第一次会见时,首次愤怒而又激烈地批评斯大林。他说:“当我们不知道曾经发生的事的时候,那是另一回事。但当我们已经知道并且知道得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就可能有两种观点了。斯大林是个没有任何道德的罪人。我给你们(!)说:100万党的积极分子被枪杀了,300万人被送往了集中营,饱受长期监禁之痛苦。一大批好人被驱逐出境了……这还不算集体化中遭毁灭的几百万人,如果按照尼娜·安德列耶娃的逻辑去做,她是要我们去搞新的1937年。你们愿意这样做吗?你们是中央委员吗?你们应该深刻考虑国家的命运。时刻记住:我们大家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拥护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我们不需要……”<sup>②</sup>

二是破除思想禁锢的认识需要。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的实践需要社会政治思想界来作一个急剧转变。因此,搞清以往那段不寻常的历史的真相,是1985年4月改革开始的重要条件之一。利加乔夫指出:“我们的历史空白点数不胜数。无疑,苏共二十大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使人们完成了思想上的震动和转变。”<sup>③</sup>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在没有把苏联历史划分出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没有分析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做法之前,“我无法揭开我们历史悲剧的疙瘩”<sup>④</sup>。戈尔巴乔夫关于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在切尔尼亚耶夫看来,报告中还有许多传统的东西,对历史的评价和分析还是以对待我国(苏联)历史的苏维埃式“逻辑”为基础的,而且说的远非全是实话。在宣读(1988年10月31日)这份报告前的一个星期里,在政治局讨论报告草案时戈尔巴乔夫说,“有些事情人们指望我们能多说些……而少说不行……”“但没有必要多说!”——不知是谁这样回答的。但十分重要的是,从总书记——按传统是党的绝对真理的最高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

<sup>②</sup> 同上,第242页。

<sup>③</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sup>④</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的、无可争议的代言人——的嘴中实质上说出了我国(苏联)历史也可以是公正分析的对象,许多好像不可动摇的“理论”原理可以加以怀疑并重新认识。戈尔巴乔夫本人后来在政治局作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总结时这样确定了业已实现的意图:“我们可以说,在社会的意识中出现了理解;必须逐步更新社会形式以适应人们的实际需求。这样就对几十年来培育起来的思维的教条化给予了沉重的打击。”<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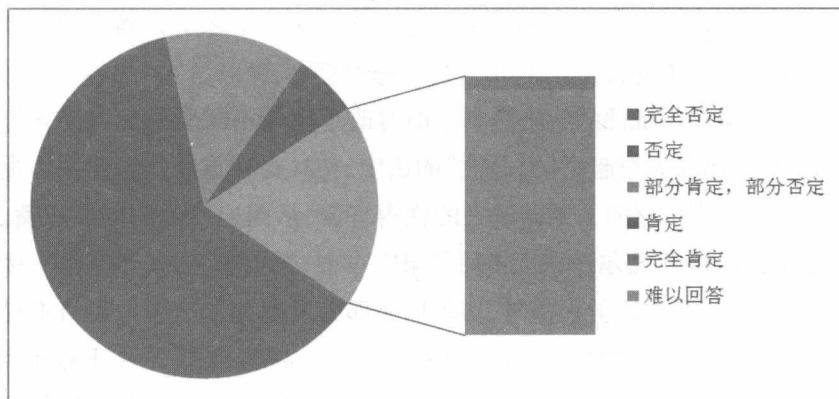
三是回避党内批评的策略需要。面对改革政策不断受到党内保守势力的责难,戈尔巴乔夫祭起了“公开性”的法宝,使社会在重新认识苏共历史的大潮中把矛盾直接指向了固守过去的党内官僚,从而迫使他们要么闭嘴,要么跟他走!1988年戈尔巴乔夫撰写了第二本书,初步取名为《改革——接受生活的考验》。阅读这份手稿时,切尔尼亞耶夫发现戈尔巴乔夫为何不得不越来越放松“公开性”的缰绳,甚至“快马加鞭”。1988年夏天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是个转折点。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党本身不是按机关办事方式而是自发地得到了公开讲话的可能性——每个人想什么、要做什么,无须看别人的眼色,无须顾忌上层的权威,无须考虑职位等级制度的规则。如果在从前,在代表会议召开前,不仅是政治局,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都认为“公开性”是一种使国家摆脱极权主义束缚的力量,即便不说是最有力的,那么也是一种独立的力量。这种独立的力量暂时减轻了戈尔巴乔夫在党内的压力。

四是实现变更制度的政治需要。随着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发展”,他越来越觉得现有的苏维埃制度是一种压抑人性的、专制的、无情的制度,必须加以更新。借助对历史的重新评价,戈尔巴乔夫突然发现:无论是党还是社会,对更新社会制度已经没有强烈的抵抗意志了。因为在重新评价中,党和社会所坚持的这种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下去的道义力量。利加乔夫承认:“对于这种着重于吸取历史教训的立场,是可以欢迎的。但是稍后有人唱起了反调,对过去的违法事件,用尖刻犀利、幸灾乐祸的笔调,大加鞭笞,对上一代所遭受的苦难则是庸俗地津津乐道,而绝不是意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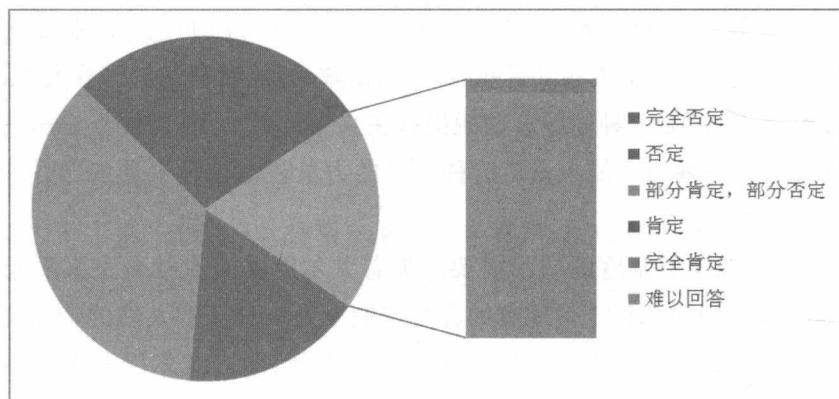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亞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03~204页。

为后世留下深刻的教益。读者于是得出了一个结论：一切都是社会制度的错，也就是说，应该替换它。”<sup>①</sup>

美国《时代》周刊关于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民意调查显示：<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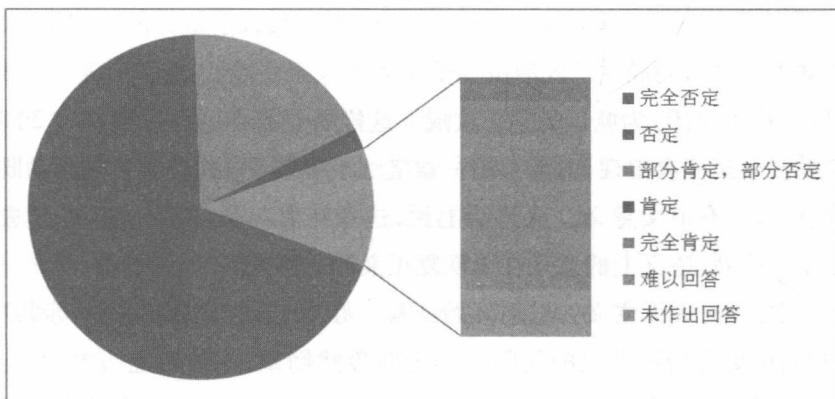
关于斯大林的评价



关于赫鲁晓夫的评价

<sup>①</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34页。

<sup>②</sup> [美]《时代》周刊，1989年第15期，转引自《参考消息》，1989年4月17日。



关于勃列日涅夫的评价

但是不加科学分析地对过往历史的肆意评判,使得“如实恢复历史面目”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党的历史被彻底抹黑颠覆。“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力图限制它的框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质。从社会民主化的观点来看,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出现了许多缺点。戈尔巴乔夫认为:“大众传媒上无原则的相互争吵向社会散播着仇恨、敌对和刻毒的情绪。例如,在对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国所走过道路上的评价问题上就是如此。或许,‘公开性’的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曾引起过如此强烈的反响和造成巨大的心理震动,这里说的是,恢复苏联时期真实可信的而非神话般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历史,这段历史中除去众多的人民英雄主义典范和社会设施方面无可争辩的成就之外,还有骇人听闻的官僚为非作歹,大清洗对自由思想的蛮横钳制。人们如饥似渴地争阅揭露当年所犯罪行的报刊书籍,出现了苏共二十大之后又一次令斯大林声名狼藉的浪潮,大张旗鼓地谴责勃列日涅夫,随后事情已发展到了对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原则也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社会上冒出了许多浅薄的耸人听闻的东西。重提旧事往往缺少认真的分析,未能揭示其全部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情况的矛盾性。撕去了紧紧掩盖着我国许多历史事件的谎言和蛊惑宣传的层层面纱,但偏见和怨恨往往导致企图以‘白色’神话代替‘红色’神话,否定那场革命的某

些正面内容……”<sup>①</sup>新闻界的强大压力、公众对不久以前事件的普遍关注,促使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这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以前称主席团)为此目的第三次成立这样的委员会。1987年9月28日,平反委员会第三次出现,由米·谢·索洛缅采夫领导。“委员会的活动既有政治意义,也有道义意义。从政治上说,这意味着与最坏的传统,即过去的镇压制度决裂,道义上的意义在于恢复正义和无辜获罪的人的权利。”<sup>②</sup>

其次,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开始泛滥。在“公开性”的浪潮中,苏共“红色”神话历史开始从人民的无限崇拜走向轰然倒塌,一种否定历史、否定过去、否定现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开始蔓延泛滥。“大多数大众传媒的报道常常是用一种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笔风。自然,他们不会用严谨的科学研究,对事实细致的检验及求证来给自己添麻烦。在历史课题方面,报刊渐渐形成这样的论调:想要揭示实质及真相,再有几十年也是不够的。”<sup>③</sup>苏维埃政权七十多年的历史被从头到尾说成是国家的一场悲剧,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克留奇科夫指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曾是神圣不可亵渎的东西,现在也遭到了攻击。“事实上,开始为那些叛徒平反,像班杰尔、弗拉索夫等人,说什么他们并不是背叛祖国,只是反对制度,反对斯大林等等之类。但是要知道他们是站在希特勒一边的呀!”<sup>④</sup>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的泛滥在文学界比较突出,主要以从前受到体制压迫的创作家们为代表。一大批曾经受到批判、禁止的文学作品被准许出版,使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学重获新生。在这一阶段,中长篇小说、文章和回忆录取代了专业的苏联社会史学研究,因为它们讲述了大多数读者前所未闻的事实。被斯大林镇压和因持不同政见遭受迫害的事实潮水般涌向社会,以至于很难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社会认可的理想人物。“公开性急速越过了允许的界限,使读者产生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7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54页。

<sup>③</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35~136页。

<sup>④</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47~248页。

了离经叛道的念头：难道需要社会主义吗？”<sup>①</sup>

最后，团结稳定的改革大局遭到破坏。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布向“公开性”、言论自由、全面民主化过渡的同时，并没有把对于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在许多方面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歪曲的党和国家的历史加以科学、客观、慎重地重新审视的主动权抓到手上，却把这一极为尖锐的、具有强大震撼力的评价工作交到了潜在敌人的手上。于是，“那些对联盟思想本身展开攻击的民族主义者，就靠着成见和偏执，实现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迫不及待地一头扑向权力的宝座”<sup>②</sup>。而改革的历史表明：“那些人后来果然成了公开的敌人，并以此为自己赢得了真理和正义斗士的美称，而且还因此赢得了如果不是带领社会大多数也是带领相当一部分人前进的可能。”<sup>③</sup>利加乔夫愤怒地谴责，假民主派——激进派在人民的历史意识领域中所进行的破坏活动的目的在于，使社会在思想上软弱无力。而这样做又是为了骗诱人们放弃真正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说，促使假民主派歪曲、污蔑我们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牺牲历史是为了使自己作为英雄登上政治舞台。新出现的“工程主任们”把同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作斗争的神圣权利匆忙窃为己有，并“承包”了破坏我们历史的全部工程。“我重申一次，他们关心的不是深思熟虑、严肃认真地分析我们矛盾的历史，而首先是自己的‘斯大林主义斗士’的政治形象。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恰好证明他们这一企图，即‘工程主任们’很少引证苏共二十大揭露个人崇拜的事实，而宁愿‘忘记’它。他们企图把同斯大林主义斗争的功劳据为己有，而且仅仅是归自己所有。他们沽名钓誉，企图在‘白纸上’书写这段历史，这绝不是没有政治目的的。”<sup>④</sup>

在社会思想大混乱的时候，党到哪里去了？它仍“处于惊慌之中，处于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53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sup>③</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sup>④</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35页。

失控状态”<sup>①</sup>。当戈尔巴乔夫陷入政治困境时,对于“民主派”针对领导了这个国家整整 70 年的苏共所大力展开的常常是诬蔑性的攻击,他们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sup>②</sup>

改革的实践证明:“党的思想家们不能控制过去。”<sup>③</sup>

## 二、民主化:要从下面发动起来

“公开性”使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成为可能,并且通过公开的选举打破了人民“公仆”高踞人民之上的政治局面。然而要使改革深入推进下去,还需要培养真正民主的、独立的社会力量。于是,在提倡“公开性”的同时,社会“民主化”的政治要求也就相伴而生。格拉乔夫指出:“新领导人实际上没有深思熟虑的时间了:全国上下都以期待的目光看着他,必须提出一个改革计划,即使这个计划并不存在。于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他的许多研究者和已经出现的改革史专家便详细地、不止一次地向人们解释,为什么在苏联体制下除非按照最高层的决定,否则任何改革都无法起步。柯西金的例子说明,甚至凭着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的职位也不够。不仅因为一切极权主义制度所特有的、追求一长制的权力金字塔那完美无缺的匀称结构,而且也因为缺乏‘来自下面’的、推动较为认真的改革的因素。”<sup>④</sup>对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放弃过。他说:“从 1985 年四月全会起,我们还从来没有变更过政治方向,始终都是沿着变革的道路向前推进的。当然,也并不一直都是同一个速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248 页。

<sup>②</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16 页。

<sup>③</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557 页。

<sup>④</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01 ~ 102 页。

度,是有张有弛的。但从未有过从民主化改革的既定目标上后退的事。”<sup>①</sup>戈尔巴乔夫强调:“我们应当通过社会民主化使人民参加改革进程。如果说对改革的实质,那么我可以把这一实质简单地归结如下:我们就应当在每个劳动集体、每个党组织、每个州、共和国、部门、每个中央主管机关,在全党创造一种前提,使我们的人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sup>②</sup>

### (一) 打破经济官僚垄断

从下面发动起来的民主化运动,主要是针对经济官僚对改革的无动于衷而发起的。

1985年4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制定了发展经济的“加速战略”。“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一个极端口号就是加快发展速度,而且只强调数量,而不管质量。他不提目标和明确的发展道路,只是简单地号召,这些号召又被粗制滥造般地完成。一切仍是老样子,只是干工作必须更快更多。”<sup>③</sup>所以经过一年的实施,无论“加速”的格言还是对每个人发出的“在工作中加把劲儿”的号召,均未改变当时的社会现实,更遑论改变生活的总结构了。

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呢?

改革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雷日科夫指出:“我国在着手改革时,它的领导并没有以应有的方式深入评估进行改革应采取哪些相互联系的必要步骤,以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后果。我想,说来也真是遗憾,那些指责20世纪80年代改革行动缺乏明确纲领的人是正确的。当然,他们没有考虑必须采取某种决定的具体政治环境,但这一点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指责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不过以我的观点来看,当时有一点倒是现实的,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决定改革从经济开始。其实,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也是要对国家经济做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sup>②</sup> [苏]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时的讲话”(1986年9月),《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1987)》,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sup>③</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30页。

一番改革。”<sup>①</sup>格拉乔夫也观察到,当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们着手改革时,新领导人并无一个完整的改革构想。注意力分散了,倡议一个接一个,多半使用的是从前的旧产品:当初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一起倒腾数百篇专家和科研院所的资料,起草了无论安德罗波夫还是契尔年科均未采纳的关于科技进步和可能进行的经济改革的材料。戈尔巴乔夫舍弃了突出某一个关键的加速方向的尝试,提出“全面出击”。在1985年6月轰轰烈烈地开过机械制造业的会议之后,注意力又转移到农工综合体上来,当时把这说成不折不扣的“整个国民经济的楷模”<sup>②</sup>。

改革遭到了人为的阻力。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甘别吉扬指出,反对改革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人有四类:第一类是官员,多是部一级和司局级工作人员。由于权力将下放到企业和协会,他们将被剥夺这些权力。这些人试图证明,没有他们,一切会变得更糟,管理部门将不会正常地发挥作用。第二类是一些能力差的管理人员,即一些厂长和集体农庄主席,他们习惯于根据行政措施办事。第三类是那些“拿钱多干活少”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由于劳动组织存在缺点,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虽低,却拿高工资。第四类是贪污国家财富者、受贿者和酗酒者等反社会分子。<sup>③</sup>

秘密的行政管理方式。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出,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还有不少工作人员不采取符合民主化和经济改革条件的新的管理形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重犯过去那种最大的错误——在办公室里为企业在新条件下工作作准备。正是在劳动者和劳动集体委员会置身于改革之外、一切问题都是秘密地由上面解决的地方,才出现了最严重的疏漏,才产生了许多未预料到的困难。而这就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自我感觉和他们对待改革的态度。”<sup>④</sup>

结果,经济又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而且是浮光掠影式的政治的牺牲品。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4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sup>③</sup> 美联社维也纳1987年7月8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7月29日。

<sup>④</sup>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9页。

正如一句古老的俗语所说，如果躲在森林中的大树后，谁都找不着。“而主要的目的——人民的福祉，销匿在了个人政治奢望的围栏下。”<sup>①</sup>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亲密战友雅科夫列夫在寻找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时发现：“原因并不在每个经济部门，而恰恰在政治方面”<sup>②</sup>，“根源在于体制本身，而不在于这种体制的一些工作机制”<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强烈感受到，现在在改革中存在着严重的“原始森林效应”。上面轰轰烈烈，下面寂静无声。感觉好像倒退了，什么变化都没有！他说，我收到过一封信，是一位哲学系毕业生、共青团书记给戈尔巴乔夫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想告诉您，人民在您一边，大家都希望变革，但是地方领导人不让您知道实情。他们在极力抵制。”戈尔巴乔夫从家乡斯塔夫罗波尔也收到一封信：“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苏共二十七大精神的鼓舞下，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找到自己的党领导谈心。您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别激动，这类运动我们见得多了。这次运动也会过去的。我们从来也未做什么，现在仍然如此。”<sup>④</sup>

戈尔巴乔夫开始强烈批评党和国家的“经济官僚”。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向中央机关干部，主要是计划委员会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这次全会后他在接见部级干部时仍继续进行攻击。国家计委遭到最强烈的攻击绝非偶然，因为这一中央机构是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中枢。戈尔巴乔夫总爱说：“在国家计委眼里没有领导，没有总书记、没有中央，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全会上，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散布说，部长会议主席和部长们不希望推行“改革”，因为改革损害他们的特权。因此，从1986年6月，大约在他上台一年后，他改变了政治斗争的性质和方向，从针对社会经济方面转向了针对个人。他触及官僚主义的敏感神经，给改革的机器中注入了更多的燃料。反对特权，这成了总书记手中最肮脏、最不光彩的武器。最有

①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②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③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83页。

④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特权的人利用这个武器来反对其他有特权的人。这样，目标发生了变化，从经济和社会领域转到了干部身上。

残酷的干部斗争一直持续了整整一年。接下来的 1986 年 8 月政治局会议对经贸干部进行了从未有过的打击。戈尔巴乔夫提出全面改组整个党的体制的任务，“从基层党组织直到中央政治局”<sup>①</sup>。1987 年夏天，戈尔巴乔夫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7 月份又专门为批准方案召开过中央全会。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在为社会民主化扫清道路的“政治”一月全会上，经济民主化就该进行了。于是，由于管理者的消极怠工，由于拒绝“民主地”投票造成提价的社会不够“觉悟”，经济改革受阻，戈尔巴乔夫便只剩下唯一的推进改革的办法：“加大政治攻势。”<sup>②</sup>

## (二) 要给社会输送氧气

这种政治攻势，其实就是要通过民主化提高社会的政治能动性。简单地说，就要给社会输送氧。戈尔巴乔夫指出，社会改造与实现中央四月全会所采取的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密不可分。并不是说要来一次革命，而是说要改善这个制度。当时我们相信有这种可能。人们是如此思念自由，所以就想：只要给社会输送氧，它就会振作起来的。戈尔巴乔夫打算名副其实地而不是装模作样地将土地交还给农民、将工厂交还给工人，给企业经营以活动余地，改变投资和结构政策，优先发展社会领域各部门。在所有这些组织的工作中，特别是在基层，一定的民主成分是存在的。但是整体说来，它所建立的全部巨大机器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巩固和加强党国的权力。而被称作人民政权的工具的权力机关却没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它们属于党的领导的功能。谁也没有对涉及政治和政权的决定选择不同于“上面下发的指示”的可能性。“思维和决定的多元主义都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背离。”<sup>③</sup>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140 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44 ~ 145 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40 页。

在 1986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苏共中央收到的来信问题时,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委员们通报说:“有不少写给我本人的措辞激烈的信”。比如,一封来自列宁格勒的信说:“我,不仅我,不喜欢您推行的国内政策。说得太多!您每到一个城市,讲的话好,也正确。听着很开心,但是现实中什么也没有!我们的生活改善了吗?我们的工作有进步吗?……与非劳动所得斗争的指示也是这种情况。一开始抓得好。可是现在呢?和谁斗争?和用自己的劳动生产蔬菜和水果的人斗争。为什么?对那些挨斗的人却不动手……”来自莫斯科的信则说:“您的乌托邦式的拯救俄罗斯的计划使我们对党的政策完全绝望。请清醒地看一看,国家走到了什么地步。贪赃受贿、投机倒把盛行。这会使我们的祖国全面落后和崇拜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您说‘加速’‘加强’,可这不过是些空洞的毫无根据的话。一个伟大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像被拔都毁灭的罗斯……”<sup>①</sup>戈尔巴乔夫强调了觉醒的人们对改革的期望,而党却瞻前顾后。于是,在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进一步认清了社会和国家民主化即发展人民自治制度的必要性。

这种思想转变的目的在于:

一是要改变人民的冷漠和依赖。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政治方面则离开十月革命最早的理想越来越远了。苏维埃时期是系统地在事实上否定和压制民主的时期”<sup>②</sup>。他说:“我们称之为苏维埃生活方式的东西,对于几代人而言曾经是一种现实,不可能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消失的倒是 3 亿人民,至少是全体已到懂事年龄的人。除掉某些不应该忘记的公认的正面因素而外,这种生活方式最大的特征就是将个人贬低为程序化了的巨流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个体。基层群众实际上根本没有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的选择余地,一切都已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子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都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这种情况到头来就转化为社会性的依赖心理和社会性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545 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39 ~ 40 页。

的冷漠态度。”<sup>①</sup>改革不仅要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要“着手改变社会的道德心理状况”<sup>②</sup>。而要改变这种局面,光靠陈腐落后的宣传机构是行不通的。1985年夏天,戈尔巴乔夫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然而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刻板陈旧的宣传仍然毫无变化。因为党整个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机关工作人员、报刊、党校、社会科学学院等)仍然在按照习以为常的制度运转。要想改变局面,除非在事事秘而不宣的体系上一个接着一个地打通“窗口”,“这个只有总书记能够做到”。<sup>③</sup>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抛弃党的宣传系统,准备另起炉灶。他发动了“公开性”和“民主化”。

二是要教育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戈尔巴乔夫认为,极权主义制度是用民主的装饰品来掩饰自己的——存在着宪法、各种法律和代表机构。“实际上社会的一切活动,从头到尾都是由党的机构及其作出的决议,由党的上层领导所做的决定和指示,加以规定和操纵的。甚至是联盟共和国的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都处于无权状态,而宪法规定共和国是具有全权的主权国家。看来,在其他国家中,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看到这样的集权和超集中的状况。最主要的是,苏联公民实际上失去了真正影响政权和监督政权的可能性。”<sup>④</sup>当改革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开始把改革的计划直接指向了制度本身。据马特洛克回忆:戈尔巴乔夫掌权头两年的经验使他确信,他从上面所发动的变革,只有得到来自下面的压力才有保证。他现在认识到,制度本身抗拒变革,仅靠来自上面的命令是不够的。“在我国的整个历史中,”他说,“变革来自上面。它总是靠武力来推行。现在,我不能使用武力,否则我将击败目标本身。你不能把民主强加给人民,而只能给他们行使民主的可能性。我们所做的尝试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把俄罗斯的历史颠倒过来。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在我们的整个历史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

<sup>②</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sup>④</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6~27页。

中，他们从未被允许这样做。”<sup>①</sup>

三是要加强对改革进程的掌控。戈尔巴乔夫没有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就并面临着失去权力的危险，为了清除那些不赞同他的路线的经济工作者、党的领导者，他急急忙忙地开始筹划在生产领域实行“民主化”。1985年5月17日，戈尔巴乔夫对列宁格勒的党员积极分子发表演讲，呼吁听众改变自己的观念：“最困难的阶段——心理上的改革……当前需要思想大变革……谁无意改革自己的观念……就应当让路，别挡道……”<sup>②</sup>最初，戈尔巴乔夫建议选举产生厂长和企业领导者，这样可以除去一部分固执己见的经济工作者。随后戈尔巴乔夫又建议打击“司令部”，惩治党和政府中不服从他的经济领导者，撤换各级管理机关的官员，“但是换人的做法仍然无效”<sup>③</sup>。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先后视察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纳霍德卡和阿穆尔河畔共青城。他在那里看到的情况是，“改革”尚未到达远东。戈尔巴乔夫断言：“当官做老爷的人本能地或者有意识地轻视改革。”正是在那里，戈尔巴乔夫开始公开指责国家管理系统的“中间环节”有缺陷，消极怠工。戈尔巴乔夫从远东回来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抱怨说，报刊闭口不谈缺点，有些人念念不忘安德罗波夫时期，党的干部应当调整。他还说，一些准备参与改革的人心存疑虑，他们总是说：“会不会走向深渊。”许多地方组织的作风没有改变，因循守旧。<sup>④</sup>

给社会输送氧气，表明了戈尔巴乔夫对于可以作为改革的实际基础的东西十分向往，因为他那自上而下的革命尚无像样的政治基础，更遑论社会基础了。社会基础有待建立和构建，其材料有赖于模糊不清的公众期待、“六十年代人”的浪漫主义理想、尚未出现的中产阶级，以及未来后共产主义的资产阶级那刚刚破壳而出的带挑衅性的赤裸裸的自私利益。而社会的其他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2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06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99页。

<sup>④</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44页。

成员就其大多数而言,看不见、意识不到这一“即将发生的灾祸”,因为由于自己领导人的努力,他们被迫生活在虚伪的、宣传者的世界里。这样一来,他们不仅不“自下而上”地去促进改革,却反而动摇犹豫,感到困苦,甚至与改革者作对。戈尔巴乔夫正是想借助“民主性”和“公开性”克服这一“材料的阻力”,发动“基层”,将社会从他的计划的客体变成积极的主体和参与者。他的短期政治利益一目了然:他需要社会作为反对官僚的同盟军。于是,戈尔巴乔夫在去西伯利亚视察时发出号召:各地方应当“自下而上”对改革的敌人施加压力,而我们(指政权的“先进”部分)则要“自上而下”施加压力。这个号召一出台,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运动自然就更加积极地开展起来。普通党员和非党人士于是开始向“上层”——苏共的州委领导和市委领导施压。戈尔巴乔夫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却兴高采烈:那里的一个群众大会把党的州委书记赶下了台。“总书记公开在电视上对此事加以赞许。”<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给社会输氧的目的随着改革的深入也慢慢达到了——社会开始生动起来了。1987年12月2日,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在苏联15个地区进行的全苏舆论调查结果表明,苏联人对国家各种问题的兴趣不断增长。对1万人的问卷调查表明,约85%的人对国内事务始终感兴趣,而1983年在万名征询者中,这一人数仅占60%。在被征询意见的人中,84.2%的人希望完善自己在政治问题上的知识,91.8%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苏联历史。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被征询意见者对社会生活中落实党的一些最重要的要求的程度给予高度评价。66.3%的人确信,公开性已普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仅有8.1%的人持相反意见。<sup>②</sup>然而“他的动机和政治意图(唤醒‘群众的创造性’,催生‘自由的俄罗斯人’,争取‘出现社会主义民主’,抛弃‘一切长上青苔的东西’)全都无懈可击,颇值得称赞。然而他是否盘算过,这一实际上是革命的意图将把他和国家引向何方?”<sup>③</sup>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

<sup>②</sup> 塔斯社莫斯科1987年12月2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12月4日。

<sup>③</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

### (三)选举就应该是选举

苏维埃有没有选举？有！但是有没有真正的民主的选举呢？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非常肯定地给予了确认：没有！

党和国家各级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一直是苏共中央的核心权力。干部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政治传统是：忠于党的领袖。按照传统政治惯例，每一位总书记的上台总是要进行相关的干部人事调整。对于高层领导人来说，通常的做法是：如果党内领导干部的行为不符合“上层”意旨的话，那么就让其退休。比如，赫鲁晓夫在1964年的下台就是如此。虽然是出于被迫，但也是以“健康”的体面原因宣布退休。对于其他各级干部来说，其晋升提拔的升迁之路主要取决于党的各级组织的推荐认定，虽然要经过苏维埃选举的程序，但毕竟只是一个程序而已。这种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系统保证了苏共中央具有强大的政治能力。但是改革开始了，无论是出于民主的政治理念还是基于现实斗争的选择，戈尔巴乔夫决定要对选举进行改革，真正赋予选举在改革形势下的新形式、新内涵。“斯大林时期确立的选举制度开始发生根本变化，转向实行差额选举制。以前几十年人民代表的选举完全是走形式，这使选民对选举态度消极。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没有州党委的许可谁也进不了候选人名单。除此之外，苏维埃的代表机构严格遵守这一秩序，代表大会严格由各阶层、社会团体、各民族、妇女和青年的代表参加。毫无选择的选举是过时的、不民主的，应该改变。高层领导人中就这个原则性问题没有分歧。”<sup>①</sup>

1987年1月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指出：“就拿我们的选举来说吧。投票箱的安置或者领取选票的地方的安排，应该可以做到不会产生任何秘密投票的问题。国外的人士总是指责我们，说我们这儿是没有选举的选举。而问题不仅在于选举的行为本身，应该仔细了解整个过程。主要的是——选举就应该是选举，而现在是没有选举。大家投了选票——就回家了，至于对那里将出现什么结果都无所谓。滋长了漠不关

<sup>①</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87～88页。

心的态度。”<sup>①</sup>

1987年1月27日至28日,苏共中央召开了“关于改革和干部政策”的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重申了“社会中危机现象增长的危险性”,并力图指出这些危机现象产生的原因。为此,戈尔巴乔夫追叙了历史,对被他称之为“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立场”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总书记在阐述改革性质时,认为它首先是完善社会主义的新阶段,而完善社会主义应当依靠群众,依靠发扬民主,依靠加强经济,依靠坚决地转向科学。在新形势下,“选举制度不能不受到改革的触动”。戈尔巴乔夫宣布了更新干部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党内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问题,获得了大会的一致赞同。同时,全会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召开战后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的原则性决定。这次全会后来被评价为“改革时代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sup>②</sup>。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评论认为:“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他正努力对苏联制度实施自斯大林时代以来最根本的变化。他敢于提出让人民通过秘密投票选举从地方到共和国一级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根本性建议本身就表明了他在莫斯科的地位。除非他首先成功地控制了执政的政治局中的大多数成员,否则他不敢提出打破党的老特权阶层对职位和特权的控制的建议。他的建议在西方人听来几乎是根本性的。让人民通过秘密投票选举领导人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是最根本的。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变革不会结束一党统治或实行西方式的民主。但是这将是苏联的大胆变革,因为那里的领导权是自我延续的。如果苏联要摆脱经济上和政治上停滞不前的状态,就必须打破这种控制。”<sup>③</sup>格拉乔夫也敏锐地观察到了改革已经具有不同的内容:“改革所启用的其他政治概念也渐渐褪去了‘社会主义’的包装,其中包括最具爆炸危险的概念:多元论。”<sup>④</sup>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51页。

<sup>③</sup>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7年1月30日报道,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2月1日。

<sup>④</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43页。

1987年夏,全国举行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决定进行试验——准许一些选区按照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年)的规定进行投票,即准许差额选举。1987年6月29日苏共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呈送政治局的一份报告中对试验进行了初步总结:选民对州、边疆区代表投反对票的人数是以往选举的9倍,当局第一次遇到大批选民不到选举站,其中包括“无故”不到选举站投票的情况。而且9个选区第一次没有搞成选举。“这还不是政治风暴,不过已能听到远处的头几声雷鸣。”除了这些情况外,再看一看地方选举委员会记下的选票上的手写文字。按照苏联的政治传统,有的选民把选票当成“上访信”,把认为必须向当局说的话写在选票上。这些选票被宣布为废票,但是手写的文字被复制下来,送交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到党的权力部门的“主管机关”。之后,“通常把最典型的手写文字汇总,上报党的最高领导层”<sup>①</sup>。

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决定:更新选举制度,实行“自由选举”。1989年初,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运动正式开始。博尔金指出,社会民主化思想像杨树的白絮一样满天飞,许多人感到呼吸比较畅快了。那些不受器重的初级研究员们和得不到当局提升的实验室主任都走出令人生厌的研究所,不再昏昏欲睡,他们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使许多坚定的唯物论者很快变成了笃信“资本主义天堂”的信徒。苏共容许所有愿意的人参加人民代表的差额选举。苏共中央、各级地方党委就是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条件下,在给代表机关以更大的独立性和更多的行动自由的口号下准备选举行动的。“每一个席位可提几名候选人,这种方式使得所有愿意的人都可参加选举。”<sup>②</sup>

选举活动在中央是由拉祖莫夫斯基主管的部门领导的。那么,党是怎样“领导”的呢?如果说以前党监管了整个选举过程,那么在转向差额选举之后,党基本上被完全排除在政治斗争之外。这是令人吃惊的!在所有发达国家,恰恰是在选举时期,在竞选斗争尖锐化、白热化的时候,政党机构才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58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18页。

表现得特别活跃。而这里却恰恰相反！苏共中央发出一个又一个命令：不要干涉！不要干涉！保持距离！苏共中央的指示让许多党委感到惊慌失措，党的地方机关束手无策。这正好发生在竞选时期，正是权力斗争之时！

利加乔夫感叹：苏维埃是我们制度的政治基础，在应该坚决巩固其作用、赋予它管理职能时，党却明显地放缓了节奏。选举活动开足马力向前奔跑，“上面”毫无根据地以为一切都会顺理成章。同时，有些人认为党不干涉选举便是民主的表现，同以往的形式主义斗争的正确思想占了上风。但是“将洗澡水连同孩子都泼掉了，事情做得过了头，党实际上已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了”<sup>①</sup>。

#### (四) 要给新闻界以自由

作为改革的对象——斯大林模式不仅代表了对政治经济体制的强大控制，而且也是对苏联社会无孔不入的思想控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大众传媒领导体制。

这种制度从斯大林时代承袭而来。苏共中央总揽着对这个领域的控制权，“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人办的，反正中央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须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sup>②</sup> 特别是报刊检察机关，它在“捍卫”这个体制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式讲来，这个机关被客客气气地称为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它应监视是否有人泄露国家机密。事实上这是特殊类型

<sup>①</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2～153页。

的意识形态“克格勃”，编辑和出版者们面对它真是战战兢兢。在该局的职能中还有一项就是监督各种期刊，特别是监督图书馆和档案馆。必须按照它的旨意确定禁书的目录，听它指示什么应该在专门保存处保藏，什么属于“秘密”“绝密”“仅供公务使用”。<sup>①</sup>

在这样的新闻管制下，批评是有禁区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他认为还是给自己在“高层”的战友们留点情面为好，因为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们。什么时候容许过对库纳耶夫、谢尔比茨基、拉希多夫、阿利耶夫或者莫斯科“格里申帮”提出批评意见？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戈尔巴乔夫指出，问题不仅止于此。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在区里可以批评所有的人，甚至区执委会主席。但是第一书记嘛，只要上面还没有撤掉他，你可千万别碰。这曾是一条铁定的规矩。因此，当级别越来越高的一个个党员领导如今相继脱出了“批评禁区”的时候，反应就近似病态了。有多少电话打到了编辑部、党中央，指控电视和报纸竟然“胆敢”将久居高位的土皇帝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sup>②</sup>

然而社会的发展，战后新一代人的成长，依靠纯粹的行政管控的方法已经很难适应社会的变化要求。于是，从安德罗波夫开始，苏共逐步放宽了对新闻界的管控。

作为曾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与持不同政见者作斗争的过程中，安德罗波夫相当明白地理解新闻作为一种管理方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正是新任总书记做出了扩大新闻接触人员范围的重要决定。当然，这种接触是受苏共中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督与控制的。不过，这种接触改变了国家的新闻局面。从1982年12月11日起，苏联开始每周定期公布“苏共中央政治局通报”。每周四是政治局举行会议的日子，而在周五早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就会播报有关政治局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的消息。无论如何不能小看这一步骤的重要意义：正是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才出现了关于国家最高政治领导机关工作情况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内容从斯大林时代开始，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

<sup>②</sup> 同上，第148页。

就被列入国家最高机密之列。安德罗波夫还批准公布有关经济犯罪案件的负责性质的材料。1983年11月23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在苏联媒体上报道有关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对莫斯科执委会商业总局“美食家”商店工作人员的巨额受贿者进行刑事调查的结果》的专门决议。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项决议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公布了这个文件的原因。重要的是另一个方面: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新闻领域的“潘多拉盒子”被稍稍打开了一点儿。“新闻具有自身的逻辑和自身的规律。在存在着对新闻进行控制的明确愿望和巨大可能性的情况下,报道那些在过去完全保密的有关当局活动情况的消息,这创造了先例,也为扩大这类报道的规模提供了动力。”<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后,为了获取改革舆论支持,他又积极推动了新闻界“公开性”。1986年2月25日,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戈尔巴乔夫宣布“公开性”与新闻界结盟的新方针。他在代表大会上宣称,“对于我们来说”,“扩大公开性的问题是原则问题……没有公开性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民主以及群众的政治创造力和他们对管理的参与……有时谈到公开性时,会听到有人打招呼:慎言我们在现实工作中在所难免的缺点、失误和困难。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列宁主义的答案: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需要真理……因此,我们必须把公开性变成一种不间断起作用的制度”。<sup>②</sup>

这种“不间断起作用的制度”就是要给新闻界松绑——增强透明度。戈尔巴乔夫个人非常喜欢同媒体打交道,这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风格,并在改革的前几年为戈尔巴乔夫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在鼓励报刊、电视和广播对苏联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表批评意见时,按其发展逻辑,扩大“公开性”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下一个阶段。戈尔巴乔夫惊奇地发现:……已经被无所不至的压制和禁锢折磨得奄奄一息,只消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66页。

<sup>②</sup> 同上,第528页。

给记者们稍稍输点“氧气”，“他们便立即充满了批判哲学的激情”<sup>①</sup>。

1989年5月13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新闻工作的迫切问题。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梅德韦杰夫说，已进行过的选举不仅活跃了生活，而且使生活极端政治化了，它为现实生活又注入了崭新的政治实践。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工作成了支持党和改革的全民投票。梅德韦杰夫又说：“形成社会舆论是改革的一种最有力的手段，是整个社会管理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sup>②</sup>1989年10月6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的3个委员会组成的一个工作组拟制了苏联新闻法草案。该草案规定允许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及其他团体和个人有权创办舆论机构，取消新闻检查。然而失去了管控的新闻媒体，在怀着各种利益需求的人和组织的推动下，越来越表现出了它的反体制的危害性。马特洛克指出：“这种新出现的新闻透明度使得公开性突破了原先的限制，开始向少数民族成员和其他利益集团提供令他们对现行体制极度不满的信息。教科书中被删除的整个历史片断逐渐公布于众；以前没有公开的斯大林的具体罪行大白于天下；人们开始讨论政府推行的工业发展计划和农业措施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连1939年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成了争论的话题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这样，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苏联各民族开始恢复他们各自历史的本来面目。”<sup>③</sup>

1989年10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新闻评论文章《戈尔巴乔夫和任性的报界》。文章对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的得与失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

由于苏联报纸每天充斥着从飞碟之谜到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亵渎性的批评之类的耸人听闻的新闻，因而西方人，甚至还有许多苏联读者都渐渐地把公开性误认为是新闻自由。在过去一周中，戈尔巴乔夫主席已帮助澄清了真相。他清洗了一位总编辑，对另一位总编辑进行威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6页。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54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80页。

胁，并斥责苏联新闻记者普遍缺乏团体精神，以此来提醒全世界，他认为公开性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个工具，而且目前它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发挥作用。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近5年时间里，公开性曾为一系列目的效过力。它帮助赢得苏联知识界对戈尔巴乔夫的事业的支持，更不要说赢得西方赞赏并接受这个词。它还一直是打击戈尔巴乔夫的敌手的一件武器，并在使他的几届前任名声扫地方面起了作用。它向公众揭露了国家面临的大量问题，从而为实行重大改革提供了依据。它还促使各行各业的人去寻求解决办法。然而令戈尔巴乔夫失望的是，它并没有使人们产生一种保持国家的团结和安定，并渡过危机的共同目标感。在放松新闻检查之后，总编们的眼睛盯着发行量。他们懂得，好消息和振奋人心的呼吁一般地说并不能赢得读者，于是便想方设法搜罗抱有最大胆的、引起争议的看法的评论家、神秘主义，甚至列宁实际是恐怖分子的说法都出现了。

戈尔巴乔夫和他周围的人抱怨报界使公众分裂成一些派别，总是发表一些坏消息来瓦解民心……内务部长巴卡京说：“新闻界现在是一团糟。”他抱怨新闻界制造了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精神恐慌症”。<sup>①</sup>

## (五)保障游行结社权利

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下，苏联社会迅速分化重组，各种政治诉求层出不穷。

据雷日科夫观察：国内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他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主张爱国主义，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民主派、保守自由派，等等。许多团体的形成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环境保护，有的从事古迹保护等。杂牌军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

<sup>①</sup> [美]《纽约时报》1989年10月23日文章“戈尔巴乔夫和任性的报界”，转引自《参考消息》1989年10月28日。

同之处在于它们同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但没过多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了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sup>①</sup>

1988年7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关于在苏联组织和举行集会和街头游行示威的规定》。规定指出,举行集会和游行要向相应的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递交申请书,参加者不得携带武器和损害健康的器物以及造成物质损失的工具。另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文件规定:凡参加未经批准的示威活动或集会者将罚款300卢布以下,一年内重犯,则罚款1千卢布以下,劳动教养2个月以下或拘留15天;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再次被捕后,将被监禁或劳改1年以下,或罚款2千卢布以下。<sup>②</sup>于是,支持变革的人把公开示威游行当成反对现政权的一种有效武器。据统计,在1988年,苏联170个城市和居民点共发生2600次大规模行动,参加人数达1600万。1989年全苏共发生5300次群众性集会,有1260万人参加。1990年初到2月25日的近两个月内,全苏共举行1500余次集会,有700万人参加。作为首都,莫斯科爆发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比其他城市都多。1988年1—6月就有246次,而1990年1—10月更有约800次。这些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口号也越来越反动。例如,1989年11月7日,有5000人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1990年2月4日,有2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要求苏共中央政治局辞职和实行多党制;2月25日,有20万人举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示威游行;5月1日,有3万人举行反政府示威,高呼“打倒列宁”“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7月15日,有5万人举行反对苏共的示威游行;9月6日,有数万人举行游行集会,支持“民主派”代表人物叶利钦的市场经济纲领;1991年3月10日,有30万人集会,表示支持叶利钦,等等。<sup>③</sup>

面对社会上的乱象,苏共党内强硬派开始主张采取管制措施。“1990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9~10页。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03页。

<sup>③</sup> 王正泉:《戈尔巴乔夫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年,当旧制度遭到无情攻击的时候,苏共、克格勃和军队中的强硬派开始怀念过去只允许官方组织游行的日子。”<sup>①</sup>但是苏联内务部部长瓦季姆·巴卡京一直拒绝禁止和平示威游行的提议。不过,示威游行之所以能够受到保护而不至于发生军队介入从而造成流血事件,还是由戈尔巴乔夫最后决定的。戈尔巴乔夫认为:“利用武装力量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政治家,不仅不该受到支持,而且应当受到诅咒。军队应当用于它的直接使命。指望动用坦克的政治是达不到目的的。此路不通……”<sup>②</sup>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放任甚至是纵容,使得苏联公民正常的集会游行权利被迅速政治扩大化,示威游行反对现政权的性质更是愈演愈烈。对于这一点,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早在波罗的海“人民阵线”的活动时就已经洞若观火。

1989 年 8 月,正值纳粹德国—苏联秘密协定签署 60 周年纪念之际,人民阵线得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合作,于 8 月 29 日发起并组织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游行即“波罗的海之路”。两百多万人响应了号召,手拉手形成人链,不间断地绵延于首都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之间。生活在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差不多有 500 万,因此参加者令人震惊地达到了全部波罗的海民族人口的 40%。事态的发展令戈尔巴乔夫和莫斯科震惊。莫斯科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警告,认为运动的组织者是要强迫人们接受仇视苏联制度、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的和苏联军队的想法。声称如果不悬崖勒马,将予以严惩。“这种陈词老调不符合事实,也有悖于逻辑,因为要求独立的游行者正是在行使宪法保障的正当权利。在法制社会——这也是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行使权力算不得犯罪……正是中央委员会的威吓和动摇,即使抛开声音中赤裸裸的威胁,其表现出的惊惶失措也是可笑的。苏联共产党这个庞然大物在伴着歌声、鲜花、手拉手的游行队伍面前发抖了。”<sup>③</sup>

1989 年 11 月 7 日,在庆祝十月革命 72 周年节日游行时,苏联一些地区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579 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356 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277~278 页。

发生骚乱,由“选民联合会”“民主同盟”“莫斯科人民阵线”等非正式组织发起,有大约五千名示威者在莫斯科市举行和平示威,他们打出“改革了五年——成果在哪里?”的标语,也有人打出“十月政变是俄国的悲剧”的标语,并指责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是“毫无成就的 72 年”。反对派组织“三月之路”经当局同意,在距离红场 3 千米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集会,通往体育场的道路由警察设双岗加以封锁。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首都基什尼奥市有数千人聚集在民族英雄纪念碑附近,在警察驱散聚集的人群时发生冲突,原定举行的阅兵式被迫取消。拉脱维亚共和国首都里加有人在市中心烧毁了一面苏联国旗。

面对层出不穷的示威游行,戈尔巴乔夫是什么态度呢? 11 月 7 日,戈尔巴乔夫向苏联中央电视台记者发表谈话。他说:

我看到了赞成改革的口号。人们赞成在改革的道路上更坚决地前进。我们已经走出了旧的形式,但是还没有进入新的形式。结果有些损失和削弱,这没有什么,调整一下就行了。是不是要回到过去呢? 这会是错误,极大的错误。就是说,必须前进。更快地采取新的形式,掌握新的形式。

作为一种制度,一种体制,社会主义还没有彻底展现出来。劳动人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向新生活,走向普通人民感到自我良好和自信的生活,感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国家命运的主人。改革就是要民主,要公开性,要经济生活民主化,要把权力交给苏维埃。要使人们掌握精神文明,改革使人们高尚起来。这是最主要的。

在改革的这一困难时刻,由食品和市场状况而引起的问题就像一把利剑悬在我们头上,这样说虽然严酷了些,但我还是要这样说。主要的是,我们在革新的道路上前进了。在这里,在游行队伍中,我看到了这样的口号:“我们赞成列宁式的社会主义”,我赞成这一口号。我认为,革新了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实现列宁的以劳动者为中心的观念。

我感到高兴的是,人们在这次游行中喊着符合当前形势的口

号——希望克服过去的行政命令制度,同它决裂,打倒官僚主义……<sup>①</sup>

### 三、知识分子:体制内的异见者

“改革”的全部热情——致力于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发展,实现“真正的”“没有被‘个人迷信’和‘停滞’变形了的”社会主义。这势必引出一个问题:这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

1987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对社会学家的尖锐批评成为探索“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刺激因素。戈尔巴乔夫认为,这种探索仅仅依靠高级党校和社会科学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依靠苏联科学院的那些因循守旧的意识形态研究所是难以完成的。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中说:“改革给我们的政治实践和社会思维提出了新的任务。这就是结束社会科学的僵化状态,使之具有更广阔的天地,彻底消除作为个人崇拜时期特点之一的垄断理论的后果。”<sup>②</sup>戈尔巴乔夫向社会科学界提出了要求:“不能使社会科学界和创作力量在党内只起对某些决议或地位很高的同志的讲话发表评论的作用。”<sup>③</sup>

那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社会科学界为领导人的讲话做“注释”的现状呢?戈尔巴乔夫认为,这需要改变党与知识分子的现有关系,不要压制而是要发挥知识分子的创造力。他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会议上说:“对在新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缺乏准备,在这里也有察觉。因为我们是在这样的禁令下受到教育的——千万别出事,千万别发生什么问题。党的机关不应该允许在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出现分裂……我们不能没有知识分子。但党不应该对他们发号施令。这是不能允许和有害的。否则将无法将人的因素调动起来。”<sup>④</sup>

<sup>①</sup> 塔斯社莫斯科1989年11月7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9年11月9日。

<sup>②</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3页。

<sup>③</sup> 同上,第153页。

<sup>④</sup> [俄]阿·切尔尼亞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 (一) 知识分子与异见者

在苏维埃政权史上,知识分子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赫鲁晓夫的“解冻”而带来的苏联国内政治环境的宽松,在知识分子中间促成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并使其与现政权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sup>①</sup>麦德维杰夫指出:“苏维埃国家在它的各个历史时期都被构建为一个专制型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不同意党的政策的合法反对派和对党的领导人的公开批评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各种批评和抗议形式正好在60年代末开始发展和增多了,我们的历史政论文章中人们把这种批评和抗议形式称作‘持不同政见者运动’。”<sup>②</sup>这种紧张与其说是在政治制度上的对抗,不如说是在思想信念上的冲突。“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有许多人不仅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但这些人的惟一武器就是言语、音乐和绘画。他们是用自己的文章、小说、歌曲来维护自己的信念的,而不是用暴力、监狱、劳改营和精神病院。我们的报刊那样广为宣传的‘苏联人民政治道义上的一致’,实际上不过是苏联宣传中的一个神话。甚至在我们国内曾处于金字塔顶峰的那些人中,有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一窍不通,但仅仅是由于提升职务和保持权力的需要而把自己宣布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sup>③</sup>

“持不同政见者”由于大多批判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不赞成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垄断等而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他们人数虽少,但声誉高、影响大,不仅受到苏联社会内部不满现实者的广泛同情,而且也受到西方国家的吹捧而沦为其攻击苏联的工具。安德罗波夫说:“应该说‘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名词本身就是宣传家们狡猾杜撰出来的,其目的在于蒙骗社会舆论。众所周知,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思想不同的人’。资产阶

<sup>①</sup>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从这以后,苏联和西方之间展开了一场冷战,形成所谓“帕斯捷尔纳克事件”。

<sup>②</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sup>③</sup> 同上,第129页。

级宣传使用这个词,是打算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苏维埃的制度不容许它的公民进行独立的思考并迫害任何‘有不同想法的人’,即不象官方所规定的那样。”<sup>①</sup>不过,就整个运动来说,这主要不是由外国煽动起来的,“它是由苏联社会和国家本身的缺点和弊病引发起来的,它的根还在斯大林时期的阴暗岁月里就扎下了,那里毫无人性的恐怖和国家的罪行成了家常便饭。这个运动也是对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恢复名誉和重新极力限制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宗教、民族团体的合法权利的企图的回答。这个运动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内状况、供应短缺和生产组织中的缺点的普遍不满,是由于苏联的党政等级制中许多环节上和各个级别中还存在着的专横和腐败而产生的”<sup>②</sup>。

“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苏联政府的严密管控。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苏联政府监控“持不同政见者”的主要机构。1967年7月3日,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在呈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一个克格勃的独立部门,其任务是“组织反间谍工作去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苏共中央政治局赞成安德罗波夫的建议。<sup>③</sup> 1967年7月底,克格勃第五局成立。第五局接受的第一批案件中,就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案<sup>④</sup>

<sup>①</sup> [俄]安德罗波夫:“共产主义信仰——新世界建设者的伟大力量”(1977年9月),《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73页。

<sup>②</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29页。

<sup>③</sup> 同上,第87页。

<sup>④</sup>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9年11月,作家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形势,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销作协书记处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

和安德列·萨哈罗夫案<sup>①</sup>。苏联政府一般采取严厉批评、解除工作、开除出党、驱逐出国、送进精神病院甚至搜查逮捕被判入狱等办法惩治“持不同政见者”。随着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政治环境的日趋保守，刑法典里出现了一项条款（第 190 条第一款），规定对散布损害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谣言和消息者要进行惩罚。“这就为对犯罪的解释留下了广阔的天地，让克格勃得以为所欲为。现在持不同政见者成了主要敌人——这就是那些正直和有思想的人，民族的良心，捍卫民主思想、人权、公民权利的人。等待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是监狱。”<sup>②</sup>据不完全统计，因从事反苏与散布“攻击苏联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故意造谣诽谤”而被判罪的，在 1956—1960 年之间为 4676 人。1961—1965 年被判罪的为 1072 人。其中 1965 年被判罪的总共是 20 人，1966 年为 48 人，1967 年为 103 人，1968 年为 129 人，1969 年为 195 人，1970 年为 204 人，1976—1980 年总共为 347 人。<sup>③</sup>

然而不论苏联政府采取何种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控制，在相当程度上都达到了其目的：“在苏联晚期，驱使知识分子对党以及领袖本人的‘慈父般的关怀’感激涕零的，不仅是斯大林时代养成的恐惧心理，而且还有无

<sup>①</sup> 安德列·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苏联原子物理学家，并曾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的研发，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从 1950 年代后期起，萨哈罗夫开始关注他工作所牵涉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他在 1960 年代开始活跃于政坛，反对核武器扩散。1968 年 5 月，萨哈罗夫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反弹道导弹是核战威胁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篇文章作为地下出版物被传播并在苏联境外出版后，萨哈罗夫被禁止参与与军事有关的研究。1972 年，萨哈罗夫与同为人权行动主义者的叶连娜·邦纳（Елена Георгиевна Боннэр）结婚。1973 年，萨哈罗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翌年，他获得了奇诺·德尔杜卡世界奖（Prix mondial Cino Del Duca）。1975 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他被苏联禁止离境领奖，他的妻子叶连娜在颁奖典礼上代他宣读演讲辞。1980 年 1 月 22 日，他因为示威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捕，随后他被流放到一个保密行政区高基，即现在的下诺夫哥罗德。在 1980 年至 1986 年间，萨哈罗夫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声称他在高基的寓所经常被搜查和抢掠。1986 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展开重建和开放的政策，萨哈罗夫被释放。1988 年，萨哈罗夫获得国际人道和伦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Humanist and Ethical Union）颁发的国际人道主义奖。之后，萨哈罗夫协助了苏联最早的一批独立政治组织的成立，并成为苏联反对势力中的主要一员。1989 年 3 月，萨哈罗夫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Съезды Советов），成为民主改革势力的领导者之一。

<sup>②</sup>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 年，第 23 页。

<sup>③</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 年，第 87 页。

法克服的不知是先决性的、还是后天获得的那种力求得到上司器重的内心需要,至于已经多次描述过的御用知识分子对于执政者尤其是暴君的着迷综合征,就不在话下了。”<sup>①</sup>但是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哪怕其后又再关闭,都无法阻挡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独立思考。

就苏联政治现实而言,对体制最大的危险其实来自于内部——“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sup>②</sup>。事实上,1986年12月,在戈尔巴乔夫的力主下苏联政府通过了一项政治议案,取消了对反对派的刑事诉讼。<sup>③</sup>于是,“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走出劳改营和监狱。但他们的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卷土重来。很多人已经厌倦了‘为人权而斗争’,还有一些人则由于在西方有了名气,便跑到国外过起了太平日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正是在1986年由于对他们停止迫害而画上了句号”<sup>④</sup>。在苏联时期曾经任职过苏共中央智囊——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对外情报局的普里马科夫就指出,许多摇撼苏维埃体制的“持不同政见者”,比如安德烈·萨哈罗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sup>⑤</sup>等人,“他们从未成为苏维埃体制之一部分。他们批判这个体制,同这个体制作斗争,要求取消这个体制;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外部’进行的,甚至在他们之中一些人还生活在苏联,直到被迫而出走国外的时候都是如此”<sup>⑥</sup>。普里马科夫提醒人们注意,真正从思想的根底上动摇苏维埃体制的,恰恰是那些受到党的重用的人。他说,许多研究者“极少提到那样一些人,其中包括身居并非低微官职的那些人;很少提及那些学术机构和报刊杂志,这些人和报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sup>②</sup>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焦广田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页。

<sup>③</sup> 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突然亲自打电话把萨哈罗夫请回莫斯科居住,并给他安排两套住房和别墅,还允许并鼓励他从事政治活动。1988年1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萨哈罗夫,双方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热情友好”的谈话。

<sup>④</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9页。

<sup>⑤</sup> 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尔多维奇·罗斯特罗波维奇,俄罗斯杰出的大提琴家、指挥家,1964年被授予前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1970年10月31日,他写信给《真理报》声援被流放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而被禁止演出。1974年他带妻子和两个女儿逃离苏联,后定居美国。1978年他们被剥夺苏联国籍。1990年1月被恢复俄罗斯国籍。

<sup>⑥</sup>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页。

刊不但反对那种大规模镇压的实践,而且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教条、官方理论准则之荒谬而陈旧的观念。这些‘体制内的’众多力量的积极活动,彻底促进了那些本质的合理变化的发生”<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到了莫斯科后,他就发现在党的高层其实已经存在着这种情况。他说:“勃列日涅夫时代晚期(决非斯大林时代)有一则奇闻几乎被人遗忘,那就是不成文的禁忌:列宁的晚期著作不得再版,也不得‘未经批准地’摘录。列宁口授的一批著作甚至曾一度放在专门保存处锁起来,勃列日涅夫演讲稿写作者中的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几乎把‘大逆不道’的列宁语录当成地下传单塞进了正式讲话稿。理想化了的列宁,被党内秘密的民主派首先用作抵制斯大林主义复辟的工具。”<sup>②</sup>而对雅科夫列夫来说,这位曾经的苏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他对党的领导人的助理们的这种“夹袋式”的小动作嗤之以鼻:“我曾多次见到为勃列日涅夫起草各种文件的我的朋友和同事是如何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地把某种新的东西、某些新鲜的概念写进那种用词千篇一律、充满刻板套话的标准文件里。当时有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认为所有这些‘机巧做法’会有助于开导‘领袖们’。唉!这类企图照例都是失败的,仅仅成为在扎维多沃晚间喝茶时悲叹的理由。”<sup>③</sup>

不过,戈尔巴乔夫的到来却让党内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博尔金指出,党和国家的上层人物是那样的衰老,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向前看,没有能力思考祖国发展的前景。苏共二十六大之后已经可以看出,大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很可能活不到下一次代表大会。正因为如此,戈尔巴乔夫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才引起了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们的注意。“戈尔巴乔夫属于比较新的一代人,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有魅力,尚能鼓动起那些一直在苦苦寻找一位在实现社会上的改革思想的过程中可以依赖的领袖的人们。于是这些人(其实并非大家一齐也并非毫不犹豫)便把宝押在了戈尔巴乔夫身

<sup>①</sup>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94页。

<sup>③</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上,帮助他扬名,帮助他在曲折的仕途上步步升迁。”<sup>①</sup>

尽管如此,作为“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仍然在思想一统的苏联社会存在着,而且是以官方“思想机构”的形式吸引着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当时主要有两个机构:一个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一个是苏联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是向党的最高领导层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提供政策咨询的机构。1985年普里马科夫接替雅科夫列夫出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他认为:“在努力克服官方意识形态强加的教条主义思维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起了很大作用。”<sup>②</sup>它对那些工作在其他机构的,具有“进步意识”的学者非常有吸引力。<sup>③</sup>另一个重要机构就是苏联社会科学院。它受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直接领导,其职责是教育和培训外国留学生,特别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其目标是为这些国家培育具有影响力的共产主义宣传者甚至领导人。普里马科夫对苏联社会科学院赞誉有加,认为:“在完全停滞的年代里,苏联科学院乃是真正的‘自由思想的孤岛’。”<sup>④</sup>

这些思想活跃的官方机构之所以能够长存,关键在于它受到官方的保护。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第一任领导是阿努沙万·阿尔祖马尼扬(任职于1956—1965年),他有能力来保护该机构,因为他的妻子是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的亲密伙伴米高扬的小姨子。在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政治生命结束后,阿尔祖马尼扬仍能保住其职位,这得益于他和勃列日涅夫在战争时期结下的情谊。<sup>⑤</sup>1965年阿尔祖马尼扬去世后,与勃列日涅夫保持密切关系的伊诺泽姆采夫出任该所所长直到1982年逝世。伊诺泽姆采夫同研究人员有“君子协定”:所长可以保证研究人员学术探索的自由性,反过来学者们也必须遵守“游戏规则”,不给研究所制造麻烦。<sup>⑥</sup>其后,同戈尔巴乔夫有着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92~93页。

<sup>②</sup>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6页。

<sup>③</sup> [英]阿奇·布朗:《改变世界的七年》,韩凝等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134页。

<sup>④</sup>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sup>⑤</sup> [英]阿奇·布朗:《改变世界的七年》,韩凝等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134页。

<sup>⑥</sup> 同上,第135页。

密切关系而且思想激进的雅科夫列夫在 1982 年担任所长后，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要决策机构。

当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并努力破除“以往年代里形成的思维”的时候，寻求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人”的支持就成为改革的思想助力。雷日科夫指出，“设计师”“施工队”以及改革的其他意识形态专家们和组织者们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只有大多数或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支持改革，苏联根本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才有可能得以实施。然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党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织一支可以说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联系逐渐变成形式上的和单方面的东西：总是从上到下、从党到群众，很少有自下而上、从群众到党的事情发生。此外，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开始给予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强大的影响。首先是电视、广播，还有日报、周刊、各种大小杂志。那么，在这些机构工作，决定它们立场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人民精神生活的“气候”，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以及公民的政治行为在巨大的乃至后来是起决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这些人来决定”。<sup>①</sup>

于是，被压抑多年的知识分子开始爆发出其独立思考所带来的巨大思想能量——负面能量。借助对“自由”“民主”口号的娴熟运用，制造舆论把苏联公众引向对苏维埃社会主义“专制”“特权”的自我否定，从而在思想根源上彻底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存在。“对操纵所做的准备工作，不仅在于摧毁某些观念和思想，而且在于构筑新的思想、愿望、目标。那是一些临时的‘服务性’构造物，其主要任务是在思想中引起混乱，使它变得不合逻辑、没有联系，使人怀疑原有的生活真理。这样就使人面对操纵而无力自我保护。”<sup>②</sup>于是，思想的大崩溃开始了。利加乔夫指出：“对苏联人持最严厉批评态度的人是苏联人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sup>③</sup>知识分子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12~13 页。

<sup>②</sup>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103 页。

<sup>③</sup> [法]《费加罗杂志》1990 年 3 月 17 日。

的活动远远地超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最初预想而有了新的政治诉求——毁掉苏维埃制度。切尔尼亞耶夫指出：“对任何政权当局，俄罗斯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破坏情结’，这种情结不止一次地损害了本国进步事业，而在这里又得到了再现。这对民主阵营内的力量对比、对改革的整个进程有着悲惨的后果。”<sup>①</sup>

## (二) 报纸：意见多元化

要想取得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就必须保证在国内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对于这一点，无论是戈尔巴乔夫本人，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都是比较赞成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应该向国内的公开性转变，向外部世界开放。

对以报纸、电台等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高度重视，是布尔什维克党从革命到执政时期的政治传统。列宁指出：“工人阶级正是政治揭露的理想听众，因为他们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因为他们最能把这种知识变成积极的斗争，哪怕这种斗争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而能够成为全民的揭露的讲坛的，只有全俄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而俄国在这一点上无疑也是应当归入现代欧洲的。报刊在我国早已成了一种力量，否则政府就不会拿成千上万的卢布来收买它，来津贴形形色色的卡特柯夫之流和美舍尔斯基之流了。”<sup>②</sup>在革命初期，列宁甚至于把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当作党的领导机关来对待。他说：“报纸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党在思想上的领导者，应当对理论上的道理、策略原则、一般组织思想和全党在某个时期的共同任务加以阐发。运动直接的实际领导者，只能是专门的中央组织（姑且称之为中央委员会吧），它亲自同所有的委员会保持联系，它包括了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所有优秀的革命力量，并处理一切全党性事务，如分发书刊，印发传单，调配力量，指定某些人或某些组织管理专门机构，准备全俄游行示威和起义，等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亞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

<sup>②</sup> [俄]列宁：“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85页。

等。鉴于必须严守秘密和保持运动的继承性，我们党可以而且应当有两个领导中心：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前者应担负思想上的领导工作，后者则应担负直接的实际的领导工作。这两个组织的行动统一，它们之间必不可少的团结一致，不仅应由统一的党纲来保证，而且应由两个组织的组成人员（两个组织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之间应当完全协调一致）以及它们经常举行定期联席会议来保证。只有这样，一方面，中央机关报才可以不受俄国宪兵的破坏，保证其一贯性和继承性；而另一方面，中央委员会才可以经常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同中央机关报协调一致，并且可以相当自由地直接处理运动中的一切实际问题。”<sup>①</sup>

由于报纸、电台等通信技术固有的一对多、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特点，反映在政党的组织建设结构之上就是十分强调党的中央机关（特别是党的领导集团）的领导作用，而对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则被牢牢地约束在党的组织纪律之中，从而使政党的组织结构明显地表现为一种金字塔形的等级体系。而随后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一跃而为俄国唯一执政党的政治发展实践也进一步扩散了这种组织结构特征。“苏联一直追随着列宁以控制纸张供应作为革命后的控制信息的基本做法，印刷、复印、信息加工及通讯传播机器一直是受到严格监管的东西，要使用影印机就要得到安全许可：俄罗斯文的文件要两个政府部门签名，非俄罗斯文的文件则要三个部门签名。长途电话线及电传打字机在每个单位内部都受到特殊程序的控制，‘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这个想法本身在客观上就会对苏维埃官僚体系，包括科学官僚体系在内，造成颠覆。信息技术的流通，包括机器和技术在内，很难在一个信息控制对国家的合法性、人民的控制极为关键的社会中发生。传播信息技术愈是让外在世界能进入苏联公民的想象表达（再现）（imaginary representation）的世界中，在客观上这类技术让公民能接触到，就愈会有破坏性。因为大体上，由于缺乏信息以及替代的世界观，苏联人民已经由臣服的恐怖态度转为被动的千篇一律，因此苏联国家体制本身就否定信息技术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而缺乏扩散，信息技术就无法发展

<sup>①</sup> [俄]列宁：“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1902年），《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页。

出超越国家所制定的特定功能性任务。因此使得因使用而带来的创新以及网络化互动的过程无法展开,而这点正是信息技术范式的特色。”<sup>①</sup>

就具体的媒体管理而言,“苏联的报刊、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上的每条新闻,都要经过有倾向性的筛选;记者和编辑不仅要经过审查,而且要由共产党的宣传部门进行直接的‘指导’,指示他们哪些问题可以报道,怎样进行报道”<sup>②</sup>。而对于媒体官员的任命更是苏共人事制度的重要内容。马特洛克注意到,科罗季奇引进《星火》周刊的方式就具有启发意义。任命科罗季奇时所用的程序,表明在共产党的人事制度下如何进行任命工作。“一个有着‘全联盟’重要性的职位的候选人,要先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相关部门进行审核(这一次是宣传部门),再由主管人事安排(在共产党的术语中称做‘干部’)的书记进行复审,最后由全体政治局正式通过。这种任命程序不仅有关任命重要杂志的编辑,而且涉及任命苏联部长会议成员、大型工业公司领导、各州‘首脑’、各民族共和国第一书记、大使、重要大学校长以及各军区司令。共产党控制着所有涉及监督其他部门的人员任命工作。工作越重要,所需要的批准级别越高。如果一个机构被认为有着‘全联盟’的重要意义,那就意味着要由政治局亲自批准。”<sup>③</sup>

然而改革的发展形势和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的倡议都表明:原来的做法再也无法适应今天的改革要求了。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6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强调指出:“随着社会经济领域和精神领域的任务日益复杂,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的要求也将严格起来。今天,我要指出报纸、电视和广播、舆论工具在改革进程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它们为扩大公开性、切实实现我国社会的民主、提出具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正在做许多工作。”但是戈尔巴乔夫认为,在推进这一工作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他说:“许多地方报纸的公开性程度和时效还远不如中央报刊。对这一问题的调查表明,这与党委的立场有直接关系。因此,无论党委,还是编辑部都必须作出

<sup>①</sup> [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黄慧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9~30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13页。

<sup>③</sup> 同上,第67页。

正确的、自我批评性的结论。”<sup>①</sup>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不放开对报纸的管控,就无法激发社会的思想活力。在戈尔巴乔夫兴致勃勃的时候,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对于放开报禁却有着复杂的心情。雷日科夫说:“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明白,由于我国历史情况十分复杂,在实施这种变化时要多加小心,权衡利弊,以免国家航船颠覆。不论这只船是什么船,但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船。既然我们大家都载着自己的欢乐和苦难乘着这艘船航行,总不能让它遭到危险,即便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它连同乘客一道沉向海底总是不行的。公开性宣布了,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sup>②</sup>

在“公开性”的号召下,媒体管理的政策松动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开始陆续执掌各大重要报刊。“新闻媒介的‘改革’开创了‘公开性’的新时代。排除异己的大清洗如此频繁,如此广泛,以致一般主编更换后紧接着整个编委会都要更换,能否晋升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对‘改革’的态度如何。”<sup>③</sup>于是,在“改革”的名义下,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通过撤掉主编阿法纳西耶夫,而从“保守主义”中解放出来,由主张改革的该报经济部主任维·帕尔费诺夫取代他的位置;党中央机关报《共产党人》到1986年之前,也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其主编由另一位戈尔巴乔夫分子伊万·弗洛罗夫接替(后为戈尔巴乔夫顾问)。该杂志马上变为亲改革派刊物,成了“改革”的“理论”讲坛。在它的召唤下,一批作者对戈尔巴乔夫之前的物价、金融、补贴、计划和危机以及消费市场的萧条等横加指责;中央周报《经济报》从1985年也换了主编,成了亲改革派报纸;任命叶戈尔·雅科夫列夫为《莫斯科新闻报》主编(1986年);任命维塔利·科罗季奇为《火花报》主编(1986年);主要经济刊物《经济问题》(1986年进行了改组,“保守派”恰恰图罗夫院士下台,由“改革派”波波夫教授接替主编职务);科学院新

① [苏]戈尔巴乔夫:“关于苏联1986年至199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各级党组织在实现这一计划方面的任务”(1986年6月),《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1987)》,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页。

②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③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西伯利亚研究所主要学术刊物《回声》，在戈尔巴乔夫的助手阿甘别季扬院士担任主编后，也来了一个 180 度大转弯，丢掉了自己的传统风格，成了“改革”的喉舌；其他中央报刊也遭到了撤换主编、改弦更张的命运，或迟或早，最终都由“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变为“支持”戈尔巴乔夫，这些报刊是：工会中央机关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苏维埃国家报》《莫斯科新闻报》《计划经济》，等等。<sup>①</sup>

二是大量极富意识形态攻击性的报纸杂志开始涌现。雷日科夫指出，“意见多元化”首先立即引发政治和意识形态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大杂志”的印数直线上升。例如，《新世界》的销量竟达到 150 万份。值得一提的是，在官方书报检查制度已经完全放开的今天这个“民主”时代，该刊 2005 年的印量也不过 8000 份。雷日科夫回忆，那些年政府如何像发了疯似的想方设法为报纸杂志扩大纸张供应，不得不大量增加从芬兰等国进口纸张的数量。“既然我们认为自由发表意见的路线对头，那就应该竭尽全力，保证出版部门有纸张来印刷自己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印反政府的文章。”<sup>②</sup>强调批判性和戈尔巴乔夫对“思想自由”的支持解放了人们的言论。报刊对追查批判的“惧怕心理”减弱了。<sup>③</sup> 在苏共称之为“边缘区”的共和国，反对莫斯科的情绪迅速高涨。这不仅是因为释放了一些被定性为“捣乱分子”的人，也是因为几项重要进展使以前被压抑的不满情绪得以发泄出来。“其中最重要的进展就是提倡公开性，这是一个窗口，使得有勇气的编辑、记者和学者敢于涉足以前列为禁区的话题。一开始，只是零星的一两篇文章对党的一般性教条进行质疑，后来，当发现天并没有因此塌下来时，写的文章就越来越大胆了。”<sup>④</sup>

媒体放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党内民主派掌握了舆论的制高点，通过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150 ~ 151 页。

<sup>②</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13 页。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103 页。

<sup>④</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179 页。

采用各种手段引导社会舆论向“右转”。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在这些“革新人们”看来已经渐渐褪去了真正“改革”的色彩——改变苏维埃制度。《星火》杂志编辑维塔利·科罗季奇指出,当戈尔巴乔夫宣称“公开性”是改革的一部分时,他心里的感觉是“让一个老妓女洗个海绵擦身浴,再穿上干净的衣服,以为这会使她变成处女”<sup>①</sup>。于是,一些激进派利用“公开性”和民主,旨在加强社会紧张局势,混淆群众视听,使国家动荡不安。利加乔夫指出:“我们在1985年拟定的改革措施急需的是公民的支持、人民的团结。为了不使党和国家出现分裂、无政府状态,鉴于那时的报纸杂志、电视节目的社会多元化现象,应该学会用新方法管理新闻媒介,不是通过简单的命令,而是友好的工作、讨论。但激进主义的文章越来越尖刻,攻击越来越肆无忌惮。”<sup>②</sup>这些所谓的民主激进派不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同反对自己的人的斗争中不使用科学分析的论据,却用了许多迷失方向的政治蛊惑和带感情色彩的标签。他们无原则地粗暴斥骂自己的政治对手,称他们为“反市场分子”“读死书的人”“保守分子”“勃列日涅夫分子”“斯大林分子”等。这是他们对利加乔夫等反对派关于异常贫困现象,如“周期性失业和社会分化”提出的紧急警告的“致命的”反驳。于是,“这个已成为整出闹剧的、组织极好的‘改革’政治剧场就像一台为自己的垮台转得越来越快的发动机那样工作起来”<sup>③</sup>。结果是把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其他部门以及中央集权机关从拟制计划和平衡表的职责中排挤开,不让它们承担这些职责。几千张物资平衡表被废弃,只集中注意几项战略指标和产品,同时把上面的职责推给下面(企业)的传统的计划工作。这样一来,中央集权的经济调节和管理工作与效益好的市场的反向联系失去了作用。

但是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却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党的“喉舌”终于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在他看来,这是对改革的真正支持。他说:对于“公开性”的这一类“下脚料”,开始时我们还试图用往日惯用的方法加以摒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4~65页。

<sup>②</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sup>③</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除——总书记提醒“首席思想家”注意，那人则向宣传部长作出指示，部里再召集编辑记者开会，指示他们应当怎么做才对。但是这些久经考验的方法渐渐不起作用了。编辑们开始“顶牛”，有些人干脆就不听话，用自行其是的做法考验党的领导的耐心。几乎每星期都要出现一批“大胆”文章，它们对当时“公开性”所允许的限度心中有数。最早扮演“领头羊”角色的是《星火》《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等报刊。因此如前所述，在几次中央全会上、在机关和领导人中，一时间对新闻界的为所欲为议论纷纷。戈尔巴乔夫却愈来愈趋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保障“公开性”免受侵犯，但大众传媒也应当承担明确的责任。要办到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以采取“喝令”编辑的办法，而只能诉诸有关新闻出版的法律。他的这种想法最早考虑成熟大约是在 1986 年，但到其得以付诸实施，已经耗去了不少时间。由于有了“公开性”，改革开始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而只有真正“富有参与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开性”，他们在报纸和电视台的编辑部里日复一日地传播和阐释着新思想。没有“公开性”，便很难指望相应的实践活动中能沿着政策改革的轨道进行。当戈尔巴乔夫感到“出自上层的意图被日益‘架空’，在党政机关垂直领导部门卡壳的时候，便更加对公开性的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言论自由能让你越过机关工作人员直接与群众打交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获得他们的支持。‘反馈’形成之后，同样会对改革的发动者产生巨大的影响”<sup>①</sup>。

放开媒体管制后带来的社会思想的嘈杂，让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们感到震惊和不解：难道只有这样才能推进改革吗？利加乔夫对戈尔巴乔夫当时所持的立场越来越感到吃惊，他或是对这些批评视而不见，或是将批评解释为某些人企图摆脱社会舆论和报界的监督。利加乔夫说：总书记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右派激进主义掌握的大众传媒明显地控制了全国，严格禁止发表任何异己言论。这是残酷的宣传，恐怖的活动。一天之中，像是得到统一命令似的，五六个莫斯科主要出版物和电视、“灯塔广播电台”等，在外电的有力支持下，一起向对手发起攻击，导致不安定的宣传运动一浪接一浪地在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47~148 页。

全国展开了。而从那些自称为民主派的人们身上很远便可以闻到独裁和控制人民思想的气味。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它直接威胁到真正的民主。但戈尔巴乔夫不理会这些警告,最终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悲剧。“瓶子中的恶魔扑向他的解放者,激进报刊背叛了戈尔巴乔夫,而且是在改革最复杂、最紧迫的关头。”<sup>①</sup>

### (三) 舆论:思想的背弃

以“公开性”为名,在恢复历史真实面目的旗号下,改革需要的社会思想共识被彻底打破了,作为苏联社会主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被放弃了。1989年12月26日,苏联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颁布命令,从1990年2月开始的新学期起,全苏所有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必修课程。同时各大学在学生毕业时举行的该课程的国家考试也随之取消。取代这门课程的是“20世纪的政治史”“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哲学”“经济学”等科目。另外还决定,从1990年9月的新学年开始,将过去对中学最高年级开设的“社会科学”课(事实上的“马列主义”课)改名为“社会与人”,加入重视人性的内容,至于有关马列主义的考试,同大学一样,将予以全面废除。<sup>②</sup>雷日科夫指出:“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sup>③</sup>

一是苏联人民的思想彻底混乱了。当激进报刊的肆无忌惮被认为是民主的最高表现时,“人民被吸引住了,甚至着了魔。那时便开始了对群众思想的控制”<sup>④</sup>。绝大多数大众传播媒体受“民主力量”的影响,成了它们的世袭领地,对破坏过程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发表捍卫苏联及其完整性的文章成了问题。克留奇科夫愤怒地指出:“我国历史的许多重大方面被歪曲。有人居然说什么人们在1917年前的沙皇制度下生活得多么好,而在苏联政权

<sup>①</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23页。

<sup>③</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sup>④</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下的生活又是多么糟！苏维埃政权年代被描写成一片黑暗。”<sup>①</sup>本来在苏联时期有对人们行为无所不包的约束体系：党和共青团的组织、事务性机构、惩罚机关、中学与高等院校，意识形态教化、文化、家庭，所有这些对人们生活的控制成分都是共同发生作用并相互影响的。“在这些范围内，任何品质的人们都表现得比较宽容。而在后苏联时期，所有这些约束都被取消了，人们让自己接受使人堕落的宣传的影响。而人民则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所有天性——首先表现为挑衅性的愤怒、极端厌恶和轻蔑。”<sup>②</sup>

二是社会主义思想原则被背弃了。1989—1991年，激进派对社会主义的批评达到了顶点。《红星报》发表“驱狗追猎”的评论文章指出，列宁格勒电视台播放谈话，要求设立国际法庭审判马列主义。在乌克兰有人呼吁绞死共产党人。到处破坏列宁纪念碑，到处在搞地名更改。“我不敢说这一切都是在准备反革命政变。但很像在驱狗追猎，号角在吹，鼓在擂，狗在叫……”<sup>③</sup>社会主义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指责，甚至连卫国战争的胜利也受到了责难。社会主义思想遭到挖苦和嘲笑，资本主义“乐园”却被捧上了天。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好，人人生活幸福，无忧无虑。苏联由以前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一下子变为赞扬它的完美。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党内官僚们的抵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预示着他们所维护的制度的腐朽。他说：“突破‘禁区’异常艰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的嘟囔埋怨和思想家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些机关受到了‘寿终正寝’的威胁——它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对我们的那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sup>④</sup>对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批评否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15页。

<sup>②</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sup>③</sup> [苏]《红星报》1990年10月12日文章“驱狗追猎”，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10月15日。

<sup>④</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

定很快就汇聚成为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纯粹是吮吸着手指头生造出来的信息。它们都越来越公开地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为了这一点，首先当然要利用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遗憾的是阴暗面在斯大林时期还真不少。当然，从那时起，几十年都过去了，国内好多东西都变了，国家也成了另外一种样子”<sup>①</sup>。面对这一切，“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事实上并没有反击”<sup>②</sup>。

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呢？难道说苏联共产党坚持的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真的是一场“错误的实验”吗？

雷日科夫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在于苏共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破坏性倾向战胜了实证主义。这是因为苏共，准确地说，因为它的中央和几任总书记，在整个后斯大林时期一直没有能够对全党和全社会提出要求克服侵蚀党和社会血肉肌体的教条主义的任务（除了安德罗波夫，但他来得及做的只是指出这种必要性）。在这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世界上，在我们国内，教条主义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状况，而他们却不懂得深入进行科学分析、认真发展建设新型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必要性。”<sup>③</sup>这种教条化的意识形态，使苏共丧失了活动的政治能力。“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不仅阻碍了国内健康的民主力量的发展，而且与这一思想相关的行动方针和指南也助长了党和国家统治阶层的不良习气，包括贪污腐败、滥用职权、许多地方高层领导人的自私自利，等等。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在苏共内部统治阶层的贪污腐化现象日趋严重。20世纪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瓦解的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教条主义和苏共干部队伍的普遍腐化使这个党丧失了抵抗力。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23~224页。

<sup>③</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还很强大和享有权威的时候,苏共也相应地成为具有权威的党,因为只有苏共才是这一思想理论的保卫者和诠释者。随着这一思想体系逐渐丧失它的权威,苏共也随之失去了威望。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了,这使表面看似强大的苏共陷入了困境。”<sup>①</sup>在意见多元化的竞争时代,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去挖掘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潜力,更严重的是,不能容许对社会主义持不同意见的理论体系存在,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没有经过磨练,不能适应其周围的环境与条件,是温室里的花朵”<sup>②</sup>。于是,当激进派以西方的民主、自由、公正等所谓的“普世价值”攻击苏联的社会思想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对此进行了深刻分析。他指出:“人为地使苏联人所具有的崇高的价值体系和道德品质,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消极品质的发展,使大众保持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内。自从这一价值体系和道德品质威信扫地、身败名裂之后,社会就开始了急剧的思想和道德的解体。苏联建立了统一、集中的意识形态机制,它由党的机关管理,并与自己的主要机构一起组成了党的机关。该机制非常庞大,它绝对地控制着以各种方式与人的心理状态有关的一切。尽管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制和对国民无与伦比的意识形态教化,但恰恰是意识形态成为苏联社会在与西方的对抗中最脆弱的一个环节。在千百万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表明它令人憎恨地不符合现实,急剧地降低了它的知识内涵,使其成为仇恨和嘲笑的对象。现实共产主义中的消极现象,成为西方和苏联国内的、来自西方的铺天盖地的反共宣传的对象。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和列宁所预言的那样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得到了巩固;而且,似乎还在这一历史时段同共产主义的比赛中获胜。苏联出现了经济衰退,而资本主义西方则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苏联人从那里看到了共产党人所许诺的人间天堂。苏联意识形态努力使苏联人所具有的崇高的精神和道德价值体系,原来与人们现实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85~286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26页。

的品质、和他们的存在条件并不一致。在西方生活方式的诱惑下,西方的价值体系得到了巩固,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向人类发起进攻,苏联人也被纳入其影响范围。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成为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心理攻击的最软弱的目标。”<sup>①</sup>

## 四、政治话语:从胜利走向失败

“语言是知识和传播的工具,它也是权力的工具。”<sup>②</sup>政治话语体系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语言表征,包含了语言、思维、情感、道德和符号等多个层面的内容,是政党维系内部团结、凝聚共识的重要工具。苏联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突出地表现为“胜利式话语”,其强烈的社会鼓动性、情绪渲染性和发展的肯定式判断,既是苏联一跃而成为超级大国的强大思想动力,但是在苏联社会内部矛盾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也造成了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困境。从相当意义上讲,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胜利式话语”反而为苏联共产党的丧失执政地位以至于苏联的解体培植了社会思想土壤。

### (一) “胜利式话语”的特征

意识形态话语是政党关于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政治认知的思想语言的体现。不同的政党由于其政治理念、组织结构以及与社会关系的差异而有着不同的话语特征。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具有极其鲜明的特征,集中表现为强烈的“胜利式话语”。“胜利式话语”既是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语言特征,饱含着道德的神圣性和动员的群众性,更是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思维特征,反映了对社会发展认知的垄断性与排他性。具体来说,苏共意识形态“胜利式话语”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五个

<sup>①</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34~35页。

<sup>②</sup> [美]丹尼斯·K.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陈德民、陶庆、薛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4页。

方面。

第一,语言的论断式。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象,语言既是一种社会交往的交流工具,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社会规范。“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我们的语言。语言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教导我们事物的名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还教导我们什么事物可以命名。它把世界划分为主体和客体。它指明什么事件被当做过程,什么事件被当做事物。它教导我们时间、空间和数的观念,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观念。”<sup>①</sup>在大众政治成为可能之后,不同阶层的语言总是被赋予不同的政治色彩,代表了各个阶层对社会关系的不同主张。布尔什维克在夺取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生成发展出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语言重新厘定了俄国社会的各种关系,规范了社会民众的行为举止,引导着社会的心理发展。这种创造出来的“胜利式话语”的意识形态语言,具有简单明了、传播快捷、易于记忆的特征。其在表现风格上具有预言式的论断性,在表述内容上具有强烈的肯定性,在表达语气上具有不容置疑性,通过适时而又恰当的标语式口号来实现对社会的全体动员,以调动和增强社会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持和信仰,并号召苏联人民为之奋斗终身。“胜利式话语”在苏联共产党历次党代会的决议、领导人的讲话、社会日常生活的话语交流等方面比比皆是。比如,从斯大林宣布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到赫鲁晓夫宣布初步实现共产主义,再到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最后到戈尔巴乔夫的完善社会主义的起点等,在苏联共产党的历次党代会决议中,苏联社会总是在不断前进,而帝国主义总是腐朽没落的;在苏联领导人的讲话中,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党就是要砸碎一切旧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解放一切可以解放的革命力量。赫鲁晓夫叫嚷着要“埋葬美帝国主义”时,苏联领导人以一种极其夸张的语言风格彰显着超级大国的强悍;在社会日常生活中,“胜利式话语”为领袖、组织、人民、集体、牺牲、奉献等词汇注入了深刻的政治内涵,锻造了一颗颗社会主义革命的“螺丝钉”、一块块社会主义大厦的“瓦片”与“砖头”。可以说,论断式的语言强化了苏联共产党对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真理的

<sup>①</sup> [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认知自信。

第二,思维的二元式。意识形态作为政党或政治集团对社会发展总体认知的政治表达,其内在的政治思维本身就包含着立场的不妥协性、观点的排他性和方法的简单化。作为这种思维体现的政治语言,在其表述的内容与风格上都具有强烈的二元判断。苏联共产党创造的“胜利式话语”就其思维特征而言,集中体现为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式思维,甚至在相当意义上讲就是一元化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认知和宣传解释上,苏联共产党的一切观点和主张都是最终的且是唯一的价值标准和规范要求。所以由斯大林亲自审订颁布的《联共(布)党史》成为不可亵渎的社会主义“圣经”。具体而言,“胜利式话语”的二元思维表现在对诸多重大而关键问题的认识上的唯一性。在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上,“胜利式话语”表明:苏联共产党关于共产主义的主张或学说就是唯一正确理解,苏联共产党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所有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始终遵循、不能背离的革命道路。在关于社会政治制度的认识上,“胜利式话语”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不是和平相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要埋葬资本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铁律。在关于国内政治生活的认识上,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政权的执掌者,苏联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唯一的政治代表,它的意见和主张就是苏联社会意志的表达。谁若是反对苏联共产党,谁就是与人民为敌;谁若是拥护苏联共产党,谁就是人民之友!可以说,二元式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胜利式话语”的政治内涵,使其成为人们思考社会的本能反应。

第三,道德的神圣性。政治话语体系的嬗变,不仅是政治权力强弱更替的象征,更是政治道德的社会重建过程。政治话语体系蕴含的社会道德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新的政治话语体系总是对旧有社会持总体性的道德批判,以此否定其政治权力存在的道德合理性;另一方面,新的政治话语体系在批判旧社会的基础上,必将根据自身的政治内涵及其逻辑重塑社会道德,以此来证明其政治权力存在的道德合理性。苏联共产党创造的“胜利式话语”就其内涵而言,饱含着极其深刻的政治道德的神圣性。这种道德的神圣性主要来源于阶级、主义、组织等三个方面:从阶级的角度来说,

按照苏联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无产阶级是工业社会最有组织、最有纪律,饱受压迫之苦最深,因而也是最为革命的阶级。而作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资产阶级来说,不仅用残酷无情的手段统治并压榨着无产阶级因而表现出政治上的极端反动性,而且奉行金钱至上的社会准则因而表现出彻底的生活腐烂和道德沦丧。可以说,“胜利式话语”的道德神圣性,首先来源于创造了这种政治话语体系的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历史角色。从主义的角度来说,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社会主义以后,引起了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君主制国家的政治大恐慌,其原因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包含了人类社会追求公正、平等、正义、幸福等美好愿望,并指出了这种美好愿望并非空想,而是有其现实的阶级基础和道路途径,从而赋予了共产主义信仰的道德力量和现实力量。“胜利式话语”的道德神圣性正是这种双重力量的集中体现。从组织的角度来说,“胜利式话语”所彰显的政治道德的神圣性,不仅指政治生活中共产党员单个个体的道德修养、道德表率,更是指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组织性道德。这种组织性道德,既是苏联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历史角色赋予的,也是苏联共产党高扬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历史使命赋予的。可以说,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的深刻道德印记,赋予了苏联共产党“胜利式话语”的神圣性和纯洁性。

第四,情感的鼓动性。具有神圣性道德内涵的政治话语总是富于启示性、示范性和鼓动性。所谓启示性,即是指这种政治话语总是以一种发现和掌握人类社会真理的预言方式,宣告其政治主张的不可阻挡和实现的必然。所谓示范性,即是指这种政治话语往往是通过其政治组织的道德规范来赋予团体的人格化道德内涵,并以其组织个体成员的道德实践来反哺和强化政治道德的社会印象,从而树立起政治组织的道德楷模以引领和示范社会。所谓鼓动性,即是指这种政治话语不仅在内涵上由于其是以新阶级、新道德来取代旧阶级、旧道德的必然进化而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而且在实践上也以其组织成员个体鲜活的道德实践而赋予了这种政治道德的普适性与可模仿性。

苏联共产党创造的“胜利式话语”就是这种情感鼓动性的集中体现:一是在情感鼓动的表述内容上,“胜利式话语”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描述了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引起苏联社会民众的情感共鸣，增强对国家建设成就和强国地位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二是在情感鼓动的主客关系上，“胜利式话语”把鼓动的重点放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胜利，从而在宣传鼓动的逻辑关系上使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三位一体的政治共同体。三是在情感鼓动的表达技巧上，“胜利式话语”在注重宏大叙事、营造整体社会氛围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技巧上的表达实现其对苏联民众的情感鼓动。这其中既包括简短有力、反映情感诉求的标语口号，比如卫国战争时期的“俄罗斯是广大的，但是没有退路，因为后面就是莫斯科”、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等等。同时又通过对政治符号的革命性内涵重塑，比如遍布苏联各地的重要政治人物的雕塑、各种革命纪念日等，使其成为苏联政治生活，乃至苏联民众日常生活的情感触发器，培养和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与归属感。

第五，符号的象征性。符号是包括神话、故事、传说、笑话、仪式、标识语等组成的象征体系，是意识形态的形象表征。每个符号形式都有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起到维护某种意义体系和权力结构的功能，并因此而再现统治关系。因此，通过象征符号的固定表达，能够形成和固化组织成员稳定的思维习惯。“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sup>①</sup>获取政权的政党总是借助一些共有的或特殊的象征符号来整合社会的分散意见，形成“共有意识”。同时，这些意识形态的符号本身又能够成为被崇拜的对象。“符号结构不仅在组织成员中传播信仰、准则和价值观，它们本身也被视为是这些信仰、准则和价值观的基本组成部分。”<sup>②</sup>苏联共产党的“胜利式话语”正是通过各种具有不同政治意涵的象征符号（领袖、纪念日、特殊词汇，等等）来达成对社会意识的再造与重建。比如，关于领袖的象征塑造，通过革命性的历史

<sup>①</sup>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sup>②</sup> [美]丹尼斯·K. 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陈德民、陶庆、薛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

叙事和形象刺激(比如列宁与哨兵的故事、苏联重要政治场所的列宁雕像、红场的列宁墓,等等),在不断凸显列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具有的优秀品格的过程中,列宁被神圣化而受到苏联人民膜拜,并以此象征着苏联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正确性。关于十月革命纪念日的象征塑造,通过每年11月7日的红场大型群众性集会游行、苏联领导人发表纪念讲话、反映十月革命的电影、文学创作等形式,赋予了十月革命丰富的政治内涵,以此象征布尔什维克开辟的十月革命道路的历史和政治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的首创,是对资本主义道路否定后的人类发展道路的新选择。

## (二)“胜利式话语”的成因

任何一种话语体系的形成与确立都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因素。那么苏共意识形态的“胜利式话语”是如何形成的?其历史成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从理论渊源方面来讲,偏执于社会进化的铁律。“胜利式话语”表明了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表明,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虽有曲折反复,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到共产主义则是历史的客观必然。这一规律性描述赋予了无产阶级承担的政治使命,启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指引了无产阶级前进的历史方向。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也认识到,尽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必然,但是它要从一种理论变成深刻的政治实践,却要面临各种极为复杂的社会挑战。应该说,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鼓舞了无产阶级为理想而努力的阶级斗志,也极大地激发了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意志,最终在俄国面临的国内外危机条件下取得了国家政权。但是在经历了短暂的军事共产主义之后,列宁发现,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并不像走涅瓦大道那样笔直畅通,必须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作为一种战略上的“退却”,很快激发和调动了俄国社会的积极因素,并促进其全面恢复。不过,新经济政策毕竟只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执政面临内外交困环境下采取的暂时性措施,社会主义必然建成的神圣

使命感仍然是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精神支柱。因此,当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赢得党内斗争胜利,他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宣布苏联能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时,斯大林的理论主张至少在政治心理层面满足了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精神需求。此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苏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集体化建设。尽管其间遭遇到种种难以想象的严峻挑战,但是“胜利式话语”作为苏联共产党鼓舞苏联人民克服困难、牺牲奉献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仍然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鼓动、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

二是从革命经验方面来讲,偏好于跳跃式发展道路。“胜利式话语”表明了俄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由此而蕴含的政治优越性与使命神圣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由于无产阶级的壮大及其政治上的日益成熟,西欧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意义。但是落后的俄国能不能发生社会主义却成为俄国革命者始终关注并思考的问题。查苏利奇的疑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俄国能够走社会主义时,查苏利奇的疑问得到了政治实践的肯定回应。布尔什维克以其极大的政治勇气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推动和丰富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为像俄国一样落后的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但是布尔什维克马上又面临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与马克思设想中社会主义首先发生在生产力发达的西欧的情况不同,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即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列宁又以其卓绝的智慧、坚忍的毅力和灵活的策略,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可能。当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时,标志着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问题已经被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的伟大实践所解决。可以说,在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布尔什维克及其后的苏联共产党以其付出的极大牺牲不断地突破和拓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在证明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一般道路发展铁律的同时,又刻意地表现出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当这种特殊性与俄罗斯民族固有的民族心理融合在一起之时,其所发生的化合作用对“胜利式话语”的形成又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雄踞欧亚大陆的俄国,一头在欧洲,一头在亚洲,复杂而独特的政治地理环境培育和养成了俄罗斯独特的民族心理,即俄

国的独一无二性和救世主情结。这种民族心理的独特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性的启示下，又不断得到强化和加持，进一步为其民族心理、政治心理带上了神性的光环。于是，展现苏联共产党和人民战胜困难、勇于胜利的革命浪漫主义情结自然而然地弥漫充斥于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中。“胜利式话语”自然而然地成为既是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的功能需要，又是普通党员和民众坚信真理、坚持胜利的集体无意识的集中表现。

三是从内外环境方面来讲，偏爱于压迫式自我证明。苏联共产党之所以长久坚持意识形态宣传的“胜利式话语”，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为了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敌视，需要强化苏联社会在思想上、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防御能力。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两个方面给予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致命打击：一是宣告了在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压榨下，全世界所有被压迫者都拥有革命这一神圣权利；二是宣告了在资本主义道路之外的人类社会有了新的选择，社会主义成为人类走向公正幸福的发展新路。可以说，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代表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成功，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所昭示的社会主义真理第一次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资本主义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双重影响，即资本主义是作为落后腐朽的事物而终将被社会主义新事物所取代。正是这种灵魂深处的恐慌，使资本主义国家为此采取了全面扼杀的措施，它们不仅加紧对苏联的封锁包围，企图以此摧垮苏联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更通过精神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全方面全方位的立体宣传渗透，企图摧毁苏联共产党和社会大众的共产主义信仰，“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了抵制和对抗这种敌视带来的强烈压迫感，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的构筑和宣传上，不得不通过一系列对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持续长久的宣扬，来证明苏共领导的正确性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真理性。在这场争夺人心的“冷战”中，敌我之间的角色定位、政治认同和阵营归属更加明晰确定、内在冲突更加张扬凸显。得益于苏联社会的高度封闭和作为超级大国的民族情感，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经过各种组织渠道得以持续顺利地强化着苏联社会的政治认同心理。简单明了、朗朗上口的“胜利式”口号和标语就成为塑造意识形态的工具。

四是从政治结构方面来讲，偏向于实践性平衡。一定的话语体系总是一定社会精神和实践的产物，是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可以说，社会结构通过制度性设计安排塑造了适应这一社会结构的话语体系。而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则通过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及其日常话语表达的叙事内容、语汇重点、先后顺序和语气强弱等，不断强化对社会大众的心理规训和语言服从，以使其适应并顺从于社会的结构性强制安排。“胜利式话语”在本质上反映了苏联共产党对群众型社会的管理理念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管理手段。高度板结而又易于组织的群众型社会是苏联社会的总体状态和基本特征。形成并确立起群众型社会的原因，既有国家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因素，也有执政的苏联共产党这一关键性因素。苏联虽然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联盟国家而存在，但是在实际的国家政治结构中它奉行的则是莫斯科与各共和国之间的中央集权制。莫斯科是国家政治的权力中心和组织枢纽。通过莫斯科的指挥协调，各加盟共和国获得来自莫斯科的直接指令，用于指导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又是通过莫斯科的统筹和协调，使其在经济布局、资源分配、文化发展等方面与其他共和国发生横向联系。在名义上，各加盟共和国虽然拥有可以通过民族自决来决定是否退出联盟的法律权利，但是这一自决权利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通过法律程序产生的投票结果，更主要的决定因素取决于民族自决的意志是不是符合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根本意志。而这一判断的解释权则属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作为统一组织存在的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得以在政治上存在发展的组织保证。即使在党内人士对民族自决权提出疑问的时候，斯大林仍然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正是对党的充分信任，斯大林认为只要苏联共产党保持团结统一，苏联这个联盟体就会保存。而要在宪法法律与阶级革命之间维持这种政治平衡，就需要发挥意识形态这一社会“黏合剂”的作用。“胜利式话语”的作用就在于它通过不断地渲染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成就，以此证明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正确性，借以平衡和弥补革命与法律的缝隙，使国家政治制度在实践中得以顺畅运行。

五是从理论发展方面来讲，习惯于党的一元化认知。“胜利式话语”作为一种具有深刻历史决定论内涵的革命语言，要求在话语风格上表现出极

其强烈的真理的客观性、必然性与苏共理论认知的预见性、正确性。这种话语风格的产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作为肩负着解放全人类使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苏联共产党——是人类社会真理的掌握者和历史任务的承担者，只有苏联共产党才能完成开辟人类发展新路径的神圣使命。“对相当大的一批群众看来，是对大多数群众来说，苏维埃制度是‘伟大和光荣的’人民革命的产物。成千成百万人相信革命所宣告的理想，认为苏维埃社会在原则上是公正的，他们真诚地相信，它比其他的‘资产阶级’社会要好（也是那种宣传的结果），他们对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确是伟大和崇高的思想）长期抱有希望和信心。我们从学校开始所接受的就是这样的，从苏维埃文学作品中读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从已成为最群众性的电影中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苏维埃生活中一定的现实也加强了这些希望和信心。”<sup>①</sup>另一方面，从苏联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胜利式话语”又是与苏联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现实政治高度适应、高度融合。十月革命特别是斯大林上台执政以后，不断加强党内和苏联社会的一元式高压统治，对于不同的社会政治意见往往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组织化清理，最终酿成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殃及全党全国的大清洗运动，对苏联社会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作为苏共意识形态表达的“胜利式话语”就是以不断的胜利宣告着苏联共产党的真理性和唯一性。一开始就把“真理性”当作既定的东西，这是极其有害的。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这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宗教裁判所的功能，变成了以斗争和统治的目的而进行集体心理动员的工具。<sup>②</sup>党的意志逐渐成为社会的唯一意志，党的声音逐渐成了社会的唯一声音。整个社会开始服从于党的一个意志、习惯于听一个声音。正如列宁所言：“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提出——像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

①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30 页。

②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 年，第 59 页。

党。这个党还在 1905 年革命以前就取得了这种地位。这个党在 1905 年领导了工人群众，从那时起，在 1905 年以后的反动时期内，即当工人运动在斯托雷平杜马的条件下历尽艰辛恢复起来的时候，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sup>①</sup>

### (三)“胜利式话语”的失败

“胜利式”话语既是苏共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同时又对苏共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政治生活中，“胜利式话语”的刚性论断及其对其他社会认知的排斥性，使苏共的意识形态发展越来越演变成为一种违背常识的自说自话。在苏共意识形态“胜利式”话语的描述下，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目标总是能够实现的、人民的生活是更加幸福的。“胜利式”话语成功地吹起一个巨大无比的气泡。但是在内外压力都无法继续维持时，气泡破裂所带来的幻灭与失败，无疑成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路上不断转向的思想渊源所在。“随着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这种脱离大众的具体日常生活现实而灌输的思想和观点的设想被证明是无力的。”<sup>②</sup>具体来说，以“胜利式话语”为典型特征的苏共意识形态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难以应对”：

首先，意识形态发展的不断僵化难以应对开放社会多元意见的挑战。“胜利式话语”是苏联高度封闭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必然产物。这种高度封闭社会的形成是苏联与西方强国进行国际政治角力的结果。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敌视，苏维埃政权长期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和意识形态渗透，为了维护和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意识形态为铁幕，隔断苏联社会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就成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同时，高度封闭的社会也是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整体特征的表现。在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必须集中全国的资源和力量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

<sup>①</sup> [俄]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7月），《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25～126页。

<sup>②</sup> [法]阿芒·马拉特：《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

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根据这一任务需求,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系就被迅速建立起来并不断得到扩大,对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的管理和控制更是细致严密。作为政府部门的苏联部长会议成立了几十个部委负责具体方向的工作实施和计划指导,以至于一个工厂要生产多少产品都需要得到莫斯科的同意。根据苏联的政治要求,苏共内部也成立了与之相应的部门以加强党对政府和社会的全面领导。党成为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作为这一中心的精神体现,“胜利式话语”就成为苏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必然选择。正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对语言的政治作用所作的理解:极权政体统治的基础在于创造一种特殊语言,这种“新语言”的诞生只是为了禁止一切具有潜在颠覆性的观念。<sup>①</sup> 在苏联共产党的理解中,既然党是社会的中心,又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那么这也就证明了党对社会主义理解是正确的。在这一认识的驱动下,苏共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对列宁主义旗帜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证明、自我解释、自我正确。“绕圈子”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发展的一大怪现象。但是斯大林式的高压集权社会毕竟不能长久存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在工业化建设不断取得物质进步的同时,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也逐渐培养出了独立思考的社会能力。在赫鲁晓夫改革“解冻”的触动下,苏联社会开始了对党的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反思。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成为赫鲁晓夫以后苏联历届领导人高度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不管是压制打击还是驱逐出国,党的一元化意识形态统治已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受到挑战。正如马特洛克所言:“开放边境、信息自由流动和建立民主制度等,会使苏联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但任何着手改革的苏联领导人很可能认为,该制度能够适应更为开放的环境,以提高生产效率。因而我们不应据此认为苏联领导人仍然拒绝揭开铁幕及保障一定的人权。这种改革一旦开始进行,如果不出现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它将发展出自我激励机制,难以逆转。因此,即

<sup>①</sup> [法]弗雷德里克·巴尔比耶、卡特琳娜·贝尔托·拉维尼尔:《从狄德罗到因特网:法国传媒史》,施婉丽、徐艳、俞佳乐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使这不是其统治者的意愿,苏联终将发生变化。”<sup>①</sup>当戈尔巴乔夫亲自给持政见异议者——萨哈罗夫院士打电话时,就已经表明:苏联共产党必须做好与民主化、公开性旗号下唤醒的社会力量对话的准备。但是改革的历程却让人大吃一惊:思想僵化的苏联共产党根本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多元社会。在各种政治力量纷纷涌现的情况下,苏联共产党不仅掌握不了政治斗争的策略,更是丧失了斗争的政治信念。思想僵化混乱而又束手无策的苏联共产党在内外交攻中一步一步地走向瓦解和消亡。

其次,意识形态发展的不断虚夸难以应对苏联社会心理挫折的挑战。从政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讲,意识形态主要发挥着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满足政党组织动员民众的精神需求。“意识形态通常被认为是构建和重建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而个人意识和这一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意识形态研究乃是考察社会结构中的统治权的中心课题。因为它被认为是统治结构产生和长期存在的方式。评判统治结构的方法之一便是带着批判的眼光考察作为其基础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因为统治结构有赖于对人的意识的支配而存在。……从这一角度看,意识形态主要通过现实的符号结构起作用。而语言就像‘牢房’一样地铸造个人意识。”<sup>②</sup>苏联共产党的“胜利式话语”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通过一系列的话语解读,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在严密的制度设计中形塑着苏联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发挥的第二个作用则是提供政党组织动员民众的动员手段。从动员手段来看,简单明了的“胜利式话语”,可以迅速掀起民众的集体心理,从而凝聚社会力量,通过完成一个又一个重大任务,以显示苏共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成就,巩固和增加党的威望。但是苏共在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过分注重民众对意识形态的工具性需求,而忽视了民众对意识形态的精神性需求。十月革命既使俄国成了“一个立场颠覆现行国际体系的国家”,又使俄国成为一个与传统割裂的新型国家。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政治重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sup>②</sup> [美]丹尼斯·K.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陈德民、陶庆、薛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苏联民众精神需求的制度性规定。但是在苏共“胜利式话语”之下,本来应该与普通民众保持血肉联系的精神需求,却不断地被人为哄高。苏联民众的社会生活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灌输,生生地被分割为“宣传生活”与“现实生活”。然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归结为方案与实行之间的关系。前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一种生命物质的基础上产生,是按照这种独特现象的独特规律产生和形成的;而后者则是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在另一种生命物质的基础上产生的,不是在西方文明的中心,而是在其边缘,是依据客观社会规律产生和形成的,与意识形态规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最初的矛盾就源于这种不一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矛盾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原因之一”<sup>①</sup>。在高压封闭的社会环境下,苏联民众的思想意识在“胜利式话语”的强制下,已经习惯于经过意识形态重新解读诠释的社会生活。但是封闭的社会在经过赫鲁晓夫的“解冻”松绑后,苏联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渐增多。同时,随着电视广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苏联内外部生活的见闻与思考也开始突破地方限制。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的年代,苏联社会更为深入的对外开放更是加剧了苏联民众对生活的自我认知、自我理解。由此导致苏共意识形态满足民众精神诉求的功能不断退化,最终只能是“自说自话”,成为见之于材料上的“辉煌成就”。而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不断加深,在对国外的了解、认知和比较下,整个苏联社会遭受了严重的心理挫折。“苏维埃政权没有能够回答诞生和成长于大城市条件下的几代青年人的,尽管还没有被意识到,但却是活生生的需求,以致它简直就是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不幸的失落的大众。”<sup>②</sup>被宣称为已经过上了发达社会主义(原来宣称为共产主义)生活的苏联人民突然发现,原来我们真的是生活在“胜利式话语”营造的幻象之中!以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瑞典访问的时候,不禁感叹: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苏共的意识形态无法满足社会的精神和心理需求时,

<sup>①</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页。

<sup>②</sup> [俄]谢·卡拉一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26页。

“胜利式话语”构建的庞大语言符号体系轰然倒塌。

最后,意识形态“犬儒化”发展难以应对从革命到治理转型的挑战。“胜利式话语”作为苏联共产党对社会进行革命治理的意识形态工具,是与苏联群众型社会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群众型社会管理的最典型特征就是社会动员的组织化、情绪化。通过分布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党、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触角,整个社会被分类吸纳进精心设计的各种组织机制之中。在中央集权的垂直管理体制下,苏联共产党可以通过启动这一组织机制,在情绪化的革命氛围营造中迅速动员社会。在政治实践中,社会动员的有效性取决于适当的组织体系。对于苏联共产党来说,出于管理庞大国家的现实需要,按照科层管理要求建立一整套官僚体制成为必需。尽管列宁曾经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认为“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sup>①</sup>。但是严密的科层官僚体制一旦建立并在政治生活中按照其内在的运行逻辑发挥作用后,其自身内涵的等级化、程序化和仪式化等组织要求和精神状态就与党的革命化、群众性的社会治理要求发生抵牾。内在的精神张力在无法得到有效的社会纾缓的时候,一种遵从官僚体制程序规则的意识形态变体——犬儒主义——开始弥漫于整个苏联体制内外。犬儒主义实质上“标志着一种敌对文化价值的精神,一种不仅驳难而且蔑视由世界所提供的世界观的倾向,一种在传统意义上偏爱象征姿态修辞胜于规范讨论的异化感;这种异化感不仅厌恶病态状况,而且还拒绝返身自顾,其基础恰恰就在于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不值得被严肃地给予尊重”<sup>②</sup>。犬儒主义精神的散播与受到隐秘的尊奉,恰恰就是苏联政治建制和政治实践本身出现了危机的症候。“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共产党的信徒中不再有激励作用;在私下里,几乎没有什么人隐藏对此的轻蔑。甚至那些管理这种政治制度的人,也开始怀疑它究竟能在现在有形下

<sup>①</sup> [俄]列宁:“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1904年2—5月),《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63页。

<sup>②</sup> [英]提摩太·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胡继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8页。

维持多久。”<sup>①</sup>当苏联共产党高扬的意识形态宣言从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完善社会主义一步一步退却而又无法提供新的社会思想资源时,体制性的犬儒主义精神刺激并涵养了整个苏联社会的精神状态。在苏联,“人们不满这个体制,并以各种形式表现他们的退缩:犬儒主义,工作场所的偷鸡摸狗、浑水摸鱼,自杀及广泛的酗酒等。由于斯大林式的恐怖主义早已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有选择性且有限制的压迫,意识形态的教化顶多只是一种官僚的仪式,而不是真正的审查。所以一旦勃列日涅夫的长期统治建立起一种常态和烦闷的生活形式之后,人们就学会如何对付这种体制,过自己的生活,尽量利用它,敬国家而远之”<sup>②</sup>。

## 五、消极的大众:沉默的大多数

1987年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后,戈尔巴乔夫开始了改革的新阶段——将民主原则推广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许多人认为,重要的不是工作,不是追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争取个人和社会的自由。“公开性使人感到兴奋,可以大声说出多年来积压在心底的话,可以指责任何人,包括以前不敢指责的那些人。没过多久,人们几乎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这种无限的民主化就连西方有关专家都感到吃惊。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其充分的条件,党放开手脚搞无限的公开性,无限制地批评自己过去和现在的错误。然而公开性常常被扭曲,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是因为舆论部门经常发表严重失实的消息,甚至故意进行歪曲。”<sup>③</sup>刚刚从旧的体制下“解放”出来的人民,在经过短暂的“思想狂欢”后却突然发现:无论是改革的“设计师”——戈尔巴乔夫,还是改革的“施工队”——激进民主派许下的美好诺言都没有实现。但是他们所说的话又是那么的“动听”。怎么办呢?人民无所适从了。博尔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87页。

<sup>②</sup> [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黄慧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83页。

金指出：“在前六年的时间里受改革派和激进派的愚弄，他们陷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他们简直就不能判断，从他们的利益的角度来看，真理究竟在哪一边。这一沉默的大多数永远都是消极的大众，驯服地执行领导人的命令，或者如此冷漠地无视这些命令。”<sup>①</sup>然而这一沉默的大多数所构成的社会根基和情绪，对改革中的苏联共产党及其体制命运来说却是致命的。“不满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很可能是困苦程度勉强可忍受的时候；是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以致一种理想状态看似伸手可及的时候。悲愤会在它几乎得到补偿的时候最为蚀骨……由此可以推知，在苏联人民没有尝到过一点美好生活的滋味以前，苏联是不太可能爆发民众起义的。对苏联政权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将会是国家经济已有相当改善而极权统治因为某种缘故稍见松动之时。”<sup>②</sup>

### (一)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 人民需要改革吗？

戈尔巴乔夫回答：需要！因为改革是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深刻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业已成熟的必要性。这个社会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变革的地步，可以说，变革是这个社会历尽磨难才达到的。而推迟改革在不久的将来就可能导致国内形势的尖锐化，直率地说，国内形势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我们产生改革的思想，不仅是受实用的利益和想法的影响，而且是出于良心不安的召唤，是由于从革命那里继承下来的永不衰竭的思想的影响，是由于理论探索的结果，这种理论探索加深了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坚定了采取行动的愿望。”<sup>③</sup>

#### 人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

戈尔巴乔夫回答：权利！民主的权利！在 1986 年 10 月 27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必须“力求正确解决每一个与为苏联人民服务有关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远非阔绰，还不富裕。是的，我们解决

<sup>①</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 75 页。

<sup>②</sup> [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53 页。

<sup>③</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 年，第 21 页。

了涉及人的社会地位的主要问题。我们给了人民劳动权、受教育权、居住权、保健权(尽管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以及基本生存权——能在和平中生活的权利。这是我们给予人民的最主要的东西。但是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还很落后。新的任务,加速和改革的任务,使所有这些问题更加尖锐地摆在我面前,产生了不少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问题”<sup>①</sup>。

改革在持续进行,戈尔巴乔夫许诺的民主权利在“公开性”“民主化”运动中,人民也已经慢慢地得到以前从未想过的属于自己的权利。但是生活却变得越来越糟糕,社会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1989年美国《时代》周刊在苏联就改革等问题对1000多名莫斯科居民的民意测验表明:“关于苏联改革开始后的三年中物质生活的变化”,认为有改善者占23%,认为恶化者占25%,认为无变化者占47%,认为难以回答者占5%。<sup>②</sup>在俄罗斯社会,在整个苏联,在各个共和国之间,分裂路线相互繁殖,斗争和争论愈演愈烈。甚至连党的出版物都宣称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改革不只是失败的问题,而是彻底的失败。“国家在滑坡之中,政权无能为力”;“商店里空荡荡的货架”;“犯罪猖獗,失业严重”;“民族冲突导致流血”;“街上行人愁眉不展的表情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我们社会的昏暗处境和危机”;“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出现危机,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遭到侵蚀”——《年青共产党员》杂志在1990年底就是这样描绘国家形势的。国内几乎所有地方对肉、糖、油、米,甚至牛奶都实行凭票额供应体制。肉类罐头、香肠、便宜的糖果和葵花油,在商店里早已脱销。从1990年秋天开始,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也实行每周食品定额。“对于很多观察家来说,这样急剧下降实在令人费解。”<sup>③</sup>

“费解”的是人民,但却不是戈尔巴乔夫。他明白地告诉人民,生活之所以变得这样糟糕,是因为党内有阻力,是他们的守旧思想阻碍了改革的前进的步伐。在1986年10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给出了结论:“在这一方面我们有一些顽固不化的人,他们把经济和投资搞糟糕了——可以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46~547页。

<sup>②</sup> [美]《时代》周刊1989年第15期的民意测验,转引自《参考消息》1989年4月17日。

<sup>③</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页。

说把人民的必需品供应搞瘫了……而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些人甚至不让讲新话,不让讲成绩。我想,我们还会碰到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可怜理论家,而且不止一次碰到。他们把主要心思放在加强党对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sup>①</sup>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今天的生活之所以变坏,就是因为原先的党的领导们——政治局成员“把经济搞糟了”,“把供应搞瘫了”,而且还想做“可怜的理论家”。于是,戈尔巴乔夫告诉人民,生活是美好的,要有耐心,要给他时间。

人民相信了戈尔巴乔夫。但他在干什么呢?否定过去、否定人民的历史!通过连续不断的报刊揭露和学者的精心论证,戈尔巴乔夫试图让人民知道“真相”:现在的糟糕生活是过去的错误导致的。“到1988年,关于效益、增长率、技术进步、质量、生活水平的经济问题和第27次代表大会的其他问题,都转嫁成为勃列日涅夫的问题。社会上充斥着骇人听闻的著作。更糟的是,后来勃列日涅夫的‘错误’又被笼统地等同于苏联的产物。”<sup>②</sup>戈尔巴乔夫劝说人民:要摆脱这种旧体制,必须要从精神上彻底颠覆它。于是,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的大旗挥舞下,改革的“工程师”们一拥而上,“他们不去抓经济增长,而开始搞‘精神’增长”<sup>③</sup>。

人民的生活?自由的空气都有了,还怕没有面包吗?!

## (二)台上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然而人民的不满情绪继续在酝酿着。“1989年是苏联犯了致命错误的一年。”<sup>④</sup>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在国内展开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民主运动。各社会组织和各种富有首创精神的团体都全力投入运动,代表候选人之间常常发生激烈的舌战。每个席位都有几个人竞选。竞选情绪越来越激动。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47页。

<sup>②③</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sup>④</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40页。

“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成功的保障就愈大。如果你谩骂党,你就大可放心,因为你肯定会当选。”<sup>①</sup>结果是这种方法到处被滥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许诺提高生活水平。人们相信这一点,成功也就随之而来。所有的批评言论都说到了人们的心里。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期望很大,但是四年之后他们的希望破灭了,生活困难和混乱现象越来越厉害。人民感到,困难重重,民族关系加剧,犯罪严重,供应恶化,前途一团糟。人们寻求救星,抛弃那些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困难的人。他们可以崇拜那些给他们带来幸福、给祖国带来荣誉的人,把他们当作偶像,但是不能容忍他们使自己的生活状况恶化。

公众的信心随着获得言论自由而一落千丈。集中控制的经济使民族主义获得了滋生的温床。经济改革已经止步不前——或者根本没有认真地做过尝试,摇摇欲坠的经济加剧了不满情绪。而公开的差额选举使这种情绪上的激动和心理上的焦虑通过人民的“代表”得到了肆意的发泄。在1988—1989年间,“感恩知恩的全国上下与改革领头人之间热恋中显露出来的初次异常,并未导致公民经济状况的实际恶化,更未引起国家解体的悲剧性后果,那都是后来的事情。眼下人们开始表现出来的,仅仅限于因为生活迅速得到改善的希望迟迟无法实现而产生的不满情绪。生活当然是‘变得更快活了’,却显然并未变得更好,不过可以希望的东西同原来相比是多得多了。这就足以使许多人感到自己受骗了,感到自己很不幸。新政权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的这种潜在的进展之所以会以愈来愈猛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还因为由于改革者本身的努力,原来‘哑然无声’的社会得到了自我表达的讲台——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舞台、电视屏幕和媒体”<sup>②</sup>。

在这些“自我表达的讲台”上,人们看到:“许多不称职的人,甚至连曾因恶性犯罪、杀人坐牢的罪犯也出现在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中。而那些竞选纲领旨在反苏、反共的空谈家和蛊惑人心者更是数不胜数。在这种条件下本应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22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06~207页。

该广泛进行党的宣传,宣传自己的候选人,揭穿某些人不现实、无根据的许诺”<sup>①</sup>。得到释放的激进派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筹码,“不仅因为他们急于尽快地切断那仍将国家与不久前的极权主义过去联系起来的线索,或者是急于让戈尔巴乔夫本人与之一刀两断。他们那愈来愈高的声音和日益强烈的自尊心迫使他正视他们,主要是因为这种激进主义反映了全国上下的焦急情绪,全国上下开始公开地一再要求改革及其首倡者拿出具体的成果来”<sup>②</sup>。甚至于连共产党自己的候选人也开始竞相攻击以争取选票。“形势发展到共产党候选人互相攻击,这使政治上的对手更容易获得选举权。在集会浪潮中掀起的反共主义,全盘否定历史的狂潮成了所谓‘民主’力量的竞选手段。”<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突然发现,他释放出来的竟然是这样的东西!“大概他只是没有料到,公开性‘在一定阶段上’(他喜欢这样说),会使他所宣布的改革目标(完善社会主义)变成与他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sup>④</sup>原因在哪里呢?“归根结蒂,悲剧并不在于某项计划遭否决或被出卖。而在于,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旧体制越来越威信扫地,越来越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除了空谈,除了一些精明的人在一场比赛没有规则的游戏中迅猛地填补真空外,并没有任何东西来取代这一旧的体制。”<sup>⑤</sup>这时,戈尔巴乔夫开始亲身体验到实际上所有的改革者都无法摆脱的那种厄运的作用:“始于良好的愿望而且顺应公众期望的改革,因为仅仅预言奇迹的出现,却通常都不会带来奇迹,徒然增加了不满者的数量,而且往往使这些人调转头来反对改革者本人。”<sup>⑥</sup>

甚至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发生了决定性变化。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分数”就不是通过报纸调查的相对支持率,而是通过议会中的投票来展示了。从1989年春天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到1990年3月当选苏联总统,仅仅一年的时间,投赞成票的代表的比例由96%下降到

<sup>①③</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sup>②⑥</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

<sup>④</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

<sup>⑤</sup>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59%，而他当选总统本身，最终是靠诸如雅科夫列夫、索布恰克、维·戈利丹斯基院士和德·利哈乔夫院士之类社会名流向代表大会发出激昂慷慨的呼吁来保障的。<sup>①</sup> 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整个社会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持续不断地下降。1989年12月，有52%的被调查者完全赞同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到1990年1月，这个数字降到了44%，5月份是29%，7月份是28%，而10月份只有21%了。到当年年底就降到了20%。1990年年底挑选“年度风云人物”的民意调查显示，32%的被调查者支持叶利钦，只有19%的人选择了戈尔巴乔夫。一年前，支持戈尔巴乔夫为“年度风云人物”的公众有46%，支持叶利钦的只有6%。1991年头几个月，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持续下降——15%、13%、10%。<sup>②</sup> 莫斯科的一家报纸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的知名度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几乎没人听他讲话，他可以机敏，也可以愚蠢，可以好，也可以坏，反正人民对他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他也不寄予任何希望了。”<sup>③</sup>

### (三) 沉默：我们不需要改革

1990年10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信函中写道：“得到苏联人民支持的改革路线，解放了社会复兴的强大力量；实施改革方针，使国家从休眠和停滞中挣脱出来；国际合作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与此同时，行政管理系统遗留下的沉重负担，贯彻经济改革措施的间断和半途而废，经济指导下犯下的错误，以及不尊重客观规律等，共同引发了国家的一场严重经济危机。国民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生产规模降低，经济联系中断，分立主义加强，消费品市场出现空洞，预算赤字和国家支付能力接近临界点，反社会现象和犯罪行为与日俱增，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下降，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国民经济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旧的行政管理体系已经崩溃，而新的市场条件下刺激经济的手段还没有建立起来。现在需要一种建立在社会和谐基础上的、有利于稳定经济形势和加快改革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07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521页。

<sup>③</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进程的、沿着市场经济道路的、充满活力的新举措。”<sup>①</sup>

然而与戈尔巴乔夫充满乐观的讲话不同的是，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正在不断加重。1990年是苏联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没有见到有这个五年计划的任何信息，甚至连国家发展计划和1991年的预算都没有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工作也被推迟。“所有这一切所证明的不仅是改革的失败，而且是改革的崩溃，以及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茫然和不知所措。”<sup>②</sup>苏联检察院和内务部的统计数字显示：1990年“地下经济”总额达到3500亿卢布，仅比当年全国商品零售额低30%。<sup>③</sup>苏联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表明：1991年头几个月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期下降12%，劳动生产率下降11%，工业产品的生产下降8.5%，1991年1—5月，只有酒精制品的生产出现增长，其增长幅度为2%，其余领域均是负增长，对外贸易下降约40%。<sup>④</sup>

甚至用不着看统计数字，只要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发现这种经济危机具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商店空空荡荡，衣服鞋子无影无踪，任何家具都无法买到。巨大而空荡的贸易大厅里，售货员们悠闲踱步；橱窗都用塑料布遮挡，堆满了装着陈旧醋渍黄瓜的罐子。不但出现了购肉、油、糖和其他物品的证券，而且还出现了“顾客卡”——能够证明顾客为该城市居民的贴有照片的证件，以免把商品卖给“外人”——过路人。怨恨的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购买突然就会从商店里消失不见的香烟，购买在反酗酒运动秘密停止之后一直不曾见到的伏特加酒。商店里连香烟、食盐、火柴都脱销了！城市里时而爆发“香烟”“伏特加酒”骚乱。

戈尔巴乔夫一定没有想到，“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受到基层群众的压力、大规模不满情绪的表露或者最不愿看到的自发抗议的混乱状态等的推动，特别是对宣布改革的领导人来说，这样自有其优越之处。“它使执政者有时间制定合理的方案和‘规定剂量’的变革的计划进度表，也可以使人相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页。

<sup>②</sup> 同上，第3页。

<sup>③</sup> 同上，第4页。

<sup>④</sup> 同上，第44页。

信社会可以平衡地从一种聚集态过渡到另一种聚集态(从水变成冰或者推动机械的蒸汽),而不会出现质的飞跃和同过去的决裂。”<sup>①</sup>然而“滴管式改革”的这一切优点,都可能在面临人们的不满和焦急的压力时顷刻之间走向自己的反面。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感受到了。他本人在美国讲了一个关于自己的笑话。人们排成巨龙一般的长队等候进入商店买伏特加酒。一个男子由于长时间等待而感到精疲力竭,声称马上要去宰掉搞成这个样子的戈尔巴乔夫。但是他很快就回来了。前后左右排队的人问他是否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意愿时,这位男子叹息道:“那里排队想杀掉戈尔巴乔夫的人比排队买伏特加酒的人还多呢!”笑话归笑话,但是居民对“改革时代的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的绝对无效的愤恨,如同他们对“苏共内部的改革派”的愤恨一样,已成为一种政治因素。<sup>②</sup>

### 为什么改革会变成这样?

它没有带给人民实实在在的美好生活,却实实在在地摧毁了人民已有的幸福根基。“人们当初那种相信新领袖上台会产生奇迹的乐观看法开始消失,开始出现抱怨和不满情绪。”<sup>③</sup>1991年1月1日,日本《每日新闻》公布了对4000名苏联人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其中,苏联国民对经济改革的看法悲观,认为“会取得成功”者只有29%,比一年前调查结果(46%)大幅度减少。政府的支持率只有13%,不支持率为73%。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的人仅占13%,不满意的人高达81%。<sup>④</sup>

### 人民开始疑惑了,他们不禁问道:改革到底是什么?

科伊乔·佩特罗夫根据自己的观察分析给出了答案:怪事中之最怪者仍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就是用它得以颠覆了共产主义。什么是“改革”?直到今天,戈尔巴乔夫先生也未能给予理论上的解释……最初,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前后,“改革”一词是以改革的一般含义被理解和接受的,而且是20世纪60—70年代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型的改革含义。甚至更晚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36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55页。

<sup>④</sup> [日]《每日新闻》1991年1月1日报道,转引自《参考消息》1991年1月3日。

一些时候，在代表大会后的几年里，苏联领导人和普通老百姓仍然把“改革”理解为一般的改革。它们根本不注意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演讲和手势中寻找突然效果的天生爱好。这个词随便就落在总书记的由助手、工作班子或领导机构写成的报告和演讲里了。这位头号人物的任务就是把写好的东西照读一遍或者转述一遍，戈尔巴乔夫最喜欢转述。在国内，在全世界，那个老掉牙的智谋仍然占上风：在政治里没有堂·吉诃德精神的地位。政治领袖的怪异表现，多半是做给媒体和好奇的记者看的。苏联的一个领袖应该是苏维埃的领袖，不论他继承了谁，谁是他的靠山，勃列日涅夫也好，安德罗波夫也好，契尔年科也好。这正是全部秘密：“改革”为什么畅通无阻。“苏联人民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人走进自己的家园并让他毁灭这个家园，使他们失去了现在和未来。当我们看到普通的劳动人民和领导人像过去一样努力工作，而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为反对自己、反对自己的儿女、反对自己的家庭而工作，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毁坏有 70 年历史的大厦的时候，一点也不奇怪或者可笑。他们只知道一点：他们正在为完成党和国家的纲领而工作。对于他们来说，谁是头号人物和他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sup>①</sup>

于是，在习惯性依赖心理下，人们“善意对待党的新领导人的全国民众期待着某种业绩，就像前来观看魔术表演的观众一样地期待出现奇迹。而且是马上出现！”<sup>②</sup>戈尔巴乔夫以“人民”的崇高名义，却在不断地毁坏着人民的生活。利加乔夫愤怒地指出：“从大政治中隐退的那些民主派们留下的一大堆谎言。如果不把奢侈的豪宅作为上层富人的战利品，他们等于没建设任何新的东西。‘改革’是为极少数人进行的，而大多数人民变得贫困，生活得越来越差。”<sup>③</sup>局势也变得越来越糟糕，人们开始憎恨地谈论改革。大家都明白，这是一条通往绝境的路。犯罪、贫穷、艰难、痛苦，纷纷落在了普通老百姓的头上。那些变得一贫如洗的人们，起初是几个人，然后是一部分，最后就是整个阶层都开始醒悟了。在集会上，他们激愤地提出各种要求：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42~43 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03 页。

<sup>③</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361 页。

“还我们低价的幼儿园！供孩子们休息的夏令营哪儿去了？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哪儿去了？低价的住房、公交、铁路和空运哪儿去了？”<sup>①</sup>俄罗斯报纸刊载了这样一幅西方讽刺画：苏联的大型百货商店里什么商品都没有，只在靠近墙角的货架上摆着一个个头矮小的戈尔巴乔夫，他手中抱着一个标牌，上面写着一个单词——“改革”。<sup>②</sup>

---

①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24页。

②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 第四章 “没有现成的药方” ——改革的方法策略

戈尔巴乔夫有没有改革的整体方案呢？

批评者说：改革的倡议者缺乏改革的“明确计划”。没有一个综合方案和总体计划就开始改革是不负责任的：“不能不带地图和航路图就出发远航，何况是承担了对于全国的责任。”原内务部部长和总统委员会成员巴卡京就断定：“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行动方案。随波逐流。他不是邓小平，是个同我们一样的人。”<sup>①</sup>面对批评和指责，戈尔巴乔夫有一个辩解的总方针：“从1984年12月起，我的观点是：让尽量多的人什么都知道并且参与作出与他们有关的决定。这就是我对列宁‘群众的生动创造’表述的贡献。计划得面面俱到，安排得井井有条，全是瞎掰。照样一无所获。任务是由政治历史过程决定的。选好方向，目标，对。这是政治家的任务。”<sup>②</sup>在戈尔巴乔夫看来，那些奢望制定改革方案的人，他们的身上仍然带有强烈的旧思维烙印，反映了几十年来形成的对生活要有一套包罗万象的规定的习惯。戈尔巴乔夫宣称：“我们选择了另一种态度：将本着列宁主义精神，列宁主义传统办事。”<sup>③</sup>然而无论戈尔巴乔夫怎样以列宁的名字发誓，实际上他的上帝不是列宁，而是过程。他认为，改革的历程表明：在对社会发展的基础进行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时期，要想提出某种事先就设计好的“模式”或变革的精确的时间表，不仅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但这不等于说不存在改革的明确目标、改革的构想和改革的基本方向。这一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64页。

② 同上，第264~265页。

③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53页。

切是改革都有的：“这就是社会生活的深刻民主化，对社会和政治选择的自由的保证。这些目标曾宣告过，而且不止一次地加以确认过。这并不是不要求，而是要求必需在事情发展过程中变换每个阶段的具体方针，经常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sup>①</sup>

面对越转越快的改革飞轮，戈尔巴乔夫坦言：“我们没有‘现成的药方’。”<sup>②</sup>

## 一、“对纪律的强调”：沿袭过去的传统做法

1985年4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表示要忠于列宁，信守社会主义理想，肯定了1983年安德罗波夫时代以来国家发展的成就。同时，也表示要继承安德罗波夫时代确定的国家发展战略——“加速”战略，并决心采用安德罗波夫的办法——整顿纪律、重塑秩序。戈尔巴乔夫的这一选择，既是对安德罗波夫政治路线的尊重和继承，也表明了在他发起改革的时候，苏联社会对党的总书记传统做法的承认与顺从。“注明改革的时间在共产党中已成惯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于1985年4月，他当选为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那次会议以‘四月全会’而著称。实际上，这次会议批准的计划并不是最终为世界所了解的那个改革计划，即政治和经济的根本改革计划，而是一个十分有限的计划。它应更准确地称为‘安德罗波夫宣言’，因为它基本上是在他的鼓动下写出来的。”<sup>③</sup>

### (一) “新阶级”：行政命令体制

戈尔巴乔夫最初采用的口号是“加速”——换句话说，“就是加快现在已存在的趋势。只要有更严密的纪律、更严格的管理、更少的腐败、更多的节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sup>②</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76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制和对传统管理方法的某些调整,就能够达到这一目标”<sup>①</sup>。通过加强纪律整顿来刺激人民的工作积极性,并因此而促进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做法,既是由苏联体制自上而下的内在特性决定的,也是由组织管理方式决定的,更是与由这种体制所塑造的政治心理息息相关。

从苏联体制的特性来讲,这首先是其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体现。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指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上而下地组织社会的一种手段。在这种将人们联合为一个整体的组织类型下,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的体制,而不是别的因素——其中也包括非经济因素。权力和管理体系的结构的形成,构成了整个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俄罗斯的封建阶级是由国家的服役者形成的,他们因了自己的服役而得到土地和人作为报酬(当时的土地和人较为充足)。而在1917年革命之前,因服役而得到贵族称号的国家官员数目,超过了世袭贵族的数目。共产主义社会在俄罗斯产生,并非普遍的社会演变规律的一个偶然例外,而是惊人地符合这一规律。”<sup>②</sup>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形成的斗争方式在国家政权组织上的延伸和扩大。“对政权的垄断是建立在对国家财产的垄断的基础上的。集体农庄的合作所有制事实上也已国有化。农民和合作社员没有地方和中央机关的许可正是寸步难移……苏联形成的这种制度的根基就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是在特殊条件下,在地下,在经常遭受沙皇政权迫害的条件下形成的。当时这不仅决定了它的适应于地下条件的组织结构,而且也决定了它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在革命和内战时期,它们都显示出了自己的有效性。而在和平时期也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sup>③</sup>对纪律的强调,不仅是共产主义的政治信念,也是其施行这一宏伟信念的组织要求。

从组织管理的方式来讲,革命后的俄国社会迅速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等级管理体制,并因此而产生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管理阶层——“新阶级”。密洛凡·吉拉斯深刻分析了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的特性。他指出:“这个新阶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sup>②</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级,这一群官僚,说得更准确点,这一群政治官僚,不只具有此前一切阶级所共有的特质,还具有一些它独有的新的特质”,“它取得政权并不是为了去完成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它自己的经济秩序,因此,它必须建立其控制社会的权力”。这种权力就是“必须信念一致和有铁的纪律。”<sup>①</sup> 1917年以后,“新阶级”主要载体的机关作为庞大国有资产的管理工具应运而生。革命的成功使得“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的思想开始变为现实。在苏维埃实践中,“这意味着土地、工厂、商店、银行、报纸、大学、铁路和森林成了‘全民财产’,成为由上级任命的、带有很明显的阶层、等级特征的党政官员管理的国有资产”<sup>②</sup>。

从政治心理的特征来讲,体制所塑造的制度性服从与俄国社会的民族特性有机结合起来。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主义之所以能够取胜,“其中一点,即关于沙俄发展的特点及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落后,人们都讲到了。但是这种落后性也决定了人民对接受真正的民主理想的准备不足。在群众的意识中,‘好沙皇’、永远正确的无所不知的领导人等老观念根深蒂固。这些老观念,顺便说,在斯大林主义时期被广泛加以利用,成了它的心理基础”<sup>③</sup>。在这种行政命令体制下,人民可以迅速地领悟到,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法律和条例对他们并没有根本的重要性。有关政府和人民间的关系的实际和不成文的规则反而重要。不管法律怎么说,每一个人都知道,政府是在党委员会和秘密警察手中。虽然并没有明文规定党的‘指导作用’,但党的权威则及于一切组织和地区。没有一条法律曾规定秘密警察有权控制人民,但是警察拥有一切大权。没有一条法律规定司法官和检察官应该受秘密警察和党委员会的控制,但他们事实上是受控制的。绝大多数人民都知道这一事实。任何人都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以及某些事由谁来决定,另一些事又由谁决定。人民只是适应环境和实际情况,一

<sup>①</sup> [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5月内部出版,第49~50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97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切重要事务唯党会议或由党控制下的机构的马首是瞻。”<sup>①</sup>

于是，“戈尔巴乔夫可以乐意将训练有素的党的机关的绝对忠诚和居民的坐享其成综合征，即苏联社会有机的无独立性，当成对他和他的计划一致支持的表示。而且，在那种条件下，他不得不利用这种落后状态，以便依靠有保障的惟命是从，在国家实际生活中施行最多的改革新政。可见，真实平民社会的不成熟是对他有利的”<sup>②</sup>。在改革之初，由于对社会主义及其“成就”和潜力估计过高，用惯常的威权主义方式提出社会发展任务，因而期望定得过高。“正是在这种心理环境中才有可能产生其基本原理都是空想的而从历史角度看又是不能避免的加速战略。”<sup>③</sup>

## (二) 纪律与道德：反酗酒运动

作为加强纪律的整肃，戈尔巴乔夫首先要做就是继续安德罗波夫时期提出的反酗酒运动。

酗酒早已成为一种痼疾，一种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痼疾。酗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根源、社会生活条件、生活放纵、缺乏与这一痼疾作斗争的意志和其他许多原因。所以问题并不在于酒类的生产总量。但是戈尔巴乔夫决心已下。上任伊始他就在工作日记中写道：“1985年3月27日。1. 质量，2. 反酗酒，3. 低收入居民……”1985年4月4—6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就“与酗酒和酒癖作斗争”问题的讨论时，戈尔巴乔夫坚持加强与酗酒作斗争，指出了酗酒的社会和生产遗传后果，提出要采取强硬措施加以整顿。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受到与会的苏联计划委员会、商业部、加工工业的领导和一些农业专家的质疑。他们极力坚持自己对“酒”的态度。他们说，这样一来国家在预算方面要损失几百亿卢布，葡萄种植园也会遭受损失，许多葡萄酒厂的机器设备将要报废。但是“要唤起那些自认为在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人的理智是不可能的，当时那些聪明之士提出了那么多理由和意见，

<sup>①</sup> [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5月内部出版，第91~92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69页。

<sup>③</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10页。

再争论下去是没有意义的，主张逐步降低酒类产量的人自然被斥责为保守派，说他们故意教唆人民喝酒。这是一场颇为激烈的斗争，不过政治局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sup>①</sup>。在国家计委副主席试图证明限制酒类销售会冲击预算，无法弥补 50 亿卢布的“伏特加酒钱”时，戈尔巴乔夫怒气冲冲地反驳道：“你打算坐着伏特加进入共产主义！”<sup>②</sup>

于是，禁酒运动在社会范围内展开。减产的不光是白酒，还有白兰地、干葡萄酒、香槟酒。进口酒类的数量也急剧减少，这使得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酿酒业面临经济破产的危险。运动高潮时甚至连酸牛奶也差点遭禁，因为怀疑它也是酒精饮料！“所有这一切即使不是有害和危险的，也是可笑的。”<sup>③</sup>在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国家管理法律体系之前，“唯意志论就始终是现实危险，它会带来一切可能的恶果”<sup>④</sup>。

首先，国家财政受到严重削弱。反酗酒运动的一个结果，是政府减少了数百亿卢布的税收，并第一次出现了巨额预算赤字。雷日科夫估计，从 1986—1988 年的 3 年时间，国家税收减少了 670 亿卢布，按照当时的官方兑换率为 1000 亿美元。<sup>⑤</sup>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人们试图放慢一下解决问题的速度，至少遵守决定中规定的数字，然而这件事主要由党的监察委员会管，他们的态度是坚决的。“不过应当说一句，当大家肩并肩坐在政治局会议里时，都慷慨激昂地主张根治酒害，而当我私下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个别交谈时，他们却一个劲地咒骂那些决定，反对降低酒类生产的速度，据我所知，他们自己的嗜好都没有改变。”<sup>⑥</sup>

其次，社会犯罪现象急剧滋生。对伏特加的需求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机会，该政策导致了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突然增长。与美国的禁酒时期相类似，当然是出于良好意图的改革者反酗酒即兴之作，尚在俄国的“芝加哥男孩”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132 页。

<sup>②③</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509 页。

<sup>④</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290 页。

<sup>⑤</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63 页。

<sup>⑥</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133 页。

出现之前,就生出了苏联的“芝加哥黑手党”。往后除了酒类黑手党之外,又新增了石油黑手党、铝业黑手党、银行黑手党等“弟兄”。紧跟他们之后,“政治黑手党也理所当然地出现了”<sup>①</sup>。

再次,损害了人民的改革热情。就负面影响来看,这场运动在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后果也不小。让人不禁想起一句俄罗斯谚语:“你强迫傻瓜祷告上帝,他会把脑袋磕破。”酗酒如同在全世界不受欢迎一样,在俄罗斯也从未有过好名声。正常的劳动道德谴责工作时间酗酒。但是饮酒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婚礼、丧礼和重大节日必不可少的标志。不能用自己的钱购买没有被禁的(!)伏特加,全国所有成年人处于被控犯有酗酒罪的状态,只会使行为能力被限制者火冒三丈。在整个城市或大城区的两三个商店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成千上万的人用生动、“慷慨激昂的语言”数落禁酒运动的始作俑者米·谢·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战友。可是对投机的酒商来说,有了大有作为的机会。不管白天还是夜间,只要付出两倍的价钱,任何时候都能从出租车司机手中买到酒。“官方反酗酒斗争的愚蠢在于,它使国内切实可行的不饮酒运动告吹。”<sup>②</sup>

最后,戈尔巴乔夫的声望受损。如此轻率地作出的决定给国家的经济和领导人的威信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人民不理解也不接受这些仓促采取的措施。许多人后来认为,禁酒令是改革计划中唯一实现的决定。“但这种看法不对,这项决定并未贯彻到底。中央委员会收到数千封愤怒的来信,那些当初呼吁同酗酒作斗争以挽救自己濒临离散的家庭、使丈夫和孩子免受病痛折磨的妇女们,这时却请求增加白酒销售量,因为男人们又改喝香水和牙粉了。在国内,人民同政府和执法部门展开了一场地下斗争,最主要的是,国家的酒类专卖权被破坏了,而且简直无法恢复,到处都有人私自酿酒,而酿酒原料主要是糖。从那时起,酒和食糖的问题成了居民最紧迫、最头疼的问题,同时对党和戈尔巴乔夫也造成很不好的影响。”<sup>③</sup>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

②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10~511页。

③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33~134页。

禁酒运动声名狼藉,到1988年便无声无息地寿终正寝了。但是反酗酒运动却成了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改革标志。它足以说明戈尔巴乔夫最初的实际步骤是怎样地考虑不周,其中包含了他的政治失误、经济失误和心理失误。“果然不出所料,就连专制时代或者极权主义时代最果断的执政者都未敢尝试的、通过命令方式达到俄国人清醒的做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它在国家预算中留下了第一个、不过也许是致使的窟窿,还留下了理所当然地冒出的生产和地下销售家酿酒和伏特加酒代用品的黑手党……以及数百则笑话,嘲讽的对象自然是‘改革之父’。”<sup>①</sup>

### (三) 障碍机制: 向新状态转变

包括反酗酒运动在内的“加速”政策的虎头蛇尾以及它们所引起的社会动荡,让戈尔巴乔夫这位改革的“设计师”感到难堪与不解。

在改革一周年之际,外界给戈尔巴乔夫的成绩作了评论。在西方分析家们看来是“感到困惑不解”:“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一直是个令人生畏的名人。但另一方面,他似乎又奇怪地不愿或不能把自己的干劲和决心输入苏联社会。”<sup>②</sup>其原因在于:“这位新总书记本身就是传统势力的产物,传统势力明显地限制他实施自己的计划。因此,在他要求振兴苏联时,这些传统势力造成的障碍成为最强大的阻力。”“苏联领导集团的状况也是阻碍戈尔巴乔夫取得进展的另一个因素,各级党政领导机构都进入了很多新人,但是这些人都不是决心干一番新事业的有胆有识之士。新领导人基本上是旧秩序的代表……他的统治,更确切地说是他的统治的效力遇到的挑战,不是来自最高领导集团(在最高领导集团里是他说了算),而是来自基层的惰性和中下层干部中的拖后腿的势力。如果在国内不能取得有力的、持续的发展,戈尔巴乔夫一帮人在国际舞台上为确保苏联霸权地位的努力几乎肯定会归于失败。除非苏联对自己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革。”<sup>③</sup>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sup>②</sup> 《是“摇动器”不是“发动机”——美报评戈尔巴乔夫上台一周年》,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年3月13日。

<sup>③</sup>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力量对比严重不利于取得实际成绩”,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年3月17日。

切尔尼雅耶夫给出的结论是：“我不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如何将我们国家引向世界水平的问题上已经有了某种明确的构想。只不过有一些个别的想法而已：如建立‘秩序’，加强‘合同纪律’，对最敏感的管理权和计划工作分散化问题还仅仅局限于作战略考虑的范围之内。”<sup>①</sup>戈尔巴乔夫在总结原因的时候认为，这是因为改革没有按照自己的方案对“经济基础”进行根本的改造。也就是说，他过高地估计了旧的体制的活力，不得不承认：“（20世纪）30至40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逐渐开始同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要求发生矛盾。它的优点越来越不起作用了，相反，障碍作用却不断增大，从而形成了障碍机制，这种机制后来则起了十分消极的作用。由于采取在非常条件下产生的工作方法，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便受到了阻碍。”<sup>②</sup>

这个“障碍机制”在改革时期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消极作用。雅科夫列夫对此作了分析。<sup>③</sup>

首先，时间在始终不渝地冲毁党垄断一切的局面。导致这种结果的过程，不仅在苏共本身（领导机关越来越脱离人民，尤其是脱离知识分子，教条主义和空谈成风，社会思潮麻痹，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承认现实中的种种现象），而且在整个社会上都得到了发展。20世纪70年代苏共的无上权力已走下坡路，尽管仍然保持着外表上的“体统”和仪式。可是仪式仅仅是信仰的外表，而十分明显的言行脱节已成为潜在的危险事实，且已渗透到了生活方式本身。

其次，党的领导机关对国内事态的控制越来越蜕变成本位主义利益和地方利益对党本身的控制。部门和地区的帮派风气已明显加强。这早就开始了。在20世纪60—70年代，工业区的区委以及州内有联盟所属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的州党委都处于这种状况。这样的党委形式上是掌权，实际上越来越听命于企业经理和部队长官。从70年代初起，部委本位主义利益也笼罩了苏共中央。各部委的权力已如此之大，以致在改革时期它们常常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44页。

<sup>②</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1页。

<sup>③</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98~200页。

对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总统隐瞒已有的危险信息，继续保存了“一国中多国”的做法。

再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党内高级干部结构中纯粹党的机关权势分子越来越让位于专家们——不仅是那些只是在本部门工作的专家，而且是那些定期在部门和党的领导机关任职的专家。升官发财成了主要动机，而官官相护则是确保升官发财的条件。结果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经济上的刑事讹诈成了党的领导机关控制高级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高级干部的主要手段。这种讹诈的基础是什么呢？从 20 年代起，经济干部就不得不随机应变和说假话。他们在法律的边缘上或在法律之外玩手法，绕开由计划体制、高度集中和唯意志论决策以及大量的互相矛盾的烦琐细小的官僚主义指示和细则所规定的程序使自己“摆脱困境”。那时违法乱纪现象简直无孔不入，到处都是，它们是绝对避免不了的，这种违法乱纪本身，使违法乱纪成了陈规陋习。这就是说，只要党委“瞄准”谁，护法机关实际上在任何时候对任何经济工作者都可以立案法办：或给予党纪处分，或撤职查办，或关大牢。与此同时，党的领导机关越来越多地浸透了部门利益，越来越多地为本部门效劳。在各民族共和国，党的领导机关则安插越来越多的本民族干部，越来越多地浸透着民族利益和越来越多地为本民族效劳。党和党的领导机关就这样一步一步地逐渐变成了军界、政界和经济界官员名录上的干部手中的工具，而不是相反，不是像斯大林在世时和搞镇压时那样。但是党的权力至上的幻想仍继续存在，而且在意识形态上还在继续滋长。

最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高智力社会集团，它可能是潜在的反对按官员名录实行干部委任制的反对派的精神支柱，这个反对派里一部分人持民主观念，而另一部分人则追求权势。苏共二十大以后，党的领导机关面临如何在不再采用镇压手段的条件下管理官员名录上的干部时的重大问题。干部的自由放纵，领导的胡作非为，在中央和地方都有所滋长。贪污受贿、营私舞弊、出于贪财或玩忽职守的滥用职权、对很多人来说有利可图的经营不善等情况大为增长。当营私舞弊和滥用职权成为普遍的现象时，就极其可能既容易又简单地把这一套实际关系用于宗派和黑社会团体的利益服务。

1988年9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戈尔巴乔夫“关于改组党机关问题”的信。讨论表明,这次改组会产生大量复杂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指出:“现在的机关人员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得力的。”党的机关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人们开始记恨他,认为总书记的所作所为是不稳定的根源,它破坏了大家对明天的信心,而这一信心是自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以来机关的主要成果。”<sup>①</sup>于是,戈尔巴乔夫决定:“要坚决加快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精神发展速度,就要在走向崭新状态的道路上实现根本改革。这无疑是一项革命性任务。”<sup>②</sup>

## 二、“不要崇拜计划”:要跟上现实生活节奏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例行会议上说:“不要崇拜计划。应该经常准备根据需要修改计划。”<sup>③</sup>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这么说呢?因为“崭新状态”表明:改革就是革命,“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飞跃,是实现其本质特性的飞跃”<sup>④</sup>。从当时的改革进程来看,博尔金指出:“建设性的思想已提得相当充分,其中有些还被新的总书记拿去到处讲演。但是整体构想仍未形成。因为戈尔巴乔夫竭力反对这样做,他认为,按部就班只会把事情搞糟。今天看来,他不愿这样做显然另有其真实原因,许多人曾一再要求(包括在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上要求)讲明我们走向何处,而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1988年之前,戈尔巴乔夫一直得到广泛的支持,在这位新领袖的行为中以前从未出现过逃避、悲观和善变的情况。”<sup>⑤</sup>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话还比较隐晦,那么,雅科夫列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96页。

<sup>②</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5页。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亞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sup>④</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sup>⑤</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93页。

夫则明白地告诉世人：“那些批评改革运动的人，他们喋喋不休地说，1985年的改革开始时没有任何计划，甚至没有任何主张或思想。至于说到计划，那是不可能有的。那个时候谁能够接受包括取消单一权力、单一意识形态和单一所有制的根本改革社会制度的‘计划’的？谁能接受？党和国家的机关权势分子？克格勃？还是将军们？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预先‘计划’的要求都是由习惯的传统思维产生的。怎么能够对千百万人的生活事先作出计划呢？！这不又是神话、幻想，又是骗局吗？要知道，这里讲的是生活方式的更替，而不是政治体制的修补。”<sup>①</sup>

这就是不要“计划”的问题所在！于是，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仓促行事、即兴发挥，而这样却把党和国家带进了毁灭的深渊。克留奇科夫说：我们有过一个明确严整的改革方案吗？现在，完全可以肯定地回答“没有，甚至总的过程和目标都没有，只是在边走边看”。有一点要补充的是：“很多人觉得，我们是在前进，但当我们陷入困境时，却没有意识到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应退后几步。不过，不是人民自己走上这条死亡之路的，而是被诱导上去的。”<sup>②</sup>

### (一) 从经济到政治：改革转向

为什么要在经济改革还没有取得一定成果的时候急剧地转向政治改革呢？

这个问题一直是人们在把苏联与同一时期的中国改革进行比较后，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疑问。“最近几年我不止一次地受到批评，说我应该从经济开始，而把政治的缰绳拽住……像中国那样”<sup>③</sup>，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反复辩解：“我很清楚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所以认为首先应当争取使经济现代化，以便为(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全苏科技进步讨论会也以此为目标。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这些设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邓小

<sup>①</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3~24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40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方法颇为近似。”<sup>①</sup>戈尔巴乔夫指出：“只要看一下改革事件的记事表就可知。从一开始多数中央全会讨论的正是经济改革问题。它占了我作为总书记的工作中，我的同事的工作中和政府机关工作中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和精力。”<sup>②</sup>

这都有些什么措施呢？除了采取旨在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满足居民诸多迫切需求的措施外，中央政治局和政府还制定并通过一系列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其中包括关于生产集约化，关于提高生产效率，关于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和能源工业并提高其技术水平，关于改造钢铁工业，关于改进设计工作和基本建设工作，关于采取新工艺和计算机技术等决定，并开始落实完善行业管理及利用劳动资源的决议，等等。在格拉乔夫看来，这些所谓的改革措施，“除了借自安德罗波夫的整顿劳动纪律的处方而外，再加上承诺企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的、未能实现的柯西金改革思想，以及戈尔巴乔夫本人在斯塔夫罗波尔土地上推广提高农村劳动者物质利益的‘伊帕托夫工作法’的成功经验。结果出现了‘加速’经济发展的纲要，那与其说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改革构想，倒不如说是宣传性的口号”<sup>③</sup>。1987年5月，对莫斯科地区五百家国有企业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一半以上的熟练工人对经济改革政策没有带来什么实惠却带来过度的工作量表示不满。”<sup>④</sup>

那么为什么改革还是没有达到它提出的所有目的？

博尔金认为，这主要在于改革的措施仍然是过去政策的延续。“如果仔细分析当时那些决定的标题和内容就不难发现，它们与从前那一套没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一切措施无异于给一条四处进水、正逐渐沉入漩涡的破船堵漏。每当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一些地区走了一趟之后，总要作出发展这一地区或那一地区的经济的决定，决定越作越多。这样一来就分散了资金，降低了投资效益。尽管‘改革’一词已流行全国，可是还没有进行社会改造的总体构想。在经济改革方面最初十分冲动地走了几步，很快便遇到障碍，受到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1～162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sup>③</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

<sup>④</sup> [苏]《消息报》1987年5月4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5月6日。

限制。国民经济发展优先项目的选择具有偶然性，我们曾多次对总书记说，不制定统一的发展构想，不解决普遍存在的问题，就不可能取得局部的积极效果。要有严肃的理论作为实现转变的基础，要扎实、循序渐进地一步一步进行改造。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况且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sup>①</sup>或者说，经济改革目标没有实现主要是由戈尔巴乔夫自己的个性决定的。“作为一个国内改革者，特别是作为一个国家和它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在实际问题面前越来越表现得毫无办法，常采用冲动的、狂热和鲁莽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sup>②</sup>

但是戈尔巴乔夫并不这样认为。他相信，这不是他的错。“总书记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是他的‘专利权’。他的行为永远没错，他也不用考虑别的事情。在犯罪的现场，来的不是公安人员，而是他的官方发言人‘公开性’，它发布了千万条谎言，说不是总书记和他的工作班子，而是他的前任（勃列日涅夫、斯大林等）负有罪责。”<sup>③</sup>戈尔巴乔夫指出，经济改革的挫折在于没有“制定统一的发展构想”。他认为，这首先涉及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协调问题。改革的民主主调不可避免地要强调政治改革。“那几年我国发展的辩证法是，没有社会在政治上的解放，不保障自由，也就是不打破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就不可能在经济领域中进行认真的改革。”<sup>④</sup>戈尔巴乔夫认为，几十年来在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垄断主义，决定经济骨干和主要是搞经济的人组成的党的领导人入选的行政命令体制，以及长期运行的经济体制本身的性质，具有难以置信的强大的惰性力量，“这项力量使得经济向新的轨道，向现实的市场的轨道过渡变得极其困难……甚至即使是在所有我们的经济主张和改革时期的决议都是合乎理想地正确的情况下（我不能说是这样），也会是很困难的”<sup>⑤</sup>。而格拉乔夫的记录也证实了戈尔巴乔夫在推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91页。

<sup>②</sup>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720~721页。

<sup>③</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

<sup>④</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77~78页。

<sup>⑤</sup> 同上，第78页。

进经济改革时在政治局遭到了阻力。他说：就连这方面最初推行步骤——鼓励农村中的个体农场、制定关于个体劳动活动的法律，以及后来的旨在去掉私人企业主头上铁枷锁的合作社法，也在政治局内受到敌视和充满警觉的对待。包括索洛缅采夫和切布里科夫在内的几名政治局委员表示忧虑：他们担心鼓励个体农场会破坏集体农庄和“败坏”集体化的“名声”。<sup>①</sup>

于是，戈尔巴乔夫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不仅是政治局里的保守势力，更重要的是体制已经成为严重的阻塞力量了。“政治民主化与经济改革之间的间隙的出现，不是由于改革首倡者在走向市场经济方面迟迟按兵不动，而是由于他们起初在这个领域干脆是在往后退。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在两年甚至三年的时间里一直认真地转动的，依然是那个‘宗派主义和命令主义模式’的手枪，他们希望前任设计的发动机在去掉腐蚀和尘土之后最终能够启动，‘船夫曲自己会响起来’。他们和安德罗波夫一样，相信只需凭着强化纪律和秩序的行政措施、向领导人本身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以及尚未道德沦落的年轻干部的无私热情，即可迫使理论上无可挑剔的社会主义‘永动机’卖力地运转。”<sup>②</sup>

在 1987 年 6 月召开的苏共中央经济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名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和负责经济管理的斯柳尼科夫晋升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此，在现有的 14 名政治局委员中，戈尔巴乔夫获得了绝对支持。“人们把这次中央全会看作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的前途、甚至可能是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本身的一个关键性的考验。”<sup>③</sup>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表明的大胆经济管理的路线，是想坚决改变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从上到下的指令性领导制度和国家的限制，将之改为从下到上，即实行以合同企业和企业为中心的自主管理。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主张表明，“这是行政社会主义真正终结的开端，是果敢地向建立现代化经济机制过渡的开端。当然，这意味着要更坚决地对官僚们进行清算，在过去两年中官僚们阻挠了改革。如果说 1985 年 4 月全会曾乐观地相信只要局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23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105 页。

<sup>③</sup>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 1987 年 6 月 26 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 年 6 月 28 日。

部完善现行管理体制就能使形势好转的话,那么现在非常清楚,摆在面前的是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决定开始进行政治改革以扫清政治上的障碍。他说:“我曾经讲过,我之所以执掌权力是因为我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而且竭力表明,事情不能只局限于发表‘意向性的声明’。1985—1988年间,为了使国家摆脱停滞状态,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所起色,人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从根本上改革经济的第一次尝试。实际上,直到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才出现真正的转折,此后改革才开始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采取这一决定性步骤,既有经济改革明显受阻的缘由,也是为社会舆论激化所驱动。”<sup>②</sup>

从经济到政治,在急剧的转向中改革开始深入体制的内部,并不断冲击、破坏,并最终摧毁了这一体制。这一过程,戈尔巴乔夫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他说:

第一个阶段——从1985年到1988年,包括1988年:这是探索、试验和犯错误的时期。当时我们希望能够纠正制度上诸多的明显弊端。虽然我们走得很远,采取了许多至今还在进行的改造措施,但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圈子,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戒律还不敢越雷池半步。

第二个阶段——从1988年春到1990年初: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民主化时期。这时我们意识到不仅小修小补不行,连大修大补也不行了,不进行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经济方面的任何革新措施都很难产生应有的效益;我们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

最后,第三个阶段——从1990年到1991年,社会力量、民族力量和政治力量放手进行斗争的时期。快到1990年年底的时候,他们都进入了

<sup>①</sup> [南斯拉夫]《政治报》1987年6月28日评论,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6月30日。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3页。

原来的阵地,1991年都变成了拼杀搏斗的战场,这中间我国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必须解决:“苏联要不要存在,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sup>①</sup>

## (二)学会在民主的条件下工作

“在民主的条件下工作”——这是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提出来的。戈尔巴乔夫说:“改造国家的任务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虽然我们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任务,但我们将奠定加速发展进程的基础。我们还能及时地吸收新鲜的、出色的力量。我相信,甚至在全部机制、全部民主的和道德的杠杆开始起作用时,党的任务也不能简化。党的工作将会增加,而且工作将越来越复杂。我们不得不改变方式和方法,因为我们将在民主的条件下工作。党有责任看到一切、抓住一切、总结一切,寻找有才能的人,把他们安排在需要的岗位上,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工作,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sup>②</sup>在这个阶段,戈尔巴乔夫仍然相信改革——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它只有在业已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框架内才有可能;仍然相信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党依然是完善和加快发展这一制度的动力和主心骨,只有党才能将民主变成改造社会的工具。所以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反复提醒甚至警告党的干部,要学会在新的条件下工作。在1986年7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出:“对于所发生的,我们既不该吃惊,也不该愤怒,而应该看作正常的现象,因为这是客观进程所产生的,到处都在实行民主化。所以当有人反对或者表示不同意时,不要不高兴。”<sup>③</sup>7月31日,戈尔巴乔夫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干部,无论是党的干部,苏维埃干部,还是经济工作干部,应该学会在扩大民主、调动人的因素和发挥人民主动性的条件下工作。”<sup>④</sup>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41页。

<sup>③</sup> 同上,第104页。

<sup>④</sup> [苏]戈尔巴乔夫:“改革刻不容缓,它涉及所有人和所有方面”(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1987)》,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0页。

但是到了 1986 年年底,戈尔巴乔夫开始感受到民主化进程越来越遭受来自党内的阻力。据他回忆,从 1986 年秋天起,戈尔巴乔夫开始筹备关于干部问题的中央全会,并决定在 11—12 月召开。但是由于党内的不同意见而没有按预定时间召开。于是,“西方开始喧哗:戈尔巴乔夫开不成全会了,他受到强烈的抵制,政治局内部斗争激烈。这是夸张,因为当时并不存在这些问题,政治局内部也没有分裂。当时大家都还认为需要新的干部。在起草中央全会的报告时,我碰到一个问题:对培养和教育干部的传统题目必须改变提法。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成为改革的命运问题”<sup>①</sup>。

1987 年 1 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在理论和政治问题上向前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第一次对停滞时期进行了评价,对党内选举产生的机关的作用作出了评价,阐述了它们的作用是如何被贬低的,所有工作是如何被上面指派的一小部分人所操纵的。戈尔巴乔夫对全会的报告感到满意。但令他惊奇的是,“这次中央全会实际上是为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为政治改革、为改革的战略和策略开辟道路的一次会议,但在现实中却被官僚们否认了,中央全会后一切照旧”<sup>②</sup>。戈尔巴乔夫深切地感受到了为什么会出现阻力:一切都隐藏在权力的奥秘之中。“这并不是因为精英们完全因循守旧。他们已经看到,改革进程的逻辑必然会导致一个结局,那就是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有资格掌权。许多人已经感到,过去他们是从上级手里得到权力,但在民主条件下就未必能重新得到了。这是改革最富戏剧性的时期,尽管政治局内部还保持高度的和谐,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是一致通过。”<sup>③</sup>于是,戈尔巴乔夫得出结论:“党本身在阻碍事业的发展,改革党的问题变成了最迫切的问题。应该通过民主化使党活跃起来。那时我几乎在每次全会上都说,号召民主——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都应该学会在民主条件下工作。如果不学会在新形势下生活,以为今后可以一切照旧,我们会输掉一切的。但是这些话没有得到重视!党内精英们听不进去这些话。不能说百分之百的人,但是大多数人都听不进去。”<sup>④</sup>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第 18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18~19 页。

<sup>③</sup> 同上,第 19~20 页。

<sup>④</sup> 同上,第 19 页。

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放弃，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政治局内的其他人都已经感受到：民主化的进程已经不可阻拦，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而已。不过，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他希望这个时间越短越好。在他的努力下，1987年6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一项重要决定——召开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应当根据中央一月全会的决定筹备，即采用民主程序——按差额原则提出候选人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按照这一精神，1988年6月28日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作出决定：成立新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取代原来的最高苏维埃。同时，更新选举制度，规定人民代表的选举要实行“自由选举”。

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了！

马特洛克敏锐地观察到：“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无异于一场潜在的革命。1988年苏共代表大会确立了很多目标，如建立一个权力受到一定限制的政府；按步骤创设一个拥有真正立法权的、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允许大家对新观念进行公开讨论，允许大众传媒对新思想进行公开报道，正式抛弃与西方为敌的意识形态基础，等等。政府为实现这些目标正在付诸行动，而这些行动又将不可避免地打破旧的体制。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选正在筹备之中，不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苏联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sup>①</sup>

1989年年初，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运动正式拉开。根据最高苏维埃制定的选举细则，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由2250位成员组成。其中， $\frac{1}{3}$ 的成员按地理区域选出， $\frac{1}{3}$ 选自各联邦共和国内的“民族”地区及其他形式上自治的实体，最后的750人则选自“公共组织”。细则中最重要的是采取多名候选人互相竞选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进行选举。马特洛克解释道：如果了解一下新规则，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就会知道苏联公众将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行使选举权。即使大多数候选人是共产党员，他们也不得不参加竞选，如果投票是不记名的，且选票的计算是公正的，那么那些不受欢迎的候选人就有可能落选。意欲反对当时“体制”的选民们被赋予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细则要求每一位获胜的候选人获得的选票必须过半数，不以票数多少

<sup>①</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16页。

为准。选民可以对所有候选人投“否决票”。这样，即使党控制了提名过程，但如果它所提名的候选人不受欢迎，人们也可以把他否决。苏联选民将拥有一项众多美国人梦寐以求的权利，那就是有权“不选名单上任何候选人”，然后把选票捻成小棍。<sup>①</sup>

1989年3月15日，苏联共产党开始在党内选举人民代表。结果显示，在有641名官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100名党员代表中9名政治局委员没有一个人获得全票。其中，利加乔夫有78张反对票，雅科夫列夫有59张反对票，尼科诺夫有26张反对票，扎伊科夫有25张反对票，梅德韦杰夫有22张反对票，斯柳尼科夫有19张反对票，切布里科夫有13张反对票，戈尔巴乔夫有12张反对票，雷日科夫有10张反对票。雷日科夫成为政治局中最受欢迎的人，利加乔夫成为最不受欢迎的政治局委员。<sup>②</sup>

1989年3月26日，选举在全国结束。但是选举结果却让苏共领导人大吃一惊：约有30名左右的苏共州委书记与市委书记未能当选。一种从未有过的挫败感顿时在3月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蔓延。戈尔巴乔夫试图证明苏共没有输，因为85%的代表是共产党员。他指出：“选举运动的进程表明，我们已处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局面之中。一场为争取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为争夺电视节目的播送时间而展开的斗争显得很残酷。而在报刊上，在与选民会见时，争辩相当激烈，有时甚至表现得失态。从表面看来，有许多事情令人伤心，也有许多事情是先前所不知道的。某些领导成员对这一切感到气愤、不安，情绪上有点张皇失措。我倒觉得高兴，这说明我们确已把社会唤醒过来了，确已做到了我们前几年搞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让人民参与政治。自由选举发现了许多人才，弄清了社会各阶层的立场，我们过去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代表中，苏共党员占85%（在过去的最高苏维埃里约占一半），而党的高层领导把选举的这一结果竟看成是党的失败，这岂非怪事？”<sup>③</sup>

然而戈尔巴乔夫遭到了反驳，他被提醒注意“现在党内的纪律性比无党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

<sup>②</sup> 法新社莫斯科1989年3月19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9年3月21日。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3页。

派人士还差”。雷日科夫指责道：“难道在这 30 个输掉选举的人当中，真的有谁是跟自己的幸运对手做过一番较量的吗？然后自己回答：没有。我看，他们恐怕还是以为一切就像过去那样，只要哪位党的负责人给基层下一道命令，叫大家给州委领导投上一票，那所有的人都会立刻乖乖地完成任务。可不是那时候了！选举恰似表明，那种享有说一不二的威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要想建立威望，就得天天奋斗，每个人都得这样干才行，党也好，领导人也好，谁都不能例外。可不能以为这场选举只是 30 个人输掉了。是党输掉了这场选战，因为它相信了这些人，把自己交到了这些人手上。”<sup>①</sup>克留奇科夫指出，选举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党没有掌握民主条件下的斗争手段。“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公开的、通过合法途径建立的反对派，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行为上的唯意志论不受任何限制，对群众情绪不予理睬成了一条准则，少数社会政治力量的意见也未予考虑。各级领导人都未学会政治斗争的科学，而反对派力量却尽善尽美地掌握了这种艺术。”<sup>②</sup>

1989 年 4 月 25 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选举问题。一部分人认为，选举结果对党和他们自己都糟透了。另一些人谈及此事时明显带有指责领导的语气，觉得是上面要进行民主实验而“把事情搞到了如此不成体统的地步”。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对于党来说，当前主要的就是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掌握新方法，“到人民中间去”，到群众大会上去，不要光坐在办公室里，要学习在民主条件下工作。<sup>③</sup>

遗憾的是，党的领导——从区委书记到政治局委员——看来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相当普通的道理。选战之后的乐观情绪很快就消失了：87% 当选代表中的大多数开始大张旗鼓、急急忙忙地退出苏共。雷日科夫肯定地说：“这种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决不是什么觉醒，而是彻头彻尾的叛变。不过这可是一个绝对令人不安的信号！它意味着做党员就得不到群众拥护。不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312 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152 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00 页。

过,从党内向党外的‘移民’直到变得规模吓人时,苏共领导还在稳坐钓鱼船,他们安慰自己说:耗子从船上逃跑怕什么?方向还是正确的嘛,航线还是清楚的嘛,前进的步伐并没有改变嘛……他们不是健忘就是不懂:耗子弃船逃跑,那是因为遇到了灭顶之灾……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自己‘正确’,宣称航线不会改变,毫无自我改革的愿望,过分自信,不善于聆听足够振奋发聩的报警信号,终于导致 1991 年 8 月共产党的毁灭。”<sup>①</sup>

### (三)要用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

当选举成为人民手中的权力时,苏共的执政方式必须随之改变——要用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1990 年 9 月 13 日,苏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党应该学会在有反对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他说:“如果我们想在新的条件下成为积极的政治力量,那就请你们注意,运用陈旧的强迫方式,我们将一无所获,只会使自己完全彻底威信扫地……我不止一次讲过这一点,然而在吸取经验教训上,我们大家都是慢慢腾腾的。大家大概都怀念过去……应该变革经济。还应该变革政治程序,摆脱无用的经济军事化,实行非常强大的结构政策。如果连这一点都弄不懂,那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舒适方便,自己的利益好处。”<sup>②</sup>具体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新变化决定的:

一是苏联出现了新的政治运行规则。选举显示:“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望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你是个好人,作风正派,会做工作,我们支持你。普通党员开始被与党的官僚分离开来。结果令人震惊:地方领导手里掌握了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交通运输、宣传大军、政府机关、文化设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312 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62 ~ 663 页。

施……都屡屡败在昨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下。”<sup>①</sup>而这一结果的出现，则是与戈尔巴乔夫极力推进的“社会民主化”进程紧密相连。戈尔巴乔夫从“民主化”中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对抗党内保守势力的力量，而“民主化”的参与者们则从他那里取得了政治权力的保证。“为了使抵制变革的机关陷入包围圈，必须招兵买马，扩充兵力——‘开展民主进程’。不知戈尔巴乔夫当时是否知道，政治中从来没有无私的服务，他打算撼动和‘吸收入股’的社会，不久就会向他本人提出条件，必定要求获得党所空出的相当一部分权力，以作为对其参与改革的回报。即使他认为有此可能，也肯定未曾料到一切会来得如此之快，社会从他手中得到了自由这一意外礼物之后，回报他是忘恩负义，更有甚者，是对自己解放者的遭遇无动于衷。”<sup>②</sup>

二是戈尔巴乔夫坚持个人政治理念。改革的意义是什么呢？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的全部意义，正是要结束阶级专政这一原则本身，要彻底结束我国社会 70 年来的分裂局面。要拔除公民之间深刻冲突的根子，建立一种宪法机制，在这种机制下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打耳光、流血，而是通过政治来弄清。此外，不能忘却，我是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千百万人把这个岗位托付给我，我要是跑到另一个阵营中去，那是不像样的、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当时，我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是总统，我认为不用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行暴力的方法、而是通过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至少也要采用主要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办法。”<sup>③</sup>对社会改造所引发的政治危机，从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就竭力避免采取激烈的解决冲突的办法，而是运用策略，争取时间，“给民主化过程提供稳定自身的充分机会，遏制旧势力，强化人民对新的价值观的信任”<sup>④</sup>。于是，在很多危机事件的处置中，戈尔巴乔夫都主张用协议商议的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一方法的副作用就是迟钝。尤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96～197 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32 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03 页。

<sup>④</sup> 同上，第 367 页。

其是在苏联改革进入危机频发时期后,戈尔巴乔夫的这一行为特征在政治上造成了致命性的伤害。“众所周知,迟缓,换句话说,对尖锐事件的迟钝反应是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典型特点。例子非常之多,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立陶宛开始,以价格改革的‘追逐’危机的经济和财政措施结束。中央全会不止一次公开地批评政治局总是迟缓。中央和报刊编辑部收到的千百封来信中也谈到了这点。总之行动迟缓是改革时期的特征。”<sup>①</sup>

### 三、“改革的杠杆”:发起对官僚特权的反对

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革命,就是要采取革命措施革除一切社会弊病。戈尔巴乔夫指出:“在把我们所采取的措施称为革命措施的时候,我们是指这些措施的深刻性、彻底性和不妥协性,是指这些措施包括从上到下、从经济基础、所有制关系到上层建筑的整个社会,包括一切生活领域,并且是全盘地、完整地包括所有这些方面。这不是对我们社会机体上这种或那种小毛病和污点进行粉饰和洗刷,而是使整个社会机体得到改善和更新。”<sup>②</sup>1986年4月初,从古比雪夫和陶里亚蒂市回来后,戈尔巴乔夫决定痛改前非,一扫前人积弊。他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应该从自身作起。宴会、礼品、招待会——我们曾鼓励所有这一切,而且自己也参与过。各级领导有自己的食品供应基地,他们的妻子连商店都不用跑了。在每个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基地和内部供应商店,在那里分配着进口商品。我们自己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有错。感谢上帝,我们自己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一切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了……”<sup>③</sup>

#### (一)“官名录”:特权阶层的形成

苏联的干部制度及其畸变而成的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形成,无疑可以

<sup>①</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

<sup>②</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61页。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91页。

成为我们深度解释苏联亡党亡国历史悲剧的一把钥匙。只有深刻剖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才能准确把握苏联干部制度畸形发展的内在因素。下面从俄国的治国传统、苏共的组织伦理、干部的身份设定和监督的空泛虚化等四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阐释。

第一，从俄国的治国传统来看，以集权为特征的专制主义和以特权为内核的精英主义统治是俄国治国理政的传统，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深厚历史根源。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sup>①</sup>苏联作为无产阶级在世界上创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在取得政权以后，其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固然有着无产阶级的独创性发展，但是在一个具有长久专制统治传统的落后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苏共的执政必然会受到俄国治国传统在制度、文化、心理、实践等各方面的深刻影响。而最为深刻的就是沙皇专制统治的影响。

作为一种国家统治的基本制度，沙皇专制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强调沙皇具有至高无上的专制统治权力。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具体的国家统治实践中，沙皇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限制。事实上，沙皇专制制度作为建基于俄国农奴制基础之上的封建主义统治，实质上既包含沙皇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又包含了统治阶级中贵族阶层的统治权力。可以说，沙皇专制制度是由作为国家首脑的沙皇和作为权力支柱的贵族共同构建起来的统治制度。由此就逐渐形成了以集权为特征的专制主义和以特权为内核的精英主义统治的治国理政传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沙皇专制制度就是沙皇拥有无限的权力。人民根本参加不了国家的机构和国家的管理。沙皇拥有独揽的、无限的、专制的权力，一切法律都由他一个人颁布，一切官吏都由他一个人委派。可是，对于俄国的一切法律和一切官吏，沙皇自然连了解都做不到。对于国内所发生的事情，沙皇连了解都做不到。沙皇只不过是批准几十个最大最显贵的官吏的意旨罢了。一个人，不管他多么愿意，像俄国这样

<sup>①</sup> [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1页。

一个大国,他是管理不了的。管理俄国的不是沙皇,——所谓一人专制,只不过是一种说法罢了!——管理俄国的是一小撮最富有最显贵的官吏。沙皇能够知道的,只是这一小撮人愿意告诉他的事情。沙皇根本不可能违背这一小撮名门贵族的意旨:沙皇自己就是地主和贵族;他从小就完全生活在这些显贵中间;他就是受这些人培养和教育的;沙皇对全体俄国人民的了解,仅仅限于这些显赫贵族、富裕地主和少数可以出入沙皇宫廷的最富有的商人所了解的情况。”<sup>①</sup>

十月革命以后,取得国家统治权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打碎旧的国家统治机器的同时,在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文盲、缺乏管理经验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放下人民直接实现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的理想,实行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布尔什维克政党对国家事务的委托统治。这就事实上初步形成了对国家事务管理在两个层面上的权力落差:

第一个权力落差是在无产阶级政党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产生形成的。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在实践中的不可行性,那么,由谁来代表人民群众行使国家管理的权力呢?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讲,无产阶级政党都是唯一的选择。从理论上讲,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广大劳动群众中一部分具有先进思想、高度觉悟的人组成的先锋队组织,他们没有自己的利益,而是为全体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而牺牲的革命先行者,肩负对广大人民群众实施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阶级使命。从这一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治代表来行使国家统治权力就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制度保障,那么由无产阶级政党来代表劳动群众的整体利益往往就会成为空泛的政治宣言。列宁逝世以后,随着斯大林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共产党在事实上实现了对国家权力的全面垄断。但是由于在人民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落后,苏联共产党开始成为超越人民群众的特殊存在,具有了自己的利益!“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出现了一种党崇拜。在每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全会上,以及每一个盛大场合,一定都要千方百计

<sup>①</sup> [俄]列宁:“告贫苦农民——向农民讲解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1903年),《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15页。

地强调‘列宁主义的党’——苏联共产党——的作用。国家是在它的‘英明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是‘智慧、荣誉和良心’的化身。”<sup>①</sup>

第二个权力落差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产生形成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以后,作为人民的政治代表开始对国家实施全面统治。党成为国家权力分配的最终决定者。通过以任命制为特征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授予制度,产生形成了政党内部领袖、干部(高中级党员)和群众(普通党员)之间的巨大权力落差。在这一权力授予制度中,下级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上级组织,个人的权力必须服从于组织的要求。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局和部委实现了对权力的各自分割。“列宁的政党旨在成为一个严密的中央集权组织,它不承认任何形式的邦联制或地方自治或其他组成单位的自治。它必须是一个准军事的组织,普通成员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和各种规则,各级领导人也必须受制于自上而下形成的等级权力链。政策在政党未决定之前可以由党员自由讨论,但是一旦做出决定,这个决定就必须得到无条件的接受和执行。”<sup>②</sup>当权力成为组织的垄断性资源以后,苏联开始形成并确立起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而各级党组织的总书记则在其中占据着关键位置”<sup>③</sup>,“各级权力机关的组织就犹如一座金字塔,层层对上负责。下级机关同上级机关的关系只是一种服从关系;人民群众的监督职能,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只不过是一种口号、标签,实际上从来没有有效地实行过。在这座权力金字塔上,处于最上层的部分自然地拥有了无限的权力。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结构、这种政治生活气氛,尽管不是出于自愿的。这种政治体制已经形成一种惯性,依赖于这种惯性向前发展”<sup>④</sup>。

上述两个权力落差,实质上反映了苏联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所秉承的精英政治逻辑,即苏联共产党高于劳动群众、干部高于普通党员、领袖成为权力的最高象征。在这一统治逻辑之下,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不仅是俄国

<sup>①</sup> [俄]B. A. 利西奇金、Jl. A. 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6页。

<sup>②</sup>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03页。

<sup>③</sup> 同上,第549页。

<sup>④</sup> 李永全:《俄国政党史——权力金字塔的形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25页。

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且成为苏联共产党巩固执政权力的必然要求。

第二，从苏共的组织结构来看，强调集中、服从、统一、秘密的组织要求，使党内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服从，这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深层政党文化因素。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sup>①</sup>在近现代政党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类型的政党组织。其中，以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资产阶级政党最具代表性，成为两大主要政党类型的集中代表。除了政治理念上的巨大差别外，布尔什维克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上的不同。资产阶级政党标榜“民主”“自由”，因此其政党结构一般具有组织结构的开放性、组织成员的弱约束性等特征。而布尔什维克党则在组织结构上表现出极为强烈的纪律性、严密性、集中性与职业化。列宁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因此，“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sup>②</sup>。

应该说，列宁所主张建设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既是当时俄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又更为深刻地反映了机械工业时代对政治组织的内在要求。如果暂时不考虑革命斗争需要集中统一的革命政党这一点，那么，列宁之所以创立组织严密、号令一致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有一个重要的技术因素，就是政党的组织结构适应了当时社会环境所能提供的技术水平的需要，即以报纸等印刷媒体为代表的通信技术可以满足列宁创建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要求。列宁指出：“报刊在我国早已成了一种力量。”<sup>③</sup>早在 1899 年时，列宁

<sup>①</sup> [俄]列宁：“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1904 年），《列宁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 415 页。

<sup>②</sup> [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 年），《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4 页。

<sup>③</sup> [俄]列宁：“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 年秋），《列宁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 85 页。

就注意到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由于地域的阻隔而导致的组织涣散,在政治斗争中无法快速动员和凝聚党内外力量的致命问题。为此,列宁主张通过创办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来克服这一组织弱点,并以机关报为中心,改造党的组织。“必须把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的当前目标。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这个工作作为最近期间的全部活动内容。”<sup>①</sup>斯大林指出:“在党形成的时期,无数的小组和组织都还没有彼此联系起来,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从上到下腐蚀着党,思想上的混乱是党内生活的特征,—在这个时期,整个链条中的基本环节和摆在党面前的各项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创办全俄的秘密报纸《火星报》。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全俄的秘密报纸才能形成党内意见一致的核心,才能把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联结成一个整体,准备思想统一和策略统一的条件,从而为真正的党的形成奠定基础。”<sup>②</sup>

可以说,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建设构想和实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并最终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根本原则。不过,报纸以及随后出现的电台等通信技术在传播信息、组织动员方面确实具有极其强大的政治能量。但是由于报纸、电台等通信技术固有的、一对多、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特点,反映在政党的组织建设结构之上就是特别强调党的中央机关(特别是党的领导集团)的领导作用,而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则被牢牢地约束在党的组织纪律之中,从而使政党的组织结构明显地表现为一种金字塔形的等级体系。而随后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一跃成为俄国唯一执政党的政治发展实践也进一步扩散了这种组织结构特征。这种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上层的结构性问题,列宁早在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前就已经意识到。他指出,党的上层领导“要受党的‘下层’、受全体加入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监督和领导”<sup>③</sup>。为此,列宁提出了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

<sup>①</sup> [俄]列宁:“为《工人报》写的文章”(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8页。

<sup>②</sup> [苏]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9页。

<sup>③</sup> [俄]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1905年),《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30页。

组织原则。但是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关系,列宁有过原则性的意见,但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却没有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作为同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这一组织构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将列宁的政党建设原则称为“无情的集中主义”。在她看来,“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是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sup>①</sup>。由此导致工人阶级成为被监管的、完全被动的、缺少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央委员会的工具”。“在最高领导层小圈子里做出的每一项决定,都被以1500万党员的名义神圣化了,而实际上做决定与普通党员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没有以应有的方式通知他们。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宣传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套话:‘党揭露了斯大林’‘党开始了改革’。‘党’这个词成了意识形态专家们从事各种活动的掩蔽手段。而在现实中,普通党员在做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甚至在地方一级党组织中也在逐渐下降。各级领导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形式和非正式的关系。他们具有一种‘不倒翁’的特点。一旦由于工作不力而从一个领导职位上撤下来,就转移到另一个职位上去。党的机关干部阶层就这样形成了。”<sup>②</sup>应该承认,卢森堡的批评虽然是从西欧政治环境来思考俄国特殊的革命斗争问题,难免有理想化的色彩,但是她所预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集中化趋向却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

随着列宁的逝世和斯大林的强硬统治,苏联的政治实践加剧了政党组织体系中的这一结构性矛盾,最终导致全体党员对党的上层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党的命运系于党的领导集团的一念之间——“忠诚”。皮霍亚指出:“这一阶层的独一无二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加入这个阶层具有个别性。所

<sup>①</sup> [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4页。

<sup>②</sup> [俄]B.A.利西奇金、J.I.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7页。

谓个别性是指每一个人都是被单独接纳的。官场的‘参赛者’可以竞争职位,迈过职位这道门槛便是通常的官场或者官场无数官阶中的一级。不过,只有证明自己忠于‘党的事业’,忠于最终判定他对党、对主管本部门官场者本人忠诚程度的长官,才能迈过这道门槛。这个长官可能是党的区委书记或州委书记、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或总书记本人——完全取决于任命官职的权限范围。总书记处在这种垂直结构的顶端,掌管苏联的整个官场。于是产生了这种独一无二、垂直结构的靠封建主义的私交和个人依附制度结为一体的阶层。有可能从官场中‘掉出来’,在斯大林时代这是很常见的事(通常,这意味着死亡),后来,在他的继任者时代,则很少见了。斯大林的继承者认为,处分、降职后留用为上策。我们应当指出,至少从(20世纪)40年代和稍晚些时候开始,官员上了官职表,意味着他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职业优势、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管理交给他的那部分‘全民财产’。”<sup>①</sup>苏联亡党亡国的剧痛教训暴露了这种政党体制的最大弱点,即“我们的社会体制,就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有其最致命的弱点:对政权高层人物的背叛绝对无能为力”<sup>②</sup>。

第三,从干部的身份设定来看,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内在地规定了干部必须具有优于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政治理想和政治能力,这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社会心理原因。干部作为苏联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不仅是对苏联公民(主要是指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一种政治认定,具有突出的象征意义,而且具有极其显著的权力导向功能,即只有干部才能最大限度地分享国家统治权力。斯大林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sup>③</sup>可以说,无论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时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97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1941—1994:个人档案——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sup>③</sup> [苏]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93页。

期还是其后的苏联共产党的执政时期，党的干部都具有极其深刻的政治意义和符号象征。

对苏联共产党来说，党的干部具有崇高神圣的政治道德色彩。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主要政治力量，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而且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政治话语的符号表达不断地被人格化，由此导致政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均被赋予极其深刻的道德内涵。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由于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其道德使命感更为突出。干部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中坚骨干力量，是连接党的领袖与党员群众的桥梁，是政党组织宣传动员群众的骨干力量，是政党政治理想和道德使命的具体载体。“列宁的政党在原则上是一支经过仔细挑选并具有严格纪律的精英队伍，所以它绝不旨在成为一个靠说服和争取选票来扩大自身影响的群众组织。它自称在知识和道德两个方面都具有优越性：它之所以在知识上具有优越性，乃是因为它拥有精通政党这门独特科学之各种理论的专家；而它之所以在道德上具有优越性，则是因为它的成员无私地献身于实现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命运，而这种命运也是社会和民族的命运。它的理想是一种彻底奉献的理想，首先是彻底奉献给革命，然后是彻底奉献给革命所通向的新社会的建设工作。”<sup>①</sup>这种强烈的道德使命特征，要求干部必须成为群众的教育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但是随着苏共的长期执政和党的干部制度的僵化，党和国家的干部逐渐形成了特殊利益群体，干部也成为苏联社会特权享受的代名词。正如李普曼所言：“象征常常具有很大的用处和神奇的力量，词语本身就能释放出不可思议的魔力。一想到象征，人们总会兴致勃勃地谈论它们，宛如它们有着独立的力量。而且，那些曾经令人神魂颠倒的象征，从没有完全失去对人们的影响。”<sup>②</sup>人们一想到干部、一看到干部，就把干部等同于配车、别墅和丰富的物质供给。苏联社会普遍的崇官尚权心理由此形成，这就为苏联官僚

<sup>①</sup>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02～503页。

<sup>②</sup>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3页。

特权阶层的产生形成奠定了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具体来说，干部在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身份象征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规定的。

一是组织体系的制度要求。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首先是一个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的革命家组织。其“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更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的”<sup>①</sup>。因此，作为掌握了社会发展前进真理的革命家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sup>②</sup>。另一方面，经常性的教育活动，可以起到组织团结的作用。“我们对开展宣传、鼓动和组织方面的正常工作的意义愈是重视，我们同宗派主义、小组习气和计较地位离得愈远，我们就愈是应当努力使党员之间的意见分歧能够心平气和地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使这些意见分歧不至于妨碍我们的工作，不至于打乱我们的活动，不至于阻碍我们的中央机关正常地履行职责。”<sup>③</sup>当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政党组织的成功革命经验就成为重要的路径依赖。在苏联共产党执政的过程中，党的干部就成为巩固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正如斯大林所说：“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当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毕竟还不够。我们所以需要政治路线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而是为了贯彻实行。但是要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就要有干部，就要有懂得党的政治路线、把党的政治路线当作自己的路线来接受它、决心实现它、善于在实践中实现它、能够对它负责、能够捍卫它、能够为它而奋斗的人。否则，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sup>④</sup>

<sup>①</sup> [俄]列宁：“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年秋），《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34页。

<sup>②</sup> 同上，第79页。

<sup>③</sup> [俄]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文献”（1904年），《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16页。

<sup>④</sup> [苏]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93～694页。

二是组织体系的价值要求。无论是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劳动群众的先进组织所担负的建立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还是苏联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形成的党领导群众的成功经验，都在相当意义上内在地规定了党与群众这一主客体的依附关系，在更深层面反映了苏联共产党组织体系的价值要求。即作为苏共政治象征的干部这一主体是以相对于劳动群众这一客体的真理掌握者而存在的。在上下等级关系中，干部作为党领导群众的主体肩负着教育、引导群众客体的特定使命，群众作为党的领导的客体被赋予了接收教育改造的身份标定。这一组织要求在列宁所创建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以来就一直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生存发展的核心价值。列宁认为，工人并不能自发地变成社会主义者，而只能自发地成为工联主义者；社会主义只有依靠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给他们。“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sup>①</sup>因此，“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sup>②</sup>。对此，乔治·萨拜因这样评价，列宁“习惯于认为革命乃是必须‘从外部’向群众灌输的某种东西，而且也乐于相信除非在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否则人民大众就是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毫无头脑的群氓”<sup>③</sup>。

可以说，正是苏联共产党在政党建设上所秉承的价值取向与使命承担，赋予了党的主要力量——干部——领导群众的特殊意义。应该说，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执政时期都是必要的。没有党的干部的自我牺牲和身体力

<sup>①</sup> [俄]列宁：“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年秋），《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页。

<sup>②</sup> 同上，第76页。

<sup>③</sup>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9～500页。

行,是无法唤起劳动群众对革命的向往和支持。但是在苏共执政以后,畸形发展的干部任用制度使得苏联共产党开始脱离劳动群众,干部也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利益“小圈子”。罔顾民意,身居高位而视人民如牛马,最终为人民所抛弃。正如列宁所言:“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sup>①</sup>

第四,从监督的空泛虚化来看,苏联共产党在干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使得在没有有效监督的自我封闭状态环境中,干部的升迁走留完全取决于上级的认可,这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制度设计原因。以任命制为核心的苏联干部制度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制度原因。应该说,列宁对官僚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是早有认识的。早在1904年时,列宁就对官僚主义作出了强烈批判,并表示官僚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党是有害的。他说:“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sup>②</sup>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后,列宁已经意识到,由于广大劳动群众知识文化水平的落后以及党的干部管理国家能力的不足,都使官僚主义的产生具备了现实条件。他指出:“由于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不能适应这一任务,同时我们几乎99%的人都已习惯于军事政治任务,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又复活了。这是大家公认的。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消灭旧的机构(就象十月革命时那样),把权力交给苏维埃。但是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又承认,在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已经复活,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没有。”<sup>③</sup>在苏维埃机关复活的官僚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有害影响,“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

<sup>①</sup> [俄]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9页。

<sup>②</sup> [俄]列宁:“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1904年),《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63页。

<sup>③</sup> [俄]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页。

的上层领导”<sup>①</sup>。

应该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以后,也曾经试图通过人民选举、设立工农检察院等方式来克服已经产生的官僚主义和官僚特权。但是俄国社会的现实表明,在封建落后的俄国实行人民直接选举只能是一种政治理想。为此,列宁不得不进行政治的妥协,采取干部委任制的方式以应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其后,经过斯大林的努力,以任命制为核心的苏联干部制度正式确立并逐渐巩固起来。中间虽然经历了赫鲁晓夫干部轮换制的改革,但是很快就被勃列日涅夫所否定。苏联干部制度开始表现出领导干部老龄化和职务终身制的两大弊端。而这两项弊端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僚特权的制度化,严重阻碍了苏联社会的发展。以至于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候,当经济改革陷入停顿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以打破苏共特权为名义,直接把苏联共产党和党的干部制度作为改革对象。据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小杰克·F.马特洛克回忆,当他看到这次会议的文件时兴奋不已,“新内容比比皆是”,“我从未在一份共产党官方文件中看到对诸如保护公民权利、权力分散、司法独立、在证明无罪之前先作无罪假设等原则给予如此广泛的重视”。“有些‘议题’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外,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些苏联惯用提法也不见了。从某种程度而言,‘议题’所谈论的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sup>②</sup>

苏联干部制度虽然几经反复,但却始终无法改变苏共垄断权力的固有弊端,这已经不能简单地说明是一种制度建设上的缺陷,从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来讲,这其实是一个政党的根本立场问题。正如罗伯特·米歇尔斯在《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中针对社会主义运动所发出的警告那样:“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还面临管理问题、民主问题。如果社会主义者仍将革命与社会变迁之间的

<sup>①</sup> [俄]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38页。

关系简单化,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将最终导致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并由那些狡诈的善弄权术的领袖们主导下的专政……因此,社会革命将无法带来社会结构的真正改变。它是社会主义者的胜利,而非社会主义的胜利,这种胜利的果实从社会主义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凋零。”<sup>①</sup>

也就是说,苏联干部制度的畸形发展以及由此产生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并最终导致人民抛弃苏共统治的事实表明:一个以特权为享受的政党是不可能永远站在历史舞台之上,一个封闭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维持长久存在的。当戈尔巴乔夫打开了苏联人民与外部世界的大门之后,苏联人民有了获取更多非官方提供的信息渠道时,用意识形态伪装起来的苏共干部“大公无私”“牺牲奉献”的身份神话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民众的嘲讽和鄙弃。苏联的惨痛教训表明了高度僵化集权的国家在信息主义面前的失败。“1917年俄国革命及其点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是20世纪重要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现象。共产主义与苏联,曾触动整个世界,并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世纪的社会与人民。然而此巨大的帝国与其强大的神话,却在短短几年中崩溃了,成为全无预料的历史变动中的最离奇例子。我认为此过程的根源,显示了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表现出爱国主义无能力处理向信息时代的过渡。”<sup>②</sup>

也许,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根源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执政党竟庇护‘自己的’坏蛋!! 真是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sup>③</sup>

## (二)“反腐败”:改革的政治杠杆

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反对腐败从来不是一件单纯的追查刑事犯罪事件,而是一个撬动特权社会的政治杠杆。“在苏联历史上,刑事犯罪指控往往掩盖着事件真正的政治原因。”<sup>④</sup>

<sup>①</sup>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英文版序言,第6页。

<sup>②</sup> [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黄慧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2页。

<sup>③</sup> [俄]列宁:“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4页。

<sup>④</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11页。

安德罗波夫在其执政时期,甚至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对苏联社会中存在的普遍性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于是,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开始着手进行反腐败斗争。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特别是随着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梅杜诺夫的时候,安德罗波夫遭到了来自总书记的直接干涉:不允许再查下去!勃列日涅夫在看过安德罗波夫提交的一份报告后说:“看了安德罗波夫关于国内情况的阴暗报告我感觉完全病倒了,过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恢复不过来。他当然是想用他的报告把我送进坟墓。”<sup>①</sup>这场冲突差一点儿以安德罗波夫的辞职而告终。冲突的导火索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另一位领导谢洛科夫——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引发的。谢洛科夫的告发得到了能够接近总书记的其他领导人的支持。“按照当时人们的印象,谢洛科夫是典型的‘苏联黑手党’的化身: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毫无原则、贪得无厌、为了达到目的毫不留情,他玩弄着勃列日涅夫对豪华汽车与其他奢侈品的嗜好。谢洛科夫要弄这套手法的全部实质,就是要把他所憎恨和害怕的、为自己的信念而爱好刨根究底的安德罗波夫排除掉。他不无依据地觉得安德罗波夫清楚地知道那些‘黑勾当’。双方彼此都是怀恨在心的。但是勃列日涅夫的‘宫廷游戏规则’迫使他们在见面时还得带着微笑,更何况他们在市内的住处都在库图佐夫大街第26号,而且在同一个单元,也就是与勃列日涅夫的住房一个单元,不过是在不同楼层罢了。”<sup>②</sup>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执掌苏联政权,他继续未竟的反腐斗争。在首先对莫斯科商业系统的腐败案件查处后,报刊开始大规模地谈论国家和党的机关里存在腐败现象的问题。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最严格的控制下开始的。1983年11月2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做出《关于在苏联媒体上报道有关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对莫斯科执委会商业总局“美食家”商店工作人员的巨额受贿者进行刑事调查的结果》的决议说,应当“同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结果,《消息报》《莫斯科新闻报》和《莫斯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18页。

<sup>②</sup> 同上,第217页。

科晚报》三家报纸,受委托“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意后,刊登法院对莫斯科执委会商业总局‘美食家’商店工作人员中的巨额受贿者进行刑事调查方面的材料”。三家报纸刊登的材料成了大量侦探故事、剧本、故事片的素材,成了新的、已经提升到“地方”和“地区”层次的揭露性政论文的素材。“黑手党”一词在新闻媒体中出现后,“成了现代政治体制的定义之一”。<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反腐政策,决心将其进行到底,以彻底清除党自身存在的弊病。这一政策得到了戈尔巴乔夫战友们的支持。

一方面,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利加乔夫都对苏联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特权问题心知肚明,甚至还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现象不仅不成为问题,反而成为一种政治风尚。在一些大型党组织和社会阶层中道德水准普遍下降,吃喝之风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影响极坏。博尔金到基层出差,看到那里有客必请,常常大摆宴席,不顾来宾而自己狂饮。向客人赠送礼品总忘不了也给自己留一份。很难相信,有谁到企业参观视察以后,其汽车后备箱中没有放进参观“纪念品”。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经常提到他当时如何苦于接待无数前去度假的客人、想方设法款待客人和馈赠礼品之事。<sup>②</sup>

不过,当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书记后,他也开始享受到体制所带来的一切好处。高级领导人的特权制度不只限于免费食品,他们的住房、别墅、汽车等很多的费用也都由国家或党的预算负担。他们的住宅通常在设备齐全的高档楼房里,必要时配备警卫和各种服务人员。<sup>③</sup>当然,一切待遇都是要根据他在党内的地位来决定的。成为中央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在体制内的相关待遇立即根据他的职级而有了新的调整。等待着戈尔巴乔夫的新的书记生活:“是给他派的贴身警卫、停在大门口的吉尔车以及老广场上那间设有接待室和休息室的宽敞的办公室。开完中央全会回来,门口肯定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69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sup>③</sup> 同上,第259页。

已经挂上写有办公室新主人姓名的牌子，这是不成文的规定的要求。此外，在‘书记成套待遇’中，还有莫斯科市内住宅和郊外别墅，配有与卫队同属一个机构的训练有素的服务人员；两名轮换上班的秘书；1—2名助手；大名鼎鼎的卫生部第四总局及其属下的门诊部、医院和疗养院；‘克里姆林宫特供点’——食堂和食品店，它们所供应的东西，照当时的标准来看堪称神话般的美味佳肴。”<sup>①</sup>

利加乔夫在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也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最后不得不屈服：不要特殊化。1983年4月，也就是利加乔夫被任命为组织部长的第二天，苏共中央总务部“赠送”给他一辆“海鸥”牌轿车。但利加乔夫非常不喜欢这个大的、特别豪华的轿车。因为他还不习惯坐“海鸥”，也不想坐着它在莫斯科市内到处走。所以利加乔夫马上给当时的苏共中央事务局局长帕甫洛夫写了一张条：“恳请拨给我一辆‘伏尔加’代替‘海鸥’。谢谢您。”但是回答是出人意料的，也是严肃认真的：“你想另搞一套吗？大家都需要‘海鸥’，你想同他们不一样吗？……叶戈尔·库兹米奇，不要另搞一套，使别的部长处于难堪境地。你这一级的工作人员应该怎么样，我们就怎样做吧。”<sup>②</sup>

但是从勃列日涅夫后期开始，国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不得不有所作为了。成为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决心来一个彻底转变。出于树立权威的和启动改革的需要，戈尔巴乔夫决定用采取新的措施——坚决地反对腐败——来向人民表明他的立场——改革的人民性。“整个社会，其中也包括相当大量的党的积极分子，接受新的思想转折是有困难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像是一种不能允许的‘叛逆’，简直就是要完全否定自己了。有些人并没有对官方的各种设定的意义做过深入的思考，他们在诚实地劳动、战斗、生活，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向自己提出问题：‘那我们过去为之奋斗的是什么呢？’要想让人们，让国家的公民懂得并且接受新的思想，需要时间，需要有能说服人的、透彻的解释，需要证明采取新的立场是有实际好处的。”<sup>③</sup>戈尔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53页。

<sup>②</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42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13页。

巴乔夫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反腐政策——作为确立个人权力的一种手段，对部分国有机关施以高压，以证明他下决心与贪赃受贿和玩忽职守作斗争。但是必须看到，1985年4月以后与以前的明显不同之处。首先，国内的社会情绪变了。“我们期待变革”——这是当时苏联最有名的摇滚乐手维克托·措伊唱的一首歌的歌名。国家需要变革。期待变革创造了一种普遍的乐观氛围。年轻的领袖受人信任。这几年，即使是明显不受欢迎的措施，诸如禁酒运动，或者赶超世界汽车制造水平的浮夸任务，引起的与其说是恼怒和怨恨，不如说是嘲讽掩饰下的对形势的理解。“戈尔巴乔夫表现的与贪赃受贿决一雌雄的决心，使大多数人成了他的同盟军。”<sup>①</sup>

1985年7月9日，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召开了党中央机关全体人员大会。利加乔夫作了题为“关于乌兹别克共和国党组织情况”的报告。腐败的事实令人发指。棉花的产量在增长，可是经过加工后的纤维产量却逐年下降。盗窃国家财富的款额达数十万卢布。各类“领导人”人均拥有2处至5处住宅，其中包括在城郊。他们个人可使用的轿车平均为5辆。三年里，苏共中央共收到了3万封来自乌兹别克劳动人民有关这一问题的信件，没有一封被认真研究过，对此谁都“不予以重视”。利加乔夫在报告中说，仅在一个卡什卡达里亚州，不得不逮捕了内务局的人，没收了这家“警察局”700万卢布的财物。在共和国的内务部里发现了一封信上的附笔：700个共产党员的“虚报名额”——为了显示党员人数的可观，担任所有州委主要职务的人彼此都是亲属。现在已有数千名党的工作者被撤职，他们中约有1500人被送上法庭。“总之，这是一种多么离奇的在‘帝国’内部的彻底腐败……和彻底的胡作非为景象。”<sup>②</sup>

然而“乌兹别克案”是作为政治案件产生的，它后来的发展完全符合苏联法律的传统——“以政治和党的需要为前提”<sup>③</sup>。在“公开性”的浪潮中，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15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sup>③</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13页。

受到俄罗斯广大阶层支持的对苏联社会中贪赃受贿现象的揭露逐渐变成了一种政治因素。魔鬼从被安德罗波夫打开一条缝的宝瓶里窜了出来。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开始担心了。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调查过程中有可能“翻出”有损于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时名声的材料，这使他不得不解除费多尔丘克的内务部长职务。这种担心是现实的、普遍的，因为苏联的经营管理体制“在决策方面”带有犯罪性。犯罪性绝非经营管理者的特点。“当不是经济实力、不是经营管理成效，而是部里或者从区委会到中央党机关官员的意见决定着机床、钢材和配套设备是否给企业，是否为扩大生产拨款，能不能再雇佣工人，能不能建厂、修运动场等等之时，在这种把全面‘分配资源’作为经营保障方式的条件下，犯罪性是经营管理方式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实际上，从每一个经营管理者、高级行政官员和党的活动家那里都能找到足以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的材料。这一点在苏联路人皆知。不过，对于那部分把经济体制中的矛盾当作个人发财手段的命官来说，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这种威胁第一次变成了现实。”<sup>①</sup>从 1988 年起，社会对干部特权的批评越来越激烈。一些能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新闻冲破了政治桎梏。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当时最受欢迎的《星火》杂志的主编公开指责一些党的高级官员贪赃受贿。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移交别墅、国家疗养院和休养所的工作于 1990 年年底结束。

反腐败斗争本来可以成为戈尔巴乔夫通过改革实现党的自我清洁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是在大规模的舆论宣传中，通过攻击苏联人的公正感和公平的理想，“把厌恶不劳而获的范式逐渐偷换为一种厌恶感，然后又偷换成对干部的仇恨，似乎他们成了剥削劳动人民的阶级。人们的不满情绪宣泄到与国家形象紧密相连的管理人员的身上”<sup>②</sup>，结果，戈尔巴乔夫在反腐败的斗争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一切都是过去的错！一切都是这个体制出了问题！于是，改革的悲剧出现了。反腐败为新的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制度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514 页。

<sup>②</sup>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171 页。

性契机。“改革的真正悲剧就在于，在苏共内部开始的我们社会的自我清洁过程，后来不仅变慢了，甚至是被歪曲了。对过去寄生在苏共和整个社会机体几十年的那些贪赃枉法分子的撤换，转眼之间停止了。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又出现了更为可怕的、各种各样的贪赃枉法分子，他们抑制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和国家内部出现的健康开端。就像迅速繁殖起来的马铃薯甲虫一样，刹那间吃掉了马铃薯的嫩叶，新出现的寄生分子很快就扼杀了改革的萌芽。结果，已着手进行革新的国家失去了平衡，开始摇晃起来，随后跌入了深渊。”<sup>①</sup>

#### 四、“政治的考量”：谋求保守与激进的平衡

戈尔巴乔夫并不主张预设改革计划，因为他相信生活会告诉他应该怎么样走。然而当戈尔巴乔夫打破了旧的体制对社会的控制之后，在激发了苏联社会赤裸裸的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的时候，作为“改革设计师”的戈尔巴乔夫究竟该何去何从呢？改革到底要往哪里走呢？无论是身处改革漩涡中心的利加乔夫还是戈尔巴乔夫本人都深深地困惑了。也许就像格拉乔夫分析的那样，当不知道生活应该往哪走时，那就顺着生活潮流而动吧。对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自问道：‘他’在多大的程度上、在什么时候‘是真诚的呢’？作为一个看问题简单化、绝对化的人，利加乔夫从未有过深深的疑虑。他很难想象，他的上司恰好在其出尔反尔、前后不一这方面才可能是真诚的，往往有时他实际上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该听谁的：是听雅科夫列夫的呢，还是听利加乔夫的？因为他觉得其中每个人都表达了部分的真理。而最主要的是他并不清楚：历史想要什么，历史究竟要把他本人、他的国家以及他所开始的改革引向何方。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然是遵循试飞员在进入超常规状态时的金科玉律（利加乔夫曾就读于航空学院，他把改革比作一架进入颤振状态的飞机）：如果不知道做什么，就什么也别做。戈尔巴乔夫

<sup>①</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45~46页。

正是在政治颤振的状态下,认为相信事件的自然发展乃是最明智的办法,他认为自己的作用就在于借助语言麻醉去安抚、平息、麻痹惊恐不安的社会,使外科医生——历史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务”<sup>①</sup>。

### (一) 焦躁: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

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呢? 如果可以给予总结的话,那就是“焦躁”。用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走极端。他说:“改革和当代的最重要的教训在于,不能指望通过飞跃或剧变获得成功。当然,我们头脑中产生这种指望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一直习惯于自我发泄、自我保护、自我激励。为了民族大计而在许多方面放弃或限制自我。人们今后还会如此,这是他们的优点……不过,还是不要指望所有问题可以一下子得到解决。不要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sup>②</sup>

按照雷日科夫的观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表现出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领导者的“焦躁”特征。<sup>③</sup>

第一阶段是着手进行必要的民主革新,对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放松硬性控制,实行“公开性”的阶段。在改革刚刚启动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主张的“改革”在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看来,只不过是新任总书记提出的又一个标新立异的宣传口号而已,就像已经提出的“加速”战略。因此,对 1985 年 5 月戈尔巴乔夫的列宁格勒之行的讲话,人们并没有予以特别的关注。或者说,作为刚刚上任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完全取得全党的支持。“人们注意到,电视转播了这次讲话,但是报纸没有登载,在苏共列宁格勒州党委就戈尔巴乔夫视察结果所作的决定中,‘改革’一词仅仅在涉及日用品生产时提到一次。这也是一个征兆,表明党的机关不支持自己领导人的思想,而这一点也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是否受到信任的一个重要附加因素。社会使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20 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第 114~115 页。

<sup>③</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109 页。

新任总书记面临信任危机,也许,他的任何一个前任都没有遇到过。”<sup>①</sup>经过一年的实践,戈尔巴乔夫发现自己的改革“呐喊”在全党并没有引起他所期望的反应。很显然,1985年开始的有限“改革”已经无路可走。戈尔巴乔夫开始发表更为激进的讲话。6月,他攻击了有影响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到夏末,他开始谈到改革政治制度。戈尔巴乔夫认为,党内存在阻力。要打破这种阻力,就必须让改革的主体——人民——参与进来。“让人民参与政治”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进改革的目标和动力。从1986年开始,“公开性”不仅成为戈尔巴乔夫破除旧的思维、改造旧的心理的重要武器,而且成为戈尔巴乔夫用来衡量改革的政治评价标准。1986年,他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宣布:“如今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涵盖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党的以及我们全体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改革是一个大容量的字眼儿。我们将推动改革……大踏步前进。”<sup>②</sup>在1986年10月2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苏共中央收到的来信问题时,葛罗米柯发言反对“公开性”,并且强调要坚持由党而不是其他力量来作意识形态的裁判。他说:“首先谈意识形态工作,它应当完全符合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任自流,哪怕是在个别地方。而且必须记住: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没有比党、党中央及其政治局更高的裁判员。显然,使用警察的方法在这里不适用,必须首先使用信念和解释的力量。但是毕竟不能回避一个现实:想让我们回头重新评价过去,再次对斯大林、工业化和集体化提出异议的人在我们这里并没有绝迹。这简直不能容许……”<sup>③</sup>为换取支持,戈尔巴乔夫决定推荐葛罗米柯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的国家元首。1987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以及1988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使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突然加速。“尽管戈尔巴乔夫受农民经验的熏陶,喜欢重复‘欲速则不达’这样

①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06页。

②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③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45页。

的话,在由他亲自唤起的期望的压力下,他不得不采取试验的办法,也就是犯错误的办法,愈来愈加快前进的速度。”<sup>①</sup>

第二阶段应该从 1989 年年中算起。它的特点是激进民族主义的抬头和夺权斗争的展开。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维·伊·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如果说 1988 年经济改革的进程减速,而政治改革开始跃居首位,那么在已经来临的这一年,国家的政治变革之势犹如‘九级巨浪’……”1989 年成为“改革”的最高点。与此同时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楚:“以社会主义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的‘改革’有其历史局限性,而且前途无望。”<sup>②</sup>这一阶段的“开篇”之作是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雷日科夫指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种民族主义的癫狂相对于全苏整体来,开始得更早,即从 1988 年年中就开始了。当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预警信号。正在开始实施改革的国家领导人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但是相比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历史上的创造性发展——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带来的政治满足感来说,对于已经存在的民族主义癫狂,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无视。这种政治无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极端的政治短视,最终戈尔巴乔夫带来了政治上的失败。雷日科夫说:“他忘记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考虑到最主要的东西——我国的特点。请注意,苏联有近三亿人口,民族和信仰的构成都非常复杂。国家的历史之所以不简单,还在于它虽强大而富饶,但相当一部分人民对此却毫无知觉。在这样的条件下,改革者必须得一步一个脚窝,无论是方向、规模、速度还是时机,都要找得特别准。也就是说,行动必须要有具体的、切合实际的纲领。但总书记却没有纲领。戈尔巴乔夫着急了。现在很难判断,当时他是受到什么力量的推动,不知是出于性格,还是受到谁不断催促,时间不等人哪!我看两方面的原因都有。那些‘改革’的策划者们利用总书记性格中的某些特点,推行他们自己的路线,以更快地动摇国本,消灭他们所仇恨的社会制度。当雅科夫列夫及其一伙牵着总书记的鼻子走到对国家已构成危机的第二阶段时,总书记束手无策了。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迈出。我想,他掉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04 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16 页。

进什么圈套,他自己是明白的。于是就开始乱套了,权力也丢了,改革初期建立的威信也丧失了。这恰好应验了一句富有哲理的格言:‘从爱到恨只有一步之遥。’”<sup>①</sup>

## (二) 领导者与裁判者:改革中间派

当“公开性”和“民主化”唤醒了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处于长期冬眠状态的激情时,铁板一块的苏共和社会开始出现政治分裂,戈尔巴乔夫幻想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形成了。

改革既然具有“期望的革命”(戈尔巴乔夫语)的面貌,它就在社会中唤起了形形色色的希望。“如果说大部分居民是相当模糊地相信可以通过奇妙的跃进一举进入西方标准的繁荣世界的话,那么在社会中最具活力、并未进入党内官僚行列的那部分人看来,改革和任何革命一样,首先意味着‘大量的空缺’。由于戈尔巴乔夫出于各种策略上的考虑,迟迟未公布初登政坛的‘戈尔巴乔夫的应征者’,那些听够他的讲话、相信自己绝无仅有机会已经出现的人,便渐渐地感到不耐烦了。人人都各显其能,利用这个机会。相当大一部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意识到改革并未带来习惯性的干部更新,却对他们的平静生活构成威胁,便投奔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内的斯大林主义者,并开始形成好斗的反改革势力。大多数普通党员则类似解除战时状态的军队,他们丢掉装具和军服,纷纷交出党证或者只是停止交纳党费,成批地离开党的多面堡。共和国的精英们失去了加入联盟官僚行列的前程,也摆脱了先前对发怒的莫斯科的恐惧感,掉头加入如今已是安全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离主义运动。”<sup>②</sup>

更为关键的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也变了。“他变成具有异国情调的、政治上的半人半马(半是总书记,半是议长),同时充当保守派和激进派的领袖,既要吆喝和鞭打一些人,又要勒住和遏制一些人。看来,这是戈尔巴乔夫极为有趣的政治体验和个人体验,又是惟一有效的推进改革的策略,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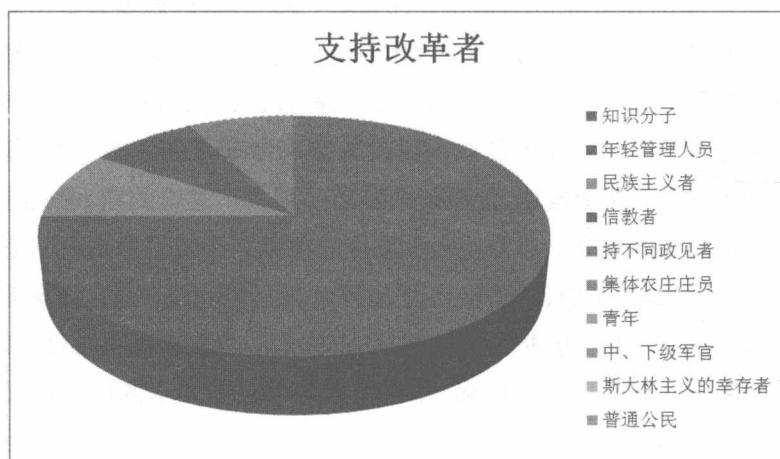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05页。

策略得到了补偿,至少在同时进行的比赛场次中能够在所有的棋盘上获胜之前是如此。然而愈到后来,这样做的风险就愈大,戈尔巴乔夫肯定意识到一旦处在等待对手出牌的地位,那他自己就有失去主动权的危险。如今改革的节奏和进度表已愈来愈不是由他来决定(他是根据自己的分析、本能和对全国上下对于某种新事物的准备程度的估计来确定的),而是由唤醒的政治自发势力、介入政治的各种政治势力和个人的自由游戏来决定的,这样以来他与其说是起到主动的作用,倒不如说是起到反动式的作用。”<sup>①</sup>

于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右边,是以利加乔夫为首的正统共产党领导人企图勒紧改革的缰绳;在他的左边,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则要加快改革的步伐。然而他们身上的光彩遮盖了相当复杂的社会现实,那就是在支持或反对改革的大派别中又分成许多小派别。

常驻莫斯科的外国分析家们编制了一份“左”“右”力量对比表:<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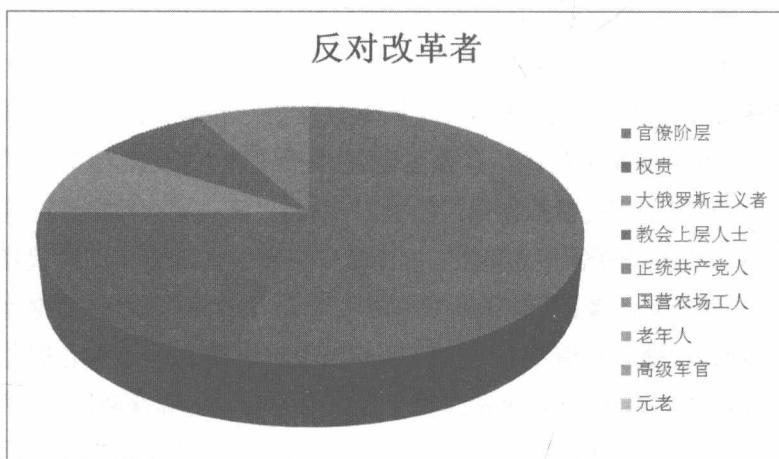


注: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有许多“僵化”文化的继承者反对改革派地位的上升,其中有在小说中叙述苏联将进入一个美妙世界的作家,因忠于前政权而被提升的科学家和吹捧勃列日涅夫、报喜不报忧的记者。中、下级军官看到勃列日涅夫的失策(特别是出兵阿富汗)使军队丢了面子,使他们失去了晋升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担心随着大批裁军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05~206页。

<sup>②</sup> 埃菲社莫斯科1989年1月21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9年1月21日。

而失去特权。



注：官僚阶层中也有支持改革的。例如，那些在地方上辛苦工作而没有享受特权的官员，以及那些有能力、没有“关系”而得不到提拔的干部。元老们也分成安德罗波夫派和勃列日涅夫派。前者赞成改革，后者则反对改革。

在政治派别分立的改革浪潮中，戈尔巴乔夫将自己定在“中间派”的角色上，其实有着他自己的政治考量。

首先，这与他的政治性格有关。凡是和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的人都知道他善于摇摆。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尔巴乔夫另一性格特点也显露出来。“他从不停留并坚持一个固定的立场，哪怕是他刚刚亲自确定的，这也就是他前后不一的原因之一。他不断地退却，常常改变观点、主意，不能坚定地支持一些人和批评一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说经常改变立场，这造成了混乱，给投机冒险创造了机会。”<sup>①</sup>摇摆不定成为1988—1991年间戈尔巴乔夫政策的主要特点。“他既没有勇气前进，也没有勇气后退。党的各级领导者看不到实现转变的道路上的明确目标，也看不出进展，他们已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他们知道，和他一起会走上死路。有民主意识的人也一下子都离开了总书记。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悲剧，但也是党的悲剧，是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我们全民族的悲剧。他最终成了孤家寡人，他的党看不起他，社会上那部分民主人士嘲笑他，只有西方国家在为他唱赞歌，他们没有忘记戈尔巴乔夫为他们做的事，千方百计地支持他。”<sup>①</sup>

其次，这与他的政治经历有关。博尔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不幸（不是他的过错）也许就在于他一生从事的都是机关工作，这便给他造就了一副“柔软的”脊柱，而不是坚强不屈的性格。<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本人不愿意让他希望投身于自己的计划的全国上下总是被改革首倡者们拖着走。因此就经常停下来，回头看看落伍者，就像陪伴羊群的牧羊犬一样，在围着羊群跑完之后又力求折回去，确实弄清没有一个掉队的。戈尔巴乔夫总是操心避免社会分成主导者和从属者、果断的先锋队及其带领的消极的群众两部分，唯恐在途中把谁丢掉，这就使得他试图求出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公分母”（最后几年尤其如此），往往让自己确信他是面向大多数，是在使自己与扫尾的后卫部队保持步调一致。“最终是两边不讨好。”<sup>③</sup> 所以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实际进行改革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便失去了对改革的兴趣，而去改做其他事情。“他的主要活动范围自然很快便局限于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或在电视上讲讲话，再有就是出访西方，因为在那他作为国家的代表受到了尊重和欢迎。”<sup>④</sup>

最后，这与当时政治现实有关。戈尔巴乔夫承认：“我们决不是缺心眼的人，居然不懂得手里要是没有权力这个杠杆、没有克服所设想的改革必然会遇到的抵制的能力，就无法推行任何实质性改革。”这个问题早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之前就已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当时戈尔巴乔夫是这样打算的：为实现改革的设想所必不可少的“盾”，将由权力逐步从党手里转归经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手中来予以保证，并形象地将其表述为：“从老广场转归克里姆林宫”。我们还意识到，权力不像物品，可以亲手转交，“关键是不要在半途中把它丢失了”。权力的更迭是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必然会遭到那些不得不与权力告别的的人的抵制，同时要求做好积蓄新的力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99页。

<sup>②④</sup> 同上，第97页。

<sup>③</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68页。

量的准备,他们要承担管理国家的责任。不难看出,苏维埃尚未准备好履行全部权力职能。没有为此所必备的机构,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专业素养的干部,也没有经验。而主要的是缺乏自信心,缺乏那种今后一切都要由他们最后拍板、再也不必每走一步都要跑到党的区委和州委去征得同意的自信心。简而言之,为了“掌权”需要时间,而且是不短的时间。<sup>①</sup> 对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构想,奥地利《信使报》作出了评论:“在党内,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不仅证明自己是个天才的策略家,而且也引入了一个原则上的新因素。他允许派别斗争,这样他就取得了一个极重要的调整手段。他的政策因而真正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它是由‘左’‘右’两种偏向合力组成的,因而起着真正融合一体的作用。这就意味着,他的政策是较易实现的,因为它确实是得到了党内最广泛支持的中间路线。”<sup>②</sup>然而政治现实却没有给戈尔巴乔夫这个时间。无论对党内官僚疯狂抵制改革的程度,还是对改革唤醒的新势力的权力欲,戈尔巴乔夫均估计不足。他迷信民主万能,以为民主像市场那只“无形之手”一样,即使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里,也可以在顷刻之间成为任何社会关系、包括尖锐冲突的社会关系的万能的自动调节器。在这个国家里,除了在民主发展方面传统性的长期落后而外,还得加上 70 年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经验。“由于体制一味依靠强制手段,社会深层就不能不积聚起一股脱离装潢门面的社会主义、发挥保守主义和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应的潜在力量。因此,借助民主的‘起子’将盛有发酵好的苏维埃‘家酿啤酒’的密封瓶打开之后,溅洒出来的东西与改革首倡者的期望大相径庭,也就不足为奇了。”<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助长了所有这些多元化自发势力,却使他处于“骑虎者”的尴尬境地,他的主要危险是从虎背上被甩下来。此外,他又成了议会领导人,却并未得到所希望的更多一层保护,反而使自己置身于交叉火力之下。一方面,“那个经受着政治上的舰船沉没的党愈来愈严厉地要他这个船长作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12 页。

<sup>②</sup> [奥地利]《信使报》7月3日评论“不是盖新房,而是彻底翻修”,《参考消息》1988年7月5日。

<sup>③</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17 页。

出解释”，另一方面，议会中的激进反对派又不耐烦地在旁边推推搡搡。“不许他屈服于党内保守派的压力。”<sup>①</sup>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处境，在让人愤恨的同时，也让人怜悯。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就说：“我现在有时觉得，戈尔巴乔夫内心不希望把苏联弄垮。无论人们怎么议论他，这个倒霉总统还是想保留自己的‘王冠’，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权力抓住。他的手脚被缚，因此不得不转向‘左右逢源’。但是‘左右逢源’过了头——丢失了政权，毁灭了国家，这给他留下永远难以抹去的耻辱。”<sup>②</sup>

### (三) 改革：既所以说开头也所以说结束

除了政治上的妥协摇摆，戈尔巴乔夫另外一个政治品质就是“能言善辩”。“言语成了戈尔巴乔夫的第一必要工具，也是由于他的计划及其选定的实施方法的特殊性。他正是指望通过讲话、解释、对于改革的鼓吹，将社会舆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让怀疑者跟着他走，甚至使对手回心转意。”<sup>③</sup>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难道总书记是神吗？党的其他领导人为什么会失去思考的能力？科伊乔·佩特罗夫分析，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不同于所有其他人包括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斯大林、列宁的政治人物。“他的‘机智的改革主义’惟一依靠的是他那能言善辩的发明家的才能，而避免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汇（西方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些品质并给以高度评价）。他以‘改革’和‘公开性’不仅偷换了马列主义的政治词典，而且偷换了整个苏联党和国家的实践和制度。”戈尔巴乔夫的这种行为方式可以用两个具体因素来解释：一是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机会从事过任何具体职业。二是他的农民出身，其中包括从南俄地区继承下来的哥萨克农民品质。“戈尔巴乔夫有没有两千万党员所特有的某些个人的或职业上的品质或功勋，从而受到重视并被提升到最高职位？除了那枚劳动奖章（戈尔巴乔夫在村机器拖拉机站跟父亲一起当实习助理机械师期间得到的）外，戈尔巴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05页。

<sup>②</sup>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71页。

<sup>③</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

乔夫在仕途上,从来没有留下任何具体职业的足迹。”<sup>①</sup>

也许,戈尔巴乔夫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当然是出于戈尔巴乔夫自己个性偏爱——抽象思考。格拉乔夫指出,早在关键的那几年,当戈尔巴乔夫的计划刚刚在打基础、历史为他规定的时限以及人民的信任预期中的每一个月都十分宝贵时,就已显露出政治家戈尔巴乔夫身上那个最终使他尚未建成的改革大厦一朝倾覆的特点:“不愿从事千篇一律的、日常的、一贯的工作,几乎到了厌恶的地步。让他感到激动和着迷的,是‘大事’,宏伟的想法,扭转乾坤的决定,远离(或者带着他离开)日常事务的计划。对他说来最有趣的谈话伙伴,是让他脱离平淡生活、枯燥的日常琐事,邀他进入高尚思想世界的空气稀薄的大气层的人。当时的政治局显然不适于进行雅典学派式的哲学辩论,于是戈尔巴乔夫会乐意将自己的时间慷慨大方地花在其他人、非‘法定’的谈话对象身上。”<sup>②</sup>

而对实际上负责整个国家具体事务的中央各部部长和各地第一书记们,戈尔巴乔夫却总是找借口不愿意同他们会谈。博尔金就发现,戈尔巴乔夫没有时间同部长们、同各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以及苏共边疆区委和州委的书记们交谈。这一切加深了总书记同中央委员、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和经济部门领导者之间的隔阂,他们始终积极地帮助戈尔巴乔夫而且准备继续帮助他,可是他们与戈尔巴乔夫的联系中断了。总书记对地方的情况不感兴趣,很少打电话过问,于是相互之间的关系疏远了。不愿保持联系是戈尔巴乔夫的一大弱点,没过多久,会见和电话对地方领导者来说已失去意义了。戈尔巴乔夫对经济工作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不再同部长和企业的领导者促膝交谈,尽管他们有种种建议和请求。同被邀请者的会见越来越少,会见时他常常进行说教或是言辞激烈的、侮辱性的批评,而且这类会见时间也不太长。于是,“人们感到同总书记格格不入,尽量不去找他,除非非去不可”。<sup>③</sup>

①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②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00~101页。

③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

怎么解释戈尔巴乔夫的这种个性特征呢？格拉乔夫继续分析：“从大学年代起就养成的对于构想性观点和理论研究的兴趣，还有始终未得解决的问题，这些都促使戈尔巴乔夫从更高的层面——抽象的层面去寻求出路。很难说这仅仅是令人羡慕的超越日常现象、居高临下地审视具体情况、进行概括和典型化的能力，亦即战略家智慧的特征呢，还是精神上逃离陈规陋习和日常琐事的一种方式。况且，既然这两者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又有什么手术刀可以将它们截然分开呢？”<sup>①</sup>

另一方面，也是苏联政治传统在发挥着惯性作用——党的总书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所当然的创新者和集大成者。于是，喜欢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就成为戈尔巴乔夫树立政治权威的重要手段。戈尔巴乔夫特别爱写文章，他认为“说”是自己最主要的工作和最重要的工作方法之一。一般情况下，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包括一些复杂的问题，他总是说：“应该写篇文章或写本书。来起草个大纲吧。”<sup>②</sup>自从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并引起国内外的热烈反响后，切尔尼雅耶夫就发现：戈尔巴乔夫竭力想对改革加以理论上的论证。这是按党的列宁主义传统行事：凡“大事”都应加以理论论证，党的领袖看来也应是一位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但是这一举动还有一层实用主义的考虑：正在采取的确实是不寻常的、超越官方正统思想界限的措施，需要意识形态的掩护，包括利用列宁的威望加以掩护，以便在人民中，特别是在党内，更容易地得到“通过”。在这段时间内，戈尔巴乔夫不止一次地因社会科学的碌碌无为和受教条主义禁锢而加以挖苦：“列宁从不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笔直的。他善于变换口号，当生活要求这样做时。他从来就不是已经通过的决议的奴隶。政治的艺术就在于要考虑形势。如果你忠于理想，忠于工人阶级的事业，那就不必害怕某些从表面上看近似于另一种制度所具有的形式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我们在对待自己的公式方面已经僵化了。”<sup>③</sup>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6页。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47页。

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促成了戈尔巴乔夫喜欢“说”的特点形成。那就是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可行的改革方法，所以试图在“说”的过程中寻找到答案。“成功地玩弄术语的做法扩大了纵横捭阖的空间，然而在巧妙的词句结构之外，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改革却进行得并不顺畅。如今戈尔巴乔夫的一个解释是：最初数年，他和他的战友们自己并未弄清真正的优先方向，试图同时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以及全新的问题。”<sup>①</sup>格拉乔夫指出，人们希望看上去真诚得令人喜欢、值得信赖的领导人除了保证一切都会马上变好之外，能够提出一个可使国家迅速实现梦寐以求的繁荣的解救性纲领。然而纲领始终搞不出来。尽管在笼统的词句和选择主要前进方向方面似乎一切都能很清楚：走出停滞就需要“激活”经济发展和“加强每个人的责任心”。但是主要的问题却始终没有答案——从何入手？列宁所说的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那个“关键环节”始终没有露头。戈尔巴乔夫“继承下来的问题像一团乱麻，伸出好些个线头，他依次抓住一根又一根线头——机械制造业、科技进步、农工综合体，却每次都确信没有抓住关键，乱麻反而愈来愈乱了”<sup>②</sup>。

不过，戈尔巴乔夫虽然喜欢对“改革”进行理论的论证，但是自始至终他身边的人都没有搞清楚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这些名词和概念准会把人们搞得莫名其妙，谁也不会明白改革是怎么回事、改革将如何实行。后来的结果就是如此，有许多关于改革的政治笑话，改革一词渐渐成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盲目变化的代名词。”<sup>③</sup>

难道，戈尔巴乔夫有自己的隐藏的深意？戈尔巴乔夫是在最初巡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时开始使用“改革”一词的，起先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讲演时用了两次。后来他在哈巴罗夫斯克又对国内改革作了全面阐述，它的意思显然就是在国内进行全面改造。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旨在加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改革的计划，改革实际上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同勃列日涅夫时期一样，人民听到的仍是一些通俗易懂、但又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② 同上，第113页。

③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44页。

不负责任、毫无实际意义的话。“生活越来越糟，党只顾为过去的错误而自责，却没有能力改变现状，这使得人们渐渐地与苏共疏远，把它视为万恶之源。”人们很快便发现，不进行深入的改革，很难加快国家发展速度。权力结构渐渐瓦解的同时，新生力量开始兴起，他们大张旗鼓地、无所畏惧地批判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就在这时，博尔金发现，“还有一股势力对国家沿着科技进步的道路快速向前发展根本不关心，他们更想做的是摧毁现存的政治制度。”于是，“含义模糊的‘改革’一词被各种势力用来大做文章，谁也搞不清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搞不清改革道路上那些难以辨认的路标会把人们引向何处”<sup>①</sup>。

但是政治现实却告诉戈尔巴乔夫，这种不喜欢抓具体事情的政治特点，往往“决定着改革的命运”<sup>②</sup>。造成的后果就是：社会上人心惶惶，因为党的指导思想不明确，经济状况非常糟。领导者仍在探索究竟什么是改革，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空话、指责自己的前任，而人们却越来越多地思考着：领导者究竟要把我们领向何处，现在应该做些什么？“这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但当时确实没有人知道具体应做什么。当时正处于理论上混乱不堪、组织上软弱无力的时期，今天说一样，明天说一样，而干的又是另一样。”<sup>③</sup>可是摆脱危机的办法却仍然提得含含糊糊。形势极为紧张，“从改革到革命只有一步之差，就缺一根导火索了。1991年8月，导火索终于找到了”<sup>④</sup>。

综观戈尔巴乔夫的七年改革，对戈尔巴乔夫“能说会说”的政治特点人们仍然记忆深刻。“戈尔巴乔夫在中央非常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这时他就有了改革社会生活的想法。当然，他那时尚没有系统的改革理论。这些想法多半是修修补补性质的，还不是对国家各方面生活进行改革，即后来向世界表明的那样。但后来全世界看到的是口头上的激进主义，事实上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56～157页。

<sup>②</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48页。

<sup>④</sup> 同上，第157页。

的软弱无力。”<sup>①</sup>苏联社会所面临的深刻矛盾和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更需要的是领导人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地、一个一个地解决好人民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好高骛远、空言大论，最后却破坏了人民的生活基础。博尔金指出：“如果把戈尔巴乔夫讲话中具有感情色彩的话，把改造世界的不实际的想法去掉，那么会发现这些讲话有许多合理的和健康的论断。不幸的是话讲得虽好，但这位总书记总是以说开头，也以说结束。在创造新词汇方面戈尔巴乔夫超过所有的前任，我认为按执政时间长短来衡量所说的话，他在斯大林以后的领袖中绝对名列前茅。不幸的是，戈尔巴乔夫作为演讲者，多年以来通过讲话号召群众建功立业，但他自己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号召。如果说破坏现行制度不需要很多智慧和技巧，而且他在这方面也确实取得了成绩，那么在建立新制度方面他却觉得力不从心。人民过高估计了他的话，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七年的夸夸其谈不仅没有使国家向前发展，反而向后倒退了。”<sup>②</sup>在穆尔扎看来，戈尔巴乔夫的这一特征却证明了他是一位天才的大众意识操纵家。“起初他全力动用集中的党权、迫使卷入政治的人接受所谓‘别无选择’的荒谬的方针政策。接着把各种各样的玩意儿套进这个公式：改革、方针、市场、叶利钦等等都是别无选择内容……此外，还广泛运用所谓同心同德向前看的招数。（此法也可以用一个粗俗的比喻来概括：‘已经上了贼船了。’）总之，就是要说服老百姓相信，而且努力也不无成效，说什么退路是没有的，已经破坏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现在没有别的法子，只好继续进行改革了。”<sup>③</sup>

①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前言第2页。

② 同上，第290页。

③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89页。

# 第五章 “破除社会阻碍机制” ——苏联共产党的改革

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思,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改革的成败,尤其在初始阶段,完全取决于苏共对待改革的态度,因为实际上苏共本应自动舍弃原来的独裁专制。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痛苦而又特别严重的政治战役,可以说对于党内的高官阶层来说,那是“致命的结局”。“退位”,意味着这批人将逐步失去他们原先所享有的特权,意味着他们将从当今世界强者地位下降为平民百姓。不难理解,党政官僚阶层肯定对这些新政措施极端仇视。当时,政权的关键部门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而只有两种办法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一方面,组织社会上大多数坚决主张彻底变革的力量,对党政官僚阶层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运用策略手段削弱上层的抵制,孤立其中最保守的部分,广招具有新思维的人士一起参与改革。不采取策略手段应对,已经形成总体体系的强大的官僚阶层是永远不会拱手让出权力的。——戈尔巴乔夫如是说。<sup>①</sup>

## 一、改革的保证人:苏联共产党

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是根据苏联共产党的倡议开始并且在它的领导

---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0~191页。

下进行的。党认为自己有勇气,有力量制定新的政策,并能够领导和开展社会的革新进程。”<sup>①</sup>因此,作为为了巩固社会主义,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改革的倡导者、思想动力、组织者、领导者——苏联共产党,是“改革的保证人”<sup>②</sup>。

### (一) 共产党与政权

戈尔巴乔夫指出,在有倾向性的改革史编纂学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提法,似乎苏联共产党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变革的反对派,而且尽其所能地干着阻挠改革事业的勾当。“也许,党内确有不愿见到任何变革的阴鸷的保守分子,还有那些预感到改革对他们的利益会构成威胁的党僚们,对改革抱着十分警觉的态度。但大多数共产党员意识到必须对现行制度进行深入的改革。正是作为一个组织的苏联共产党,才是变革的首创者。”<sup>③</sup>

苏联共产党作为“变革的首创者”,这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原则体现,也是由它在苏联政权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

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原则来看,苏联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斯大林指出:“党是我们国家中的领导力量。”<sup>④</sup>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又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领导力量。工会、苏维埃、青年团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重要内容。共产党无疑应该而且必须是领导力量。“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和本阶级联系起来;苏维埃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和劳动者联系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新一代并培养青年后备军;最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63页。

② 同上,第150页。

③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7页。

④ [苏]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84页。

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领导这一切群众组织,——大体说来,专政‘机构’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sup>①</sup>可以说,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sup>②</sup>即,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不与其他政党而且不能与其他政党分掌这种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任何巩固的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党呢?因为党是无产阶级顺利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战斗司令部。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把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在斗争进程中把整个运动的领导都集中起来的党,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专政。可以说,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因此,执政的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其本质意义在于要保持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sup>③</sup>。

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实践来看,苏联共产党是苏联政权体系的政治核心。按照苏联宪法的逻辑,应当是苏联共产党制定政策,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政府执行这一政策和贯彻法律。但是因为苏联共产党插手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职能,“整个方案名存实亡。结果是乱成了一锅粥”<sup>④</sup>。一方面,权力机构没有任何分工,没有任何监督;另一方面,权力又高度集中。密洛凡·吉拉斯深入分析了苏联的政治权力结构。他指出:“共产党人用以控制社会机构的基本方法有二:第一是党组,这是原则上和理论上的主要方法。第二是政府机构中的某些职务只许党员担任,这是实际上常用的方法。

<sup>①</sup> [苏]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37页。

<sup>②</sup> [苏]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3页。

<sup>③</sup> [俄]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6页。

<sup>④</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这些职务包括警察,特别是秘密警察人员,还有外交官员和军官,特别是负责情报并作政治活动的人员等,这些职务在任何制度的政府中都极为重要,但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中却尤其重要。”<sup>①</sup>苏联共产党虽然承认政府有权及时有效地管理经济和社会领域。“然而事无巨细,均需得到党的同意。而若干重要的部,诸如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内务部,实际上完全受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控制,经费和建制仍然留在部长会议。”<sup>②</sup>“只有党员才能任警察、军官、外交官及类似的重要职位,或者只有党员才能真正行使权威,这是共产主义国家特有的不成文法;于是一种特殊的享有特权的官僚集团被制造出来了,政府和行政机构也因此而单纯化了。这样,党组便扩大了,并且或多或少地包罗了上述各项工作。”<sup>③</sup>“整个政府结构都是以这种方式组成的。政治职位完全保留给党员。甚至在非政治性的政府机构中,共产党人也占有当权地位或者负有监督之责。党中央召集一次会议或者发表一纸文告就足以推动整个国家和社会机构。”<sup>④</sup>结果,随着时期的推移,苏维埃日益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委员部则日益成为部门立场的体现者。党开始充当捍卫“全国利益”的整合力量。中央和地方的党委会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地区的常委会和全体会议上,如今不仅决定政治问题,还决定纯经济问题。“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它已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管理机构,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承重结构。任何改变这种作用的企图都被认为是‘破坏基础’”。<sup>⑤</sup>

从政权的实际政治运行规则来看,构建了“总书记—第一书记”权力体系。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力量能够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发挥全方位的领导作用

① [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5月内部出版,第93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③ [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5月内部出版,第94页。

④ 同上,第95页。

⑤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9页。

用,在苏联政权的政治实践中,在事实上构建起了“总书记—第一书记”的权力运行体系。戈尔巴乔夫指出,要弄清苏联政治体制的内部结构和机制,“搞明白共和国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特殊作用就十分重要。他们是体制的一个主要支柱。尽管存在机关在部门和行政上的分散性,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通过他们连接成为一个统一的体制。他们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占大多数,总书记实际上是由他们投票选出的,仅此一点似乎就使他们处于特殊的地位”<sup>①</sup>。至于说到第一书记的作用,那么只有过去沙皇省长的地位可以与之相比。一切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让全部地区管理机关甚至选举产生的机关都符合他的需要。任何任命都不可能绕开他们,任何稍微像样的领导职务都上了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的官名录。甚至在企业或者学校隶属联盟部的情况下,部长也不能撇开第一书记、未经第一书记同意就任命什么人。只有军工综合体这个“国中之国”可以例外。然而即使那些单位也都尽量考虑地方领导人的意见。总之“第一书记是一种特殊现象,是政权体制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职位和巨大权力不是人民给的,也不是差额选举的结果,而是莫斯科——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本人——给的。这就是第一书记地位的薄弱环节和自相矛盾之处。每个人都清楚,只要上面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就立刻失去权力和职位,立刻失去总书记的信任。”<sup>②</sup>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亲自组建这个班子,并且仔细进行挑选。在此之前,勃列日涅夫的亲密战友们——卡皮托诺夫、契尔年科——会对竞争者的专案文件进行悉心的研究。他们所得到的信息来自各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初步的意见。然后候选人与中央书记们一一见面,最后才与“头头”见面。戈尔巴乔夫回忆:“这样的整个程序我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叶夫列莫夫调走的问题刚刚提出来,就把我叫到莫斯科去。依次与卡皮托诺夫、库拉科夫、基里连科、苏斯洛夫谈话。这是所有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在批准之前必定要走的过场。”<sup>③</sup>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6~67页。

<sup>②</sup> 同上,第68页。

<sup>③</sup> 同上,第68~69页。

因此，“数十年间，党的最高机构的领导作用和无所不至的作用并无任何明确的符合法律的规定”<sup>①</sup>，但是其政治权力却是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正是基于对苏联政治实情的深刻了解，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运动”只有在发端于党内的条件下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任何别的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组织，想发挥类似的主动精神，那是注定会徒劳无功的，会遭到社会“政治核心”的排斥，也会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对现行制度的蓄意诋毁。这就是说，只有兴起于党的怀抱之中、由党的领导人来推行的事情，正统派人士才能勉强地容忍下来，不过总还得小心谨慎才是。而要是这样的事从一开始便发轫于旁门别路，就会寸步难行，必将被扼杀于萌芽状态。这时候，社会就已经像是一口蒸汽锅炉。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党自己给已逐步把社会的其他阶层全都卷了进来的变革过程定调子；要么保留原来的体制，不作任何变动，任其存在下去。到那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强力大爆发。应当关切的还有这样的情况：“改革体制，也就是将其逐步重建，只有手中握有权力的杠杆才做得到。”<sup>②</sup>

## (二) 改革就是革命

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是一个含义广泛、内容极为丰富的词。但是如果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选出一个关键的、最能表达其实质的词，那就可以这样说：“改革就是革命。”<sup>③</sup>

为什么要把改革叫作革命呢？戈尔巴乔夫指出：“据我们理解，革命是立，当然也总会有破。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打破过时的、停滞的东西，打破一切妨碍迅速前进的东西。没有破就不能为新建设清除场地。那么，改革就意味着坚决果敢地破除已形成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东西……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触及整个社会。自然，要破就不可能没有冲突，有时甚至不能没有新旧事物之间的尖锐斗争。只不过是没有炸弹的轰鸣和枪弹的呼啸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sup>②</sup> 同上，第228页。

<sup>③</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5页。

声而已。”<sup>①</sup>

具体来说,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实现其本质特性的飞跃,改革就是:

坚决克服停滞现象和打破障碍机制,建立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机制,使它具有更大的活力;

依靠群众生机勃勃的创造活动,更全面地发扬民主,发展社会主义自治,鼓励主动精神和自主性,加强纪律性和秩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大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更加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

使苏联经济全面集约化,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原则,普遍运用经济的管理方法,放弃行政命令方法,大力提倡革新和社会主义进取精神;

实现向科学化的坚决转变,学会使任何创举都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使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同计划经济结合起来;

优先发展社会领域,以便越来越充分地满足苏联人对良好的劳动条件、生活和休息条件、受教育和医疗服务条件的需求,时刻关心每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精神财富和文化水平;

使社会坚决摈弃歪曲社会主义道德的做法,始终不渝地实现社会公正原则,言行一致,权利和义务一致,推崇诚实的、高质量的劳动,克服劳动报酬方面的平均主义倾向和消费观点。

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深刻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在其各个决定性方面,即经济方面、社会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sup>②</sup>

### (三) 更新干部队伍

“干部决定一切”是苏联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政策。斯大林指出,如果我们想要顺利地消灭十分缺乏人才的现象,使我国得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推进技术和运用技术的干部,我们首先就应当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干部,重视每一个有益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工作者。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

<sup>①</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8页。

<sup>②</sup> 同上,第35页。

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sup>①</sup>“干部决定一切”的意义就在于：一是在正确的路线提出以后，在对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后，事情的成功就取决于组织工作，取决于组织实现党的路线的斗争，取决于正确地挑选人才，取决于检查领导机关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否则，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决议就会有遭到严重破坏的危险。“不仅如此，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sup>②</sup>二是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因此，斯大林指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要求党的领导人对党的工作者，对无论在哪个部门中工作的“大”“小”工作者，采取最关切的态度，用心地培养他们，当他们需要支持时帮助他们，当他们做出初步成绩时鼓励他们，推动他们前进，等等。而实际上我们却往往看到人们对工作者竟采取一种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态度和简直是“岂有此理”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所以往往不是去考察人才，不是先考察后任用，而是像对待小卒子那样把他们摆来摆去。重视机器，报告我们工厂里有多少技术设备，这一点已经学会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人用同样的热情来报告说，我们在某个时期内培养了多少人才，我们怎样帮助这些人才在工作中成长起来和受到锻炼。“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工作者，重视干部。”<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也认为：“在我国，拥有计划经济和特殊的经营管理体制，在党执政的国家，许多事情，而且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党如何行动，取决

<sup>①</sup> [苏]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35年），《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5页。

<sup>②</sup> [苏]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66页。

<sup>③</sup> [苏]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35年），《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1页。

于党的干部，而且首先取决于党的积极分子工作得如何。干部和我们党的积极分子，所有人都要有眼光，都要有新思想，养成新的工作态度，带领全民争取实现党代会的各项决议。”<sup>①</sup>因此，从 1985 年到 1986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干部决定一切”这一斯大林不朽名言的旗帜下度过的。

在戈尔巴乔夫刚刚上任的 1985 年，按照苏共政治传统，总书记将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对党的核心——政治局——进行调整。

1985 年 6 月 29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戈尔巴乔夫推行人事变动政策中的关键一环。会议对党和国家最高层的职务进行了重新分配，力量布局发生了变化。戈尔巴乔夫建议由安·安·葛罗米柯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提议由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出任外交部部长。

1985 年 7 月 1 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戈尔巴乔夫发言说：明天要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应当讨论一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候选人问题。罗曼诺夫被开除出政治局，谢瓦尔德纳泽由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叶利钦被提名进入书记处。

1985 年 9 月 26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吉洪诺夫“因健康原因”退休的决定。雷日科夫坐上了他的交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85 年 12 月 23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只有政治局委员、负责党的干部工作的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说，他和格里申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谈话，格里申不得不写信，要求退休和进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组。

在整个 1985 年，戈尔巴乔夫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局的组成。戈尔巴乔夫说：“都是平静地退出的，但事先都与我进行过谈话。我当时态度非常坚定，谈话开诚布公，不转弯抹角，但是很友好。我觉得，我所处的地位和担负的责任使我有道义上的权利进行这样的谈话。撤换各地第一书记时，我也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没有进行任何迫害。相反，通过专门决定，如果退休的中央书记想从外省来莫斯科，则给他们安排住房，享受医疗服务。我认

<sup>①</sup> 塔斯社莫斯科 1986 年 8 月 1 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 年 8 月 6 日。

为,这种花费是值得的,是为新生力量开辟道路。”<sup>①</sup>戈尔巴乔夫不无自豪地宣称:我开始实现我的“空想”。<sup>②</sup>

从1986年年初开始,戈尔巴乔夫的目标越来越大:更新党的整个干部队伍。

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同参加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的谈话时指出:“党的原则性战略目标和任务依然没有改变。我们依然坚定地忠实于我们一贯坚持的那些价值观。至于具体实现这些目标和达到它们的手段和方法,以及为解决多种任务需要有更多的灵活性,那么在这方面当然有许多东西要改变。首先要改变的正是在经济、社会和我们的政治生活领域里必须更机动灵活地工作。而这就意味着首先必须改变党本身。在这里自然将要保留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的实质。”<sup>③</sup>苏共二十七大过后不久,许多中央委员已经不再参与活动,退休在家(303名中央委员中有84人已退休,157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也已有27名退休)。<sup>④</sup>

1986年夏天,戈尔巴乔夫在会见中央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时首次做出结论说需要革命。“改革——这是革命,是思想、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整个上层建筑、所有方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继续视党为革命的“先锋”,并指望它,也只有它能在所有方面——从经济到文化——从事改革的事业。也就是说这里所指的是“来自上面的革命”。<sup>⑤</sup>但在这时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发现,党准备完成这一使命并非一切都顺利。因为体制的惯性实在太强大了!“体制从四面八方——工农业生产企业、科研单位、各种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中仔细地遴选最积极、最有活力的领导人。它确实在尽量地取其精华(换成俗话就是‘刮走奶皮’).不过只要你登上了官名录,无论你做什么,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4~15页。

<sup>②</sup> 同上,第14页。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73~74页。

<sup>④</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7页。

<sup>⑤</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无论你是工厂厂长还是有才气的工程师、杰出的学者还是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每个人都在这个体制中有指定的位置，就应当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最终，体制让干部通过‘党的分离器’，将‘奶皮’加工成自己的‘黄油’。”<sup>①</sup>一旦成为继续旋转的原有机制的“小齿轮”之后，就连并未受到停滞感染的年轻干部也开始表现得与他们的前任毫无二致。“应当看到，干部更替工作进展缓慢，如果说正在进行，那么替而代之的同样是那些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只是年轻些，他们贪婪而热烈地掌握着旧方法以及命令和强制的杠杆。但党内开始抵制，不只是因为人们被迫按他们所不会的办法工作，受到报刊的嘲笑，而且还因为党的干部（就是说还有国家干部）切身感到了对整个‘社会主义’秩序的危险性。公开性起着作用。越来越经常地出现一些文章，暗示有时甚至直截了当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构想和政策中的矛盾，指出如果不触动社会主义的‘圣牛’，他所致力于的任何改革都不会成功。”<sup>②</sup>

1986 年的更新干部队伍和推进改革的实践让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干部并不决定一切！格拉乔夫指出：“大体来说，这方面的机会并不比那个抓住头发要把自己从沼泽里拖出来的著名文学人物多。因为党的机关要充当改革的主要工具和杠杆，而它又颇有切肤之痛地感觉到，改革的必然结果就是打破机关对管理国家生活的垄断，并从而剥夺它的权力。官僚本能地嗅到的东西，改革首倡者却只有在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之后才开始意识到。”<sup>③</sup>

原定于 1986 年下半年召开的关于干部政策的中央全会也不得不一再推迟。外电在猜测推迟原因的时候认为，戈尔巴乔夫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遇到顽强的抵制。“这次会议推迟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里的顽固保守分子采取了自卫行动，他们反对戈尔巴乔夫想要在政策和人事上进行的某些改革。”<sup>④</sup>1987 年 1 月苏共中央召开关于干部政策的全会后，戈尔巴乔夫无奈地发现，他在全会上的主张在实践中都被党的各级机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67 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165 ~ 166 页。

<sup>③</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29 页。

<sup>④</sup> [英]《泰晤士报》1987 年 1 月 2 日报道，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 年 1 月 6 日。

关无视了。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对党在新思维的基础上改造国家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但是更糟的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新干部中间,反对派已经开始成熟,船上暴乱的危险开始临近:就是那个曾经将赫鲁晓夫搞下台的官僚叛乱”<sup>①</sup>。

那么戈尔巴乔夫如何清除他在党内的政治反对者呢?英国《情报文摘》分析,大概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以打击社会邪恶为名,然后转向具体目标。例如,戈尔巴乔夫反对酗酒的运动为清除罗曼诺夫铺平了道路,因为罗曼诺夫是个酒鬼。而打击贪污腐化的运动使不少批评和反对他的人丧失名誉,其中特别是莫斯科前党委书记格里申。另一种方式是迂回的办法。戈尔巴乔夫不是直接向目标进发,而是采取迂回的办法。例如,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的主要对手是谢尔比茨基。虽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能够把他从政治局里清退,但是戈尔巴乔夫却把谢尔比茨基在乌克兰的权力基础削弱了。乌克兰政府首脑亚历山大·利亚奇科被撤换,另有9名党的高级官员也被撤换。<sup>②</sup>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利用总书记的权威。科伊乔·佩特罗夫指出,戈尔巴乔夫在选择干部的过程中,利用一切强制和威胁手段,压制反对者的意见和反抗。他直接利用党的权力搞大规模的跟踪、调动和解职。“公开性”是他进行政治陷害的秘密武器。总书记可称得上是20世纪8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者。斯大林在党内恐怖时期枪杀了成千上万“可疑的”列宁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而戈尔巴乔夫则在党和人民的门口布满了圈套,把同“保守派”作斗争的绳索不断拉紧。他动用“现代化”斗争手段,在第二阶段保持自己“民主派”的形象,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一方面,有几十年的经济改革,不断扩大的社会民主和从60年代到80年代创造的财富;另一方面,“改革”的失败开始显露。戈尔巴乔夫选择陷害活人,摧毁人的精神和意志并不是偶然的。他必须戴上“民主派”和反斯大林主义者面具,尽管在第一阶段他的看法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观点。他甚至在面对自己的“兄弟”、合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30页。

② [英]《情报文摘》1987年7月29日文章,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8月4日。

作者和继承者、斯大林主义分子、民主派叶利钦时都不肯摘下面具。<sup>①</sup>

#### (四) 策略: 拉住党

戈尔巴乔夫发现,无论是已经习惯于旧的一切的“老”干部,还是在改革旗帜下提拔上来的“新”干部,对“改革”都有着自己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往往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在党内,特别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们随着改革的日益加快,对改革的走向、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等政治敏感问题的分歧越来越大。戈尔巴乔夫面临着党内威胁也越来越大。该怎么办才能使党内业已形成的反抗力量不至于重演赫鲁晓夫的历史悲剧呢?戈尔巴乔夫承认:“这个过渡原来是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比我们当初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首先是因为极权主义制度具有很大的惯性。构成极权主义制度牢固的国内骨干的党和国家机构进行了抵制。权势官僚分子加强了抵抗。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过去把整个国家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须得放弃自己的无限权力和特权。因此整个改革时期就充满了改革力量与那些抵制改革和那些特别在头两年之后开始简直是破坏改革的人之间的斗争,开始是隐蔽的,后来则是公开的,甚至是当众进行的斗争。”<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方面,仍然遵照苏共政治传统——更新干部队伍——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提拔拥护和支持他的“改革”的各级干部,以扩大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拥护基础;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通过对改革的部分妥协,试图稳住和拉住党的高层领导,使其不敢、不愿甚至不能走上启动罢免总书记的最后绝路。戈尔巴乔夫说:“有个念头始终让我不得安宁,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期望的结果一直达不到,阻力是什么,加速改造的潜力在哪里?现实生活催促党,社会整体领会新思想的能力比‘先锋队’要强。人民的积极性越是高涨,这种落后的感触也就越加强烈。我依然相信苏联共产党有可能获得新生,但它眼看着在失去一块又一块阵地。党的机构内部有点失魂落魄,已经公开地表现出对改革核心力量的不满。我们一直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8~139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71~72页。

在谈论遏制机制,但从未提到过党。当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个机制就在党内,党不仅落后了,而且还在抵制将会触及体制的变革。因为党正是这个体制的支柱。遏制基本上是通过机关去实施的,通过党的机构、国家机关、经济部门。机关又是什么呢?机关里非党人士就那么几员,屈指可数。要想毁坏迄今为止尚相当牢固的这一大堆人数达到1800万官员的根基,开始实施精简,我意识到,这是捅了一个马蜂窝呀。我也知道,这些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善罢甘休的。”<sup>①</sup>

为了安抚党内情绪,在推进苏维埃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对两项关键性的改革措施进行了精心设计,以淡化党内关于改革弱化了党对苏维埃领导的批评和指责。

一是各级党委书记经由选举兼任各级苏维埃主席。在1988年召开的苏联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建议在各级政府机关,从地方到中央,乃至整个国家,党政高级职位由一人担任。这一思想似乎同党与行政及所选议会职能分开的总体目标背道而驰。而且,它几乎不可能结束党的干部对经济管理的直接干涉。然而戈尔巴乔夫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据马特洛克分析,戈尔巴乔夫要与之打交道的是苏联共产党。戈尔巴乔夫讨好性的建议促使那些固执的官僚产生幻想,不管怎样,正反两方面他们都可能保住权势:虽然新苏维埃的行动可不受党的直接监督,但党的领导人可身兼二职,并保住他们作为所在州、市或地区“头号人物”的个人地位。但如果真这样,改革会走向何处?除非实现真正的权力转移,不然,改革毫无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只做了间接的回答,但细心的听众已注意到了他建议中可能存在的“陷阱”。切尔尼雅耶夫指出,这条建议允许党的主席去竞选相应地区的(苏维埃)议会主席,如果他获胜,他将身兼双职。但换言之,若这位党主席竞选议会主席失利,那么党组织就会不得不对他是否能够胜任党主席一职“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当选的主席就有可能取代各级党的第一书记的职位,因为那些人已无法凭借自己的权力赢得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6~177页。

选举。”<sup>①</sup>

二是直接确定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党内代表名额。在确定了成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并展开自由选举运动后，戈尔巴乔夫面临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怎样才能保证政治局委员和“其他同志们”当选。戈尔巴乔夫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呢？切尔尼雅耶夫回忆，不清楚戈尔巴乔夫是听了谁的劝告，采取了“红色百人团”<sup>②</sup>的办法。他本人长时间拿不定主意，究竟是将自己的名字纳入“红色百人团”呢，还是通过选区。他最后选择了前者——不想把自己从领导人的“队伍”中拉出来。<sup>③</sup>博尔金则谈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另一个想法——担心落选。他说，戈尔巴乔夫当时产生了一种想法：代表不仅从选区选举，而且从社会组织中选举。他给这种想法找出了相应的根据，说必须使工会、共青团、党、创作者联盟和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在立法机关中也有代表，这样，就可以不仅按区域，而且按职业特征更充分地反映群众的想法。“这个想法看起来很妙，它不仅在党内受到欢迎，而且受到工会代表、作家、画家、演员、新闻工作者等的欢迎。”戈尔巴乔夫还责成有关部门确定选举代表的名额：党、工会和其他大型组织各为 100 名。这是一个小花招，它在实现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这些代表也应该实行差额选举，这样就会使戈尔巴乔夫的主意化为乌有。最后经过共同努力才达成共识：这是各社会组织的权利，由它们自愿决定是搞差额选举还是等额选举。<sup>④</sup>博尔金过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决定在党的全会上参选。他下不了决心在莫斯科提名自己为候选人，是因为他害怕首都有强大的反对派而遭到可耻的失败。去其他街区参选又觉得丢面子，而且还要同别人在差额投票的情况下进行竞争。他害怕输，害怕他得到的支持率低于正在积聚力量的他的主要政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在权衡了所有的“利”“弊”之后，认为唯一不会背

<sup>①</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143 页。

<sup>②</sup> “红色百人团”，这里指的是在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 2250 名代表中，按新宪法规定苏联共产党占有 100 名代表的名额，故称“红色百人团”。——译注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325 页。

<sup>④</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318 ~ 319 页。

叛他的只有亲爱的党、党的中央委员会。于是开始制定“百人”名单。<sup>①</sup>

在 1989 年 1 月 10 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他谈了社会民主化的重要性和劳动者的政治积极性的高涨，他在报告中对苏共中央告全党和全体选民书草案作了说明。“许多人心里害怕按选区选举，害怕出现差额，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戈尔巴乔夫对为什么必须这样安排参选名单作了解释，他讲了很长时间，许多人已大体上懂了，为了一道好菜应有相应的配菜，为了几个必须被选上的人而推荐了一些著名的演员和作家、工人和农民。他们被列入党的名单就使那些恶意找茬的人无法说这‘百人’全是党的干部，也不会引起著名的和有威望的人的不满。”<sup>②</sup>

在 1989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按照老办法：向全会的代表们提供了一份百人名单，要求他们不经过讨论投票赞成所有的候选人。这一百名候选人由戈尔巴乔夫的亲信——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事先选定，又经戈尔巴乔夫本人精心“筛选”，而戈尔巴乔夫当时害怕亲自参加普遍选区的竞选活动。如此对待选举权引起了激进民主派人士的嘲笑：苏共选举出来的代表得到了一个绰号“红色百人团”。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其回忆录中对这一事件另有一番解释：“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坚信从百名候选人中产生百名苏共的代表的做法是正确的。不可能让当时一些党的领导成员落选，否则立刻会把他们推到秘密或者公开的改革的对抗者营垒之中……我们估计，倘若在候选人的名单里，譬如说列入 103 ~ 105 个姓名，那么得到‘毒眼’数量最多的将是利加乔夫、乌里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即使这份名单再增加 10 名候选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会落选……”<sup>③</sup>

切尔尼亞耶夫对此作出评论：戈尔巴乔夫出于其他动机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是为了把“这个保守主义的庞然大物”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它会颠覆所有的改革事业。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也曾直截了当地这样说过。他极力捍卫的把（州、地区和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职务与国家职位（最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320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321 页。

<sup>③</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16 ~ 617 页。

高苏维埃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等等)合并为一的思想,转过头来倒反而使他所不希望看到的党的机构对政权的垄断延长了。他的动机是想在从国家一党转向法制国家的过渡时期保持国家的可控性。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长期反对“匆忙地”要求取消宪法第六条的主张。在这一点上,正如在评价党的改革潜力上一样,再次显现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战略和策略之间的过于巨大的“空隙”。<sup>①</sup>

而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当切尔尼雅耶夫劝说他放弃苏联共产党,认为留在党内“您始终会是党的人质,成为经常不断受气挨打的童仆”时,戈尔巴乔夫反驳道:“你听我说,托利亚。你以为我看不见……我看见了……你们的信也看了。阿尔巴托夫、什梅廖夫……也好像全都商量好一样劝我甩掉总书记职务。但是你要懂得,不能不要绳子放开这只可恶的发疯的狗。一旦我这样做了,这整个庞然大物就要反对我……”<sup>②</sup>

## 二、上面的革命:党的自我纯洁

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目前的改革可以称作“来自上面的革命”。是的,改革是根据苏联共产党的倡议开始并且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党认为自己有勇气,有力量制定新的政策,并能够领导和开展社会的革命进程。“党首先是从自己,从纯洁自身开始的。”<sup>③</sup>戈尔巴乔夫承认党是改革的保证人,但是“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sup>④</sup>。另一方面就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察觉到:党既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但也是改革的最强阻力。“我当时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应该而且可以进行改革。1985年和1986年这个认识一直激励着我的行动。尽管从1986年秋天起我就发现改革的进程在中层和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80页。

<sup>②</sup> 同上,第425页。

<sup>③</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63页。

<sup>④</sup> 同上,第64页。

下层遇到了阻力。”<sup>①</sup>

1986年4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对他的战友们说:机关“又成了清谈馆。文牍主义泛滥,不干实事。目前情况下最危险的是惰性”。他做出第一个组织结论:“要从首脑机关入手。精简机构,让他们自己淹没在文山会海里吧。否则就会出现赫鲁晓夫遇到的情况,机关要了他的命。”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受到主管党内人事的利加乔夫的有力支持。于是,“尽管未能找到可以拖动沉重的改革链条的‘主要环节’,起码已经确定了改革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中间环节,这是呈褐色的官僚化的党机关、刀枪不入的保守阶层,它阻碍着锐意改革的领导层同愿意热情支持他们的大多数居民的重新联合。政治局找准目标,校准标尺,决定转而采取果断措施”<sup>②</sup>。

1986年6月16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戈尔巴乔夫严肃批评了管理机关的文牍主义弊病。他说:“就拿管理机关为例吧。如果你直接了解一下它们的活动,你就会发现,一些部长、总局和企业的领导人相互根本就不交谈,不建立直接的事务联系,一切都通过公文往来。是同志们不能打个电话、碰碰头来解决问题呢,还是企图用公文来推卸责任呢?党的机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比如,塔什干市党委和各区党委4个月内向基层党组织下达的决定比去年同期多了半倍到一倍。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碰到这种文牍主义作风。”<sup>③</sup>戈尔巴乔夫强调:“文牍主义绝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请看一下我们搞的一切检查都是什么吧。不过是研究材料、报表、记录、活动计划,不过是查明问题是否讨论过和是否就此问题作出了相应决议。总之,习惯于同文件打交道,而不是同人打交道,而且还是通过文件来看人。至于人们如何劳动,如何生活,想些什么,他们有哪些问题,情绪如何,所有这一切都被弃之一边。要知道,党的工作的实质就在于此。”戈尔巴乔夫发出警告:“如果党及其各级组织不形成对缺点、对怠慢工作、对华而不实和空谈不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

<sup>③</sup> [苏]戈尔巴乔夫:“关于苏联1986年至199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各级党组织在实现这一计划方面的任务”(1986年6月),《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6—1987.6)》,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35页。

容忍的气氛,就谈不上任何改革。”<sup>①</sup>

1986年7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就关于党的作用问题继续讲话:“所有领域都面临着巨大的改革,但是要从党开始。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原则,而且还因为不这样的话,将一事无成。要改革一切东西。也要改造党。这是具有历史规模的任务,并会有巨大的影响。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不要怕这个词。”<sup>②</sup>

1986年9月19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时指出:“我们的意图是实现生活各个领域的根本变化。就其实质来讲,我把这些变化叫做革命的变化。显而易见,在这些变化过程中,触及各个劳动集体和各个家庭的利益、状况、地位及命运,触及各级地方党机关、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以及国家各级政权的活动。”<sup>③</sup>

1986年9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前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正式宣布要“炮打司令部”:改革,首先要从党的首脑机关开始!据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沃罗特尼科夫在回忆1986年9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时写道:“正是在那时戈尔巴乔夫宣布了‘炮打司令部’的口号。”<sup>④</sup>

### (一) 不改革就得靠边站

戈尔巴乔夫更新干部队伍的态度和标准很明确:是否拥护改革。这是一条贯穿戈尔巴乔夫改革始终的路线,虽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政治含义。

1985年4月初,戈尔巴乔夫在就任总书记后就进行了首次视察。全程

<sup>①</sup> [苏]戈尔巴乔夫:“关于苏联1986年至199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各级党组织在实现这一计划方面的任务”(1986年6月),《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1987)》,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sup>③</sup> [苏]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时的讲话”(1986年9月),《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1987)》,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sup>④</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44页。

费时三天。视察的结果给戈尔巴乔夫的第一感觉是：仿佛时光机器又回到了整整一年之前。“州委、市委的书记们依然大声训斥部下，规定了总书记与人民群众接触的‘可以允许’的限度。他们打手势阻止那些在与我交谈时急于讲真话的人，要么就是干脆打断他们认为不必要的谈话。我想了解真实情况的愿望显然不合地方官员们的口味。同群众直接交谈使某些人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他们试图进行无理的干涉。我不得不当众加以制止，说此时此刻我感兴趣的不是同他们讲话。我看这帮官气十足的家伙气得脸红脖子粗。”<sup>①</sup>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向全体干部提出希望：“认清时势的要求，改变工作方式。但是凡是不想改变工作方式，尤其是阻挠解决新任务的人，就应干脆走开，别再碍事。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的利益置于整个社会的利益之上。”<sup>②</sup>

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对干部进行清理和重新分配。他倾向于从党内干部清理做起。勃列日涅夫时代形成的，并在契尔年科任期内再次流行的那些教条、那一套陈规陋习开始动摇了，华而不实的作风，官僚主义的惰性、妄自尊大和不论功行赏等现象开始破除。此时的改革尚未遇到有意识的抵制。切尔尼亞耶夫对此作出评论：“如果用技术术语来表达的话，仅仅发生了研究零部件强度和变形的‘材料力学现象’，其中主要的是懒惰、坐享其成的心理（包括在党内）和我们通常都预料到的到处也都在津津乐道地讨论的旧制度中的干部调动‘将使一切得到保障’。戈尔巴乔夫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做的实际工作全都是为了使人们振作起来，唤醒他们的良知，迫使他们思考和自觉地行动。如果在旧制度里，所有这一切将会在原地打滑空转，即使人们变得较为积极也将如此——这样的担心人们尚未有过。”<sup>③</sup>

1986年2月25日，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大会的开幕之日恰好是1956年赫鲁晓夫向苏共二十大代表他的著名报告的那一天。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坦率地承认党活动中的问题和缺点：“多年来，不仅由于客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3~134页。

<sup>②</sup> [苏]戈尔巴乔夫：“坚定不移地前进”（1985年5月），《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2页。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亞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76~77页。

观因素,而且首先由于主观方面的原因,党和国家机关的实际行动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和生活本身。国家发展中问题增加的速度甚于解决的速度。惰性、管理形式和方法僵化、工作动力下降、官僚主义增长,所有这一切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小损失。社会生活中开始显露出停滞现象。形势要求变革,但是在中央机关以及地方上,一种独特的心理开始占上风:最好改善现状,但什么都别变动。不会是这样的,同志们……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不能回避。采取这种立场会使国家、国家机器和党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让我们大声地讲这个问题!”<sup>①</sup>

1986年夏天,戈尔巴乔夫在会见中央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时说:“干部政策——这是现在问题中的问题。不在党内进行‘小规模的革命’,什么事都做不成,要知道党的机关掌握着现实的权力。而我们培养党的干部——用的是已腐朽的老一套办法。在选择干部和干部晋升问题上也是这样。能干的领导人从区委开始培养,而权力不能造就出色一些的人……我们应该经常记住有关一党制的代价。如果无人监督和不会监督的话,党的工作者会变成官吏……如果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那就一切都完了。应该记住,我们刚刚开始这个进程。这涉及党、国家机关、军队、警察局、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到处都需要改革。而党应该既在思想上,又在行动上做出榜样——原则性和坚韧性的榜样。现在明白了召开关于干部问题的全会是多么必要。”<sup>②</sup>

到了1986年秋天,戈尔巴乔夫最终阐明了改革新阶段的主题:党、国家、经济的全面改革。改革的杠杆是体制的民主化。他在其政治演说中将新方针又定义为“回到”列宁关于鼓励“群众创造”的思想。对于党的各级机关中理解力最差的人,他则说得更加通俗易懂:“你在哪儿待着,就在那儿改革吧。”切尔尼亞耶夫说,在每次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上,都要“免除”几十人的职务。但换上来的又是什么人?能不能确信这些人有能力贯彻戈尔巴乔夫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26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亞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98~99页。

的政策,而且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去执行?问题不仅在于要有愿望,而且还要有能力。在切尔尼雅耶夫看来,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大多数“新”干部,甚至很年轻的干部都“不成材”,不能进行改革,“后来其中许多还投向了疯狂反对戈尔巴乔夫的阵营”。<sup>①</sup> 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化研究所所长比亚勒教授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苏联改革的报告时就分析到了这一点。他说:“即使新一代领导人愿意搞中国式改革,进行一场经济革命,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权力这样做。苏联的官僚体制已有三分之二个世纪的历史。其惰性已牢固形成,影响极深。要克服官僚主义,迫使中层官僚抛弃旧的工作作风是十分困难的。当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但正如他本人所指出的那样,仅仅提拔新人到领导岗位上来是不够的。关键要看提拔上来的是懂业务、有创新精神的人,还是庸庸碌碌的官僚,即使在最高领导层,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存在分歧。戈尔巴乔夫目前掌握的权力还不足以推行一场中国式的体制改革。”<sup>②</sup>

1987年1月27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谈戈尔巴乔夫面临的社会生活方面的种种问题。戈尔巴乔夫首先批评了意识形态部门和学者,说他们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没有理论建树,仍在翻来覆去地讲20世纪30—40年代的那点东西。他指出,社会学家没有及时地对国内形势作出建设性的分析,也没有提出摆脱困境的新思想。计划部门、机器制造业以及那些负责解决精神和物质刺激问题的机构也受到严厉批评。但主要的还是作为发展的决定条件的社会民主化问题,戈尔巴乔夫提出扩大“公开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企业中实行民主、让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等任务。报告中还提出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论点,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积极地运用民主原则创造了条件。“中央委员们都支持报告的主要论点,也加深了对改革条件下的民主化的认识。这是总书记、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一大功绩。”不过,这次全会还开辟了一个战场,这一点恐怕不是所有的人都注

①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67~68页。

② 新华社1986年8月23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年8月23日。

意到了。戈尔巴乔夫发现人民对现行方针没有取得效果、生活状况不断恶化有不满情绪，他觉得不能光在学者中寻找失利的责任者，他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各个“司令部”，指向了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助手们召集起来，给他们大讲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是官僚。”<sup>①</sup>

在全会结束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对全会作了评价：“早些时候，这样的全会我们是开不成的。甚至在二十七大上，有许多话也不能说。再晚些时候开也不行。只有在改革开始走向深入时，这才成为可能。因此，这次全会是很及时的。”<sup>②</sup>事实上，一月全会在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历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雅科夫列夫指出：“一月全会是具有一定转折意义的一次全会，因为全会上提出了党自身民主化、自由选举、加强基层组织对政策的影响等问题。党的机关及其全部高级领导干部感到了将有丢掉自己权力的威胁，他们知道在自由选举中他们将会遭到失败。潜在的抵制变成了公开反对主张民主的方针。但是这时候改革观念的演变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脱离其倡导者的独立性，有了自己的发展逻辑。高级领导干部内部的关系也尖锐起来，这在历次苏共中央全会上表现得特别突出。批评越来越有针对性，而且指名道姓。政治局里出现了像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这样的‘挨打的孩子’。但是他们打的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党内危机日益加剧。”<sup>③</sup>

危机的日益加剧，使戈尔巴乔夫进一步认识到：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党内官僚，来自体制的惰性。“内部事务仍和过去一样进展缓慢，基本上靠来自上面的鞭策，而在上层也只是靠戈尔巴乔夫本人不知疲倦的努力。”<sup>④</sup>

在 1987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宣布 1987 年是关键的一年：“如果我们损害一月全会决议的命运，改革就完了。”他对一月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181 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145 页。

<sup>③</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 年，第 185 页。

<sup>④</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159 ~ 160 页。

全会后做了些什么进行了分析。的确,没有做任何事。无论在各部,无论在各企业、无论……从上到下各级党的机关中,没有任何人是按新作风工作的。在从州委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中,甚至对一月全会决议的讨论到处都是松松垮垮的、形式主义的——按文件扯一通,就回办公室去了。“我们在搞革命,而我们的行动却和两年前一模一样。”<sup>①</sup>

在 1987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有一场关于改革受阻原因的谈话。“大家确认:改革碰上的绊脚石是庞大的党政机关,他们就像一座座拦河大坝,横亘在改革的道路上。1985 年 5 月我说过,我们给予所有的人以改弦易辙、采取诚实态度的机会,过去的一段时间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必须对各级干部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因为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不甚理解或不够熟练,而是公然的怠工了。”<sup>②</sup>在 4 月 30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在改革之初我们说过,我们给人们一次机会,而现在两年过去了,我们必须提出问题:这些或那些干部是否有能力按需要办事?有一类坐而等待的人,他们的无所作为败坏了改革的名声。所以谈话和说服教育已经够多的了。应当撤换那些不愿改革或不称职的人……中间环节的抵制……为什么?因为公开性表明:国王是光屁股的,而我们应当考虑,我们为什么要让光屁股的国王待在领导岗位上……在两年之后,我想这样说:愿意改革的人已经改变了,而不愿改革的人永远也不会改变了,这种人应当撤换。”<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发现,仅仅通过撤换干部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当时典型的情景是:群众渴望改革,领导干部却无动于衷,十足的奥勃莫洛夫<sup>④</sup>习气。1987 年 10 月 13 日,戈尔巴乔夫说:“党已开始进行革命性的机构改革,以克服习惯势力和人们漠不关心的现象”,“我希望你们不要理解成我在呼吁像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160 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35 页。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165 页。

<sup>④</sup> 奥勃莫洛夫:俄国小说家冈察洛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他意志薄弱懒散无为,害怕改革。

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向干部开火”。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需要“有才干的，有专长的干部”。缺乏这样的人改革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他再次指出有些党的干部行动拖拖拉拉，还有的对改革抱迟疑态度。<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自问：“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是他们不愿改革还是没有能力改革？当然，许多事情都要取决于全苏联或共和国的高层，可是，就连那些可以就地解决的事情也偏偏不做呀。”<sup>②</sup>他在与斯拉文的谈话时说：“我们在苏联机制和官僚机器中陷得太深了，很难拔出腿来。我们撤换了三批区委和市委书记，毫无效果。人只要一进入官僚系统，马上开始使用权利，发放食品购买证和进入各种基地的通行证。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已经盘根错节了！它时至今日仍然存在。”<sup>③</sup>

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指明改革的阻力来自旧的体制。他说：“两年来，我们获得了教训，更多地认识到必须进行深刻变革，必须打碎阻碍机制。我们刚刚开始拆除阻碍机制，所以不得不与过去一样使用非经济的、行政的方法。管理和计划体制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在起作用的。50年代改变体制的尝试是不彻底的。60年代和70年代的尝试也都是不彻底的。原因只有一个：在上层，任何人都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但这个体制与国家的需要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保持老体制的情况下解决新任务是不可能的。否则，我国自上而下的革命将受挫……”<sup>④</sup>

到了1987年年底，苏联的政治局势已与改革初期大不相同。“社会被分割为‘改革的工程主任’和‘阻碍势力’，过去的历史被扭曲了，被描绘成漆黑一团，千百万人的思想因此产生了混乱。”<sup>⑤</sup>

<sup>①</sup> 法新社莫斯科1987年10月13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10月16日。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49~50页。

<sup>④</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

<sup>⑤</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333页。

## (二) 允许政治派别存在

党内不容许有派别存在！这是苏联共产党的组织铁律，也是苏联的政治高压线。

斯大林认为，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保证执政的共产党的统一。这是因为，旧的势力总是不甘心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力。“那些应当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总是直到最后才相信他们的作用已经完结。要他们确信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已经腐朽的旧制度建筑物上的裂口是可以填补的，正在毁坏的旧制度建筑物是可以修补和挽救的。因此，垂死的阶级拿起武器，开始用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使自己能够作为统治阶级生存下去。”<sup>①</sup>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党如果自身发生了分裂，就会在这种旧势力的反扑下使革命面临覆灭的危险。因此，为了保持党的统一，绝对不允许党内有派别存在。“我们认为在我们党内不容许有派别存在，因为显而易见，在党内存在着各种有组织的派别，就会使统一的党分裂成一些平行的组织，就会在国内形成一个或几个新党的萌芽和细胞，也就是说，会瓦解无产阶级专政。”<sup>②</sup>赫鲁晓夫的下台，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把党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的鲁莽作法在事实上造成了党的内部分裂，这是党的官僚集团绝对不能允许的。

然而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要推动改革，允不允许党内有派别存在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对改革实践的反思，戈尔巴乔夫认为，党要保持活力，派别是必不可少的。就在其就任总书记后不久，雅科夫列夫就建议戈尔巴乔夫将党分成两个部分，以解决党内由于改革路线而出现的组织分歧。“和平时期党领导一切的做法是极其脆弱的。经济中开展竞争，实行个人自由和真正的而不是口头的选举自由，这些必然和单一的权力发生矛盾。但权力就是权力，自愿放弃权力是罕见的。苏共也是如此。特别是因为苏共有一

<sup>①</sup> [苏]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斯大林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185页。

<sup>②</sup> [苏]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43页。

一种‘佩挂勋章’的脾性。应该赶在事件发生的前头。也许，将党分成两个部分是明智之举。那样就可以给现有的分歧以组织上的出路。”<sup>①</sup>不过，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采纳他的这一建议。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样极端的做法带来的唯一后果就是他会像赫鲁晓夫一样被赶下台。

为了减少党内敌意，戈尔巴乔夫决定采取迂回战略，在高举列宁旗帜的同时却不断阐释着自己改造党的思想。戈尔巴乔夫认为，列宁在苏维埃政权遭遇到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持开展党内讨论，听取党内不同意见，这是布尔什维克能够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重要原因。“至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七大至十大的速记记录时，曾经大为赞叹。尽管当时面对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陷入绝境，执政党却并不害怕辩论，并不认为可以限制发表意见、言论、批评的自由。我的心中形成一种印象：列宁有意地鼓励‘敞开’党内的意见分歧，至少在初期确是如此。”<sup>②</sup>

把列宁当作自己的政治护身符，这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头几年用来对付党内反对力量惯用的政治伎俩。或者说，这也是一种政治传统：表示对苏维埃政权创立者的敬仰以及对他的思想和事业的无限忠诚。不管怎么说，戈尔巴乔夫的策略成功了，至少在他开始打破“党内不容许有政治派别”的组织铁律的时候，党内反抗力量虽然有，但却并不影响大局。于是，戈尔巴乔夫决定进一步采取行动。

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新闻界代表时正式阐述了自己对与反对派相互关系的理解：“……无论在党内或者在国家机关中，都存在着许多由于没有反对派和不同意见造成的思想和行动停滞、守旧、错误和失误。现在，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我们的新闻界可以成为这种独特的反对派。”这大概是戈尔巴乔夫有别于安德罗波夫的主要方面——戈尔巴乔夫接受了有反对派的思想，认为反对派是不可避免的。“他相信自己的力量，所以不怕反对

<sup>①</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派。集权主义的传统就这样被中断了。”<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认为，党内必须有反映各种社会集团利益的纲领派。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体现多种多样的社会利益的社会团体迅速增加”是改革的“显著特点”；“总的说来，这是人民的首创精神的出色表现，它值得大力支持”。戈尔巴乔夫对斯拉文说：“一旦我们给发扬党内民主进程创造了条件，党内立刻出现了许多运动和纲领派。”<sup>②</sup>

很快，戈尔巴乔夫的“人民首创精神”就迅速得到了响应。其中，立陶宛的“萨尤基斯”运动开始发起并最终成为推动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的主要政治力量。

1987年8月23日，即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协议签订的纪念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组织了抗议游行活动，以试探一下“公开性”的容忍度。“在当时，共产党是苏联境内唯一的合法的政党，因此在爱沙尼亚和其他共和国内，人们决定组成‘多民族阵线’，而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政党。给他们的组织一个有别于‘政党’字眼的名称，组织者就可以避免法律上的指控，也可吸引共和国内共产党人的支持。他们还把绝大部分活动冠以‘支持调整运动’或改革运动，以避免与莫斯科关系紧张。由此他们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他们的运动是支持而不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这种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sup>③</sup>爱沙尼亚人在4月份建立了一个“支持改革民族（或人民）阵线”，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即声称已达到4万名成员。7月份，立陶宛成立类似组织。此后以“萨尤基斯”而闻名遐迩。拉脱维亚也不甘落后。

1988年10月22—23日，立陶宛召开“萨尤基斯”成立大会。“萨尤基斯”的立陶宛语意思是“运动”。客观地讲，“萨尤基斯”之类的大型社会活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15~516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96~197页。

动，“其产生的基础，都是广大居民对生活中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中央及地方官僚行政领导作为的不满，以及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中出现的偏差……提出的了要求要更多社会民主、独立自主、社会公平、恢复‘历史真相’之类的口号”<sup>①</sup>。改革的作用正是要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但为此需要时间，并应采用深思熟虑的方法。但是当“萨尤基斯”刚刚成立而没有引起苏共的强烈反对以致采取强力措施禁止后，运动开始由初期的改善生活、体现社会公正的民生要求，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支持者——雅科夫列夫的怂恿下，迅速转向政治诉求——民族独立。“雅科夫列夫实际上为把该共和国引向 1991 年 1 月维尔纽斯街头发生流血事件，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这位改革的‘设计师’和‘施工队长’，是中央的最高层政治活动家当中最先支持‘萨尤基斯’分离主义倾向的人。这次到访之后，‘萨尤基斯’开始觉得自己被委以担当首要政治力量的重任，而目标则是做一把攻城的大锤，以摧毁现存社会制度。”<sup>②</sup>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共和国的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共产党员也参加了进来，这是很有意义的现象”<sup>③</sup>。

如果说作为苏维埃政权外部政治区域的反对派代表——“萨尤基斯”运动只是对戈尔巴乔夫造成了政治触动，那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后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而产生的强大政治力量，就不得不让戈尔巴乔夫感觉到震动：改革的政治反对派终于出现了！只是没有掌握在他的手里。

1988 年 7 月 19 日，叶利钦向最高苏维埃通报说，旨在组织一个“跨地区代表团”的协调机构已经建立，计划月末召开成立大会。地区间小组<sup>④</sup>的目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111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112 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197 页。

<sup>④</sup> 马特洛克分析：尽管改革派没有能够主导新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所属机构最高苏维埃，但他们并非无足轻重的少数……由于这些代表思路清晰、目的明确，再加上电视的转播，他们虽人数不多，却往往能在公开场合制造出轰动效应。然而他们的数量毕竟有限，除非戈尔巴乔夫支持他们的立场，帮助他们拉选票，不然他们还是很难施加有效的影响。很明显，他们需要一个组织来协调他们的政治行动，但他们大多仍是共产党员，而党章又规定禁止搞宗派主义。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称他们的组织为“小组”，而不是“宗派”或绝对禁止的对象“政党”。——《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257~258 页。

标是要“加速改革的进程”，并将为实现这个加速采取更加果断一致的步骤。叶利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反对”这个词，但他却明确了这个在最高苏维埃里属于少数派的小组将要发挥的作用：将作为一个反对派为立法机构起草供选择的建议。

1989年7月29—30日，跨地区议员团在莫斯科电影之家召开成立大会。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帕尔姆、波波夫、萨哈罗夫先后担任该议员团的主席。跨地区议员团纲领的基本原则是：承认私有制，包括土地私有制；权力分散；各共和国经济独立，加强各共和国的主权。“这样一来，我们国家合法的反对派组织就正式形成了”<sup>①</sup>，并且“获得了不止一个共和国的支持。它使自己合法化的方法是将自身定性为一个支持改革的组织，这也是此后各共和国民族阵线所使用的方法”<sup>②</sup>。

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党竟然没有看到这种活生生的现实！戈尔巴乔夫指出，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参与跨地区集团的，或倾向于这一组织的大多数代表，参加这个组织的会议，却不办理正式加入手续，依然留在苏共内部。除了萨哈罗夫之外，跨地区议员团的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党员：像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所以执政党内的大多数和议会中的反对派之间的界限就显得很“模糊”了，这也就带来了诸多不便。中央机构及大多数领导成员都未立即意识到，他们必须在全新的情况下行动，需要重新学习，坚决摒弃以往的游戏规则。某些人还是从“共产党人同非党人士的联盟”的传统观念出发。他们认为，苏共党员在代表中间占压倒多数。既然如此，只需规定严格的党的纪律即可贯彻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议。党中央各部经过短时间酝酿，建议将从各地来到莫斯科的代表召集起来，深入细致地引导并提醒大家：党员的职责就是按中央的指示投票表决。然而事与愿违。<sup>③</sup>

1990年1月20—21日，苏联共产党民主讲坛成立。改革派把他们的计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319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59~260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

划付诸有组织的行动比“帝国缔造者们”更为迅速。来自 78 个城市的 400 ~ 500 名共产党员于 1990 年 1 月 20—21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周末会议，会上建立了“苏联共产党民主讲坛”。会议的组织者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地区间集团”领导人以及矿区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会议要求建立多党制；把共产党转换成一个普通的政党；反对“民主集中制”；通过秘密投票从基层选举共产党官员。一些组织者，如叶利钦认为新建立的“民主讲坛”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党内部的改革上。<sup>①</sup>

1990 年 10 月 20—21 日，莫斯科最大的“俄罗斯”电影院举行了“民主俄罗斯”运动的成立大会，从而完成了该运动的组建手续，成为它发展的最高点。<sup>②</sup>

1990 年 11 月 17—18 日，俄罗斯共和党成立大会召开。

1990 年 12 月 1—2 日，俄罗斯民主党成立大会召开。<sup>③</sup>

.....

如何看待这些政治派别呢？

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激活了苏联社会的“民主力量”。然而从整个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程来看，这种“民主力量”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从意识形态操纵的角度来看，“民主派作为一个具有自由思想，充满新的隐喻、新的口号和寓意的群体出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停滞、沉闷和腐败的环境中。他们玩自由的游戏，闪现出思想的火花，而后经过我们的引申，又建造了不少空中楼阁，加入了这场游戏。其实这里头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内涵，我们闯进了一个镜花水月的世界，是我们自己塑造出了这些民主派的形象——那是与令人讨厌的苏斯洛夫比较的结果”<sup>④</sup>。克留奇科夫就指出：“所谓的民主运动是一股活跃的破坏力量。这个含糊不清的术语的涵义是要为各种不同

<sup>①</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355 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66 页。

<sup>③</sup> 同上，第 667 页。

<sup>④</sup>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形态操纵》（上），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158 页。

的机会主义流派提供一顶大保护伞。”<sup>①</sup>运动吸收了那些事实上已脱离那种半合法状态的人,这些人在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以及随后的多年间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开展活动的。在“民主运动”的总潮流中,有对国家和社会制度、对意识形态里的世界观的态度持相反观点的各种力量,同时还有只打算稍稍修改一下民族政策并改正所谓错误和过火行为的各种人物。运动的总体倾向是,许多人赞成对在苏联政权的不同年代遭受镇压的各类人士恢复道德和法律上的公正。在“民主运动”中,聚集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流派和观点的社会团体的代表。在利加乔夫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流派实质上把改革推上了绝路。他指出:“改革的真正的悲剧甚至是惨痛就在于,改革的领导者们不是同所谓的保守派进行正常的、健康的辩论,而只是热衷于同他们斗争,没有看到(确切讲是不想看到)正在做大的真正的主要威胁……应该认识到,热衷于同‘保守派’进行政治斗争以及纵容当初以民主口号为掩护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是改革的致命错误。”<sup>②</sup>

另一方面,在戈尔巴乔夫政治解禁的刺激下,党内的分裂已经成为一种现实。“问题全在于我们这个党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志同道合者的集体。当改革带来的自由之风刚刚吹起的时候,就轰动一时地、有时甚至是气势汹汹地冒出了各种各样的、包括十分对立的政治流派。”<sup>③</sup>事实上,当时苏共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运动,内部有若干派别:丘利金派、尼娜·安德列耶娃派、民主纲领派、克留奇科夫纲领派等。那么,戈尔巴乔夫自己是怎么看待党内分裂呢?“我认为,我们的经验,也像其他共产党的经验一样,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无论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多巧妙的花招,包括允许派别活动存在,都不能成为防止官僚化、防止停滞僵化的可靠保障,当然,这不是针对大量普通党员讲的。这里指的是很快迷上权力并准备不择手段保住权力的领导层。70年来,这个阶层经过党和国家几代精英的交替,他们的意识中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98页。

<sup>②</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5页。

起决定作用的特点是坚信其永远执政的权利系与生俱有,不与人分享……不过如果说我当时相信取消苏联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对人民和共产党本身都有利、至少是对几百万普通共产党员都有利的话,那么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这样的事是不应该一蹴而就的。”<sup>①</sup>

### (三)向多党体制的过渡

看来,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党内的分裂以及政治派别的大量存在,都预示着戈尔巴乔夫将采取合乎逻辑的政治举措: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从原则上讲,苏共放弃垄断地位的决定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多党体制、准许政治反对派存在等)都是早已经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如果说政治改革的其他要素,首先是自由选举和建立议会,本拟立即实施的话,那么向多党制过渡便是‘计划中’的下一步了。我们不准备把这件事束之高阁,但也无意匆忙上阵。”<sup>②</sup>

1989年4月,美国《时代》周刊在苏联就改革等问题对一千多名莫斯科居民的民意测验表明:“关于多党制”,认为苏联在某个时候可能建立多党制者占33%,持否定者占37%,认为难以回答者占30%。<sup>③</sup>

1989年4月23日,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格拉西莫夫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我们已习惯一党舒适的政治条件,一旦失去这种条件,就会陷入窘境,在选举中败北。因此,需要深入认真地研究多党制问题。多党制问题应该在党内加以讨论。<sup>④</sup>

1990年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共产主义会议上说:“我认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而且我可以明确地这样对你们说——如果多党制是一种正常历史进程的结果并符合社会需要的话。我们不应当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不过,多党制并不是万应灵药。”戈尔巴乔夫的这番讲话虽然是对苏联的几个加盟共和国当前的政治现实给予的承认,但是这一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sup>②</sup> 同上,第213页。

<sup>③</sup> [美]《时代》周刊1989年第15期的民意测验,转引自《参考消息》1989年4月17日。

<sup>④</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51页。

讲话也会导致产生一些只为本民族着想而不为整个联盟考虑的不听话的党派。“它还可能使已有 70 年历史的共产党政治机构完结。”<sup>①</sup>

1990 年 2 月 5 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共产党“打算努力争取执政党的地位,但是将严格地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去争取,不利用任何形式的法律或政治上的优势”<sup>②</sup>。全会通过了苏共中央提交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决定修正宪法第六条,消除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对此,美国密歇根大学苏联和东欧问题研究所所长罗曼·什波尔卢克说,使多党制合法化“实际上就是承认苏维埃制度是非法的,就是抛弃了列宁主义最基本的原则”<sup>③</sup>。

1990 年 3 月 12—15 日,第三届(非常)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宪法第六条的修改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多党制。戈尔巴乔夫承认:“第六条的问题同改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建议一起研究,在祖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总统职位,这当然不是旨在‘出人意外地’通过那项妥协的议案的策略性手段。修正第六条和补充基本法第 127 条相互之间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前者表明,我们国家将不再是一党制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甚至不再是神权政治的国家,我们将奉行民主制的一项主要原则——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后者表明,我们承认民主制的另一项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则:权力分立。”<sup>④</sup>改革派的重要议员、人民代表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说:“这是走向西方政治制度的第一步。”<sup>⑤</sup>

多党制的推行,引起了苏共党员和军人的担忧不满。可以预料到,一旦实行多党制,那么从地方的市镇乡村到城市工厂将会出现大批共产党员失业的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家已开始感到不安,认为“人们都在担心明天可能会被解雇,因此很难积极地开展工作”。国防部长亚佐夫也指出,国内某些

<sup>①</sup> 美联社莫斯科 1990 年 1 月 14 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 年 1 月 16 日。

<sup>②</sup> 美联社莫斯科 1990 年 2 月 5 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 年 2 月 7 日。

<sup>③</sup> [美]《波士顿环球报》1990 年 2 月 8 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 年 2 月 25 日。

<sup>④</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16 页。

<sup>⑤</sup> 美联社莫斯科 1990 年 3 月 13 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 年 3 月 15 日。

地区最近对军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实行了限制。<sup>①</sup>

为什么一定要推行多党制呢？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一方面，这是对改革进程引发的政治分裂现实的承认。到1991年2月，也就是在苏联实行多党制仅一年时间，根据苏共中央书记库普佐夫统计，已出现全苏性政党20个，共和国一级政党500多个，还有16个联合组织。<sup>②</sup>另一方面则是表达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政治理念：要让党在真正多元竞争的条件下赢得政权。戈尔巴乔夫认为，对宪法第六条的任何修正都不能为实施多党制提供宪法保障，也不会改变原先的政治制度。“在这些修正的基础上，我国就只会出现像在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中国的那种非独立的‘二等’政党，那些国家的这些政党起着工会和共青团那样的‘传动带’的作用，并成为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阵线或民族阵线的成员。”<sup>③</sup>于是，戈尔巴乔夫决定让党在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环境中检验党的政治能力。

格拉乔夫分析道：

他指望通过这样的休克疗法唤醒已进入政治休眠状态的“国有化的党”，使之能够参与正在开放的市场上竞争，这是一场真正多元化的、而不仅是社会主义多元化的竞争。

总书记要让党摆脱“并非它固有”的功能（“现在它把什么都攥在自己手里：从迎接里根到马的套具和土豆”），要将党委会手中的执行权的杠杆交给苏维埃，一部分惊慌失措的官僚从他的意图中（完全正确地）看到了天崩地裂的危险。这时他们最感到恐惧的，不是可能校正甚至彻底修正意识形态：绝大部分党的官员早已不去考虑主席台上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讲话的意义，他们也并不打算进行唇枪舌剑的意识形态辩论，何况尚未对此做好准备。

习以为常的话语的改变十分危险，仅仅因为它预示着昔日的舒适、

<sup>①</sup> [日]《朝日新闻》1990年3月8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3月29日。

<sup>②</sup> 王正泉：《戈尔巴乔夫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4~55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5页。

稳定将一去不复返，预示着固定的常规和其中最主要的部分——组织将受到破坏。在这个意义上，组织的普通成员同那些领导他们以及他们已经不完全信任、却尚未下定决心与之顶嘴的人相比起来，更有洞察力。官僚们更多的是凭着皮肤、本能而不是理智感觉到：他们的权力，也就是安乐，如专门研究极权主义制度的德国哲学家阿伦特所言，已经不是以思想的引力、即话语和口号为基础，而“仅仅是以组织的强大力量为基础”。

当然，对苏共代表会议的代表说来，这位公认的 20 世纪极权主义专家的著作<sup>①</sup>并非案头必备的书籍。他们所意图维护的体制千方百计地抵御意识形态方面的谋反，体制与其说是不让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早已学会绕开禁令）阅读此类书籍，倒不如说是不让其坚定的拥护者甚至领导人阅读，从而剥夺他们对现实进行清醒分析的必备工具。<sup>②</sup>

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企图唤醒处于政治休眠状态的“党”的“休克疗法”虽然惨烈，但还是在全党意志体现的中央全会上获得了通过。1991 年 4 月 26 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苏共“有意识地放弃了自己几十年对政权的垄断”。戈尔巴乔夫不无得意地说：“当时还没有人敢于以社会的名义向党的领导发起直接的挑衅。胆大包天的‘骚乱分子’在议论思想和政治多元化时也都必然要带上‘苏联共产党的先锋作用’的保留条件。可见，是党自己主动地放弃了不受监督的掌权，并表明准备同其他政治组织及运动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争取掌权而斗争。无须证明，这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刻，它标志着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离。同时，自愿‘放弃权力’不仅是总书记和以政治局为代表的小范围领导集体事情，而且得到了苏共高层代表机构，先是代表会议，随后是代表大会的正式同意。”<sup>③</sup>

<sup>①</sup> 指德国学者汉娜·阿伦特所著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此书中文版见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

<sup>②</sup> [俄] 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89 页。

<sup>③</sup> [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13 页。

#### (四) 竞争选举下的失败

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蛊惑下,苏共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在放弃了党对选举的“指导”后,苏共开始品尝到了党的总书记释放的“民主恶果”——党在选举中失败了。选举竟成为对宣称自己是“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一个党的严峻考验。<sup>①</sup>

为了保证党对选举的支持,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计,新人民代表 2550 席位中只有 1500 个席位是在选区选举出来的。总席位中有 1/3 被分配给了一些“公共组织”里的代表,如共产党组织及其各下属机构。其目的很明显,就是使一些高层领导人如戈尔巴乔夫不必参加竞选,也不必冒失败的风险,就可进入新的代表大会。从理论上讲,戈尔巴乔夫有权通过党中央委员会提名 750 名代表,因为法律规定共产党是所有有权“选举”代表的组织的“领导核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新国会得到了 100 个席位,是单一组织分配到的最多席位数额。可以肯定地说,戈尔巴乔夫掌握着这个组织的控制权。在代表的挑选上,戈尔巴乔夫做了某种平衡处理:它既包括几名高层领导人,如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也包括一些来自社会各个部门的人员,如经理、军官、作家、农委主席等。总的来说,其人员构成中没有几位改革家,更多的倒是一些华而不实的官僚。<sup>②</sup>

选举运动开始后,立即成为全国居民政治化的强大动因。几十年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合法的机会,能够发表与党的机关正式确认的观点不同的看法。竞选运动将代表的候选人分为两大集团。一个集团是背后有党的机关撑腰的那些候选人,另一个集团是违反党机关的立场、为争取被选举权而斗争的一些人。这是一些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各种不同的人,他们或者是社会民主派和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家,或者是基督教民主派和知名记者。他们与党的机关相对抗常常得到选民们的大力支持。有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19 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250~251 页。

时,一些共产党官员精心策划一场没有竞选对手的选举,可往往遭到“不选名单上任何候选人”这样的打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尤里·索洛维约夫就是这样一位苦命人。在总共 24 万张选票中,他只获得其中的一万张选票,就这样在一场没有对手的竞选中失败。“列宁格勒选民胆敢把州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选下去一事,有些人将其称之为(1917 年 10 月革命之后)又一次彼得堡革命。”<sup>①</sup>索洛维约夫是政治局中唯一一名遭受这种难堪的候选人,但是较低层的共产党候选人在许多选区都遭受了他这种命运的嘲弄。马特洛克说:“正如一位俄罗斯朋友所言,在没有对手的选区失利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人,但是这种不一般的人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还比比皆是。”<sup>②</sup>

据马特洛克观察,虽然并非每个选区的选举都是公正进行的,许多、甚至是大部分地区都不是这样;虽然大选后并未出现一个明确以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宪政国家为职志的议会,其中的许多代表也还是保守的共产党,他们决不愿失去任何权力,但总体来说,整个大选的结果仍鼓舞了那些希望苏联实现民主的人士。之所以说选举的结果令人振奋,是因为在苏联的历史上第一次经过选举产生了这样一个重要机构,其中的许多代表面对顽固政治势力依然赢得了竞选的绝对胜利。同样重要的是,有为数不少甚为独断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大选中惨败。这次选举并非最后一次,它传达给广大公众的信息,只要你认真尝试,你就能够在选举中击败官方提名的候选人。“由于苏共多年执政,部分居民形成了一种顽固的偏见:不愿接受党的代表。实际生活表明,只要受到党的委员会的支持,即使是精明能干、知识渊博的人也很容易输给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苏共的对手。在厌恶苏共的浪潮中,许多匆匆过客被选为人民代表。他们根本不能胜任工作,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当然也有不少天才的、高水平的、各方面很有造诣的人当选,但这一切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当时没有反对党来对候选人进行必要的挑选。遗憾的是,1989 年初谁也没有考虑过这些情况,差额选举原则当时非常诱人。但对那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99 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248 页。

些代表苏共去竞争的人来说,这种原则也是危险的。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他感到许多党政活动家,包括他在内,可能会在竞争中失败,不能当选。”<sup>①</sup>

这次选举运动所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公众的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最初的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即使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民主,但是选举结果完全不是党的领导人一年前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作出关于人民代表选举的决议时所希望看到的那样。苏联共产党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竞选运动。“尽管它拥有人数众多的职业机构,可以深入任何一个居民点、每一个工业、教学、行政机构,掌握着党的报刊、资金……但是没有思想。”不久以前出现的围绕“革新的社会主义”“加快速度”“全面改革社会生活”的热情已经枯竭,剩下的是悲观失望、大多数食品凭证购买、购买伏特加的长队,以及关于党的机关贪赃受贿及其无穷无尽的真实与虚构的种种特权的永不休止的议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境内接连不断的冲突令人怀疑国家政权本身的努力。关于所谓的空白点,确切地讲,是关于官方宣传讳莫如深的很久以前或者不久以前的苏联以往事件的历史研究文章,在《星火》《莫斯科新闻》及《电影艺术》这类杂志上接连刊载;阿·雷马科夫的作品《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问世并成为畅销书,这一切即便没有直接清除苏共的“历史领地”,也缩小了苏共的“历史领域”,使苏共的历史变成暴力、罪恶、欺骗的代名词。国家保持一党制的唯一貌似合理和荒诞不经的理由是:“再多一个党,国家不能养。”<sup>②</sup>于是,在突然间,人民都不再惧怕直抒胸臆了。这种变化在苏联这样的国家里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几十年前只要政府怀疑你持有异议,你就会有生命危险,就在最近,对持异议者也是以蹲监狱或流放加以惩戒。而现在,似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都开始对共产党的统治进行最毫不留情的抨击。”<sup>③</sup>

1989年3月26日,选举在全国结束,有三十名左右的苏共州委书记与市委书记未能当选,但是当选的人民代表中共产党员占绝对多数。1989年3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18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18~619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51页。

月 26 日选举结束后,根据苏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当选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党员比例达到 85%。戈尔巴乔夫感到非常高兴了。因为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原先为“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联盟”所规定的限额。于是,当选举结果陆续公布以后,戈尔巴乔夫吹嘘说,在这次选举中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因为选出的代表中 80% 以上是共产党员。雷日科夫则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当时曾反驳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提醒他说共产党实际上是失败的,因为有 30 名重要的地区领导在选举中失利,有 30% 的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委书记、总的来说有 20% 的党组织书记落选。而且许多共产党员之所以能在大选中获胜,并非因为他们认同共产党,而是相反。“那时,我并不了解他们有此交锋,但我的判断与雷日科夫不谋而合。”<sup>①</sup>

选举反映出新的现实,苏联共产党跟不上生活的节奏。“当时戈尔巴乔夫以为,经他唤醒的第二个党通过民主选举,会像神话中的伊万努什卡那样显露出来:并未在改革沸腾的大锅里烫坏,却反而变得更加年轻貌美了。”<sup>②</sup> 1991 年 7 月 3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党的任务。库普佐夫援引了这样一个材料:苏共支持的俄联邦总统候选人 6 月 12 日在所有一千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即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的选举中输掉了。“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的发言中呼吁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不要总待在首都不动,要经常出去走走,到各个企业、劳动集体看看,大胆地参加政治辩论。同时不要做尾巴主义,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许多党的工作者都犯有这个毛病,这种作风和工作方法好像是从民主派那里学来的。党只有在坚决支持成熟的改革行为时才能够挽回在社会中的威信。”<sup>③</sup>

然而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党内的达官贵人成了改革的阻力,这种看法已经在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的确,我在出行中也愈益感觉到管理部门和

<sup>①</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251 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99 ~ 200 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353 ~ 354 页。

党的机构正在加紧阻挠活动。他们认为,变革使他们受到被排挤出权力结构的威胁,因而竭尽所能地要去拦阻。实际上这主意打错了:本来应当改变作风,多办实事,多接触群众。可他们却依然坐在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这不是积恨吗?我曾经向全国公开讲过(在一些非公开的场合讲得更多),谁不想改革,不想跟着生活的节奏齐步走,那就得靠边站。选举表明,敲起了警钟。我承认,暴露出来的党的‘小毛病’已演变成不治之症,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作为改革的主谋,我看到,现实中主要的事业就是实现我国社会的民主化;同时我又是苏共总书记,我有责任,也衷心希望党能够领导这一过程,不要做这一过程的反对派”<sup>①</sup>。

### 三、政治局、书记处与中央委员会

在 1987 年 11 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对社会实行民主化的方针。他说:“人民和党选出来的代表受机关工作人员领导,而不是受中央委员、执行委员会和部长会议成员领导,这种制度必须改变。”不过他忘记说明,整个政府、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实际上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即总书记和他的机构统一领导的,“首先应该改变的是他的机构”。<sup>②</sup> 这个机构就是政治局和书记处——苏联的“政治心脏”。博尔金指出:“是什么人领导着 2000 万共产党员和 3 亿人口的国家呢?近 70 年来这个职能实质上是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担任的,正是它们决定着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并通过苏联部长会议、各部及各地党和苏维埃机构控制着国民经济,直接领导着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由于它们的参与,苏联才能够成为一个强国。”<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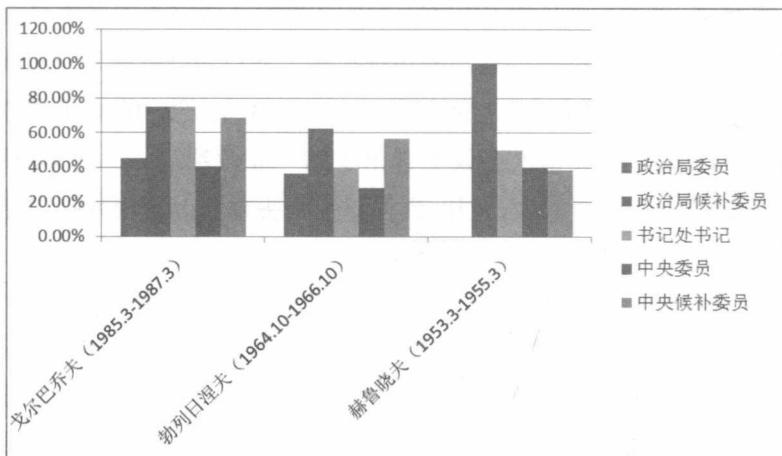
然而在戈尔巴乔夫“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下,苏联的政治生活处在从未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96 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292 页。

<sup>③</sup> 同上,第 189 页。

有过的变革冲击之下。从 1985 年 3 月到 1987 年 3 月的两年时间里, 戈尔巴乔夫在党的高级职位的更新率远远超过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时期。(见下图<sup>①</sup>)



另据统计, 戈尔巴乔夫在 3 年当中(1986—1988 年)召开了 111 次政治局会议, 平均每年 37 次, 平均每月 3 次以上(几乎每周 1 次)。下面是党的部分重要会议的名称。在这些会议中, 领导撤换问题作为党的改造问题提了出来: 中央委员会新投资政策会议(1985 年 6 月)、第二十七次党代表大会(1986 年 2—3 月)、中央六月全会(1986 年), 重点讨论戈尔巴乔夫的干部变动、中央政治局关于撤换外贸部干部会议(1986 年 8 月)、中央一月全会(1987 年), 讨论民主化问题, 即干部撤换问题、中央关于经济改革和干部状况的六月全会(1987 年)、中央关于撤换农业干部的全会(1988 年 5 月)、党关于政治改革第十九次代表会议(1988 年 6 月)、中央九月全会(1988 年), 讨论关于加深政治改革和干部撤换问题、中央二月全会(1990 年), 决定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在政治体制和社会中领导作用的条款, 以及 1989—1990 年政治局举行第三十一次会议和 1991 年前其他一系列党的会议, 包括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一系列会议的召开, “最终导致共产

<sup>①</sup> [法]《世界报》1987 年 3 月 11 日文章“戈尔巴乔夫更换干部超过前任”, 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 年 3 月 30 日。

主义在政治上垮台”。<sup>①</sup>

### (一) 政治局：从团结到分裂

“政治局”这个术语是在 1917 年 10 月出现的。当时布尔什维克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的指挥机构。1917 年 10 月 10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经过激烈辩论后，中央委员会以 10 票赞成 2 票反对通过了起义决议。在这次会议上选出了第一届政治局——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以便向党提供对起义的日常指导。<sup>②</sup>

不过，随着武装起义的胜利结束，这个中央政治局也就不复存在了。为了处理紧急问题，曾建立了由列宁等 4 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局。作为党的一个常设领导机构的政治局直到 1919 年才正式选出。此前布尔什维克党遇到的一切问题，包括最琐碎的日常问题都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即使在革命最紧张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也几乎是每周开会一次。在委员人数尚未超过 10~20 人时，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而随着党的不断壮大和中央委员会的扩大，入选中央委员会的人不仅来自中央机关，还来自外省，中央委员会就无法像先前那样运作了。1919 年年初，布尔什维克党在中央内部进一步明确了职能划分：中央执行局改称为中央政治局，并同时设立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 5 名中央委员组成。在中央全会闭会期间，党由它们来领导。于是，这三个机构渐渐集中了党的全部的权力。1952 年 10 月，联共十九大决定，把中央政治局改组为中央主席团，撤销与政治局平行的中央组织局，把中央委员会的日常组织工作集中交给书记处去处理。1966 年 4 月，苏共二十三大又把苏共中央主席团改称为苏共中央政治局。

1919 年 3 月党的八大选出了第一届中央政治局。5 位政治局委员分别是：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克列斯廷斯基。第一届中央政治局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139~140 页。

<sup>②</sup> [波]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王国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第 264 页。

是中央委员会原班人马的核心。不设正式的主席，每位委员的威信并不取决于他的职务和地位，恰恰相反，是地位取决于实际的威信。会议通常由列宁主持，他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辩的。不过会议也可由其他人如加米涅夫来主持。当时尽量将最后的政治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而将“日常琐事”推给组织局。在对待人民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权力机构和机关的态度方面，常常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方面，列宁不止一次地说，不得老麻烦政府；而另一方面，刚刚出现冲突的局面，他又立即向人民委员们发出“拉到政治局去”的威胁。“后来，当党的领袖不再兼任政府领导人时，这个倾向日益占了上风。”<sup>①</sup>

中央政治局是苏共和整个国家的主要政治机构和中枢神经，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所有原则问题都是由政治局决定的。“政治局委员传统上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领导人、处理国际问题的权威人士。这是由一些不太年轻的、常常年事已高的圣贤们组成的最高法庭。但是这个最高法庭往往使很多人感到惊骇，在国内外都引起人们的敬重。”<sup>②</sup>同时，中央政治局及其主要人物始终是苏联“政治厨房”的烹调家，提名党和国家主要人物——苏共中央总书记这道菜就是他们“炒”出来的。他们选出总书记并心甘情愿地服从新领袖的意志，尽管事先就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失去自己的职位。“这种提名往往不是冷静和无私的行动，这总是各种力量和集团、政治局暗中的实权人物间的一场斗争，而且这场斗争有时在总书记还在世时，常常在他们去世前很久就已开始了。”<sup>③</sup>不仅总书记是如此，其他重要岗位的干部也是如此。政治局主管的干部一般包括州委、边疆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所有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副主席、各部部长、《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主编、意识形态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高级军官、克格勃各部门领导人、军工企业领导人、苏联驻外大使及其他一些职务。<sup>④</sup>

在苏联体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享有处于金字塔顶的各种特殊待遇。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②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98页。

③ 同上，第213页。

④ 同上，第193页。

1987 年以前,政治局委员包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形式上的工资为 800 卢布,这是个相对不小的数目,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水平并不是由工资决定的。当时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有一些专门的内部决定,规定什么人可以得到什么东西,有些决定只有三个人知道。比如,除工资外,政治局委员可以免费从克格勃九局供应站领取价值约四百卢布的营养食品,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以领取约三百卢布的营养食品。那些直接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书记还可以免费享受早、中、晚三餐,以及水果和他们想订购的任何东西,而且运往别墅的以及通过苏共中央分发下去的食品都要经过卫生检验或者在严格的卫生监督下在专门的车间加工制作。<sup>①</sup>

中央政治局每周星期四十点钟召开政治局会议。“这个制度在列宁时期就形成了,并差不多一直保持到苏共二十八大。”<sup>②</sup>政治局的会议不保留正式记录。政治局的决定将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发出并在一个严加控制的官员名单中传阅以便落实和监督,这些文件都被保存在总书记的直属部门里,锁在一个“特别的文件柜”中。会议的议题总是出自总书记自己的决定,政治局的要员们有权建议或改变议题,但很少有人这么做。要讨论的文件在会议前的一至两天里由中央委员会的总务部下发,这个部是在总书记直接管辖下的一个主要行政机构。总务部在中央委员会机构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它是由总书记最亲近的人领导的。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先后由阿·卢基扬诺夫和瓦·博尔金负责这个部门。<sup>③</sup>

政治局并不经常采取表决手段,当总书记意识到即将发生不一致的时候,他就会建议将有争议的问题拿到下次会议上再做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向持不同意见的成员施压,使其接受他的立场。政治局内部是有着明确的分工,并且遵循着一条不成文的政治规矩:不要过界!利加乔夫指出:“在政治局委员当中存在一种不成文的,但不可破坏的规矩,这就是如果干部问题不属于你的主管范围,就不要插手。顺便指出,我自己后来也严格遵守这一制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257 页。

<sup>②</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10 页。

<sup>③</sup>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年,第 697 页。

度。它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每一个政治局委员对选拔干部有目的地进行各自干预的可能性,而把这种权利留给了总书记,当然也留给了整个政治局,因为最终决定是集体作出的。”<sup>①</sup>有时中央书记也出席政治局会议。但是他们有权参加讨论,却无权投票表决。

政治局内部人员的调整往往是伴随着总书记的更迭,甚至可以说是根据总书记的立场而不断调整的。不过,这种情况在斯大林之后就极少出现,毕竟没有谁再愿意回到过去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政治局作为苏联整个国家管理系统的中心和神经中枢的特殊作用,使每一个政治局成员比一般的国家高级官员重要得多,政治局成员也是他主管的许多党和国家机构的直接首长。因此,自勃列日涅夫时代起,就不存在总书记主宰一切的局面,他始终只不过是‘平起平坐者中的头号人物’。政治局中的力量对比决定着苏联国家政策的走向。”<sup>②</sup>所以戈尔巴乔夫在当选总书记后,首先着手的就是加强自己在政治局内部的支持力量,以对抗契尔年科时期政治局留下的“老近卫军”。

1985年4月23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在讨论组织问题时,新任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口气地提议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委员,索科洛夫元帅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尼科诺夫为负责农业事务的中央书记。投票结束后,他向大家表示祝贺,并邀请所有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到主席台上就坐。他让利加乔夫在身旁主席位子上坐下。利加乔夫便“主持了”这次会议。于是,大家都明白了。当晚切尔尼雅耶夫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在政治局中,他有了八位忠实的朋友去‘反对’(如果胆敢反对的话)吉洪诺夫、库纳耶夫、谢尔比茨基、罗曼诺夫和格里申,可占到绝对优势。”<sup>③</sup>

在改革的初期,戈尔巴乔夫是真诚地希望政治局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因为无论从苏联政治传统还是现实力量对比来说,政治局都是苏联庞大体制

<sup>①</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87页。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42~43页。

的“大脑”。“党的这一机关的工作实践和工作作风中含有不少积极的、有益的因素，并为这一声明担负全部责任。就其潜在能力而言，这是个研究并通过相应决定的集体领导机关。这种研究带有原则性和基础性，一般说来，要讨论的问题都经过认真准备，并邀请有关部委和组织的领导人出席会议。如果政治局委员产生疑问，哪怕在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反对，问题也会被搁置一旁，打回去重新考虑。也许那时国内根本没有别的调理得这么好、工作能力这么强的集体机构。在一党制的条件下，这种领导实践为唯意志论主义者设立了一道重大障碍，但在发展真正民主基础的情况下，也确实需要其他管理机制和其他领导机关。”<sup>①</sup>

因此，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是来自“上面的革命”。简单地说，就是政治局首先要革命。一方面，在新的改革条件下，政治局在实际运转中积累了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进行自身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环境。“当时的政治局显然已与时代不符。不过，当时存在的任何一个别的机关都不能取代政治局。停止它原来的活动，就会使国家管理体系即刻出现重大空白。在政治局位于权力金字塔顶层的那种管理体系中，有个最大缺陷，那就是权力的极端集中化。政治局既解决大问题，又解决小问题，它了解并驾驭国内形势，看到了问题的复杂化，但仍旧机械地工作，日复一日地为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对此，许多部委和组织的领导人都已经习以为常，在每个问题上都竭力争取获得政治局的决定，然后用它保护自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因为他们已经获得逃避责任的免罪牌。”<sup>②</sup>另一方面，就苏联改革的实质而言，虽然有人民的参与，但是仍然摆脱不了“自上而下革命”的深刻烙印。在这种政治动力机制运行中，容易出现由于政治局内部的矛盾而导致影响改革的政治事件的发生。“苏联进行的最后一次社会改革尝试的特点是，这些改革长时间‘自上而下地’进行，因为国家居民至少在 1989 年头几次比较民主的选举之前还没有影响政治生活的手段。除苏联共产党外，国内尚无任何群众性的政党，而政治运动只出现在苏联边远地区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在这种情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355 ~ 356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356 页。

况下,主观因素(政治局的态度,政治局成员的喜恶)有可能立即引发政治事件。”<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很重视政治局的作用。但是他的实际做法却破坏了政治局集体领导的政治原则,并最终使苏共这一超强“大脑”患了“脑瘫”而坐视改革的背离。

首先,戈尔巴乔夫把政治局变成了政治演讲台。戈尔巴乔夫喜欢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他的改革高论,并总是能够让他的战友们不管愿不愿意但却表示接受同意。“戈尔巴乔夫陶醉于言谈辞令,而且几乎就每一个问题高谈阔论,其结果是上午11点召开的会议要到晚上6点甚至到8点才能结束,每位想要发表意见的人都让发言。戈尔巴乔夫是位强有力的人物,通常控制着政治局的会议,长期下来便造成了没有人真正想同总书记发生对立的一种局面。当他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正如他主持过的所有的政治局会议那样,他的观点以及他的逻辑都是激动人心的,而且像往常一样最终能成功地使政治局接受他的决定。”<sup>②</sup>

其次,戈尔巴乔夫随意改变政治局作出的决议。戈尔巴乔夫一直强调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工作,要与群众直接打交道,可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政治局关于总书记的讲话预案往往准备不足。因为戈尔巴乔夫总是喜欢“临机一动”,改变既有行程安排。甚至于当总书记在与国外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时,也不遵守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原则,擅自发表讲话。“由于他到处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局内协调发言的制度被破坏了。他的许多倡议和许诺,政治局委员都是从报纸上得知的。”<sup>③</sup>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认为,戈尔巴乔夫处理政治局事务工作的态度逐渐地改变了,他的作风变得更加独裁与专横,该由政治局决定的外交政策问题已转到由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过问。最初,戈尔巴乔夫和外国领导人特别是美国领导人安排的一切会谈都是通过政治局详细讨论决定的,不管会谈地点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国外。通常由

①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87页。

②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696页。

③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

葛罗米柯先呈上外交部的讨论稿、需要签署的文件草案以及其他国际会议和会谈所必需的东西，但是到了谢瓦尔德纳泽当外交部部长时，几乎没有什上呈的文件和讨论的事情。显然，戈尔巴乔夫是在力求避开政治局的路线、方针和指令，自由地同外国的国家元首交往，在谢瓦尔德纳泽的帮助下，戈尔巴乔夫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事实上而不是在形式上，戈尔巴乔夫在单枪匹马地设计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又同样是单枪匹马地执行这一政策。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他与美国总统里根和接下来的布什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中，戈尔巴乔夫越来越热衷于那种事前毫无准备的临时做决定，他不和我们的专家磋商就突然做了妥协，而这一妥协是我们的军方长期以来都认为的对美国人的单方面让步。”<sup>①</sup>

再次，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内部人为制造矛盾。戈尔巴乔夫喜欢玩弄政治平衡术，这样有助于他对政治局的掌控。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总书记的支持。博尔金就发现，戈尔巴乔夫给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们安排工作时，故意让他们相互发生冲突。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利加乔夫和尼科诺夫、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工作关系。“这些人负责处理同样的问题，在党内又具有同样的权力，都不愿意作出让步。”<sup>②</sup>比如，同时负责意识形态的两个政治局委员，都有可能直接影响两家畅销报纸的办报方针：利加乔夫影响《苏维埃俄罗斯报》，雅科夫列夫影响《莫斯科新闻报》。于是，政治局内有矛盾，成为全国人尽皆知的事实。政治局内部矛盾丛生，让戈尔巴乔夫十分厌恶。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旧有的灵魂”、旧的习惯力量在起作用。“以前体制的根本弊端恰恰在于它不能革新。苏共二十大后结束了斯大林模式一个最负面的特点——大规模的迫害。但同时却保留了这一模式‘旧有的灵魂’原封未动——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力。这就严重局限了政府的视野，使它变成为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几乎不可能在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进行改革。”<sup>③</sup>于是，戈

<sup>①</sup>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704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27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56页。

尔巴乔夫越来越不愿意面对政治局里的指责,也不愿意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局的作用开始减弱,会议开得越来越少,决议通过得很仓促,常常是一个人说了算。有时好几个月不开一次会,这种情况后来在中央全会上受到严厉批评。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内容越来越少,党中央委员们发现:“曾经强壮的机体开始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实际上是在埋葬国内独一无二的强权机构,政权日益瘫痪。”<sup>①</sup>

最后,戈尔巴乔夫借外力逼迫政治局屈服顺从。1987年以后,戈尔巴乔夫试图摆脱政治局束缚的企图不断遭到党内的抵制。虽然政治局里的委员们都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出来的。据统计,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实际上总共换了四批政治局委员。<sup>②</sup>除了党的第二书记利加乔夫之外,中央和政治局中所有其他岗位都换上了戈尔巴乔夫的人。在12名政治局委员中有8名是在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后上来的。他们是: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麦德维杰夫、卢基扬诺夫、雷日科夫、斯林科夫、扎伊科夫和沃罗特尼科夫,其余利加乔夫等4人被认为是“保守派”,是勃列日涅夫的追随者。<sup>③</sup>但是戈尔巴乔夫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危险——被赶下台。雅科夫列夫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前夕向戈尔巴乔夫紧急进言说:“改革最主要的障碍是政治局,其次是中央全会……如果您还继续拖延,不夺权,那么,一切就完了。”于是,戈尔巴乔夫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删除宪法第六条,苏联共产党的法定领导地位被否定了。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全国的作用也就被削弱了。博尔金说:“这部运转了几十年的社会管理机器还在不停地工作,和以前一样通过决议和决定,但是党和经济机关工作人员对制定的措施已经没有信心了。我有时看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的部领导人突然忍耐不住,激烈地有时甚至尖酸刻薄地批评起草的决定,批评国内形势和无人负责完成计划的现象,但更糟的是那种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沉默或根本不想发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28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

<sup>③</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42~143页。

表意见的态度。政治局会议上再没有人害怕批评，批评常常遭到冷嘲热讽。会议结束后，我常常看见有的部的人学着总书记的腔调和手势说应该做什么，于是周围的人一阵苦笑。”<sup>①</sup>于是，在与势力不断壮大的改革民主派和野心不断壮大的加盟共和国首脑们的呼应下，戈尔巴乔夫不断强迫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作出让步，最终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并通过了新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组成规定。

1990年7月9日，苏共二八大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关于成立新的政治局的建议。按照新的规定，新的政治局将由总书记、副总书记、15个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以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一些人组成。中央政治局的组成人数将由中央委员会决定。戈尔巴乔夫对代表们说，新政治局的组成结构将允许15个加盟共和国的党“独立行事，真正影响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美联社认为，政治局人员组成的变化保证了传统统治苏联的俄罗斯小集团由主张改革的和非俄罗斯共产党人所代替。同时，也表明中央委员会对政治局不再拥有控制权。<sup>②</sup>

1990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选出24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布罗基亚维丘斯（立陶宛党中央第一书记）、贡巴利泽（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古连科（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扎索霍夫（苏联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伊瓦什科（副总书记）、卡里莫夫（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卢钦斯基（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马萨利耶夫（吉尔吉斯党中央第一书记）、马赫卡莫夫（塔吉克党中央第一书记）、莫夫西（亚美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穆塔利博夫（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一书记）、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尼佐夫（土库曼党中央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俄罗斯联邦党中央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鲁比斯克（拉脱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谢苗诺夫（《农妇》杂志主编）、西拉里（爱沙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索科洛夫（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斯特罗耶夫（原中央书记）、弗罗洛夫（原中央书记、《真理报》主编）、舍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亚纳耶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88页。

<sup>②</sup> 美联社莫斯科1990年7月9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7月11日。

席)。在新的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戈尔巴乔夫一人是苏共二十七大时的政治局委员;包括雷日科夫在内的政府成员都未有政治局兼职。政治局将充当总统委员会的副手。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认为:“这个国家的权力正在转移。”<sup>①</sup>

《泰晤士报》发表题为“戈尔巴乔夫在党的问题上耍花招”的社论指出:“一段时间以来,苏共政治局已不再是苏联无可争议的权力中心。”“预计政治局今后将大约每个月只开一次会,间隔太长,无法冲击总统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党内官员的传统权力基地——党的中央委员会也失去了它的权力的关键手段。”“党现在不仅在最高层失去了对权力的垄断地位,而且党的基层组织也失去了这种地位”。“现在已有迹象表明,在基层,人们蔑视党的书记,工厂一直在忙于解散党的基层组织,这种趋势中会随它们对政治运动的垄断权的结束而得到加强。”“一个自相矛盾的事情是,戈尔巴乔夫巧妙地阉割了党,但他决定继续当这个党的总书记。”<sup>②</sup>

## (二) 书记处:从执行到空置

中央书记处的职能作用在苏共历史上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书记处自1917年8月起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领导,他同时兼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他的主持下,整个组织工作和技术性工作,即所谓的“机关”工作,都具有纯辅助的性质,“仅仅是为了保证中央的活动”<sup>③</sup>。但是自1922年4月3日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为“俄共(布)中央总书记”后,书记处的职能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斯大林向世人表明,什么叫作机关,主要是干部、中央和地方所有大小职务的任命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甚至开始对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和决议的形成施加影响,因为决议都是在书记处内部起草的。换言之,书记处渐渐从向政治局提供组织和技术帮助的辅助性机构变为政治领导的执行机构。”<sup>④</sup>

按照苏共党章的规定,中央书记处的职责应该包括:研究各组织和委员

<sup>①</sup> 路透社莫斯科1990年4月10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4月13日。

<sup>②</sup> [英]《泰晤士报》1990年7月14日社论,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7月16日。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sup>④</sup> 同上,第79页。

会在党的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检查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监督这些机构通过的决定的执行情况。但是书记处常常超出自己的职权范围,代行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职能。“书记处讨论的很多问题都远远超出了党团组织工作的范围,实际上它成了第二个部长会议,而且是更有权威、更有实力和更加严厉的部长会议。”<sup>①</sup>从形式上看,它有条件这样做:党组织活跃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简言之,书记处是某种意义上党的领导的作战总部。因为那时实行的是党政领导体系,所以书记处会议上审议的问题非常广泛,包括生活的各个层次,从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到党和军队的建设。”<sup>②</sup>

中央书记处由苏共中央书记们组成。“中央书记,也就是说在名义级别上低于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sup>③</sup>中央书记处虽然也处理党委抓的很多经济问题,但它首先是处理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事务的机构。<sup>④</sup>党的组织事务主要是对主管干部进行批准任命。所谓主管干部——这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主要是置于党委监督之下的行政管理部门、生产部门和意识形态部门的职务系列。党、苏维埃和意识形态很多工作人员的职务任命只不过是履行登记手续。而中央书记处任命、批准某个工作人员的职务时则必须经过中央书记们同意并形成正式决议。在批准政治局主管的干部的任命时,除书记处外,还邀请各州和边疆区党组织领导人参加会议。<sup>⑤</sup>

中央书记处每周召开一次会议,一般安排在每星期二下午四点整在老广场开会,一般由党内二把手主持。<sup>⑥</sup>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实际上确立了利加乔夫“党内二把手”的政治地位。“从表面形式上看,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没有副手,但实际上他的副手是叶·利加乔夫,这个人一直待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直到在他统治的最后一刻弃他而去。利加乔夫掌握着党的日常事务并由此获取了在全国实在的影响,正是他主持所有的书记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

<sup>②</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82页。

<sup>③</sup> 同上,第59页。

<sup>④</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98页。

<sup>⑤</sup> 同上,第193页。

<sup>⑥</sup> 同上,第190页。

处会议。”<sup>①</sup>

在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紧要时刻，中央书记处发挥了关键作用。据博尔金介绍，中央书记处主管书记处庞大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机关。这个机关同地方党委和其他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形势不明朗和困难时期，这些地方组织总是跟中央及其机关走，而不是追随政府和国家领导人。“这一次，新总书记的命运也掌握在接近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控制各种联系包括密码联系手段的人手里。不论是政府，还是最高苏维埃，实际上都发不出一份密码电报，因为所有设备和密码都在中央大楼并由中央系统控制。地方上的这些设备则由苏共区委、州委和边疆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控制。”<sup>②</sup>因此，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非常重视书记处。最开始，戈尔巴乔夫很相信利加乔夫，让他主持书记处会议。中央书记处在利加乔夫主持工作期间，可以说是很有威信的。当时有 7 个政治局委员，如果考虑到政治局总共只有 12 个人，那么书记处的“分量”就很明显了。不过，书记处具有的强大政治力量却随着政治局内部关于改革路线分歧的日益加大而令戈尔巴乔夫感到非常不安。利加乔夫自己回忆说：“大约是在 1987 年我感觉到，书记处严格明确的工作和强大的实力，引起了某些人的警觉，其中也包括戈尔巴乔夫。”<sup>③</sup>

于是从 1987 年开始，中央书记处在改革的转折时期面临着愈来愈尖锐的矛盾和挑战。作为“党内二把手”的利加乔夫的政治命运也因不断的政治冲击而随之动荡起伏。

第一次冲击：1987 年 10 月 21 日，苏共中央召开关于总书记纪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报告的全会。在全会上，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坚持要求发言，公开指责利加乔夫，说利加乔夫和中央书记们阴谋反对他，因而使他无法工作，于是他向全会提出辞职。“像这样粗暴攻击最神圣的东西——中央书记处，反对党的‘第二把手’并反对总书记本人，这在当时是胡闹。大概从

①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年，第 698 页。

②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76 ~ 77 页。

③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120 页。

托洛茨基时期起,还没有听说过中央全会上发生这样的事。”<sup>①</sup>相比于叶利钦的公然抨击,雅科夫列夫则采取了“沉默的抗争”。对雅科夫列夫来说,书记处明显地妨碍了他的工作,书记处存在的时间越长,对他的影响就会越大。利加乔夫感到,“书记处准备的材料他不是每次都读的。在大多数会议上他保持沉默,自1988年春天起他开始间或缺席,而且有时连我也不通知”<sup>②</sup>。

**第二次冲击:**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登载了列宁格勒一大学教师安德烈耶娃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刊登立即在政治上引起轩然大波。戈尔巴乔夫认为这篇文章是在利加乔夫的授意下发表出来的,是“反改革宣言”。利加乔夫被迫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失去了总书记的支持,利加乔夫在党内的威信急剧下降。此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的次数越来越少,利加乔夫这个政治人物被孤立起来。“在这一点上总书记和那些指责利加乔夫贪污受贿的人不谋而合。它使中央书记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也就是破坏了苏共的结构和苏共所有组织。”<sup>③</sup>

**第三次冲击:**1988年9月发生的事件则给予了中央书记处最致命的打击。在急迫投入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真正选举的准备活动之前,戈尔巴乔夫在党的上层结构里策划了一场大改组,并重新分配了各自的职责。戈尔巴乔夫决定,不再定期召开党的书记处会议,并委任利加乔夫担任新改组的农业委员会的主席。于是,利加乔夫也就失去了主持书记处的政治可能。格拉乔夫指出:“至于利加乔夫主持中央书记处的问题,总书记也以自己的方式作了处理:他没有用另一个‘第二书记’去接替利加乔夫,干脆抽掉了利加乔夫所坐的交椅,实际上将书记处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庄严的坚不可摧的机关从此不再使国家机关战战兢兢。”<sup>④</sup>

于是,改革给中央书记处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出来了——集体领导原则被破坏!政治决议无法得到执行!党的各级组织开始涣散!国家陷入权力空转的漩涡!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sup>②</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12页。

<sup>④</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97页。

第一个严重政治后果：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不定期召开甚至一度停止召开严重违背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利加乔夫指出，停止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幸，最严重的莫过于对苏共的影响。“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包括集体讨论干部任免问题。中央继续发布书记处决议，但通过的办法完全是走形式主义：为了征集签名，文件从一个办公室传到另一个办公室。”<sup>①</sup>更为严重的是，在各个委员会成立之后，利加乔夫被任命管理农业政策工作，雅科夫列夫负责主管国际问题，而意识形态工作由梅德维杰夫主持。“停止书记处会议和任命梅德维杰夫为党的意识形态负责人表明，雅科夫列夫成了中央意识形态政策的真正的主宰，从这时他的位置便彻底确定下来了，他成了‘灰衣主教’。”<sup>②</sup>在利加乔夫看来，这一做法实际上把政治局和书记处完全抛在一边，改革的“思想”开始完全由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两个人决定了。

第二个严重政治后果：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党的决议得不到党和国家各级组织的坚决执行。博尔金指出，很少有人知道，党内情绪、整个社会的情绪已经发生根本转变，严肃纪律已经没有意义了。党的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越来越不把政治局、中央书记处、苏联部长会议的权威放在眼里。<sup>③</sup>“中央书记们看到，他们的决议已不像从前那么有分量了。虽然通过了各种决议，但是下面不是无法执行，就是不想执行。从1989年起，书记处从一个有影响的机构变成了论坛馆。伊瓦什科当选苏共中央副总书记并主持书记处工作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改变局面了，因为从前党施加影响的整体体系被打破了。高楼倾斜，开始倒塌。党依靠原来的力量已经无法影响国民经济事务，‘公开性’使大众传媒摆脱了党的监督，差额选举实质上使党无法对干部政策施加影响。有好多次，书记处批准一个人担任州委第一书记，可党员在代表大会上和全体会议上选出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地方上对此很清楚，因此执行书记处的决定只不过是按照传统和出于对从前有影响的苏共机关的尊

<sup>①</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08~109页。

<sup>②</sup> 同上，第109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79页。

重。”<sup>①</sup>深谙苏联政治的马特洛克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变化。他分析了戈尔巴乔夫如此做的原因并得出了自己的政治结论：“戈尔巴乔夫由于没能向党的领导层引进足够数量的改革者，只好决定削弱党的领导。当然，他不可能公开挑明这一点，赫鲁晓夫就是前车之鉴。他不得不装作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党的工作更加富有成效，使党能真正起到决定政策的作用，从而把一些琐碎烦人的日常管理事务交给政府部门中不重要的角色去处理。我与官僚机构打交道已非一日，深知‘决定政策’的机构若无权干涉执行政策的机构，那它只是个绣花枕头。”<sup>②</sup>

第三个严重政治后果：中央书记处无法在重大政治事件上给予各级党组织明确的政治指令，导致中央集权式的苏共组织开始因为“上层”的瘫痪而引发整个组织的涣散。一方面，是因为书记处所发出的指令不明导致决议无法执行。“下发的文件没人重视，这些文件也用不着监督执行，因为文件的内容模棱两可、含糊不清。”<sup>③</sup>另一方面，则在于失去了书记处的指导，党的各级组织在政治大变革的特殊时期无所适从。博尔金指出，中央组织部以往的监督作用和不可缺少的帮助现在没有了，它在精简之后已大大“消瘦”，其工作人员害怕介入党的委员会和党组织的事务，更不用说代表选举了。而且这在人力上也是不可能的，有几个局只剩下四五个人，却管理着从库尔斯克到外高加索的大片地区。结果，中央书记们失去了大量信息，不了解地方上的情况；而共和国党中央、苏共州委、边疆区委则不了解中央的情况。中央工作人员下基层的数量减少了，电话费也大大减少了，然而那种失去管理杠杆作用的情况发生了。在正常情况下，这对党组织来说好像并不可怕，但是在一切事情都由中央决定、地方不习惯独立解决问题这样一种多年形成的体制下，情况就不同了，各级党委会不知所措。此外应该看到，总书记在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而后又当选苏联总统之后，对召开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97~198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48~149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79~180页。

会议审议党内问题已失去兴趣。“政治局和书记处很少开会，中央下发给地方的文件越来越少，也不再给地方充分通报国内党内的具体情况和各级党组织面临的任务。此外，区委员会急剧减少，很快便丧失了影响局势的能力。”<sup>①</sup>

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导致的更为关键的后果则在于政治上的不作为。尤其是在 1989 年初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过程中，中央书记处的不作为是苏共选举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利加乔夫指出，在新的、极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地方上的党员有理由等待莫斯科的指示。中央全会上多次请求，甚至要求党针对现状提出明确立场。这是正义的、合法的要求，中央、党的大本营的存在就是为了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还有选举竞争的条件下领导共产党员们。这是世界上一切政党中央机构的任务。但戈尔巴乔夫对地方要求党提出明确路线的回答总是重复：“你们自己决定如何行动，不要等待中央的指示。自己决定！”这是一个错误的纲领。它在反共的新的危险面前解除了党的武装，并且如果说得不过分的话，纲领是虚假的，因为对地方也发布了一些指令。是什么样的呢？我记得选举期间的口头指示是“不要干涉！不要干涉！”。一些党委相信了“自己决定！”的号召，试图积极影响选举斗争，但另一道批示又束缚了他们的手脚。<sup>②</sup>

第四个严重政治后果：由于中央书记处丧失了政治权威以及苏共组织的涣散，导致政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的时期，国家权力陷入空转的危险境地，政局开始失去控制了。利加乔夫指出：“总书记在国外，他没有留下代理人，中央书记处不工作，最高苏维埃实际上已经卸任，而在党—国家管理条件下，老的政府不习惯通过政治决议。一个大国，当它进入自身发展非常复杂的阶段时，却遇上权力涣散的问题。”<sup>③</sup>博尔金也认为，党的最高权威的丧失表明裂缝已经出现，它后来迅速导致整个苏联领导结构垮台。尽管还在高谈阔论，还在不停地作出一个又一个决定，但是人们已经明白，新领袖、中央政治局不能控制局势，不能切切实实地负起责任。许多人清楚地知道，需要寻求新的途径和新的工作方法来发动群众，解释失败的原因，让所有的人

①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336 页。

②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108 页。

③ 同上，第 255 页。

都参与解决经济问题，然而总书记—总统与执行机构之间的隔阂已无法消除。戈尔巴乔夫对报纸上的消息，对代表们的意见已经厌烦了，他不愿同中央机关、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的工作人员见面，“对他们很不客气”<sup>①</sup>。

### (三) 中央委员会：咨询机构

苏共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是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按照党内一贯存在的传统，中央委员会事实上是一个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中心，可以采取任何决定，仅仅在形式上引用一下上届代表大会的各种方针而已。”<sup>②</sup>在政治实践中，苏共中央全会在党的工作中都发挥着很大的政治作用。“实际上，全会不仅决定当前的政策，而且还决定国家的战略政策。中央全会通过和批准国家建设、国际关系、工农业发展、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等重大问题，讨论军工综合体状况，并且还就最重要的干部问题通过一些决议。”<sup>③</sup>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中央委员会有着特殊的意义。

鉴于中央委员会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戈尔巴乔夫决定通过更新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方式来扩大和增加他在党内的改革基础。到1986年春天，高层领导中残留的勃列日涅夫派已经调离、退休或者安排到政治上不重要的位置。在1986年2月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中央委员会的调整。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拉祖莫夫斯基一起拟定新的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这是整个代表大会（指苏共二十七大）工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大部分政治局委员根本不知道谁会入选、谁会落选，这个秘密（它是领袖至高无上权力的基础）使戈尔巴乔夫能够随心所欲地左右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命运，很少有人知道，这项极为重要的决定是根据个人的考虑作出的。总书记决定谁可以进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们则以选他当领导作为回报。”<sup>④</sup>在这次大会上，中央委员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80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29~230页。

<sup>④</sup> 同上，第149页。

会的人员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40%以上的正式中央委员是新人，这是比以前历次党代表大会所发生的更为重大的变化。据估计，自从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执掌权力以来，截至1988年5月，由300名委员组成的制定政策的中央委员会至少有40%的委员已被撤换。中央委员会各部负责人中有 $\frac{3}{4}$ 被撤换。<sup>①</sup>

但在实际上，这种变化的意义并不太大。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换汤不换药，中央委员会依然极为保守。马特洛克指出：“改革派后来认为，党代表大会提早了一年。他们感到，戈尔巴乔夫没有时间进行适当的‘准备’，确保由志趣相投的官员占主导地位。看来，戈尔巴乔夫很可能对他打算进行的改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见解，因而他不可能知道谁会支持他。即使他了解其改革方向，他也难以在共产党的上层发现对其改革有帮助的人。旧制度的提拔过滤系统仍在照常运转。”<sup>②</sup>戈尔巴乔夫感到党内的阻力越来越大。

从1987年1月的中央全会开始，“对总书记来说，每次中央全会都成了严峻的考验”<sup>③</sup>。不过，斗争的真相被掩盖了。即使有人在研究1990—1991年中央全会会议记录时也无法感受到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因为对改革和整个戈尔巴乔夫方针的批评都被安排到中央委员会正式会议之外去了。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一切都结束得比较顺利，通过了模棱两可的决议，缓和了矛盾，造成了中央委员意见一致的错觉。”<sup>④</sup>尽管如此，也无法掩盖党内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声音。利加乔夫指出，在那个时期，许多州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们经常对遇到的曲折、改革的激进化不理解，但他们把权力赋予了戈尔巴乔夫，而且只有戈尔巴乔夫。不只是要嘴皮子，不是在公开的讲话中，而是在实际行动中，在脑子里，在心中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新路线的领袖。正是他们在1985年选举他为总书记，因为他们将戈尔巴乔夫与复兴联系在一起。“在全会上产生骚动的原因是：中央委员们感觉到，由于过分的激进，改革偏离了最初的道路，几代人所取得的成果正遭到破坏，给人民带

① [美]《华盛顿邮报》1988年5月18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88年5月23日。

②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58页。

③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④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34页。

来痛苦和损失的社会主义退化开始了。有政治经验的人们明白,是什么人由于什么原因在推动这一进程,他们已经预见到了这么做的严重后果。”<sup>①</sup>面对来自党内的各种批评和指责,戈尔巴乔夫不止一次地对利加乔夫说,他应该辞职。

于是,中央委员会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又是一个回避不了的敏感政治问题——赫鲁晓夫下台及其改革失败——就出现了。有人开始向总书记的思想中灌输所谓的“赫鲁晓夫综合征”,“赫是在 1964 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被撤职的”<sup>②</sup>。而戈尔巴乔夫与中央委员会的恶劣关系,又进一步促使戈尔巴乔夫决定采取各种措施来预防这种最坏情况的发生。利加乔夫认为,戈尔巴乔夫与当时中央一部分委员的关系促使“赫鲁晓夫综合征”的形成。<sup>③</sup>因为在戈尔巴乔夫同政治局发生冲突的时候,苏共中央全会的立场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央全会向来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依照这一机关的决议,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人与著名活动家被辞退和解职——从赫鲁晓夫到贝利亚、马林科夫和朱可夫,都是如此。为了及时防止可能发生政变的危险性,需要改变中央的人员组成。”<sup>④</sup>

戈尔巴乔夫开始采取行动了——削弱中央委员会! 1987 年的中央一月全会继续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斗争,社会主义机构成了批评的目标,成了缺少民主的罪人。作为解决方案,戈尔巴乔夫提出了选举基层领导干部的建议。

1987 年的中央六月全会继续开展撤换领导干部的运动。这种对干部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唯一可解释的理由可能是反对“改革”的力量在增强。在苏联的政治史中,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极度变革引起矛盾和混乱的时期。当时的情况甚至使对“改革”有兴趣的西方观察家们都感到惴惴不安。科伊乔·佩特罗夫指出,戈尔巴乔夫不停地进行干部斗争,他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在有组织的半官方的会见、座谈和庆祝会上纺织了一张结实的网,试图动员

<sup>①③</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124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120 页。

<sup>④</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21 页。

更多的社会力量反对“有特权的”官僚阶层。在同媒体代表的反复会见中，总书记向记者们发表个人言论并指出他们要关注党内变化及其矛头所向。1987年，在经过大规模干部清洗之后，戈尔巴乔夫的宣传媒体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党内管理“自由化”运动，由大众传媒和人民群众对这种“自由化”进行双重监督。<sup>①</sup>

从1988年开始，他把共产党从经济和国家管理中排除出去，把权力转移给国家代表机构。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撤换干部达到高潮。戈尔巴乔夫成功地把政治改革或戈尔巴乔夫主义作为全面改革的政策确定下来。但是党代表会议刚结束不久，党的领导人之间的思想对抗立即死灰复燃。这说明尽管表面上戈尔巴乔夫取得胜利，所谓党内团结统一的说法只得忘记了。取消了书记处这一真正的“苏联影子政府”，此举自然不仅仅是为了将利加乔夫推向次要地位。这一看似纯机关的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寓意：自斯大林时代以来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不再充当发号施令的机关，苏联共产党本身也不再充当苏维埃国家实际上的“最高强力机构”。<sup>②</sup>

在1988年9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就机构改革问题作了讲话。会议前后，戈尔巴乔夫对切尔尼亞耶夫说：“如果现在就直接召开党代表大会，我的中央委员会产生不了，新的干部还没成长起来。但是应该做彻底更新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它应该是有一个工作机关，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人应不是根据职务，而是根据智慧、根据成为推进改革的革命者的能力……我们要成立中央委员会的各种专门委员会，由中央委员组成，让它们‘拟定政策’。党中央各个部门要成为这些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从机关中取消所有管经济和政府事务的部。保留社会经济部作为理论研究单位，取消它的一切管理权力和职能。不然的话一切就会回到老路上去。保留农业部。现在问题特别尖锐。再说党在传统上一直有个农业部。（戈尔巴乔夫本人是‘搞农业的’！）但是这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没有搞好食品供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41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98页。

应,就应保留农业部。还要保留国防工业部(最后同意建立军事政策委员会,受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的总书记领导)。……把三个国际部合成一个国际部,两个意识形态部合成一个部……”在切尔尼雅耶夫看来,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直接说撤销书记处,但只是保留“分管方面”的书记职务而已。<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开始按照设想规划中央委员会。

1988年9月,戈尔巴乔夫在例行休假期间起草了改组中央工作的计划。他建议组建一系列关于组织、经济、农业、国防和其他问题的理论委员会,而且每个委员会都由一名政治局委员领导。戈尔巴乔夫给利加乔夫安排了一个含糊的差使,去监管农业生产。切布里科夫的克格勃主席一职也被撤销,安排他去负责党的一个委员会,监督警察和犯罪审理制度。当然,这样的改组是以加强苏共中央活动为出发点的。但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利加乔夫指出:“委员会的建立取缔了书记处。如果仔细想一下,这严重违反了党章,这在党内近几十年尚无先例,因为上面白纸黑字写道,书记处是中央的常务工作机构。这里不管怎样,巧妙之处在于谁也没说取消书记处的会议,好像无人有此企图。但是委员会建成之后,书记处会议便自动取消了。党丢掉了战略领导司令部。这对中央活动本身而言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且党的州委、边疆区委也叫苦连天。纪律执行情况急剧恶化,党的监督职能被削弱了。书记处重要功能之一是总结全党的有益经验,但各委员会各自为政,中央好像垮了,隶属关系也松弛了。”<sup>②</sup>马特洛克也注意到:“这次改组有两个目的:其一,党的高级官员再也不能轻易直接干预政府的工作;其二,进一步清除了阻止改革者的组织基础。新成立的党的各级委员会除了颁布一些冠冕堂皇的命令之外,不再行使实权。它们的工作几乎无人注意,政治上其主席一职已被架空。”<sup>③</sup>

为了减少党内的批评,从1988年9月27日起,戈尔巴乔夫用两天时间在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变动的准备工作。他把同志们请来并向他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71~272页。

<sup>②</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48页。

们“解释”——谁得离岗,谁将调动工作。他从葛罗米柯开始,同样也建议让索洛缅采夫、杰米契夫、多尔基赫退休,切布里科夫被调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当中央委员会书记。对于戈尔巴乔夫的安排,他的战友们无法拒绝。因为“这些新委任的工作听起来都很重要,而且拒绝有能力胜任的职位有违党的传统‘伦理道德’。”<sup>①</sup>

在 1988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得到了实现。在这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彻底粉碎了党内高层领导干部中的反对派。全会同意葛罗米柯的请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全会选举梅德韦杰夫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为中央书记,弗拉索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比留科娃和卢基扬诺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解除他们中央书记的职务。全会解除索洛缅采夫政治局委员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职务、多尔基赫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的职务、杰米契夫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和多勃雷宁中央书记的职务。全会决定普戈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同时,全会决定,苏共中央成立 6 个委员会:党的建设与干部政策委员会(拉祖莫夫斯基任主席);意识形态委员会(梅德韦杰夫任主席);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斯柳尼科夫任主席);农业政策委员会(利加乔夫任主席);国际政策委员会(雅科夫列夫任主席);法律政策委员会(切布里科夫任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党中央机关将不具有指挥职能,而只具有政治职能。”<sup>②</sup>于是,老的中央机构被剥夺了权力。“改革”的领导核心由党的机构换成了代表机构(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有组织的反对派行动已不存在了,而国家体制却在继续全面退化。”<sup>③</sup>权力中心的转移,让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一旦撤掉党内官僚手中的这个工具,他也就砍断了自己所栖身的树枝。因此,戈尔巴乔夫建议全会选举他担任葛罗米柯去职后空去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职务。

在 1988 年 10 月 1 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被选举为最

<sup>①</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148 页。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 年,第 109 页。

<sup>③</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141 页。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看上去戈尔巴乔夫好像走上了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走过的老路。不过，格拉乔夫却认为戈尔巴乔夫另有深意。“尽管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他在玩了几年‘民主游戏’之后，又走上了同时兼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的习惯性老路（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莫不如此），这里情况却截然不同。获得新的职务之后，他就朝着挣脱亲爱的党和政治局的怀抱迈出了第一步。”<sup>①</sup>

1989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政治局对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失利的大肆批评，戈尔巴乔夫决定更换大部分中央委员。但是完成这一任务极为复杂艰难：只有代表大会才有权选举新的委员和不改选老委员。戈尔巴乔夫想出了一个非惯用的方式，创造性地发展了列·伊·勃列日涅夫首先使用的一种方法。勃列日涅夫当时坚决要求一些党的颇具威信的活动家“自愿”辞职，这样就使他避开各种党内程序。戈尔巴乔夫还决定采用让中央委员会中为数众多的领取养老金者“集体退休”的方法。这些领取养老金者在不久前的过去都是最著名最重要的党和国家的官员。戈尔巴乔夫并非毫无理由地认为，这些人敌视改革及其“工程主任”。解除他们职务的行动戈尔巴乔夫搞得很漂亮。基于同一些颇有威望的领取养老金者谈话的结果，他能够预先获得他们的支持。安·安·葛罗米柯再一次帮助了他。在 198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例行中央全体会议上，宣读了 110 名领取养老金者申请退职自愿的一封信。<sup>②</sup>

经过短短两年激烈的斗争，戈尔巴乔夫严重地损害了共产党，甚至扭曲了社会，其后果就是使苏共这台强大的政治机器更加停滞不前。一方面，清除更多的党内权力派人物；另一方面，又吸收大量支持“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分子。从 1989 年起，苏联共产党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形式上都已失去了领导作用和职能。戈尔巴乔夫担任了总统职务，建立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但是为了把国家的最高权力抓在手里，戈尔巴乔夫决定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98 ~ 199 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21 页。

对党——其仕途急速飞黄腾达的功臣——的结构和运行给予最终的毁灭性打击。

1990年7月12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尽管遭到代表们的强烈抵抗,但是戈尔巴乔夫仍然再次当选为总书记。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倡议,大会决定“改组”苏共中央委员会——把它变成了有名无实、完全失去战斗力的机构。<sup>①</sup>

1991年7月25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最终完成了他“改造”党的目标——建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在这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不能驾驭党了。他的讲话不时被打断,与会者当中时常有人同总书记争吵。会议日程中有讨论苏共新纲领草案和确定苏共提前召开二十九大的日期。但是更多令与会者惶恐不安的大概是戈尔巴乔夫如何对待俄罗斯联邦总统7月20日颁布的《关于停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机构和组织中的活动的命令》。在戈尔巴乔夫的劝诱下,已经失去政治辨别能力和政治勇气的苏联共产党通过决议:1991年11—12月提前举行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会上将通过苏共新纲领。<sup>②</sup>

然而谁都不知道,这次全会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 四、全党意志:关键的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和一次党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认为,如果照这些“党的里程碑”来看,改革的历史大体如下:

<sup>①</sup>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16~717页。

第一阶段,从1985年4月到1986年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是改革的哲学阶段。苏共摆脱了渐渐地已习惯的意识形态的模式,初步地尝试着分析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这个社会与列宁的设想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它在世界上占有怎样的位置。我们回顾了自己的历史,尽量剔除对历史的扭曲。开始制订一份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之内的革新社会的计划。

第二阶段,从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到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这是改革的组织阶段。在这一阶段,苏共已在研制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改革的规划,并采取将其付诸实施的措施。而此时每前进一步都要由党、由其领导机构的决议来安排。在1987年的中央一月全会上提出了必须重新审视关于社会主义过时了的观念,并建议采取一系列社会和国家民主化的激进措施。同年的中央六月全会批判了管理经济的行政指令方法,并明确表示支持彻底的经济改革。1988年的中央二月全会是在“给革命性的改革以革新思想”的口号下召开的。最后,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成了改革事业从哲学思想和第一批按照“在实践中摸索的工作方法”进行的实际行动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入推进过渡的基础:首先是向实施1917年之后第一次自由选举议会过渡。于是,任何一个公正无私的研究者都应当承认,党不仅曾经是改革的发动机,而且事实上还在人民代表大会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之前就已经同意放弃自己在社会上的垄断地位了。

第三阶段,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到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是苏共在民主环境下自我改造的阶段。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政权便开始转交到苏维埃手里。苏联共产党就像在民主社会里那样,已经不再能指令性地决定国家的发展,而是应该通过政治手段行动了。但它仍然是唯一一支拥有全联盟范围的组织规模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不过,许多党的委员会在失去习以为常的指挥职能之后出现了自我感觉失常。对党来说十分沉重的阶段开始了,它要寻找自己在革新中的社会里处于怎样的地位。广大共产党员面临着实实在在地要决定党的命运的问题:它有没有能力改革好?能不能从一个与国家同生同在、在许多方面官僚气十足的结构改变为群众性的按民主作风组织起来的左派力量的政党?一场全党范围的大辩论自发地启动了,矛头针对领导的批判浪潮掀起来了,脱离党的队伍的人数

急剧增长。苏联共产党的团结统一因各共和国的分立运动而开始逐步削弱并遭到破坏。即使在这一十分艰难的时刻,苏联共产党仍继续在对事态的进程发生重大的影响。在1988年的中央七月全会上,讨论了落实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决议的问题。中央九月全会的议题是完善党的机关机构。1989年1月,中央委员会核准了苏共参与选举的政治纲领。3月,发表了新的土地政策,其主要目的为恢复农民是土地主人的地位。同年的中央九月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在当代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纲领。1990年2月5—7日举行的中央全会通过了苏共中央提交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7月2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新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苏联共产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sup>①</sup>

### (一)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

1986年2月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路透社预言“此次划时代的代表大会将迎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在戈尔巴乔夫的坚定领导下,苏联的经济增长幅度将增大”<sup>②</sup>。这次大会是例行的代表大会,在1985年4月的中央全会上已经决定大会召开的日期和需要讨论通过的主要文件。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确认中央四月全会提出的“加速我国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制定改革的战略和策略,动员全国力量去实现它。

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广泛地按照列宁的方式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制订出能把宏伟的目标和现实的可能性,把党的计划同每个人的希望和夙愿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现实主义的、经过全面斟酌的行动纲领。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将确定我们今后几年和几十年前进、向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崭新状态前进的性质和速度。”在对已取得的成就作出应有评价的同时,戈尔巴乔夫说:“苏共领导人认为,有责任把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9~231页。

<sup>②</sup> 路透社布鲁塞尔1986年2月20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年2月23日。

我们在政治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出现的失误、经济和社会精神领域的不良倾向,以及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如实地、直率地告诉党和人民。一些年来,不仅是由于客观因素,而首先是主观上的原因,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实际行动落后于时代和生活本身的要求。国家发展中问题的积累要比问题的解决快。惰性、管理方式方法的僵化、干劲不足、官僚主义滋长——这一切都给事业造成不少损失,社会生活中开始出现停滞现象。形势要求变革。”<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主要谈了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当代世界的主要趋势和矛盾”。戈尔巴乔夫指出:“社会进步的道路充满着各种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但是这正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主要特点,处在这些过程中心的始终是人、人的利益和他所关心的事情。弗·伊·列宁强调指出,人的生命、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是最大的价值,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一切。苏共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是以此为目标的。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当前条件下,斗争的主要方面是为各国人民创造应有的、真正人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保障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存条件,热心地对待它的财富,首先是热心对待主要财富——人本身和人的能力。我们正是建议在这方面同资本主义制度竞赛,在持久和平的条件下竞赛。”

第二个问题:“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是战略方针”。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所理解的加速指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但不仅仅是如此。其实质在于发展的新质量:在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结构改造、有效的管理、劳动组织和刺激形式的基础上尽一切可能使生产集约化。加速发展的方针不能只归结为经济领域中的改造。它还规定执行积极的社会政策,始终如一地确立社会主义公正原则。加速的战略要求完善社会关系,更新政治机关和意识形态机关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坚决消除怠惰、停滞不前和保守主义,即消除阻止社会进步的一切东西。应当保证我们成功的主要一点是,群众生动的创造活动,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可能性和优越性。”总之,“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些问题包括近期的和远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政治的和意

---

<sup>①</sup> 以下报告内容均引自:“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的政治报告”(1986年2月),《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6年第3期。

识形态的,内部的和外部的。苏联社会的崭新状况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达到,并且应当达到”。

第三个问题:“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社会主义人民自治加深”。戈尔巴乔夫指出:“民主,这是新鲜的清洁空气,社会主义社会机体只有在这种空气中才能朝气勃勃地生活。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强大潜力在我们这儿还没有充分利用,这指的是,如果不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及其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那么加速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戈尔巴乔夫强调:“党是推动社会主义自治发展的主导力量和主要保障。党在完成社会的领导作用的同时,本身又是社会政治自治组织的最高形式。苏共在发扬党内民主、提高在政治体制各个环节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积极性的同时,为加强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治和扩大群众以及每一个人参与国家事务的过程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作了进一步解释:“扩大公开性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原则性的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及参加管理。这也可以说是国家对千百万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知识分子的事业充满责任感态度的保证,是我们干部心理改造的出发点。有时在谈到公开性的时候,还会听到这样的呼吁:在谈论我们的缺点和疏漏以及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的困难时要谨慎一些。这里只能有一个答复,列宁的答复:共产党员永远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讲真话。最近一年的经验证明,苏联人是多么坚决地拥护对妨碍我们前进的一切东西作出不妥协的评价。有些人习惯于马马虎虎地工作和欺上瞒下,一旦实行公开性,即把国家和社会中所做的一切都置于人民监督之下和在人民的注视下,他们确实感到不舒服。因此,我们应当使公开性成为不断起作用的制度。中央需要它,然而在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也同样需要它,也许更需要它。”

第四个问题:“党的对外政策战略的基本目标和方向”。戈尔巴乔夫指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决定了苏共的国际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极为明确的——保证使苏联人民能够在持久和平和自由的条件下劳动。“这实际上就是党对我们对外政策的首要的纲领性要求。在目前局势下实现这一要求,首先就意味着制止从物质上准备核战争。”戈尔巴乔

夫呼吁,一定要取得反战斗争的成功。“这种成功将是全人类,也就是地球上每个人的历史性胜利。苏共认为积极参加这一斗争是自己对外政策战略的实质。”

第五个问题:“党”。戈尔巴乔夫指出,如果党自己能够不断发展,摆脱“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一套观念,批判地评价所取得的成绩,明确地看到还要做些什么,它就能够卓有成效地解决新的任务。党的工作的改造,实质在于使每个党组织——从共和国党组织到基层党组织——能积极地实现四月全会的路线而斗争。戈尔巴乔夫说:“如果我们不学会按新方式工作,不善于克服各种表现形式的因循和保守,如果我们丧失清醒估价和如实看待形势的勇气,我们就无法向前迈出一步。为了消除不负责任的现象,应当把直言不讳、开诚布公地评价一切当作一条规矩。在那些应当表现严格要求、诚实和党的良心的地方,已经该是放弃不合时宜的老好人作风的时候了。”戈尔巴乔夫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他说:“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即我们的哲学战线和经济战线,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的状况,可以说是明显脱离生活的需要。”他告诫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讲话与实际生活脱节就会严重地使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努力一文不值。不管我们作多少报告,谈到关心人,批评生硬作风和官僚主义,只有要一个人在机关里、在大街上或在商店里遇到粗暴的对待,那么这些报告就会化为乌有。不管我们谈多少次举止文明,但是如果我们不进行实际斗争来争取生产、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高度文明,那么,这些讲话就不会带来好处。不管我们写多少有关社会主义、秩序和纪律的文章,但是如果不能配合以劳动集体的积极行动和彻底实施法律,那么这些文章也就毫无用处。”因此,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它没有应付现实生活各种情况的万灵办法,它要求不断地探索和善于跟上现实生活。提高社会的成熟程度和建设共产主义,就意味着要不断提高思想的成熟性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第六个问题:“关于讨论党纲新修订本和修改党章的总结”。戈尔巴乔夫指出:“自通过第三个党纲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生活中发生了许多变化。积累了新的历史经验。并非所有的评价和结论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转到直接的实际行动方面来,原来是为时过

早了。在规定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的期限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完善社会主义、加速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国际政策等方面的新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显得很尖锐。所以这些都要求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有所反映。由此可见,把提出的这个文件作为党的第三纲领的新修订本是有实际根据的,并且具有原则意义。这个新修订本重申了苏共的主要目标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同时也证明,我们对所积累的历史经验给予创造性的理解,并根据面临的转折时期的特点来制订战略和策略。”

在报告的最后,戈尔巴乔夫满怀豪情地宣布:“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已经涌向第二个一千年和第三个一千年的交替时期。将来,在这交替时期以后情况会如何呢?我们不准备预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提出的计划是不寻常的,而是大胆的,我们的日常工作贯穿着社会主义道德和正义的激情。在目前这个令人不安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战略,我可以说也是我们的生活战略,目的是要使人们爱护这个星球、天空和宇宙空间,像建设世界文明的新居那样开发宇宙空间,使生活彻底摆脱核噩梦,为了创造目的,而且仅仅是为了创造目的,使宇宙中的独一无二的居民——人的一切优秀的品质得到充分发扬。”

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报告呢?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让·卡尔洛·帕叶塔指出:“我有个印象,贵党似乎有三位总书记。一位呢,是那个称赞新稿苏共纲领的人。这是一份完全充斥着以往观点的文献。另一个呢,就是那个做报告的人;这个报告里已经有了一些针对改革的新颖的思想。最后呢,第三位总书记审查校订关于那份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里有着相当多的新东西,尽管其中有些地方也会碰到伊索寓言式的话语,有的地方则对深入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足。”<sup>①</sup>

不管怎么说,此时的戈尔巴乔夫仍然相信社会主义,但却开始赋予社会主义新的内涵。1986年2月25日的《真理报》发表社论:“我们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社论指出:

---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1页。

我国社会已进入自己历史上的新阶段。

……这就是要吸引越来越广泛阶层的人民来解决社会事务,要调动他们创造性的能力和经验,要进一步发扬和丰富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关于防止核威胁、使国际局势迅速好转、加强地球上和宇宙中的和平的问题已提上了日程。列宁的党、共产主义者的党寻找并已找到解决这些复杂的、名副其实的革命性的任务的方法,对时代提出的要求作出了无愧的回答。

……我党坚决声明:和平与裁军的方针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苏共和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核心。苏联现在采取的维护和平和使整个国际局势健康化的新的、坚决的行动,乃是苏共内外政策的实质和精神以及这两种政策有机融合的表现。我党高高地举起和平、自由、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的旗帜和列宁的伟大旗帜。

……世界发展的全过程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当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世界两种社会政治体系进行历史性竞赛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及殖民主义崩溃的时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即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获得解放是国家的人民和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侵略与压迫政策、为争取民主与社会进步而斗争的时代——的性质和基本内容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sup>①</sup>

## (二)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

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开幕。苏共党代表会议在苏共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它主要用来解决在紧急情况时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全苏党代表会议在1941年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战后一次也未曾开过,这次实际上是相隔47年后的第一次会议。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两年后就要召

<sup>①</sup> 塔斯社莫斯科1986年2月25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年2月27日。

开党代表会议呢？马特洛克分析：“戈尔巴乔夫打算举行苏共大会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为了通过一个更加权威的决议，以支持他的改革观点，因为中央委员会的赞同还不够权威；其二是为了改组中央委员会。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他曾提出要召开一次苏共大会，但这个建议直到6月全会时才得以通过。这表明即便是召开这样的大会也有人从中作梗。一旦改革进入政治领域，中央委员会里的争论就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戈尔巴乔夫很少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如愿以偿。要使改革实现它的民主化目标，戈尔巴乔夫要么有一个唯命是从的中央委员会，要么想办法绕开党的所有机构。第十九次苏共大会首先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当规定只有党代会才有权为中央委员会选举新成员时，戈尔巴乔夫就已经输掉了这场改组中央委员会的战斗。大会上他只能作些有限的变动，使候选人晋升为正式成员，至于从外面引进新成员则是不可能的。”<sup>①</sup>实际情况也正如马特洛克所分析的那样。时事社在6月20日预测全苏党代会时就指出，这将是戈尔巴乔夫政权的转折点。这次全苏党代会首要的工作是，将为排除成为改革的最大障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实行党、政组织的改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全苏党代会将成为关系到戈尔巴乔夫政权的前途的斗争场所。”<sup>②</sup>因此，戈尔巴乔夫必须全力以赴。

从1988年4月起，围绕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主题报告，戈尔巴乔夫经常召集成员不定的“小圈子”会议商量应写入报告中去的思想。他说：“此次代表会议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但不要篡夺了1985年4月的位置。革命那时候开始了。而代表会议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将宣告：我们将最终剪掉了行政命令体制及一切斯大林主义的遗产的脐带。考虑到‘安德列耶娃’的文章及其后果，指出这一点特别重要。尼娜及其同伙正是应该从这个讲坛上听到这一点。‘不可逆转变’这个词正在过时。改革的婴儿已经诞生。改革的孕育已经结束。至于婴儿将如何成长，这将取决于襁褓的清洁、饮食的质

①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

② 莫斯科6月20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8年6月22日。

量和玩具的新颖。”<sup>①</sup>切尔尼亞耶夫回忆：当我们在新奥加廖沃写完报告中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这会使政治局的同志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新的体制中将找不到“高层位置”。他反复思考了很久——这一部分如何开头。“也许，”他说，“可从我要求辞去总书记一职开始……并立即建议把这一职务与主席（但不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是最高苏维埃本身的主席）职务兼起来。让党代表会议，然后再让人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吧……”<sup>②</sup>同时，为了减少党内阻力，在1988年4月11日至18日期间，戈尔巴乔夫三次召开全国州委书记和各共和国党中央书记会议，每次50人左右，讨论代表会议的安排，并解释对不久前发表的安德列耶娃文章的立场，争取第一书记们的政治支持。

1988年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作了长达4小时的政治报告。“实际上总书记和整个报告就贯穿着如下思想：让人民更加广泛地参与国家管理；为每一个民族今后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划分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的职能。”<sup>③</sup>戈尔巴乔夫在报告开始就提出把使改革变得不可逆转列为这次会议代表们面临的“根本问题”，并指出“不能说革命性的改革已经不可逆转”。戈尔巴乔夫说：“今天我们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但它们之中哪个是关键问题呢？苏共中央认为，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就是这样的问题。”<sup>④</sup>然后，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展开论述。

一是发展和深化改革。戈尔巴乔夫首先列举了用自我批评的精神评价已取得的成就，强调要始终如一地实行根本的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指出，如果不千方百计地使蕴藏在科学、教育、整个文化中的社会智力和精神潜力活跃起来，社会主义的改革和革新就是不可思议的。特别需要重视发展社会科学。戈尔巴乔夫认为：“恰恰是社会科学受个人崇拜、官僚主义领导方法、教条主义和外行的干涉之害最深。”<sup>⑤</sup>改革的方向，就是恢复列宁主义原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亞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43页。

<sup>②</sup> 同上，第247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88页。

<sup>④</sup>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3页。

<sup>⑤</sup> 同上，第26页。

则、把注意力转向人，转向从精神上充实人民。“党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不断努力以达到人道的目标。”<sup>①</sup>在谈到国际关系民主化问题时，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的改革已具有世界意义。在自己家里进行根本变革也要求对国际事务采取新的立场。这种新的立场就是新的政治思维。戈尔巴乔夫说：“新思维并不是一种封闭的和一成不变的理论。新思维是辩证的，它使政策适应现实生活的演进而不断完善和发展，当然，也要适应我们作出的社会主义选择，适应列宁主义原则。”<sup>②</sup>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首先在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应该承认），在某一个时期，由于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变形。结果不仅使斯大林及其亲信的独裁，而且使大批镇压和目无法纪的行为有可能出现。那些年形成的行政命令的管理方法对我国社会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现在我们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这个体制。”<sup>③</sup>其代价是巨大的：出现漠不关心，群众的社会积极性下降，劳动者疏远公有制和管理的现象。因此，应当有勇气承认：“假如政治体制仍然不动，仍然毫无变化，那么我们就无法实现改革的任务。”<sup>④</sup>那么，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改革的主要标准是什么呢？这就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戈尔巴乔夫指出，在政治体制的各个基本环节之间，首先是在党和国家之间正确地分配权限，这具有原则性意义。需要综合地处理并从根本上解决恢复人民代表苏维埃充分权力的任务。党的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民族政策——首先应当经过人民代表苏维埃这个人民政权机构贯彻执行。为此，提出候选人供选择、实行无记名投票、竞选以及其他民主形式应当成为一项准则。应当力求使各级苏维埃的工作公开进行，经常置于选民的监督之下。因此，必须坚决更新现有的选举制度，实行竞争性差额选举。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苏联社会不断民主化进程的结果应该是建立一个社

①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② 同上，第30页。

③ 同上，第38页。

④ 同上，第41页。

会主义法制国家。简而言之，“法制国家的主要标志是要切实保障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集体、党组织或社会团体，还是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正像公民对自己的全民国家负责一样，国家政权也要对公民负责。公民的权利应该得到可靠的保护，不受政权及其代表人物的任何专横行为的侵犯”<sup>①</sup>。

三是苏共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戈尔巴乔夫指出：“为什么作为真正民主的组织而建立的和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苏共未能阻止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关的社会主义变形过程呢？为什么后来在揭露和谴责了背离列宁主义原则的行为以后，苏共仅限于表面上的变化，从而使国家发展中严重的停滞现象得以产生呢？答案在于，党本身、党的活动内容和党与劳动者的联系发生了某种变形，使党一开始就固有的和列宁及其战友通过多年努力培养的许多民主的布尔什维克传统丧失了。”<sup>②</sup>为此，在目前的转折阶段，苏共要充分地实现自己的社会领导力量的职能和任务，就必须做到：首先，充分恢复党内民主。“应当在党内全面恢复坚持原则、开放性、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遵守纪律、党的同志情谊和无条件履行个人责任以及求实的气氛。”<sup>③</sup>其次，区分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戈尔巴乔夫强调，这首先要求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应当以政治领导机关的面貌出现和行动，不允许取代最高层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所有应当由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做的事情，都要由它们来做。那么，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应当运用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可能性通过苏维埃政权机关贯彻党制定的政治路线、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央全体会议呢？这里应当充分实现列宁的原则：“苏共应当通过在国家机关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自己的政治方针。所有党组织都应严格地在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委会不能通过含有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直接指示的决定。”<sup>④</sup>最后，通过革命性改革塑造社会主义新面貌。戈尔巴乔夫把更新意

<sup>①</sup>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68页。

<sup>②</sup> 同上，第78页。

<sup>③</sup> 同上，第81页。

<sup>④</sup> 同上，第89页。

意识形态的任务同根本经济改革以及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民主化相提并论。他指出，背离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给意识形态留下了严重的烙印。“意识形态的理论水平下降了，宣传工作经常脱离生活现实。实质上，意识形态工作是为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服务了，对现实丧失了批判态度，从而助长了停滞现象。宣传如果回避非常重要的现实存在的问题，就会流于玩弄辞藻和空谈，就会变成纯粹官样文章。丧失理智上的首倡精神、教条主义、言行脱节，这都会导致党的思想影响的削弱。”<sup>①</sup>很显然，进步之路只能有一条——这就是改革之路，革新之路。

1988年7月1日，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关于公开性》《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关于司法改革》《关于族际关系》等7项决议。在戈尔巴乔夫的七年改革历程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无疑具有转折性意义。“实际上，直到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才出现真正的转折，此后改革才开始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sup>②</sup>党代表会议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像一股刮过的台风，使全社会、全国，甚至全世界都为之激动。全世界都极度紧张地注视着苏醒的俄国熊是如何走出洞穴、走向文明世界的。如果它出现在体面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情况将会怎样，周围的一切是否将会崩溃？博尔金指出：“变革之风是有感染力的，它激发了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居民，助长了东欧各国潜在的并时常爆发出来的情绪。”<sup>③</sup>

具体来说，党代表会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党代表会议暴露了党内一致的假象。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是一次空前绝后的代表会议，会上对领导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发言自始至终争吵不休。格拉乔夫指出，就群情激昂、违反礼仪以及打破禁忌而言，代表会议确实像一出情节充满尖锐冲突的戏。主要的是，代表会议永远结束了所谓苏共队伍铁板一块的神话，揭示了实际上的多元化以及苏联政治精

<sup>①</sup>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91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3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英出人意料的多党制——此前政治精英均被送入一党体制的狭小的罐头式空间。“代表大会使这一切都发生了动摇”，至今戈尔巴乔夫回忆起来还非常兴奋，“……只有这样开放的立场才能削弱官僚的淫威”。<sup>①</sup> 英国《泰晤士报》在1988年6月29日的社论中作了这样的评价：“昨天在三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概述了一项计划，以拆散苏联政府的组织结构，并为其未来确定一种新的格局。自从赫鲁晓夫32年前谴责斯大林，共产党一直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种演讲。他的方案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而且从莫斯科有礼貌的鼓掌来看，也比代表们为之作好了的思想准备走得远得多。虽然戈尔巴乔夫并不是第一个试图削弱党对克里姆林宫的控制权力的人（赫鲁晓夫和安德罗波夫都曾尝试提倡这种变革），但是他们都没有如此公开或有魅力地尝试，也没有提出一项具有如此规模、紧迫性的雄心的计划。这位苏联领导人也不是在进行赌博，因为心里明白他要冒在他的经济改革期间失去政治控权的风险……他仍然没有赢得本周的会议的全心全意支持。他昨天得到的欢呼是不那么欣喜若狂的，时断时续的鼓掌大部分只是在他读到恭恭敬敬地赞扬党和国家对共产主义所作的承诺的段落之后才出现。即使他的演说和游说活动本周证明是成功的，对他在地方上被接受的程度如何，人们一定还有种种怀疑。”<sup>②</sup>

其次，党代表会议为政治改革提供了起点。代表会议的最大成果是同意成立人民代表大会。该机构将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制定总政策和选举一个规模较小的常设立法委员会即最高苏维埃，以改变现有最高苏维埃“以盖橡皮章的形式批准党的政策”<sup>③</sup>的尴尬政治地位。这就“为政治改革提供了起始点，为通过选举产生代表权力机构开辟了道路。这是在改革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道路上迈出的实际一步。至于后来很快就发现这个制度没有进行改革的能力则是另一回事。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苏共中央机关和整个管理机构受到了尖锐批评，这一状况成了开始改组机构的起点”<sup>④</sup>。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88页。

<sup>②</sup> [英]《泰晤士报》6月29日社论“米哈伊尔的理想”，转引自《参考消息》1988年7月2日。

<sup>③</sup> 美联社莫斯科1988年7月5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8年7月7日。

<sup>④</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94页。

戈尔巴乔夫也指出：“自愿‘放弃权力’不仅是总书记和以政治局为代表的小范围领导集体事情，而且得到了苏共高层代表机构，先是代表会议、随后是代表大会的正式同意。”<sup>①</sup>博尔金指出，从近五十年来第一次召开的这次党代表会议起，党内生活开始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些变化震撼了国家，震撼了全世界。当时人们都明白，如果国内不恢复应有的秩序就会失去所有自己取得的成就，就会毁掉国家，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领导的意图。“他在考虑对策，但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无论中央政治局，还是后来的总统委员会和安全会议成员以及政府都不知道，就连他最亲密的战友也因不了解他的真正意图而陷入迷茫。他是否有一个消灭党、瓦解国家的战略计划？我认为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他有个摆脱不掉的念头，有一个最终目标，但如果不能消灭现存制度就达不到这个目标。他满怀激情而又小心谨慎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大多数人认为改革就是巩固国家，加强国家的实力和提高人们的福利，但是实践表明，总书记没能实现这一点。在他试图改变社会的同时，不由自主地消灭了国家制度。政权的腐烂的根基被拔掉了，可是这个政权像随风草一样，在这个巨大的国度里飘来飘去，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和铁腕人物的出现。”<sup>②</sup>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以 2123 的高票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开始有了在党之外的另一个权力支柱，虽然它现在还很虚弱。对此，法新社评论：“戈尔巴乔夫正在对一个难驾驭的党发动一场‘政变’，因他竟要绕过党员而转向更广大的人民群众。”<sup>③</sup>

最后，党代表会议预示了苏联改革的偏离。具有洞察力的法林是戈尔巴乔夫身边为数不多的读过阿伦特著作的人之一，他看出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不仅是党、也是整个苏联社会的“转折线”，是体制的更替。他在猜测中感到茫然：戈尔巴乔夫关于将政权权力中心从党转到苏维埃的建议，仅仅是回到早已有之的“十月革命模式”呢，还是为建立抄袭自法国或者美国的未来专制总统制扫清场地。<sup>④</sup>不过，马特洛克则敏锐地觉察到了苏共第十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13 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317 页。

<sup>③</sup> 法新社莫斯科 1988 年 7 月 5 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8 年 7 月 7 日。

<sup>④</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90 页。

九次代表会议将给苏联带来的巨大政治变化。他说：“我收到了从莫斯科发来的关于大会议题的俄文文本，并返回旅馆去翻阅，相信这不是什么机密文件，可以带出去，不受什么限制。我当时以为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令人意外的新东西，大致浏览一下，就足够简述时引用了。其内容很可能是罗列一些早已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讨论过的改革方案而已。可等我翻开一看才发现情况不是这样，新内容比比皆是，我兴奋不已。我从未在一份共产党官方文件中看到对诸如保护公民权利、权力分散、司法独立、在证明有罪之前先作无罪假设等原则给予如此广泛的重视。有些‘议题’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外，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些苏联惯用提法也不见了。从某种程度而言，‘议题’所谈论的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我对总统说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苏联将会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尽管这些‘议题’离我们的民主标准还欠缺一些，但却蕴藏着这个国家的自由的种子。如果言论、新闻、集会的自由得到了保障，如果多党选举和无记名投票得以进行，如果司法独立原则得到了合法的确立，那么我敢说共产党一党专政将会很快寿终正寝。”<sup>①</sup>

奥地利《信使报》在7月8日发表题为“不是盖新房，而是彻底翻修”的评论，对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作出了全面评价。评论指出：

莫斯科党代表会议将载入史册。因为至少在意向声明和决议之中，表示要对苏联进行列宁的革命之后大概最为彻底的改造。这虽然还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制度，但政治的静态平衡和制度的支柱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苏联共产主义大厦显然不仅做了一番外观美容修饰，而且力求（在保持建筑实体的情况下）从根本上进行翻修。

对于这次极其生动活泼的党代表会议的结果，可作如下总结：“公开性”的政策是这次大会的“主角”。尽管有种种限制，这一政策再次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和必要性。公开性使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而只有知

---

<sup>①</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37～138页。

道了问题才可能解决问题。这是列宁去世以来苏联不幸欠缺的。

这次共产党的会议无论在拥有约 2000 万党员的苏共,还是在整个苏联社会(这一点更为重要),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心。戈尔巴乔夫以其往往险象环生的改革消除了群众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为苏联开创了潜在的机会,在 21 世纪名副其实地成为大国。

在党内,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不仅证明自己是个天才的策略家,而且还引入了一个原则上的新因素。他允许派别斗争,这样他就取得了一个极重要的调整手段。他的政策因而真正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它是“左”“右”两种偏向合力组成的,因而起着真正融合一体的作用。这就意味着,他的政策是较易实现的,因为它确实是得到党内最广泛支持的中间路线。

戈尔巴乔夫今后要使党摆脱经济和社会的日常杂务,这意味着消除对它的过分要求,无论如何是要改善现状。

实行限制任期的主席制,意味着苏联从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实行的少数人专政(列宁),从斯大林残暴的国家恐怖主义、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家长式独裁统治向“君主”任期受时间限制的开明专制制度转变。

莫斯科会议在外交方面对东欧的强烈反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其影响的幅度可能从迅速更换老一代领导人直到迅速实现现代化。在世界政治方面,由于对自己近几十年来的对外政策作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批判,苏联赢得了信任。

这次党的会议对于苏联和世界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希望的信号,一个变化、运动和活力的信号。<sup>①</sup>

### (三)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1990 年 7 月 2—13 日,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在第二十八大召开前夕,关于党的走向问题已经成为苏联政治生活的重大

---

<sup>①</sup> [奥地利]《信使报》7 月 3 日评论“不是盖新房,而是彻底翻修”,转引自《参考消息》1988 年 7 月 5 日。

话题。<sup>①</sup> 共产党员们所讨论的大多数问题涉及苏共内部生活,甚至诸如党可能分裂这样的问题都引起参加讨论的人的各种反应。一部分人认为,分裂对苏共来说是一场灾难,需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另一部分人则强调,分裂有利于党,因为党的队伍将在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即使人数减少,但苏共获得的不是表面上的而是真正的团结。对有关民主集中制原则问题的讨论中,一部分人坚信,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会把党引向崩溃,而另一部分人相信,只有放弃这一原则,苏共才能转变成真正民主的党。这些分歧的意见最终决定着对政治纲领的评价。在党内各派提出的众多方案中,主要形成三个行动纲领:苏共中央纲领、民主纲领和马克思主义纲领。分别代表着党内的主流派(戈尔巴乔夫)、民主派(叶利钦)和保守派(利加乔夫)。6月22日公布的苏共中央在俄共代表大会的2200名代表中关于“三个纲领的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完全支持苏共中央纲领的占45%,部分支持的44%,不支持的2%;完全支持民主纲领的占5%,部分支持的48%,不支持的12%;完全支持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占3%,部分支持的44%,不支持的12%。三个纲领都支持的占21%。<sup>②</sup>

纲领的分裂表明:此时的苏联共产党已经走上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大会成为“党内的改革派和正统保守势力之间的一场搏斗”<sup>③</sup>。争论的焦点是为苏联共产党制订新的行动纲领。1990年6月17日在莫斯科闭幕的“苏共民主纲领派”运动支持者代表会议作出了总结性决议,并发表声明:必须“放弃共产主义作为苏共(改变党的名称)的目标,宣布党的目标是在自由、公正和团结原则基础上建立的民主社会。”代表大会决定,如果苏共代表大会不接受民主纲领派的建议,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就将开展建立新政党的工作。<sup>④</sup> 利加乔夫作为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中最明显的政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党不能再后退了”,党是“起先锋作用的党,不是一个政治俱乐部”。美联社记者波鲁布先斯基预测,正在“设法取出苏联共产党内脏”的戈尔巴

<sup>①</sup> 塔斯社莫斯科1990年6月16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6月19日。

<sup>②</sup> 新华社莫斯科1990年6月22日记者唐修哲报道,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6月24日。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

<sup>④</sup> 塔斯社莫斯科1990年6月17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6月19日。

乔夫将会受到严峻挑战。<sup>①</sup>

7月2日，戈尔巴乔夫作为党的总书记、苏共中央纲领派的代表，在大会上做了主题政治报告。<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在报告开头指出：“5年来我们在所有生活领域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这使我们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今天的问题是：要么苏联社会沿着已经开始的深刻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样，我坚信，我们伟大的多民族的国家就会迎来美好的未来；要么反改革势力占上风，让我们直言不讳地说，那时国家和人民就将面临黑暗时代。”在这里，戈尔巴乔夫重点强调改革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管理机构的官僚阶层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力量对变革的反抗……改革必然会触犯那些手中握有实权和以人民的名义拥有社会财富的人的利益。信守老一套和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改革进程融为一体，而且在政治上以及心理上都不接受改革进程的一部分领导干部，目前的立场我们是清楚的。……如果不克服这些工作人员的立场，……改革进程就会尖锐化”。这些“是顽固地抓住旧的东西不放，阻挠社会上正在发生的变革，而且试图在为人民的利益为意识形态原则的纯洁性而斗争的幌子下，坚持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的那些人”。

戈尔巴乔夫肯定了“公开性”、民主化以来取得的社会进步。他说：“自由人的公民社会正在取代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正在进行根本改造，包括自由选举、多党制、人权在内的真正的人民政权正在复兴。造成劳动者同所有制、同其劳动成果分享的生产关系正在解体，社会主义生产者自由竞赛的条件正在形成。把超集中制的国家改造成真正的以各族人民自决和自愿统一为基础的真正的联盟国家的工作已经开始。自由思考和公开性以及开放社会信息取代了意识形态专制的气氛。”“苏联人已不甘心过去俯首帖耳地忍受一切的情况。”对于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派别斗争，戈尔巴乔夫乐观其成，认为“各种各样的政治流派，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斗争。各种居民群体和阶层的利益都调动起来了，并发生了冲突”，这是“真正民主正在确立，真正的人民政权正在复兴”。

① 美联社莫斯科1990年6月30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7月2日。

② [苏]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的政治报告和党的任务”，《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5期。

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运动的目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主导思想——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使社会深刻民主化和人道化，使其成为自由的社会，为人应该过的生活创造条件。”为此，“制定了进行根本经济改革、根本改造政治体制和联邦以及建立法制国家的思想制定了新的政治思维的基础，其核心是全人类价值占优先地位”，“这实质上是要求修改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这“是一场新的革命，是伟大十月革命奠基的事业的合乎逻辑的继续”。党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新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机构。戈尔巴乔夫认为，“几十年来苏共只是为官僚专制体制服务”，这导致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全面扭曲。“更新了的苏共……是以社会主义为选择和以共产主义为前景的党，是在自己的政策中体现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利益的志同道合者的志愿联盟”，“是忠于全人类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摆脱意识形态狭隘性和教条主义……同不同国家和不同方向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人，同现代政治和哲学思想的许多其他派别的代表进行接触和协作的党”。“苏共将在民主过程范围内和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选举范围内执行自己的政策，并为保持执政党地位而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起着议会党作用。”

作为“主流派”的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遭到代表们的严厉批评。当他宣布大会开幕时，来自马加丹州党组织的代表弗拉基米尔·布卢多夫马上建议以政治局为首的全体苏共中央委员辞职并不把他们选入代表大会领导机关，因为“他们在开展实施食品纲要，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及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方面的工作中遭到失败”。<sup>①</sup>

作为“保守派”代表的利加乔夫在会上警告代表们：“国内某些力量正在进行反社会主义制度、反共产党的斗争。这些力量的能量很大，对某些新闻机构有着强大影响。”他的这番话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他还说：“我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党的作用持有公开而不妥协的立场。没有党，改革就没有希望。”<sup>②</sup>会后，利加乔夫在总结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时指出：“苏共二十八大上没有总结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且苏共的党章中

<sup>①</sup> 塔斯社莫斯科1990年7月2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7月4日。

<sup>②</sup> 法新社莫斯科1990年7月3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7月5日。

删除了苏共是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组成部分的内容,这在苏联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在党还处在地下时,党也没有隐瞒过自己的纲领目标。”<sup>①</sup>也正是因为利加乔夫旗帜鲜明地支持苏联共产党继续领导改革,他遭到了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大多数代表们的反对。在竞争苏共中央副书记失败后,利加乔夫被迫退出政治舞台。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对此作了分析。他说:“尽管会上不少人为他(利加乔夫)鼓掌,表示赞成他的观点,但最后他仅取得了700多票。绝大多数代表已经理解到,若利加乔夫当选,那就意味着党的分裂。”因为“他不仅不能与戈尔巴乔夫亲密合作,而且必将引起民主派和倾向于民主派观点的人的强烈反抗。”<sup>②</sup>

作为“民主派”代表人物的叶利钦着重批评了党的机关,认为希望在于实行多党制,在于让苏共党员有可能决定自己的政治选择。“他建议改变苏共名称,使它脱离一切国家职能。”<sup>③</sup>同时,叶利钦发表声明:鉴于他已当选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需要对各族人民负责,服从人民及其全权代表的意志,社会正向多党制过渡,不能执行苏共的决议,因而宣布退出苏共。紧接着,民主派的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也宣布退党。博尔金指出:“抗议性的退党给许多代表和共产党员留下了印象,对造成党的信任危机以及后来党的瓦解起了不小的作用。”<sup>④</sup>

塔斯社观察家奥尔洛夫在评论苏共二十八大的结果时说:“中间派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右派所遭到的毁灭性失败,不仅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战术技巧及其盟友梅德维杰夫、雅科夫列夫的英勇,而且也因为保守派不善于推举强有力的有声望的领导者,和提出即使不使全体党员也能使他们本人对之信服的建设性的可供选择的政策。”戈尔巴乔夫拒绝了许多人提出的“向左”再迈一步的呼吁,而是把“重心”向“左”移动了一点,这样就保持了苏联共产党统一的基础。再者,“苏共放弃与社会民主派作斗争,承认它对

<sup>①</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18~119页。

<sup>②</sup> 新华社莫斯科1990年7月17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7月19日。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41页。

<sup>④</sup> 同上,第342页。

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这会为苏共与社会民主派的接近创造现实的基础”。<sup>①</sup>

1990年7月13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通过了《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副总书记由代表大会的代表直接选举产生的决议。戈尔巴乔夫以3411票赞成、1116票反对的优势再次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名的伊瓦什科当选为苏共中央副总书记。同时,大会以3548票赞成、570票反对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关于成立新的政治局的建议。

1990年7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选举了新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政治局成员从过去19名正式的和无表决权的非正式委员扩大到现在的24名正式委员,其中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的党的首脑。新的政治局中没有无表决权的委员。总理、外长和国防部长不再是政治局委员,而成了总统委员会成员。原来的政治局委员中,伊格尔·利加乔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都离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以后改任比较寒酸的苏联总统高级顾问,从前在乌克兰工作的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被选为苏共中央副总书记。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奥列格·舍宁,以及从前担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奥列格·巴克拉诺夫被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奥列格·巴克拉诺夫在苏共中央主管国防工业系统。苏共中央的意识形态工作由苏共中央新书记亚历山大·扎索霍夫负责。戈尔巴乔夫免去了瓦季姆·巴卡京的苏联内务部长职务,但为他保留了总统委员会成员职务。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鲍里斯·普戈被任命为新的苏联内务部长。<sup>②</sup>这次政治局的改革调整,“标志着戈尔巴乔夫在将权力由党向政府转变方面取得的一个胜利”<sup>③</sup>。路透社对此分析道:“这个从前的最高执行机构似乎将充当戈尔巴乔夫的新的总统委员会的副手。政治局这个党的最高机构完全打破了过去传统做法,把权力让给了总统委员会,这就加强

<sup>①</sup> 塔斯社莫斯科1990年7月13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7月15日。

<sup>②</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页。

<sup>③</sup> 美联社莫斯科1990年7月13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7月15日。

了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改革的势力。几十年来，政治局一直是由政府的高级人士组成的。但是新的政治局中只有两名是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其中有一些人相对来说不大有名……根据过去两年实行的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逐渐把行政权力从党转移到他有效地控制着的政府。”<sup>①</sup>博尔金也指出：“选进来的都是带有另外的优点和缺点的‘新人’。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都进入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也改变了，实际上百分之八十的中央委员都是新人……这已不是一个‘坚如磐石’的中央全会了，而是从前的大党内部各种派别的代表的集合体，这一点很快就在毫不妥协的争论和尖锐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来了。”<sup>②</sup>

那么，如何评价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呢？

戈尔巴乔夫认为：“党在经历了将近 90 个年头之后，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并未放弃自己历史遗产中正面的东西，但谴责了极权主义，还宣誓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这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决裂，也是苏共改革大业中意义重大的第一步。”<sup>③</sup>在闭幕式上，戈尔巴乔夫强调说，苏共二八大是在“革新党方面迈出的重要步骤”。那种原来指望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为苏共“举行葬礼的人，又一次失算了”。他表示：“苏共现在存在并会一直存在下去，将为我国的进步，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自己的历史性贡献。”在谈到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方针时，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基本方针就是党“有决心克服尚存的党组织脱离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现象，同国家劳动集体建立生动活泼的日常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先锋作用，为达到革命性改革的目的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谈到党内生活问题时，戈尔巴乔夫说，代表大会坦诚地揭示了错误，并对过去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犯下的罪行坚决予以谴责，他同时也断然驳斥了“试图抹杀几代共产党人为国家做出的所有好事的做法”，那些“要求党忏悔，算账，几乎要宣布党为犯罪组织的人，不过是企图将党从政治生活中抹掉，并以此来打击社会的革命性革新的整个事业”。<sup>④</sup>

<sup>①</sup> 路透社莫斯科 1990 年 7 月 14 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 年 7 月 16 日。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345 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31 页。

<sup>④</sup> 美联社莫斯科 1990 年 7 月 13 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 年 7 月 15 日。

## 五、党的反抗：反对戈尔巴乔夫

随着戈尔巴乔夫将改革的矛头直接指向苏联共产党的时候，来自党内的反对力量开始与日俱增。在 1987 年年末至 1988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给予了苏联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形象上以沉重打击。戈尔巴乔夫一连串的政治举动迫使党内力量开始与之进行斗争。切尔尼雅耶夫指出，这是从十月革命 70 周年报告开始的。然后是 1988 年 2 月的中央全会，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党要放弃自己的国家垄断地位的问题。随后就是尼娜·安德列耶娃文章事件和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sup>①</sup> 随后的历次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都受到来自党内的批评。在苏联共产党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直接受到要求辞职下台的政治诉求。然而为什么苏共没有采取行动制止戈尔巴乔夫——党的总书记——的行为呢？原因很多，但却并不复杂——苏联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党心民心。苏共中央书记、苏共监察委员会主席鲍里斯·普戈指出，从 1990 年 1 月以后，已有 37 万名党员自动退党，15 万名党员被开除出党。退党狂潮使党在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丧失了与戈尔巴乔夫作最后斗争的政治勇气。“每个人都感到制定的决议没有生命力，因为没人去执行这些决议，没人去为实现它们而斗争，也没人要求实现它们。”<sup>②</sup>

### (一) 尼娜的信：《我不能放弃原则》

1988 年 3 月 13 日，《苏维埃俄罗斯报》登载了列宁格勒工艺学院讲师尼娜·安德列耶娃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sup>③</sup> 文章指出：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227 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342 页。

<sup>③</sup> 《安德列耶娃谈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510 ~ 511 页。

大概不只是我一个人注意到，党的领导人号召把“揭露者”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各阶段实际成就上来，似乎像命令一样，爆出来了一批又一批新的“揭露者”。

就拿约·维·斯大林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作为例子。据我的意见，正是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所有批评性攻击的狂症，与其说是关系到历史人物本人，倒不如说关系到所有最复杂的过渡时代。在这个与整个一代苏联人的史无前例功绩相联系的时代里，今天这些人逐步放弃积极的活动，强行把工业化、集体化、文化革命这些把我们国家引向世界伟大强国的概念塞入“个人崇拜”的公式。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怀疑。事情已经发展到坚决要求“斯大林分子”（随心所欲地把人列入其中）进行“忏悔”的程度。

我支持党的号召，捍卫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光荣和尊严。我想，我们应该从这些党的、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评价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历史作用。

“左派自由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们形成了一种伪造社会主义历史的倾向。他们闭口不谈国家过去和现在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却向我们暗示，在过去的年代里，国家做的都是错事和罪过。他们在追求历史真理完备的同时，用伦理学范畴那种不切实际的理论偷换社会发展的社会政治标准。

“左派自由主义者”观念的另一个特点——公开的或隐蔽的世界主义倾向，某种没有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

培养青年人工作的复杂性加大，还在于“新左派自由主义者”和“新斯拉夫主义者”思想范畴中出现了非正式的团体和联盟。他们的领导层让善于挑拨离间的极端分子占了上风。最近，这些自发形成的组织在这不是社会主义多元化的基础上呈现政治色彩。这些组织的领袖们经常谈论在“议会制度”“自由工会”“自治出版”等基础上的“权力分配”。以我之见，所有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的这些讨论的主要和最最基本的问题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党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领导作用。毫无疑问，由此可以对政治、

经济和思想得出全部理论和实践结论。

正如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同时，首先应该在精神方面采取行动。同志们，我们不应该用任何借口放弃这些原则。”

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捍卫原则。原则不是来自别人的恩赐，而是在祖国历史急剧转变时刻，由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

文章一经刊发，再度引起对有关历史的争论，立即引起政治上的轩然大波。“文章的作者和编者在竭力‘捍卫社会主义理想’的同时，触犯了改革思想家们的绝对权利，而有关过去的争论适逢政治局内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之间的竞争加剧，而后者又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尼娜·安德列耶娃文章的后台。”<sup>①</sup>

作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立即意识到，这是对“公开性”的公然挑衅，是党内权势分子的公然反抗。他说：“党内反对改革的一派，受到了十月全会的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叶利钦被解除职务的鼓舞，对改革发起新的攻击。这是指机关权势分子随着1988年3月11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而企图东山再起。”<sup>②</sup>据利加乔夫回忆，当时雅科夫列夫拿出权威领导人的架势，用极其尖刻的语言攻击尼娜·安德列耶娃的信和《苏维埃俄罗斯报》。这不过是故技重演：“反改革势力的宣言”“反对改革”“阻力”，总之，这一整套大帽子后来都被激进派报刊所使用。在这种不正常的、压抑的气氛中，雅科夫列夫觉得自己是形势的主人，梅德维杰夫附和着他。他们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整个政治局。他们认为：安德列耶娃的文章不是一次普通发言，而是斯大林主义的复活，是对改革的主要威胁。“他们完全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文章是发表在‘争论’栏目上的。要知道，他们不是多少次倡导多元化与争鸣吗？”<sup>③</sup>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56页。

<sup>②</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

<sup>③</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对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说，安德列耶娃的信无疑是对他的改革声望的一个巨大威胁。格拉乔夫指出，1988年3月13日，也就是总书记启程出访之日。“正统的反对派这篇胆大的抨击就其政治意义而言，大致介乎1952年挑起‘医生案件’的反犹诉讼案的季玛舒克告密材料<sup>①</sup>以及1991年7月也是刊载于《苏维埃俄罗斯报》的《告人民书》之间。《告人民书》中提出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纲领。”<sup>②</sup>戈尔巴乔夫震怒了。他认为这是党内反改革力量对他的公开反扑。他对斯拉文说：“我从南斯拉夫回国后得知，这封信在政治局有独特的诠释……最后把这封信评价为反改革的宣言。实际上，背后的指使人企图利用人们对现实问题担忧，放弃开始的事业，搞复辟。总的来说，这是有预谋的举动……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他插手了这件事。如果不是他，那就是他的助手。我认为，这与筹备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有关。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带着什么样的纲领举行这次代表会议。我在二月全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的行动纲领。这不符合

① 1952年年底，克里姆林宫收到一封署名为莉季亚·季玛舒克的告密信。告密信直指那些在克里姆林宫中工作的医生，这个自称莉季亚的女人说，以斯大林的内科医生维诺格拉多夫为首的一些医务工作者，一直利用职能之便，不动声色地陷害政府要人。斯大林看罢怒不可遏，当即将主席团的成员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告密信，不管是否署名，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苏联都不是新鲜物件，它可以是无中生有，可以是造谣诬蔑。斯大林用激动的语调读完这封信，在场的官员一个个缄默不语，他们不知道告密信所说是否属实，但他们本能地察觉到，一场关于医生的“大清洗”即将展开，当然，清洗的对象不只是医生。与会的主席团成员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不会被这场“大清洗”牵扯进去，在斯大林时代的克里姆林宫，地位越高，人越危险。在疑心重的斯大林那里，凡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斯大林知道自己的老同事、老伙伴中不乏觊觎国家大权的，认为这些人大有可能买通克里姆林宫的医生，谋害他堂堂国家总书记的性命。维诺格拉多夫医生很快被逮捕入狱，一些在克里姆林宫名望甚高的医学教授也未能幸免。斯大林亲自参与了对医生们的审讯，这些医生万万想不到，这个自己曾尽心尽力照顾、救治过的人，竟会摆出凶神恶煞般的面孔。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医生们被铐上了手铐，遭受酷刑拷问。没多久，医生们就都像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一一“招供”。1953年1月3日，这起“医生案件”的审讯结果在苏联的各大报纸上披露。若干和克里姆林宫打过交道的医学教授都被看作美国人派入苏联的特务，被认为奉西方国家的命，来谋害苏联领导人的性命。那因心脏病突发而英年早逝的政治家、斯大林的女婿日丹诺夫，以及死于酒精中毒的、经常到孔策沃别墅参加晚餐会的谢尔巴科夫，都被说成是被维诺格拉多夫等人害死的。《真理报》信誓旦旦地称，这些用心险恶的医生大多是犹太人，通过一个国际性的犹太人组织和美国方面联系，并称若不是被揭发得早，这些黑心医生还会对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等军事将领下手，旨在破坏苏联的国防建设。至于写揭发信的莉季亚·季玛舒克则被当成苏联英雄，受到铺天盖地的赞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1953年1月21日，奖励给她一枚列宁勋章。

②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

保守的反改革势力的口味。于是他们决定掌握主动权。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这是否定我在全会上发言的全部提纲和全会的决定。”<sup>①</sup>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也指出,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以及改革家们都认定这篇文章是以运动的形式进行的公开反扑,目的是要葬送1987年开始的政治改革事业。戈尔巴乔夫1993年公开发表的有关这两天会议的纪要表明,当时戈尔巴乔夫以“这篇文章应该被看成是反对改革的讲坛”这样的评语开始了讨论会,他说他怀疑没有人指点,尼娜·安德列耶娃是写不出这篇东西的。“令他担忧的不是这篇东西的出现,而是它曾被党的官员看作是具有权威性的文章而加以推荐。”<sup>②</sup>于是,戈尔巴乔夫下令追查文章发表的经过。

1988年3月24日和25日两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追究这篇闹得满城风雨的文章的发表经过。这次会议的积极参加者维·伊·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打开了话题,说这篇文章非同寻常。它带有破坏性,旨在反对改革。不清楚它是怎么出现在报纸上的。中央有没有人看过?戈尔巴乔夫强调说:据我得到的消息,有人看过,据说在发表之后甚至建议在党组织内讨论这篇文章。这是什么意思?!”戈尔巴乔夫认为,这篇文章是“反改革纲领”,它发表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前,所以更具有危险性。<sup>③</sup>被迫在会上忏悔的利加乔夫后来在回忆录中揭露了会上的“执行判决式作风”,它与斯大林时代意识形态方面的“迫害异端”有异曲同工之妙。每个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都必须表明自己对于“反改革势力宣言”的态度。亚佐夫元帅在会上代表军队指挥人员表示愤慨:完全被宠坏了的媒体不去提出爱国主义的话题,“却喋喋不休地大谈维索茨基,他都有些什么作为呢?”尽管令人不堪忍受的马拉松式会议的结果,是总书记求之不得的团结一致,团结一致为筹备党代表会议扫清了道路,却再也没有人对这种勉强凑出的团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36~37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sup>③</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90页。

结产生误解。<sup>①</sup>

为执行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定,1988年4月5日的《真理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编辑部文章,题为“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实际上是由雅科夫列夫写的)。文章严厉批判《苏维埃俄罗斯报》3月13日发表的《我不能放弃原则》。文章指责该信的思想观点背离了苏共二十七大的方针路线。文章的作者断然拒绝以迫不得已和极端异常的条件为借口为过去开脱,“为政治畸形和社会主义的罪过开脱”。文章写道:“为斯大林辩护,就是企图在我们的生活和实践中保留他的那一套方法……保留他建立的社会和国家机构……而最重要的是维护无法无天的权力。”“企图恢复斯大林主义”,是“反对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随后,《莫斯科新闻》《苏维埃文化报》等许多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材料,支持《真理报》,支持改革,反对所谓的“保守势力”。4月15日,《苏维埃俄罗斯报》被迫在头版为发表该文表示道歉。说发表该文是缺乏“责任心和慎重态度”,表示今后将努力宣传改革思想。

对文章的批判在事实上带来了四个方面的政治后果:

首先,社会思想领域斗争逐渐表面化。1987年的十月革命70周年庆祝活动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思想斗争,而且是重大的斗争。戈尔巴乔夫指出,许多人都浮于表面,不认真研究和分析历史。一些人抓住个别历史事件不放,而在我们多灾多难的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事件又层出不穷。实际上往往是泼水时把孩子也泼出去了。另一些人则对历史采取恶意中伤的态度,尽管他们也对苏联历史的某个时期进行了分析,但没有任何客观性可言。思想斗争日益激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在1988年2月召开的教育改革问题的中央全会上,考虑到社会上人们的热情已经达到炽热的程度,戈尔巴乔夫认为应该在会上就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发表讲话。于是,戈尔巴乔夫先谈了“社会主义哭灵人”的问题。“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指出我们往往把那些信奉教条的人称为共产党人,而把自由、民主的拥护者称为市场派。这是一个转折。从这里开始了潜在的、后来越来越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87页。

激烈的斗争,斗争逐渐表面化,引出了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的《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写信》。”<sup>①</sup>

其次,使政治局内部矛盾开始“公开化”。政治局内部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的改革分歧与斗争。这种矛盾其实源于党的深层。切尔尼亚耶夫回忆,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是这样描述的:“与中央相比,在党的各级梯队中改革进程发展得有气无力。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有些人认为改革是要夺取权力,是要侵犯他们已经习惯了的、存在了几十年的秩序……在最初阶段强调点放在了批评上。劳动者表示支持这种强调点。干部的反应却迟缓。因此其结果是好像他们过去在一切方面都错了。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人民十分拥护改革,而改革却在中层领导环节上卡住了……这倒是真的:除了公开性和批评精神的发扬外,须知还没有产生实际成果。甚至民主化(选举、苏维埃的活动),更不用说经济改革,还没有真正地开展。我们还没有取得感觉得到的成果。”在对改革本质的理解上产生了危机,它使政治局本身濒于分裂的境地,这是由登载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一篇署名为尼娜·安德列耶娃(她并没有否定)的有争议的知名文章所引起的。<sup>②</sup>

再次,为公开的反共思想打开了闸门。对尼娜·安德列耶娃《我不能放弃原则》文章的批判产生了另一种后果,它比政治局干涉这场历史性争论所造成的结果更为严重。造成的后果就是:在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目中,批判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文章,大概是在批判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全部历史的道路上迈出的最后一步。当然,这不是“改革”的领袖们有意识迈出的一步。所有这些争论都是在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民族关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发生的,历史问题的政论作品以寻找“社会主义的理想人物”开始,最后导致否定在苏联条件下作为正面理想的社会主义。这就为公开的反共思想打开了方便之门。“想限制这一过程的努力实际上并不奏效,反而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31~232页。

变成了恼怒的抱怨，而且是不再让人生畏的抱怨。”<sup>①</sup>

最后，为党的代表会议作了政治准备。围绕尼娜·安德列耶娃文章的论战，也许是营造举行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社会政治氛围的主要大事。戈尔巴乔夫写道：“事与愿违，尼娜·安德列耶娃在客观上给我们帮了忙。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为她设立一个……‘阐明立场贡献’奖。”戈尔巴乔夫开的玩笑是有充分根据的：党的领导层中保守势力的地位被削弱了。这为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通过极其重要的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sup>②</sup>由苏共中央政治局以及随后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确认的定论式的公开评价，“一时使公开支持安德列耶娃的人失去了继续争论的可能性，暂时中断了证明过去正确的尝试，彻底结束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战”。<sup>③</sup>

## (二) 苏共纲领派的形成与政治主张

自 1987 年起，随着经济、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苏联人民已经从粮食制品越来越少、糖和肉类等食品日益紧缺的状况中感觉到了这一点。许多日用品经常脱销，国内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很多人开始怀疑改革的合理性，怀疑领导者使国家摆脱危机的能力。还有很多人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认为共产党到底把国家引上了绝路。在各级党组织和党委内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间，出现了与总书记观点不一致的现象，甚至出现了深刻的分歧。”<sup>④</sup>截至 1987 年 11 月底，戈尔巴乔夫在党内虽然遭受批评，但是改革却让苏联人感到兴奋，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基础仍然很牢靠，党内的反抗力量还在蛰伏。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进行的关于生活方式问题的广泛民意测验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民意测验是在苏联 28 个地区进行的，被调查的大约有 1 万人。在回答“您能不能说您是乐观地看待未来，相信未来”的问题时，有 72% 被调查者的回答是肯定的，10% 的人作了否定的答复，18% 的人表示难

<sup>①③</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556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591 页。

<sup>④</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178 页。

以回答。苏联科学院对民意测验的分析表明，在不相信未来的人中间，多半是身体状况不好的人、改革和净化社会生活的进程触及了其利益的人以及被调查时正在闹家庭矛盾的人。在对提出的问题表示难以回答的人中间，有不少是还没有确定自己生活道路的年轻人和那些有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心理的人。<sup>①</sup>

不过，这一乐观情况随着 1988 年的到来却戛然而止。1988 年 3 月 13 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的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来信《我不能放弃原则》使政治局内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的矛盾开始公开化。而其焦点则是对改革的性质和走向的分歧。博尔金指出，戈尔巴乔夫思想在这一刻发生了转变。他说：“我反复阅读戈尔巴乔夫的报告、讲话、文章中关于对马列主义理论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的章节，以及关于我们的社会成就、我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论述，于是我发现了他的观点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他 1988 年以前的著作明确主张国家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这一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者、普通党员以及许多关心政治问题的公民也都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生活和工作了，可是，如果将几十年的成就统统抛掉也是巨大的损失，因为许多国家的劳动者所珍视的正是我们所取得的社会成就，许多国家也都尽量采用我们的正面经验。共产党员，实际上全体苏联人，都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话反映的是他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则立场，所以他们在国内的社会形态开始变换之前一直是支持改革的。”<sup>②</sup>

在讨论尼娜·安德列耶娃来信的政治局会议上，利加乔夫虽然遭到戈尔巴乔夫的严厉批评，被迫在会议上做了有损威信的检讨。但是利加乔夫的立场和观点在政治局内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切布里科夫就对利加乔夫的遭遇施以援手。在 1988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切布里科夫为利加乔夫进行了辩护。而利加乔夫在他的支持下也否认对他提出的企图破坏戈尔巴乔夫政策的指责。政治局里的争论，让外界以为利加乔夫很快就会被拉下马来。《纽约时报》报道说：“政治局的决定似

<sup>①</sup> 塔斯社莫斯科 1987 年 11 月 26 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 年 11 月 30 日。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127 页。

乎是要在苏共于 6 月底召开关键性的会议之前的几周内把利加乔夫赶下台。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控制与会代表的人选(据认为更可能在把利加乔夫赶下台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那么,他就能得到代表们对他的计划的大力支持,而这种支持对他来说是十分必要的。”<sup>①</sup>

但是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苏共纲领派(也被称为“保守派”)还是形成了。为落实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在 1988 年 9 月 30 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实现了他对党的大改组——成立 6 个委员会,并任命利加乔夫为其中的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借以缓解党内压力。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认为,这其实是戈尔巴乔夫的一个策略。社论指出:“明显的一点是,被戈尔巴乔夫任命的改革派正在党内取得优势。但是过分地急于获得成功,撤掉‘左右’的反对派,实行一种独裁,这决不会是令人满意的事情。保留像利加乔夫那样的反对派,谋求稳步前进,这也许是上策。”<sup>②</sup>

不过,随着 1989 年苏联人民代表选举运动的开始,苏共纲领派的主张越来越强硬。

一方面,此时的苏联社会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政策的态度也在悄然变化。美国《时代》周刊在苏联就改革等问题对 1000 多名莫斯科居民的民意测验表明:“关于苏联改革进程”,认为毫无问题地发展的占 2%,认为经历着某些困难的占 15%,认为经历着严重困难的占 56%,认为改革受阻停滞不前的占 20%。认为改革越发展,反对者就越少的占 63%,不这样认为的占 18%,认为难以表态的占 19%。“关于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完全支持者占 45%,部分支持者占 34%,在某些事情上不支持者占 11%,根本不支持者占 1%。“关于未来生活的变化”,认为将会改善者占 2%,认为不会发生变化者占 17%,认为将会变得更困难者占 32%。<sup>③</sup> 社会的情绪开始变得对戈尔巴乔夫不利了。

另一方面,苏共党内的情况也日益恶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党员的数量减少。苏共二十七大后,在三年的时间里,苏共党员人数增加了

① [美]《纽约时报》1988 年 4 月 22 日报道,转引自《参考消息》1988 年 4 月 25 日。

② [日]《朝日新闻》1988 年 10 月 2 日社论,转引自《参考消息》1988 年 10 月 4 日。

③ [美]《时代》周刊 1989 年第 15 期的民意测验,转引自《参考消息》1989 年 4 月 17 日。

48.3 万人，平均每年增长 0.8%。而在苏共二十七大前，平均每年增长 1.7%。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发展。二是工人在新党员中的比例下降。工人党员占新吸收入党的预备党员的人数，由苏共二十七大前的 59.4% 下降到了苏共二十七大后的 56.4%。三是退党人数有所增加。1987 年前 9 个月退党人数为 11714 人，1988 年 1 至 9 月为 26016 人。1988 年总共开除和退党人数 20591 人。<sup>①</sup> 而戈尔巴乔夫强迫中央委员们辞职的做法更是激起众怒。在 198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面对选举的失利和中央委员会们的大规模辞职<sup>②</sup>，“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头一回遭到了粗暴的斥责，许多人竟敢攻击并粗鲁地责骂总书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情景，不久以前甚至是不可想像的”<sup>③</sup>。在全会之前，莫斯科到处传闻“要撤换戈尔巴乔夫”。马特洛克也分析了当时的苏共党内情况，他说：“当共产党内部的争论愈演愈烈时，好几个政治观察家告诉我，党内的保守派，包括利加乔夫，都确信戈尔巴乔夫已经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已蜕变成了一个西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党内的保守派人士看来，戈尔巴乔夫反对阶级斗争就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政权所依赖的主要意识形态信条。从东欧的退出证明他背叛了用自己的生命去打败纳粹德国的那些人，削弱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使他的整个国家正面临着陷入混乱的危险。显然，他甚至不愿意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因为他反对使用武力镇压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以及别处的分裂活动。”<sup>④</sup>

1989 年 7 月 18 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召开的各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革的党的工作是当今极其重要的关键任务”的报告。戈尔巴乔夫指出，国家“正处于改革的紧要关头”，“党的改革大大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进程”，造成党的领导作用“可能削弱的实际威胁”。但这

<sup>①</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 年，第 153 页。

<sup>②</sup> 1989 年 4 月 25 日，塔斯社全文播发了 110 名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致苏共中央、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呼吁书，请求辞去在中央工作的职务。苏共中央举行全会批准了他们的集体辞职的请求。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343 页。

<sup>④</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357 页。

不是党的危机，而是“党的原来职能的危机、陈旧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危机”。戈尔巴乔夫认为绝大多数非正式组织“主张深化改革，主张进一步民主化”，“它们的积极目的与改革的客观目的相符”。利加乔夫不同意戈尔巴乔夫的说法。他要求党加强对新闻界和政治领域的控制。利加乔夫警告说，“拥有自己的出版物、持反对派立场的反对改革的政治组织”日益壮大起来。如果让新闻界脱离党的领导，“新闻媒介就会变成为某些势力进行专制的工具”。但是利加乔夫的主张遭到梅德韦杰夫和哈萨克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纳扎尔巴耶夫的反对。

进入 1990 年以后，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越来越多。1990 年 3 月 14 日，苏联第三届（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该法对 1977 年宪法第六条作了修改后，苏联共产党的法定执政地位被取消了。于是，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人担心，权力正每日每时从党的机构转移到国家的和苏维埃的机构，至于苏共原先的政治影响那就不用说了。苏联宪法第六条修改之后，党对社会的领导作用事实上还保留很长一段时间，按照所谓惯性，还在管事儿。但永远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苏共党内成立了纲领相当强硬的反对派，出现了几十个其他政党和组织，他们一心要“控制”共产党人，将居民中这样或那样的阶层和群体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些党的官僚们不是由此得出应有的结论，好好学习开展争取群众的斗争，取得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习惯于认为自己的权力几乎是上天所赐，一切事情都责怪中央和政治局，当然，首先是指责总书记”<sup>①</sup>。

1990 年 4 月 2 日，列宁格勒召开了“团结起来——为了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全联盟社会代表会议，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这是小有名气的尼娜·安德列耶娃的产物。4 月初，基辅市委，接着是列宁格勒州委，再往下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召开非常中央全会，听取中央领导人汇报情况。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是党的高层人士竭力将自己的反抗行为控制在下面的产物。这些涌现出来的团体“宣称自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344~345 页。

己的目的是要与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sup>①</sup>

1990年4月11日,正当全国共产党组织准备开始选举竞选党代会代表时,《真理报》发表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实际上要求“民主政纲”的发起人脱离共产党。这封公开信谴责“民主政纲”的发起人试图“把我们的党变成由完全自由的宗派和集团组成的不成样子的社团”。<sup>②</sup>

1990年4月14—15日,苏共马克思主义俱乐部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纲领派”。“根据预先准备的文件和开始的讨论判断,这一运动联合的是主张回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认为,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而私有制没有前途”,它主张“消灭作为战时共产主义党的苏共现行模式”,但不主张消灭共产党本身。<sup>③</sup>

1990年4月19日,最高苏维埃向苏共领导发了一份《苏联最高苏维埃所收信函简评》。这份材料称:“……寄信人——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知识分子代表、工人、村镇居民、战争老兵和老职工,都强烈谴责利用意见多元论来败坏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原则、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声誉。……为什么对社会主义的攻击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呢?为什么党沉默不语?……”<sup>④</sup>

1990年5月5日,《军人对苏联总统的呼吁书》猛烈批评戈尔巴乔夫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政策。“对于苏联政治传统而言,官方报刊刊登公开批评一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资料实为史无前例之举。”<sup>⑤</sup>

1990年6月16—17日,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讨论苏共二八大以前党内形势和该派在当前形势下的对策。会议作出决定:要在劳动者的群众性民主组织中积极扩大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的影响,并在这一活动范围内争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力量的民主联盟在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45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420页。

<sup>③</sup> 塔斯社莫斯科1990年4月14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4月17日。

<sup>④</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46~647页。

<sup>⑤</sup> 同上,第647页。

国内取得胜利,恢复人民对作为共产主义的、民主的和反映大多数组织的根本利益的苏共的信任”。<sup>①</sup>

1990年6月19—23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俄罗斯共产党成立大会的开幕是向苏共改良派的立场发起进攻的开始。发言的代表们无一例外谴责苏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是谴责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背叛党的利益;谴责他们姑息纵容,从而“使党受到犯下一切罪过的指责,将历史上的所有污点、面目不清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贪赃受贿的责任全部推给现在的共产党员。在总书记周围最亲近的一切人有针对性的协助下,我们逐渐陷入一种新的个人崇拜,哪怕这种个人崇拜具有民主的形式,我们对它还不习惯”<sup>②</sup>。

1990年7月8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并通过了新建立的俄罗斯共产党书记库普佐夫的简要报告。该报告的名称为“如何看待各种政治组织和运动所发挥的主动精神及其实施的行动”。报告的实质是:确信各反对派势力正在准备于最近几个月夺取全国政权。据他所言,这些势力在各采煤区组织罢工,力求将苏共排除于政治生涯之外。库普佐夫写道:“反对派的这些步骤同世界舞台上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越来越经常地表白‘不可能’同苏共结盟的思想,表达出相当一部分反对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报告的作者认为,反对派的领袖们打算于1990年秋季召开民主力量成立代表大会,而后努力达到提前解散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修改苏联宪法。<sup>③</sup>

1990年8月10日,苏联总统办公室领导人博尔金向戈尔巴乔夫呈报了一份《近期劳动者来信简评》。大部分来信请求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整顿秩序,恢复过去“改革之前的”有价值东西。“编写简评是影响党的上层人物的一种手段,另一面也是为了向国家的领导人提交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东西。可以看出,这份简评的构想旨在反对可能实行的经济改革,反对戈尔

①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325页。

②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51页。

③ 同上,第657页。

巴乔夫和叶利钦相互接近。”<sup>①</sup>

1990年12月30日,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中央第一书记和各共和国、边区与州的党委第一书记的会议上,与会代表的发言中都有一种委屈的情绪,对领导的方针不怎么理解。在31日的全体会议上,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在《论当前时机与党和任务》的报告中在遣词造句上可就无所顾忌了。“只是作为党的工作者身上的生物基因,可以说,才使他在总书记面前保持几分敬意,没有对我讲粗话。但是在下一次四月全会上,这个界限已经被打破了,事情发展到已经要求更换领导人了。”<sup>②</sup>

1991年1月31日,俄罗斯共产党举行中央全会。这是又一次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中央全会。实际决定党的主张的那些人的意见体现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伊万·波洛兹科夫的发言中。他说:“现在可以看清楚,改革是一种倒退。”<sup>③</sup>

1991年3月20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会议由苏共中央书记舍宁主持。他说,从3月23日开始,俄罗斯的局势将更加紧张。对俄罗斯联邦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重新提出了几项任务:要求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作出解释,由苏联总检察长对俄罗斯政府的行为提出质问,保护共产党员代表免受“民主俄罗斯”支持者可能实施的违法行为的侵害。形势继续紧张。“这样的氛围为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奠定了法律基础,并在必要时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sup>④</sup>

1991年3月25日,苏联内阁通过了《关于莫斯科市暂时停止举行群众集会、上街游行和示威的决议》。决定从1991年3月26日至4月15日禁止在莫斯科举行群众集会、设纠察线、街头游行示威。

1991年3月26日,通过苏联总统《关于建立苏联内务部莫斯科市和莫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58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45页。

<sup>③</sup> 美联社莫斯科1991年2月2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1年2月4日。

<sup>④</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96页。

斯科州总局》的总统令。莫斯科民警机关脱离市和俄罗斯的管辖,直接归属苏联内务部,从而排除了莫斯科民警机关被用于反对俄罗斯当局的可能性。<sup>①</sup>

1991年4月16日,苏联英雄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布列斯特、伏尔加格勒、刻赤、摩尔曼斯克、新罗西斯克、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斯摩棱斯克和图拉市党委书记在斯摩棱斯克举行会晤。表面上的理由是纪念卫国战争50周年,实质上是为了在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前夕制定苏共保守正统派的纲领。会上讨论了戈尔巴乔夫的活动、“改革”的思想,呼吁为“拯救祖国”采取各种紧急措施。会后发表了《致苏联公民呼吁书》。呼吁书说:“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危险之中,现在,不是像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发生的情况那样,是有人从外部侵犯我们的祖国。而是用你们的手和我们的手试图从内部瓦解我们的祖国。有人动用了各种肮脏的手段,想抹杀我们的历史记忆,唆使我们按民族特征去相互对抗,使我们失去同志情感和正义感,失去对祖国的爱和应承担的义务。有人企图使我们相信,我们被欺骗了……唆使我们相信这一点的人所抱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想瓦解用了几十年工夫才形成的苏联这样一个国家。”<sup>②</sup>

1991年4月23日,新奥加廖沃进程开始了。戈尔巴乔夫需要在中央全会召开之前走出这一步出人意料和有力的棋,中央全会定在4月25日召开,会上准备同他进行“最后的坚决斗争”。在中央全会之前,政治局在4月24日召开会议。讨论联合声明,指责戈尔巴乔夫的“反人民政策”。

1991年4月25日,苏共中央例行全会召开。获悉党内的保守力量决定把这次会议变成某种审查戈尔巴乔夫个人问题的会议。甚至还草拟了一份决议草案,准备判处整个改革路线“死刑”。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说:“现在有人不仅在口头上,而且事实上已经采取了行动,企图使国家脱离改革的道路,或者将它推向又一个超革命的冒险主义,威胁破坏我们的国体;或者回到过去,回到稍加化装了的极权制度。我想,用不着解释,这里指的是左派和右派的激进分子的计划。这两种方向都是极其有害的。而目前最大的危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96页。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484~485页。

险在于,他们现在汇流在一起了,尽管看起来是势不两立的……会晤通过的声明已经公布。如果其中制定的措施得到贯彻——我们为此要竭尽全力——那么这就有可能成为局势发展的转折的开始……克服危机的首要任务是根据全苏全民公决的结果签订联盟条约。”经过激烈的讨论,全会赞同9位共和国领导人和苏联总统的声明,指出“……为了制止即将爆发的灾难,要求必须做到:签署联盟条约,其基础就是关于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全民公决的结果;恢复国内的宪法秩序和法制”。一场指望国家脱离改革道路,包括脱离改革联盟的道路的疯狂企图就这样破产了。<sup>①</sup>

1991年6月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向最高苏维埃会议通报了联盟条约的起草情况。代表们支持他的建议:不讨论,也不领取条约文本。苏联最高苏维埃中最大的议会党团——实际上由卢基扬诺夫领导的“联盟”议会党团对这个条约持否定的态度。

1991年6月8日,“联盟”议会党团作出了《关于签订联盟条约》的声明。指出:“重新起草的条约规定将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予以取消,该条约有未经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核而签订的危险……这将意味着国家政变。”<sup>②</sup>

1991年6月15日,苏共中央举行了俄罗斯共产党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苏共中央书记舍宁主持会议。与会者认为,造成失败的主要罪人是戈尔巴乔夫。舍宁强调:“大家的发言中对如何签订新联盟条约深感忧虑。根据与会者的意见,不容许无视全民公决的结果和苏联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因为全民公决的结果和决议明确规定了新联盟国家的名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及其组建的基本原则。与会者强调指出,只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通过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决议。”<sup>③</sup>

1991年6月17日,联盟条约草案起草委员会在新奥加廖沃结束工作。该草案当天就分发给联盟各共和国讨论。同日,卢基扬诺夫召开苏联最高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52~154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11页。

<sup>③</sup> 同上,第712页。

苏维埃秘密会议。政府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在会上发表讲话。这些“强力机构”的领导人谴责苏联总统的行为同苏联的利益相抵触，议员们纷纷谴责戈尔巴乔夫叛变。最高苏维埃能够动用罢免总统的程序。<sup>①</sup>

1991年7月23日，各共和国领导人再次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会晤。经过艰难争论后决定：1991年8月20日最终签订新联盟条约。当天，《苏维埃俄罗斯报》刊载了一篇政治宣言——《告人民书》，在上面签名的有未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的活动家。他们写道：“我们会神智清醒，我们能悬崖勒马，我们不分老少奋起捍卫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对那些危害者和掠夺者说‘不’。在抵抗的最后一线，我们决不退却……我们要团结起来……促进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苏联是所有各族人民以巨大的努力建造的我们共同的家园和堡垒，是在敌人入侵时期我们从耻辱和奴役中拯救出来的家园和堡垒……”<sup>②</sup>

1991年7月25—26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与会者都不知道这是苏共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尽管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不时被打断，与会者当中时常有人同总书记争吵。但是全会仍然通过决议：1991年11—12月提前举行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会上将通过苏共新纲领。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可以简单地这样回答：以前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有必要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和民主改良。与此相联系，党本身也必须变革。”从戈尔巴乔夫的角度而言：“我要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党和我们对未来的观点的发展来说，1991年的中央七月全会的意义是最重大的，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拥护新思维的人和传统派分子进行了最后的搏斗，通过了苏共新的党章草案，与过去就此一刀两断。”<sup>③</sup>在中央全会开始之前，并非所有人都确信，中央委员们能够接受提交给他们的纲领方案。这份文件的很多章节对“老党员”来说实在是非同寻常，对党的理论、意识形态和组织基础都进行了颠覆性的修改。有消息说，莫斯科市和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13页。

<sup>②</sup> 同上，第716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50页。

莫斯科州的很多党组织通过决议，明确表示不再信任戈尔巴乔夫，并要求他马上下台，由此造成 7 月中央全会推迟讨论“修正主义纲领”，转向议论党内高层关系的现实危险。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不怀好意的那些人所做出的种种预测更加剧了这种危险性……尽管如此，中央全会开幕的气氛还是很平静的。围绕会议日程，没有出现任何争论，没有感觉到苏共二十八大以后已经成为中央全会特征的冲突和仇恨迹象。中央全会着手讨论党的新纲领，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的发言，理论水平都很高，最好战的纲领反对派却选择了沉默。是什么因素改变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情绪呢？麦德维杰夫认为，苏共从 4 月到 7 月所遭受的失败在会上全面反映出来，政权正在从中央全会的主体——州委书记手里流失。在保守趋势严重的地区，苏共遭受的打击尤其明显。毫无疑问，叶利钦在 1991 年 7 月 20 日颁布的“非党化”总统令从另外一个角度促进了党的团结。总统令规定，所有政党和政治运动在 8 月 5 日之前都要停止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机关、企业内的组织活动。俄罗斯其他政党的地方组织非常薄弱，而苏共一直是把在生产第一线建立党组织定为党建的主要原则。从形式上说，只有苏联总统才有权取消叶利钦的总统令。在此背景下，苏共中央全会上反对叶利钦和民主派的声音很高就没有任何奇怪的了，苏共的纲领在中央全会上以绝大多数票获得通过，并在 1991 年 8 月 8 日的《真理报》上予以公布。<sup>①</sup>

党的反抗失败了！

### (三) 为什么不能放弃戈尔巴乔夫？

那么在戈尔巴乔夫执政长达 7 年的时间里，为什么苏联共产党就不能放弃戈尔巴乔夫呢？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说，从 1990 年秋天，尤其是 1991 年开始，每次中央全会上都有一些中央委员在“打倒戈尔巴乔夫！”的口号下发言。<sup>②</sup> 特别是 1991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例行全会，这次全会以党的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63~65 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第 39 页。

官员们对戈尔巴乔夫展开严厉而尖锐的批判而著称。党内的保守力量决定把这次会议变为某种审查戈尔巴乔夫个人问题的会议。甚至还草拟了一份决议草案,准备判处整个改革路线“死刑”。马特洛克说,当时莫斯科盛传着这样的流言:“党内强硬派将利用这次会议攻击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有些地区的第一书记还公开鼓吹,作为辞去总统职务的第一步,戈尔巴乔夫将被迫辞去党内职务。”<sup>①</sup>全会召开后,戈尔巴乔夫遭到侮辱和诬蔑性的攻击。代表们认为他“对国家做了敌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要求他从立法上加强苏共执政党的地位,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督,并向他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要么实行紧急状态,要么走人。”<sup>②</sup>但是戈尔巴乔夫似乎又以智谋战胜他的批评者。他在开幕词中发出警告说,如果他被迫辞职,就会产生一个权力真空,导致独裁。他对“左翼和右翼的激进分子”都进行了抨击,以表明自己是坚定的中间派。然后进行了投票,结果要求讨论他的辞职问题和要求他递交一份述职报告的两项动议都失败了。另一项动议要求讨论将的党组书记和总统职务分开的问题,最后也失败了。最后,戈尔巴乔夫表示要辞掉总书记的职位。他愤怒地宣称,总书记只有在委员会成员的支持下才能工作,因此,“如果这就是你们支持我的方式,那我宁可辞职!”他的声明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会场,副总书记伊瓦什科立即宣布会议暂停。休息期间,中央委员会的 72 名成员联名请愿,如果戈尔巴乔夫辞职,他们也辞职。这引起了与会者的仓皇失措。事情突然变得很简单,如果同意戈尔巴乔夫辞职,将意味着共产党本身的结束。不仅有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将跟随他一道辞职,而且以他的地位,他可以利用国家官僚的权力来瓦解共产党的机构。叶利钦已经显示了一个脱党者可能带来的挑战,如果戈尔巴乔夫加入他那边,来毁灭共产党,那么会场里多数成员也就前途渺茫。中央全会被迫中断 2 个多小时,中央委员被分成几个小组,惊慌失措地讨论当前局势。政治局委员都离开了大厅,他们也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局势有些明

<sup>①</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600 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530~531 页。

朗：中央委员中就找不出一个，哪怕只是临时担任中央委员会领导的人物，而且没有一个中央委员愿意担任这个领导。又过了一个小时，政治局通过如下决议：“从国家、人民、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撤销对米·谢·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关于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这一提案的审查。”这一提案被交中央全会审议。绝大多数的与会者不敢冒险投票赞成戈尔巴乔夫辞职，而是支持政治局的建议，让他留任总书记。<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答应了这个要求，原因也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sup>②</sup>

“为了党的最高利益”就只能选择戈尔巴乔夫吗？这其中难道存在着难以言说的政治玄机吗？

仔细分析，大概有这样四个方面的因素在发挥着作用。

首先，戈尔巴乔夫拥有党的总书记权威，使党丧失了反抗的勇气。科伊乔·佩特罗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毁灭了共产主义，毁灭了共产党这一工人阶级专政的重要基础，这也是出现剧变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共产党保持住自己社会功能的活力，思想精神健康，坚持团结统一，即使经济上遭到破坏，共产主义仍会重新复活。苏共作用的削弱为共产主义大厦的倒塌创造了重要前提。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共产党（书记处、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党员们占据着国家机关以及政治经济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总书记和最高党的机关掌握着最强大的职权和监督权，他们是共产党专政的首脑。所以“上层的每一点‘头疼脑热’都可能在整个机体中引起中毒。每一次头脑混乱都可能引起机体中其他部位的病痛”<sup>③</sup>。就苏联政治传统而言，上述情况实际上就是每一位党员必须遵守的不成文的政治规则。党的总书记总是英明而又正确的，他是全党智慧、意志和能力的最高体现。没有人愿意冒着丢掉政治生命的风险去质疑总书记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马特洛克深刻地揭示了苏共党内存在的这一特殊政治现象。他说，1986年年底，苏联领导人仔细考虑了从 20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702 页。

<sup>②</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31~32 页。

<sup>③</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130 页。

年代以来共产党的实践中所没有的想法,因为意见不一致,三次推迟了党中央委员会原定的会议。这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苏联经济能否恢复活力?能否既谈论政治改革,又不违背该制度所赞成的一切?全体会议最终于1987年1月底举行,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态度使人们感到吃惊。他把国家的发展阶段称作“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重复人们所熟悉的勃列日涅夫的公式:“发达社会主义。”他甚至赞成地谈到“真正的选举”和秘密的无记名投票。

仅仅在几年前,谈论这样的事情可能要使党的官员丢掉工作,如果一再发表这种言论,他就会被送进监狱或精神病院。1月份,当戈尔巴乔夫向中央委员会介绍这些仍很笼统的想法时,人们感到惊讶,但没有提出公开的反对。“因为仍然存在着遵从总书记的老习惯,并避免对他的见解提出直接的怀疑。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些建议是想提高戈尔巴乔夫在公众中作为改革者的形象,而并不意味着要把它们付诸实践。如果对他们来说这确实就是全部含义,那么迁就一下总书记没有任何害处。”<sup>①</sup>于是,改革的局势越来越不可控,已经远远超出了苏联共产党的改革计划,但党却再也没有反抗的能力了。在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唯一选择人,毕竟他还是党的总书记。在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就承认,党的总书记职位是个使他拥有权力的职位。他的这番讲话是在整个共产主义大厦动摇之前不久发表的,丝毫没有隐瞒自己利用手中权力的事实。“大家批评总书记的重大错误,而在大会结束时同是这些人又投票再次选举他为总书记。这些由千百万共产党人选出的数千名代表的反常表现使相信戈尔巴乔夫肯定倒台的西方政治家们摸不着头脑……那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生涯之歌已经唱完,然而人们都错了,总书记保住了,尽管从正常逻辑的角度看这是很荒谬的。总书记保全了,这是一个奇迹,因为国家和党这艘大船沉没了,经济和整个共产主义都被搞垮了。为什么成千上万个曾无所畏惧、准备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代表们,没有一个敢接过沉船的船舵,担负起拯救者的责任?而让船长公开把他们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1页。

推向无底深渊。”<sup>①</sup>

其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迷惑了党,使它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戈尔巴乔夫不仅能言善辩,而且非常擅长在党的传统政治词典里添加新的政治术语,并且信誓旦旦地说其实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涵,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于是,人们选择相信了他。克留奇科夫说,戈尔巴乔夫曾长期毫不动摇地站在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列宁一边,也曾强调保持和发展联盟与社会主义合作的必要性。受他的这些言论的影响,有时让人觉得不应对他产生怀疑。“戈尔巴乔夫重新振兴社会的思想使我对他的尊敬有加,我还把他敏锐地阐明问题当作诚挚,在与他交往中也就多了一点儿朴直。他像与他同级的其他许多领袖人物一样,易受影响,认真听取国内尤其是国外对他的看法。我觉得,戈尔巴乔夫那时根本未想到1991年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会陷入如此令人失望和灾难性的窘境,他自己会如此孤立无援,他的声望会降到零。要知道,他在口头上曾发过誓,绝不允许联盟解体,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都不会退出联盟。他还经常强调说,绝不允许发生这种情况。他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我们绝对不能四分五裂!’他曾多次向人们保证,国家的未来除了走社会主义之外,其他别无选择。他也盲目崇拜党,称自己是党教育出来的人……遗憾的是,我和许多人一样,相信了他的话,结果却大错特错。”<sup>②</sup>

改革的初期,党为总书记关于改革的宏大设想所陶醉、所迷惑。博尔金指出:“如果在戈尔巴乔夫王朝执政初期,还能经常把一些具体问题提交中央全会并提出一些相当明确的任务和解决任务的办法,那么到后来讨论就成了抽象的辩论。党不是像从前那样处理实际问题,而是陷在内部争斗中……戈尔巴乔夫经常用辞职、国家要毁灭、要发生贫困等办法进行威胁,他本人也常常猛烈抨击国内的局势,把一些令很多人胆战的‘底片’曝光。被总书记的表演才能弄得惊讶不已和困惑不解的中央委员们默默地看着党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的领袖那张愤怒的脸,而他不顾中央委员的情绪,大谈骇人听闻的危机的所有预兆。这场戏演完以后,想发言的人比以前少多了……党的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多次抱怨说,这位改革建筑师真有念咒的本事,他们往往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明白,自己竟那样轻易地被人弄得团团转,扮演着各种角色。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像一位出色的演员,变着法儿地感染听众。”<sup>①</sup>

再次,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手腕帮助了他,使他能够获得党内支持。戈尔巴乔夫也许不是个改革的政治强人,但绝对不能因此而忽视他娴熟的政治手段。在党的关键性中央全会上,当党内开始凝聚力量准备采取行动时,戈尔巴乔夫总能采用合适的手段迫使苏共服从总书记的意志。在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后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于1989年4月25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的活动及方针遭到了猛烈的批评。他被指责经济改革失败,党的机关经常遭到新闻媒体的责难,滥用民主,搞垮了军队,纵容民族主义,脱离党的活动的列宁主义原则。戈尔巴乔夫的活动第一次成为公开谴责的目标况且批评他的多数人正是他圈定留任的那些中央委员。但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找到了反击批评的有效方法。他建议报刊登载会议的速记记录。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们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这样做。大家发言的速记记录全文发表实乃前所未有之举,党内“家丑”于是“外扬”。戈尔巴乔夫一下子成了中央“党内保守分子”的牺牲品,并因此获得了舆论界一定程度的支持。<sup>②</sup>

在1991年4月25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例行全会前夕,同民主派一翼进行的残酷斗争不但不会缓冲,恰恰相反,加剧了党的正统派另一翼的攻击。戈尔巴乔夫的敌人感觉到他的阵地受到削弱,准备发起强大的进攻,其目标就是撤销戈尔巴乔夫的总书记职务,从而使他彻底丧失在大部分代表是共产党人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在极短期限结束他的方针。考虑到这一危险,戈尔巴乔夫下了一招出人意料的棋:他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召集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31~232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22页。

到新奥加廖沃，通告大家，他同意签订一项联盟条约，该条约大大削弱了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生活的影响。他坚决主张通过新的宪法，之后解散现在的立法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直接选举新总统。“利用在新奥加廖沃达成的协议，戈尔巴乔夫就有了充分的准备来参加苏共中央全会。当会议上各种各样的批评犹如雨点冰雹似的劈头盖脸砸向他的时候，他强烈提出了对他的信任问题。如果知道戈尔巴乔夫得到了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支持，各共和国的与会者就可能不支持关于戈尔巴乔夫辞职的决议。他夺取了主动权。全会除了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路线之外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他在闭幕词中说，他与那些借助于非常手段企图阻止民主化进程和限制各加盟共和国主权之辈不是志同道合的同志。”<sup>①</sup>而改革也使苏联共产党陷入左右为难的窘迫困境，戈尔巴乔夫成为党的唯一希望。《共青团真理报》政治评论员尼基金撰文说：“再过几个月，叶利钦就要就任俄罗斯总统，没人再要戈尔巴乔夫这个挨打的孩子。对叶利钦来说，戈尔巴乔夫也曾发挥了他的历史作用，他7次进攻同一个靶子，并以此促进了自己竞争对手的成长。长期寻找妥协把戈尔巴乔夫引向这样一种境地：他今天沦落到没人需要的地步，成了两派主要政治力量继续对抗中的多余人物。他就是挡在路上的一块石头，阻碍一些人往前走，阻碍另一些人向后退。在此情况下，那些对祖国命运比自己的命运更关切的共产党人应该支持戈尔巴乔夫，保存他这个能够抑制超级右派粗暴进攻的人物。”<sup>②</sup>

最后，苏联共产党整体政治素质的下降，使党失去了政治的活力。不能不承认的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所说的苏联共产党已经失去了政治活动能力的断言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戈尔巴乔夫已经对苏联共产党造成实质上的政治颠覆的情况下，党仍然选择跟着戈尔巴乔夫走，这不能不说这是整个苏联共产党的悲哀，更是党的领导层整体政治素质下降的直接后果。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其实就是苏联共产党政治素质下降的无奈选择。博尔金指出，党的积极性和党的威信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书记这样有影响的

<sup>①</sup>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sup>②</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人,但是说句公道话,如果不是党遇到严重困难,不是党濒临危机状态,戈尔巴乔夫未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瓦解这个有千百万人的组织。博尔金分析了党的各个机构,特别是领导机构的活动,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个结论:苏共的许多病症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领袖的文化修养退化,在思想上及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实际计划方面缺乏竞争。党的威信的下降是从党的领导集团的领袖丧失威信开始的。列宁是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理论家、政治斗争的战略家和战术家,是一位充满激情的雄辩家,是一位有着很高文化修养的人,接替他的斯大林则是一位不那么卓越、造诣不那么深的政治领袖。但是斯大林尽管在讲台上比较逊色,仍然具有相当好的理论修养,博学多识,具有很强的组织才能,然而他却成了无法无天的象征并因此给党造成了难以愈合的、血流不止的伤口。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提升了赫鲁晓夫,他很有天赋,但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是一个三分学生,文化修养水平很低。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没有怎么改变人们对党和国家的领袖的文化修养的印象。

安德罗波夫的上台在阴暗的天空划过了一道明亮的光芒。他很有天赋,受过高等教育,是个有知识的人。接替他的契尔年科也不能表现出自己的优点,不能对党的文化行囊做出贡献。最后是戈尔巴乔夫,他无疑是个有学问的人,至少获有两个文凭。当然,他比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具有更多广义上的文化,但像几乎所有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一样,他是一个具有各种优缺点的祖传的农村生活方式传统的体现者。他在理论上的最高成就就是以他的名义写的《改革与新思维》。可以说,苏联共产党几任总书记文化素质的退化是因为那时党内最高机构的总体“水平不高”,因此选中戈尔巴乔夫完全符合当时领导的水平。<sup>①</sup>不仅党的领袖如此,包括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在内的党的领导层也是如此。“许多州和边疆区党委领导人文化修养水平的下降导致党的最高层包括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消极变化,而那些年的国家内外政策都是由政治局和书记处决定的。”<sup>②</sup>麦德维杰夫也认为: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84~386页。

<sup>②</sup> 同上,第395页。

“戈尔巴乔夫的班子软弱无能。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我国在科技领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领导干部队伍,在其他许多社会生活的领域也出现了不少富有经验和学识的领导人才,但唯独在政治领域领导人才寥寥无几。就政治能力、知识水平和意志品质方面的整体水平来说,斯大林时期的领导队伍已经弱于列宁时期,这种退步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到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依然如此。”<sup>①</sup>对于麦德维杰夫指出的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的软弱问题,博尔金深有体会。他说:“在谈论总书记的失误、他采取的冒失步骤和轻率决定时,我仍然认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是由于他的性格特点,他对某些党的、经济的或国家的领导人的好恶而铸成的。但是我不能担保说这不是有预谋的、有意破坏党和国家的行为。我之所以讲述戈尔巴乔夫在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独自确定苏共中央和政治局的组成以及后来确定政府组成了经过,是想表明改革的设计师拥有多大的权力和我们的国家显得多么软弱无力。它实际上是在由一个人摆布。关于这一点,在总结这个也许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党的活动时绝对不能忘记。此外还应当看到,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往往是根据友好关系或熟人原则、根据对个人的忠诚情况进行的,这就掩盖了许多政治领袖最严重的错误。”<sup>②</sup>

1990年3月10日,法国《费加罗报》发表了《戈氏是一个破坏帝国的超级明星》评论。评论指出:

在苏联所有最高领导人中,只有列宁和戈尔巴乔夫在执政五年之后就改变了过去的一切。同列宁一样,戈氏巧妙地、坚决地摧毁了他的前任们的事业。他认为无法接受前任们的事业。但是列宁打击的目标是沙皇俄国,而身为共产党人的戈氏打击的目标是共产党政权七十年的成果。戈氏1985年上台时被大家视为改革家。没有人认为他是破坏传统的人。他发出遵守纪律和认真负责的呼吁使人产生了希望,也使勃列日涅夫分子担忧。5年后,甚至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承认一切都变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2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99页。

了。事实不容置疑。言论、思想自由存在，移民打破纪录，私有制恢复，神圣的共产党垄断正在取消；前政治犯进入议会，加盟共和国分裂即将出现。“我是共产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戈氏去年12月23日还对议员们重复他的格言。但是在他执政5年坚持摧毁他自称所属的共产党之后，人们难以相信他的格言。<sup>①</sup>

---

<sup>①</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72页。

# 第六章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国家政治制度改革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既是戈尔巴乔夫对列宁政治思想的继承，又是戈尔巴乔夫打破苏联共产党政治垄断，推进人民自治、人民政权建设的逻辑必然，更是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体现。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并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一个排除激变及由此引起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人民的灾祸和苦难的和平改良过程。它要求高超的技巧，以便最好地选择权力交接的时机。这种交接只有在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利用它深化民主制、继续推进旨在建立法治国家和社会目标明确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时，方能完成。”<sup>①</sup>不过，戈尔巴乔夫似乎忘记了，政治从来就不是在玩拼图游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更换。“为了用改革的杠杆撬开党的官僚这块水泥板，就得有个支点，有几个支点更好。在一党独霸天下的情况下，要在社会生活中发现这些支点，谈何容易。如同招魂会中一样，又呼唤‘列宁精神’前来帮忙。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离开列宁我们就迷失方向，忘记了苏维埃。’在苏维埃政权成立 70 周年的时候想起苏维埃，想起革命领袖赋予苏维埃的意义，大概只能是出于绝望。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别的选择：需要利用手头的资源组建自己的军队。……然而无论是苏维埃、工会，还是他在反复阅读列宁的政治遗嘱时也会想起的‘文明的合作社’，他都未能依靠。所有这些‘传动带’都是靠苏共中央这个唯一的飞轮来驱动的。”<sup>②</sup>于是，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12 页。

②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32 ~ 133 页。

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政治宣言中,庞大而复杂的苏联政治体系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被戈尔巴乔夫简单而又彻底地更换掉,留下了政治上的一片狼藉。“现在很清楚:国家从一种政体向另一种转变需要一段时间。遗憾的是,一时冲动和感情用事占据了主导地位,有时甚至能决定一切。党的领导体系在瞬间便被从上到下地拆除了,而各级苏维埃却缺乏单独行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干部和经验,政权的瘫痪无力很快就遍及全国。”<sup>①</sup>

## 一、政治制度改革的目标:建设法制国家

1988年4月11—18日,戈尔巴乔夫分三次召开了全国州委书记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会议。在4月11日与州委书记第一次会见时,戈尔巴乔夫讲道:

苏共的民主化。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性质和作风具有决定性意义。要不要有一个如此庞大的中央委员会?须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按职务原则组成的。一个人刚开始工作,我们就把他送进中央委员会,按其职务几乎是将军级的。应该好好想想这一点。还有一个职务上任职的年限问题。社会要求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这些党员不应去关心“我”如何成为这个体制的一员,我能否进入这一体制。应该想想国家……

我们必须明确建设法制国家的任务。我们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思想。这个思想的核心是大家以法为根据,包括政治局。须知,坦率地讲,党不是通过民主的途径取得它现今的地位的。这一点不仅在西方有人,而且我们的法学家早就“批评”过了。情况说明,我们是首先破坏法律的。谁应该首先遵守法律呢?以及遵守“自己的”党的原则呢?难道不是党吗?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没有像我们的党有的那种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40页。

权力,而制约只有一个——良心和党性。但是正如历史表明的那样,仅此一点是不够的。法律面前人人应该平等,而我们这里事情演变到人们可以把法官本人传唤到州委去,向他指示,此案如何审理,那案是否应该审理……

全世界都在批评我们,说我们的党不顾法律管理国家。因为政权只是由社会中一部分人选出来的。而且是现实政权。

戈尔巴乔夫在州委书记会上检验了他更新“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的思想,他所指的就是法制国家。“他把这个思想归结为,第一书记同时是同级苏维埃的主席,但是……是‘全民’选出来的。如果人们不选他,他也应离开党的职位。直到最高层都应如此。”<sup>①</sup>

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召开。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苏联社会不断民主化进程的结果应该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简而言之,“法制国家的主要标志是要切实保障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集体、党组织或社会团体,还是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正像公民对自己的全民国家负责一样,国家政权也要对公民负责。公民的权利应该得到可靠的保护,不受政权及其代表人物的任何专横行为的侵犯”<sup>②</sup>。

1988年9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就机构改革问题作了深入讲话。戈尔巴乔夫说:

问题首先涉及裁减80万~90万人的事。这仅仅是地方机构。重要的不是半途而废,保守势力非常强大。改革不容易:从30年代开始,半个多世纪了,在组织上和机关工作中走的是斯大林道路……

我们形成了一种传统,一种不好的传统,行政命令体制产生的传统,党包揽一切。我指的是政治局通过了大量的具体决议。人们已经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39~240页。

<sup>②</sup>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68页。

习惯于认为,如果中央委员会不做出决议,那么谁也做不成什么事。每走一步都要有决议。党的高层决定一切。这种做法应该结束……

……同志们说得对,机关的改革,特别是党中央机关的改革,最直接地触及权力职能的根本革命性的改变和群众的政治主动性的解放。不进行机关改革和机关职能的转变,我们就不会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任务。即争取使国家权力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

……机关改革与法制国家的形成有关。我们社会和国家中的所有结构都应该在法律的基础上,即在法律的范围内运作。任何人都无权超越法律的界限,违反法律。有人已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最主要的法律破坏者就坐在这里,坐在这张桌子旁。已形成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机关改革与打破实际做法有关,这种做法给我们社会带来了巨大损失,扭曲了制定政策的性质。要知道在停滞时期就形成了这样的程序,在这种程序下,主管部门按照自己的看法把有的东西削减掉,把有的东西添加上,主要根据自己的部门利益把自己的考虑给我们拿到桌面上来。中央委员会机关照例把这些考虑转抄一遍,并送交书记处和政治局。我们则全部盖章放行。如你们所知道的,不经过任何讨论,实际上哪里也没有讨论。有时重大决定5分钟—10分钟便通过了。请问那时在政治局中是谁在决定政策?官僚体制……

党已不习惯于从事自己的主要工作。它沉湎于经济、行政和其他事务。

……党内有许多人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责任形成了一种纯粹是书报检查官式的工作态度。当在报上看到一点什么不合适的东西,就立即呼喊:“要警惕啊!过火了啊!要采取措施啊!要加以纠正啊!”这就是我们机关干部的通常反应……

……戈尔巴乔夫强调说:

在解决有关祖国的命运、社会主义命运的理论和政治任务时,谁也不能代替党。做的工作,包括迄今为止一直由党在做的那部分应由政

府和苏维埃做的工作。<sup>①</sup>

### (一) 重塑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自哪里呢？

这是戈尔巴乔夫在推进政治改革时，必须向他的政治局战友们解释清楚的一个关键问题。否则，失去了党的支持，改革就无法进行下去。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改革时代的苏联共产党，他执政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来源于真正民主，而不是形式民主。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要给社会输氧——民主。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例行会议上说：“民主化是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提供现实的权利。而谁将来实施呢？是否有有能力的和勇敢的人来使用权利呢？要知道我们已经使他们不会使用民主了……我们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先是建立了铁一般的制度，而后在这种制度下折腾活生生的人。在任何情况下，制度是第一位的！我们已经在代表大会上谈到了两院，甚至提到了选举制度。再次周密地考虑并付诸实施也是可以的……不应该害怕民主。不管任何地方，任何级别，从政治局到最小的集体，在家庭的圈子里都不应该害怕问题、难题和讨论。”<sup>②</sup>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铁一般的制度”的借口就是“人民”现在还没有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高级智慧，只能一点点地“培养”。吉拉斯指出：“苏联的领袖们，只有在开始的时候，他们还被迫东闪西让地允许‘将来’给人民以民主。但目前他们却干干脆脆地说，这种自由在苏联已经创立了。当然，甚至他们也感到自由已在他们下面发生作用。他们不停地‘提高’人民的意识，他们劝人民‘生产’，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以及枯燥无味的领袖们的政治观念，不断地填塞到人们的脑中。更糟的是，他们还不停地强迫人民承认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忠诚，并承认他们相信他们领袖们所作的一切允诺都永远不会错而且是切实的。”<sup>③</sup>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70~271页。

<sup>②</sup> 同上，第96页。

<sup>③</sup> [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5月内部出版，第175页。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戈尔巴乔夫在文章中说:“民主与自由是人类文明的伟大价值观,我们应当继承并用社会主义内容来充实它们。我们过去把真正的民主和形式上的民主对立起来,当然本身包含着某些理论内容。我们主张真正的民主,但是反对在此基础上摒弃民主的形式上的原则,因为法制国家本身必须包括这些原则,而我们自身经验证明,在社会生活中严格遵守一切法律原则是何等的重要。因此,我们可以有完全根据地说,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sup>①</sup>应该说,这篇文章,既是他对改革以来关于民主的政治思考的总结,也是对1989年上半年的苏联人民代表民主选举活动的政治实践的一个总结。

在对民主的政治思考中,戈尔巴乔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原则——“非意识形态化”。作为民主运动的第一场政治实验——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选举——则进一步坚定了戈尔巴乔夫捍卫的政治理念——人民权利。切爾尼亞耶夫指出,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选举结果发出的信号表明,冲出社会主义选择这一框架的形势已经极为成熟,选举结果反映群众对“赞成”实现改革的那批人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不满,虽然当时党的州委、区委、国有农场、集体农庄以及苏维埃机关的领导成员有2/3已经“更新”,但是他们远没有全部当选为人民代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各级第一书记和其他相当级别的领导人都遭到惨败。选举结果在政治局讨论了一整天。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说:应当在改革的具体背景下来审视选举。他把实行选举这件事本身评估为“实行政治改革和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重要步骤”。但是在这里,西方报刊和苏共党的机关的公开出版物不谋而合。纷纷责难他是有意“作难”党的机关。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索洛维约夫在政治局说,中央已经把“他们全部”抛弃,任凭政治蛊惑家们奚落摆弄。卢基扬诺夫则号召要想方设法“从道义上支持并帮助”所有落选的人。戈尔巴乔夫驳斥了为落选辩护的人:“这是他们对待人民的报应,在他们眼里人民好比牲畜。我收到了数以千计的上告信,诉说虽已踏破了这些老爷的门槛,但问题多年来毫无结果,

---

<sup>①</sup> [苏联]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1989年11月),《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哪怕只是要求解决日常用品的供应问题。而党中央却应当去保卫和维护那些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让他们自己做出结论吧！同时我们也会对他们做出结论的。”他还警告说，从现在起所有选举都将照此进行——人们现在有权利认定并驱赶掉不中用的人。<sup>①</sup>

其次，来源于竞争选举，而不是革命传承。戈尔巴乔夫认为，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创造的最大政治遗产——统治国家的权利。但是在改革的年代，这些政治遗产却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他说：“我们逐步更充分、更全面地意识到，我们建造了什么，正在改造什么，我们走向什么样的社会，自然也就相当明确地认识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体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机制到上层建筑。不仅是说，而且要在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等方面实际实行步骤。”<sup>②</sup>戈尔巴乔夫决心采取实际行动逐步破除这一强大“阻碍机制”。

戈尔巴乔夫开始对十月革命进行反思。他说，人们把革命称为被剥削群众的节日。但是结果蒙受最大损失的不就是他们这些群众吗？更何况革命之后还常常发生倒退。“热月”这个词作为这种倒退的象征已经确定无疑地被收入了学术和政治词典，“这种倒退同样是很痛苦的”。<sup>③</sup>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进化式的改革是符合公民利益的社会发展的最佳形式。正如经验所表明的，改革的速度要取决于许多因素，但主要是社会公民的成熟程度、执政者的责任心、公众的相互宽容和不走极端。以上所述绝不是要否定法国革命或十月革命的毫无疑问的意义，它们已牢固地占有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但主要问题是：这些革命，首先是十月革命是否提供了最佳地解决了当时已经或正在成熟的社会任务的范例？它们是否“提出了”最有利于社会的解决现实存在的各种矛盾的方式？还有，它们是否真正实现了所允诺的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34～335页。

<sup>②</sup> [苏联]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1989年11月），《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东西？戈尔巴乔夫发出疑问：1917年十月确实是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吗？我们建立的制度确实是社会主义制度吗？<sup>①</sup>原来，建立起来的其实是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的却是专横的斯大林主义极权体制。这种体制强迫“人民”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党”，然后“党”就宣称它的权力是合法的。吉拉斯指出：“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所以有代议制度的存在，还有一个更深刻更重要的理由。党的高级官僚，或者新阶级的政治核心有必要批准其最高机关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共产党政府能够不管一般舆论，但不能不理党的舆论和共产主义的舆论。因此，尽管选举对共产党人没有什么意义，但党的最高集团对于议员的选择是慎重其事的。在选择时得考虑到一切条件，如个人在运动中和社会中的服务成绩，所担当的任务，所能发挥的功能，以及所代表的职业等。从党内的观点看，选举领导人物非常重要：领导人物分配着他们所视为党在议会中的最重要权力。这样一来，领导上就有了以党、阶级和人民名义行动时所需要的合法地位。”<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认为，这种极权体制造就下的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人民真正赋予的，而是布尔什维克党自身政治实践逻辑的产物。在倡导人民自治、人民政权的改革年代，必须使党通过真正的竞争性选举，重新获得执政的政治合法性。戈尔巴乔夫说：“党的处境并非毫无指望。要克服因告别牢固的权力垄断而引发的精神压抑症的机会是有的，时间也是有的。赢得人民的支持已经不能靠吃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老本了，而是要靠能够保障民主、公民权、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的有效政策。我相信，苏共改变自身面貌是有可能的。”<sup>③</sup>

在1989年3月28日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代表面对党参与的苏联人民代表选举结果，大多数人的情绪都很压抑，一派天快塌下来的气氛。但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是，“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了极其重大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

①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② [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5月内部出版，第121~122页。

③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

上一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sup>①</sup>。戈尔巴乔夫指出:“党通过改革政策培植自己的威信,不是用威胁和恐吓,而是采取公开贴近人民、而且号召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的方法。现在应当去争取另一个阶段的威望了,这是一个办实事的阶段,‘堵住人家的嘴巴’是得不到威信的。选举表明,改革需要维护,但维护的办法只能是深化和发展。现在,主要的就是办实事。不能光围绕自我分析转圈子,也不能成天陷于内疚自责。我们应该让人们感觉到,对于他们所批评的那些弊端,我们是会作出回应的。我们准备满怀信心地、平稳地行动起来。我们将以此去迎接代表大会的召开。”<sup>②</sup>1989年5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苏联选举制度改革》一文。文章认为,党明确规定改变选举制度的主要目的首先在于,把国家服从社会和社会利益的极为重要的杠杆交还人民。“这一目的只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选民的主动性、提名和选举代表的自由、提高公民对选举的兴趣的途径来实现。”<sup>③</sup>

再次,来源于人民自治,而不是党的垄断。戈尔巴乔夫指出,真正的党的领导应该是人民自治的最高表现。这种最高表现不是说党要垄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是说党的执政权力是人民自治权利的集中体现——人民赋权。戈尔巴乔夫指出,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人民”就成为党伸张权力的政治工具而不是权力的政治主体。他说:“斯大林善于利用群众的急躁情绪,利用一切群众运动所固有的空想和平均主义的倾向,利用先锋队急于达到预想目的的愿望。所有这一切都大大缩小了创造性讨论所出现的问题、选择的可能性,导致统一,在统一中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和党的纲领范围内的意见和观点多样性的余地。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紧密接近专制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改革,就是要破除这一行政命令制度。戈尔巴乔夫继续说:“改革,是一个完整的革命进程,它是人民用民主方法实现的,是为了人民的,党对人民表现为是他们的政治先锋队。而党表现出来的积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

<sup>②</sup> 同上,第195~196页。

<sup>③</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53页。

极性和历史性创议是它的先锋队作用的自然反映。而党不垄断探索的权利。任何有益的创议,不问它来自何方,都是改革所需要的,因为,它的生命力在政治上取决于民主的发展,而民主的职能完全在于刺激人民的首创精神。”<sup>①</sup>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维埃作为人民自治精神的制度体现,应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但是自斯大林以来,苏维埃就成为党执政权力的“橡皮章”。按宪法规定,国家最权威的实体是最高苏维埃,理论上也应是“最高的”,其主席团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主席。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最高苏维埃与其说是个真正的组织结构,还不如说是个政治舞台。它的成员都身兼他职(常常是要职),他们每年定期召开两次为期三两天的会议,例行公事般地通过事先草拟的一些建议。这些成员都是从共产党机构事先准备好的单一候选人名单中“选举”出来的。因此,最高苏维埃所行使的职能纯粹是走形式。“真正的决策者是把书记处当作它的差役的党的政治局,它只简单地把立法权移交给最高苏维埃以便它通过已经作出的决策。因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大多是共产党员,他们必须服从党纪党规,在这种情况下,最高苏维埃不可能独立行使其职能。”<sup>②</sup>然而当戈尔巴乔夫开始选举运动后,他要求党必须高度重视,以保证权力真正归属苏维埃。“作为一种制度,一种体制,社会主义还没有彻底展现出来。劳动人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向新生活,走向普通人民感到自我良好和自信的生活,感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国家命运的主人。改革就是要民主,要公开性,要经济生活民主化,要把权力交给苏维埃。要使人们掌握精神文明,改革使人们高尚起来。这是最主要的。”<sup>③</sup>

1988年整个秋冬,整个苏联共产党都在为有史以来真正的选举作准备工作。各委员会都基于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精神草拟了选举细则,并于12月上旬由最高苏维埃以法律形式予以通过。这些细则旨在对政府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对于这些改变,尽管党内有着不同意见,但大多数党的领导人仍然同意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方案。雷日科夫就指出,

<sup>①</sup> [苏]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1989年11月),《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49页。

<sup>③</sup> 塔斯社莫斯科1989年11月7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9年11月9日。

在 1987 年底,戈尔巴乔夫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如果脱离政治改革,在经济领域就不可能出现进步的变革。他们的形象说法就是首先一定要“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客观地说,党内早就出现了变革的必要性。党的确起过伟大的历史作用。在紧张到极点的 20 世纪 30 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时刻,在伟大卫国战争岁月,在战后年代以及冷战时期,正是苏共在掌握着全国的命运。如果换了另外一种社会制度,那些年未必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可是时代变了,那么当然党的活动也应该出现重大的甚至方向性的变化。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负责的主要还是政府,所以雷日科夫认为党应该从直接管理经济的工作中摆脱出来,把这些职能交给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雷日科夫的看法,意识形态工作和制定发展战略的工作留给苏共来做比较合理,同时还应该让它从停滞了几十年的理论教条和党务工作实践中解放出来。而且,早先的戈尔巴乔夫也是持这种意见的。例如在苏共中央 1988 年的 2 月全会上他就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走到必须改造我们的政治体制的地步了。这当然不是说要取代现行制度,而是要向其中引入质量上全新的结构和成分,要向它提供新的内容和动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涉及党和国家机构功能的划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应该以列宁主义为基础。党的指导和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挥作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sup>①</sup>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一定要重塑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呢?看来,戈尔巴乔夫似乎有着三个目的:

首先,使党重新成为真正的先锋队。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改革一方面使党放弃了现在的政治权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也使党能够在竞选条件下真正成为社会的政治先锋队。也许,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想要改造苏联共产党的基本思路。在 1989 年 11 月 26 日《真理报》上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文章中,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方案。戈尔巴乔夫既排除了保存现有的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也排除了接受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其取代方案是主张创建一个“人道的、自由的和理性的社会”,他声称这是一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6 页。

个与“马列主义理论相联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将排除“官僚集权主义”，有利于“劳工集体自愿联合会”管理，工人将拥有其使用的生产工具，农民将成为其土地的主人。在政治方面，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平民社会和一个法制国家。“民主和自由”被誉为“伟大的人类文明价值观”，它只需要再加一项“社会主义的内容”就会成为合适的目标。在马特洛克看来，“这一公式间接但明白无误地否定了传统的共产主义论点，即‘资产阶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戈尔巴乔夫似乎是说，民主就是民主，如果我们必定要有民主的生活，就必须在西方民主的基础上重塑我们的政治体制”<sup>①</sup>。戈尔巴乔夫的结论是，共产党在“新的社会体制”中将起“一种特殊作用”，因为它是苏联社会的“政治先锋队”。但这也要求它停止计划经济，并进行自身内部改造，真正成为苏联社会的先锋，而不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

其次，使党避免成为官僚主义机构。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苏联社会业已形成的极权主义官僚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就是否定政治上的多元主义，就是把党和国家等同起来，就是在对财产实行国家垄断的基础上对国家进行无所不包的、严格的、超集中的管理。”<sup>②</sup>戈尔巴乔夫认为：“如果不在政治体制现代化方面采取紧急措施，那么不仅国家的经济、而且整个制度都会面临完全崩溃的威胁。”<sup>③</sup>而官僚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苏联共产党。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垄断，在事实上既使党成为事无巨细的官僚机构，又在大权独揽的同时丧失了政治活动能力。雅科夫列夫就说：“为什么我国恰恰走上了马克思的社会救世主思想的道路，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在政治垄断和意识形态神话的基础上形成了军事官僚专政，剥夺了人的一切财产和权力。而这种专政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显示出了它的无能和缺乏适应力。”<sup>④</sup>因此，推进政治改革，把党从繁杂的国家政治管理中解脱出来，就是要使党学会在新的竞争性政治环境中的生存本领，

①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36页。

②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③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④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页。

增强党的政治活力。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目的却决非如此简单。在马特洛克看来,《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其实暴露了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想法。马特洛认为,不能说戈尔巴乔夫究竟是往改革目标的瓶子里注入了20%,还是40%,抑或60%的水,可以肯定的是,瓶子中仍保留有很大的空间。但看得出戈尔巴乔夫正在从经验中学习。由于他所遇到的困难,他的目标正变得更趋于激进而非谨慎。这篇论文避而不提阶级斗争,其基本的民主制度概念与西方也并没有什么两样。“我当时有一种感觉,他为一种重新界定的‘社会主义’辩护远非一种策略;他似乎真的相信集体所有制比个人所有制优越。这些想法若不是为随后的经历所动摇,就会在未来一直在他的思想中游荡。比较而言,他对党的评论给我的感觉是,尽管‘先锋作用’不离口,但却正准备放松党对政治进程的控制。一党制不再被说成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制度:它仅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戈尔巴乔夫虽然呼吁党应是社会的先锋,但又指出社会比党变革得快。换言之,社会是先锋,党在拖后腿。如果党继续抗拒改革,阻碍国家,后果将是什么呢?戈尔巴乔夫没有说,但我想我知道。他的下一逻辑步骤将是在党外为自己建立一种权力基础,然后再迫使党跟他走。如果失败了,他最后也能挣脱出去而不至于自动丢掉事业。”<sup>①</sup>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打算是,如果党能够跟着他走,他就拉住它;如果党不愿跟着他走,他就准备另起炉灶。

最后,使党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助力。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手段很简单:“利用党的机关——国内唯一有效的执行机构的组织资源和行政资源,假手党的机关来拆卸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党的国家,将其变成苏维埃的、也就是世俗的国家。”格拉乔夫指出,戈尔巴乔夫自己曾经断言,他想削弱机关,不让这个“怪物”将“职业革命家”的党变成反对改革的反革命势力的堡垒。具体怎么做呢?戈尔巴乔夫打算遵循列宁的遗训。列宁当初曾经认为可以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以免发生内战。戈尔巴乔夫打算干列宁没有干成的事,他提出让党的书记兼任地方苏维埃主席的建议,以此来对党的官僚进行“赎买”。“这个表面上看来无可非议的建议,其狡诈之处就在于,为了将其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37~338页。

付诸实施,只需党的书记干一件小事:通过选举这一关。于是1988年他便开始将国家党这头疑心很重的执拗的骆驼塞进政治民主化的针孔。”<sup>①</sup>戈尔巴乔夫的努力——坚持要求党参加竞选——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变化:党开始丧失对国家政治的干预能力,而戈尔巴乔夫自己获得了权力的安全保障。马特洛克指出,戈尔巴乔夫早就认识到阻碍他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根深蒂固的党的官僚机构。他若一如既往地坚持改革,并维持最低的工作安全系数,就需要创建一些替代性机构。新人代会的设计似乎就有这样的考虑:迫使顽固的党的官员们接受无记名投票,以此给他们带来压力。鉴于戈尔巴乔夫当时在民众中所享有的知名度,不管这种投票选举采取什么样的民主方式,他都会赢得新一届最高苏维埃主席之职。“这样,他就不会轻易像赫鲁晓夫那样被党内一小撮敌对集团所推翻。”<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目标达到了,苏联新的政治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建立起来了。但是苏联却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格拉乔夫指出,党的“非国家化”,使党的机关摆脱对国家机关活动的监督,这应当成为新阶段的格言。党在甩掉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的职能之后,成了毫无生气的官僚主义机构,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它应当还自己以政治运动的“活的灵魂”。“这位昔日的边疆区委书记、经验丰富的党的干部不会不明白,将苏维埃政权期间像暹罗双生子一样长在一起的党和国家分开无异于冒险,无论其中的党还是国家都经受不起这样的手术。因为除了党委以外,国内实际上再无其他的管理机构。”戈尔巴乔夫应当清楚,试图将这个“党—国家”改头换面,使之像手套一样里子朝外,开始的时候将其变成“国家—党”(戈尔巴乔夫在那个阶段明智地没有提起多党制),在不知为何称之为苏维埃政权长达数十年的一党专政之后,力求将实际权力交给虚无缥缈的苏维埃,这就无异于一头扎进问题的汪洋大海,那些问题当时尚无答案。此外,他有无现实的可能性,去“说服”党的官僚即便不是全部交出自己不受监督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80~181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52页。

的权力,那也同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分享权力,而且同意通过选举,哪怕事后使权力具有合法的基础呢?因为使机关离开发号施令的阵地、使凝固的官僚结构返回溶化开的状态,就无异于实际上既与斯大林的“圣剑骑士团”章程、也与列宁的“新型政党说”一刀两断,就无异于“离开布尔什维克投奔孟什维克,几乎回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感到自己与其欧洲兄弟有着亲缘关系的时代”<sup>①</sup>。

然而无论怎么说,对于喜欢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领导人打交道的戈尔巴乔夫来说,他终于可以摆脱“总书记先生”——在他看来其实含有极端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别扭称呼了。“主席”,代表了戈尔巴乔夫的新身份,也揭开了苏联政治生活的新一幕。“他当上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从此即可摆脱那个让他的‘律师良心’受到责备的、篡权的党的领导人的不合法身份。国家的政治日历不再以党的全会和代表大会召开日期来确定了,而是遵循他所复兴的议会的生活节奏……”<sup>②</sup>

## (二)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款

戈尔巴乔夫要重塑苏联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其带来的最关键的法律问题就是如何看待 1977 年宪法第六条。这一条的内容是:“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苏联共产党之存在是为了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决定着苏联的对外、对内政策,领导着苏联人民的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她为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具有按计划的有科学根据的特点。党的一切组织都在苏联宪法的范围内行动。”<sup>③</sup>尽管此时的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明确表态,但是随着苏联人民代表的民主选举以及代表大会的成立,新的政治权力机构已经形成。于是,修改宪法第六条的运动开始激烈展开了。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80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200 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13~214 页。

1989年5月25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萨哈罗夫在发言中提出要修改宪法。他说:“我建议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法令作为代表大会首先审议的一个议程项目。我们在经历一次革命,改革就是一次革命;而‘法令’是这种情况下最合适的字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专有权力就是通过苏联的诸项法律,任命最高的国家官员……据此应该修改苏联宪法中涉及苏联最高苏维埃权力的那些条款……”<sup>①</sup>

1989年10月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在电视讲话中说,应该严格区分国家和党的职能,使党摆脱对经济和其他过程的直接领导,苏共仍然是执政党,不过,它应当在法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行使这一职能,要通过被选进国家机关和在社会与经济组织中的共产党员,对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的活动施加影响。<sup>②</sup>

1989年11月30日,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通过一项必须就该共和国共产党的地位进行讨论的决议。并决定成立起草拉脱维亚共产党章程和纲领草案的工作小组。会议还就39名党员的呼吁书进行了讨论。这39名党员中有8名是该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他们在呼吁书中主张放弃“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切实际目标,放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他们还主张,拉脱维亚共产党应当成为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独立的党,并作为议会制拉脱维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放弃宪法保证的对权力的垄断地位。

1989年12月7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修改共和国宪法第六条的规定。原宪法第六条规定: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与指导力量,是苏联政治体制、国家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核心”。经修改后,这一条表述为:“政党、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根据立法程序规定的办法成立并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样,立陶宛就成为苏联各共和国中第一个修改宪法允许实行多党制的共和国。

1989年12月8日,《真理报》发表题为“关于苏共的先锋队作用”的社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23页。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90页。

论。社论说,当前争论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党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党同苏维埃、社会团体和运动的相互关系。这是具有原则意义的一整套问题,这些问题无疑值得公众广泛加以注意和进行全面讨论。应当十分清楚地说,不能死死抓住具体的表述形式不放。在个人崇拜和停滞时期形成和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正在成为过去。党的职能正在发生变化,党不再是行政命令体制的组成部分,而这种体制在国家的根本法中也有反映。很显然,在改革进程中,考虑到改革的教训和积累的经验,也需要仔细地为完善我国的宪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宪法的任何条款,以及第六条,便可能重新评价、更新,直到取消。<sup>①</sup>

1989年12月9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发表讲话。他强调,将同企图贬低党的作用、破坏党的威信的做法作坚决的斗争。在谈到修改宪法第六条的问题时,戈尔巴乔夫说,在已经开始的新宪法制定工作的范围内,任何一条都可以修改或取消。但政治改革的经验表明,宪法第六条本身并不妨碍实行自由选择。<sup>②</sup>

1989年12月12日,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参加大会的代表有2106人。大会的第一天就在会议的议程上发生激烈争论。会议一开始就有一些代表要求将讨论、修改宪法第六条列入会议议程。但是经过一整天的辩论,大会否决了几位代表提出的把“讨论、修改宪法第六条列入议程”的建议。

1990年1月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卢基扬诺夫在莫斯科会见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时说,苏共决定对宪法第六条“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进行修改”,主张放弃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通过同其他政党“自由竞争”来获得共产党的执政地位。<sup>③</sup>

1990年2月4日,“莫斯科选民协会”“莫斯科人民阵线”等非正式组织举行莫斯科20万人示威集会。会上的标语口号有:“要把多党制写进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6条”等。叶利钦在集会上发言说,苏共领导已经没有能

<sup>①</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15页。

<sup>②</sup> 同上,第216页。

<sup>③</sup> 同上,第226页。

力对苏共本身进行根本改革，因此，必须自上而下地彻底改革党的机构，取消宪法第六条，因为“权力不能垄断”。<sup>①</sup>

1990年2月5—7日，苏共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通过了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作了报告，阐述了苏共中央将向二十八大提出的纲领草案的主要内容。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强调了共产党本身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必要性，并正式提出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他说：“在一个正在更新的社会中，共产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的组织力量才可以存在并履行它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意味着它的地位不应该由宪法条款来确立。”经过三天激烈的争论后，中央委员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提案。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作出的决议，“为在苏联数十年来第一次实行政治多元化铺平了道路”<sup>②</sup>。马特洛克说：“这些提案完全是革命性的。如果这些提案能够得到落实的话，这些重大的改革步骤会创造一个完全独立于共产党的最高权威，共产党自身只有赢得选举才能继续掌权。我很清楚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提出这些提案。尽管他没有在公众场合如此讲过，但是正如叶利钦所指出的，共产党机关已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戈尔巴乔夫被迫抑制他的改革进程以免遭到没有同情心的中央委员会的驱逐。真正的选举的开始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创设，给他提供了一些赫鲁晓夫不可能得到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仍不够。如果由中央委员会选择的话，它会撤销戈尔巴乔夫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从而迫使他辞去国家元首的职务，因为他是共产党在人代会的代表。而总统有规定的任职期限，这样他就不会受到这种阴谋诡计的陷害。总统制的创设也为戈尔巴乔夫削弱共产党提供了一种动力，尽管他仍是共产党的总书记。”<sup>③</sup>格拉乔夫对此作出评价：“苏共中央举起了白旗。‘开始改革’的党，在戈尔巴乔夫的催促下自己提出关于修改大名鼎鼎的苏联宪法第六条措词的建议，第六条从法律上巩固了共产党作为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地位。一个月后召开的第二次人民代表大

①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36页。

② 法新社莫斯科1990年2月7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2月9日。

③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66~367页。

会,就只需‘满足’苏共关于‘根据本人的愿望’免去其苏联社会‘领导和指导力量’的‘职务’的‘请求’了。”<sup>①</sup>

1990年3月11—16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在没有经过激烈辩论后,全会决定将有关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作为立法倡议提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同时决定于今年7月2日举行苏共二十八大。戈尔巴乔夫后来说:“无论在中央全会上,还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认真的辩论,这一点很有意思。大家对我们就第六条所提出的修正案大体上都较满意,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合宜的妥协。”<sup>②</sup>对于中央全会出现的这种沉默现象,季诺维也夫指出:“很难说,在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人实行多党制、取代一党制的意图中,哪种成分更多一些:是普通的无知、弱智呢,还是早已深思熟虑确定要叛变性地摧毁苏联国家的基础。坚持消灭苏共对权力的某种垄断地位,就等同于某人开始坚持要取缔大脑管理机体神经系统的垄断地位,并且要用大量的、大脑的代用品来取代它——而这些代用品又是都原本就不存在的。”<sup>③</sup>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替代品就是总统制。

1990年3月12—15日,第三届(非常)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就实行总统制问题展开辩论。在13日对宪法作其他修改的表决结果显示,1771票赞成、164票反对、74票弃权。14日,人代会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该法对1977年宪法第六条作了如下修改:“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青年团、社会团体和公众运动,通过他们的当选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以及其他方式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并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同时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一切政党“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不允许建立以使用暴力改变苏联宪法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完整性、破坏国家安全和挑起社会、民族和宗教纠纷为宗旨的政党、团体与运动和开展活动”。对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6页。

<sup>③</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2~23页。

于会议结果,戈尔巴乔夫说,修改宪法第六条和设立总统职位是“有利于民主和捍卫民主的重大步骤”。外电评论: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清除了政治局内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的政治家,使议会变为一支能与苏共抗衡的力量。他还迫使党的领导人在竞选中面对选民,最终于上月作出放弃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的“历史性决定”,从而为多党制开辟了道路。<sup>①</sup>

取消宪法第六条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对于苏联共产党来说:“作为各级地方政权的苏维埃,无人领导、无人照管,被弃置而任其自流,被放任而随其妄为,遭人侮辱。一方面,它们遭到严厉的非难;另一方面,也得不到任何支持。如果以前党组织是它们的支柱,那么在取消苏联宪法的第六款之后,它们也就失去了这个支柱。”<sup>②</sup>

### (三)不能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

戈尔巴乔夫认为,要想使政权从苏联共产党手中平稳地转交给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包括其常设机构最高苏维埃),就必须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保证党内保守力量不使用武力来挽救党即将失去的政治权力。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就是他作为总书记的最大职责。不能使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成为戈尔巴乔夫的重要政治原则。“我生平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sup>③</sup>马特洛克对此作出评价:“实际上,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不是把使用武力放在优先地位,而是把它作为最后手段的俄罗斯领导人。”<sup>④</sup>

不使用武力原则的形成,戈尔巴乔夫主要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的:

首先,这是反思苏共历史的结论。不使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首先来源于戈尔巴乔夫及其亲密“战友”——雅科夫列夫对苏联共产党历史的反

<sup>①</sup>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90年3月13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3月15日。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12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55页。

<sup>④</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68页。

思。雅科夫列夫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超恐怖的革命。在各种不同的革命者中，首先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不少人笃信暴力和它的净化能力；也有不少人想直接学习雅各宾党人的经验，认为重复 1793 年的做法将会是救国救民的好事。他们以恐怖的手段取缔了不同政见，残酷无情地砍光了旧制度的载体——地主、商人、资本家、神职人员、军官和一切可疑分子。为了这些罪行，为了失控的革命蛮干的无道德行为，不得不付出难以置信的沉重代价。但也有另外一面。许多道德情操高尚的纯洁的人们曾经真诚地相信确实非常有必要摧毁旧制度，相信眼下这场革命是符合道德的。他们相信革命的建设性本质，而且相信很快就将建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因而不加太多的思索就将当前发生的一切理想主义化了。”<sup>①</sup>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认为，斯大林以来建立的极权制度和体制滥用了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崇高理想的信念，用这些信念进行了投机。人民政权、平等、公正、对美好未来的允诺，所有这些都被用来保持和巩固极权主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他接受诺贝尔奖时做的演讲中准确地道出了这些方法的实质：“……暴力只能用谎言来掩盖，而谎言只能用暴力来维持。任何一个人一旦宣布把暴力作为自己的手段，他就确定不移地要把说谎奉为自己的行事准则。”<sup>②</sup>

特别是对苏共用来维持统治而实施“红色恐怖”的利器——克格勃，戈尔巴乔夫亲自任命的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巴卡京对其进行了思想上的剖析。巴卡京指出：“克格勃自古以来首先是一个政治侦查机构。不搞政治侦查，克格勃就不会成其为克格勃了。”<sup>③</sup>克格勃在苏联体制中的无限权力首先是由这一点确定的：它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破坏法律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然而当破坏法律的是国家的时候，这种看法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当经常、秘密地破坏法律的时候，当伪善地、理直气壮地扯谎，大谈什么对于“肃反工作人员”来说，法律是神圣的时候，这种看法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主要的是在基本人权和人的自由这方面破坏法律。“几十年来苏联宪法上——无

<sup>①</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 年，第 48 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31 页。

<sup>③</sup>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 年，第 114 页。

论是斯大林的宪法,还是勃列日涅夫的宪法——都写着公民的种种权利: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然而实际上公民都没有其中的任何一项权利,而且正是克格勃专门监视着,让这些自由永远不能实现。”<sup>①</sup>

在巴卡京看来,十月革命后建立的镇压体系,从它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起,就包含有迅速发展起来的为所欲为和不道德的萌芽,而这些因素又以革命的坚定性逐渐固定了下来。虽然“全俄肃反委员会”于1917年12月最初成立的时候是为了与阴谋破坏和土匪活动作斗争,然而很快它的职权就扩展为“肃清反革命”了,而“反革命”的含意是极广的。为合法地保卫革命、针对革命现实敌人的阴谋而举起的利剑,结果竟举到了全社会的头上。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们把阶级斗争——一种“布尔什维克的雅各宾主义”——提高到首要地位,把作为政权工具的国家的意义绝对化了,在国家中给惩罚工具指定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机构好似天罗地网布满全国,控制了一切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机关。“经党准许,全俄肃反委员会随心所欲地进行逮捕、侦查、作出判决并执行判决、大规模枪杀‘人质’,把恐怖和不法行为提高到了国策的高度。”<sup>②</sup>于是,“学会了适应这个制度而且是由这个制度教育出来的人民,他们的心理已经被扭曲了,变得极不正常了,在这种心理中,主要的是过去的悲剧和现在的悲剧。这由契卡主义产生的主要罪恶是谎言和暴力的思想体系”<sup>③</sup>。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改革就是要建立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就是要给人们信心:令人恐怖的“红色之剑”不会再降落在人们的头上了。巴卡京指出,在毫无选择余地的基础上选举出来、总是不假思索地一致通过党组织的最高苏维埃,已经成为过去,让位给真正选举出来的立法机构。这些立法机构虽然还不能完全反映千变万化的社会情绪,但总算向民主社会迈出了不大的第一步。确认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苏联宪法第六条已经被人忘却,虽说共产党还不急于放弃自己的地位。在苏联和许多共和国里开始确立

<sup>①</sup>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09页。

<sup>②</sup> 同上,第16页。

<sup>③</sup> 同上,第26页。

总统管理的形式,建立了宪法监督机构。但是改革之风却绕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从一旁吹了过去。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仍然是以前的“党的惩罚之剑”。不过这把“剑”已经在剑鞘内生锈了。像从前那样使用它是很危险的。“委员会本身的基层小组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思想,当局却没有工夫去管它们。结果是消极怠工,迷失路途,失去方向,不满,瓦解……”<sup>①</sup>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指出,斯大林从20世纪30年代起建立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专横官僚主义体制”,是“极权官僚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扭曲。它导致政治上的个人迷信、专横独裁,经济上停滞、思想上僵化,形成一套对社会发展的障碍机制,使国家陷入危机。因此,必须“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建设一个“自由公民的社会”和“法制国家”。<sup>②</sup>

其次,这是内外政策的理念展现。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提出“新思维”,就是表明苏联的立场是要把全人类利益放在首位,而不仅仅是其过去所宣扬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因此,作为这一新的政治立场的政策延伸,戈尔巴乔夫要求在对外政策中放弃以武力对抗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实力政治原则,通过对话、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说:“对抗思维、对抗政治‘文化’是‘铁幕’双方大家都有的。但是我们清楚,很多事情是取决于我们的。在对抗年代,我们苏联以自己的核威力和自己的一些行动不仅在西方的官方圈子里,而且也在广大的社会舆论界引起了不信任。必须首先改变在实际事务中和对其他国家关系中的行为。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还是寻找崭新的对外政策概念,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整个政策的新的原则和范畴。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新思维——对世界事务采取新态度的哲学和方法论。”<sup>③</sup>作为新思维的对外政策体现,1989年5月30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内外政策的基本原则的报告。他提出苏联外交政策的五项基本原则:一是在国际关系中实现非军事化、民主化和人道主义的原则;二是通过谈判销毁核武器,使裁军和国防能力削减到合理足够水平;三

<sup>①</sup>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339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83~84页。

是不许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来达到政治、经济或其他目的，国与国之间应遵守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四是不以对抗，而以对话和谈判来确定利益平衡，以此作为处理国际问题和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五是在互利和平等的基础上使苏联的经济加入世界经济的行列，积极参加现代国际分工、科技交流和国际贸易，遵守有关规则。<sup>①</sup>

不过，既然苏联主张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中放弃使用武力，那么，在国内又该如何体现政治的“新思维”呢？格拉乔夫就指出，戈尔巴乔夫在其联合国演说中作为未来世界公理提出的诸多新思维的原则，首先是其中的放弃使用武力原则，正在摇摇欲坠的苏联帝国的广阔疆土上受到极其艰难的考验。那些发生在第比利斯、卡拉巴赫、巴库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愈来愈难以说成是零零星星的事件，使戈尔巴乔夫面临一个不愉快的问题：“新政治思维是否适用于内政？如果不适用，那么运用其公理——从‘选择自由’到‘不使用武力’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sup>②</sup>戈尔巴乔夫对此的回答是：在国内政治矛盾时不使用武力。正如马特洛克所言，戈尔巴乔夫“要想使改革获得成功，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关键，因此我坚信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将继续强调保持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合作关系。这就意味着，如果东欧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不可能使用武力来镇压，那样只会牺牲他的国内政策，甚至是他的政治生命。”<sup>③</sup>

再次，这是改革形象的政治保证。把“新思维”作为改革的政治理念，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不仅是他对苏联政治的贡献，也是对世界政治的贡献。与“公开性”“民主化”一起，“新思维”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标签。作为自认为有别于苏共前几任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来说，维护改革的形象，其实就是维护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生命。就像马特洛克观察到的那样，波罗的海三国的自治运动得到了当地共产党的广泛支持。这显然使戈尔巴乔夫处于困境。“如果他允许地方共产党支持自治乃至最终导致独立的要求，不就等于

<sup>①</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17页。

让它们脱离党在莫斯科的权威机构而自行其是吗？如果他坚持各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必须服从莫斯科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那他的改革与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政策又有什么两样呢？”<sup>①</sup>戈尔巴乔夫决心树立新的改革形象。那么在政治实践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形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就像他所主张的那样，就是自由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简单来说，就是党不要去干涉！更不能用武力去阻止！

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洪流中雪崩式垮台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仍然坚持这是东欧人民自己作出的选择，苏联绝对不会像历史上那样出兵干涉。对戈尔巴乔夫来说，1956年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是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促因。“对于我来说，‘布拉格之春’更多的是人道方面的悲剧，而不是政治方面的。”<sup>②</sup>在谈起这件往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说：“一般说来，匈牙利人特别尊重本国历史，这是一种神圣的情感。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特有的鲜明的民族主义都起源于这种情愫。理解并考虑到匈牙利人的民族主义，对于正确建立与该国的关系，正确理解该国所发生诸多进程的实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谁对这些因素估计不足，谁就会最后错打算盘，这样的历史实例多得举不胜举。我们在1956年曾有过一次惨痛的教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我们自身的错误造成的，是因为轻视了匈牙利人民的感情和传统而受到的惩罚。”<sup>③</sup>他在接受斯拉文采访时说，在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按照苏共政治传统，他的理解与党保持高度一致：这可能是我们的阶级敌人的“暗中破坏”。公开战胜我们无望后决定尝试着从内部搞动作，通过意识形态的腐化作用。“1969年访问布拉格之前，我始终这样认为。”<sup>④</sup>但是在戈尔巴乔夫亲自到布拉格访问的时候，他认为他一贯坚持的党的“正确”看法却发生了变化。他说：“当时我们在尼古拉·佩特罗维切夫的领导下试图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同我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sup>②④</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8页。

<sup>③</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们的青年组织建立联系。那时,我看到了普通人对五国行为的态度。当我们来到波尔诺工厂时,工人们都背过身去,不想与我们谈话。我觉得自己像在传染病房里一样。我当时想,不应该这样。正是 1968 年以后苏联开始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运动。这些都促使人们思考,令人难忘,后来这些东西都起作用了。”<sup>①</sup>

显然,在后来他推行改革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起作用了”。面对社会纷涌的各种非正式组织狂妄的政治要求,戈尔巴乔夫不断呼吁甚至压制不要动用武力而要用谈话方式解决。1989 年 9 月 29 日,戈尔巴乔夫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他呼吁共产党同各种政治组织进行对话。他说:共产党必须仍然是苏联社会的先锋队,但是共产党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用武力取得公众对“公开性”改革计划的支持,“要么我们承认其他人拥有独立思想和行动的权力,并从事各种活动赢得公众舆论和公众同情,要么我们就一边声称起领导作用,一边成为一个被孤立的组织”。他还强调:“尽管某些新的政治组织利用比较自由的政治气候谋求共产党的瓦解,但决不能用武力来制止他们。”<sup>②</sup>然而不论是戈尔巴乔夫政治上天真也好还是出于政治策略考虑,格拉乔夫却指出了戈尔巴乔夫这种做法带来的最大政治后果就是:苏共丧失威信!他说:“总书记以为不仅他自己、而且全党都能够适应新的政治土壤的希望,不久即化为泡影。残留的党的大树,如同加尔洵小说中那棵不幸地冲破暖房的屋顶以便呼吸新鲜空气、完全暴露在严寒之中的棕榈树一样,无法适应开放政治,开始发黄枯萎。戈尔巴乔夫依然给树培土、浇水,只是后来他承认说:‘人们一旦明白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不再通过暴力来加强,党立刻威信扫地。’”<sup>③</sup>

最后,这是国内政治现实的妥协。随着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召开以及随之而来的猛烈的政治改革进程,使已经出现的反苏、反共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并在思想、舆论和组织上提出了废除宪法第六条,取消苏共法定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第 9 页。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 年,第 188 页。

<sup>③</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200 页。

领导地位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行动。在这种反共浪潮纷涌的政治危机时刻，戈尔巴乔夫仍然坚持采用对话的手段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

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脱离苏共的举动为例。1989年12月19—22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经过激烈辩论，大会通过决议，宣布独立，脱离苏共。决议说，立陶宛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党纲和党章的政治组织，它与苏共保持平等的伙伴关系”。<sup>①</sup> 1989年12月25—26日，苏共中央举行非例行全会，讨论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决议说，完全赞同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对此事所作的评价和结论：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从组织上和政治上脱离苏共的决定，是非法的。全会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中央工作小组，前往立陶宛，同当地党员、党组织和劳动集体代表举行会见，然后中央再举行会议，作出相应的决定。1990年1月3日，戈尔巴乔夫、麦德韦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同立陶宛党的19名政治局委员进行会谈，劝说他们改变两周前作出的立共脱离苏共的决定，但会谈没有得到成果。不过，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他们不会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sup>②</sup> 1990年1月11—13日，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共产党决定脱离苏共、立陶宛要求脱离苏联等问题进行调查和劝说工作。但是戈尔巴乔夫承认，他的立陶宛之行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他也不想采用强力手段来解决与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分歧。

面对叶利钦在政治上的咄咄逼人，戈尔巴乔夫也曾尝试过使用内务部的力量进行阻止。但是却遭到“民主俄罗斯”的强力反对。作为对戈尔巴乔夫的反抗，“民主俄罗斯”号召1991年3月28日在莫斯科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因为这一天将召开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叶利钦是否适合继续担任主席一职。据克留奇科夫回忆，当时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似乎很恐慌。莫斯科市当局拒绝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于是戈尔巴乔夫便颁布了一道总统令，命令莫斯科市内和附近州的警察听从苏联内务部的指挥，并且命令军队进入莫斯科，加强警察对市中心的保卫。但是共有十多万人不顾官方不准游行的警告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时，他们都很平静，大部分士兵的态度也比

<sup>①</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19~220页。

<sup>②</sup> 同上，第225页。

较温和。许多士兵还亲切地同示威者交谈。”<sup>①</sup>当政府希望清场的时候,他们动用的是警察而不是军队。军队于3月29日撤走了。戈尔巴乔夫失败的意识根源就在于以“民主俄罗斯”为代表的反共力量成功地培养了社会对苏共的“恐惧感”。“培养恐惧是改革纲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目的,使用了一切可能的名目:1937年的镇压、饥饿、经济短缺、技术事故、犯罪、艾滋病、生态危险、各民族间的战争和警察暴力。同时,把每一个名目中的恐惧形象,利用国家宣传机器的所有工具以及‘独立’电视台,以难以置信的力量向大众意识灌输。”<sup>②</sup>于是,激愤的人群走上了街头。

甚至在最后挽救苏联的新联盟条约时,面对各共和国领导的集体反对,戈尔巴乔夫既不愿也不能动用军队来逼迫各共和国通过并签署新联盟条约。在同斯拉文的谈话时,斯拉文问:“当时应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说:“当时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各共和国已给自己的代表下了指示,所以他们不会到莫斯科来的。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依靠某一部分军队,就会出现流血和国内战争。”斯拉文又问:“那么您当时是否控制着军队呢?”戈尔巴乔夫回答:“没有。应该说,当时在所有同联盟有关的原则性问题上,我们都征求叶利钦的意见。各共和国有的这样的要求:在新联盟条约通过之前,中央的所有行动都要同俄罗斯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我请求军队的帮助,很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从另一方面来讲,当时这样做会被看作是抓住权力不放的表现。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幻想。”<sup>③</sup>

那么,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政治主张呢?戈尔巴乔夫进行了自我辩解。他说:

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一种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在于他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581页。

<sup>②</sup>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72~73页。

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了。这被看做是软弱的表现,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的确,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可以易手了,从人民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推选的另一部分人手里。实际上,联盟协议签署后我是打算这样移交权力的。遗憾的是,由于八月和十二月的阴谋造成的结果,这种可能被破坏了。从那时起,俄罗斯再也无法回到政治稳定的轨道上了。此后一连串的动乱一直使俄罗斯不得安宁。我们未能完成的任务只能由下一代政治家们来完成了。<sup>①</sup>

## 二、苏维埃制度改革: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思路中,建立法制国家,就是要求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政治组织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法律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而这种权力赋予的主体就是人民。于是,戈尔巴乔夫决定在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建立苏联政治生活的全新的权力中心——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召开。戈尔巴乔夫在题为“关于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占中心地位。”他指出:“我们的国家是作为工人阶级专政的工具诞生的,而在60年代就得出了我国在逐步转变为全民国家的结论。但是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政治发展过程的内涵,就越显而易见地有必要使我们的国家制度达到全民性这个概念的最广的外延……在政治制度的各个基本

---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54~455页。

环节之间,目的是在党和国家之间正确地分配权限在这里具有原则性意义。”<sup>①</sup>

1988年10月22日,《真理报》公布苏联宪法修正草案,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法律基础。草案规定,苏联将建立新的国家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其特殊权利是:通过宪法和修改宪法,就苏联的组成和苏联的民族行政区划问题作出决定,确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基本方针,选举和任命国家某些最高职务等。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举产生最高苏维埃——国家权力的常设立法、管理和监督机构,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须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此外,它不行使“国家集体元首”的职能。还规定,设立新的国家职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主席由人民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并首次规定,建立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苏联宪法和法律与各加盟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否一致,全苏政府的决议和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决议是否一致;它有权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部长会议提出取消下属机关或负责人发布的同苏联宪法或法律相矛盾的法令。

1988年10月23日,《真理报》公布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草案。其主要原则是:保证选举的民主性和挑选候选人的竞争原则。这包括不受限制地提出候选人,广泛和自由地讨论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严格遵守程序等。<sup>②</sup>

1989年初,苏联人民代表选举运动正式开始。1989年3月26日,全苏各地进行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苏联国家预算共拨出1.56亿卢布作为全国的竞选费用,每选一名苏联人民代表平均约需6万卢布,全国共设有18万个投票站。<sup>③</sup>

1989年4月4日,苏共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结果。各选区的选举是在3月26日进行的,各社会团体的选举是在前两个星期进行的。在2250个代表名额中,已选出1958名人民代表。其余的人民代表将重新选举。在当选者中,妇女占17.1%,工人占18.6%,集体农民占

<sup>①</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96页。

<sup>②</sup> 同上,第113页。

<sup>③</sup> 同上,第145页。

11.2%。当选者中的苏共党员比例为87.6%。居住在苏联的60个民族的公民被选入国家最高政权机关。<sup>①</sup>

1989年4月27日，戈尔巴乔夫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碰头会，再次商讨关于政治改革的方案。戈尔巴乔夫回忆，这次讨论可不是起草发言稿的事，而是应当提出建立新政权的构想，也不是简单地着手准备一份像过去那种干巴巴的由“守纪律的代表们”一致通过的法律草案。“我们从一开始就会遇到强硬的反对派，他们因这次选举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而精神大振，并急切地要投入战斗。而大多数代表会怎样行动，还不完全清楚。我已经不记得，是谁首先说过这样的话，但大家都很支持这个说法。他说：从今往后，决定国家生活的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人民代表的代表大会，而不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是一次急转弯，一次真正的大转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逐步取代旧的政权体制以及这一政权的各种象征性的标志。”<sup>②</sup>

从1989年5月至1991年9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总共召开了五届会议就结束了它的政治使命——重建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但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却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分裂和混乱。最终，这一苏联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一纸决议不仅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且亲身参加了把自己赖以为基的政治载体——苏联——送入坟墓的政治大狂欢中。

苏联人民代表瓦连京·拉斯普京深刻描述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实际情况。他说：

作为一名“人民当政机构”的代表，历次代表大会，甚至每一次会议，我都从来没有缺席过，因此有权多说几句：那真是一种魔鬼的智慧啊！它所“创造”出来这个东西，把已经白热化的氛围炒作得更加炽热了。不过，这种白热化气氛当时仅存在于大城市和民族边疆地区，而1989年5—6月间对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两个星期转播，却把仇恨的种子撒遍了每一个角落。“革命者”对此作了精心策划，并有精确分工。

<sup>①</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47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

不排除大会开幕前一个半月发生的第比利斯事件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它正好安排在这个时间。否则怎么会这么巧,恰好给肆无忌惮地向联盟政权展开进攻提供炮弹呢?这一来全国都可以看到当局有多么软弱,它正在退让。代表大会开幕前是第比利斯事件,而闭幕之后,就在6月份,又发生了血洗费尔干纳事件。1990年1月,巴库再次出现更恐怖的血腥屠杀。而且,紧随从“人民监狱”里跑出来的自发暴徒之后,维尔纽斯又发生了电视塔挑衅事件,还动用了武器,出了人命。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血腥事件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谁都知道,血总是越搅越腥的。

代表大会各次会议上出现的野蛮行径简直难以名状。为了让非正义事业取得胜利,不仅要求不讲道德,不知羞耻,还要不顾一切。什么民主!什么文明讨论!那些家伙像划分战斗队似的按地区划分小组,在没有遭遇到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受到初战告捷的鼓舞,在国内外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的支持下,经常用打冲锋的办法来抢话筒,对与会代表横加谩骂,而且讲的话常常根本不是冲着人去的,而是冲着电视镜头,更不许别人开口。只要见到谁对他们构成威胁,谁能阻拦他们的那种破坏的杀气,比如像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罗季奥诺夫上将等,他们就会像一群疯狗似的扑上去,刻意罗织罪名,提供伪证,以最无耻的手段制造事端,布置心理攻势。

而且,所有的一切立刻就会被各地所效仿,并以同样的方式传入政权机关。

最后,政权终于被夺走了,那些人成了俄罗斯的主子。<sup>①</sup>

### (一)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1989年5月25日—6月9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在此次当选的苏联人民代表中,1702名代表受过高等教育或高校肄业。528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3页。

名代表受过普通中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152 名代表是工业联合公司和企业的领导人,192 名代表是集体农庄、农场和农工联合体的领导人,237 名党的工作者,10 名代表是军人,7 名宗教人士。对这些代表,博尔金评价说:“一群与众不同的人汇集到一起,这里有质朴的先进生产者,他们只会埋头工作而不善言辞;有从事经营管理的党的工作者,他们也不是‘西塞罗’,早已忘记如何热情地、恳切地和尖锐地与人谈话;还有一群新型代表——讲坛代表,他们能言善辩,具有高超的演说艺术和不错的理论修养……他们是科学工作者、作家、新闻工作者、法律工作者。总之,这是一群受过教育的而又善于雄辩的人。”<sup>①</sup>

5月25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首届最高苏维埃主席。投票的情况是:2123票赞成,87票反对,11票弃权。戈尔巴乔夫在投票前作了发言,他承认改革中有重大失误,认为目前是改革的最困难时期,应学习民主,通过对话,使苏联社会团结到改革这个大目标上来。他在谈到四月的第比利斯事件时说,军队应干自己分内的事。戈尔巴乔夫在当选后表示,将同代表们一起促进改革,发扬民主和“公开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在解决迫切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5月27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从2250名代表中选出542名最高苏维埃代表,其中联盟院和民族院各271名。叶利钦本已落选,但当选的西伯利亚代表卡赞尼夫主动让位,经代表同意,29日破格递补叶利钦为最高苏维埃代表。根据1988年《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规定,最高苏维埃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每年举行两次会议,每次会议通常持续三四个月,它有权任命部长会议主席和政府组成,批准苏联法律。“人们认为,它相当西方国家的议会。”<sup>②</sup>

5月29日,大会选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基扬诺夫为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叶利钦递补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宪法委员会,雷日科夫再次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代表大会通过苏联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24~325页。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57页。

内外政策基本方针的决议。

5月30日,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作关于内外政策的基本原则的报告。他提出苏联外交政策的五项基本原则:一是在国际关系中实现非军事化、民主化和人道主义的原则;二是通过谈判销毁核武器,使裁军和国防能力削减到合理足够水平;三是不许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来达到政治、经济或其他目的,国与国之间应遵守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四是不以对抗,而以对话和谈判来确定利益平衡,以此作为处理国际问题和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五是在互利和平等的基础上使苏联的经济加入世界经济的行列,积极参加现代国际分工、科技交流和国际贸易,遵守有关规则。<sup>①</sup>

6月1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1939年签订的苏德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进行调查,以便作出政治和法律评价。

6月9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发表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致世界各国人民呼吁书。文件说:“必须首先用政治手段并依靠联合国的威望和能力来确保苏维埃国家的安全,因为它是非军事化、民主化和国际关系人道化进程中普遍的和同等的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态度。今天,我们向世界开放,愿意同那些认为人的生活和尊严是最崇高的价值的一切人进行合作,并指望得到相互理解。”<sup>②</sup>

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给苏联政治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

首先,代表大会显示苏联的政治权力中心开始转移。马特洛克认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俄罗斯自1918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代表议会”<sup>③</sup>,“这里召开的大会却不是共产党的大会,实际是要召开一次制宪大会,是一个负责为苏联创建一套全新体制的新机构”<sup>④</sup>。在戈尔巴乔夫的协助下,工人和自命不凡的政治家们动摇了运转良好的苏联共产党机器对权力的牢固控制。而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事实表明:总书记打算在党之外组成另一套国家政治权力中心。早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sup>①</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

<sup>②</sup> 同上,第159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33页。

<sup>④</sup> 同上,第235页。

召开之前,戈尔巴乔夫就为自己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提前开始活动。因为这一地位能够赋予他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声望。而且“在权力转移到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属于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成为全国权力系统中的关键职位”<sup>①</sup>。在 1989 年 5 月 22 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应该经代表大会批准的最高国家职务的候选人:即他本人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并兼任总书记。

5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以 2123 票赞成票当选为首届最高苏维埃主席。在开幕当日,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导演、人民代表尚格拉亚提出了 4 月 9 日第比利斯事件的问题,建议看一看反映这一悲剧事件的电视片。最后他把这一切责任推到了罗吉奥诺夫将军身上。最后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第比利斯事件。雷日科夫指出,1989 年 4 月 9 日的第比利斯悲剧事件已经过去不少年,“许多俄罗斯政治家认为,第比利斯就好比是一个一心想破坏中央和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威信、涣散部队军心的人们制定策略的演练场”<sup>②</sup>。

其次,代表大会显示了人民对苏共的态度发生变化。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采取实况转播的方式向苏联人民公开大会的真实情况。“在 20 世纪,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事件,因为这一事件在国人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代表大会立刻就不像其组织者设想的那样进行了。”<sup>③</sup>然而苏联人民看到了什么呢?格拉乔夫说:“围在电视机前的全国上下被前所未有的场面震惊不已:代表大会开幕前,党的‘天人和神’,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很不习惯地手忙脚乱地寻找自己座位,他们的座位已在会场上其他代表中间,而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舞台上的主席团里,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当初就是作为国家和党的隆重庆祝仪式恒久不变的布景而设计和兴建的。”<sup>④</sup>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22 页。

<sup>②</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73 页。

<sup>③</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23 页。

<sup>④</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213 页。

苏联人民还看到了更为可怕的事实：原来在公开场合是可以批评党的。“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激烈斗争，几乎动起手来。发言中充满侮辱性的语言，对党、党的机关、军队、克格勃都展开了攻击。干部特权是一个特殊的话题，许多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不正确的，但没有人对批评作出回答。”<sup>①</sup>切尔尼亞耶夫指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极大地推进了政权“习惯性威信”的进一步瓦解。这从大会的最初几天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只需看一看政治局委员不是坐在主席团的位置上，而是坐在大厅之中就够了。几千名代表正以嘲弄的眼光看望着他们，而电视观众还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们遭到了粗鲁的斥责，有时也可怜兮兮地作些答辩。在历次中央全会上，甚至是这一时期的最近几次全会上，以及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每当戈尔巴乔夫和“非选举产生的”主席团成员步入大厅时，总是全体起立，甚至为之鼓掌。而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当戈尔巴乔夫总是从右边那扇门出来的时候，多数人甚至连头也不转。过去常常是全场肃静，屏住呼吸，为的是瞧一瞧从这扇门走出来“面向人民”的人，“算计一下”谁走在谁的后面。在会议休息时，他在走廊里踱步，周围也有一些人，而其余的人照样散步，甚至不看他一眼。好像这是正常现象，根本无须聆听“头号人物”的每一句话。切尔尼亞耶夫写道：“在他放弃了标志性的权威之后，还能不能保住哪怕是他职务上的尊重？……在古罗斯，人们曾是忘恩负义和健忘的……而在形式、规章和制度全部崩溃的‘时代’，人们简直对一切权力都怀有复仇泄愤的心理。”<sup>②</sup>

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针对苏共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包括严肃指控，乃至号召“复仇”，号召要把国家从“苏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博尔金指出，代表们的发言中当然也包含着公正的批评，揭露出党的活动在社会上造成的某些实际问题，常常可以感觉到发言者流露出来的公民政治的不成熟性。但也的确有一些完全成熟的、精心策划的行动，其目的就是破坏党的威信。而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它同国家早已深深地一体化，因此很自然，一切胜利属于它，一切缺点错误也属于它。

①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26页。

② [俄]阿·切尔尼亞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50页。

唯其如此，破坏党的威信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那些策划这一切的人知道，要想改变政权和社会制度，就必须首先部分或全部斩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因为这是国家的生命线。卑鄙无耻的谎言到处泛滥，谎言把原苏联3亿百姓中的许多人骗成了傻瓜。不少人起初孩子般天真地以为，只要一取缔共产党，生活就会大变样，变得更好了，更纯洁，更人道，更公正，当然也更富有……”<sup>①</sup>利加乔夫也敏锐地觉察到：“一些人的发言中首先暴露出党和苏维埃的对立——党和苏维埃谁高？我听了这些发言后立刻明白，社会发展的某个新阶段正在开始。这个新阶段对国家和人民都不是什么好的预兆。格德良的攻击出现在新阶段来临之前；准备进攻苏共，打算掀起反共运动。”<sup>②</sup>

代表大会上的论证书实：相当一部分居民早在选举期间就不支持党了。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而苏共中央对此却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此外，人民代表大会扩大了苏共与全体居民之间的裂痕，鼓舞了那些曾对政治斗争漠不关心的人。第一次代表大会表明：“中央委员会及其机关对新的政治争论和斗争的形式与方法也没有做好准备，从而动摇了共产党员对领导人捍卫党的原则和思想的能力的信心。最后，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果证实了一个痛苦的事实——政治局和总书记没有威信，他们没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动员党的力量去实现既定目标。”<sup>③</sup>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那些代表着戈尔巴乔夫的希望的党的人民代表，“意识到他们的当选应当归功于自己和自己的选民，而不应归功于批准未来人民代表名单的中央组织部，便开始分别走向两个完全对立的营垒：有些人听命于遗传密码，投奔传统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正统观念的维护者，另一些人由于自己的总书记没有作出关于联姻的表示，加入了‘怒气冲冲的’激进民主派的行列”<sup>④</sup>。

最后，代表大会显示了苏联政治生活的分裂与混乱。就在代表大会开展工作的最初几个小时和最初几天里，已经在国家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5月与6月，所有的电视机和收音机全都打开了，所有人都在收听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313页。

<sup>②</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93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34页。

<sup>④</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00页。

与收看代表大会的实况转播。过去很少有人知晓的代表当选者,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变成了声震全国的名人,国人不但眼熟其“面目”,而且耳详其声音。“电视破除了党的权力之‘神圣秘密’,产生了进行比较与评价,表示赞同与反对的可能与机会。代表大会实况转播成为空前未有的社会政治化的催化剂。人们变化速度之快超乎想象。代表大会第一次为各共和国与各民族表达观点和信念提供了一个全联盟的讲台。”<sup>①</sup>苏联的政治生活开始分裂了。波波夫宣布成立“跨地区议员团”,这实质上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内部的一个政治反对派,一个“反对派力量领导中心”<sup>②</sup>。无疑,“苏联出现正式的政治反对派是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另一成果”<sup>③</sup>。

在格拉乔夫看来,人民代表大会造成了苏联政治生活在事实上的分裂,使戈尔巴乔夫面临着更加巨大的政治挑战。他指出,1988年秋天在更换当时领导成员的位置时,戈尔巴乔夫还以为这是根据国内新的形势对最高权力机构进行的改造。看来他并未意识到实际上这是在洗同一副牌。这样就使自己的选择受到局限,不仅是选择干部,而且是选择继续改革的政治方案,从而也缩小了纵横捭阖的余地。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囿于习惯的人的圈子和老办法的框框,在与党内保守派进行战斗的同时,并未马上完全意识到,在他的倡议下进行的苏联历史上第一次议会选举大大扩展了国内政治斗争的战场,而且从此他势必同新的伙伴、对手和反对者打交道。随着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民主反对派的出现,改革的后方也开辟了新的战场。从此不能再说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了:“群众创造”的篝火熊熊燃烧,升腾的火焰大有将点燃篝火者燎伤之势。<sup>④</sup>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之后,改革开始滑坡,而且呈现不可逆转的形势,“它的标志完全是破坏性的”<sup>⑤</sup>。雷日科夫在其后召开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说:“代表们纷纷涌到讲台上去,提出他们的纲领、计划、建议和指责,但政治

<sup>①③</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25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26页。

<sup>④</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04页。

<sup>⑤</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52页。

局却被孤立地撇在一边,好像它患了某种瘫痪症似的。”他警告说:“一股真正的和强大的力量已经崛起,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我们不能认真应付这种局面。如果党无法摆脱这种局面,它就有可能失去管理政府的能力。”<sup>①</sup>

## (二) 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1989年12月12日,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参加大会的代表有2106人。大会的主要议程是:①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经济健康化的措施、经济改革阶段和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原则纲领;②关于修改宪法有关选举制度的条款的法律;③关于苏联人民代表的地位和人大议事程序的法律文件草案;④关于苏联宪法监督法案和选举监督委员会;⑤关于加强同犯罪团伙作斗争;⑥第一届人代会成立的几个专题调查评价委员会的报告。大会的第一天就在会议的议程上发生激烈争论。会议一开始就有一些代表要求将讨论、修改宪法第六条列入会议议程。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的代表反对将宪法监督法和选举宪法监督委员会列入大会议程。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代表要求将各自对对方的指控列入大会议程。经过一整天的辩论,大会否决了几位代表提出的把“讨论、修改宪法第六条列入议程”的建议,否决了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的代表关于“反对把通过宪法监督法和选举委员会列入议程”的建议,否决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代表要求把“各自对对方的指控列入议程”的建议。

12月13日,雷日科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经济改革基本阶段和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原则性立场的报告。这一报告遭到叶利钦在15日的分组讨论会上的猛烈抨击。叶利钦断言雷日科夫的报告是“治标办法、犹豫不决、妥协、在机关和社会的利益之间搞平衡”,会使改革倒退。叶利钦的发言没有得到多数代表的同意。

12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监督法时说,今天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必须使苏联社会成为“更公正的、更人道的、

<sup>①</sup> 美联社莫斯科1989年8月5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9年8月10日。

更民主的社会”。针对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宣布独立，脱离苏共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强调说，我们仍然忠于列宁关于各民族自决权的观念，民族自决是组成联盟的基础。“我们处在一个联盟中并实行合作，就能够用新的内容充实联邦制，从而走上政治和经济主权，给文化、语言等提供广阔天地。但是这将是另一种联盟，另一种关系。”<sup>①</sup>

12月2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听取有关4月第比利斯流血事件的调查报告。人民代表索布恰克代表最高苏维埃调查第比利斯事件委员会作了调查报告。他在报告中指责军队在没有及早通知、并使大多数人得知实行戒严的情况下，就采取行动驱散集会的群众，并且不适当当地使用了暴力手段，导致一些人的死亡。他要求苏联军方和当时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利加乔夫对此事负责。报告在经过激烈争论后，主持大会的卢基扬诺夫宣读了大会关于4月第比利斯事件决议草案，责成最高苏维埃研究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并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大会通过了该项决议。

同日，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戈尔巴乔夫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或者是自由和改革，或者是兵营式制度或倒退。“我们选择了前者，而且绝不放弃这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在民主与法制的道路上，我们将建立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纪律和法制，而不是专制。”大会通过了一份告全国人民书。指出，苏联社会“走到危险的边缘”，应当止步，应当停止不和睦和不理解，应当排除压制、封锁和暴力的方法。所有苏联人都应当“加强彼此信任，要记住，没有罪过的人民，也没有有过错的几代人”，要“净化道德，谴责镇压、粗暴践踏人权和斯大林思维方式的复发”。大会宣布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决定是少数几个人违背宪法作出的，应受到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谴责。会议还就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作出决议，认为该条约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秘密协定违背了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国际法。<sup>②</sup>

①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20～221页。

② 同上，第222页。

### (三) 第三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1990年3月12—15日,第三届(非常)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就实行总统制问题展开辩论,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乌克兰部分议员和跨地区主义议员团等与会代表反对在这次人代会上选举总统。但是鉴于苏联日益恶化的形势,多数代表赞同实行总统制。

13日,投票结果表明,1817票赞成、133票反对、61票弃权。戈尔巴乔夫说,修改宪法第六条和设立总统职位是“有利于民主和捍卫民主的重大步骤”。

14日,人代会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修改后的苏联宪法新补充了“苏联总统”一章,其中规定:总统是国家首脑;年满35岁以上、65岁以下的公民可当选为总统,同一人不能连任两届以上,总统由公民通过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产生,任期5年;总统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有权提名部长会议主席,有权任命和解除政府成员职务,有权否决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如最高苏维埃以2/3票数再次通过原先的法律,总统必须签署该法律);总统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和撤销军队高级指挥人员;总统有权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相应加盟共和国的请求或同意,在个别地区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总统领导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同日,苏共中央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推选戈尔巴乔夫为国家总统的候选人。

15日,戈尔巴乔夫以59.2%的得票率当选为苏联第一届总统,并立即宣誓就职。戈尔巴乔夫在就职演说中表示,作为总统“不是某一阶层和政治派别的代表,而是全体人民的代理人”<sup>①</sup>。

根据苏共中央提出的建议,人代会修改了苏联宪法中关于苏共在社会中法定领导作用条款。会议还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卢基扬诺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此职原由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设立了总统职位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不再是国家元首,而变成了议长。

<sup>①</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77页。

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苏联政治史上成为一个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里程碑。马特洛克指出,要想建立一个民主体制,必须冲破共产党对政治进程的束缚。除了设立总统职位或名义不同但实质相同的位置之外,没有别的实际办法能解决这一问题。戈尔巴乔夫的计划包括修订宪法第六条,即删除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提法以及允许建立多党政治体制。“在我看来,这是实行总统制的基本前提条件。戈尔巴乔夫能够成功获得中央委员会的通过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他的目的十分明显: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重整共产党,以使共产党将来不再能通过控制正式的政府部门而直接统治国家。”<sup>①</sup>于是,通过苏联宪法第六条的修改,将苏共与“其他政党”都安排在同一排。“如今全党都得被迫离开习惯于当成自己世袭王位的最高国家讲坛。”<sup>②</sup>

#### (四)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1990年12月17—27日,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2250名代表中的1979名出席了大会。大会在讨论议程时,列入苏共“党内百名”代表的乌马拉托娃在发言中谴责戈尔巴乔夫瓦解苏联,坚决要求把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不信任表决”作为第一个问题列入大会日程。她说:“戈尔巴乔夫在道义上已没有权利继续领导我们国家”,他“所能做的一切都做到了:使国家瘫痪、民族不和,让一个伟大的国家去向全世界乞讨”。大会表决结果,426票赞成,1288票反对,此提案未列入议程。随后,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国内形势报告。他强调“不允许瓦解联盟”,呼吁大会采取“坚决措施来制止分离主义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的破坏行动”。<sup>③</sup>

大会对苏联国名进行了表决。联盟条约草案规定的国名是“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去掉“社会主义”的提法。表决结果显示,1800名代表中有1365名赞成保留“社会主义”的原国名,189人反对,170人弃权,73人未参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86~387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

<sup>③</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416页。

加投票。大会对代表的派别组成进行记名登记。登记结果是：联盟议团员 561 人，跨地区议员团 229 人，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议员团 239 人，共产党议员团 730 人，社会民主议员团 19 人，争取建议性地互相协调议员团 153 人，生态议员团 220 人，青年议员团 125 人，军人和国际主义者议员团 52 人，“公正”议员团 40 人，促进科技进步议员团 90 人。其中有些代表具有双重身份。<sup>①</sup>

大会通过新联盟条约的基本构想，并通过设立副总统职位和实行总统直接领导下内阁制的宪法修改条文。以 1556 票通过的一个条文规定，总统提出副总统候选人，在选举总统的同时选举副总统。戈尔巴乔夫提名 53 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国际事务的苏共中央书记根纳季·亚纳耶夫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宣布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因患心肌梗死住进医院。亚纳耶夫以 1237 票当选为苏联第一任副总统。对于亚纳耶夫的提名及其当选，麦德维杰夫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加强总统权威的重要体现，但却不是一个很好的政治选择。他说：“戈尔巴乔夫常常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他事先没有和人民代表小组负责人商量，就在 12 月 20 日傍晚意外地向人代会提名选举大家都不熟悉的政治家亚纳耶夫为苏联副总统。53 岁的亚纳耶夫长期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在 1990 年 7 月举行的苏共 28 大上，他才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同时进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作为一个政治家，亚纳耶夫还没有展现出自己的任何才能。”<sup>②</sup>在 12 月 27 日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大会通过全民投票法。这项法律第一次在苏联把全民投票确定为“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方法。”<sup>③</sup>

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为轰动的政治事件就是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主动辞职。“这对人代会和戈尔巴乔夫本人都是一个意外。”<sup>④</sup>他向全国和世界发出了苏联即将实行独裁的警告。“毋庸置疑，这与国家内政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在‘加强总统垂直管理体制’之际，许多人（有的高兴，

<sup>①</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 年，第 421 ~ 422 页。

<sup>②</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0 页。

<sup>③</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 年，第 422 页。

<sup>④</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8 页。

有的恐惧)都在等待独裁的建立。”<sup>①</sup>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举动,在他看来就是“对独裁的抗议”<sup>②</sup>。在切尔尼亞耶夫看来,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对戈尔巴乔夫的事业和对戈尔巴乔夫的声望却造成很大的伤害。对内来说,这将进一步把知识分子从他身边推开。对外来说,如果我的考虑不错的话,会阻碍西方‘及时’向戈尔巴乔夫提供物质和经济的支持”<sup>③</sup>。

### (五)第五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1991年8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非常会议讨论“八一九事件”后的国内形势。会议由民族委员会主席拉菲克·尼沙诺夫主持。这些会议召开时并没有制定明确的议事日程,国内外的许多记者都参加了会议,他们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归纳为一个内容,那就是“是否要保留苏联?”在此次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成立了由来自摩尔曼斯克州的工程师亚历山大·奥博连斯基领导的调查政变原因和过程的委员会。还成立了苏共活动情况调查委员会,由来自彼尔姆州的纸浆造纸联合工厂的厂长瓦连京·塔塔尔丘克担任。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取消卢基扬诺夫的人大代表豁免权问题。8月27日上午,最高苏维埃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取消了卢基扬诺夫人大代表的豁免权,他离开会场后不久即被逮捕。然后,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停止苏共在全联盟范围内一切活动的决议,后来只有乌兹别克斯坦没有执行这一决定。苏联最高苏维埃将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等7个问题列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议事日程。8月30日,最高苏维埃确定了第五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的9项议事日程。

1991年9月2日,第五届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这是苏联历史上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纳扎尔巴耶夫代表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即“10+1”)发表声明,呼吁加速签订联盟条约,缔结经济联盟,成立过渡时期临时权力机构(即“人民代表代表委员会”“国务委员会”“跨共和国经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71页。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418页。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亞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474~475页。

济委员会”)。“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政治面貌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会被解散。”<sup>①</sup>其实,这份声明是戈尔巴乔夫与各共和国领导人密谋的结果。叶利钦说,在召开苏联人民代表例行大会的前一天夜里,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聚集在克里姆林宫,共商对代表大会的行动策略。在此之前,多数领导早已形成一致意见:应当结束代表大会的使命,因为这个国家权力机关已经过时,并将成为历史。同时,大家也都明白,不经过斗争,代表大会是不会自动放弃其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经过紧张的工作之后,商定了一份十国首脑共同声明,要求代表大会在通过苏联新宪法以前成立一个过渡时期的跨共和国的权力机构。“代表大会也应该至此顺利结束自己的存在。如果这项提议获得通过,苏联宪法中一些最重要的条款将暂时中止生效,权力也将移交给共和国首脑会议。它由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领袖共同组成。”<sup>②</sup>

9月4日,纳扎尔巴耶夫在9月2日代表所有共和国领导人和苏联总统向大会提出的《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未被通过。人代会通过决定,解除亚纳耶夫苏联副总统职务和卢基扬诺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务。由尼娜·安德列耶娃领导的苏共布尔什维克纲领派组织委员会作出决定,把戈尔巴乔夫开除出苏共,因为他“背叛列宁和十月革命的事业,背叛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使社会主义国家解体,消除列宁党,欺骗劳动人民和蛊惑人心”。<sup>③</sup>

9月5日,大会闭幕。上午的会议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是逐条被通过的,部分条款甚至是逐段逐句通过的。这个议程结束之后,《公民权利与自由宣言》和《关于改变苏联人民代表地位的法令》也被通过。随后,戈尔巴乔夫宣布大会临时会议闭幕。根据《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法令》第四条规定:“承认举行苏联人民代表例会的不合理性,保留所有选举产生的人民代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66页。

<sup>②</sup>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27页。

<sup>③</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628页。

表在整个任期的代表地位。”<sup>①</sup>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于是,随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倒台、苏共解散、苏联部长会议辞职,以及俄罗斯的实权已转移到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手中,这一切不能不改变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命运。“1989年选举产生的、任期5年的新一届苏联议会只走完了它不到一半的历程。”<sup>②</sup>

苏联人民代表麦德维杰夫说:“与前四次代表大会不同的是,此次大会闭幕时没有奏苏联国歌。当我们走出克里姆林宫的代表会堂时,当时的感受和心情就像是刚刚从葬礼上归来。”<sup>③</sup>其实,结束政治生命的不仅仅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解体的命运也越来越近了。雷日科夫指出,1991年9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通过了改革国家政权的决议。“正是这些决议,成为实际摧毁苏联作为统一国家的运作机制的开端,对中央的攻击开始具有公开的性质。各加盟共和国公然拒不执行承担着国家管理职能的联盟领导和机构的决定,实际上变得毫无作为能力。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威信日渐丧失,政权也处于同样境况。”<sup>④</sup>

### 三、部长会议—苏联内阁—苏联国务会议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随着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逐步从苏联部长会议演变为总统制下的苏联内阁,再到“八一九事件”后作为过渡时期政治协商机构的苏联国务会议(国务委员会)。最后,随着苏联的解体消亡而消失。

①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9页。

② 同上,第163页。

③ 同上,第173页。

④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353页。

### (一) 部长会议

苏联部长会议的前身是十月革命成功后设立的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8日,列宁被任命为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46年3月15—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会议通过了改组政府的法令,将人民委员会(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改组为部长会议,并决定对部长会议下属各部级机构进行调整。部长会议主席为斯大林,副主席为沃滋涅先斯基、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布尔加宁、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等。

1985年9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雷日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成为苏联历史上的第十任政府首脑。<sup>①</sup>原任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宣布退休。

从1985年至1989年,雷日科夫领导下的部长会议遵循着苏联的政治传统,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但是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决定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并于1989年开始苏联人民代表选举运动后,随着新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苏联部长会议的组建及其工作必须经过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也就是说,苏联部长会议的权力来源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而不再是苏联共产党。

1989年5月27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从2250名代表中选出542名最高苏维埃代表,其中联盟院和民族院各271名。叶利钦本已落选,但当选的西伯利亚代表卡赞尼夫主动让位,经代表同意,29日破格递补叶利钦为最高苏维埃代表。根据1988年《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规定,最高苏维埃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每年举行两次会议,每次会议通常持续三四个月,它有权任命部长会议主席和政府组成,批准苏联法律。

6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任命雷日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会议以多数票赞成,9票反对、31票弃权通过了

<sup>①</sup> 历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的人为:列宁(1917—1924)、李科夫(1924—1930)、莫洛托夫(1930—1941)、斯大林(1941—1953)、马林科夫(1953—1955)、布尔加宁(1955—1958)、赫鲁晓夫(1958—1964)、柯西金(1964—1980)、吉洪诺夫(1980—1985)、雷日科夫(1985—1990)。

这一任命。

6月1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举行联席会议,听取雷日科夫关于新政府组成的报告。雷日科夫说,新政府设3名第一副主席、10名副主席、57个部委。新政府有三个特点:一是部委数目减少了25个;二是政府成员“年轻化”平均55岁;三是政府行政人员将减少30%。<sup>①</sup>

6月24日,英国《卫报》报道,苏联最高苏维埃拒绝了雷日科夫提出的政府组成名单中的5名部长人选。最高苏维埃的这种独立性已经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引起了忧虑。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在莫斯科的党员会议上说:“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来反对党,或者是用最高苏维埃来反对中央委员会,给人们留下一种煽动性的回味。”<sup>②</sup>

6月28—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讨论苏联政府组成人员。组成人员共有12名部长会议副主席,约60名部长和国家委员会副主席。

7月6日,《真理报》发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作出的《关于改组政府各部委的决定》,改组后,全联盟部26个,联盟统一共和国部11个,全联盟国家委员会4个,联盟一共和国国家委员会14个。

7月17日,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例会上作总结发言。他说:“我完全同意许多人民代表发言时提出的这样一种见解:恰恰在建立法制国家的目前阶段,迫切需要有个行动有效、组织合理、目的明确的政府。它拥有并全面实施最高权力执行和管理机构的各种权限。”<sup>③</sup>

8月4日,历时6周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闭幕。会议组成了新的政府。新组成的部长会议有主席1人,第一副主席3人,副主席9人,部长及委员会主席60余人。其特点是:第一,部长会议成员完全由民主选举产生。候选人先由有关委员会讨论,然后再交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通过。第二,部委数量进一步减少。1985年以后几经精简,到这次会议前政府机构的部委有82个,而这次新成立的部长会议只有66个部委。第三,政府成员中有1/3是新人,1984年组成的部长会议成员只剩下10人,12名部长会议第

<sup>①</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59~160页。

<sup>②</sup> 同上,第160页。

<sup>③</sup> 同上,第164页。

一副主席和副主席有半数是新人，部长平均年龄 56 岁。一批专家学者进入部委领导层。这是苏联部长会议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一次大变动。而当第二次政治大变动来临的时候，苏联部长会议却迎来了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

1990 年 3 月 15 日，第三届（非常）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第一任总统。从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到成立苏联内阁这段时间里，苏联部长会议其实是作为戈尔巴乔夫推行总统制时的过渡政府。马特洛克就说：“设立了总统机构以后，苏联部长会议仍然保留了下来，这样一来，苏联的政体不像美国总统内阁制，而是有些像法国——部长理事会与总统职位分开，而且总理通常是另一政党的人。我觉得戈尔巴乔夫想把部长会议置于他更直接的控制之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机构的强烈反对，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公开羞辱总理雷日科夫。雷日科夫曾支持设立总统职位，并且拒绝成为与戈尔巴乔夫对立的总统候选人。”<sup>①</sup>但是戈尔巴乔夫并不满意部长会议。他说：“总统制遭到削弱的一个原因是部长会议保持原样。根本没有时间去设立一个强大的司法权力机构和执法系统。这样做需要大量的复杂工作和至少好几年的时间。”<sup>②</sup>

这是苏联部长会议面临的第二次政治大变动。随着 1990 年 12 月 25 日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与总统制匹配的苏联内阁时，苏联部长会议就结束了它的历史。

## （二）苏联内阁

1990 年 11 月 17 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了改组政权的纲领——新闻媒体称其为“八条”。总统宣布，部长会议改组为内阁，由他本人管理。显而易见，这就要求即将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必须解除雷日

<sup>①</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419 页。

<sup>②</sup> [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潘兴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 年，第 399 页。

科夫的职务。<sup>①</sup> 雷日科夫对此表示,他领导的政府并没有准备辞职,而且断然拒绝所谓政府是“向市场过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的说法。他强调,政府之所以遭到猛烈抨击,是因为它“坚定地站在维护国家完整的立场上”。<sup>②</sup>

11月23日,雷日科夫接受《国际文传电讯》采访。当被记者问到如果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总统关于改组国家管理机构的建议,你是否还是政府首脑的提问时,雷日科夫说:“如果总统的建议被批准,那么部长会议,相应的还有作为它的领导人的我将会自动辞职……但我们认为这些事情只能在联盟条约签订以后完成,也就是说在共和国的职权明确确定以后。”但是戈尔巴乔夫明显等不及了。他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原来设想在签订新联盟条约后改组执行机构,但局势迫使他立即采取行动,预计新的执行机构将包括副总统和内阁首脑的职位。在提交的新联盟条约草案中规定:由总统组成的国家最高苏维埃是最高的立法权力机关,总统领导联盟国家;设立副总统职位;建立联邦委员会,受总统领导,由副总统、各共和国首脑(或国家元首)组成,其目的在于“制定联盟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并协调各共和国的行动”;总统组成以总理为首的内阁,以便与苏联最高苏维埃协调一致。<sup>③</sup>

12月25日,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联盟条约的基本构想,并通过设立副总统职位和实行总统直接领导下内阁制的宪法修改条文。以1620票通过的一个条文规定,“苏联内阁是苏联的执行管理机构,并服从总统领导”。<sup>④</sup>在麦德维杰夫看来:“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名称的更改,而且还有职权的变化,从前部长会议的部分职权,被转给苏联总统和他的办公机构。”<sup>⑤</sup>

1991年1月14日,根据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提名,苏联最高苏维埃同意53岁的苏联财政部长瓦连京·帕夫洛夫担任政府总理,55岁的多古热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71页。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395页。

<sup>③</sup> 同上,第400页。

<sup>④</sup> 同上,第422页。

<sup>⑤</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耶夫和 53 岁的韦利奇科任第一副总理，马斯柳科夫和拉维奥罗会任副总理，新任总理帕夫洛夫以 279 票的微弱多数当选。在马特洛克看来：“帕夫洛夫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总理人选。戈尔巴乔夫任命他的想法早在几天前就传了出来，但是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消息。甚至连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助手都很难解释帕夫洛夫有什么资格担任总理。”<sup>①</sup>目前，副总理的人数已由过去的 11 人减为 4 人，部委和主管部门的数量也将减少一半左右，总数仅 40~50 个。自 1985 年 9 月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终于离职。

4 月 20 日，苏联内阁举行会议。在总理帕夫洛夫主持下详细讨论了使国家摆脱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方案。

4 月 22 日，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在最高苏维埃就反危机纲领作报告时指出，如果各加盟共和国和中央政府不采取对付危机的经济计划，苏联就会有大批人失业，工业生产也会大幅度下降。如果苏联很快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入自由市场经济，生产和收入将下降 30% 以上，3000 万人失业，最好的办法是采取第三条渐进道路。但是帕夫洛夫的纲领遭到激进的经济学家的指责。

5 月 3 日，苏联内阁举行会议。副总理谢尔巴科夫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一系列使反危机纲领具体化的刻不容缓措施和实现苏联总统同 9 个共和国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的行动计划。

5 月 15 日，戈尔巴乔夫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主持了苏联内阁会议，审议《苏联内阁和各主权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向市场过渡情况下使经济摆脱危机的共同纲领》。

6 月 17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帕夫洛夫总理提交的政府摆脱沉重经济危机的新纲领。帕夫洛夫总理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他某些特别权力，而这些权力当时只授予总统。在被问及时他回答说，他没有和戈尔巴乔夫商讨过这个提案。“实际上，他是在没有和老板打招呼的情况下，要求得到老板的权力。帕夫洛夫是在最高苏维埃的开幕式上讲这番话的，但大会进入执行会议来进行讨论。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内务部长普戈表示支持。他们的发言概要很快被泄露给新闻界，使得许多政

<sup>①</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541 页。

治观察家大惊失色：居然有四名内阁高级官员施展手段来破坏总统的权威，这怎么可能呢？他们感到不解。这样向总统挑战，他们将如何保住自己的饭碗呢？毕竟，这就如同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连同情报局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不预先通知总统，就到美国国会要求允许他们来支配总统。戈尔巴乔夫有权任命或者解除所有这些官员的职务，但是他对帕夫洛夫提案的第一个反应仅限于表示他不同意这一提案。有些苏联观察家认为，他肯定因没有人能解释的理由秘密地支持了这场把戏。我知道他多么珍爱他的权力，所以我怀疑他是这个把戏的幕后指使人。”<sup>①</sup>事实上，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在最高苏维埃得到了绝对多数票，否决了帕夫洛夫获得特权的要求。

8月19日，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参与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颁布命令，决定组成以俄罗斯总理西拉耶夫为首的委员会治理国家经济。苏联总统顾问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列文科受其委托召开内阁会议，宣布解散苏联内阁。<sup>②</sup>前总理帕夫洛夫被正式逮捕。苏联内阁停止运转。

如何评价短暂的苏联内阁呢？

博尔金指出，苏联内阁本身就是作为戈尔巴乔夫应对政权危机的产物。在戈尔巴乔夫已经丧失对全苏政治权力的时候，苏联内阁的成立并没有缓解这种紧迫的政权危机。“实际上内阁的活动和苏联总统命令都贯彻不下去了，前苏联版图内的各国的首脑越来越经常地撇开戈尔巴乔夫和违背他的意愿而自行相会。共和国领导人的这种行为客观上剥夺了苏联总统的决策权。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彻底明白这一点，他觉得，只要集中掌握着党和国家的权力，只要有非常权力，总书记—总统就绝对控制着这个大国。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只是紧紧攥着缰绳，而他的马早就被卸套了，它们现在拉着别人的车奔向相反的方向。”<sup>③</sup>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31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85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68页。

### (三) 苏联国务会议

1991年9月2日,第五届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伊万·拉普捷夫担任主席。大会着重讨论《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构和管理机关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苏联内阁由跨国经济委员会所取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被撤销,最高苏维埃也将重新改组,它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变成了一个没有固定成员和地位的无组织的协商机构。新的苏维埃联盟及新的共和国联盟院不仅由150~200名苏联人民代表组成,而且还包括常驻莫斯科的各加盟共和国的议会代表。苏联总统的职位虽然被保留,而且仍然由戈尔巴乔夫担任,但他的职权却被由10个加盟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组成的苏联国务会议削弱。苏联国务会议的成员包括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以西拉耶夫为首的共命运间经济委员会。戈尔巴乔夫担任国务会议主席,但只拥有一席之位而已。该机构的职权范围非常广泛,也非常不确定。因此,它几乎具有无限的权力,这就降低了最高代表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作用。新成立的国务委员会和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实际上是按邦联制原则建立的,而这个原则只待通过主权国家联盟条约和经济联盟条约就将得到确认”<sup>①</sup>。

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发布第一项决议: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并表示苏联政府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申请加入联合国和欧安会。

9月16日,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苏联国务委员会议,讨论一项新的有关各共命运间经济关系的条约和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如何组织食品生产的问题。9月17日,参加苏联国务委员会议的10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原则上”通过了有关各共命运间经济联盟条约草案。

9月18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联国务委员会任命西拉耶夫为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国务委员会公布的一项决定说,西拉耶夫受命在有各主权共和国全权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草拟有关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结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587~588页。

构、职能和人员组成的建议，并在一个月内提交苏联国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10月11日，苏联国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上通过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协定草案并要求各共和国在10月15日签署协定。国务委员会还决定解散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和建立三个情报与安全机构，即中央情报机构、跨共和国反情报机构、国家保卫国家边界委员会和边防军统一指挥部。

10月22日，苏联国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改组国家安全机关的决定。

11月4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苏联国务委员会会议。戈尔巴乔夫在国务委员会例会上尖锐提出，要加快签订联盟条约的工作。他说：“我们目前的处境，不说是最艰难也是十分困难的。给我的印象是，对粉碎叛乱和贯彻根据各共和国领导人联合声明作出的决定所取得的那份潜力，我们支配得太轻率，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头几个星期的起草工作，大家做得齐心协力，和谐一致，使这种信心得到了加强。人们和国家都支持这种态度。但是头几个星期过去后，又开始节外生枝，使工作拖延下来，恢复了政治游戏。经济条约终于在痛苦中产生，但是国家因对这些最主要的问题模糊不清而处于窒息状态。所有这一切是非常危险的。”<sup>①</sup>大会同意在主权国家联盟内建立统一的军队。叶利钦在会上指出，俄罗斯支持建立统一的武装力量，任何时候都不会谋求建立自己的军队。同时，苏联国务会议决定：“委托巴兰尼科夫·维·帕，巴卡京·瓦·维同志考虑各共和国机关的意见，审查将苏联内务部和共和国间安全局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安全机构的建议，并向苏联国务会议提出经过协商取得一致的建议。”<sup>②</sup>

1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国务会议上说，我们在浪费时间，我们成了一时政治热情的人质。我们应该对人们作出回答，解除他们的担心和不安。他声明，他不会死抱住自己的职位不放，而打算离开。

11月14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的苏联国务委员会审核了根据各共和国的意见进行修改后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同时，苏联国务委员会批准西拉耶夫为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共同体总理。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73～174页。

<sup>②</sup>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03页。

11月25日，苏联国务委员会决定将已拟定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分发给各主权国家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请各最高苏维埃审议本草案，以便准备在今年签署条约。<sup>①</sup>

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一项宣言，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 四、权力转换的中介人：“总书记—总统”

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权力转移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自诩为权力的监护人。只不过，戈尔巴乔夫与他释放的“社会政治力量”却在权力的诱惑下发生了政治上的大混乱。于是，戈尔巴乔夫的目标实现了，政治权力从苏联共产党手中交给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目标又落空了，因为崛起的各共和国成为权力转移的最大受益者，正是在这些共和国领导人的合谋下，戈尔巴乔夫曾经精心设计的人民主权象征——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被送进了历史的坟墓。格拉乔夫描述了权力转换中发生的这一切。他说：“社会顺从的资源很快耗尽，由于所期待的奇迹并未出现，社会所养成的坐享其成的习惯反过来气势汹汹地与改革首倡者作对。于是居民与改革之间的罗曼史开始演变成两者之间的冲突。戈尔巴乔夫承担起中介人的角色，尽管他并未这样对自己表述过，中介人从党那里夺过权力，以便交到日益觉醒的社会手中，他迟早会发现这个使命按理具有临时的性质。随着事情的顺利进展，改革首倡者与其应予解放和施恩的人们之间可能发生龌龊和冲突的天地也愈来愈大。领头人和被领者失去了起初的‘父与子’的等级关系，他们在改革的华尔兹中旋转起舞，不仅互换着位置，而且可能踩到对方的脚。”<sup>②</sup>

①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②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69页。

### (一) 领袖：中央总书记

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既是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也是作为国家的苏联的实际上的最高领导。1922年4月以前，俄共(布)未设总书记职务。当斯大林掌握了中央书记处以后，总书记就出现了，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一般来说，总书记拥有着决定性的权力，这主要是由苏联共产党要求团结的政治纪律决定的。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政治局内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团结，其所带来的后果与其说是积极的，倒不如说是消极的，这成了斯大林主义改头换面的复苏，成了对民主的限制。因此，并不是什么无害的事情，是一派对另一派的压制”<sup>①</sup>。但是总书记也并非是万能的，他在党内的威信既来自“总书记”职位本身所拥有的权力，更多的则来自他的党内战友们都——无论是政治局还是中央委员会——的支持。马特洛克就分析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权力。他说，总书记既没有固定的任职，也没有明确的权威。他的权力来自他对大多数同事进行说服、哄骗或胁迫的能力。一般来说，“多数”意味着意见一致，而不是变动的票数，它通常取决于默认，而不仅是得到51%的票。在理论上，如果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个委员支持并建议选举其他人任总书记并得到多数人的赞成，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可以罢免原总书记。但在实际上，只要政治局的多数派同意，就可以罢免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4年的情况就证明这一点。“鉴于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计划控制共产党的最高层领导。只有罢免了他的主要对手，或至少是罢免了足够多的对手，并提拔那些准备支持他的人，他才能拥有可靠的多数，才能够进行领导。”<sup>②</sup>

不过，从总体政治传统来看，总书记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在苏联这个党一国体制下，总书记就是党——这个时代的智慧和良心——的集中体现。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56~57页。

于是,制度性服从就被培养出来了。“一把手说了算的制度使这些上层人物养成了只能服从和恭维的习惯。”<sup>①</sup>就像切尔尼雅耶夫说的那样,“在苏联,我们很多事情都取决于‘领袖’个人,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他的情绪、他的爱好与不爱好”。在目前的过渡阶段,这一点甚至会比在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后“接班”时更起作用。在勃列日涅夫年代大家都已习惯于接受一种思想,即总书记“按定义”就是伟大活动家,不管他是谁。在勃列日涅夫之后,如果不考虑某些知识分子和对情况十分了解的机关干部的话,所有人即使是在“头脑”中,都没有对在此之前从未显示出领袖气质的安德罗波夫的个人威信有过什么的想法。情况就将会是这样:谁当选,大家第二天就会毫无二话地服从他(就像沙皇传位那样,那里是由上帝授位,这里是由“党”授位)。再过一个星期,大家除了“最近几次中央全会”决议外,就都将执行“××同志的指示”<sup>②</sup>。

当戈尔巴乔夫还只是苏共中央书记时,他就深刻体会到了这种制度性服从的威力。戈尔巴乔夫说:“我在每个接待室见到的仿佛是另外的一些人了。出现了某种‘距离’。机关工作人员都经过严格训练,遵守纪律,我明白了,如今是‘官阶表’在起作用,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级对上级的尊敬在苏共中央已成为牢固的准则。”<sup>③</sup>在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后,并且在确定要从党的手中把权力交给人民的时候,他的自信其实就来自于这种弥漫于社会的制度性服从——谁也不会、谁也不敢、谁也不能怀疑党的总书记!

于是,当东欧解体时,整个苏联社会好像遗忘了这些曾经的小兄弟们,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政治无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博尔金认为,就是这种对总书记的无条件信任造成的。他说:“在我国人们早已习惯于什么事都由领袖替他们‘操心’,连政治局和政府中的人也清楚地知道,有权决定国际政策问题的只有两三个人,首先是总书记。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权插手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70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国际关系方面的事务,除非戈尔巴乔夫要求或吩咐某个人专门解决某一问题。”<sup>①</sup>

于是,当苏联共产党遭到前所未有的竞争性选举时,在总书记的指令下,中央组织要求各级党组织不得擅自干涉选举。理由就是这是真正的人的选举。党的各级组织迷惑了,党员干部迷惑了,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干。“以前在这方面有中央组织部的积极协助,而现在组织部工作人员十分谨慎,害怕指责他们给代表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发表指责机关越权的讲话以后,大家都吓住了,认为最好还是不做。几十年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都认为机关工作人员是自己的传送带,特别是当问题涉及党的地方机关时,而现在却开始指责机关超越权力。戈尔巴乔夫不止一次责成各部工作人员监督党的委员会的工作,派他们到各区、州、边疆区和共和国贯彻中央的路线。机关甚至专门设有督导员职位,其责任就是指导党组织和党委会的工作。现在这些工作人员受鄙视,挨批评,被禁止做从前是他们的任务的工作。人们看到政治局的过错被这么快地转嫁给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只能惊奇地、不知所措地耸耸肩膀。”<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正是充分利用了制度性服从这一党的政治脉门,将自己的命运与党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前共产党的总书记,拥有不受任何宪法和法律规定所约束的权力。他现在提出解除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压制,并创设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权力有限的职位,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没有这种变革,所有改革努力将失败。”<sup>③</sup>虽然他和党之间都互相讨厌,但两者之间却不得不相互依靠。“总书记是这样一种人,地位提高以后,就失去了感觉尺度,一有‘成就’便飘飘然起来,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了现实,为自己今后的败落打下了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什么也不怕,戈尔巴乔夫害怕依靠党,因为党已经威信扫地,其中部分的是因为他不能持之以恒地解决问题才使党威信扫地的。同时他也不能脱离党,因为他十分

①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75页。

② 同上,第325页。

③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70页。

明白，脱离党会导致他政治上的灭亡。”<sup>①</sup>

在这种权力捆绑中，戈尔巴乔夫能够保证政权的安全转移，却不管权力的接收方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后，已经开始削弱的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权的威望急转直下。州委、区委、党组织不知所措，不知他们要做些什么：他们“一生”所做的就是，领导经济，指挥行政部门，而现在干什么呢？“苏维埃机构无论在哪个问题上都不能代替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已被教会只充当装饰品或听话的执行者。他们全都知道，苏维埃机关什么也决定不了。中央也发生了同样的事。过去（已很久！）没有中央委员会（实际上是政治局）的决定，任何大的举措既不能开始，又不能继续。政府、各个部没有这种权威力量以及中央机关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组织有序的催促和威胁，他们很快就失去工作能力。”任何企业、集体农庄等的“独立自主性”，（谁也不了解去如何支配“独立旗帜”）都不能（在缺少市场、民主习惯和规则的情况下）替代党的行政命令管理体制。<sup>②</sup>

尽管如此，苏共中央总书记依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应尽职责，不仅是对自己的，更是对全国的职责。在真正经过选举产生的因而也是合法的新议会准备将最高权力实际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情况下，必须让迄今为止执政的政党完全自愿地而且不作武装对抗地将最高权力让给人民的代表。“除了准备了这次行动、依然是惨遭历史性失败的党的军队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而外，没有人可以向党发出撤退的正式信号。他同时签署和接受投降书这件事，使问题略微简单化了。然而迟迟不进行当众‘剖腹自杀’也不应该，与其让例行的人民代表大会逼着党的领导人走这一步，倒不如自己采取主动。”<sup>③</sup>

于是，当总书记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时，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们也只是冷漠地看着——好像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29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78页。

<sup>③</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

## (二) 新职业：苏联总统

1988年以后，改革的进程愈发艰难了，戈尔巴乔夫的处境也更加艰难了。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他十分喜欢的一系列国外之行、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谈判与他的总书记身份不太相称，这种身份对西方的伙伴也不方便。因此，戈尔巴乔夫违背当初不兼任两种职务的诺言，开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自己当选国家首脑做准备”<sup>①</sup>。叶利钦敏锐地观察到戈尔巴乔夫的心态变化。他说：“戈尔巴乔夫已经厌倦改革了。他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可能掉进去的死胡同。形势的发展已经非常明显——应该由不成功的改革、例行的‘解冻’开始，逐步向冻结政治气候、强制保持局势稳定、严厉监督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进程过渡。戈尔巴乔夫的第一步是实行总统制。”<sup>②</sup>

1988年10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戈尔巴乔夫被选举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是戈尔巴乔夫迈向总统制的关键一步。切尔尼雅耶夫回忆，当时他们曾建议戈尔巴乔夫直接走“总统制”的道路。不过，戈尔巴乔夫表示先不要着急，要慢慢来。“我记得，在那次少有的五位助理们的坦率谈话中，我们表示了对他的同情：要清除和重新安排与之共事多年的、每星期都要与之共商党务国事的人们、无论如何与之都有着同志关系的人们。这是不简单的，要当着他们的面说出‘决定性的’话，这是多么大的精神负担……同时要看到，他们都明白：这样做是要走‘总统制’道路。怎么会不是这样呢？如果我们想要改革，就别无选择。不走这条路在最高层就无法解决已成为重大关键的巨大的、对管理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但又是民主的改革任务。”<sup>③</sup>

但是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喜悦，很快就被强烈的不适所代替。戈尔巴乔夫开始后悔没有听取顾问们的建议——直接实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说：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23页。

<sup>②</sup>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76页。

我还是后悔没有立即想到必须以设立总统职务来圆满完成我国新政治机构的构造。此外我还坚决否定了我的几位战友和专家提出的相关建议。而且强调我国政治体制的基础即使在改革之后仍然是苏维埃制度，总统的职位同苏维埃制度很难相容，格格不入。我让我的对立面相信，也许将来我们会采用这种形式，而现在有这么一个重要的革新措施已经完全足够了，那就是以最高苏维埃主席来替代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种革新措施自身就能扩大国家元首的能力，而且会赋予他许多纯属总统所有的权力。与此同时，他仍然是最高苏维埃的首脑，这就是说，他将与代表们一起从事立法工作，更深入地意识到自己对选民应承担的责任。可是，事隔几个月之后，我真的相信我是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期间，从头到尾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尽力弄清会议所有议题、议程、各委员会工作的细节，这时我明白了，将直接领导议会同其他职能结合起来，体力上是吃不消的。问题还不止于此。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立法部门和执行机构需要不同的处置问题的方法。这决不是说，两者之间一定会处于持续不断的相互对骂、或者甚至是“战争”状态，一如目前我国最近的情况。两者应当既相互监督，又相互照顾，而我们所选择的方案却排除了这样的可能性。因而，就使分权制结构的一个优越性失去意义。<sup>①</sup>

于是，戈尔巴乔夫决定加快总统制的实施步伐。

1990年2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联席会议上，四百多名代表以多数票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的设立苏联总统职位的建议，总统选举实行普选制，第一任总统例外。苏联关于设立总统职位的法律草案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年满35岁的苏联公民都可以当选总统。总统由苏联公民在全国平等和直接选举的基础上投票产生，任期5年。总统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并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政府首脑、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苏联总检察长的候选人。总统可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

---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7页。

提出部长会议辞职的问题,可以签署法律。外电认为:“第一任总统肯定是由戈尔巴乔夫。”<sup>①</sup>

1990年3月4日,举行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的选举。在竞选活动中,叶利钦号召取消宪法第六条,该条宣布苏共为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这些新的政治现实迫使戈尔巴乔夫采取一些政治策略。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表明,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已经不能为维护他的政治地位起到保障作用了。就连迫使戈尔巴乔夫经常同日益强烈的反对派情绪作斗争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地位也不稳固了。“苏联总统职位的设立使戈尔巴乔夫同西方国家的总统‘平起平坐’,巩固了他在政权系统中的地位。而且当时有可能不用通过苏联公民投票,而是通过‘捷径’,即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总统。诚然,许多代表可能将修改宪法(设立总统职位)同另一种宪法修正案——取消臭名昭著的宪法第六条联系起来。在走向总统职位的道路上,必须预先得到苏共中央政治局与例行的中央全会的支持。”<sup>②</sup>

1990年3月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例行工作会议。戈尔巴乔夫对总统职位表示出了巨大兴趣,并成功地说服了他的战友们接受了他的提议。因为“他每时每刻都在怀疑自己的老战友们不够忠实,而且会注意到他对现实情况的不切合实际的理解”<sup>③</sup>。

1990年3月12—15日,第三届(非常)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就实行总统制问题展开辩论,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乌克兰部分议员和跨地区主义议员团等与会代表反对在这次人代会上选举总统。但是鉴于苏联日益恶化的形势,多数代表赞同实行总统制。不过,就在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来得及为总统制的决议通过时,他所力推的这一新的国家政治制度就面临着来自加盟共和国的强力冲击。在就设立总统职位问题的辩论中,纳扎尔巴耶夫第一个发言。他热烈支持设立这一职位,指出各加盟共和国同样设立总统职位的时候已经到了。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

①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90年2月27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3月1日。

②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39页。

③ 同上,第640页。

说,他没有料到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会走这一着棋。纳扎尔巴耶夫明确主张应当在各加盟共和国同样设立总统职位。“换句话说,各加盟共和国迅即察觉到中央政权要加强,在不希望放弃已经取得的自主权的同时,决定要利用这个机会保障自身的安全,以防万一。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哈萨克斯坦的领袖可以说玩了一场只赢不输的游戏。不必隐讳,我原来当然并不打算在各加盟共和国设总统职位。这样做会使我们为提高中央政权的威望已经赢得的成果失去一半的意义。”<sup>①</sup>于是,联盟总统职位的出现成为各共和国效法的先例。政治主权化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联盟解体进程被赋予了正式的法律依据。“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这种政治上的幼稚令人惊讶——苏联向来是中央有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形式,各个共和国,甚至各个州都照搬照仿,向来如此。这一次的情况也是如此。不但仿效设立总统职位,而且多数加盟共和国也仿效设立总统职位的机灵巧妙的手段——即通过听话的人民代表大会。苏联解体进程具有了新的加速度。”<sup>②</sup>

13 日,投票结果表明,1817 票赞成、133 票反对、61 票弃权。戈尔巴乔夫说,修改宪法第六条和设立总统职位是“有利于民主和捍卫民主的重大步骤”。

14 日,人代会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修改后的苏联宪法新补充了“苏联总统”一章,其中规定:总统是国家首脑;年满 35 岁以上、65 岁以下的公民可当选为总统,同一人不能连任两届以上,总统由公民通过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产生,任期 5 年;总统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有权提名部长会议主席,有权任命和解除政府成员职务,有权否决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如最高苏维埃以 2/3 票数再次通过原先的法律,总统必须签署该法律);总统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和撤销军队高级指挥人员;总统有权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相应加盟共和国的请求或同意,在个别地区宣布实行紧急状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18~219 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42 页。

态。同时,规定设立两个总统顾问组织:一是联邦委员会,由各加盟共和国议会的领导人组成;一是总统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提供了一种集体决策的外表。马特洛克认为:“戈尔巴乔夫设立联邦委员会的意图是,让各加盟共和国议会感到它们在中央政府中有发言权。该机构能否产生这一效果将取决于它能否对涉及各加盟共和国的重要决定产生影响。至于设立总统委员会,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试图用它来取代政治局。如果他把政治经济改革政策的讨论从共产党机构转移到由他本人直接控制的总统办公室,他就可以远离共产党机构并最终忽视它的存在。”<sup>①</sup>14 日,苏共中央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推选戈尔巴乔夫为国家总统的候选人。

15 日,戈尔巴乔夫以 59.2% 的得票率当选为苏联第一届总统,并立即宣誓就职。戈尔巴乔夫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总统制“有助于克服权力的无组织性和分散性”,作为总统“不是某一阶层和政治派别的代表,而是全体人民的代理人”。<sup>②</sup> 根据苏共中央提出的建议,人代会修改了苏联宪法中关于苏共在社会中法定领导作用的条款。会议还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卢基扬诺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此职原由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设立了总统职位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不再是国家元首,而变成了议长。

然而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总统后,还有必要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吗?戈尔巴乔夫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而且他身边的顾问们也曾建议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专心致志地当好苏联总统。但是出乎这些提议人意料之外,不仅是戈尔巴乔夫拒绝了,就连已经遭到戈尔巴乔夫不断政治打击的苏联共产党也拒绝了。这是为什么呢?

麦德维杰夫分析了拒绝背后的原因。他说:“如果党内还有个人魅力出众、拥有行动纲领的知名领袖,这种措施还有一定意义,但苏共中央根本就找不出这样的领袖,那里都是一些党的官僚。宪法第六条取消以后,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不再是苏联的政权机构,州、区地方党委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还继续行使政权职能,因为当地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其他管理体系。但在莫斯

<sup>①</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417~418 页。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 年,第 277 页。

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光莫斯科市委,就是俄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辞去党的职务只能加速党的危机,但不会提高总统的威信和地位,因为他这个总统不是人民直选的,而是人民代表大会按着苏共中央的建议安排的。”<sup>①</sup>博尔金也认为,戈尔巴乔夫对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尤其是苏联总统的角色无疑很满意,但对从事党内事务他已感到厌倦,觉得是个累赘,似乎应当放弃党的领袖地位,专心从事国务活动。但至少有两个原因妨碍他作出这样的决定。“第一,离开总书记的职位会大大削弱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他可能会成为左、右两翼的批评对象。党的新领袖的上台可能会使改革的总设计师完全失去声望。第二,戈尔巴乔夫自己怂恿所有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委书记担任党的委员会和苏维埃两个关键职务。而现在,当他得到国家首脑职位后,就要放弃党的领袖的活动领域,这是又一个批评他的理由。”<sup>②</sup>于是,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总书记—总统”的双重最高权力拥有人。

戈尔巴乔夫开始准备在新的政治权力架构下行使自己的总统权力。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搭建自己的总统班底——组建总统委员会。“建立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旨在加强最高权力机关的威望,这是在新的政治体制下独特的政治局等同物。”<sup>③</sup>在博尔金看来,这是戈尔巴乔夫努力实现从党的总书记向苏联总统转变的一个尝试。“在斯塔夫罗波尔和莫斯科的多年的书记生涯中养成的许多工作方法、风格和作风在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活动中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戈尔巴乔夫要求建立一个类似中央政治局的机构,在那里可以发表讲话、发布指示、审议产生的问题。”<sup>④</sup>在外界看来,苏联的总统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美国的内阁。“总统周围有其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以及控制主要政策领域——国防、经济、内政和外交的人物。与此同时,他也有某些不大精通政务但颇有影响的人物,如作家、环保分子、工会负责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8页。

<sup>④</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51页。

人、少数民族代表等。这些人物的影响对确保总统下达的各项政策得到广泛的接受是至关重要的。”<sup>①</sup>

1990年3月24—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任命总统委员会的16名成员。他们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马斯柳科夫、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巴卡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主管国际事务的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主管党中央内部机要工作的总务部长博尔金、原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普里马科夫、基辅州委第一书记列文科(地方党组织代表)、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代理学术秘书长沙塔林院士(社会科学界代表)、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奥西扬院士(自然科学界代表)、艾特马托夫、拉斯普京(作家代表)、俄罗斯劳动人民统一阵线负责人亚林(工人代表)和农业公司经理考尔斯(农村代表)。总统委员会是附属于总统的咨询性工作班子,其任务是制定实现苏联对内和对外政策基本方针的措施,确保国家安全。实际上,总统委员会“是戈尔巴乔夫的全国安全委员会”<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在挑选总统委员会成员时,显然对性格以及政策的协调考虑不多,更多的倒是考虑政治平衡。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最忠实的意识形态盟友之一,他在党的旧权力基础与新“内阁”之间起着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克留奇科夫的任务是改变克格勃这个迄今为止仍然令人畏惧的、无孔不入的组织。雷日科夫在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是一个关键人物。沙塔林主张进行更激进的改革,从而对雷日科夫的谨慎态度起了平衡作用。工会组织的领导人亚林是个强硬派。他支持缓慢派的主张,因为他清楚知道,价格猛涨会引起工人们的强烈不满。戈尔巴乔夫把亚林纳入总统委员会,可能是希望控制住工人的反抗。拉斯普京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直接的政治经验,但是他代表俄罗斯新民族主义。他有大量的、情绪激昂的追随者。戈尔巴乔夫选择艾特马托夫加入总统委员会是让他作为穆斯林居多数的中亚地区的代表。普里马科夫曾领导过有名的经济和世界关系研究所。奥西皮扬是科学院成员和著名的物理学家。博尔金是重建党的意识形态的

① [英]《泰晤士报》1990年4月1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5月8日。

②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90年3月24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3月26日。

中央委员。乌克兰人列文科从 1986 年起一直是党内负责国际事务的委员会的一员。来自拉脱维亚的考尔斯可以代表波罗的海共和国发表意见。同时,他还是农业专家,而农业则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经受严峻考验的部门。<sup>①</sup> 显然,“总统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在政治上混杂不纯,使其完全有别于过去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把总统委员会等同于苏共中央政治局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政治局里意见一致早已成为习惯,而且分别是预先决定好的,这与矛盾重重四分五裂的总统委员会截然不同”<sup>②</sup>。

不过,在最开始的阶段,戈尔巴乔夫还是充满信心的。为了树立总统委员会的政治威信,戈尔巴乔夫与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确保这次会议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他让委员会成员搬进了克里姆林宫宽敞的办公室,这是为苏联最高级官员保留的。不过,总统委员会在成立以后,其实并没有发挥其本来就模糊的作用。而且作为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在做出决定时可以随意地采纳或者不理睬他们的建议。马特洛克就观察到:“我可以理解确保这个国家的每一重要集团在总统委员会中都有其‘代言人’的政治用处,但是我不清楚这个机构将如何协调行动。事实上,它从来也没有过协调一致。”<sup>③</sup>

1990 年 11 月 16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加强总统垂直管理体制,改组政府,撤销总统委员会,暂缓进行联盟条约的准备工作,做好在全国采取紧急措施的准备。<sup>④</sup>

11 月 17 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关于“改革和加强国家政权结构”的八点建议。其中包括:将联邦委员会从协调机构变为拥有新的协调中央和各共和国活动的有效机构;废除总统委员会,建立总统所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根本上改组中央执行机关,并由总统直接领导,增设副总统职位;在总统管制范围内成立一个协调和维护法律机构活动的专门机构,

<sup>①</sup> [英]《泰晤士报》1990 年 4 月 16 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 年 5 月 8 日。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68~669 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418 页。

<sup>④</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71 页。

以便同犯罪活动作斗争；等等。最高苏维埃经过一天的辩论，最后以 316 票赞成、19 票反对和 31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表示“基本赞同”总统的建议。

废除总统委员会，其实并不令人意外。还在戈尔巴乔夫刚刚组建的时候，人们就已经预料到了这种结果。博尔金指出：“总统委员会的命运已经注定，不知是觉得这个机构无用呢？还是对它的人员不满意，或者是由于来自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批评（最高苏维埃代表认为许多无益的决定都是出自总统委员会），反正时隔不久戈尔巴乔夫就取消了该委员会。而且这一举动非常仓促、迅速，委员会成员是在决定通过之后才知道自己被免职的消息的。”<sup>①</sup>戈尔巴乔夫废除总统委员会令他的“盟友”们非常不满。雅科夫列夫、普里马科夫、沙塔林、彼得拉科夫等人纷纷提出辞职。

取消总统委员会后，直到 1991 年的 3 月份，经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戈尔巴乔夫才最终任命一个安全委员会来取代消亡的总统委员会。“实际上，由于职务的原因，有些人成了这个机构的当然成员：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外交部部长和克格勃主席。”<sup>②</sup>参加安全会议人员主要有瓦·维·巴卡京、亚·亚·别斯梅尔特内赫、弗·亚·克留奇科夫、瓦·谢·帕夫洛夫、鲍·卡·普戈、叶·马·普里马科夫、德·季·亚佐夫、根·伊·亚纳耶夫。但是安全委员会的命运和总统委员会一样，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制定任何关于安全委员会的相关工作条例，谁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于是，戈尔巴乔夫在召开了几次安全会议后就确信，“除了麻烦和额外的负担外不会有任何结果。总统早已习惯于独自解决所有问题或直接找某个执行者而不需要建议，他公开提倡的民主原则对他早就成了障碍”<sup>③</sup>。

11 月 23 日，戈尔巴乔夫在提交的新联盟条约草案中规定：由总统组成的国家最高苏维埃是最高的立法权力机关，总统领导联盟国家；设立副总统职位；建立联邦委员会，受总统领导，由副总统、各共和国首脑（或国家元首）组成，其目的在于“制定联盟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并协调各共和国的行动”；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352 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543 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366 页。

总统组成以总理为首的内阁,以便用苏联最高苏维埃协调一致。<sup>①</sup>

12月17—27日,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新联盟条约的基本构想,并通过设立副总统职位和实行总统直接领导下内阁制的宪法修改条文。以1556票通过的一个条文规定,总统提出副总统候选人,在选举总统的同时选举副总统。戈尔巴乔夫提名53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国际事务的苏共中央书记根纳季·亚纳耶夫为副总统候选人,并获大会通过。不过,亚纳耶夫的当选并不令外界满意。马洛克就说:“亚纳耶夫给我的印象不像是一个坚定的领导。他似乎没有属于自己的观点,我还感到他稍微有点紧张不安。在我们谈话期间,他不停地抽烟,抬起的手有时也微微颤抖。我不能想象为什么苏联的副总统对会见一名外国大使会感到紧张,唯一的结论是他不善于同陌生人轻松相处,即使是对一名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来说,这也是一种最不寻常的特征。起初,我难于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何要选择亚纳耶夫担任副总统,后来才想到他之所以同叶利钦分手即是嫉妒叶利钦的声望使然。很明显,他不可能容忍在公众影响方面有可能成为对手的高级官员。而根纳季·亚纳耶夫在这方面显然不会对其构成威胁。”<sup>②</sup>

1991年9月2—5日,第五届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在9月5日的会议上,大会撤销了苏联副总统的职位。根据过渡时期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法,苏联总统不能履行职责时,由国务委员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国务委员会主席临时代理总统职务。

9月25日,戈尔巴乔夫任命了新的总统政治协商委员会。成员包括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波波夫、索布恰克、巴卡京等人。

10月2日,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了直属于苏联总统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与签订主权国家联盟新条约以及经济协定的内容和前景有关的问题。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曾参与制定的这一文件,已分发给国务委员会全体委员以便讨论。

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sup>①</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400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506页。

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一项宣言,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为什么成为“总书记—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仍然不可避免地率领党和国家走向失败呢?原因究竟在哪里呢?看来,失败的根源在于总统制是建立在一片政治沙土之上,毫无政治根基。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夺走的权力从理论上讲会注入的唯一机构——暂时纯具象征意义的“总统制”——还没有来得及适应新的环境、更没有多少人明白的权力结构,在一开始就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从俄罗斯议会和苏联议会中的激进派,到与之沆瀣一气对总统“危险的独裁主义”进行抨击的“联盟议员团”中的人民代表。<sup>①</sup>具体来说,总统制失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政治权力转移中忽视了苏联社会的传统政治心理,导致无法迅速建立起与新的政治权力相适应的社会习惯。戈尔巴乔夫说:“很遗憾,还有一个理由我明白得太晚了,很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理由。有时理论家和政治家所创立的国家机构无论有多么完美,如果得不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民众心理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机构就可能运转不起来。几十年来,我们这里形成了一种对政治局和总书记的特殊的迷信,要求对他们所下达的命令和指示绝对服从。这个极有威望,既备受敬重,又令人畏惧的权力之源仿佛已经干涸,并立即在国家的纪律上反映出来。尤其是如今他们的职能已转归最高苏维埃。而按根深蒂固的观念,最高苏维埃在我国可是一个纯属装门面、摆样子的机构。至于这个新议会确实很有权势,要相信这一点很难,至少马上不易做到。同样,就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对政治定义不甚了了,也就难以琢磨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sup>②</sup>

其次,政治权力转移中没有能够建立起与新的权力中心相匹配的运行机制,导致在政治混乱情况下政令失去效应。1989年以后,除了社会基础之外,改革的政治支柱也开始锈蚀。先前的追随者和同路人,不仅是政治局委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2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7~218页。

员,而且还有知识界和大众传媒的代表,他们保持对于戈尔巴乔夫知恩感恩的忠诚的时间最长,如今也开始分别投向完全对立的营垒。苏联共产党以及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那底部锯断的树干发出的幼芽自不必说了,它们自然不打算成为总统党。戈尔巴乔夫试图注入活力的苏维埃,却对任何复苏尝试均毫无反应。政治上的大混乱、大分裂,使总统制失去了成长的政治土壤。戈尔巴乔夫在分析总统制失败的原因时指出,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如果失去能够依凭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握有实权的指挥机构网,岂不也很可能陷于同样的境地吗?“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有总统,有司令部(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但下面没有支撑。好像没有人来公开否认中央最高权力机关享有特别的权力,可是从上面发出的脉冲却得不到有力的回应支持。当我们作出了实行总统制的正确的决定之后,我们实际上还是停留在那个初始阶段,没有把问题想透,想到底。因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也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再加上那个优越性,就是他还能通过最高立法机构发布权威性的决定来加固自己的路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总统制的优点尽管很多,但也只有在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时才能发挥出来”<sup>①</sup>。格拉乔夫也指出:“到1990年,总书记兼总统已拥有无限权力,却除了电视屏幕之外,手边竟没有一个传动机构,借助这样的传动机构他即使不是大权独揽地管理国家,至少也是对已经展开的进程施加影响。”<sup>②</sup>

最后,政治权力转移中对权力的原拥有者——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打击和政治忽视,导致戈尔巴乔夫丧失了最后的支持。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又当上了总统,戈尔巴乔夫有一段时间将苏共中央机关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使用。然而戈尔巴乔夫不喜欢、不信任、不尊重苏共中央机关,不止一次地裁减其工作人员,并对该机关本身进行改组,这早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地方党的机关习惯上被认为是总书记的可依靠的力量,可它们的状况也未必更好。多勃雷宁指出,给戈尔巴乔夫政权以致命打击的是共产党在苏联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5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2页。

瓦解以及他在创建一个新的替代权力和权威机构上的失败。共产党连同她在全国各地方的支部,是从在莫斯科的最高领导到工厂和农村的管理骨干,作为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是这个国家毫无争议的统治者,因此他直到1989年还继续强调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在他自己的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在此后不久他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因为他一旦打开了“民主性”与“公开性”的潘多拉盒子,来自党内的批评意见就增加了,他的政治局也不是完全一致地支持他的改革,戈尔巴乔夫不会忘记赫鲁晓夫在党内的一次政变中被即刻解除职务的事情。“由于惧怕失去在党内的控制地位和由此失去在全国的最高权力,1988年底他转而把议会的作用也控制在总统手里,这样他的职务就不能够由共产党罢免。但是这一切都是密室中的政治交易,只能削弱戈尔巴乔夫在全国的地位。1991年8月当议会禁止共产党的存在并支持叶利钦时,戈尔巴乔夫身边没有一个人追随。”<sup>①</sup>

---

<sup>①</sup>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721页。

## 第七章 “志同道合者的事业” ——改革领导集体分析

戈尔巴乔夫一直认为，改革是一件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和他一起来完成。他说：“我们不是上帝，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知道答案。在我们上层信息更多一些。我们更明白需要进行深刻的改革。应该带着这些考虑去参加代表大会。但还有另一种情况。要知道在二十四大上也讨论过正确的东西。这些东西讨论了多少年了，可是始终还是没有实行。出现了新的一族，他们废话连篇，成天谈论新思想而不干工作。而我们需要的是一起‘惹出了麻烦’和准备走到底的志同道合的人。”<sup>①</sup>但是在他的政治助手格拉乔夫看来，改革中的戈尔巴乔夫往往与他“志同道合”的战友们上演着“政治反转戏”。他说：“像基督一样，每个领导人和政治领袖都有自己的使徒。拿破仑有他的元帅，戴高乐有他抵抗运动的战友，所谓‘历史上的戴高乐主义者’，卡斯特罗有同他一起在古巴登陆并前往马埃斯特腊山的‘格拉玛号’乘员。因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空降到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像卡斯特罗占领哈瓦那那样占领莫斯科，而是通过宪法的途径（按照苏联体制的标准）、按照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意愿上台执政的，他就没有忠实的乘员，并且还得在航行途中更换几拨班底。说来奇怪，他愈是多看看集体领导班底中同志们的脸色，尤其是在改革的第一阶段，随机应变、被迫作出妥协的情况愈多，他作出的人事决定往往就愈成功，愈准确。反之，随着戈尔巴乔夫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权力，并逐渐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完全靠他青云直上的人，他的工作班底反倒变得不那么可靠，他在新的任命中搞的‘私人婚姻’也愈来愈多。

---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72页。

早在多亏戈尔巴乔夫才当上‘公爵’的那些人所策划的八月政变之前,他最亲密的战友就对于他在人事问题上临时现凑的做法往往感到困惑不解,并且预言会因此招致政治上的失败。”<sup>①</sup>

## 一、三驾马车: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与雷日科夫

从改革的初始阶段至转折阶段,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共同组成了改革的“三驾马车”。早在安德罗波夫时期,他们三人已经在苏共中央共事,并惺惺相惜。安德罗波夫让雷日科夫就任共产党高层职务,把管理专长引入领导工作。同时,他又让利加乔夫进入中央书记处,主管人事安排工作,以便更努力地同腐败做斗争。“利加乔夫名声清白,这一点打动了安德罗波夫。像安德罗波夫一样,利加乔夫也认为应该由共产党来推行改革。”<sup>②</sup>

1985年4月23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改变了政治局内部的力量对比,使自己的战友进入了政治局,从而成为他推行改革在党内高层的主要支持者。中央全会增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切布里利夫、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戈尔巴乔夫已经为两人安排好了位置:利加乔夫作为他在党内的助手,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事实上成为“党的二把手”;雷日科夫作为他在政府的有力支持者,将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改革的人事“引擎”准备就绪,戈尔巴乔夫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改革“伟业”。

### (一) 戈尔巴乔夫

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全会根据葛罗米柯的提议,一致选举54岁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76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书记,成为斯大林去世以来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最年轻的领导人。

塔斯社发表新任总书记的政治履历: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3月2日生于俄罗斯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一个农民家庭,从15岁起当了5年联合收割机驾驶员,1952年入党。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随后回故乡从事党团工作。1967年读完当地农学院函授课程取得学位。1968—1978年先后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1971年4月在苏共二十四大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78年11月当选为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书记;1979年11月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升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开启了苏联政治新时代——希望与毁灭。科伊乔·佩特罗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名字是同“戈尔巴乔夫主义”和“崩溃”密不可分的。<sup>①</sup>

以当选总书记为转折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履历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的起止时间为1956—1984年。在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像其他所有进入体制的人一样,在党的筛选机制下一步一步地在党的阶梯上努力升迁。佩特罗夫认为,在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除了能较快地往上爬(这意味着为了个人名利更擅长利用“保护人—被保护人”这一制度外),与其他机关工作人员在升迁道路上没有什么两样。这里包括两个分阶段:从1956—1970年,这一时期他担任地方上党的职务,从共青团书记到斯塔夫罗波尔区委书记;从1970年至1984年,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先后当选最高苏维埃委员(1970年)、苏共中央委员(1971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

1970年是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发生转折的一年。在这一年,戈尔巴乔夫成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也就是说,在苏联政治生活中,戈尔巴乔夫已经不再是无名小卒了,他开始正式进入“总书记—第一书记”的权力中心了。从此,戈尔巴乔夫真正成为党的“封疆大吏”中的重要成员,

---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他有了向党的更高政治阶梯攀爬的野心和动力。1978年,戈尔巴乔夫等来了绝好的机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去世了。在安德罗波夫的推荐下,勃列日涅夫提议任命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农业。戈尔巴乔夫真正进入了苏联政治的权力核心——苏共中央委员会。

为什么会选中戈尔巴乔夫呢?

据戈尔巴乔夫自己说,在开始时他“把这当成普通的现象,认为这是力求通过辩论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及至后来在中央工作,他才明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不光是意见分歧,而是领导班子内部存在派系,是派系之间的斗争。但是也不要在这方面有什么误解,以为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这都是有同一“信仰”的人,同一体制的拥护者。“派系之间的角逐不是别的,正是争夺权力的斗争。”<sup>①</sup>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他的当选就是因为他与安德罗波夫、库拉科夫的亲密关系。安德罗波夫是斯塔夫罗波尔人,库拉科夫担任过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与这两个人良好的关系成为戈尔巴乔夫上升的重要政治依仗。简单地说,他们都属于一个派系。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很普遍的,因为总书记身边就存在着“第聂伯罗斯克帮”。

格拉乔夫指出,为什么像库拉科夫和安德罗波夫这样一些截然不同的人以及其他相当典型的苏联领导人,在戈尔巴乔夫不同的升迁阶段都赏识他、支持他,而且几乎像接力一样让他步步高升呢?这是一批庇护者,准确地说是一批为这位秩序的未来破坏者精心地充当向导的人,而他们自己曾经为维护这个秩序贡献了无比的精力,其中有苏斯洛夫、柯西金、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以及勃列日涅夫本人。较为可能的倒是另外的因素: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见风使舵——在这方面他恰好可能与成千上万党的工作人员、与著名的斯大林所说的体制的“螺丝钉”毫无二致,而是使得他出类拔萃、令人刮目相看的东西。“安德罗波夫对与戈尔巴乔夫交往的认知和实用方面的兴趣,当然不足以说明他对于自己在外省发现的这位党内天才的那种显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页。

而易见的、几乎是慈父般的眷恋。可能当时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吸引他，不仅是因为本人的个人品质、开朗的性格，而且还因为无论从出身、教育程度和所走过的道路来看，均堪称体制的示范产品，而安德罗波夫本人为巩固这个体制，可说是做到了呕心沥血。”<sup>①</sup>

有些人在看到这个年轻、热情、让他们想起自己的年轻时代、只是比他们更有文化的斯塔夫罗波尔才俊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同戈尔巴乔夫交往时，他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正在成长中的可靠接班人，如安德罗波夫所说的“小灌木丛”一样，他们是一批精力充沛、令人信服的年轻领导干部，他们不能不抱这样的幻想。有些人（库拉科夫也多半属于这种人）则认为在未来不可避免的党领导人大换代中可以依靠他。“这个显然气数已尽的制度的领导人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像这样年纪轻轻、充满活力、比他们自己更有文化、而且还相信体制的合理性及其潜力的接班人吗？领导人对于自己毕生事业的前途可不是无动于衷。这个‘小灌木丛’在他们眼中应当是希望的化身，与此同时，应当不仅不辜负他们付出的精力，而且也不辜负他们对自己的希望和良知所作的妥协。”<sup>②</sup>

于是，戈尔巴乔夫成为中央书记也就可以理解了。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说：“当时把我作为候选人向全会推荐的决定多么来之不易。担心选错了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机构中，主管农业的书记是个关键职位，因为他与各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的第一书记经常保持联系。而第一书记这个群体又是总书记的世袭领地和依靠力量。就是说，这个职位让谁担任，要由勃列日涅夫最后拍板。”<sup>③</sup>

不过，仍然不能忽视斯塔夫罗波尔时期戈尔巴乔夫所拥有的另一个重要政治资源——疗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各级官员享有着各种各样的特权和福利。其中，疗养就是重要的一项内容。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政治资源。在众多的“疗养地书记”中，戈尔巴乔夫无疑是幸运的。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59页。

<sup>②</sup> 同上，第59~60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页。

相比于利加乔夫的托木斯克州或者叶利钦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来说，斯塔夫罗波尔拥有更令中央领导们喜爱的疗养地——矿水城<sup>①</sup>和栋巴依。格拉乔夫就说：“如果说戈尔巴乔夫跻身于前途远大的地方领导人行列，凭的是自己的各种创举和经济试验的话，那么同诸如苏斯洛夫、柯西金、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巴伊巴科夫之类当时政治上的关键人物的私人交往，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得益于矿水城和栋巴依（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喜欢在该地休养）。”<sup>②</sup>可以说，“这张苏联体制的王牌是自己送上门的”<sup>③</sup>。

在这里，戈尔巴乔夫本人也给前来疗养的领导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格拉乔夫说，到戈尔巴乔夫这里疗养的一般都是些年事已高的人。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疗养。这些人在休假中，摆脱了自己的办公室、接待室、吉尔车和高不可攀的秘书，换上便装，在心理上也是如此，他们变得平易近人，乐于突破礼节性交往的框架。“之所以可能同中央首长进行非正式的甚至推心置腹的谈话，也是由于这些日渐衰弱和多少都有些病痛的人与光顾克拉斯诺达尔斯克的客人不同，既不想开怀畅饮，也不想同殷勤周到的共青团女积极分子一起在澡堂嬉戏取乐，他们力图远离多年国事工作中业已厌倦的单调生活，谈论谈论抽象的事情。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本人和赖莎都是他们理想的交谈者。”戈尔巴乔夫夫妇与勃列日涅夫晚期的许多大人物正是从那时起才彼此相识，甚至“全家都很要好”。在年轻而有文化的夫妇面前，这些实际上大半生已经失去了正常人际交往的人“摘掉领带”，“变随和了”，将自己天性中身边的人早已忘怀或者压根儿不了解的那些方面裸露出来。在可以当着年轻书记放松一下的“莫斯科领导人”看来，这种交往是推心置腹的休息。但是对戈尔巴乔夫而言却依然是工作。雅科夫列夫回忆道：“当年的宫廷倾轧甚至不是作为决定政策的方式，而仅仅是作为在官场内生存下去的方式确立起来的”，“他不仅必须让老同志开心、听他们诉说衷肠，而

<sup>①</sup> 矿水城，俄罗斯北高加索中部城市，著名的生态度假区。在大高加索山北坡、库马河谷，属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在首府斯塔夫罗波尔东南约130千米处，连接顿河畔罗斯托夫与巴库的铁路在此处交汇，2013年人口75291。1920年设市。随高加索矿泉疗养区的发展而兴起。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sup>③</sup> 同上，第32页。

且必须当众向整个党的领导层及其具体代表人物深表敬意”。<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谨守着政治本分,但这却令这些疗养的领导人对他更加满意。于是,这位边疆区党的第一书记似乎一下子成了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宠儿”,先后受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器重。1978年12月勃列日涅夫授予他“十月革命勋章”,赞誉他“工作中有原则性和忘我精神”,1981年3月又授予他一枚列宁勋章。安德罗波夫上任后,极力创造各种条件将戈尔巴乔夫推向政治前台。1983年4月,安德罗波夫委托戈尔巴乔夫在列宁诞辰纪念日上作报告。戈尔巴乔夫对斯拉文说:“安德罗波夫想扶持我并千方百计地给我创造机会。这一次他利用了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方法:提供讲话的机会。这一方面意味着支持,另一方面意味着我应该提出新东西,展示自己的思想和对问题的理解。”<sup>②</sup>在契尔年科短暂的执政时期,戈尔巴乔夫确立了他在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利加乔夫指出:“虽然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之间从来不存在亲密关系,但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就是要把戈尔巴乔夫推上党的最高政治领导层非正式的第二把交椅,强硬地推行自己的路线,坚持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契尔年科远不像改革时期有些记者宣扬的那样,是个头脑简单、认识片面的人。在他执政期间,尽管并非一帆风顺,但戈尔巴乔夫的作用还是增大了。”<sup>③</sup>当契尔年科去世后,党内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可供当选总书记的领导人年龄太大了。于是,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来了。“乌斯季诺夫和契尔年科逝世后,拥护勃列日涅夫国家发展方针的人的统一联盟解体了,现在再推举一个年迈的领袖是危险的。而且合乎条件的人也寥寥无几,只有葛罗米柯和格里申可以竞选这个位置,但是他俩都已70多岁。剩下的就只有戈尔巴乔夫了,不论从年龄,还是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政治局里再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sup>④</sup>在葛罗米柯的支持下,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苏联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sup>③</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sup>④</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74页。

第二阶段的起止时间为 1985—1991 年。在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带着苏联社会的满腔期望发起了改革,却一步一步地将党和国家亲手推向毁灭的深渊。博尔金说,对于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苏联近几十年来还没有一位领袖受到人们如此的企盼、得到如此的信任和被寄于如此的希望,没有一位总书记能由于自己的外表、由于迷人的、坦诚的样子和能言善辩而令人们如此喜爱。他到退休时工作了六年多一点。他是在失去大多数人民的尊敬、失去威信和权力之后离开总书记一总统职位的。“确切些说,他是在瓦解了国家、抛弃了使他掌权的党变得无用之后被迫辞职的。他至今仍认为他掌权的六年是照亮一个伟大国家的胜利曙光,但是在历史上这六年将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经济崩溃、人民贫困的悲惨的六年。在美国,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及其统治结果被看作是西方在冷战中对‘罪恶帝国’的胜利,在我国则被看作是民族的灾难、各共和国和经济的分崩离析、科学及文化的大滑坡、许多社会精神财富的丧失、兄弟相残的流血冲突及贫困和饥饿的开端。”<sup>①</sup>在改革不断深化的时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政治的舞台上扮演着各种角色:苏共中央总书记(1985—1991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88—1990 年)、苏联总统(1990—1991 年)。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有两个角色:苏共和苏联的毁灭者、自我失业者。这种令人惊愕的政治滑稽戏,使戈尔巴乔夫“成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sup>②</sup>。

佩特罗夫不无感慨地说:“共产主义的大厦被推倒,就是世界上的万能之神苏共中央总书记所为。社会主义大厦的崩溃,是戈尔巴乔夫的杰作。”<sup>③</sup>

## (二) 利加乔夫

从安德罗波夫时期开始,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就成为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重要支持者。

1983 年 4 月,苏联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利加乔夫为苏共中央组织部部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406 页。

<sup>②</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32 页。

<sup>③</sup> 同上,第 27 页。

长。中央组织部是苏共中央的核心部门，主管干部和党的各级委员会。“如果考虑到那些年实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就应从广义上理解干部这个词，其中包括苏维埃干部、经济干部。”<sup>①</sup>戈尔巴乔夫指出：“因为苏共已经取代了一切，实际不仅是充当领导，而且履行了管理社会的功能，与其他部相比，党的组织部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部所管的问题范围也相当宽泛：除了边疆区党组织的组织工作以外，还在‘照管’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工作。不过主要的是，干部都在组织部的主管范围之内，这里包括各级官员，大大小小的各种重要职务，从非同小可的党内职务到工厂厂长、国营农场场长和集体农庄主任。也就是党内行话所说的‘选拔、分配和培养干部’。”<sup>②</sup>

利加乔夫被任命为组织部长的消息就是戈尔巴乔夫亲自通知的。利加乔夫说：“在安德罗波夫头脑精明但身体很糟的情况下，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作用迅速增大，由此我们看到了好的征兆。所以既然他们准备让我担当某种角色——应该说是引人注目的、但终究是辅助性的、事务性的，绝非主要的和声名显赫的角色，我便毫不犹豫地准备接受这个角色。”<sup>③</sup>当利加乔夫进入中央以后，他和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有了共同语言和共同志向。在利加乔夫看来，戈尔巴乔夫比他小 10 岁，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而我自然会认为，为了党和国家利益，应该帮助他，支持他。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 1983 年，正是戈尔巴乔夫被看作是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可能的接班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任务是完全明确的，我有义务承担更新干部工作中那部分令人不愉快的工作”<sup>④</sup>。

1985 年 4 月 23 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在戈尔巴乔夫的推荐下，利加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让利加乔夫主持会议。这一举动向党内外传达了明确的政治信息：利加乔夫是党内“第二把手”，是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然而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的亲密关系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随着两人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

<sup>①</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6 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63 页。

<sup>③</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17~18 页。

<sup>④</sup> 同上，第 25 页。

大,利加乔夫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愈来愈不稳定。

1986年3月13日,苏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戈尔巴乔夫对党的最高领导成员的职责进行了重新分工。戈尔巴乔夫亲自掌握政治局工作的组织、内外政策的基本问题、干部配置、总的经济问题、国防和国家安全、外贸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部——组织和党务部、公共部、经济部、行政机构部、国际部、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国外干部工作部、事务管理局。“第二书记”利加乔夫主要分管苏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权、科学文化问题、农工综合体的领导。同时,利加乔夫还负责对宣传部、科学和院校部、文化部、农业部的工作实行监督。

看起来戈尔巴乔夫仍然很重视发挥利加乔夫的作用,但是面对在党内权威日益加重的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政治制衡手段。在利加乔夫分管的领域,戈尔巴乔夫同时又安排了一个人与其共同负责。于是,利加乔夫很快就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两个中央书记同时管意识形态——齐米亚宁和雅科夫列夫,而且后者是戈尔巴乔夫最近的亲信,对他来说,利加乔夫的意见无足轻重。由梅德韦杰夫主管的科学与文化领域也是这种情况,梅德韦杰夫也是戈尔巴乔夫的亲信。而农工生产领域,则完全是原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多年经营的地盘。职责如此分工只能说明一点:“戈尔巴乔夫不想让自己身边有一个有力的‘第二书记’和潜在的竞争者。”<sup>①</sup>

在利加乔夫看来,戈尔巴乔夫要推行改革,这是应该的。因为苏联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但是利加乔夫认为,改革是可以的,甚至对党自身进行改革也不是不行。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才可以。这是改革的根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马特洛克指出:“利加乔夫认为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进行富有成效的改革。他赞成采取措施,使党更加讲究效率,更加实事求是。但对任何会削弱党对社会的控制,降低党的威信的举措持反对的态度。他坚持认为宣传媒介应在党所控制的范围之内活动,‘家丑’不可外扬。他也许是1987年苏联政治局内唯一一位仍然坚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29页。

信国家的内外政策应立于马克思‘阶级斗争’概念基础之上的委员。”<sup>①</sup>实质上,利加乔夫的改革观点属于“安德罗波夫大计划”,即不进行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规划的政治体制改革。“他当时对外界也许否认这一点,但他事实上却反对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提出的政治改革步骤。他们之间的分歧因该年戈尔巴乔夫采纳更加激进的改革方案而扩大。”<sup>②</sup>

利加乔夫的改革观点首先就与共同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发生了严重冲突和尖锐对立。利加乔夫是个正统派,对他坚信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原则从不动摇。多勃雷宁回忆:“当我刚开始在书记处的工作时,戈尔巴乔夫就坦诚地告诉我,他尊重利加乔夫作为一个党的组织者的才干,这减少了他日常例行公务的负担,但就思想和文化发展而言,戈尔巴乔夫说利加乔夫根本不是一个‘革新派’,因为他学到的全部理论差得远啦,然而他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党的思想纯洁。”<sup>③</sup>雅科夫列夫作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灵魂”,始终认为改革就是要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落后观点,建立一个人道的民主的自由的公民社会。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分歧从根本上对立起来了,以至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利加乔夫经常性地批评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采取了软抵抗:要么闭口不言,要么根本就不来参加会议了。

怎么看待戈尔巴乔夫的这种人事安排呢?克留奇科夫指出:“当戈尔巴乔夫身边有雅科夫列夫和利加乔夫时,他俩可以起到平衡观点的作用,使戈尔巴乔夫自觉与不自觉地采取中间立场。但如果利加乔夫远离戈尔巴乔夫的话,雅科夫列夫的影响和能量就会立刻增强。”<sup>④</sup>雅科夫列夫最终还是赢得了戈尔巴乔夫的信任。这是由利加乔夫所不具备的另一种身份——知识分子——决定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雅科夫列夫把和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sup>②</sup> 同上,第124页。

<sup>③</sup>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698页。

<sup>④</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91页。

总书记的私人谈话确立在一个高知识层面上,这使得他成为戈尔巴乔夫信得过的谈话伙伴并将他的思想渗透给戈尔巴乔夫。“这种行动的结果使雅科夫列夫得以控制了思想领域,并在他成为羽翼丰满的政治局成员和戈的最亲密的助手之后戈尔巴乔夫最终将这一思想领域放心地交给了他。”<sup>①</sup>

利加乔夫与雅科夫列夫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冲突,让戈尔巴乔夫一时很难下决心给出定论。对利加乔夫来说:“我与雅科夫列夫以前的关系是平和的,而我与戈尔巴乔夫是友好的,……1985年4月以前我们一起开始了改革。”<sup>②</sup>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从思想的亲近上来看,戈尔巴乔夫是比较倾向于雅科夫列夫的看法。毕竟,早在1983的时候,两人就已经建立了联系。并且,戈尔巴乔夫还向安德罗波夫推荐了雅科夫列夫。但是从现实政治考虑来讲,戈尔巴乔夫又不得不重视利加乔夫的意见。毕竟,在改革进行到1987—1988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充分的把握将党带到另一条道路上去,戈尔巴乔夫需要利加乔夫及其背后的党的政治力量。但是要对利加乔夫进行敲打。

很快,戈尔巴乔夫就找到了机会。1988年3月13日,在整个改革时期引起政治上轩然大波的尼娜·安德列耶娃《我不能放弃原则》事件爆发了。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之间的矛盾瞬间全面爆发。在切尔尼亚耶夫看来,这两个人在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在党内甚至在社会上“象征”着改革的两条路线。他们俩为争取戈尔巴乔夫而相斗,希望他当自己路线的领头人,而他则想把两人都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以便在工作中团结他们来推行他自己的、在当时就已是“中间”(虽然在两年后才使用这个词)的路线。但他未能统一这两条路线,这是改革的客观逻辑本身决定的。就个人而言,他对两个人的看法都有错误。其中一个人越来越与戈尔巴乔夫对着干,深信正是他的新斯大林主义改革构想是唯一正确的,虽然我认为他更多遵循的是他所理解的“事业的利益”(这样的本性!),另一个人则对自己完全“控制”戈尔巴乔夫的能力越来越感到失望,对他抱怨(“在政治局没有维护我,在报上没

<sup>①</sup>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698页。

<sup>②</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

有反对诽谤者”),并想建立自己个人的政治“形象”。<sup>①</sup>

雅科夫列夫抓住时机向戈尔巴乔夫进言,尼娜·安德列耶娃的信代表了党内保守势力对改革的反扑。他的意思不言而喻,利加乔夫就是最大的幕后“黑手”。戈尔巴乔夫表示赞同。于是,在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之间,戈尔巴乔夫作出了政治选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利加乔夫被迫作出检查。但是利加乔夫始终坚持:“我只是在《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它。”<sup>②</sup>

利加乔夫在政治局上被迫作出检查的举动严重损害了他在党内的政治威信。因为这一举动表明:利加乔夫已经失去了党的总书记的支持了。于是,在戈尔巴乔夫解决了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之间的矛盾后,又顺手解决了利加乔夫的问题。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利加乔夫虽然赢得了对叶利钦的胜利,但他的威信却每况愈下。他对政治改革的反对使得戈尔巴乔夫对他失去信心。作为“否定因素”,利加乔夫被排挤离开了第二书记的位置,只管农业问题。<sup>③</sup>更为严重的政治后果是,随着戈尔巴乔夫取消利加乔夫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权力后,中央书记处实际开始陷入瘫痪状态。因为戈尔巴乔夫本人并不喜欢召开书记处会议。一方面,这是因为他更愿意独自作出决定,然后再让党去执行。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早就有改组中央委员会的想法。现在,机会来了。1988年9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下成立6个专门委员会,作为他的政治咨询机构。于是,中央书记处虽然没有被明确宣布取消,但实际上已经无法工作了。对戈尔巴乔夫这一公然背离苏共党章的做法,利加乔夫选择了沉默。他说:“中央书记处有近一年的时间没召开任何会议,虽然在公开场合并没提过。在地方上以及国外,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也经常会有人向我提很多相关的问题。我的回答是,现在就各类问题的解决成立了专门的中央委员会。我认为,只要不在政治局会议上,或是在中央全会上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亞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24~225页。

<sup>②</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46页。

<sup>③</sup> 同上,第110页。

讨论取缔书记处的问题，我就会容忍错误的发生。”<sup>①</sup>只是在苏共二十八大之后才恢复了书记处的经常性会议，而且可以发现，中央各委员会还在继续工作。现实生活表明，两者互不妨碍、不矛盾。利加乔夫这时才敢肯定：“终止书记处工作是人为的、有预谋的行动。”<sup>②</sup>但是这个时候说什么也已经晚了。

1989年5月，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拉开了苏联政治的新时代——公开的反共活动开始了。利加乔夫这才认识到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剧烈反转。他说：“开始，我认为侦察员格德良和伊万诺夫攻击的只是我个人，目的是把我驱逐出党的领导核心，并以此加官晋爵。但是当一些舆论工具十分积极地参与诉讼案件，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色彩时，我开始明白，矛头不单是指向我个人，而是要败坏整个政治局的形象。后来，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事情发生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当时，在一些人的发言中首先暴露出党和苏维埃的对立——党和苏维埃谁高？我听了这些发言后立刻明白，社会发展的某个新阶段正在开始。这个新阶段对国家和人民都不是什么好的预兆。格德良攻击出现在新阶段来临之前：准备进攻苏共，打算掀起反共运动。”<sup>③</sup>利加乔夫在政治上的光明磊落和在许多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使他成为相当一部分“民主派分子”的攻击目标。“利加乔夫的名字已成了‘反动分子’和‘保守分子’的代名词。”<sup>④</sup>

1990年7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全盘接受了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在政治大崩盘的情况下，苏联共产党走上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但是此时的利加乔夫已经无能为力了。7月11日，苏共二十八大经过表决产生了8名苏共中央副总书记候选人。在选举中，戈尔巴乔夫推荐的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伊瓦什科击败利加乔夫，当选苏共中央副书记。他的胜利，宣布了利加乔夫政治生命的结束。

那么如何评价利加乔夫在改革中的作用呢？

克留奇科夫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在一定

<sup>①</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07～108页。

<sup>②</sup> 同上，第109页。

<sup>③</sup> 同上，第193页。

<sup>④</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91页。

时期内才会有所顾虑，停留在一定的范围内，不敢贸然踏上险途，而那些改革的“施工者”和“设计师”们正是要把国家推上这条道路。需要强调的是，利加乔夫并非像那些属于“民主派”的宣传工具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他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改革，明白改革的必要性，但主张改革要经过周密的考虑，避免走上极端。”<sup>①</sup>

不能说利加乔夫是一个排斥新事物的人，他的特点是：很难放弃过去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以及过去的政治、经济方针，他很谨慎地对待新事物，不能容忍任何违背马列主义思想的事情。他一贯主张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但同时认为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一贯主张以谨慎的态度对待改革，常常提醒人们注意一些试验的不良后果，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利加乔夫支持建立强大的执行权力机构，但反对部长会议决定所有重大问题。他与雷日科夫常常为此而争论，这一点还一度影响了他们的私人关系，只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灵活性才避免了公开的政治冲突，准确地说，总是戈尔巴乔夫把他们劝开。

克留奇科夫认为，应该给予利加乔夫积极的评价，他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决定，认为它们可能造成消极后果，主张进行渐进式改革，不应贸然行事。但他过于相信党的决定和行政指令性管理方式，这是由于他对旧方法的忠实所致。他渴望社会“健康”，于是便支持方式上严厉粗暴的禁酒运动，却忽视了由此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sup>②</sup>

### (三) 雷日科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于1929年9月28日出生，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9年毕业于乌拉尔基洛夫工程学院，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位于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制造厂工作，先后担任过分车间主任、车间主任、总焊接师、副厂长、总工程师和厂长等职。1971年，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制造厂同该市其他几个单位合并成

<sup>①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89页。

为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生产联合公司，雷日科夫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这个厂建立于 1928—1933 年，是全苏同行业中的最大企业之一，公司总经理享受副部长职级。这一职位的获得使雷日科夫具备了比较高的政治级别。

1975 年，雷日科夫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调往莫斯科，先后在苏联重型运输机器制造部和国家计委两个重要部门主持常务工作。1979 年，雷日科夫升任苏联重型和运输机器制造部第一副部长。在 1979—1982 年期间，雷日科夫被任命为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委是苏联部长会议的核心部门，负责全苏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这一任职，大大提升了雷日科夫经济管理的综合能力。很快，雷日科夫的经济才能就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

1981 年雷日科夫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82 年 11 月，在安德罗波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的中央全会上，雷日科夫被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兼任新成立的负责统管国民经济事务的苏共中央经济部部长。从这时起，雷日科夫开始同戈尔巴乔夫在书记处共事。

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在他的推荐下，在 1985 年 4 月的中央全会上，雷日科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苏共中央书记，从而与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一起，成为 20 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兼任苏共中央书记的三名显赫者。1985 年 7 月，雷日科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法案委员会主席，1985 年 9 月 27 日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85 年 10 月被解除苏共中央书记职务。

1989 年 6 月 7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以多数票赞成，9 票反对、31 票弃权通过了雷日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的任命。

但是随着 1990 年 12 月 25 日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与总统制匹配的苏联内阁时，苏联部长会议结束了它的历史。1991 年 1 月 14 日，根据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提名，苏联最高苏维埃同意了 53 岁的苏联财政部长瓦连京·帕夫洛夫担任政府总理，雷日科夫终于离职。

## 二、左膀右臂：雅科夫列夫与谢瓦尔德纳泽

科伊乔·佩特罗夫认为，对“改革”的进程及其恶果负有责任的主要高层人物结成“三人帮”：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以上三人，“总书记和另外两位政治局委员，构成了‘改革’的政治拳头。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友谊不是太牢固，但他们的结盟毕竟说明了加强党在成熟社会主义时期的作用的理论，他们及其追随者们的权力和特权都大大增加，而对其他不同意改革的人则采取另外的管理办法，取消了他们的特权和权力”<sup>①</sup>。正是在这三个人的努力下，苏联经历了从内到外的全面失败。

### (一) 改革的“灵魂”：雅科夫列夫

谁也无法忽视雅科夫列夫在摧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体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没有戈尔巴乔夫作为总书记—总统的权势——他必须依靠戈尔巴乔夫才能获得权势。“这两个我们现实生活的罪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既是改革的‘设计师’又是‘施工者’，他们在一起参与阴谋的制定与执行，他们达成一致，相互配合，紧密协作，有机地相互补充。有时出于战术上的考虑还变换角色。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与雅科夫列夫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态度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sup>②</sup>但是雅科夫列夫拥有在整个改革时期谁也无法撼动的最大权力——思想的力量。无论是反对、痛恨他的人还是赞赏、肯定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改革的基本观点是雅科夫列夫提出来的。”<sup>③</sup>也正是因此，雅科夫列夫“成了戈尔巴乔夫的邪恶智囊人物，诱使戈尔巴乔夫摧毁了他得以维系其权力的党组织”<sup>④</sup>。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44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61~262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57页。

<sup>④</sup>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698页。

对雅科夫列夫来说，“改革运动从开始起就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生了矛盾。马克思主义宣布自己是关于建设体现社会公正的社会的学说。很少有人对此感到困惑：怎么会有关于专门研究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的学说。可是，古拉格群岛从肉体上消灭了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而半个世纪以来使人们同周围世界隔绝并配合以极度意识形态化的教育制度，最终完成了已开始的‘伟业’。真正相信可能建成‘人间天堂’的说法的几代人成长起来了”<sup>①</sup>。雅科夫列夫开始尝试着对苏联共产党信奉的政治学说进行反思。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了雅科夫列夫以极大的触动。“赫鲁晓夫刚刚讲了几句斯大林的罪行，我就感到浑身发冷。当时我是个怎样的人呢？年纪轻轻，对于马列主义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尚未完全消失，我是抱着这个信仰经过卫国战争的。对于所许诺的人间天堂的到来，我还抱有希望。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对于童话般未来的着迷产生了多么强大的愚弄和欺骗作用啊。当然，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脑子里已经产生了某些模模糊糊的疑虑和不合时宜的问题，不过我劝自己说，这些问题并不是那么重要。我把它们赶到一边去，因为对于党的设想之‘壮丽’的信任，对于‘克里姆林宫智者’（他们比别人都更清楚该做些什么）的景仰仍然主宰着我的头脑，我驱赶着任何仿佛是不相干的思维。我心中感到一种令人压抑的空虚，却对严肃的结论以致行动尚未做好准备。”<sup>②</sup>

苏共二十大以后，雅科夫列夫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在美国的学习，对他的思想的转变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我比较年轻，具有非常矛盾的思想，在我头脑里已经扎下了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我回国了，尽管在思想问题上已向右转了。”<sup>③</sup>于是，回国后的雅科夫列夫又一次遭遇了政治上的挫折。

从1968年起，雅科夫列夫成为苏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但是他的政

<sup>①</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

<sup>②</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患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20页。

<sup>③</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0~21页。

治命运在 1972 年发生了转变。1972 年 11 月 15 日,《文学报》刊登了雅科夫列夫题为“反对历史主义”的文章。“他在文中猛烈抨击了俄罗斯自我意识的觉醒,错误地给它扣上了‘家长制残余、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大帽子。”<sup>①</sup>雅科夫列夫的观点不能被当时的苏共领导容忍,于是他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从苏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职位上被“流放”到加拿大,担任苏联驻该国的大使。马特洛克指出,雅科夫列夫曾有非常广泛的国外经历,他被任命为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在渥太华居住了 10 年。在那些年,莫斯科的谣言工厂称这一任命是从上层政治生活中“流放”,认为雅科夫列夫所写的一篇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文章导致了此事。然而雅科夫列夫说,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他感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越来越困难。在其他事情上,他力图降低在他看来对勃列日涅夫过分的颂扬,而只学习属于勃列日涅夫本人首创的东西。当共产党官员攻击他没有事先清理他的文章时,他请求调到国外工作,如果可能,到英语国家工作。<sup>②</sup>

在加拿大的任职长达十年之久,苏共中央将雅科夫列夫与苏联政治生活隔离了,但却进一步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经历不仅对雅科夫列夫本人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他即将遇到的“贵人”——戈尔巴乔夫来说也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他们对国内外的事情有着共同的看法。

1983 年 5 月,戈尔巴乔夫出访加拿大。这次访问对雅科夫列夫和戈尔巴乔夫两人影响都是很大的。对雅科夫列夫来说,这是他的一次极好的政治机会——作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的到访,可能会为他重返苏联政治舞台提供良机。因此在雷日科夫看来,雅科夫列夫对到加拿大正式访问的当时还不起眼的政治局委员、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关怀备至,以至于他在改革失败后总结原因时特别指出了这次会面的不同凡响。“雅科夫列夫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一般人,也不是政治局的普通成员,他在摧毁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事情上,留下了极为浓重的一笔……人们只能凭猜测来确定他在把戈尔巴乔夫推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起

<sup>①</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135 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82~83 页。

到了什么作用。他们之间的交往密切,是从 1983 年开始的。”<sup>①</sup>雅科夫列夫自己也说:“我同戈尔巴乔夫在农业部部长韦兰农场里的谈话具有标志性意义。有些政治家和观察家认为这是改革的开始。”<sup>②</sup>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次对加拿大的出访以及同雅科夫列夫的交谈使他耳目一新,好像找到了思想上的知音。博尔金指出:“这次访问对后来《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作者了解西方世界发生的一切,了解关于国家发展的另一种观点,了解民主化、自由和公开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戈尔巴乔夫同我交谈时说,在加拿大,雅科夫列夫阐述了自己对苏联和世界发展的看法以及振兴我们社会的途径。这次访问对雅科夫列夫后来的命运也具有重要影响,戈尔巴乔夫出访之前,国内并没有急于调雅科夫列夫回国。”<sup>③</sup>于是当戈尔巴乔夫回国后,打算请求安德罗波夫将雅科夫列夫调回国内任职。这一请求遭到安德罗波夫的拒绝。

雷日科夫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一次,当我与安德罗波夫单独会见后,戈尔巴乔夫应约来见他。戈尔巴乔夫向总书记汇报他出访加拿大的情况。他肯定了这个国家的农业技术、肥料、储存和农产品加工。安德罗波夫认真听取汇报后,平静地说:如果您喜欢加拿大的农业,就想一切办法把咱们的也搞成那样吧。戈尔巴乔夫见总书记心情很好,于是决定向他建议,意思是我们的大使雅科夫列夫在加拿大已经待了 10 年,在那里待够了,也许该把他召回莫斯科了?……安德罗波夫突然严肃起来,很不客气地对戈尔巴乔夫扔下四个字:“让他待着!”……不久安德罗波夫死了,雅科夫列夫也就回到了莫斯科。<sup>④</sup>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123 页。

<sup>②</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患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312 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44 页。

<sup>④</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123~124 页。

回到莫斯科的雅科夫列夫很快就得到了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重用。1985年7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时年63岁的雅科夫列夫被提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外电认为:“他是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外的新形象的设计者。”<sup>①</sup>1987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了专门研究经济改革构想的全会。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组成发生了变化,雅科夫列夫、斯柳尼科夫和尼科诺夫成为政治局委员。外电评论:“雅科夫列夫获得提升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显然是得分。”<sup>②</sup>

不忘“知遇之恩”的雅科夫列夫立即投入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伟业”之中。他长期领导“写作班子”的工作,“总书记的报告讲话中的主要提法其实都是他的发明”<sup>③</sup>。不仅如此,雅科夫列夫制定改革的种种方案,为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选配干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以为,改革所遇到的全部问题在于具体的人,在于他们素质差,他们的行动不受监督,也在于没有公开和民主选用各级干部。于是,在他私下写给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发展的无上命令”的长信中,雅科夫列夫论证了他的改革方案。其后的改革实践证明,这一方案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蓝本。

1985年12月底,雅科夫列夫给戈尔巴乔夫呈送了一份长篇变革方案。在方案中,雅科夫列夫力图论证把苏共分成两个党的必要性,甚至这是无上的命令。这样,两个党就可以构成民主竞争的局面,在这条路上,它们会自我更新,通过民主选举互换执政地位。社会也就能从中获得强大的活力。在这封题为“政治发展的无上命令”的长信中,雅科夫列夫认为:

一切日后改革的目标是人,“是人的所有相互关系和各种表现,即生产、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爱好、心理、健康等等”。

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

今天问题不仅仅在于经济,尽管它是向前发展的物质基础。关键

<sup>①</sup>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7年1月28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1月30日。

<sup>②</sup> 路透社莫斯科1987年6月26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6月28日。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94页。

在于政治体制，确切地说在于政治体制怎么运作，怎么发展，怎么面向人，在于政治体制同人的关系，在于政治体制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服务作用。因此，必须：1. 消灭言行脱节现象，使个人、集团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越来越密切地融为一体。2. 根据每个阶段的具体历史条件，坚持不懈地充分实现民主主义。3. 使人发展成为在思想和行动上能自觉地团结其他人的、独立的、富有创造性力量。使每个人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4. 切切实实地吸收所有人来改善地方和全国的生活。这是关系到解决头两项任务的主要关键。这里有着消除社会不满的基础……

#### 关于改革的基本原则：

1. 民主——这首先是选择的自由……2. 对生活的所有方面的革新要综合进行——从经济到民主的多种形式上的外表特征……3. 在关键领域（首先是党内）的改革要同时或甚至提前进行……4. 改革必须坚决进行，只应受现实可能性的限制，因为考虑到一系列国家职能要有一个逐步（尽管是在将来）消失的过程……5. 改革本身应该不只是从上面进行，而且应该由群众从下面进行。6. 吸收学术界的力量来研究并实施民主化的进程以及对民主化的中间成果进行监督。

#### 关于选举：

选举不应该是推举，应该是选拔，而且是选拔优秀人才。可以对提名的候选人名额加以限制（但不应少于两个候选人）。

代表应该依从选民的意愿，应该通过自己的嘴真正反映选民的意见，而不是用选民的名义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样做的结果是：代表对群众的真正责任心、从属群众并受他们监督的程度空前提高。……这将首先特别是有效地影响到使地方苏维埃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

#### 关于公开性：

全面的公开性，就是及时提供包罗万象的信息，这是社会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消息灵通的人才能有创见地和富有成效地参与社会事务。要想号召不掌握广泛信息并处于不利于发挥这种创造积极性的社会气氛中的人们表现出公民积极性来，是不可思议

的……

关于司法权：

司法权真正独立于其他各种权力……

关于人权：

与此同时，应切实保证行使个人的权利。应该制定人权及人权保障法……

关于经济问题：

……群众的切实参加经济的权利、管理和销售活动，建立积极的能自我发展的基础，这才能达到个人、集体和社会的利益真正的、有机的和始终不渝的一致……

几条建议：

……为了这些目标，有必要采取下述原则性的领导体制：1. 由苏联总统行使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2. 总统通过全民直接投票……3. 共产主义者联盟由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两个党组成……4. 总统下设两名副总统……5. 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6. 最高苏维埃的工作和职能具有特殊性，需要另作考虑……

最后，雅科夫列夫宣称：

这将是历史性的革命改革。这样时代要求的压力下将会减小。像个人的积极性、人员的更迭、同情性作斗争等等问题的解决，将不会特别费劲。社会的政治文明将提高，也就会有实实在在的稳定局面。<sup>①</sup>

雅科夫列夫提出的上述方案，“无论如何不是政治局的意见。这些问题从来没有全面提出过，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会议上讨论

---

<sup>①</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76～182页。

过”<sup>①</sup>。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实践中却正是按着这个方案一步一步走下来的。

戈尔巴乔夫非常欣赏雅科夫列夫的思想主张。于是,在总书记的支持下,这位新任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开始在借着“公开性”的名号大肆进行社会舆论调整——更换新闻领导,尽管主要的任命仍需要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但他能够主动提拔他所选中的人。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这一起悲剧性事件为雅科夫列夫提供了机会,把某些活力注入死气沉沉的苏联新闻媒介。当放射性尘埃开始沉降,这场巨大灾难的某些情况开始为克里姆林宫所知时,如果进行改革,那么显然过去那种过分保密的做法就不能持续下去了。苏联领导人的国际地位动摇了,由于未将真实情况告诉世界,正当他们最需要信誉的时候却失去了它。“切尔诺贝利事件仅仅是一个突出事例,长期以来,许多观察家已对这类问题掌握了很多情况:即使作为宣传工具,苏联的新闻媒介也一钱不值。报纸和电视迟钝单调,缺乏信息,根本引不起苏联公民的注意;如果他们想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就去收听外国的无线电广播。那些不收听外国电台的人,要等好几天才能得知有关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消息,而且即使到那个时候,这些消息也是很不完全的。”<sup>②</sup>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使得戈尔巴乔夫深刻体会到了“公开性”带来的政治效应——增强了总书记的改革形象。于是,戈尔巴乔夫决定让雅科夫列夫承担更大的责任——与党的“二把手”利加乔夫一起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不管是出于平衡利加乔夫的权力也好,还是戈尔巴乔夫想进行意识形态改革降低利加乔夫的抵制,雅科夫列夫都可以光明正大地插手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对戈尔巴乔夫的这种人事安排,博尔金是这样认为的:“让两位中央书记负责同一项工作,这在客观上使苏共的两位领导人发生了矛盾……总书记甚至还不无用意地为这场争斗推波助澜,他的用意就是让他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15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5页。

们在这场争斗中两败俱伤，以后他们就会听话了。最初他并未意识到，在政治角斗场上进行的不是党的领袖人物的权欲之争，这是党的活动和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还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是戈尔巴乔夫能马上明白所发生的一切的话，他也就不会自食其果，不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总书记天生不具备战略头脑，他围着自己燃起的篝火起劲地忙碌着，不时地添上一把干柴，为那燃起的火苗高兴不已。”<sup>①</sup>

很快，因尼娜·安德列耶娃发表的《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引发的与利加乔夫的尖锐冲突，使雅科夫列夫成为最终的获胜者。虽然戈尔巴乔夫为了党内团结考虑，同时免去了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分管的意识形态工作，任命中央书记梅德韦杰夫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新负责人。但是谁都知道，梅德韦杰夫与雅科夫列夫其实是一伙的。于是“雅科夫列夫彻底地变成了苏联高层领导中右派激进主义的化身。他不顾现实，打乱了改革的节奏，危及改革的进程。”<sup>②</sup>其实，如果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那么所有后续工作都应在一个整体方案的基础上进行，这一方案应计划缜密、考虑周全，具有基础性和系统性，但实际上恰恰没有这种方案。克留奇科夫指出：“在改革进程中，甚至连个完整的改革实施计划草案都没有，只是制订了一些涉及个别领域的计划，但是也是感情用事，政策摇摆不定！混乱无处不在，领导人只是凭感觉在作决定，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些决定杂乱无章、前后不一。现在清楚了，这样做是有预谋的，是为了掩盖他们企图破坏联盟、颠覆现行的宪法制度、破坏苏联国家体制的真实计划。而这一计划，从一开始就被明确地、坚定不移地执行着。可以感觉到他们有高超的指挥艺术，准确地对一些关键性的目标进行致命的打击，向着隐秘的目的地一步步靠近。由雅科夫列夫开好头，然后由戈尔巴乔夫推向前进。有时，为了掩人耳目，两人也时常对换一下角色。苏联所发生的事件并不具有客观必然性，这是主观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由于一些人的行为所致。这一破坏进程的罪魁祸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53~154页。

<sup>②</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

首就是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俩人。”<sup>①</sup>

那么怎么评价雅科夫列夫的历史观及其在改革的作用呢？怎么看待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呢？

关于雅科夫列夫的历史观。对雅科夫列夫来说，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一出荒诞剧。“苏维埃政权从成立之初，就已经全面腐败——政治腐败，思想腐败，经济腐败，道德腐败。”雷日科夫愤慨地指出：作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对自己国家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它是个帝国，其中的加盟共和国似乎被剥夺了一切自由。他的思想、主张、全部活动，表明他对养育他的俄国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其中包括俄罗斯人，没有一丝的尊敬。对雅科夫列夫来说，俄国历史的整个苏维埃时期就是一团漆黑。直到 20 世纪的 90 年代，当直言不讳成为时尚的时候，雅科夫列夫才开始讲真话：他彻底否定 1917 年的十月革命和列宁。他混迹苏共达数十年，爬到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但对待苏共却完全抱仇视态度，全然看不见它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1991 年 8 月之后，他公开和示威性地谈论自己在把党赶下政治舞台过程中个人的功劳。自诩为“改革”创始人的他（当然不止他一个人），“强烈地仇恨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sup>②</sup> 在雅科夫列夫看来，戈尔巴乔夫以前的苏共领导人都是有着巨大的政治缺陷的。他说，列宁是 20 世纪的一位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他对不同政见持不容忍态度，而且残酷无情，他只作能带来好处的妥协，他把夺取政权的目的置于道德之上。斯大林是职业掘墓人，他个性暴戾，是最奸诈的恶棍，他是布尔什维主义制度最明显的代表人物，拥有要诡计、说假话、搞恐吓的能力，是封建主义的国家镇压制度的创始人。赫鲁晓夫是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第一步，他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始者决裂，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262 页。

<sup>②</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124 页。

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从来就无法解决，但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勃列日涅夫是衰落时期的一名闹剧丑角，开始时他曾想“纠正”些什么，可是很快就对事情冷淡下来；他喜欢勋章、光荣头衔和各种隆重的礼仪活动；生前最后的五六年，重病不起，实际上已不能工作，但一直被精心隐瞒，但是看来制度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有生气的管家，这已经不是他的过错，而主要是垂死的单一政权的征兆。安德罗波夫是位狡猾阴险而经验丰富的人，他是通过国内流放和驱逐出境、关进监狱和精神病院组织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镇压和经常施加压力的能手；他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整顿上层建筑，是消除上层建筑的污垢，因为这种污垢已超过了范围，他是看到了这一点。契尔年科是我们这个制度即将覆灭及毫无生命力和完全不合格的最耀眼的信号，他在事业上毫无作为，他最喜爱的是读劳动群众的来信，他上台执政这个事实本身就荒谬绝伦，这使国内很多人觉醒起来。<sup>①</sup>

关于雅科夫列夫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尽管雅科夫列夫最后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是共同的。格拉乔夫指出，如果将“改革之父”戈尔巴乔夫与“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当时精神上的联盟看成他们精神上有机接近的明证，那就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细微差异。至少就雅科夫列夫而言，如果相信他后来的说法，那么对列宁和社会主义的礼仪性的顶礼膜拜，仅仅在初期反映了他那尚未克服的“错误观念”。“我们曾试图为了真正的宗教和真正的耶稣毁掉教堂，当时还仅仅是模模糊糊地猜测到：我们的宗教是虚伪的，我们的耶稣也是伪造的。”然而这种顶礼膜拜很快就变成了不得不采取的政治策略，其理由就是改革的计划“始于党内，只能宣布为旨在巩固社会主义和党的阵地的倡议”。他自己承认，到了改革的结尾阶段，忠于社会主义的“游戏”对他说来就归结为政治上的“花招”，其目的就是避免与那个愈来愈显得好斗的保守派阵营发生正面冲突。<sup>②</sup> 雷日科夫在分析雅科夫列夫和戈尔巴乔夫关系时指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是我们现实中的一对凶狠的家伙，他们整个一生都在以虚伪的面目示人。他们一

<sup>①</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02~204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18页。

个是改革的“设计师”，还有一个是改革的“施工队长”，无论在阴险的“创意”上还是在“创意”的实行上，都是狼狈为奸，互为补充。直到苏联垮台之后，党被禁止活动，这两个家伙才抛去假面。正是党指引了他们的生活道路，而他们却毁掉了党，这两个政客全都背叛了自己伟大的国家和人民。历史已给予他们以符合实际的应有评价。而那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年代离我们越是久远，社会就越是能够深刻而客观地评估这两个“该隐”的所作所为。<sup>①</sup>

关于雅科夫列夫在改革中的作用。对于雅科夫列夫的巨大破坏性作用，克留奇科夫认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他认为，那些自称为民主派或者相信自己属于民主派的人至少能分为两类：第一类人根据他们活动的性质，可以把他们划入破坏者的行列中，他们批判历史、现实，甚至批判未来，他们没有任何建设性计划，主要目的就是破坏！雅科夫列夫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鲜明”的代表，后来他的所有活动都具有破坏性。他赞成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虽然他曾坚定地站在维护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上。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后来醒悟了呗。然而怎样才能实现从一种社会制度转向另一种社会制度呢？像他那一级别的人都应该考虑这些事。如果走改良的道路，则能减少人民的损失和痛苦、避免社会动荡，也就是用最少的代价来进行，这是一种情况。如果走全面的破坏道路，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民族之间发生流血冲突、国际地位下降、领土完整受到威胁等，那就是另一种情况。1989年初，雅科夫列夫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不必担心支撑国家与社会的基础被破坏，两三年后，国家形势将会好转，事业将得到大发展。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遗憾地说：“我没能及时认清这个历史上罪恶最深的人物之一，这是我的过错，也是我的灾难。”<sup>②</sup>

克留奇科夫继续指出：

国家的确需要变革，需要改善现有的体制，需要对政治路线作一定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53页。

的修正,需要摒弃一些陈旧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完全避免极端主义当然是不可能的),需要新的方法。戈尔巴乔夫自己这样讲,雅科夫列夫的讲话和文章开头结尾也都是这些话。怎样反驳他们呢?从总体上看,这似乎没有什么错。

许多人赞成它,包括我自己。因为关于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安德罗波夫就已经提出,只是提得不这么迫切,非常谨慎,这也符合安德罗波夫这位极富责任感的政治活动家的素有的风格。

但是没有人会赞成肢解苏联,也没有想过要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人们的愿望是加强联盟,巩固大国地位,整顿国家秩序,加强法纪。很有可能,戈尔巴乔夫起初也是这样想的(但后来的情报和事态发展使我很怀疑这一点),但雅科夫列夫从一开始就绝对不怀好意!

我对这番话不仅负全部责任,而且了解内幕。现在,当我们目睹了一幕幕悲剧,当许许多多的苦难与不幸降临到我们民族的身上后,许多问题也就有了答案。雅科夫列夫在这一切事件之中所扮演的罪恶角色也越来越清楚,他似乎早就摘掉了面具,这就是他——雅科夫列夫,这位“恶魔”在我们面前原形毕露,他是我们历史上的“灾星”!<sup>①</sup>

1991年8月15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常委会决定:“由于苏共党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行为违反苏共章程并且旨在分裂党,认为他继续留在苏共队伍是不可能的。”

1991年8月16日,雅科夫列夫宣布退出苏共。

## (二)外交“新思维”:谢瓦尔德纳泽

爱德华·阿列克谢·谢瓦尔德纳泽,格鲁吉亚人,1928年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194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先后毕业于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党校、国立库塔伊斯师范学校。1946—1961年间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先后担任区团委指导员、部长、格鲁吉亚团中央指导员、库塔伊斯市团委第一书记,格鲁吉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57页。

亚共产党库塔伊斯市委指导员。1957 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61 年当选为格鲁吉亚共产党姆茨赫塔区委第一书记、第比利斯市五一区党委第一书记。1964 年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72 年为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市党委第一书记，同年升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1978 年 10 月，谢瓦尔德纳泽被提升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 年 7 月 1 日，晋升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7 月 2 日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成为十月革命后苏联第十任外交部部长。<sup>①</sup> 时年 57 岁。

谢瓦尔德纳泽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部长引起了外界的猜测。因为全世界几乎不了解这位新任外长。就像叶利钦说的那样：“任命谢瓦尔德纳泽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职务曾使许多人大吃一惊。尽管他是一个加盟共和国（但不是最大的共和国）的领导人，却没有外交经验。”<sup>②</sup>

看来，这是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为了推行改革而在外交领域的一次重大人事调整。此前，苏联的外交部部长是葛罗米柯。葛罗米柯的外交思维是典型的苏维埃式思维，或者说，是苏联传统外交思想的集中体现。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说：“他最优先的目标就是捍卫他认为是国家利益的东西，而首当其冲的是捍卫我们在那场打败纳粹德国的残酷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作为斯大林的门徒，虽然他是一个诚实而正派的人，但他不太重视外交政策中如人权这样的伦理问题。他不相信这样的抽象命题在政策上或在影响早日与西方达成基本协议的可能性上会成为重要因素。”<sup>③</sup> 在格拉乔夫看来，葛罗米柯不仅代表了“冷战”的政策和时代，而且代表了整个苏联思维的学派，这个学派按自己的逻辑认为，只有将从雅尔塔协定时代即保证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的战后原状“冻结”起来，才能保证苏联在世界上的重要价值。由此便挑衅性地拒不接受可能动摇、撼动这个原状和使之模糊化的一切。由此也产生了策略：“拖延”、模拟谈判，顶多同意停止军备竞赛，而

<sup>①</sup> 注：先后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的是：托洛茨基、契切林、季维诺夫、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谢皮洛夫、葛罗米柯、谢瓦尔德纳泽、别斯梅尔特内赫、潘金。

<sup>②</sup>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166 页。

<sup>③</sup>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年，第 650 页。

不能同意裁减军备,更不用说不均衡裁军了。<sup>①</sup>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葛罗米柯在国际上的“不先生”名声使苏联形象不佳,是贯彻外交新思维的一大障碍。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但是要想推动国内改革,首先要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而不能再延续“冷战”的政策了。“按照遵循新政治思维的浪漫主义者戈尔巴乔夫的信念(他自然自认为是个脚踏实地的实践家),试图将处于飞速变化的世界中的苏联的国内局势和周边局势冻结起来,只会导致体制以至国家的历史性崩溃。他相信,只有经过改革之后的苏联,方可植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平起平坐地’与西方世界一争高下,这样的价值观念使得苏联比她的历史性对手更加适应21世纪和未来世界。”<sup>②</sup>而戈尔巴乔夫与葛罗米柯(以及其他苏联领导人)之间在观点上的原则区别,“毕竟不在于对美国人的评价——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是用实力的语言还是用新思维的论据说话,而在于对苏联历史前景的估计。在现实主义者葛罗米柯看来,可以保住苏联超级大国地位的‘国王的最后一个论据’、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一张王牌,就是对世界其他各国起威慑作用的潜力”<sup>③</sup>。克留奇科夫观察到,葛罗米柯之所以逐渐失去对外交部门的直接领导权,是因为他一贯奉行强硬的外交路线,不“谦让西方”。应该由一个听话的部长来代替他,并借助新部长在国际事务中实行所谓的新思维。“谢瓦尔德纳泽就是这种合适人选。”<sup>④</sup>

于是,为了贯彻外交“新思维”,戈尔巴乔夫决定任命新的外交部部长。不过,葛罗米柯毕竟是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政治支持者。为了安抚好葛罗米柯,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政治策略——通过提升葛罗米柯的政治地位而使其放弃对外交工作的垄断。

1985年6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对党和国家最高层的职务进行了重新分配,力量布局发生了变化。首先确定了契尔年科去世后一直空缺的国家正式的二号职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

<sup>①②③</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

<sup>④</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28页。

位的人选。以前的协议兑现了，戈尔巴乔夫建议由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出任这一荣誉职位。然而代价就是他必须放弃外交部部长的职位。按照戈尔巴乔夫与葛罗米柯会前的协商，戈尔巴乔夫提议由谢瓦尔德纳泽出任外交部部长。于是，“富有经验的政治局委员们明白，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打算亲自领导国家的外交活动。他不需要固执的葛罗米柯或者追求功名、受外交部传统和常规束缚的外交官留在这个岗位上。外交官应当执行总书记的指示。这时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具备虽不丰富但是成功的外交活动经验，他想让谢瓦尔德纳泽扮演不折不扣执行他意志的角色”<sup>①</sup>。

1985年7月1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在政治局里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好久（！）并提名谢瓦尔德纳泽同志担任外交部部长。”即使是对接近上层的机关工作人员来说，这也无异于晴天霹雳。对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来说，谢瓦尔德纳泽的政治名声并不是很好。“这个党的官员、不久前的内务部领导人，既没有任何国际事务的经验，在这方面也没有受过任何培训。但是他对上司说话投其所好的本事是有名的，因此，谢瓦尔德纳泽甚至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是个让人厌烦的人。”<sup>②</sup>但是戈尔巴乔夫此举的主要的目的就在于宣告葛罗米柯的垄断权以及外交部对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的终结。

1985年7月2日，第十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提议，选举葛罗米柯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是受尊重然而却是荣誉性的职位，虽然有国家领导人的头衔，但却无权制定政策。”<sup>③</sup>同时，会议选举谢瓦尔德纳泽为苏联外交部部长。

除了外交部部长，戈尔巴乔夫还任命了新的副部长，更换了驻四十多个国家（相当于苏联与之保持着外交关系的所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大使。并且在外交部新设裁军局、人道问题和文化联系司、新闻局和太平洋司等4个新的单位，分别负责处理武器控制问题、人道主义问题、新闻问题和与太平

<sup>①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21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8页。

洋岛国关系问题。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外交部的控制,戈尔巴乔夫任命苏联前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为苏共中央书记,负责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并授权其监督外交人员的任命。换句话说,苏共中央国际部拥有了控制外交部人员的相当大的权力。<sup>①</sup> 简言之,戈尔巴乔夫直接控制了外交部。“从给外交官以活力,到提出内容广泛的削减军备建议,戈尔巴乔夫个人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控制在苏联可能是史无前例的。”<sup>②</sup>

1986年5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对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讲话中明确要求:“要让新思维在外交中占统治地位,要让外交与时代同步前进,大力清除老模式和过去的烙印。”<sup>③</sup>

苏联外交新时代开始了。谢瓦尔德纳泽——苏联外交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设计者——将按照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外交新思维开启新的航程。在马特洛克看来,“谢瓦尔德纳泽负责处理国家外交事务,与此同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创立了理论依据,使苏联外交政策置于新的基础之上”<sup>④</sup>。然而在克留奇科夫看来,戈尔巴乔夫“创立”与奉行新的外交路线,“实质上是一条破坏的路线、改变立场的路线、背叛的路线”<sup>⑤</sup>。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选择谢瓦尔德纳泽呢?毕竟,他的这一举动在事实上打破了苏联的政治传统。据多勃雷宁分析,在选择葛罗米柯的接班人时,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苏联和许多西方国家的旧传统,没有选择外交官,而是选择了一位政治家。戈尔巴乔夫告诉政治局,外交政策应由党来直接控制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由党的领导层中的一员来担任这一工作的原因。在党的其他领导人看来,谢瓦尔德纳泽从未在莫斯科任过什么职,他一直在格鲁吉亚供职,另外他没有任何外交经验,这些都是谢瓦尔德纳泽担任外交部部长的最大缺陷。不过,戈尔巴乔夫并不看重这些东西,他说:“他将边干

<sup>①</sup> 《自由欧洲电台研究材料》1986年7月1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年8月8日。

<sup>②</sup>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6年12月18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年12月29日。

<sup>③</sup> [苏]《苏联外交部通报》1987年第1期“新的政治思维是时代的迫切召唤”,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8月24日。

<sup>④</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81页。

<sup>⑤</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29页。

边学。”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要一位站在他一边的精明的人，而且要求他不受旧政策陈规旧套的困扰，准备将戈氏的计划付诸实践。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里也需要一位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当时他的外交政策新思维在政治局里并不是得到一致赞同的”，而“谢瓦尔德纳泽在克里姆林宫领导层中没有什么他自己的关系，这正中戈尔巴乔夫下怀，因为由一个外来人担任新的外交部部长的职位有助于保证他对总书记的忠贞不二”。<sup>①</sup>

谢瓦尔德纳泽又是如何贯彻总书记的外交“新思维”的呢？

一是改变了苏联的外交程序，从而使苏共丧失了对外交的控制。克留奇科夫指出，谢瓦尔德纳泽作为外长，他处于国际事务和苏联整个对外政治的中心。当然，许多问题都取决于他，在他之前，一般是集体作决定，得益于集体的仔细讨论，所以未发生过有危险性的纰漏。政治局始终把外交政策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当时葛罗米柯也很尊重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从未发生过不听取政治局意见的情况。那时，一些人，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认为事情进展得太慢，为达成协议需要太长的时间，如果不能尽快达成协议的话，将来则更困难，还得作出更大的让步。他们确信：政治局的“顽固”妨碍了与美国等国在各个领域发展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事实上，这是政治欺骗。但遗憾的是，它竟然得逞了。”<sup>②</sup>

二是片面曲解地搞外交妥协，从而使苏联丧失了多年外交成果。谢瓦尔德纳泽的特点是：迅速地作出决定，不分析细节，最主要的是不考虑这些决定将来会引起什么后果。这一特点被融入他的工作作风中，而且在他所领导的部门内蔓延开来，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如此一来，外交部巨大的智能、专业潜力根本没有被利用起来，外交人员都变成了单纯的执行者，或者彻底成为消极的旁观者。克留奇科夫指出，在公正解决国家关系中日积月累的矛盾时，除了相互让步与妥协之外，别无他途。然而谢瓦尔德纳泽不是去耐心地寻找能考虑到多方利益的解决办法，而是与戈尔巴乔夫一起

<sup>①</sup>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651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

主动提出单方面的让步，放弃原有的立场。正如一句谚语所说“万事开头难”，苏联在裁军谈判中作出许多让步之后，裁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此同时，国防潜力却被削弱到了危险的地步，许多方面都没有得到具体明确的协定和坚实的保障。为了解开国际关系中的症结和与西方达成妥协，苏联决定与社会主义国家分道扬镳，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谊如纸牌搭成的楼房顷刻间便七零八落了，“我们昔日的朋友纷纷变成了论敌”<sup>①</sup>。

于是，在国际舞台上，谢瓦尔德纳泽成了比戈尔巴乔夫并不逊色多少的一个人物。在叶利钦看来，这是因为“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苏联新的政策原则成为现实，成为可以与之打交道的原则”<sup>②</sup>。那么谢瓦尔德纳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雷日科夫指出：

我认识谢瓦尔德纳泽已有25年多了。这些年里我仔细观察过这个人。他是个不寻常的人。他的不寻常之处不是表现在才干、知识的渊博、政见的卓越上。他是一只“白狐狸”——媒体就是这样称呼他的。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是能够不可思议地随机应变、看风使舵，对上级领导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他隐蔽了真面目成功地适应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又同样轻而易举地像变色龙一样换了一身资产阶级的外皮。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没受到过专门教育，没有国际政治领域的工作经验，一门外语也不懂，却把苏联外交部门的最高职务弄到了手。

戈尔巴乔夫十分赏识这个人。是什么原因使他对这个人倍加宠爱——天知道。但在苏联崩溃和苏共解体后，在接受采访时，他们才流露出了真心话：在谢瓦尔德纳泽任格鲁吉亚一把手时，他们就已经促膝交谈，公开表示了对现存制度的厌恶。所以戈尔巴乔夫才坚持要把这位志同道合者拉到自己身边，拉进中央，这绝非偶然。<sup>③</sup>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81页。

<sup>②</sup>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66页。

<sup>③</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74页。

### 三、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竞争对手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是“戈尔巴乔夫最初伙伴中的第三个人，在权力阶梯上的地位低于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他是共产党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不是正式委员。但他显然注定要成为这三个人中最重要的一个。”<sup>①</sup>亚纳耶夫就认为，分析苏联灭亡的主要前提条件，不能不考虑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相互关系这个因素，亚纳耶夫把这种关系定位为“动物学上的相互憎恨”。同时，他们实质上完成了同一个任务——动摇和毁灭了苏联。“正如当时有人说的那样，两只狗熊待在一个洞穴里，显得太挤了。”<sup>②</sup>从1991年初开始，叶利钦发动了极为积极地反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运动，并且在这场赌博中最终成为最大的政治赢家。

#### (一) 莫斯科市委书记

1985年12月24日，苏共莫斯科市委召开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出席了会议。会议选举叶利钦为市委第一书记，市委原第一书记格里申被免职。

莫斯科市委书记一职在苏共党内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这是全国各地区党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位，因为它包括统治着广大帝国的中央官僚机构。”<sup>③</sup>选择叶利钦执掌首都党组织，戈尔巴乔夫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一方面，得益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关系。他们两人早就认识，作为州委第一书记，他们早在1977—1978年间就经常见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曾在农业方面帮助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而乌拉尔各城市曾用技术设备帮助过南方各州。这些联系在戈尔巴乔夫当上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后得到了加强。1983年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安德罗波夫交代的更新党政干部的任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0~61页。

<sup>②</sup>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务时,就把叶利钦列入了干部提升名单。安德罗波夫表示赞同。利加乔夫回忆:“1983年12月底,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从医院里给我打来电话,说我有机会时走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去‘看看’叶利钦。不久这种机会来了。1984年1月我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那里参加了州的党代表会议,还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一起去访问过劳动集体。坦率地讲,叶利钦同人们交往的活跃,他的精力充沛和办事果断吸引了我。显然,很多人对他都很尊重。”<sup>①</sup>但是由于安德罗波夫的去世,这项干部更换的设想暂时不能实现。不过,当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后,叶利钦的机会来了。于是,利加乔夫向戈尔巴乔夫推荐了他。利加乔夫的推荐为他后来招来了非议。亚纳耶夫在苏联解体后说:“我认为,利加乔夫犯了个大错误:邀请当时担任斯维尔德洛夫州党委第一书记的叶利钦到莫斯科工作——起初担任建设部部长,然后是中央书记。当叶利钦被选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他的举止完全符合时代精神,第一件事就是赢得‘群众爱戴’。”<sup>②</sup>

另一方面,正如利加乔夫当年观察到的那样,叶利钦是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而这一点,对于戈尔巴乔夫清除莫斯科存在的腐败是迫切需要的。作为戈尔巴乔夫曾经最大的政治竞争对手,格里申是此前莫斯科党组织的首脑。叶利钦被任命为该市党委第一书记,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自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以来在这个关键的党组织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腐败”<sup>③</sup>。对于叶利钦的工作,戈尔巴乔夫给予了强力支持。他对斯拉文说,当时莫斯科确实存在黑社会组织。而且,“摧毁这些黑社会组织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在叶利钦刚来莫斯科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我是支持他的”<sup>④</sup>。

精力充沛的叶利钦也对总书记的器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非常认真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叶利钦的警卫科尔扎柯夫回忆:“最初叶利钦把戈尔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62页。

<sup>②</sup>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3~34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sup>④</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巴乔夫奉若神明。他和苏共中央总书记之间有一条专用的热线电话。只要这部电话一响,叶利钦就飞快地跑过去。开始戈尔巴乔夫的电话相当频繁。但是接近 1987 年时,电话铃声就越来越稀少。叶利钦是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热心参加各种党内活动,当时他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丝毫不感厌倦。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他可能是最忠诚的党员,比任何别的党内首领都更愿竭尽全力去改善生活。”<sup>①</sup>叶利钦真心实意地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并以自己的方式来体现改革成果。“例如在莫斯科,差不多每一个角落都建起了农贸市场,当时莫斯科人买菜、水果、禽蛋、蜂蜜都十分方便。叶利钦当时自己看报,他个人认为改革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公开性之外,全国上下没有新鲜货色。报纸杂志上大块文章也只是强调公开性。”<sup>②</sup>不久,叶利钦“就成为普通莫斯科人心目中的英雄,成为有很强权欲、并对其领导层同僚构成潜在威胁的对手”<sup>③</sup>。但是叶利钦工作上的粗暴做法也开始让戈尔巴乔夫感到不满。戈尔巴乔夫说:“不久他的一些极端做法和庸俗的工作作风就表露出来。他在工作中对干部采取粗暴的态度。他对各区委的工作不是检查,而是严厉斥责。有些区委派人在中央来揭露事情的真相。有些人甚至不知该如何摆脱这种工作方式。这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市委常委会可以在夜里 11—12 点开会,就是为了告诉所有人,他是如何工作的,而其他的人都是游手好闲的懒汉。他把这种工作方式称之为创新。实际上,这是典型的庸俗外省风习。”<sup>④</sup>

叶利钦在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的形象从 1987 年 1 月 19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开始发生转变。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对戈尔巴乔夫在 1 月 27 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关于干部政策的报告发生了争论。争论是由报告中的以下措辞引起的:“首先是由于主观方面的原因,苏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未能及

<sup>①</sup> [俄]A. B. 科尔扎柯夫:《我所知道的叶利钦——俄罗斯总统安全局前局长回忆录》,杨藻镜、葛澹云、王文静译,外文出版社,1999 年,第 41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51 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61 页。

<sup>④</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第 69 页。

时、充分地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和社会中危机现象增加的危险性……”叶利钦建议应该具体说明是哪些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表示“反对在评价过去中把事情搞成评价前几届领导成员和党中央成员。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政治结论以及为未来汲取教训。”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进度缓慢的原因在于干部政策和管理机构的错误。政治局内的这次争论非同寻常,如果说在此之前政治局内部最激进的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智囊团”,那么,现在政治局成员中则出了一个竟然敢于批评他们立场、坚持更加激进立场的人。“戈尔巴乔夫针对叶利钦说了一番话:国家需要改革,而不是折腾干部,这是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在莫斯科所做工作的评价。戈尔巴乔夫一叶利钦双套马车散伙了。这对叶利钦是个有力打击,因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所必不可少的靠山没有了。”<sup>①</sup>

1987年2月21日,苏共莫斯科市委举行全会,会议批评叶利钦在干部工作方面“没有章法”,未能解决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关键问题,其他一些市委书记也受到批评。叶利钦在会议上发言,指责说,“许多领导人跟不上正在变化的经济机制和社会生活的日益民主化。一些人犯了等待综合症,一些很好的决议被束之高阁,陷入官僚主义泥沼中”<sup>②</sup>。会议对叶利钦的批评,其实就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授意下进行的。很快,又有一件事让政治局对叶利钦集体产生反感。

1987年5月6日,莫斯科发生了真正的一次群众性游行。四百多人举着“我们要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给历史爱国主义‘纪念’协会以法律地位!”“打倒改革的怠工者”等标语向苏维埃广场进发。叶利钦在市苏维埃大厅接见了游行群众,并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对话。叶利钦的这一举动破坏了党的全部戒律,使他的地位变得非常脆弱。“第一,他竟然亲自接见抗议者,从而开了危险的先例。第二,经他同意,首都的一个官方礼堂成了举行自由辩论的场所,成为不掩饰抵触情绪者辩论的场所。第三,在莫斯科的知识界,‘纪念’协会被视为一个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组织,这使叶利钦背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50页。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42页。

上了黑锅——他为什么会见他们?”<sup>①</sup>

8月6日,叶利钦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必须制定集会游行办法。9月1日,莫斯科市苏维埃作出关于游行示威的规定,禁止在克里姆林宫周围和市中心举行游行示威,并规定,公众集会的组织者必须提前10天提出书面申请。9月10日,利加乔夫指责叶利钦,说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未取得莫斯科市委常委会同意,未与政治局协商,擅自制定、通过而且在《莫斯科晚报》上公布了举行集会和游行的规定。

9月12日,叶利钦致函在南方休假的戈尔巴乔夫,抱怨他作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得不到支持,并请求辞职。“叶利钦的信——党的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文件之一。他自愿要求从党的最高层职位上退下来,这是没有先例的。更为重要的是,叶利钦的信是一份政治文件。他称自己引退的理由是不同意党的政策——口头上大喊拥护改革,而实际上,在他看来依然如故。他认为,利加乔夫是党机关故步自封的代表人物。从叶利钦的这封信可以看出,他已经心灰意懒,对国家的改革感到失望,他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了。”<sup>②</sup>

然而戈尔巴乔夫也不再相信叶利钦了。戈尔巴乔夫后来对斯拉文说,叶利钦虽然穿着改革的外衣,可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严厉的党阀。“因为自己不是政治局委员而感到压抑。这是他的致命点,他权力欲望极强又容不得人。至于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民主派,那纯粹是演戏。所有民主派都看到了这一点。他把所有的人都‘利用’了。在全会上他说,我们对总书记有吹捧的成分,报告中要明确反对个人迷信,反对集权主义,反对专制,而我们却允许对总书记搞个人迷信……他当时讲的这些话非常有意思。叶利钦通过打击那些掌握大权的人使自己成了英雄,他开始千方百计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砸碎一切,但是他在逐步进行的,当时他也只能如此。”<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相互恶感,让他们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64页。

<sup>②</sup> 同上,第567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8~29页。

10月21日，在苏共中央召开关于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的全会上，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的矛盾彻底公开化。这次全会本来只是走过场地讨论戈尔巴乔夫关于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报告的草稿。但是叶利钦坚持要求发言。他说，70周年的那份报告，政治局已讨论过多次了，他今天没有什么好说的，随后他转到“当前形势”上来。他的论断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分析了十月革命后的历史，看到社会经受了何等样的悲剧，这些情状终究是发生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民主，由于个人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所造成的。而之所以会出现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是集体领导的体制逐步遭到破坏的缘故。全部权力只在一个人手里，他不受任何批评，这一教训我们应当记取。目前，政治局里还没有这类现象，但某些同志已在开始吹捧总书记。当我们正在党内营造同志式的民主作风的时刻，这是尤其不能容许的。应当防止坏风气的蔓延。”接着，叶利钦提到了改革遇到的诸多困难问题。他表示关于必须在最近二三年内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怀疑。他说，这种大肆渲染而又毫无根据的许诺而后会使人失望和愤恨的。最后，他发表了一则耸人听闻的声明：由于各种原因，他在政治局里没有得到工作。这说明他经验不足，还有其他的情况，但主要原因是得不到支持，尤其得不到利加乔夫的支持。根据这些原因，他请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sup>①</sup> 叶利钦的发言使全会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随后，有26个人起来发言批评叶利钦。“在公开的速记记录上，叶利钦的全部讲话不到两页，而谴责他的讲话有48页，这是竞相指责、侮辱叶利钦的48页……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发言无一例外地指责叶利钦。”叶利钦最后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发言是个错误”，全会给他“上了严峻的一课”。这次会议通过的专门决议指出，叶利钦的发言“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责成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莫斯科市委“结合中央全会上形成的意见，研究鲍·尼·叶利钦同志要求解除其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问题。”<sup>②</sup>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70~572页。

叶利钦异于往常的政治举动在外界看来,表明了戈尔巴乔夫政治上正在遭受挫折。《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总书记的政策讲话是常常公开发表的,但是辩论总是秘密进行,会上的发言通常被认为相当于国家机密。因此,苏联官员们谈论上次会上出现的不和谐的声音,是很异乎寻常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当中出现任何反叛,或者只是闷在心里的反对,都会是戈尔巴乔夫严重关切的一个问题,叶利钦事件大概已使他为巩固权力而作出的努力受到了挫折。”<sup>①</sup>戈尔巴乔夫决定维护总书记的至高权威。

10月31日,苏共中央书记卢基扬诺夫对外界宣布,叶利钦在十月全会上的发言有“政治错误”。

11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列·尼·扎伊科夫接替叶利钦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11月11日,苏共莫斯科市委举行全体会议,批评叶利钦的错误,并解除他的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同时选举扎伊科夫为市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上发言,指责叶利钦在十月全会上的发言是“故意歪曲”,“实质上是企图使人怀疑四月全会以来党的改革工作”,还批评叶利钦的作风和方法是“假革命的辞句和假坚决”。<sup>②</sup>

11月1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戈尔巴乔夫指出:“叶利钦实质上对改革发起了进攻,对改革的速度和性质表现出不理解。更有甚者,他从蛊惑人心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工作的问题,受到全会的一致谴责。总而言之,应当首先对他进行政治谴责,然后再谈第二个问题,即所谓递交辞呈问题,必须指出,大家并不支持他,虽说当初支持过他,那是在最初阶段,高呼口号的时候,后来就不再支持他了。”<sup>③</sup>

1988年1月14日,叶利钦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此时叶利钦依旧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直到二月全会才解除他的这项职务。<sup>④</sup>

<sup>①</sup> [美]《纽约时报》1987年10月30日文章,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11月1日。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65页。

<sup>③</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73页。

<sup>④</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

## (二) 政治局的出局者

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采取的一连串政治举动向外界传达了这样的信息：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关于改革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罗伯特·米歇尔斯指出：“建立在官僚制原则基础之上的组织，不可避免地要极力用一种表面忠诚的幕布掩盖组织内部的分歧。因为既然组织的首要目标就是吸纳尽可能多的成员，那么任何组织内部观念上的冲突必然要被视为组织实现其目标的障碍。”<sup>①</sup>戈尔巴乔夫的举动在事实上带来了三个严重的政治后果：

第一个政治后果：它强化了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党内保守力量。“政治局全体成员一致谴责原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并将其罢免的闹剧客观上有利于政治局内认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信念的那一派。”<sup>②</sup>而就在罢免叶利钦的莫斯科市党委会全体会议召开前夕，切尔尼雅耶夫给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中就指出：“叶利钦事件，这是改革的艰巨性在党的领导层内的第一次‘反映’。这次事件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全会之后日子过得越久，越促使人进行思考……叶利钦的去职，将被看作是保守势力的胜利……人们将根据该事件的结局来判断您拥有多大的威望和您推行‘戈尔巴乔夫路线’有多大的能力。”<sup>③</sup>奥地利社会党的《新总汇报》说：“显然，他的讲话中的历史部分和当代部分都反映了领导集团内部势力的进一步转换，这对改革是不利的。”<sup>④</sup>美国《华盛顿邮报》则明确指出：“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是向保守分子屈服。”<sup>⑤</sup>

第二个政治后果：它强化了叶利钦改革受难者的良好政治形象。切尔尼雅耶夫指出，政治局不发表叶利钦的讲话，实质上“为叶利钦的神话的流

<sup>①</sup>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峰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6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87页。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99～200页。

<sup>④</sup> 路透社伦敦1987年11月3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11月5日。

<sup>⑤</sup> [美]《华盛顿邮报》1987年11月3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11月5日。

传奠定了开端,使他具有了为公正而蒙难的形象”<sup>①</sup>。马特洛克也认为,在“公开性”的影响下,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这种做法其实起到了反作用。他说:“1986年和1987年时,苏联市民有充分理由不相信他们自己的传媒报道。传播媒介抵制报道事实上也帮助树立了叶利钦在民众中的形象,因为有关叶利钦的事迹在民众中口耳相传,造就了他英雄般超常的品德。如果官方媒介一直对他进行吹捧的话,民众也就不会信任他了。”<sup>②</sup>雷日科夫也指出,为什么党的高层——尽管这只是些莫斯科的和地方的领导人——反应会如此激烈呢?看来,大概是因为党正在通过它的领导人和政治局展现“公开性”,而且正处于“多元化”前夕的缘故吧。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发言表现得非常病态,其实,那远不是什么纲领性的问题,只不过对自己的一个同事,对中央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书记利加乔夫的工作方法表示不满而已。激烈的讨论以及对“离经叛道之徒”绝对毫无意义的狂轰滥炸,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俄罗斯的事就是这样,一个关于人民英雄,关于老百姓的“守护神”受到迫害的神话就这样诞生了。<sup>③</sup>

第三个政治后果:它预示苏共高层和普通群众之间的严重分裂。雷日科夫指出,以叶利钦的这样一个肤浅的、显然具有个人目的的发言,又如何会引起如此这般的反应呢?“以我的看法,把全会搞成一场大批判实在是一个大错,它昭示了我国最高领导的不成熟,首先是政治局委员们和中央书记们的不成熟。我很理解,当时各级党组织的多数领导,还没有能够摆脱党内生活的各种标准和关系的束缚。既然党的高层倡导变革,其中也包括苏共内部的变革,那怎么能允许搞这么个‘大批判’呢?看来,党的领导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在党的各级领导人同普通党员基本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有多么严重。到了1991年,当戈尔巴乔夫按照叶利钦的指示解散苏共之后,这种分裂就充分暴露出来——1900万党员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保卫它。”<sup>④</sup>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sup>③④</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297页。

因此，马特洛克认为：“1987年10月的这场风波是戈尔巴乔夫从政期间犯下的第一桩大错。嫉妒使他头昏眼迷。他把具有领袖魅力的助手看成是潜在的对手，而不是难得的合作伙伴。这种嫉妒心理不仅进一步恶化了他与叶利钦的关系，而且使他在挑选助手时只选择那些无力与他相抗衡的弱者。然而这些弱者最终还是背叛了他。”<sup>①</sup>于是，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竞争“演变成了不妥协的权力斗争，最终付出了苏联被毁灭的代价。戈尔巴乔夫不能用自己内在的力量、强大的能量去对抗竞争对手，总书记总统从来就没有类似的优点。叶利钦就像坦克和推土机一样，可以横冲直撞。显然，这种品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了他作为领导人和人的所有缺陷。当然，这说的不是对整个国家客观上有利的弥补，但是叶利钦的紧逼攻击像施了魔法似的对当时党的工作人员产生了影响”<sup>②</sup>。

### (三) 政治反对派领袖

十月事件对叶利钦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沉重打击。以至于叶利钦认为，他有可能会从此告别苏联的政治舞台。“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我推到荒无人烟的偏僻角落里，也没有把我发配到遥远的异域他乡，就像他的几位前任所做的那样。相反地，他似乎是很高尚地宽恕我，怜悯我。”<sup>③</sup>在这个时候，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了。他说：“我彻底弄清了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我看清了他的力量和软弱，懂得了来源于他的不幸与危险的精神流质。我从来没有把同他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但如此，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亦步亦趋，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sup>④</sup>

随后，叶利钦的命运发生了戏剧般地转变。他成为苏联国内所有不满情绪的代言人。“把叶利钦开除出党的最高领导班子所产生的效应完全不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所希望的那样。如果说以前这种惩治确实会使一个人

<sup>①</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34页。

<sup>②</sup>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sup>③</sup>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sup>④</sup> 同上，第19页。

从政界消失,现在的情况则不然。被罢官的叶利钦马上变成了一个游离于有70年历史的国家政治生活规则之外的政治人物。他成了国内所有不满者的领袖,成了前不久还是其领导成员的那个党的政治反对者。在一个没有反对党的国家,叶利钦成了未来运动的领头人。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出现了,许多原先只有不满情绪的人作好了成为反对派的准备,为未来年代的激烈政治斗争和政治对抗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这是‘叶利钦案’制造者们所没有想到。”<sup>①</sup>而这一切,正是戈尔巴乔夫亲手开启的“改革”造就的。苏联人对官僚特权阶层几乎感到一种憎恶,因为它被用来“谋取特权和私利”。“在这一基础上,叶利钦被创造出来,作为临时偶像。”<sup>②</sup>

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叶利钦要求发言,他简直是冲上主席台的。叶利钦想保留和部分恢复自己党内地位的努力,遭到不久前全会的“主角”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激烈甚至是粗暴的回击。“对叶利钦的怨恨遮住了这场运动组织者的眼睛,他们的良苦用心完全适得其反。代表会议不是党的全会,代表会议强调的开放性和公开性使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的争论全国知晓。叶利钦的发言——他对党内实行差额直选的要求、他对官场特权的批评及其想在生前而不是死后(如同苏联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平反的简单愿望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叶利钦昔日曾在党的领导班子中的同事对他的批评越多、越凶,叶利钦在社会中的个人得分就越高。”<sup>③</sup>

按照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定,苏联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运动。政治上失落的叶利钦终于迎来了政治生命的复活。叶利钦将选举地选择在莫斯科——这个他曾经跌倒的地方。在这里,叶利钦赢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为他重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赢得这场选举的胜利,他不得不与党的机器以及戈尔巴乔夫进行较量。戈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74页。

<sup>②</sup>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0页。

<sup>③</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94页。

尔巴乔夫就置身党的机器之后，只是偶尔露露面，表明他在操纵这台机器。叶利钦自从被赶出政治局之后，就从新闻媒介中消失了。他已经感觉到这次选举是他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因为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这样的选举，它有可能通过无记名投票为否定共产党的统治打开通道。”<sup>①</sup>

在自由选举的条件下，按照叶利钦的社会政治效应，他也许根本不需要进行通常意义上的政治竞选。因为，“随着共产党对他的敌意越来越公开化，他在人民中的威信也如日东升。公众的态度是，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位英雄。共产党官员掀起的反叶利钦运动不仅无效，还成了叶利钦最强大的政治资产。”1989年3月26日第一轮投票选举之后，统计结果令戈尔巴乔夫大吃一惊，叶利钦获得了89.4%的选票。“反对叶利钦的莫斯科党组织全线崩溃。”<sup>②</sup>然而3月26日那天，叶利钦并不是唯一一位取得选举辉煌胜利的候选人。在许多选区，特别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与共产党官员竞争的候选人都取得了胜利。“许多对共产党领导不满的知名学者以成功的竞选向现有的体制发起了挑战。”<sup>③</sup>

叶利钦的成功，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形象相形见绌。到了1990年初，在老百姓和许多苏联人民代表的心目中，戈尔巴乔夫的形象就是一个软弱无能的领导人，他说话滔滔不绝又非常不清晰，他没有能力采取果断措施。与戈尔巴乔夫相比，“叶利钦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则是果敢有力而又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大家认为他是有能力整顿国家秩序，消除贫困，打击犯罪和滥用职权。叶利钦巧妙地利用民众的情绪，经常参加各种公开活动和演讲，尽管他还没有形成任何明确的政治和经济纲领”<sup>④</sup>。

1990年5月29日，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按有关规定，候选人必须获全体代表半数以上票（至少531票）才能当选。此前，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代会曾进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41页。

<sup>②</sup> 同上，第244页。

<sup>③</sup> 同上，第245页。

<sup>④</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2页。

行过两轮投票。叶利钦和其他候选人所获选票均未超过半数而未能当选。在 29 日的选举中,叶利钦以 535 票当选。这一天,莫斯科近千人举行集会,支持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在当选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根据即将通过的独立宣言和所需的法律,俄罗斯将完全独立,它的决议将高于联盟的决议。”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叶利钦的这一做法既不负责任,又十分无知。“实际上这意味着俄罗斯将无视联盟及其权力机构,将不履行全联盟性质的决定。俄罗斯的行为引发了所有加盟共和国以及许多自治共和国群起宣布独立——出现了‘主权大检阅’,妨碍了与立陶宛进行建设性对话,实际上开始了苏联瓦解的进程。因此,那些认为联盟倒台是由波罗的海沿岸、高加索和中亚的民族冲突引起的议论,都是企图事后为叶利钦及其民主俄罗斯派的战友们的不负责任的瓦解苏联的行径开脱。”<sup>①</sup>

不管怎么说,叶利钦开始向戈尔巴乔夫发起政治上的猛烈进攻。

1990 年 7 月 6 日,叶利钦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民主国家不可避免地实行多党制。在各种政党逐步形成的情况下,苏共要进行根本改革。只有议会党才能革新社会并在选举中赢得胜利。

1990 年 7 月 12 日,叶利钦在代表大会上说:“鉴于我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和俄罗斯人民赋予我的重大责任,考虑到社会向多党制过渡,我不能只履行共产党的决定。我必须服从人民的意愿,因此,鉴于我所承担的义务,我宣布退党。”<sup>②</sup>

#### (四) 俄罗斯首位总统

从这一刻起,叶利钦正式成为苏共的反对者,成为戈尔巴乔夫走上政治末路的主要推手。根据苏联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就苏联居民对政治活动家们的态度问题的民意测验显示:2680 名被调查者中有 61.3% 的人对叶利钦的活动表示完全赞成,21% 的人不完全赞成,5.3% 的人不赞成。而对戈尔巴乔夫的活动只有 28.5% 的被调查者完全赞成,40% 的人不完全赞成,19.5% 的人不赞成。在回答“谁的行为你最喜欢?”这一问题时,有 34.2% 的被调查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135 页。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 年,第 338 页。

者提到叶利钦,10.2%的人提到戈尔巴乔夫。<sup>①</sup>到了1991年1月,70%的人认为最理想的政治家是叶利钦,只有14%的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sup>②</sup>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叶利钦的威望已远远超过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的政治野心滋长起来了。对他而言,此时的政治目标已经很明确——摧毁苏维埃制度。叶利钦说:“俄罗斯的主要怪诞现象是,国家体制早已蹒跚而行。严格地说,就是没有任何人驾驭操纵之。实际上俄罗斯早已没有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领袖人物了。甚至连改革家戈尔巴乔夫都是世界上最害怕破坏和粉碎这个体制的,他怕这个体制将来会报复他。依照他的思想,‘改革’不应该触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机制。是的,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情况下,把这种体制转变成了另外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不可能公开地压死我们,但它能够慢慢地、一块一块地吃掉,最后完全吃掉我们。它能够暗中破坏我们的一切行动而又能摆脱任何监督。它能够在亲亲热热、温温柔柔的拥抱中让你窒息而死。它对付我们的办法非常之多。然而我们只有一种选择——战而胜之。”<sup>③</sup>

1991年2月19日,叶利钦通过公开广播猛烈抨击了戈尔巴乔夫40分钟:总统欺骗了全国,他的政策是反人民的。他的身上有民族冲突的鲜血。他使国家完蛋。他是使人民贫困的罪魁祸首。他的许诺毫不兑现。他,叶利钦要求总统辞职。把治理苏联的权力交给联邦委员会。<sup>④</sup>

1991年3月9日,叶利钦在“电影之家”发表讲话,号召自己的支持者回击共产党复仇的努力。<sup>⑤</sup>叶利钦宣布:“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央——庞大的、官僚主义的中央……我们应当摆脱它。”“举行全民公决是为了国家领导人的现行政策得到支持,其目的是为了保留联盟的帝国单一制实质,为了保留制度。”<sup>⑥</sup>

<sup>①</sup> [苏]《国际文传电讯》1990年9月,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9月18日。

<sup>②</sup> [日]《每日新闻》1991年1月1日报道,转引自《参考消息》1991年1月3日。

<sup>③</sup>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sup>④</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517页。

<sup>⑤</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91页。

<sup>⑥</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47页。

1991年3月17日,俄罗斯在举行苏联全民公决的同时,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确定俄罗斯也设立总统职务,俄罗斯总统在俄罗斯境内的权力超过苏联总统。叶利钦在投票站发表讲话。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苏维埃制度、共产党和政府的官僚体制,而不是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叶利钦声称:“在维护这一制度的情况下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应该摧毁这一制度,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新制度——在集体领导下的各共和国联盟。”<sup>①</sup>全民公决没有成为对联盟政权机关的信任投票,民意调查机构在莫斯科进行的一项调查清晰地表明,联盟政权机关威信剧烈下降。莫斯科市民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度只有12%,对内阁和总理的信任度已经低于10%。莫斯科市民对叶利钦的信任支持率超过50%。在各个政党中,刚刚成立的“民主俄罗斯”运动最受民众欢迎,被调查者中的50%支持这个党,而此时苏联共产党的支持率只有12%。对莫斯科、俄罗斯和整个苏联其他城市居民情绪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是整个国家不断恶化的经济局势。<sup>②</sup>

1991年3月28日,俄罗斯联邦第三届代表大会(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叶利钦在代表大会上不但保住了自己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位,而且还得到了代表大会赋予的实行改革所需要的补充权力。在3月29日的会议上,叶利钦提出了他在苏联发生了变革条件下的政治纲领。他号召各共和国和政治力量按照圆桌会议原则开始进行对话,形成一个新的联合政府。

4月24日,俄罗斯议会通过了《总统选举法》,规定凡是满18岁的俄罗斯公民都有权参加俄罗斯总统的选举。选举将在普遍平等和行使直接选举权利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6月12日,举行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选举。叶利钦获得了57.3%的选票、雷日科夫得票率为16.85%、日里诺夫斯基得票率为7.81%。在进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前期的准备过程中,叶利钦、雷日科夫、日里诺夫斯基之间的选举斗争表明:从实质上讲,这是苏共和成分复杂的政治运

<sup>①</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470页。

<sup>②</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动——“民主联盟党”之间的斗争,这也是苏联支持者和俄罗斯独立支持者之间的斗争。“设立俄罗斯总统,并且赋予他很大的权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在苏联国家大厦下面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地雷。在俄罗斯即将出现了一个新的、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基本不依赖于苏联政府和苏联总统的权力中心,现出了一个与苏联竞争的国家。”<sup>①</sup>

对全国大多数居民来说,他们在这次选举中主要是看到了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对抗,刚刚实施的提价措施和不同寻常的货币改革,不是俄罗斯领袖的主意,而是苏联政府搞的。“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视整个国家为自己所有,但又经常不满于将资源运往俄罗斯境外,特别是中亚地区。他们为苏联的规模和力量感到自豪,但又不满于共产党为维系这一帝国强迫他们作出牺牲。他们强烈感到,他们与波罗的海人、中亚人、高加索人不同,许多人认为摆脱这些民族会使俄罗斯更加强大。反之,他们将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视为自己的‘小兄弟’,认为在法律上没有理由将他们与俄罗斯分开。”<sup>②</sup>

对苏共和俄共来说,这次选举是对它们的又一次政治打击。在当天同时举行的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的市长选举中,共产党推出的候选人均告失败。民主派人物波波夫、索布恰克分别被选举为莫斯科市长和圣彼得堡市长。圣彼得堡选择同一天举行城市名字的公决,广大市民不顾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坚决反对,将城市名称由列宁格勒恢复为原来的名字——圣彼得堡,苏共中央就此问题开过几次半封闭的会议,会上的气氛是惊慌失措和悲观失望。苏共中央收到很多质询、来信和电报,任何人也无法回答上面提到的问题。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的分析专家在6月底给中央委员和地方党组织下发了一份题为“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选举结果”的报告。报告说:“叶利钦的胜利得益于他在社会意识中建立起政治家坚强个性的声誉:对新生事物独具感觉,解决迫切的经济和社会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3~24页。

问题目的性明确,与党的官僚主义作毫不妥协的斗争。大多数选民接受叶利钦并不是对他个人品质的认可和政治上的倾向性,而是怀着对叶利钦的一种期望,认为他有能力通过自己的毫不妥协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将俄罗斯从危机处境中解脱出来。有关叶利钦的消极反应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起作用的还是老规矩,在短时间内打破这些规矩是不可能的。”报告提出了一个非常传统的问题:我们该做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极其没有说服力的。其中提出的部分建议是:迅速加快解决原则问题;在苏共内部建立一个由年轻有为的干部组成的专门为竞选制定计划的工作组;停止抨击党的机构;不要使保守势力、中派、无特权阶层与民主势力相对抗。报告的作者还建议:要尽量避免与叶利钦发生冲突,要寻找与叶利钦建设性合作的结合点;要坚定地把党组织的方向引向参加具体的实际工作上去,为党建立一种做实事的形象。在麦德维杰夫看来,就1991年的具体情况来说,报告提出的很多建议是非常幼稚,甚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内容,里面没有充分考虑到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本人遭受政治打击的程度。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苏共和民主联盟之间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已是不可能了。无论是戈尔巴乔夫本人,还是他周围的大部分人士,还继续在划分政权范畴内思考问题:什么样的权力应该归中央?什么样的权力应该交给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但是在全国以及整个俄罗斯联邦,已经不是什么划分权力问题,而是形成了事实上的双重政权。“各种层次的政权试图解决同样一个问题,但不是朝着一个方向。这不是为划分权力而进行的斗争,而是为取得最后胜利而进行的斗争。叶利钦自己也不打算去和苏共、俄共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sup>①</sup>

但是对叶利钦而言,6月选举的胜利只能表明他所作出的政治决定是正确的。叶利钦说:“我很难客观地说,主要的是什么影响了我在初期自由选举中的成功。我仍然认为,关于‘受欺负的’叶利钦的无稽之谈、现制度的敌人形象所起的作用并非最为重要。我认为,这些选举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动因是角色的不同分工:戈尔巴乔夫代表联盟,代表一个大帝国,代表一个旧的超级大国;而我则代表俄罗斯,代表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代表一个新的甚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0~51页。

至尚未存在的国家。大家在急切地期待这个国家的出现。俄罗斯社会的大部分人在接近 1991 年 6 月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苏联历史时期的终结。‘苏联’这个词本身已不可能说出了,它已耗尽了自己的寿命。在全世界,苏联的形象与军事力量的形象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联。‘苏联人’和‘苏联坦克’这两个概念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纷繁复杂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全球战略范围里改变了我们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形象,给我们的坦克盖上护套之后,他继续喋喋不休地大讲什么社会主义呀,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啊,苏联生活方式的成就哇,需要发展和丰富这些成就呀;结果,他糊里糊涂地走进了死胡同。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离开帝国的形象而存在,帝国形象已经不可能离开实力形象而存在。甚至可以说,在柏林墙上响起第一声锤击时,苏联已经寿终正寝了。”<sup>①</sup>

1991 年 7 月 10 日,俄罗斯联邦第 5 次非例行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叶利钦宣誓就任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参加了叶利钦的宣誓仪式。“这个不仅隆重而且意味深长的仪式,大家都看出这两位对抗 4 年有余的政治家的心情有很大差别。叶利钦处在成功的顶峰,他感到喜气洋洋。他正在接受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的全权。戈尔巴乔夫则抑郁不欢。从表面上看,戈尔巴乔夫当然还是苏联总统,俄罗斯联邦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共和国而已。但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个职务的,不是全体公民,而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而且还不是一致通过。更何况,俄罗斯不仅是苏联最大的共和国,而且还是苏联整个构造的基础,这种构造的坚固性遭到很大的破坏。”<sup>②</sup>

7 月 20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颁布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的命令。命令规定:不允许各政党及群众性社会运动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以及基层组织、委员会和其他组织机构中活动。马特洛克指出,这是一项极具潜在破坏力的法令,禁止任何政党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国家机关中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活动。如果法令得以实施,就将对俄国共产党造成致命的

<sup>①</sup>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42 页。

<sup>②</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52~53 页。

打击,因为它是建立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之上的。每个机关、学校、工厂、农场以及军事单位都有共产党组织,而共产党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来进行统治的。即使共产党放弃了在法律上的统治权,这些机构仍会完好无损、一如既往。如果取消了工作单位的党组织和他们所提供的特权,许多成员将会默默放弃党员资格。“共产党组织一直全力反对叶利钦,而这个法令就是他的报复。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私人仇怨。如果一个党独享国家级组织的利益,且暗中得到国家统治机构的支持,那么,一个真正民主、多党制的政府就不可能在这个国家里诞生。”<sup>①</sup>

7月2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叶利钦非党化命令发表声明。指出,叶利钦的命令违反了苏联宪法第48条、第51条和俄联邦宪法第49条,“苏共中央政治局深表遗憾”。据马特洛克观察,苏共党内官员拼命向戈尔巴乔夫游说取消叶利钦的法令,但是他拒绝了。“这是另一个迹象,表明他与顽固派的联盟正在分裂。全体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叶利钦的法令,但这当然完全没有法律效果,共产党干部只好就此罢休。”<sup>②</sup>

8月19—22日,“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保全苏联的努力失败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换。据格拉乔夫观察,从福罗索斯回来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了自己的死对头叶利钦的政治债务人,多亏叶利钦的果断行动,他才重新回到克里姆林宫”。总统的所有这些致命的失误、新的有缺损的地位都对他的执政者威信打击甚大。因为在俄国(以及苏联)公民心目中,千百年来形成了一种民族领导人就是上帝恩赐的君主、天赐的“生父”的观念,无论他身着沙皇的紫袍还是顶着总书记的称号,都是如此。主要的是,在八月动荡之后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中的政治地位起了很大的变化。那个千百万人将他们的生活迅速而奇妙地得以改观的希望同他所开始的改革、同他本人联系在一起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思想上的解放、令人陶醉的变革空气,以及上边赐给的政治自由,不能永久充当生活水平下降和社会紧张局势加剧的补偿。八月事件还表明,改革已经“误入歧途”,改革的继续进行已经并不预示着美好前景(戈尔巴乔夫本人将自己上

---

<sup>①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56页。

台执政的最初几年称之为“美好的时期”),而是预示着阴霾的日子和悲剧性的问题。“曾几何时,改革的首倡者和鼓动家还几乎被当成救世主,如今则已失去昔日的神圣光环和永远正确的声誉。”<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在2001年接受采访时说道:

您知道吗,猫是如何收拾被逮住的老鼠的:老鼠已经流血了,猫还在不断折磨它,却又不想马上把它吃掉,只是想羞辱它。叶利钦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有报纸曾经这样写道:“与叶利钦会面之后,我们看到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他看起来就像跟随在训斥它的主人后面的一条灰溜溜的走狗。”<sup>②</sup>

#### 四、政治智囊:博尔金、格拉乔夫与切尔尼亞耶夫

在戈尔巴乔夫的身边有很多助手、顾问充当着他的政治智囊。他的这一做法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当中属于普遍性的政治选择。作为政治雇主,挑选政治顾问的原则很多。对雇主的忠诚和客观地提出建议无疑应该成为最重要的两条原则。利加乔夫指出:“领导人的顾问,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社会中的都能在很大程度上从思想上影响自己的‘上司’。很久以前聪明的东方人便说过,传达者,也就是诠释者,有时比国王更能左右事态。助手和顾问就是这样的诠释者,他们诠释事实。因此,企图影响领导人物的人总是竭力将自己人塞进领导人的亲信中。这便是为什么选拔助手和顾问对领导人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组建班子只从对个人忠诚的角度出发是不够的,这一点已被世界历史上众多的教训所证实。亲信提供的有关事实、事件、人物和现象的材料,如果是带有偏见的,那便会使领袖对国内和世界事态产生错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29页。

<sup>②</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任总统》,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误认识。”<sup>①</sup>

就戈尔巴乔夫而言,造成其政治不幸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没选择好或者说没有发挥好政治顾问的作用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利加乔夫说:“大约在1987年我就感觉到,戈尔巴乔夫越来越被与雅科夫列夫有关联的人包围了。此外,很容易感觉到这样一种趋势:了解国内实际生活的人渐渐远离了戈尔巴乔夫,而代替他们的则是些学院式思维的学者。当然,领袖需要有学院式思维的顾问和助手,他们甚至是不可取代的。但就像艺术作品中需要比例一样,政治中也要有平衡。戈尔巴乔夫被‘开明君主’的光环所吸引,最终这种学院式思维倾向导致政治问题被极度夸大,给领导国家的实际工作带来了危害。不错,‘戈尔巴乔夫班子’召开的会议和讨论不计其数,但总书记对决议执行情况的日常监督工作被削弱之极。但是这种许多政治领袖常有的不足,可以在经过相应挑选的助手、顾问和战友们的帮助下得以补救。对戈尔巴乔夫的班子来说,理想的搭配是将实干家与具有学院式思维的人结合起来。可惜的是,注定不能建立一个将政治现实主义与科学思维相结合的集体。”<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的性格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错误。“戈尔巴乔夫从不同他的任何一位助手保持太近或者太远的关系,他可以轻易地抛弃一位原来的同事而置他于痛苦和失望的境地,当他下台之后没有一个政治局成员出来为这位前总书记和总统辩护也就不足不奇了。”<sup>③</sup>马特洛克认为,这种政治上的冷漠源于戈尔巴乔夫的天性。“从天性上说,戈尔巴乔夫有点孤家寡人的味道,这使他很难建立有效的顾问和咨询机构。他既没有正式的顾问班子,也没有非正式的顾问班子。当然也有各种类型的委员会,其成员进进出出,不时同他会面。但它们从来不是有效的顾问班子,原因有两点:第一,戈尔巴乔夫所选择的人常常不能在一起共事;第二,他从不把他们看作是真正的顾问班子,定期向他们咨询,认真对待他们。此外,他总是对他们说,而不是

①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② 同上,第95页。

③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698页。

听他们讲。”<sup>①</sup>

### (一) 博尔金

博尔金是戈尔巴乔夫的重要政治助手。先后担任过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等要职。在“八一九事件”中，博尔金坚定地站在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边，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无疑是对他的“政治背叛”。然而在博尔金看来，这不是“政治背叛”，而是对戈尔巴乔夫错误政策的“政治扭正”。改革的失败就是对戈尔巴乔夫不愿听取别人正确意见的惩罚。他说：“戈尔巴乔夫不喜欢顾问，总想占上风的思想使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也不能立即接受‘别人的’想法。有时别人向他提出某些建议，他却说他正准备这样做，不用别人提示就已经考虑到了。有时他又借题发挥，开始阐述和论证这个题目，以显示他对问题的了解。许多人对我说，戈尔巴乔夫这种态度使大家不愿意提建议，也无法与他愉快地共事。”<sup>②</sup>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戈尔巴乔夫的性格和道德观念、决定了他的工作能力和行为方式呢？博尔金认为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性格因素。戈尔巴乔夫从祖辈和父母那里继承了一种矛盾的性格，缺乏信心，心慈手软，组织才能和口才，农民的精明和吝啬，这些在他身上兼而有之。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很记仇，而且也不饶人。”<sup>③</sup>更关键的是，戈尔巴乔夫缺少一种豁达、踏实的精神，总是爱忙忙碌碌，小题大做。“当然，地位可以改变人，积累经验是需要时间的。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主要问题，即在哪些人中选择，当时我对许多领袖人物都有自己的看法，政治局中，仅从年龄上看就没有合适的人选，当然，下一个层次中有这样的人才，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缺少知名度。反正，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戈尔巴乔夫也是费了很大劲才当上总书记的。”<sup>④</sup>但是在经历了改革初始阶段的困难后，戈尔巴乔夫很快就发生了转变。“1988年是我醒悟的一年。我突然发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72~773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sup>③</sup> 同上，第65页。

<sup>④</sup> 同上，第78页。

现,国家的前途和强盛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目的,从他那得意扬扬的举止中开始暴露出领袖至上、自我欣赏、自私和平民主义的倾向,事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sup>①</sup>

二是家庭因素。戈尔巴乔夫的妻子对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博尔金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党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个性情倔强、严厉、有支配欲的人,她善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善于想方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很快当上了国家第一夫人,这种感觉肯定要比戈尔巴乔夫真正感到自己成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来得更快……她经常毫无顾忌地给总书记的助手和国家某些领导人,尤其是她认识的人打电话,让他们干这干那。她不仅确定这个家庭党支部的政策,而且常常做出某些决定,想方设法让家庭党支部成员戈尔巴乔夫将制定好的路线拿到整个苏联共产党内贯彻执行……戈尔巴乔夫性格十分软弱,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因而总是受到妻子的种种决定的影响。”<sup>②</sup>

三是经历因素。在博尔金看来,作为疗养院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其实是苏联政治体制的命运宠儿。这种人整天围着休假的中央领导转,为的是得到他们的赏识。“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是在这个疗养区工作,不被党和国家权威机构知晓,如果党和国家的实权人物没有发现他、支持他并扶着他走上一个个权力台阶,那么他也就不会成为总书记和总统。这些实权人物包括尤·弗·安德罗波夫、米·安·苏斯洛夫、费·达·库拉科夫、B. H. 叶夫列莫夫等人,他们都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和生活过。”<sup>③</sup>这种政治经历塑造了戈尔巴乔夫“左右摇摆”的决策特点。博尔金说,听而不闻、问而不答是这个人(指戈尔巴乔夫)的特点。有时他说“不”的时候,往往是同意采取行动。我时常发现,他虽然对有些建议或思想不表态,但并不是不重视,过一段时间,这些建议或思想往往在戈尔巴乔夫的行动中反映出来,不过已成为他的思想成果了。有些思想往往要过一两年后,直到他意识到了的时候,才以他个人意见的形式反映出来。“戈尔巴乔夫利用他人思想的本领简直达到天衣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72页。

<sup>②</sup> 同上,第108~110页。

<sup>③</sup> 同上,第118页。

无缝的地步。但是没有人为此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大家都清楚,他这种地位的人大概就应当如此。”<sup>①</sup>戈尔巴乔夫常常陷入理论的抽象思维之中,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戈尔巴乔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每天都搞文字工作,这使他不得不放下很多其他事情。他总是匆匆忙忙地、不太情愿地接见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实际上不会见部长和其他经济部门领导人,我认为,他是知道自己不太内行,不想承担解决经济问题的责任。”<sup>②</sup>

四是心理因素。博尔金观察到,戈尔巴乔夫注重外表。即使在他身处政治困境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仍然十分注意自己的外表,常换西服,挑选衬衣,时髦的领带和考究的皮鞋。“他这么讲究衣着常使我感到惊讶:工作这么繁忙,还能每天换领带,没忘让领带同衬衣和西服相配套。透过这一切,我仿佛看到一个穷孩子因内心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渴望补偿这一切的心理。”<sup>③</sup>戈尔巴乔夫对礼仪要求很高。戈尔巴乔夫夫妇喜欢让一大群亲信为他们送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定了一条规矩:“送行时全体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助手、各主要部门的领导必须到场,站在最前面的是他最信得过的人。……戈尔巴乔夫还要求电视、报刊报道送行场面,结果中央收到几百封信,指责一些人成天泡在机场,不是为总书记—总统送行,就是迎接他归来。”<sup>④</sup>而且戈尔巴乔夫对外界的赞誉渴望至极。博尔金说,不知道是谁首先发现戈尔巴乔夫爱看那些称赞他的报道,大概不是西方的情报部门就是我国的驻外大使们。不过可以说,总书记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来自方方面面的消息都是吹捧新领袖的,我们的每一位驻外代表都把从西方的报纸或杂志上谈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伟大事业的文章剪下带回来视为自己的义务,还要亲口对总书记说,外国的领导人和“老百姓”都喜欢他。<sup>⑤</sup>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双重性也给博尔金留下深刻印象。“我不止一次在报刊上读到并听到西方政治家谈戈尔巴乔夫的魅力、优雅的风度和良好的文化修养的文章和谈话,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善于根据需要制造印象,但我和很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58页。

<sup>②</sup> 同上,第277页。

<sup>③</sup> 同上,第30页。

<sup>④</sup> 同上,第164页。

<sup>⑤</sup> 同上,第98页。

多人都知道他另外一些方面的特点和习惯：他很粗鲁，常使交谈者感到难堪和受到伤害。”<sup>①</sup>

究竟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年代呢？博尔金认为：

首先应当指出，改革既带来了一些积极的结果：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头几个月，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

然而评价一位国家领袖的政策和活动不能只看他的良好动机或个别事件，要看有无有效的政治方针和积极结果。这样看的话，这六年在我国历史上是丧失时机、告别幻想和神话的时期，是动荡的开端。实际上没有一项经济措施、没有一次保证提高生产和人民福利的尝试取得了切实的积极结果，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使提出的社会民主化措施失去了意义。

制定改革政策带有冲动性和不彻底性，而实施改革政策又缺乏权威性，这种情况只能使形势复杂化并加剧社会发展的矛盾。<sup>②</sup>

.....

本来应当从这个分析中吸取一切有益的东西，制定出在各个生活领域实行彻底改革的方案，然而所作出的结论却是应景性的、思想定向性的和不完全正确的，分析报告主要被用作在政治上攻击前领导人的武器。它变成了勃列日涅夫、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成员领导水平不高的佐证……

本来，详细了解社会状况之后可以制定改变形势的系统措施，预测经济发展，建立国家改革，首先是彻底的经济改革的理论体系，但是戈尔巴乔夫没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政治经济动荡不定、改革的结局令人失望、甚至常常令人可悲的最严重的原因……

总书记既没有阐述社会转轨的总趋势，也没有说明彻底改革道路上的主要阶段及以后的发展阶段，他甚至没有能力解决生活提出的个别问题，克服一般障碍。然而他认为失败的原因不是自己的过失，而是

①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07页。

② 同上，第406~407页。

其他人不能有效的行动,结果开始经常撤换各级干部——政府首脑、经济的、苏维埃的、党的领导人。六年之中更换了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位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团所有成员和各部部长……这种频繁更迭干部的做法是领袖的最大错误,它给我国人民和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可悲的后果。

民主化和公开性运动使人民能够对国内状况和党的政策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对党垄断社会发展思想公开表示不满。这个运动席卷全国,使许多有魅力有进取心的人走到社会生活的前台。取消党对政权的垄断为许多政治流派平等竞争,为争取民心和人民的利益创造了条件。如果创造相应的条件,如果我国社会的文明、民主传统具有更深厚根基并能制止某些领袖和部分居民的极端主义,对这些现象无疑应该给予肯定的评价……然而民主化却被用来搞冲突、分裂国家、各种力量进行对抗和搞个人报复。<sup>①</sup>

## (二) 格拉乔夫

安德列·绥拉菲莫维奇·格拉乔夫,1941年生于莫斯科。1964年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继续在该校读研究生。1976年获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历任《共青团真理报》记者(1963—1964年)、匈牙利布达佩斯国际杂志《世界青年》编辑(1967—1968年)、世界青年联合会副主席(1968—1972年)、苏联青年组织委员会副主席(1972—1973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副处长(1973—1990年)、苏联总统顾问和新闻发言人(1990—1991年)。

格拉乔夫是怎么看待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呢?格拉乔夫认为,改革的失败不仅在于戈尔巴乔夫的夸夸其谈,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失去了推进改革的动力机制,而摧毁这个机制的恰恰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这不得不说是他自己的政治悲剧。格拉乔夫指出:

---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408~409页。

应当将戈尔巴乔夫明显的禀性特点与时间的描图纸、他的计划的编年史叠加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所固有的品质：作为政治战略家和机关的策略家、通晓国家与党的机器的行家以及经济管理部门领导人（可惜是苏联学派）的品质。

然而较之改革领头人良好的或者不良的个人品质，新阶段改革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团结一致的班底，再是有效的国家管理机制。关于班底，确切地说是相继更换的几拨人马的可悲命运，那都是后话了。至于说到对于国家和国内展开的进程进行管理的机制，那么不可忘记：在一定的意义上，结构本身就装有爆炸物，因为如果不拆除体制的主要支柱——大权在握的党的机关，所设想的改革就无法实行。因此，这个得心应手的机器的杠杆，戈尔巴乔夫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就是当它还听使唤的时候加以利用。总书记兼总统大讲特讲让官员们放心的话，那是在设下圈套，指望社会中不断积聚起来的量变会不失时机地转化为质变。

当他逐渐成熟到提出真正改革者的意图、对于将这个庞然大物对准何方尚心中无数时，管理机制并未出现问题。当他自己已经明确改革的构想和战略目标、摧毁机关的无上权力成为首选任务之一时，原来可以充当实行改革的工具的东西，就变成了改革的绊脚石和主要的反抗力量。

许多起初曾经同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意图的人，如今都在责怪戈尔巴乔夫，说他拆毁、烧掉好歹还能派上用场的旧房子，却没有盖起新房取而代之。然而首先，除了原来房子所占的地方而外，他再也无其他空地来盖新房，除了旧结构的构件、将其连接起来并勤勤恳恳地为原政权服务的“螺丝钉”而外，他再无其他的建筑材料。其次，当时最新出炉的政治精英和职业精英（未来的官员）并不打算放过业已出现的机会，而且如今再也不必为总书记当牛做马，他们绝不会仅仅出于感激之情热望自愿地无偿地为总统服务的。

顺便说一句，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早在1990年春天即明确无误地向他暗示这个意思，当时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就设立苏联总统职位问

题投票，戈尔巴乔夫需要他们的支持。于是纳扎尔巴耶夫代表他们发言，要求在各共和国也实行总统制，“以便消除已经初露端倪的总统制思想同共和国扩大自己独立性的意愿之间的矛盾”。<sup>①</sup>

### (三) 切尔尼亞耶夫

阿纳托利·切尔尼亞耶夫，1921年生于莫斯科，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在莫斯科大学攻读研究生后执教10年。1961年起在前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了25年。1986年至1991年，担任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助理、总统助理。作为苏共党内著名的“一支笔”，切尔尼亞耶夫参与起草了苏共中央许多政治报告、重要文件以及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及其他著作。

切尔尼耶夫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直持同情和肯定态度。“把戈尔巴乔夫排挤掉和在顷刻之间使国家瓦解的那些人，利用戈尔巴乔夫已进行的必不可免的改革（我重复说，其方向是正确的），打出了狭隘自私的，实质上是蛊惑人心的民族主义的口号与诱惑，给俄罗斯，给俄罗斯人民排除了（长久地，也许是永远地）体现自己的新角色的可能性，也就是成为在辽阔的前帝国和前苏联的欧亚空间中实现的规模宏伟、前程远大的改革进程的真真实实的、具有威望的和完全平等的参加者的可能性……戈尔巴乔夫在他所走的这段道路上，尽管有错误、失算和弱点，并没有辜负自己的使命。”<sup>②</sup>

在切尔尼亞耶夫看来，戈尔巴乔夫的使命就是：通过对苏联的深刻改组来解决苏维埃制度的总危机（社会的和族际的总危机）。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辜负自己的使命”——“苏联多亏戈尔巴乔夫才实际上成了爱好和平的大国，他的政策不仅受到信赖，而且戈尔巴乔夫的名字本身和身份也成了普遍接受的民主关系的象征。世界政治需要戈尔巴乔夫。他的下台和绵延半个赤道、地跨两大洲的核大国苏联的解体，像人们通常用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词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74~275页。

<sup>②</sup> [俄]阿·切尔尼亞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汇来表达的那样,有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的危险。这在他的许多交谈者看来,苏联将变成‘一百个南斯拉夫’的模样。”<sup>①</sup>

切尔尼雅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取得了很多成就。他的主要成就表现为:

——他摧毁了以往所有专制制度中根据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最强大的专制制度;

——他给了千百万人民在没有由上面强加的方式和意识形态教条的情况下安排自己的生活和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

——他为地球六分之一地区的居民在承认民主、法治国家、市场经济、人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人类普遍原则的基础上进入现代文明的总轨道创造了条件;

——他为停止“冷战”和核军备竞赛所做的工作比谁都多,由此为拯救人类免于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毁灭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人类历史上所有划时代的转折之前,都有过强大的思潮、群众性的运动、有势力的团体和各种政治党派。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先有基督教的兴起,然后才有古代罗马的灭亡;先有宗教改革运动,然后才有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崛起;先有工人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党,然后才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此等等。可是戈尔巴乔夫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他是单枪匹马去推倒庞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决定这样去做的,甘愿自己冒很大的风险,置他已经拥有的可使人心满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质条件于不顾。<sup>②</sup>

## 五、“天使们的起义”:改革精英的集体背叛

为什么号称信仰坚定的苏联共产党、坚若磐石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591页。

<sup>②</sup> 同上,第621~622页。

会在短短的七年改革时间里走向全面失败呢？

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发出疑问：“苏联拥有地球上最大的军事机器，该机器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制性的、一党专制的政治权威所控制，它的官僚机构遍及和深入到其国民生活的每一角落，它的意识形态旨在揭示如何利用历史潮流的秘诀。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会轻易自取灭亡呢？”<sup>①</sup>

苏联“自取灭亡”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看来，原因只能从苏联社会内部来找。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助理格拉乔夫指出：“为什么那个能如此顺利地抵挡住外来军事压力和思想上的敌人的瓦解企图的体制，面对改革家们的方案时竟会解除武装、不堪一击？而改革家们‘只不过’是力求改善体制、或者说得准确点是想挽救体制而已。答案就包含在问题之中。一个由‘唯一正确的学说’武装到牙齿、在全世界面前不可一世的体制，只能被内部的腐蚀、思想上的异端邪说所击败。不是败在外来的侵略，而是败在‘天使们的起义’。”<sup>②</sup>

### (一) 苏联政治体制不可挽救吗？

麦德维杰夫在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时认为，苏维埃政权从建立之日先后经历了四次危机。前三次危机是在苏维埃制度的自我调节之下安然度过的。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却使苏维埃制度丧失了自我调节的功能，从而导致制度本身的消亡。

麦德维杰夫说：

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 1921 年，如果列宁当时不实行“新经济政策”，不对共产主义学说本身进行相应的修改，那么任何专制制度都无法挽救布尔什维克的失败和灭亡……

苏维埃政权的第二次危机始于 1928 年末，并持续了五年之久。克

<sup>①</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5 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 ~ 2 页。

服这次危机不是依靠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新的政策，而是依靠大规模的恐怖镇压行动。……这些年里，部分群众仍然支持这个制度，支持党和党的思想。但是在斯大林时期逐步形成的特权阶层已成为政权的主要支柱，它包括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以及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绝对服从“上级”的干部队伍。这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而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只不过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外部特征而已。卫国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制度，但这种制度离开了斯大林便不可能存在。

苏维埃政权的第三次危机发生在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这次危机同样持续了将近五年。战胜这次危机依靠的是国家对农民、工人、军人和知识分子作出的大量让步……

苏维埃政权的第四次危机始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是一次在经济、意识形态和道德领域的全面危机。此次危机是由于精英阶层的腐败和老化而产生的。“改革”是摆脱此次危机的尝试，但是这次尝试并不成功。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没有能够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所以并不能减轻老百姓的不满。苏共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重大修改，但这只是即兴之作。这些举措虽然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是同时党组织机关内部的权威阶层则对此表示不满和抗议。在尚未巩固这个制度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基础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却在此时开启民主化进程，也就是说废除官本位专制制度。在这种政策下，政权的瓦解已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将苏联比喻成一座高塔，但它却是一座基础不很牢固的高塔，高塔的建设者既无视塔身已经倾斜的情况，也不加固基础和承重结构，而是继续增加塔的高度和层数。邓小平在中国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思想理论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保证了这个泱泱大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在80年代的苏联，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苏共，都没有胜任这一使命。<sup>①</sup>

---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80~283页。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目的就是通过改革使苏联的政治体制适应新时代对民主自由的呼唤而重新焕发活力。“我们对改革的想法往往是好的：将社会主义同民主和公开性结合起来，使社会成为自由的社会。人们应当自由地选择所有制、政党、宗教，等等。做不到这一点，改革将毫无结果，在人和人的主动性起着重要作用的今天尤其如此。我们已经着手建设高新技术、信息、文化等起主要作用的社会，我们知道，没有人的主动性，没有人的创造性的发展和联合，这些任务是完不成的。”<sup>①</sup>然而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阻力和困难却让戈尔巴乔夫对改造传统政治体制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

在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们”看来，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是一个极其公式化的“模式”。它是建立在不允许对之进行再认识的意识形态原则和规范的基础之上的。斯大林对这些原则和规范的解释更使它们成了僵硬的教条。这是半宗教式的信条，它完全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并无情地镇压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方面不能听命就范的所有人。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们”认为，苏联政治体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反人民”“反人道”的，贯穿其中的就是暴力至上的“契卡主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巴卡京指出：“经过以后几代苏共思想家和寄生于‘犯罪—爱国主义’浪漫主义作品的政论家们修饰和润色，终于最后定型的一种特殊思想体系——‘契卡主义’，从那个革命的专横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了。事实证明，这一思想体系比产生它的那些机构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不仅如此，在党的惩罚机构——从全俄肃反委员会到克格勃——存在的全部时间里，这种思想体系在群众中还获得某种程度的同情，受到一定的欢迎。尽管这些机构本身会在人们心中引起——说得委婉一些——恐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我们传统的双重标准。”<sup>②</sup>于是，以人民的名义“保护”人民，与人民的“敌人”斗争，这种从人民那里篡夺来的权力，是由不得人民做主的。不是由人民，而是由党来确定，谁是敌人，敌人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14～115页。

<sup>②</sup>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是永远需要的。没有敌人的话,这种体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契卡主义”,这就是根据一个臆造出来的方便公式,经常不断地寻找敌人:“谁不跟我们一道,谁就是我们敌人。”“契卡主义”,“这就是经常不断、不受任何限制地侦查和以暴力镇压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能纳入布尔什维克党思想体系那个僵硬的模式。”<sup>①</sup>

第二个弊端就是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的、概括一切的原则——“无产阶级专政”。戈尔巴乔夫指出,“这个词是从马克思那里借用来的,但被用到了荒谬的地步”。列宁在革命前曾写道,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取得政权,只有采用民主方式才能建设新社会。<sup>②</sup>“列宁带着对他遭到失利的选举的蔑视,终止了所有民主程序的伪装。他的态度明确显示,不管他是否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他都要牢牢握住统治权不放。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合法性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而非基于人民主权之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建立了一个靠武力来维持的警察国家。”<sup>③</sup>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专政的实施实际上意味着与民主的彻底决裂。可是无产阶级专政却被说成是最高的民主形式。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甚至不是多少还是一个社会的群众性阶层的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上层统治者及其等级制权势集团的专政”。革命后,非共产党遭禁止和言论自由被废除,这些是与民主决裂的明显标志。这类措施在严重的非常状况下,作为暂时步骤,是可以允许的。但是“作为一个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实行一党制和‘单一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歪曲事物的自然发展进程,导致专制,并以严重的后果告终”。<sup>④</sup>

通过党的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把他自己对苏联政治体制弊端的认识上升为全党意志。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阐述了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他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提出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呢?同志们,问题首先在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应该承认),在某一个时期,由于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

<sup>①</sup>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sup>②④</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35页。

变形。结果不仅使斯大林及其亲信的独裁，而且使大批镇压和目无法纪的行为有可能出现。那些年形成的行政命令的管理方法对我国社会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现在我们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这个体制。”<sup>①</sup>“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律法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这一切广为传播，并且在社会生活中扎了根。”<sup>②</sup>戈尔巴乔夫宣布：“假如政治体制仍然不动，仍然毫无变化，那么我们就无法实现改革的任务。”<sup>③</sup>因此，戈尔巴乔夫推动苏共二十八大作出决议，批判了“党和国家上层集团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专制”的体制，宣布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排除任何阶级、政党、集团、官僚管理体制的独裁专政”<sup>④</sup>，建设一个“自由公民的社会和法制国家”<sup>⑤</sup>。

正是按照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政治体制的批判及其预设的改造目标——自由公民的社会和法制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体制却在改造中被彻底摧毁。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说苏联的政治体制真的已经无药可救了吗？

季诺维也夫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将大众组织为一个统一整体的复杂体系，这一体系的主要支柱有如下三个方面：“1. 将国民组织为标准化的初级集体。2. 统一、集中、分层的权力和管理体系。3. 对人民进行统一的教育和意识形态教化体系。”<sup>⑥</sup>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些构成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支柱。戈尔巴乔夫曾尝试使之具有政治支柱和社会支柱的这场从上层开始的革命，原来根基很不稳固。

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不相信党的机关。他不信任机关，不信任任命制，这让人惊讶。“他本人与任命制血肉相连，他一生都是在官场里度过的，一

<sup>①</sup> 羌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38页。

<sup>②</sup> 同上，第40页。

<sup>③</sup> 同上，第41页。

<sup>④</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342页。

<sup>⑤</sup> 同上，第339页。

<sup>⑥</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步步走过了官场上的每个阶梯——从共青团边疆区委副科长一直到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似乎最终也没有弄明白它的功能。他走到这个阶梯的顶端后,打破了任命制,其后果比他预料的要严重得多,使人联想到如同儿童想用火柴为黑暗的干草棚照明。似乎注定会支持戈尔巴乔夫的那个社会阶层与他分道扬镳,是拿任命制做实验的最小最直接的后果。“官场私有化”,竭力把原来自己管理的东西据为己有,苏联的垂直管理体制(即任命制)遭到削弱,只不过是这种做法的几个后果。”<sup>①</sup>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愿意相信的人在分食了他的改革“蛋糕”后,却又成为他的改革“破坏者”。这些所谓的精英们一心追求权力,他们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笔直的道路就是加入与戈尔巴乔夫分庭抗礼的激进反对派。格拉乔夫指出,颇具活力的新企业家阶层坚信过渡时期经济的“灰色地带”提供了绝无仅有的致富机会,纷纷投向半合法的和非法的商业活动,将许多党和国家官僚带了进去。不难理解,如此令人可疑的基础必然对于“上层建筑”产生瓦解腐蚀作用,并将其纳入犯罪分子的势力范围。其结果,一面是改革的顶部日益升入改变国家和世界的直上云霄的远景,改革的底部却愈来愈深地“埋入水中”。“从某个时刻起,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必然不知不觉地既成为他所启动的进程的牺牲品,又成为某些势力手中的工具,他为这些势力打开了通往真正的权力即经济权力以及暗中的政治影响的大门。”<sup>②</sup>

改革的实践表明,问题与其说在于“精英们”的努力和意图,倒不如说是在于体制本身的内在特点。格拉乔夫认为,斯大林留下的这份遗产“完美无缺”,只需人们为它服务或者加以看管,却无需改进。在抵御任何从外面摧毁它的企图方面,体制可说是做到了尽善尽美、无懈可击,却只有一个缺陷:它无法避免从内部对其“稍加修理”的企图。因此,任何人只要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出于良好的动机提出完善体制或者使之现代化的计划,客观上都会变成体制最危险的敌人——“破坏分子”。领袖斯大林深谙此事,或者至少是有所感觉,因此主要是出于正统的共产党人的“破坏分子”人数就愈来愈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97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2页。

多,尽管对他们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戈尔巴乔夫无疑是很走运,至于体制本身,就不能说走运了。”<sup>①</sup>

于是,克留奇科夫很惊讶地发现:“整个一个时代,由于各种原因,包括一些客观原因,使党作为一支思想政治力量独占领导权。但即使是对于那个时代,也不能说一党制就是社会的最佳选择。随着社会与国家的发展,建设问题必定会复杂起来,需要全面地考虑各种条件,需要倾听各种不同意见的观点,作出决定,包括一些各方妥协后的决定,但在一党制下,就无法保证做到这一点。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是这样,党内领导不去寻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迷恋于玩弄各种策略和手段。结果,却是战术吞噬了战略,最后认为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是废除一党制,自然也废除了苏共在社会上的领导地位。”<sup>②</sup>而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改革失败最关键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模式。”<sup>③</sup>

## (二)苏联共产党是否不可改造?

麦德维杰夫认为,苏联是在被摧毁了的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和社会模式,是劳动人民掌权、无产阶级专政、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利益和意志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巩固不是依靠民族思想、历史传统,也不是依靠君主政体、专制的帝国主义思想或者是宗教思想,而是依靠一种全新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的唯一政党。他说:“共产主义学说以及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的主要原则不仅仅依靠信仰和信念,它还需要证明,共产主义学说不是指在天堂的永生和死后的劫难,不是指上帝和灵魂的不朽,它宣扬的是全新的、更加公平的生活以及人类的富足,它要消灭战争和暴力,追求自由和幸福。一方面是富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学说,另一方面是国家统治的力量,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45~246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这两者构成了这个新兴国家的主要基础,而倡导和维护这种意识形态学说的共产党则是这个国家的承重结构。”<sup>①</sup>季诺维也夫也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在国家机构领域的最重要的创造,就是被称为党这一重要的结构性成分。”<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恰恰就是把党作为改革的直接对象而开始行动并毁灭了党本身。在改革的七年时间里,戈尔巴乔夫长时期地使自己和其他人相信他能改造党,把它改造成为改革的先锋队、社会的先锋队。戈尔巴乔夫经常说:“……由于中央委员会在党和整个社会中所起和将要起到的特殊作用,这是个特殊问题。正是中央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负有确保党作为政治先锋队的不断增长的作用的责任。”但是在切尔尼雅耶夫看来,这是一句“关键性的话”,因为它反映了戈尔巴乔夫把党改造成什么样子的真正想法。切尔尼雅耶夫说:“可以这样理解这些话,即戈尔巴乔夫只是考虑完善并赋予其‘作为指导和领导力量’的党更文明的形象。我相信事情并非这样。在‘政治的’这个词中包含了她的这样一个思想,即不是用强制的手段,而是用其道德和思想理论影响使党从国家组织变成‘指明’‘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组织。”<sup>③</sup>

在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们”看来,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积累了太多的政治弊病:

一是苏共组织的严重蜕化使党丧失政治活力。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苏共的活动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不符合社会面临的任务的要求。在实际争取国家变革的斗争年代,苏共始终是一支强大的、目标明确的积极力量。但是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和管理机构系统的稳定运行时期,苏共的积极性急剧下降,党的全面蜕化开始了。一方面,由于没有了斯大林时代“大清洗”的恐惧和卫国战争时期的生命危险,党成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追求权力的最好选择。博尔金指出:“由于生活相对平静和苏共党员可以在社会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279~280 页。

<sup>②</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 21 页。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279 页。

上担任领导职位,各种各样的人都想参加党的队伍。”<sup>①</sup>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数十年待在温暖的习惯的位置上从而导致了干部工作的停滞。关键问题主要在于没有几个领导人真正关心和培养党的事业的接班人。“许多领导为自己挑选了会讨好的人,一些工作能力显然很差但听话的人。因此一旦需要更换干部时,很难找到一个出众的人接替工作。于是那些才能有限、从未搞过党委工作的人就被提上来了。”<sup>②</sup>戈尔巴乔夫也说:“通常,登上巅峰的领导人可说是麻木不仁、对其行为的道德方面不是特别在意、将良心深藏起来的人。因为评价一个领导人的品质,主要是看他达到既定目的的能力。这叫‘胳膊长的人’,就是说可以把事情托付给他。至于竞争者的头脑甚至良心,往往都忘记了。在提拔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有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由第二书记担任,其次是由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州委的部门主管书记或者诸如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塔什干之类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担任。由其他人担任的情况很少。”<sup>③</sup>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党的力量被削弱了,党开始丧失政治活力。“对领导及其干部政策的不满加剧了党的各级统治集团的紧张关系,削弱了党,把它变成了一个没有工作效率的死板的机构。”<sup>④</sup>这样,为反对个人崇拜做的很多工作却没能让各级领导,包括高层领导准确地认清自己合法的地位、作用、权利与义务。第一把手拥有决策权和特别行动权,甚至可以要挟最高立法机关。“戈尔巴乔夫以及后来的叶利钦都充分利用了这些特权。”<sup>⑤</sup>对此,党却无能为力。

二是苏共无限的权力造成了社会的政治冷漠。在苏联,被称为党的独特社会现象,是由许多初级集体式的党组织和独立于它们之外的党的机构组成的。季诺维也夫指出,党组织是构成社会最基础的、国民的社会组织成分,是基层集体、单位的结构成分,其活动局限在单位的范围之内,但它们的作用却是巨大的。它们干预集体生活的所有方面,对集体的大环境、领导人和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89页。

<sup>②④</sup> 同上,第394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sup>⑤</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40页。

其他集体成员的行为发生影响。党组织是共产主义民主特有的、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党的机构是国家机构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是特殊的一部分。首先，它是整个权力体系的轴心、骨架。其次，它也是这样的一部分权力：它管理所有其他权力——也就是说，它是相对于权力本身的权力，是二级权力。对社会的整个权力和管理体系都处于党的机构的监督之下，实际上是党的机构的延伸和分支；反过来，权力和管理体系又在党的机构中以某种方式发生交叉，并影响着党的机构。”<sup>①</sup>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把有关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条款写进宪法，实际上反映了共产主义国家的结构。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对苏共产生了极大影响。博尔金指出：“也许玩弄数字可以哄骗某个人，但是形式主义给党造成了不可补救的损失是有目共睹的。最具创造性的那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的疏远，大量不相信理想但却很有能量的人涌入苏共，不仅破坏了而且瓦解了党的队伍。不道德行为、贪污受贿、入党收费、出卖党证等事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外高加索情况更甚。这个曾几何时强大的、坚如磐石的、以自己的领袖和进步思想闻名全世界的党，如今人数发展到反常的规模，变得臃肿笨重，染上了难以治愈的疾病。党的委员会、许多区、州的党委书记具有绝对权力，常常包办代替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他们不关心党组织和党员的需要和要求，只是中央的传声筒，所以当然不能解释为什么病病歪歪的勃列日涅夫仍然领导着国家，而他那些年迈的战友把持着经济、工业、科学、文化这些正处于危机状态的重要部门。很多地方领导得不到应有的信息。”<sup>②</sup>社会对苏共的政治冷漠开始形成。

三是苏共干部的特权腐败激起了人民的愤恨。博尔金指出，命运使党不仅受过一种疾病的折磨，而且长期以来党内不同意见的斗争就没有中断过，党不断地同各种派别、反党集团、机会主义分子、倾向分子、派别分子以及其他现实的和虚构的反对党的路线的各种政治敌人进行斗争，但是党从来没有同自己上层中的贪污受贿者、自私自利者作过斗争，这是苏共历史上新的一页。“这种病削弱和损坏了党的免疫系统，破坏了党的巩固。苏共

<sup>①</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93页。

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各种肮脏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区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寄来的盒子。这种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特别盛行，后来在安德罗波夫时期曾竭力改变这种做法，但是它的残余还持续了很长时间。”<sup>①</sup>还有一个原因使苏共普通党员和领导人之间的裂痕逐年扩大，这就是各种特权。博尔金指出，关于这些特权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耳闻，这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并大大离间了党内各阶层的关系，最终竟导致共产党员要求澄清某某人的东西是哪儿来的，花费谁的钱。问题的提出是公正的，但是富有经验的党的领导却努力把所有的批评引向党的、经济的、苏维埃的基层官员。“如果分析一下各个人民代表特权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就会一清二楚，最高领导集团没有受到检查。至于中央机关，许多工作人员之所以能留在这里工作，除有党纪约束外，主要是因为有机会到专门的诊所看病，到疗养院治疗，否则这些业务水平很高的工作人员——博士、副博士未必能看上这些官位，何况近几年工资又不是太高。”<sup>②</sup>

为了改变苏共身上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党真正成为社会的政治先锋队，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三个造成了极大政治影响的“改造”措施：

首先，通过更新苏共的指导思想，使苏共更人道、更民主，结果导致了苏共的毁灭。博尔金认为，戈尔巴乔夫把苏共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进行了“改头换面”，这是导致苏共丧失战斗力最深刻的原因。他说：“不管对选拔党和国家最高机构的干部方面的缺陷批评得多么正确，看来导致党被削弱和党的领导者中出现冒险主义者的最深刻原因是，苏共和社会失去了一个全民族的伟大思想，依靠这种思想，我们不仅完成了1917年的革命，而且团结了人民，经受住了国民经济改造的艰苦条件的考验，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战胜了希特勒德国，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取得了不愧我们伟大人民的地位，它的伟大胜利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实际上没有一次重大的国际行动不是在苏联公开的或非公开的赞同下完成的。”但是这个在150年前诞生的伟大思想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僵化”，苏联的思想家违背时代的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86页。

<sup>②</sup> 同上，第394页。

要求,长久以来并不无成效地把它变成了一种教条,他们坚持认为经典作家的思想是完美无缺的。党依然坚持过去的立场,从而在对于世界社会发展的认识失去了战略优势,丧失了主动权,无力地、教条地反抗着西方宣传的进攻。“思想专制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靠职位等级建立起来的结构,它依赖某些神圣而又牢固的思想象征和权威等关系得以维持。对权威和象征的尊敬一经丧失,便是灭亡。如果敌人能把破坏这些思想的病毒投入其体内,那么胜利便有保证。”<sup>①</sup>由于能够在苏联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把群众联合起来的创造性思想已消耗殆尽,党不能得到新的理论武装。戈尔巴乔夫对形势没有明确的认识,提不出能够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切实有效的新思想,他的上台导致党彻底失去了社会领袖的地位。“不仅如此,总书记还加快了党的垮台。千百万忠诚的共产党员信任他,选他为党的领袖,而对这些共产党员的命运负有责任的他却第一个宣布与苏共脱离关系,第一个背叛了党,怯懦地抛弃了党,而且是当众公开宣布这一点。”<sup>②</sup>

其次,通过实行党政的权力分离,使党成为社会政治组织,结果导致国家的崩溃。佩特罗夫指出:“共产主义的崩溃和它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组织上的瓦解,而不是改组。”<sup>③</sup>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理应占据应有的地位。在党领导一切的几十年里,国家管理体系正是在这一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它已经成为国家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戈尔巴乔夫在未把共产党 的作用降低到三流角色之前,接连不断地打击它,使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小。尤其是在苏联最高立法机关通过决议废除了苏联宪法第六款后,这首先在局部,然后在全国范围内破坏了整个国家体制。克留奇科夫认为,这又是戈尔巴乔夫考虑不周、无法控制和冒进主义在作怪,在那些需要以理智来对待的问题上总是感情用事。由此所形成的局面使国家急速走向崩溃,并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在这之前一直“能够”进攻和取得胜利的党,已无法在自己队伍中维持秩序,在不断地退缩和改变立场。苏共领导脱离了党,

<sup>①</sup>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6~57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401页。

<sup>③</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98~99页。

而党则脱离了群众。为了扭转局势，党内高层领导和党的领袖对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改组，建立了各种委员会，召开了许多毫无条理的会议，发表了一些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自相矛盾。苏共很快就在人民群众中间、在新闻媒介中间丧失了影响力。在党内、党的领导层内也形成了一股势力，它成功地从内部分化了党。在每一次反党活动进行后，党的领导都不断地放弃立场，退缩到事先根本没做任何准备的阵地，而不是首先确定并坚守某条界限，坚持下去，镇静下来，然后再采取行动。于是，“戈尔巴乔夫把共产党清除出政治舞台以后，一下子就使苏维埃社会失去了支撑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活动体系的基座”<sup>①</sup>。

毫无疑问，在政权职能转交给苏维埃的同时，党政一体的管理体制也要随之改变。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并不一定非要高喊口号，并且不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利加乔夫指出，大众新闻媒体编造谎言，说什么党的机关紧紧抱着行政和经济职能不放，应该采取果断行动使之与政权分离开。“那就让我们回想一下，把党与经济的职能分开的任务很早以前就被提出过，那时战争才刚刚结束，其后在六七十年代又有人提到过这一点。这才是正确的步骤。要是党渐进式地把管理职能转移给苏维埃的话，就可以避免当前的大多数的动荡。但是占大多数的恰好是另一种情况，剥离党的机关的政权职能的过程被赋予了夺权斗争，不，不是斗争，取代平衡移交的正是殊死的搏斗！”结果党没有剩下任何的经济职能，参与决定重要社会政事的权力通通被剥夺了。管理体制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质变”。尽管苏维埃在孤立无援而又缺乏经验的状态，党还是被顺理成章地剥夺了自己的管理权。“其结果就是国家演变成了无政府的状态。”<sup>②</sup>

最后，通过建立多党派竞争制度，使党发挥议会党的作用，结果导致政治的混乱。在一党体制下，苏联共产党并非人们通常使用这个词汇时的含义。马特洛克指出：“它不是一个政党，它一直是政府的工具，或者反过来说，是控制政府的工具，它有权支配整个国家机构。即使一些类似共产党的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序言第3页。

<sup>②</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77页。

组织,不管叫不叫共产党,在苏共残存的基础上再建起来,它也不可能再把触角伸向共和国各个组织中去发挥作用了,它也不会成为国家施行强制统治的工具。换句话说,它将被迫成为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政党。”<sup>①</sup>总的来说,苏共多年来始终生存在“温室”环境中,作为领导力量,它在国内没有谁反对它。党不需要为生存、为社会总体发展路线和具体某个方面的发展路线去斗争。党的高层领导机关、代表大会的意见更是无可争议的决定。党还负责执行这些决定,如果没有成功,党可以把失败的责任推到那些领导部门的身上。“很大一部分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层总是抱着这样一种幻想:只要说几句话,发一些号召,通过几项决议,事就办完了。”<sup>②</sup>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发生改变了。在自由竞争、差额选举的新政治生态环境下,苏共被急剧推向一个悲剧性结局的时期。

戈尔巴乔夫认为,在改革时期,推行了对党的活动进行重大改组和扩大党内民主,然后也改变党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方针。可是,苏共的结构、工作方法、干部队伍本身(“等级名录制官员”)都已被老的习惯、传统和规范所浸透和固化了,所以要改造它,使它变成一个正常的政治组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这就给改革进程打下了烙印,使之不得不在矛盾之中,在改革力量和保守力量的激烈斗争之中进行。但是在对改革年代的党作评价时必须准确和公道。戈尔巴乔夫认为,事实是,改革是由苏共开始的,那时党是在忠于改革的领导人的领导之下的。再说,假如实行改革的倡议不是来自苏共,改革根本就不可能开始。这里问题不仅在于有一群改革者,社会上大部分普通党员也是赞成变革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最终赞成实行民主、政治多元主义、自由选举,建立混合的市场经济,改革联盟等。后来,在1990年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这些都得到了批准。但是“苏共到底没有经受住成为一个改革党的考验。由于它的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和许多州和区的委员会出面事实上支持了1991年的8月政变,从而给自己作出了判决。”<sup>③</sup>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99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8~29页。

结果，在改革的过程中，党既丧失了对改革的控制权，又丧失了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利加乔夫说：“之所以在我国能发生这一切，最主要在于，苏共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先是弱化，而后被完全消除。苏共被从大政治中、从思想和组织中排挤出去。在党的内部形成各种派别。投机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向党和国家、共和国党和权力结构的领导层渗透。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国家领导形成派别，他们的立场转向消灭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所有这些都是毁灭苏共链条的环节。戈尔巴乔夫在未召开中央全会的情况下，自行辞去了总书记一职，没有对叶利钦签署禁共令、瓦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定的举动给予有力的反击。”<sup>①</sup>

### (三) 戈尔巴乔夫有改革计划吗？

#### 戈尔巴乔夫有改革的整体计划吗？

克留奇科夫明确指出：“任何改革的计划都没有。人们在猜测这个让人费解的口号究竟有何含义，想弄明白，我们到底要走向何方，追求什么目的，目前与将来要解决的任务又是什么，但他们却要么得到戈尔巴乔夫那些令人费解的话，要么就是死一般的沉默。”看来，错误不仅仅在于戈尔巴乔夫号召“走革新、改革和改变的道路”，“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就改革发表的文章、讲话，还是他的大部头著作，都没有把这一问题解释清楚，而且使它更加让人难以理解”。<sup>②</sup> 不过，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改革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并不能用一张药方来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所以计划并不重要。

不过，七年的改革实践还是能够显示出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设想，以及为了落实这些改革而采取的措施。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改革失败的一个很大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格拉乔夫指出，戈尔巴乔夫认为首先是因为改革初期“错过了开展经济改革的不少时间”。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主要的原因应当是所开始的改革的经济方面总是从属于主要的方面即政治方面，并且负有为政治改革服务的使命。因此，只要出现

<sup>①</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353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31页。

使问题复杂化的政治事件,已经成熟、甚至过分成熟的经济上的决定都不止一次地被取消,或者推迟到美好的时期实施,而由于国内的紧张气氛始终没有消退,戈尔巴乔夫就没有办法腾出手来认真地抓抓经济。“由于这个原因,某些平民主义举动完全可以预见的经济上的后果就很少算计,尤其是当认为这些后果可以很快在政治领域得到补救的时候。”<sup>①</sup>

但是改革失败的原因远远不止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这样,可能还有着更为深刻而复杂的原因。博尔金认为,改革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是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和性格,是他的优柔寡断和热衷于他年轻时就形成的那些定式。“实质上总书记依然是自己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培养他并把他推上权力顶峰的那个结构的产物。一方面,他看到了现存制度的缺点,想给社会生活带来一些变化;另一方面他又忠实于旧模式和旧方法。不管戈尔巴乔夫如何谈论民主化和公开性,但是他不是斯大林也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化身,而只不过是他们渺小的影子——狡猾诡诈的苏斯洛夫的化身,而且甚至连他也不如。这就是对他的行动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戈尔巴乔夫高喊民主化并谴责自己战友的斯大林主义,但实际上他独揽党和国家大权,独断人们的命运,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偏见、好恶决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组成、各共和国共产党党中央及各州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人选。”<sup>②</sup>

作为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上述行为其实符合苏共政治传统,也符合党内干部的政治习惯。于是,人们都被他迷惑了,以致丧失了对改革的政治辨别能力。因为总书记直到最后仍然宣称他不会放弃党。佩特罗夫就指出,“改革”能畅通无阻正是因为它既不是新理论,也不是新实践。党还是那个党,领导人还是那些领导人,人们还是那些苏联人。连那些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也在同大家一起努力劳动,尽量不要被看作是进步和革新的阻力。“尽管如此,那里也曾有过某种新东西,某种不太重要的东西,我们可称之为个人的东西:总书记的进攻性、喜好标新立异和不同凡响的强烈愿望,希望苏联在下一个千年成为举世无双的国家。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性格和个性,对这一点,谁都没有认真注意。”而这一点,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铸成了不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09页。

②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412页。

可饶恕的大错。“改革”不知不觉变成了“戈氏改革”，即某种反改革的东西、某种完全陌生的新东西。看来，国家也像任何一部汽车一样，全在于谁坐上它和驾驶它。戈尔巴乔夫这位司机与众不同，他能牺牲党和国家，牺牲人民，就是不牺牲自己。因此，在苏联发生了这一切之后，经过受苦受难的10年，人们还在糊里糊涂，还在自问“这是怎么回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怎么会允许这件事情发生？”<sup>①</sup>

性格上的优柔寡断，造成了戈尔巴乔夫理论上的摇摆不定。博尔金指出，在对改革的可能性的如此幼稚的认识支配下，戈尔巴乔夫作出了一个个仓促的决定，在管理经济、刺激和组织生产方面采取了种种不可靠的方法。最主要的一点是开始逐步撤换干部。这项工作在各个领导层进行，也涉及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戈尔巴乔夫往往不按专家们的建议去做，却采纳另一些人的主张。从思想上和人员上的这种不断变化中可以看出总书记内心的慌乱无措。为了加速国内经济的发展，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构想，但每一次转变都使人感到，这明明是要转而采取资本主义发展的方法，而且还是资本主义在最不成熟的初始形态时的方法。“虽然还在一本正经地大谈建设社会主义，大谈共产主义远景，但这些都是空话，如同一块遮羞布，在掩饰见不得人的思想和放弃党的全会和代表大会所确立的方针的做法。”<sup>②</sup>利加乔夫也指出：“戈尔巴乔夫的话，虽然就其实质而言是正确的，但是却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在具体的行动上体现出来。”这类例子很多，比如规定是正确的，实际工作却没有根据它来执行的情况便是其中之一。戈尔巴乔夫关于我们的历史一日也没有虚度的论断，同样也没有成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指导媒体活动的指针。总体上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就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是他却没有为自己的观点贯彻到生活中去而斗争过。进而言之，如果就污蔑历史的话题继续谈的话，那么没有发现总书记对歪曲历史表示过愤慨，在他的观点中甚至表现出某种两面性。从一方面而言，他提倡对历史要有负责的态度，而从另一方面而言，他自身就表现出相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3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96页。

反的看法。其中包括,他1991年对检察官说,似乎“过去所做的一切就本质而言,都是在棍棒驱使下做的,人脱离了土地、生产资料、政权,脱离了所有一切……都被收归国有。区、州、共和国权利归于‘诸侯’,不受任何监督,没有任何法律可言。”<sup>①</sup>

这种摇摆不定以及爱妥协的天性,实质上反映了戈尔巴乔夫政治实践的无能。“戈尔巴乔夫爱搞妥协的天性所特有的回避抉择或者延迟抉择,在很大程度上既决定了改革第一阶段的内容,又决定了政策的面貌,人们说当时政策的特点是不够坚定和前后不一。”<sup>②</sup>叶利钦就非常不屑地批评戈尔巴乔夫:包罗万象的改革计划遇到了他在改革实践中的无能。改革就是要重新破坏和建设,而他把赌注下到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上,结果证明自己是错误的。叶利钦继续指出,戈尔巴乔夫想搞什么样的改革呢?他是否在本能上能充当一位不知妥协的铁腕领导人的角色呢?“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有着一副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信徒。从理论上而言,这样看起来很漂亮;但在实践中,前总书记是何等的惧怕痛苦的破坏和急剧的转折啊!他这个人在我们的苏维埃体制中所养成的根深蒂固、透入骨髓的思想、作风和习惯,致使他从一开始就对‘市场’‘私有制’这样的概念怕得要命。这种恐惧的心态就像女人长衣的拖地长后襟一样尾随着‘党的政府’的一切行动。”<sup>③</sup>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戈尔巴乔夫在激发了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后,本想增加自己的政治支持力量,但实际上却带来了政治大麻烦。在对权力的渴望下,这些政治派别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政治批判能力。于是,对于“左派”和“右派”,戈尔巴乔夫总是常常作出小小的或不小的让步,以此来求得他们之间的平衡,但是对于那些要求他要有明确具体行动纲领的人,戈尔巴乔夫总是愤怒地进行驳斥。在雷日科夫看来,戈尔巴乔夫没有,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不想有这样的纲领。“他是一个即兴做事的人,可以说这种即兴的办事作风

<sup>①</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43~144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sup>③</sup>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0页。

过于经常地支配着他的行动。”<sup>①</sup>按照这种行动的结果就是：“许多事情有始无终，没有改革的战略路线，搞得匆匆忙忙，缺少深思熟虑，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即兴而为的产物。”<sup>②</sup>于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改革仅仅只是个空洞的口号，没有什么内容，总以嘲笑的口气谈论它。最后，人们发现，“改革”一词的丰富含义：“摧毁一切，然后重新建立；不进行破坏，只是从根本上完善；改变管理结构，实行地方分权，废除计划体制，如此，等等。”<sup>③</sup>

当1990年戈尔巴乔夫成功当选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的时候，他的失败其实已经开始了。美国《新闻周刊》发表评论认为：

经过将近5年的执政，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显赫的失败者。他对苏联的控制几乎是完全的，对政权的掌握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坚如磐石的。但是在某种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正在走向失败。迄今为止，他未能实现其主要目标：挽救苏联本身的制度。

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归咎于他本人的缺点。他对苏联社会的了解并不完全。他缺乏经济上的专门知识。他对未来的思想既狭隘又模糊。在越来越落后于时代的克里姆林宫政治舞台上，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精明的战略家。他是一个老练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上的胜利却很少转变成国内的胜利。在他的国家里，绝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个不能令人信服的领导人，他的同僚们不服从他的命令，他的将军们怀疑他的才干；而大多数苏联公民则不需要他目前正试图强加给他们的经济自由。

还有一些政策未能收到预期效果，部分原因是估计错误。在东欧，戈尔巴乔夫原想推进开明的改革，结果却触发了整个地区共产主义的溃败。在这个过程中，他帮助带来了苏联人民最大的恐惧：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的崛起。公开性的推行导致大量的个人诽谤，从而破坏了戈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

<sup>②</sup> 同上，第19页。

<sup>③</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31页。

尔巴乔夫自己的威信。它还导致了苏联民族主义的爆发,从而形成了国家分裂的危险。戈尔巴乔夫试图取消中央计划经济,结果正促使有些城市和地区抛弃他这只正在下沉的船。他发起的打破警察国家体制的运动已造成苏联犯罪率空前增加。

.....

那么,西方人所认为的戈氏的局限性是什么呢?那就是:当有关改革的决定最后作出时,这些决定予人一种审慎的和有限定的印象,即他们所考虑的,是要做些什么事情来挽救苏联的制度。这意味着他要在经济和技术上结束苏联的孤立。他要保持国家的统一,停止花费很大的军事对抗,并且在经济上实行一些市场机制,而同时又保持共产主义。他想实行多党制,但在这个多党制中,共产党要继续占统治地位。

总而言之,戈尔巴乔夫希望改进苏联的制度,并非要打碎它。但是他已成为无意造成的效果的牺牲品。<sup>①</sup>

#### (四) 改革是否受到西方的诱惑?

1990年6月10日,英国《星期日快报》刊登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发表的一次电视讲话,谈她为什么要支持戈尔巴乔夫。撒切尔夫人说:“苏联新的革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它超过了人们,或许还有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预想可能达到的程度。现在,西方仍在竭力把握这种革命的全部意义。”<sup>②</sup>

这段话听起来好像撒切尔夫人已经能够把握苏联改革的走向——自我瓦解。但是作为改革的发动者——戈尔巴乔夫,在她的眼里仿佛仍然被蒙在鼓里而毫不知情。

这到底是什么呢?事实上,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以及改革失败,人们都不得不怀疑:戈尔巴乔夫是受到了西方的蛊惑而主导了苏联毁灭的历史悲剧。“苏维埃列车的颠覆和这一列车是由戈尔巴乔夫及其精选出来的随从人员驾驶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这是谁的个人罪

<sup>①</sup> [美]《新闻周刊》1990年6月4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6月2日。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319页。

责。”<sup>①</sup>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说：“撒切尔夫人看上戈尔巴乔夫哪里了？她看上他没有骨气。她当时就明白，对待戈尔巴乔夫就像对待软蜡，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塑造。”<sup>②</sup>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前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有所不同，后二者只是在他们在位的后期，才热心投入外交活动，而他却从一开始便乐此不疲。戈尔巴乔夫同西方的合作开始于1984年的秋天，当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如所知，这次会见是由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组织的。实际上这是一次对未来总书记的摸底会见：西方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这就是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的信号。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sup>③</sup>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明确而肯定地指出：“苏联所发生的事件不是解体，而是崩溃，是外部势力有意识、有目的地催化并支持的破坏过程。”<sup>④</sup>

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博尔金指出：“总书记是如何从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前途的拥护者变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构想的推崇者的呢？我想，时间会使戈尔巴乔夫将他的观点、原则发生急剧转变的原因向世人作出解释的。当然，一个人不能像风向标一样随风转，我只同意一些分析家的结论：他当时已经身不由己。总书记受制于国内外某些势力，他们为他设下了圈套，他被迫带领党的羊群走入那精神的和肉体的屠宰场，只有他一人从那里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sup>②</sup>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sup>③</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sup>④</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序言第1页。

走出来,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还发了财。”<sup>①</sup>

作为政治学者的季诺维也夫在研究中明确指出:“应该承认,在苏联危机的成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内部原因(尽管不仅仅是这些原因);但是在危机的展开和随后的国家崩溃中,起决定作用的当属外部原因。在与优势的外部敌人的残酷斗争中,苏联和俄罗斯被摧毁了。这个敌人的名字就是:西方。”<sup>②</sup>这是因为,苏联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形式转变的任何前提条件都还没有成熟、也不可能成熟,国民大众中间还没有任何向资本主义转变的需求,只有一些来自“影子经济”的罪犯、个别持不同政见者、隐藏的敌人以及一部分聚敛了财富并想将其合法化的特权阶层的代表幻想这样做。随后开始的、毁灭一切苏联的事物的狂热,乃是新的反苏、反共宣传和大规模思想混乱的结果。“而当局上层仅仅是想要迎合西方主子——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些人恐怕早就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sup>③</sup>

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之所以会如此盛行“阴谋论”,除了改革的结果说明之外,还应该考虑到一个更大的背景:“冷战”。实际上,“冷战”远远地走出了仅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发生的战后冲突的范围。“如果我们把冷战界定为思想战,那么这场战争就具有一个庞大的文化武器库,所藏的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等。”<sup>④</sup>就其规模来说,它涵盖全球,并包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宣传、文化、体育、旅游。使用了一切能够影响人的手段:广播、电视、间谍、会议、讨论会、文化交流、收买、知名度。利用了一切的理由、对手的一切脆弱之处、人类一切的弱点:民族分歧、宗教偏见、好奇、虚荣、好处、羡慕、消极思潮、恐惧、对冒险的热衷、利己主义、爱情等。总之,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无所不包的新型战争。”<sup>⑤</sup>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美国作为“冷战”中苏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27~128页。

<sup>②</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sup>③</sup> 同上,第53页。

<sup>④</sup> [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前言第2页。

<sup>⑤</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7~48页。

联的最大对手，不会不利用戈尔巴乔夫改革造成的国内动荡而趁机挑起更大政治混乱的机会。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时，美国就已经视苏联为其在意识形态和全球利益的最大竞争者。为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确定了针对苏联的战略方针。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只是通过外部影响，无论它们多么强劲有力，也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不可能完成他们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任务，唯一可行的办法依然是从其内部对它们进行破坏。……自从戈尔巴乔夫一上台执政，就彻底预先确定了以后斗争的结局。我们的社会体制，就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有其最致命的弱点：对政权高层人物的背叛绝对无能为力。如此以来，现在只好向西方领袖交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西方在选择手段方面是正确的。”<sup>①</sup>

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

---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sup>①</sup>

对美国的策反渗透活动,苏联早已洞悉并保持了高度警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情报侦察部门于1977年起草的《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公民中招募有影响力间谍的计划》中指出:

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得的可靠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最近在其专家分析和预测苏联今后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正制定激化旨在瓦解苏维埃社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敌对活动的计划。为达此目的,美国情报部门将提出在苏联公民中招募有影响力间谍的任务,并对他们进行训练,然后再使他们进入苏联政治、经济和科技管理部门。

中央情报局还制定了根据不同对象分别对待的有影响力间谍训练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大纲,使他们掌握间谍活动技能,并对他们进行高强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改造。此外,教授国民经济领导层的管理方法,也是此类间谍最重要的训练内容之一。

美国情报部门领导人准备不惜任何代价,目的明确、坚持不懈地寻找在个人素质和办事能力上将来能够在管理机关担任行政职务并能完成敌人所交任务的人。同时,中央情报局的出发点是,个别的、彼此之间互不相关的有影响力间谍在国民经济中奉行破坏政策和曲解领导指示的活动,将由美国情报机关建立的统一中心来协调和指导。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预谋,有影响力的间谍将以目的明确的活动促使苏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形成某些困难,迟滞我国经济的发展,并把苏联科学的研究引向绝境。在制定该计划时,美国情报部门的依据是,苏联与西方越来越频繁的接触为在当代形势下实现这一计划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据美国直接负责在苏联公民中培养这种间谍的情报侦察人员称,目前美国特工机关实施的这一训练大纲,将有助于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并最终使苏联接受大量的西方思想。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核实所获情报,以便制定并采取措施,揭露和制止美国情报部门的这类计划。

签发: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sup>①</sup>

仿佛就是按照历史剧本的演出一样,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不过,在雷日科夫看来,他绝不会以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sup>②</sup>那么西方国家是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65~366页。

<sup>②</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3页。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达到这个战略目标呢？

首先，摧毁苏联人的精神信仰，使社会丧失抵抗能力。“冷战的基本技术存在于信息心理领域。”<sup>①</sup>“冷战”的主要武器，是意识形态、宣传和心理的手段。“冷战”的组织者和执行者的任务，是从思想、道德和政治上败坏苏联社会、使其社会和政治结构衰败、使群众失去反抗能力、摧毁敌方国民的思想—心理免疫力。还运用强大的宣传手段，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问题引开，而转向性、电影明星和文痞的私生活、犯罪以及变态的娱乐方式。民族和宗教感情被挑唆并膨胀起来，创造并强制接受一些虚伪的神话和偶像。在改革中，戈尔巴乔夫用“全人类利益”替换了苏共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利益”。这种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知识分子，包括党内干部，都是由欧洲中心论教育出来的，因而西方左派精英的观点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戈尔巴乔夫同他的整个智囊班子，都公开遵循欧洲共产党的主要思想。但是欧洲共产党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否定苏联体制的存在权利，因为似乎马克思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已经被它破坏了。”<sup>②</sup>于是，苏联社会坚持了七十多年的主流价值观被放弃了。雷日科夫指出，这种把“泛人类价值”向俄罗斯土壤不加考虑地、片面地、机械地移植的结果，无疑对实现在美国倡导下推行的全球化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民族价值和国家主权，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后果，就完全被置于次要地位上了。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sup>③</sup>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在事实上造成社会的“精神空虚”。于是，“西方（主要是美国）按部就班地利用意识形态—心理武器和经济武器，不惜花费天文数字般的金钱，终于完全搞垮了苏联社会——首先搞垮了统治阶层和特权阶层以及

<sup>①</sup>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01~402页。

<sup>②</sup> 同上，第405页。

<sup>③</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意识形态精英和知识分子阶层。结果，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在短得惊人的时间内就投降了”<sup>①</sup>。

其次，大肆地宣扬戈尔巴乔夫，使其亲近西方国家。戈尔巴乔夫喜欢外交活动，特别是喜欢同西方国家元首打交道。出国访问、会见西方国家首脑成了苏联总统的主要工作，西方舆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具有新思想、不按照前任的教条行事的人，他很快成了西方人崇拜的偶像。他们不断地塞给他各种名目的奖金，向他颁发金质奖章，授予他种种荣誉称号，在电视、报纸和杂志上为他作宣传，巧妙地满足着他的自尊心。西方国家的老百姓并不知道，批判过去、打破现存结构要比搞建设容易得多。他们不明白苏联人民为什么对这个人持冷漠态度：“他开创了一项多么好的事业，却在自己的国家里受到严厉的批评。”<sup>②</sup>于是，国内的形势愈紧张，国外的赞誉之声就愈大。西方国家对总书记—总统的所作所为依然赞不绝口，把他当作伟大人物来接待，因为他做了他们用任何武力和其他力量都办不到的事。“戈尔巴乔夫的西方崇拜者对他的称赞补偿了他在国内遭到的冷遇。”<sup>③</sup>当然，如果把总书记兼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称之为错误，那实在是太荒谬了。“不过他首先满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总是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还使得西方对苏联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使得苏联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日趋活跃，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sup>④</sup>

再次，诱使戈尔巴乔夫深入改革，使其依靠西方支持。博尔金回忆：我是什么时候感觉到改革末日的最初征兆呢？当然这里说的不是具体日期，末日是逐步到来的，但是可以感觉到了，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言行中开始缺乏信心，在探索新的经营方式方面开始摇摆不定，把失败归罪于别人，害怕承认错误，害怕承担责任，和从前一样到处讲话，通过一些不解决任何问题的

<sup>①</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78页。

<sup>③</sup> 同上，第158页。

<sup>④</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决定。也许开始得还要早些,当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政府成员们彻底分裂时,一切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发现戈尔巴乔夫明知国内情况,还讲那些言不由衷、盲目乐观的话时,才开始醒悟的。他越来越希望能有某种奇迹出现,帮助他摆脱困境。他心目中的奇迹就是人所共知的,那就是来自海外的奇迹:“西方会帮助我们。”<sup>①</sup>没有人会相信西方的诺言。但是总书记却认为西方是真诚的,因为他们自由而文明。“戈尔巴乔夫本人相信这些童话,所以他每个月都许诺西方朋友会给大量援助。但是他们只是许诺,却始终不给实际援助。西方领袖们只是牵着那些渴望援助者的鼻子走,期待着这个东方大国彻底崩溃。他们既不需要伟大的苏联,也不需要伟大的俄罗斯。”<sup>②</sup>

最后,培植亲西方的政治势力,使其影响戈尔巴乔夫。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始终怀疑雅科夫列夫与西方间谍机关有着不清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政治上对苏联造成了极大危害。因为雅科夫列夫不是普通的人,他曾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党的领导人!克留奇科夫说,1991年年初,在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被迫让雅科夫列夫离开总统委员会,但是3个月后在美国人的逼攻之下,他又让雅科夫列夫做了自己的高级顾问,并委托他在苏联推行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这就使雅科夫列夫得以转到国内政治上来,而这在当时无疑是最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是以搞垮苏联为基础的,最多也不过是以邦联制取代联邦制。为此,必须给苏联共产党以新的打击。这些打击的组织者就是雅科夫列夫。1991年年中,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达成基本协议:应该由另一党来代替苏联共产党,这个党就是建立于多党结构内的社会民主党。在以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为一方、以“民主运动”的代表为另一方的思想体系、行动计划和实际活动中,这一点是共同的。1991年春,对戈尔巴乔夫的攻击突然停止下来的缘由实际上就在这里。克留奇科夫指出,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巧妙地扮演了一个破坏者的角色,这完全符合苏联和国外有关势力的旨意。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地方机构曾接到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行动情报,该情报没有引起怀疑。我即时把这份情报报告给戈尔巴乔夫,是博

<sup>①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尔金帮助了我。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舍宁。此时，雅科夫列夫的不幸角色已被看得一清二楚。雅科夫列夫在同自己的伙伴的谈话中，越来越多地引用他同戈尔巴乔夫达成的协议。但是正如博尔金所说的，“戈尔巴乔夫也不愿意会见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甚至不愿意给克格勃主要部门的领导们讲话，担心人民群众怀疑他偏爱克格勃。他这种自我孤立越严重，他的苏联总统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能‘消亡’得就越快，这不是偶然的”<sup>①</sup>。克留奇科夫曾多次试图同戈尔巴乔夫谈谈，但始终没有谈成，不是遭到不成理由的推托，就是被研究研究的许诺支吾掉了，戈尔巴乔夫的不真诚显而易见。“党的领袖在反对党，苏联总统要搞垮苏联。”<sup>②</sup>

### (五) 叛变流行病：精英的共谋？

对改革造成的苏联毁灭，人们已经达成一致共识：是苏联内部因素在发挥作用。更确切地说，是党和国家的“上层”出了问题。

博尔金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这样的悲剧事件是我国数百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有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sup>③</sup>

季诺维也夫在研究中感慨：“我不知道，人类历史上是否还会有这样背叛的情形，其规模和后果能与之相提并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有许多叛变的例子，但是同戈尔巴乔夫一伙在和平时期（在其通常的意义上）所能够做的相比，那简直就是一些儿童游戏。即使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将自己的政治家——一个可靠的反共分子——任命为苏联国家的首脑，他也不可能像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人所能做的那样，对苏联国家和人民造成这样的损害。他们利用共产主义国家所拥有的全部权力，像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那样行动，谙熟业务。一个真正奇怪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是一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81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00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前言第1页。

个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被用做摧毁社会的工具,而国家的存在要归功于社会,捍卫社会乃是国家的神圣职责!”<sup>①</sup>

叛变的首先是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意识形态领袖和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鱼从头先烂。那些挤到政权高层的人,按照其规律在党和国家机关里飞黄腾达。保护国家的现有制度、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是他们天经地义的职责——这首先是他们的制度、他们的政权、他们的意识形态。国民习惯于怀着这样的自然信念生活:他们的领袖为了自我保护和保护国家,会以各种方式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迄今为止凶残地镇压所有企图破坏社会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人的当局,竟然自己会如此暴怒地开始对这些社会基础发动进攻。”<sup>②</sup>

人民无法理解这些在苏联社会占据较高地位的、受过教育的人为什么会发生叛变。但是对这些苏联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来说,却有着最简单不过的理由——攫取属于自己的更大权力和更多金钱。奥尔森指出:“在统治者任命的特权阶层这一层次上,甚至在共产主义体制内,随着时间的充分发展,会存在隐蔽的集体行动。每一个这样的小型团体均有其狭隘的利益,这些利益和专制者的共容利益形成了对照。因而,这些小型团体具备损害经济效率、抗拒增强竞争的市场导向的改革的动机。”“统治者任命的特权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位更为巩固,他们可以阻挠将他们的共谋收益暴露于公开竞争的改革中。”<sup>③</sup>于是在政治大混乱的改革时期,成为叛徒的,首先是那些在苏联社会占据较高地位的、受过教育的人。“由于叛变,他们有机会适应新情况、成为名人、平步青云,得到表现为巨额酬金的金钱施舍。”<sup>④</sup>

叛变带来的好处是:“大量以前没机会升官发财的人,获得机会在新组

<sup>①</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57~58页。

<sup>②</sup> 同上,第63页。

<sup>③</sup> [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

<sup>④</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65页。

建的政权体制中占据位置，并拥有他们的所有特权和收入来源。简而言之，叛变流行病已经以闪电般的速度蔓延到苏联社会。它具有完全世俗的基础，与任何思想动机、任何智力上的顿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sup>①</sup>

看来，改革失败的根源并不在于苏联体制。佩特罗夫指出，对这一问题存在一种广为流传的不正确说法，它是由西方学者、政治家和大众媒体杜撰出来的，这就是一党制和多党制的问题。按照这一说法，只有一个政党，建立起的专政缺乏更新机制，而多党制才是民主制度，具有不断更新的机制。“苏联共产主义的动摇，实际上并没有给在外因影响下出现的多党制思潮提供什么重要论据，恰恰相反，苏联的一党制证明，社会和文明的毁灭是由于内因造成的，而外因的作用不大。”<sup>②</sup>

佩特罗夫分析了导致苏共自我毁灭的戈尔巴乔夫的“秘诀”：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1985—1987年），即改革的初始时期，党和国家内部蕴含着改革的冲动。戈尔巴乔夫说：“在‘最高层’有那么几个人坚信必须实施变革，而且准备亲身去冒这巨大的风险：他们开始了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针对高度集中、官僚主义盛行、意识形态僵化，且成功扎根已有70年历史的那个体制的根本性改造。同我一起开始这一事业的那些党的领导成员与各地区、各社会阶层、政治流派、党内的许多派别都有联系。他们知道，在苏共党内和社会上有利于革新的情绪相当强烈。据此他们信心十足，因为我们着手的并非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是会得到支持的。总之，改革不是一天两天的宣传活动，也不是中彩摸奖的口号。我国是历尽艰辛才得到这个机会的。”<sup>③</sup>

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称要完善社会主义，巩固七十多年的革命成果。于是，所有政治决议和经济改革在内部都被看作按照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目标，是过去实际做法的正常延续。总书记和党的中央机关有权做出

<sup>①</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65~66页。

<sup>②</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8页。

决定,对进程实施中的纪律、连续性和结果进行监督,对人力物力进行重新分配等,地方党的机构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党的纪律要求要无条件服从已做出的决议。人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克留奇科夫说:“我对戈尔巴乔夫的路线,对其目的的善意性,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怀疑,对他要繁荣国家、加强联盟并使其更加蓬勃发展、再上新台阶的多次声明,我一直持信任态度。”<sup>①</sup>因为党的决议是政治家、学者、专家、工人和农民,即所有社会阶层共同努力的结果。“从外表看,苏共第二十七大上的政治决议没有什么不足之处。但改革并不像以往那样顺利,在它的核心里掩藏着非常错误的东西,它影响到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像电流穿过整个有机体。这是患麻痹症的最初信号。”<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的目的达到了。他迅速获得了党和社会的支持。克留奇科夫就说:“至今我仍然认为,即使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开始改革时,是抱着美好的愿望,但他对改革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缺乏明确的认识。他曾大谈特谈具体的行动计划,但是却没有一个切实的计划。在1985年以前,我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只是听说过他。1985年,我当时也是对他上台持欢迎态度的人之一。”<sup>③</sup>

在改革的第二阶段(1988—1989年),即改革的转折时期,戈尔巴乔夫换了一副总书记的新面孔。由于他的本性和欲望的需要,或者说进行“改革”及其负面效应的需要,戈尔巴乔夫没有去发现和纠正错误,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态度。他想加速“改革”的进程,以此掩盖失败的真正原因,从此开始了自己艰难坎坷的路程。1987年底由他掌舵的大船在不断高涨的政治对抗和足以使大船倾覆的经济危机中飘摇。

如何摆脱困境呢?“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和平的尝试,而是采取了牺牲党保全自己的方式,向主要危险(共产党)发起了进攻。”<sup>④</sup>克留奇科夫指出,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97页。

<sup>②④</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

<sup>③</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35页。

戈尔巴乔夫发出号召——“炮打司令部”。“他所说的司令部就是各级党组织，首先是各共和国、各州、各市的党组织。他号召自上而下地进行轰击，他怎么做，人民在底下就怎么做。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暴露了他的卑鄙无耻。”当时，各个方面都开始越来越尖锐地批评戈尔巴乔夫，最激烈的批评正是来自党内，于是他就号召炮打党组织。戈尔巴乔夫不可能不明白，在那时，党是社会的核心，党支撑着许多部门，决定着许多问题。“炮打司令部，炮打党，就意味着炮打核心。不论我们在主观上是否愿意，事实上是党支撑着苏维埃政权，支撑着苏联这个大国，支撑着国家法律秩序。如果你愿意，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工农业的发展，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形势。”改革的实践让克留奇科夫越来越确信：“戈尔巴乔夫只是在装模作样，表示他知道该把一个大国推向何方，实际上，他在有意识地把人民引入迷途。”<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摆脱困境的战略是：把党从国家政权体系中剥离出来，还权于苏维埃。“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倡议而发生的所有高层政权机构的改革，都是向着同一个方向进行的：建立处于党的机关之外的、服从自己的超级政权机关。这方面最重大的步骤首先是：建立总统制的统治体制；其次，删除宪法中关于苏共的领导作用的条款，将苏共贬黜到一个普通政党的地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多党制）、并剥夺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地位。”<sup>②</sup>

为什么千百万党员和工人阶级以及几千万普通百姓没有及早看清戈尔巴乔夫的真实企图呢？其实，这并不是一种容易的事情。佩特罗夫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公开成为工人阶级的敌人或者反共分子，那么因为他的行为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他很快就会被揭露，开除出党，被审判或者退休。但他是“久经考验”的党的总书记，是他掌握着党的机器。谁要认为，“改革”连同他的错误只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事，那他就错了。改革是千百万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戈尔巴乔夫只想尽快尽好地把它搞成。因此，他利用所有宣传手段散布说，改革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民主和自由市场而进行的。当垮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32页。

<sup>②</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台临近时,他们则宣称,问题出在“保守派”那里。

改革的第三阶段(1990—1991年),即尾声阶段,没有了党,没有了国家,无政府状态和分裂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个某些人认为的强硬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独裁者,尽管在他手里掌握着最强大的政权。“他不像一个大国大党的领导人,更像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市侩或农村势利小人。他诡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走出勃列日涅夫的死胡同,而实际上是越陷越深。”如果不是经济“改革”,他就不会搞垮共产党。“他凌驾于党之上,看起来像一个童话中描写的挥舞着大锤而不是靠智慧的侏儒。”<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继承了一个运转较好的党的机器,同时他也继承了共产党的“头脑发热”,认为总书记是具有历史使命的最英明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给反对者心理上设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永远支持总书记的传统还有影响力,尤其在党内‘保守派’中有影响力,他们清楚,如果他们处于这场争论中不利的一边,有可能会终结他们的政治生命。对当前形势的笼统批评是可以的,但不应该公然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具体提案。”<sup>②</sup>戈尔巴乔夫希望大力提高或改善党的地位,他把强有力的锤子握在自己手里,但缺少使用工具和有关机器的知识,他不是卡皮察。因此,他漫无边际地敲打,上下左右,弄坏了机器,贻误了工作。他敲了9999下,就是破坏了9999次。戈尔巴乔夫站在政治和国家的最高层,远离现实,甚至躲在幕后,把锤子交到千百万执行者手里,根据他的旨意敲打机器。戈尔巴乔夫像一个评判孰胜孰负的高级裁判,这些执行者喜欢这样的闹剧,希望戈尔巴乔夫给他们颁奖。而戈尔巴乔夫不利用共产党首脑的权力制止这场闹剧,而是站在自己前任的阴影里,扮演着稻草人的角色,以所谓“错误”要挟着别人,尤其是那些高层的“保守派”。<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利用的唯一武器就是“改革”这一目前最强大的破坏手段。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67页。

<sup>③</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4页。

一开始这个词的含义并不清楚，后来才知道是对党、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公开性”释放了社会的不满，缓冲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错位与不协调。但是戈尔巴乔夫却把改革中出现的所有过错转嫁到“改革”的反对派头上。于是，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都被定为“保守派”，视为阻挡进步和改革的人、勃列日涅夫和斯大林类型的人。作为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断变换政治人物的立场观点。戈尔巴乔夫在爬到顶峰之前，极力以共产主义强大和战胜资本主义之类的演说给人留下强烈印象。“只有集约的、高度发达的经济才能保证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巩固地位，并使它作为伟大的、繁荣的国家当之无愧地进入新的千年。”甚至当“伟大的、繁荣的”苏联看来没有什么作为，并且肯定要灭亡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改变这种宣传方式。1990年11月，当时苏联的寿命不长了，在一次同作家和文化人士的会见中，戈尔巴乔夫还宣称，除了社会主义，他任何时候都不会接受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不然就意味着甚至在他亲祖父的英灵面前背叛。看来，只有尼克松一个人抓住了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奇异特点：“玩弄政治就像特级象棋大师在棋盘上玩弄棋子一样”<sup>①</sup>。

于是，党的健康力量被戈尔巴乔夫搞糊涂了，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苏联这艘大船，在无舵无帆的情况下航行，故而受到各种力量的左右而摇摇晃晃，最重要的还是谁居于上层。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的积极分子，其中不乏有经验的专家、行家、职业革命家、学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工农业和科技企业的领导，以及中央的领导，大家都处于茫然状态，被破坏力量的强大宣传机器和领导与管理国家的瘫痪机制的无所作为搅得糊里糊涂。”<sup>②</sup>

对总书记的习惯性服从以及对现实政治的无能为力，党选择了仍然跟着戈尔巴乔夫走！于是，戈尔巴乔夫说：“你们既然赞同所有的决议和措施，那么我们就应一起走向共同的坟墓。”在苏共二十八大上，代表们又一致通过了所谓“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文件，文件中充斥着西方社会民主主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11~412页。

义的内容和辞藻。到了这个时候，“总书记仍然在骗人，他没有同普通党员们一起走向坟墓，而是背着广大党员，投向了资本主义这条救命大船，那里为他放着从苏联财富中掠夺来的几十亿美金。对于普通党员来说，奢谈挽救可能太晚了，整个机器已不能操作，共产主义已不再是马克思时代想象的那样，共产党人的幽灵却在游荡（如齐奥塞斯库）。代表们为自己的皮肉、身心以及一切而担心，进而赞同了戈尔巴乔夫”<sup>①</sup>。

在佩特罗夫看来，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的党对戈尔巴乔夫而言是最好不过的情况了。1989年年底以后，戈尔巴乔夫及其侍从开始在这方面积极行动——试图拯救党的财产，以保证将来有相应的收入和经费。“对他们这些司令部的权势分子来说，向市场过渡就是苏共的财产、财务经济来源和党的活动向黑手党经济控股公司、向特权干部的资产阶级过渡，目的是把司令部的成员包容到不断扩大的非法的商贸和财政经济（‘市场’）领域中去，以保障他们本人的收入和外汇来源，以及党在新的形势下进行国内和国际活动的需要。”<sup>②</sup>于是，“总书记把共产党的忠诚卫士（高层机构）变成了新的全面资产阶级化的财经犯罪团伙，以此掠夺苏联的社会资源和财富”。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忠实幕僚们一起挥霍和掠夺正在沉入深渊的苏联这艘大船上的“财富”。所谓“9人委员会”，他们的任务就是实施把苏联党和国家财产私有化的秘密计划，保障资金和财政收入的渠道畅通。这些戈尔巴乔夫分子都是书记处、克格勃、各大部委和银行以及其他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一开始，他们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道路失败之后，叶利钦下令禁止苏共而把其财产划归国有（1991年8月25日），对20世纪党内最大的经济投机集团进行调查，他们的名字才被人们知晓。（这9人是：戈尔巴乔夫、伊瓦什科、卢钦斯基、贾索霍夫、马纳延科夫、维谢列夫斯基、法林、克鲁奇纳、舍宁）。<sup>③</sup>

“改革”，在戈尔巴乔夫这个政治大磨坊里，把逐渐建立起来的成熟社会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

<sup>②</sup> 同上，第117页。

<sup>③</sup> 同上，第145页。

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碾得粉碎，像废品一样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就是他政治上自杀的“秘密”。“不管作出何种比较，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仍然是无与伦比的，他的情况独一无二。这位克里姆林宫的太上皇不自觉地自我毁灭了皇位和帝国，而最惊人之处在于：他从被毁的家园里走出来时，不但没有受伤，反而得到了‘胜利者’和‘解放者’的美名。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灾难（特别是战争灾难）、灾祸和叛变、皈依或改变信仰、被俘等情况，都不新鲜。新鲜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堡垒不是从外部遭到敌人进攻，而是被他自己，从内部毁灭的；其次，他是自愿走进敌人营垒的，保全了自己，却撇下数以亿计被‘改革’抛入崩溃深渊的无辜百姓，对他们的呻吟和呼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sup>①</sup>

也许，正如大卫·科兹所言：“苏联的崩溃，从根本上说，不是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厌恶了，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行不通，不是民族主义在其中作祟，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颠覆——虽然这些因素都在其中起了各不同的作用。最根本的，是上层利益选择的结果：党—国家精英中起主导作用的一部分人觉得资本主义更有吸引力，更能给他们带来实惠——经济的、政治的、地位的等，因此放弃了原本就不太坚定的理想，加入到分割国家财产、抢夺社会政治地位的亲资本主义大潮当中。”<sup>②</sup>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sup>②</sup> [美]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孟鸣岐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2页。

# 第八章 “建立主权国家联盟” ——党—国联邦化失败

进入 1990 年，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以后，苏联各共和国谋求独立的主权化进程开始加速。这一进程的鲜明特征就是：联盟中央的党和国家的机关分化与各共和国及其政治组织、地方上层人物的公开对立相互交织在一起。在这条分裂与毁灭的道路上，有两座里程碑式的事件：一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于 1990 年 3 月选举米·谢·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设立总统为其他各共和国开创了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先例，并开启了后来受到戈尔巴乔夫批评的“主权大检阅”；二是准备不足、为时尚早的全民公决。“它将一个复杂的大问题（苏联的前途）变成各种政治冲突的目标、对抗的根源。”<sup>①</sup>

## 一、联邦党、联邦国：戈尔巴乔夫新构想

马特洛克分析了苏联国家制度的特性。他说，构建起苏维埃帝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是完全吻合的。所有这些正是“缺席政治统治”的典型特征，通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它，那就是“帝国”。无论苏联体制还有些什么别的特征（它的确还有很多其他特征），它的确是一个帝国。不过，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帝国。罗马帝国、大不列颠帝国、法兰西帝国、西班牙帝国，它们都是因一国入侵另一国而产生的。结束于 1917 年革命的俄罗斯帝国亦是如此。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93 页。

侵略国成为其他殖民地所依附的“宗主国”。与之相反，“苏联帝国则是政党入侵的结果，该政党将官僚和意识形态合而为一。所谓宗主就是共产主义统治阶级，即官僚阶层，它没有国籍之分”<sup>①</sup>。

在民族分裂和政治离心的独立浪潮中，戈尔巴乔夫绞尽脑汁地想出克服危机的对策——党和国家的联邦化。他决定对苏联制度实现全面的“政治逆转”。当这种逆转遇到挫折后，苏共和苏联作为政治的“孪生子”，也就一起走向了消亡。麦德维杰夫指出，研究苏联解体的性质和原因时不能不考虑苏共消亡的原因，这当然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事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共产党是苏联的唯一政党，按照苏联宪法，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领导者和前进的力量”。“苏联共产党不仅是普通的执政党，它还是苏联的缔造者，这个国家正是依靠苏共创始人和理论家的思想方针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这个国家能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在此情况下，共产党的机构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统治国家的国家机构，共产党的削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削弱。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苏共依然是国家的承重结构，但是缺少强大而权威的思想后盾，它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裂痕逐渐加深，于是在瞬间整个承重结构便突然倒塌。……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sup>②</sup>

### (一) 民族分裂与国家联邦化的构想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松开了苏联民族问题的“政治把手”，使得长期累积下来的民族矛盾瞬间爆发出来。在地方精英谋求更大权力的政治冲动、“吃亏的民族”或“受镇压的民族”的情绪渲染以及戈尔巴乔夫拙劣的政治手段，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sup>②</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25~226页。

民族矛盾、民族独立运动最终与苏联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一起成为摧垮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倒性力量。

早在 1987 年 12 月,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就曾对此作过悲观的结论。评论说:“戈尔巴乔夫未能消除全国人口方面的矛盾,反而通过公开性原则暴露和加剧了这些矛盾。民族意识复活的信号到处可见。少数民族的人们一点儿也不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他们希望在摆脱莫斯科的控制的情况下以他们自己的民族方式进行改革。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是他们的历史使命。戈尔巴乔夫希望加强苏联帝国,恢复其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它的政治威望,但民族运动领导人希望这种巨大的时代错误尽快消失掉。简而言之,对于戈尔巴乔夫的使命,从历史的角度看和从严格的政治角度看大不一样。他所执行的任务超出了他的力量,这是因为,他不仅受到官僚主义者和普通老百姓的反对,而且遭到历史本身的反对。历史不是他的盟友,而是他的死敌。俄国帝国已到了日落时代;它在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和人口方面走下坡路,这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任何缓解措施和半路采取的措施能拯救这个帝国。”<sup>①</sup>

格拉乔夫也指出,受到米哈尔科夫国歌歌词<sup>②</sup>熏陶的改革者一代,真心诚意地相信“牢不可破的联盟”的确坚不可摧,相信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将会发现,在极权主义制度崩溃的过程中,冲到表面上来的,不仅有此前受到镇压机关抑制的主张自治和分离主义的思潮、“民族主义者”的反俄情绪以及民族之间的积怨,而且改革所唤醒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也穿上了民族的外衣。在苏联制度的强力支柱倒塌后,出来取代装潢门面的行政的族际主义的,并不是国民经济成就

<sup>①</sup> [美]《巴尔的摩太阳报》1987 年 12 月 4 日文章“戈尔巴乔夫和复仇女神”,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 年 12 月 10 日。

<sup>②</sup> 注:苏联国歌·《牢不可破的联盟》又称《神圣的联盟》,是苏联国歌的中文非正式曲名。原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歌,作于 1939 年,由瓦西里·列别杰夫—库马奇作词,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作曲。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政府决定做一首能激励人心的新国歌,于是在弗拉基米尔·米哈尔科夫和加布里埃尔·艾尔—雷吉斯坦两人合作写出新歌词后,《牢不可破的联盟》于 1944 年 3 月 15 日首次在苏联的电台上播放,正式取代《国际歌》成为苏联国歌。歌词:自由的共和国组成牢不可破的联盟,伟大的俄罗斯永久地团结起来。以人民的意愿在斗争中建立,是我们统一而强有力的苏联!……

展览馆内著名喷泉所体现的各民族友谊的和谐统一，而是无法遏制的民族综合征和民族激情的狂潮。主要的“改革者”，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对此毫无准备”。<sup>①</sup>

1986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党中央全会决定，解除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哈萨克族）的职务，由俄罗斯人科尔宾接任。但是这一做法却被看作是对哈萨克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随后，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和共和国其他一些城市，人们纷纷走上了街头，烧毁汽车和商店，抗议库纳耶夫被免职。这次事件成为“地方精英挑起的、旨在‘显出凶相’和表示中央的影响有限的族际冲突，仅仅是改革唤起的民族主义火山的第一次喷发”。<sup>②</sup>

实质上，阿拉木图事件揭开了苏联体制在处理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的内部政治规则。一般来说，中央政府为了表示对加盟共和国的尊重，共和国党的中央第一书记都由该民族共和国产生，也就是第一书记的民族化、本土化。但是作为政治交换，为了表示加盟共和国对中央政府权威的顺从，共和国党的中央第二书记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而从政治实践来看，一般都是由俄罗斯族人担任。在哈萨克人看来，科尔宾的任命打破了这一传统政治规则。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看到这次事件背后的民族主义诉求——加盟共和国已经成为本土民族势力的政治禁脔。“几十年来，莫斯科当局一直容忍一部分联邦预算资金在地方民族上层人物中分配。莫斯科给钱，地方上层人物以效忠和驯服回报。从安德罗波夫时期起，莫斯科打破了这种惯例。君子协定被撕毁了，加盟共和国的交易参与者遭到极其严厉的惩处和贬斥。地方上层人物的报复行动很快发生了：就在1986年底，第一次出现了在声势上没有先例的民族动乱，动乱直到苏联存在的最后日子也没有停息，由于政治的惰性，一直持续到苏联消亡之后。”<sup>③</sup>

对于与其说是作为民族情绪与愿望的自发流露、倒不如说是作为夺权斗争的政治杠杆的民族因素估计不足，这使戈尔巴乔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7页。

<sup>②</sup> 同上，第221页。

<sup>③</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14页。

雷日科夫就指出,阿拉木图事件事实上是对“改革”的第一次考试,遗憾的是“改革”没有及格。“更糟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汲取内中深刻的教训。他们在彼时彼地看到的所谓民族主义表现,其实并不存在。而真正民族主义复活的危险和利用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反改革势力来消灭党、国家和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危险,他们却并没有看清楚。此后不久,我们便会遇到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了。”<sup>①</sup>在这方面,利加乔夫更具有洞察力。他在抵挡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营垒射向“保守派”的一支支利箭时,试图将其转送给“民族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他正是宣称这些人为“改革的”真正“敌人”。<sup>②</sup>

但是对戈尔巴乔夫而言,他并不认同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的看法。他说:“对族际关系的这一严重的不祥之兆,我们是怎样反应的呢?应当承认,还是老一套。那些指责戈尔巴乔夫不够坚决的人应当明白,我现在正在对1986年处理哈萨克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坚决感到懊悔呢。而很遗憾,这还不是唯一的一次。后来我才明白,不能走这条路,我们不能按照双重标准生活。”<sup>③</sup>于是,在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进程中,新政权五花八门的反对派(从极端保守派到极端民主派)比新政权本身迅速得多地意识到:“在一个多民族的‘封闭帝国’里,民族主义是一把万能的政治钥匙,是人人都可利用的廉价燃料,可不难用来点燃人民激情的篝火,以便给任何混乱火上浇油。在街头骚动和集市骚动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示威,于是从此刻起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具有了政治的形式,开始愈来愈露骨地向戈尔巴乔夫的计划挑战。闯入他所提供的舞台的,压根儿就不是他所邀请的演员。”<sup>④</sup>戈尔巴乔夫面临抉择:要么违背他在讲台和电视屏幕上亲自宣布的原则,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要么寻求政治解决。早已“冻结”的民族冲突和受迫害民族的痛苦遭遇就这样闯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安排改革的日程,打乱了戈尔巴乔夫想为改革规定的进度表。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8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

<sup>④</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21页。

但是戈尔巴乔夫仍然坚持不使用武力而通过谈话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来处理民族问题。“我从整个悲剧性的历史中所吸取的教训是：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领导当局无法避免动用武力。但是这种行动必须是在绝对必要时才是正确的，而且只限于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问题的真正解决只能通过政治手段。”<sup>①</sup>

1988年2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迅速恶化的外高加索局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中央的政治对手不是持不同政见的民族主义分子，而是因联邦当局无力为它们的利益解决问题而被激怒的共和国。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党的最高领导层表示，坚决不考虑对方的立场。阿塞拜疆首脑巴吉罗夫甚至拒绝讨论这个问题。苏联政治领导人考虑到两个共和国领导人的利益互相排斥，认为维持现状为上策，但是这种立场哪一方都不满意。“这样一来，当地共和国掌权的上层人物和苏联当局的矛盾，第一次明显地反映出来。共和国的党领导人第一次成了苏联当局的政治对手。”<sup>②</sup>

3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讨论纳卡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为讨论作总结的时候，呼吁大家保持平静和原则性：“不要把人们当成敌人……要用政治处理问题。当然，当局还是要掌握权力。法律还是高于一切。”他还说，在冲突中没有胜者，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确认用这样一种政治的、深思熟虑的方法解决民族问题，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事实上不仅在老百姓中间，甚至在政治局里头也有人主张使用武力。“军队一上街，秩序马上就会恢复。”安·安·葛罗米柯就曾如是说，这一主张未被大家接受。“但这种主张不时总会出现。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老方法还在发生作用。”<sup>③</sup>

10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总的说，情况还没有危急到需要敲警钟的地步。但是也不应简单化。在民主和公开性条件下这样的进程是很自然的。早已形成的许多脓疮被挑破了……由于对共和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79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国事务进行的‘兄弟干预’，人们形成了一种印象，他们给中央的多，而得到的却少。还存在全苏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共和国范围内解决不了。但是应该加以解决。我们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有别人按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反对族际主义和反对我们的联盟。当我们犹豫不决时，有人就会搞投机。”<sup>①</sup>

在改革进程中影响最大的三次民族危机中，戈尔巴乔夫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政治原则来处理问题的。“可以看清楚，第比利斯、巴库和维尔纽斯这三次危机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其中只有一次，即在巴库，是根据中央的决议派遣军队的。其他两次情况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与国家领导当局以政治与和平的办法解决出现形势的路线背道而驰。”<sup>②</sup>

从1989年4月4日起，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非正式团体在政府大厦前连日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打出的口号是“格鲁吉亚要独立！”“打倒俄罗斯帝国！”格鲁吉亚领导人认为采取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当时许多“老一辈”干部都有这毛病），还是采用武力为好。

4月7日，格鲁吉亚领导人建议第比利斯实行紧急状态。在当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会议上（叶·库·利加乔夫、维·米·切布里科夫及其他人员参加）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军队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

4月9日，示威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16人死亡，175人受伤。苏共中央决定派谢瓦尔德纳泽赴第比利斯处理骚乱事件。10日，苏联政府向第比利斯派出一些坦克，在格鲁吉亚党中央会议上，选出贡巴里泽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原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利提出辞职。

4月11日，格鲁吉亚党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宣布4月11日为哀悼日。

4月12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告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书。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共同责任是加深和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但是民

<sup>①</sup>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28页。

族间关系的改革,这不是重划边界,不是打破国家的民族国家体制。我们坚决反对这样做。

4月14日,谢瓦尔德纳泽在格鲁吉亚党中央全会上说,很难认为共和国领导人决定动用武力的做法是正确的,如果准备用坦克捍卫民主和改革,也应事先通知,让人们有充分的准备。他强调,决定出动军队是犯了操之过急的错误,没有仔细考虑各种可能的方案。也没有预见到会造成的后果。还说,事件的性质还需要进行细致、全面和不带偏见的调查,要用法律和科学性来确定事件的性质和方向。<sup>①</sup>

关于第比利斯事件,戈尔巴乔夫最为关心的问题不是怎么解决矛盾冲突,而是不停地追问:是谁下命令使用武力?在苏联解体以后,戈尔巴乔夫认为:“格鲁吉亚的地方指挥人员成了某种政治游戏的牺牲品,对此他们自己也不怀疑。看来当时影响军队行为的是那些在1991年挑起称之为叛乱事件的人。罗季奥诺夫大将<sup>②</sup>不久前在回答记者有关问题时说,他曾经得到当时国防部长亚佐夫的批准,这就可以证实以上的判断。而罗季奥诺夫以为亚佐夫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赞同。”<sup>③</sup>

谢瓦尔德纳泽从格鲁吉亚回来后,苏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讨论第比利斯事件。雷日科夫说:“这些日子我们在莫斯科,我们能知道什么?我——政府主席,而我知道什么?关于第比利斯人员伤亡的消息,我是从《真理报》上读到的。中央书记们知道情况。而我们,政治局委员,在政府中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理应得到及时准确的信息。这怎能行呢?军区司令在那里行事,而我们在莫斯科对此一无所知。他把格鲁吉亚政治局的全部成员都抓起来了。我们对此还是从报纸上获悉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看来也不知道。我们怎么会是这样?动用了军队,而总书记第二天才知道。苏联社会将怎样看我们?全世界将怎样看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这里许多事情政治局根本不知道。这比政治局作出某些不正确决策还要坏。”

<sup>①</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346页。

<sup>②</sup> 罗季奥诺夫(1936—),俄罗斯族,1936年生。毕业于奥尔洛夫坦克学校(1957)、装甲兵军事学院(1970)、总参军事学院(1980)。1985—1986年在阿富汗指挥第40军,之后任苏联政府阿富汗临时驻军事务全权代表。从阿回国后任外高加索军区司令。1996—1997年任俄罗斯国防部长。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

戈尔巴乔夫对雷日科夫的发言极为赞赏，并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提出了在类似事件处理上的要求。戈尔巴乔夫说：“在这次会议上我不得不以尖锐的方式提出问题，要求信息准确无误，要求提供信息的单位以极其负责的态度对待工作。当然也提到了军队的作用。国防部长亚佐夫被告知：从今以后没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决定，军队不得干预类似事项。”<sup>①</sup>

在整个第比利斯事件中，显示出戈尔巴乔夫的处事风格——推卸责任和不愿担当“政治恶名”。雷日科夫指出，为了稳定局势，依据格鲁吉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在第比利斯实行宵禁，但是中央采取了奇怪的、不一贯的立场。政治局，尤其是戈尔巴乔夫，要求共和国局势正常化——同时又指责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把事情搞得过分紧张。在那些日子里，政治局始终没有开过全体会议，只是几位政治局成员碰头研究一下局势。戈尔巴乔夫有一句最爱说的话：“不要把事情搞得太紧张。”这句话捆住了领导者的手脚，无法自行采取决定。“在第比利斯事件中显示出的这种作风，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特色。他不参与不得人心的决策，尤其是涉及恢复秩序问题的时候。”<sup>②</sup>结果地方政权瘫痪了，对驾驭事件无能为力。<sup>③</sup>

在此后爆发的一连串民族冲突事件中，戈尔巴乔夫总是置身事外。雷日科夫回忆：“事情总是这样，只要一出现民族土壤上的尖锐冲突，他一般总是会置身国外。当第比利斯事件眼看就要爆发的时候，他是在英国。当人们在费尔干纳为民族屠杀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巴库开始闹事的时候，他也是不知在什么地方。那些认为一切麻烦都是政治局里的保守分子，而不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和梅德韦杰夫惹出来的人，就利用了这种局势，因为那些人也常常陪他到国外去

①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17~118页。

②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③ 1989年6月，格鲁吉亚人民阵线建立。11月17—19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修改宪法，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宣布如果苏联的法律、法令不符合格鲁吉亚的利益，则停止这些法律、法令在境内的效力。1990年3月16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保证共和国主权的法令，第一个宣布1921年协议和1922年联盟条约作废。1990年12月8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二八大通过决议，宣布脱离苏共。1991年4月9日，格鲁吉亚非常会议通过国家独立宣言。

跑。相信这种神话的人实在是太天真了！”<sup>①</sup>

1989年5月1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局势问题。戈尔巴乔夫在最后作总结发言时说：“让我们取得共识吧——并没有丧失一切。在作出评价时要非常慎重，不要陷入绝望和决裂……不能将共和国百分之九十的人们所追随的人民阵线与激进分子等同起来。应当善于与他们对话……应当相信人们的健康思维……不要害怕共和国试验完全的经济核算……不要害怕各共和国之间在运用自主权方面出现程度有差别的状况……总之，如何实实在在地改造我国的联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则真的要全部完蛋……不得动用武力。在对外政策中已经放弃使用武力，那么在对待本国人民时就压根儿不能容许……要提高对各种进程作分析的水平……对于各种绝对化的‘鉴定’和‘扣帽子’也要慎之又慎。因为这是民族问题。”<sup>②</sup>

1989年5月25日—6月9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戈尔巴乔夫在谈到四月的第比利斯事件时说：“军队应干自己分内的事。”<sup>③</sup>

9月20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苏共的纲领性文件《当前条件下党的民族政策》。主要内容是革新党的民族政策，完善联邦制，扩大各共和国的权利。同时强调，民族自决并不意味着脱离，而是自我管理，保持民族特色。

1990年1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涉及处理民族问题的法律草案和相关的宪法修正案。

面对愈来愈强的政治离心倾向和分裂势力，戈尔巴乔夫左支右绌。在不愿使用强力维护政权完整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寄希望于制度的改革——设立总统制——来克服政治危机。

3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总统。在随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声称：“实行总统制有助于克服权力的无组织性和分散性。要实现总统权力，不只是需要选举总统，而且需要建立整套体制。”<sup>④</sup>但是现实却给了戈尔巴乔夫一个教训：

<sup>①</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94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20~121页。

<sup>③</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56页。

<sup>④</sup> 同上，第278页。

“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的总统制立即受到了各加盟共和国同样设立总统制的削弱。这并不是我的计划,正如后来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这个举措被苏联的反对者用来削弱和摧毁整个国家制度。”<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一步步地妥协退让——建立联邦制国家,这成为他摆脱政治困境的被迫选择。作为总统顾问的联邦委员会就成为戈尔巴乔夫竭力协调与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的组织机构。不过,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建立联邦制国家并不是他的“创新”,而是真正贯彻列宁民族自治权的政治体现。

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苏联联邦委员会会议,讨论有关苏维埃国家联邦体制的问题。“联邦委员会主张成立主权国家联盟,尽其可能借鉴联邦制、邦联制和共同体的成分。”<sup>②</sup>会议认为,应当立即着手制订和签署新的联盟条约,保障各加盟共和国现实的经济和政治主权以及共和国之间的有效合作。在新的联盟条约基础上建立各主权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在确定彼此联系的不同形式时,应当考虑到各共和国民族历史、经济和文化特点。会议强调,建立主权国家这种“自由的”联盟并不意味着苏联瓦解和分崩离析,因为这一进程是和向市场经济过渡同时进行的,而统一的全联盟市场则是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基础。戈尔巴乔夫提出的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联盟的构想包括:由中央同各加盟共和国分别签订协定,划分权限;原则上中央只负责外交、国防以及某些经济活动和财政方面的工作。

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脱离联盟”法。根据这项法律,要求脱离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必须得到公民投票2/3的多数票支持,并且要有5年的过渡时期。该共和国在脱离前必须同莫斯科清算财政问题。在过渡期结束前,必须再次举行公民投票,各地方的投票结果必须分开考虑,若个别地区愿意留在苏联,应允许他们这样做;若要求独立的共和国没获得2/3多数的支持,它在10年内不能再举行公民投票。这一经戈尔巴乔夫签署的法律使人产生了更多的怀疑。马特洛克指出:“尽管理论上允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但是它规定的脱离程序是如此的复杂和充满‘陷阱’,以至于实际上要遵

<sup>①</sup> [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潘兴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399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

守这些规定是不可能的。全民公决要求有 2/3 多数赞成,达到这一要求后才能开始谈判,在谈判的不同阶段还须得到苏联总统、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将确定过渡期的时间,最长可达五年之久,并且只有经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议才能结束。在整个过渡期间,苏联法律在加盟共和国仍然有效。这一新法律表面上是贯彻宪法授予的脱离权,实际上与斯大林时代的宪法条款一样虚伪。我明白了为什么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拒绝遵守。”<sup>①</sup>

事实上,在中央权威已经丧失的情况下,不仅是波罗的海国家不愿遵守,其他加盟共和国也是如此。

1990 年 3 月 10—11 日,立陶宛首次自由选举产生新的最高苏维埃。这是苏联第一个非共产党控制的立法机构。立陶宛共和国议会通过表决,决定更改国名、国旗,并宣布独立。

3 月 30 日,爱沙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以 65 票赞成、4 票反对和 5 票弃权(30 名俄罗斯议员未参加投票)通过了爱沙尼亚向独立过渡的宣言。

5 月 4 日,拉脱维亚共和国议会颁布独立宣言,宣布拉脱维亚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

6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以 903 票对 13 票正式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和法律在其共和国境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主权宣言”是叶利钦以微弱多数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该共和国人代会通过的第一个重要文件,是继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后,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在要求更多的自主权方面迈出的“重大的第一步”。<sup>②</sup>《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是业已开始的变革的外在表现,“被国内左派力量评价为苏联解体的开端”<sup>③</sup>。

1991 年 1 月 11 日,苏联内务部队内卫部队的小分队占领了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的苏共中央的共和国出版大楼。维尔纽斯局势骤然尖锐起来。13

<sup>①</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416 页。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 年,第 320 页。

<sup>③</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51 页。

日,发生流血事件。

1月1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发表声明:“在立陶宛悲剧发生之前,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国家机关通过了许多法令和决议,这些法令和决议根据民族、居住条件、职业、所属党派等特征粗暴限制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实际上就是规定了禁止异端。”政治局认为,拉脱维亚、立陶宛、俄罗斯联邦和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致联合国秘书长的联合呼吁书是“对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联盟主权的公开蔑视,是公开呼吁外国干涉我国内政,这一切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世界都会引起严重的麻烦”。

1月16日,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公开号召对共产党员及其家属进行肉体上的迫害,奉行旨在与苏联军队进行公开对抗的方针”<sup>①</sup>。

1月22日,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他指出:“维尔纽斯发生的事绝对不能表达总统当局的路线,正是为了实现这一路线才实行总统制。因此我坚决驳斥围绕这一问题的所有投机、所有怀疑和诽谤。”戈尔巴乔夫在声明中明确表示:“任何社会团体、委员会或阵线只能以宪法的途径获取政权,不得使用暴力。在政治斗争中任何诉诸武力的尝试都是不允许的。军方不得有任何恣意的行为。”<sup>②</sup>

维尔纽斯事件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影响。皮霍亚认为,这一事件证明:“经过考验的武力解决方法原来并非有效。”事件表明,联盟中央的领导人有能力使用武力维护旧的政治制度。正如叶利钦及其“周围的人”后来所说所写的那样,维尔纽斯事件给他们的最大经验教训是,不承认使用武力的、实质上违反宪法的措施;向居民寻求支持,号召公民以不服从的方式来反对当局的专横跋扈,诉诸国际社会舆论。遗憾的是,一年半以后,这一切在莫斯科成为现实,直到筑起了街垒和反坦克障碍物。维尔纽斯事件成为惊惶忧虑的象征,成为俄罗斯新领导人的“灯塔”,它使人思考一个问题,苏联当局能够采用武力解决政治冲突。这使人不得不对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思考对付的方法。正是维尔纽斯事件促使叶利钦及其控制的最高苏维埃发表声明:必须建立自己的、俄罗斯的军队,这激起了“联盟中央”拥护者的营垒大

①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431页。

②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28页。

发雷霆。<sup>①</sup>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1991年1月发生的维尔纽斯事件,“实际上促成了苏联瓦解的进程,可以说这是导致瓦解的首要因素”<sup>②</sup>。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寻求新的对策——加紧建立主权国家联盟以缓解日益强烈的民族独立浪潮。

## (二) 政治离心与苏共联邦化的构想

面对咄咄逼人的民族独立浪潮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民族化倾向,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在谋求国家结构改变的同时,提出了要把苏共改造成联邦党以适应这一新的政治环境的构想。

戈尔巴乔夫认为,没有党的彻底的联邦化,是建立不起来真正的联邦国家的。这是由苏联制度的内在特征决定的。他说,在1917年革命之后,列宁曾提出的一个原则是,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利,直到分离;建设一个平等的共和国联邦——并将此作为保存多民族国家完整性的途径。正是根据这一立场,虽然也未能避免使用武力,在1922年建成了苏联。但是斯大林在其统治的年代里根本改变了这一方针。联盟变成了一个超集中的、单一制的国家。“这个国家架构中的‘中央’——就其实质来说就是党——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在那个年代,专横地裁定了边界,粗暴地侵犯了这样或那样一些民族的权利。”<sup>③</sup>马特洛克也指出:苏联所有的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共产党手里,而苏共又是以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虽然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共产党,但这些政党都被莫斯科视为一个单一组织的省级分支机构。“正是这种单一的政党构成了苏联专制结构的支柱,各共和国和其他实体只是一种点缀,虽然好看,却不具备结构性的功能。然而这些实体还是存在下来了。尽管它们受共产党的控制,但仍有自己的政府结构,这种政府结构形式上类似于特殊的民族集团。”<sup>④</sup>1991年苏联崩溃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74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sup>③</sup> 同上,第104页。

<sup>④</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之时,它始终坚持一个核心准则:“外表上是一个国家‘联邦’,实际上在‘联邦’的背后站着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sup>①</sup>

在作出国家政治结构根本变化的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开始把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苏联共产党改造成为与这种新的国家政治结构相适应的政党——联邦党。

1990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批准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中指出:“苏共认为,必须发展联盟建设的条约原则……在把明确规定的一些职能自愿交给联盟管理的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并且拥有宪法保障。”<sup>②</sup>

1990年7月9日,苏共二八大通过了新的政治局组成规定。根据新的规定,新的政治局将由总书记、副总书记、15个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以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一些人组成。新的政治局的组成结构将允许15个加盟共和国的党“独立行事,真正影响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sup>③</sup>

1990年7月16日,在苏共二八大上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苏共二八大情况。他说:“大会进程是富有戏剧性的,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各共和国第一书记进入政治局使党具有某种联邦党性质。”<sup>④</sup>

1990年9月19日,苏共中央召开关于民族问题的全会。全会通过的决议承认在对待各民族群体的方法上存在严重缺点,呼吁建立一个“革新的联邦”。同时,它特别明确拒绝为建立一个真正的联邦而改变政党结构。文件指出,现存联盟是“完全自愿的”。现在之所以把事情弄得很糟,那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也只有恢复真正的列宁政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故而不可能承认列宁下令武力合并这些共和国是错误的。在马特洛克看来,如果救治处方合理,这种不诚实也可算作必要的自欺欺人之谈而得到宽恕。然而尽管文件大谈“新联邦”将是如何截然不同,但却排除了任何可能付诸实施的具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8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sup>③</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335页。

<sup>④</sup> 同上,第346页。

体方案。“最重要的是,它公开宣布,在共产党自身内部,绝不可能存有联邦主义的想法。”<sup>①</sup>

但是政治现实的发展很快逼迫苏共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并从坚决拒绝党的联邦化的立场上不断后退。

戈尔巴乔夫指出,党的机构无法适应生活现实,不能把握苏共新的状态;更有甚者,还要试图阻碍乃至破坏民主改革——这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了失望的情绪。1990年一年退党的人几乎就有250万。中央四月全会的辩论对社会公开后,这个过程又加快了。截至1991年7月1日,苏共计有党员1500万。这就是说,一年半的时间,退党的和被开除出党的党员有400万,占党员总数的22%。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退出苏共的党员中有一多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每4个人中就有一人表示不愿意与不值得尊敬的人为伍,他们直接点明党的上级任命的干部的代表就是这样的人。一般说来,领导机构不仅脱离社会,脱离百姓,而且脱离基层的党员群众。戈尔巴乔夫说:“意识到自己对几百万党员所负的责任,我跟一些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信得过的党的工作者就苏共的情况不止一次进行过讨论。结论只有一个:必须加速对苏共的改造,使之变成一个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现代政党。为此必须尽快起草和通过新的党章。”<sup>②</sup>这就是提请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审议的文件。

从1991年6月起,苏共中央机关的主要工作是准备苏共新纲领。按照计划,题为“社会主义、民主、进步”的苏共新纲领草案要在7月底提交苏共中央全会讨论,并在当年秋天或者年底提交苏共非常代表大会通过。所有这项工作都由苏共二八大成立党的新纲领起草委员会负责。报纸上公布了《苏共纲领的倡议方案——通往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我们中间的很多人看来,准备提交苏共中央全会讨论的纲领方案最后文本很像一个改良方案,明显看出这个纲领已经放弃了从前很多马列主义的教条,向社会民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99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53页。

主方向跨出了很大的一步。”<sup>①</sup>

1991年7月25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新党纲草案等问题，戈尔巴乔夫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为什么党现在需要这样的文件？戈尔巴乔夫认为：

可以简单地这样回答：以前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有必要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和民主改良。与此相联系，党本身也必须变革。苏共内部有一股公开反对二八大路线的势力，他们对眼下所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持怀疑态度。但是那些今天咒骂改革及其倡导者的人，他们与眼前的事事实格格不入。80年代初国家已经进入不景气状态：社会的新老毛病尚未显露出来，更没有进行医治，结果转入了机体内部，导致了严重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不是发生在社会机体的某些个别部分，而是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模式本身的危机。斯大林建立的官僚独裁制度，通过集中使用一个大国的人力和资源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超常的努力逐渐损害了社会的健康，消耗了资源，失去了创造性生产劳动的动力。实际上这印证了列宁的思想，即社会主义是不能单靠热情来建设的。人们早就明白这种制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难怪乎斯大林死后当局曾试图改变现状。时候终于到了：大规模的迫害停止了，许多独裁专制的旧做法不再有了。但是政权和管理的基础依旧，仍然是那套靠对国家进行绝对统治的官僚主义体制。实质上这是后斯大林主义。改革之所以非常必要，还因为国家正迅速地失去自己昔日的阵地，实际上在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都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sup>②</sup>

在谈到党的问题时，戈尔巴乔夫说：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55页。

冷静观察形势，应该承认，苏共内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每个派别都想把自己的方针强加给党组织，并以自身活动的既成事实表明与党已经分道扬镳。我不想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参加这个或那个派别的党员。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由于对国内和党内所发生的事情的不满所引起的。过去的框框在束缚着公众的意识，有碍于对所发生变化的意义的理解。那些我称之为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的代表们指责我们在搞“苏共社会民主化”。他们根据的是革命和内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差异，当时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各据一方，营垒分明。不管历史学家们对过去的风风雨雨怎样研究，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当时双方对垒的准则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意义。我们变了，社会民主主义也变了。历史发展进程消除了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者因观点不同而引起的许多问题。那些今天还在用社会民主主义吓唬人的人，只会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主要的敌人——反社会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派别——身边引开。<sup>①</sup>

但是党拒绝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共产党领导人不愿作出改变，从而导致成立一个自愿性联邦的所有努力都归于失败。”<sup>②</sup>

### (三) 全民公决与主权国家联盟努力

风雨飘摇中的戈尔巴乔夫，为了增加自己更新党和国家制度构想的权威性，不得不求助于自己释放出来的民主政治利器——全民公决。

1990年12月24日，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新联盟条约的总概念及其签署程序》和举行关于联盟命运的全民公决的决议。<sup>③</sup>

1991年1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颁布一项决定——鉴于苏联人民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能为苏联命运承担历史责任的客观现实，为了落实苏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57～358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9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联第4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立法程序决定:①定于1991年3月17日(星期日)就保留苏联作为平等共和国联邦问题在全苏联境内举行全民公决;②提交全民公决、列入秘密投票的问题和答案是:问题——“您认为必须保留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能够保证任何民族公民人权和自由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吗?”答案——“是”或者“不是”。<sup>①</sup>

苏共中央各个部门都被吸收到保障全民公决顺利举行的工作中。1991年1月,一份题为《关于组织举行1991年3月17日的全民公决的一些意见》的报告被呈送苏共中央书记吉连科。该报告指出必须吸收下列苏共中央部门参加全民公决的准备工作:人文科学和意识形态部,组织部,苏共中央立法动员部,社会政治组织联络部,民族关系部、国际部。该报告指出了动员资金开展宣传运动的必要性,宣传资金来自国家预算和慈善基金会。在呈报政治局的苏共中央书记舍宁在各加盟共和国、共和国、边疆区、州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的发言稿中,也强调了即将开展的宣传运动的严肃性和重要性。舍宁在报告中指出了“损害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企图”,指出了经济、消费市场、住房建设中的各种危机现象。他忧心忡忡地说,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的国会领导人都声称不愿签订联盟条约。舍宁坚决要求提高党的积极性。他写道:“只要党的机构的每一环节都不惊慌失措,共产党员在动员起来的状态中工作的条件下,党就一定能在社会中发挥稳定和团结的作用。”针对中央无忧无虑的安乐情绪,舍宁引用了残酷无情的统计数字——脱党的共产党员人数在增加。数据表明:截至1990年1月1日党员人数为1920万,截至1991年1月1日为1650万。入党的人数从31.3万下降到10.8万。180万人脱离苏共。被开除出党的人数增加了3倍。9个月中被开除出党的人数为38万,但因为犯罪被开除的只有0.5万人。这位中央书记断言:“党内存在着很多观察员,他们不缴党费,也不交出党证。”<sup>②</sup>

1991年3月1日,苏共中央社会政治组织部副部长瓦·米罗年科向苏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79~680页。

共中央领导呈送一份题为《关于国内目前政治形势发展的几点看法》的报告。报告对全民公决前夕的国内政治形势进行了详尽分析。米罗年科写道：“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在著名的电视谈话之后，这次电视谈话实际上是他在争当俄罗斯联邦总统竞选运动的发端……支持率又开始上升了。”因此米罗年科建议——不要批评叶利钦本人，他不但不怕批评，而且这种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提高他的威望，要批评他那“一帮人”的成员。“综上所述，党的一项头等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成功举行3月17日的全民公决。在剩下的时间内，应当尝试营造举行全民公决的适当的热情洋溢的氛围。反对派想方设法宣传一种观点：国家领导人一旦取得成功——甚至只在俄罗斯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就会马上转入‘以人民的名义’的专政。”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上批示：“请认真讨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整个党的领导机构应转入‘紧急’状态。”<sup>①</sup>

3月10—17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讲话。其实质是：事情正在走向结局，我们应该赢得俄罗斯代表大会。必须严厉监督电视台。吉连科在其工作笔记上写道：“公开性”的创造者要求“让我们的观点占据广播电视。赢得全民公决和代表大会。通过了对莫斯科的决议。莫斯科应该准备举行3月23日的群众集会。”<sup>②</sup>

3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现在，我们已处在全苏全民投票的前夕。在我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搞这件事。在参加全民投票时，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充分地认识到，全民投票将解决涉及我们多民族国家的今天和明天的这个主要问题。这涉及国家的命运、我们祖国的命运，涉及我们共同的大厦，也涉及我们同你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何生活的问题。”“我呼吁你们大家，亲爱的公民们，参加全苏全民投票，并对提出的问题投‘赞成票’。”“我们投‘赞成’票就将保留国家的完整。”<sup>③</sup>

3月17日，苏联就保留社会主义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举行历史上的首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89页。

<sup>②</sup> 同上，第690页。

<sup>③</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467页。

次全民公决。参加投票的有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和土库曼等 9 个共和国，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亚美尼亚、爱沙尼亚 6 个共和国没有参加这次公决。参加全民公决的有 148574606 人，占登记选民的 80%。其中投赞成票的人 113512812 人，占 76.4%；投反对票的有 32303977 人，占 21.7%。无效票 2757817 人，占 1.9%。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参加投票的选民比例和支持保留苏联的比例分别是：76%/75.4%，83%/70%，83%/83%，95%/93.7%，89%/94%，75%/93%，93%/94.5%，94%/96%，97%/98%。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一结果本身说明，多数公民（法定的多数！）赞成将联盟作为革新的联邦保留下。”<sup>①</sup>而且，全民公决赋予苏联政府全权，并且强制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留苏联，避免联盟分裂。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为此采取保留苏联的任何措施，就连最小的象征性措施也没有”<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把 3 月 17 日全民公决的结果说成是一次胜利，但是实际上，全民公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任何形式联盟的支持都已经减少了。“不错，俄罗斯的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白俄罗斯和中亚的赞成票也占压倒多数。然而有六个共和国根本就没有参加，而且更加不详的是，乌克兰的投票极其接近：联盟草案在基辅和其他西部州遭到了失败，这些地方大部分人都投票要求乌克兰独立。而最危险的事实是，在俄罗斯，更多的人是在投票赞成总统职位而不是赞成联盟。”<sup>③</sup>

4 月 9 日，戈尔巴乔夫召开联邦委员会例会。戈尔巴乔夫就全民公决中主张联盟统一的人民的意志如何体现为立法文件提出了具体办法：恢复权力机构垂直的从属关系，坚决制止民族冲突的升级，为寻求相互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举行谈判。<sup>④</sup>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149 页。

<sup>②</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38 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578~579 页。

<sup>④</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150 页。

4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了苏联总统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领导人的会晤。这次会晤同其他类似会晤一样，被取名为“9+1”——九个加盟共和国加上一个体现联盟中央的苏联总统。会议签署了《关于刻不容缓采取措施稳定国内局势和克服危机的共同声明》。文件指出，必须“考虑到已经举行的全联盟全民公决的结果，签订主权国家新条约”，必须通过联盟的新宪法，并在此后重新选举联盟权力机关。此外，该声明号召共同采取防止危机的措施，在通过新宪法之前遵守旧宪法的规定，实施一系列社会措施，反对罢工。这项《共同声明》是戈尔巴乔夫的一个非常重大政治举措，因为在中央四月全会召开之前，他只花一天的工夫，就预先获得了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支持，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总统的名义做工作成为新联盟条约得以签署的条件。但是《共同声明》本身证明了苏联总统应该作出重大的原则性让步。首先，各加盟共和国在不久的将来应该成为“主权国家”。这一文件的正文中没有将“苏联”这一概念运用于未来的联盟，故意不提未来联盟的政治组织形式。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新联盟是社会主义的联盟。“由此不难推断，新奥加廖沃会晤的参加者重新审查了1991年3月17日全民公决的一系列规定，并在其中反映出俄罗斯领导人的立场。新宪法通过后必须改选苏联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一规定无疑对联盟权力机关造成威胁。”<sup>①</sup>

5月24日，根据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会的决议建立的筹备委员会会议召开。筹备委员会旨在起草新的联盟条约和确定其签署的程序。委员会设想经过协商后的条约草案可望在6月间提交给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批准。提交的条约草案叫作“主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条约，这个名称的简称同苏联的简称在写法和读法上一致。但是“俄罗斯领导人主张叫主权国家联盟”<sup>②</sup>。

6月3日，筹备委员会在新奥加廖沃再次举行会议，讨论联盟条约的起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02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78页。

草工作。戈尔巴乔夫和 9 个加盟共和国的总统一致同意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

7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再次讨论了新的联盟条约问题，通过了《关于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的决议。其中载明：“基本上支持苏联总统以第4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筹备委员会的名义于1991年6月18日提交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各共和国相互协商后，就可以签署条约。此时的联盟条约已经与全民公决时的联盟条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克留奇科夫指出，取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种组织。“社会主义”一词被抹去，而“苏维埃”只作为一种形式保留了下来。要知道，这从根本上违背了1991年3月17日举行的全民公决。“在全民公决中曾提到国家性质、社会政治制度、苏联与新国家组织之间的明确的连续性。而且，根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和全民公决的结果，国家的本质，就其社会政治制度而言，是依然不变的。”<sup>①</sup>但是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不是背叛，而是根据现实政治的发展而进行的“群众创造”。他说，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是否在联盟的名称前加上“社会主义”字样进行过辩论，当时大会是赞成加上的。但是辩论后来在最高苏维埃继续进行，最初建议采用“主权共和国联盟”，因为许多国家只称呼自己为共和国，如摩尔多瓦、吉尔吉斯斯坦等；而只要涉及民族政策、族际关系这一敏感领域，就必须采取严肃尊重的态度。于是我们谈妥，在名称中写入“苏维埃”字样，即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这就突出了继承性，因为它和过去的时期有联系，“这乃是所谓群众的创造”。<sup>②</sup>

7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的各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例行会晤上，起草联盟条约工作宣告结束。

7月29日，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在新奥加廖沃会晤，专门讨论联盟条约签订后新联盟如何发展问题。会晤达成了非常重要的协议：副总统亚纳耶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广播电视台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将被逐出新联盟的领导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13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

班子。叶利钦感觉“有人在偷听我们谈话”<sup>①</sup>。克留奇科夫说：“事后才知道，这次会晤谈到许多涉及苏联国家命运的问题，如签订联盟条约、终止联盟立法和执行机关的活动，并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取而代之；会上还讨论了干部问题。当时，社会各界和苏联人民对此一无所知。这一切都是在后来，在8月事件之后，当势不可挡的变革和破坏触动了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才昭然若揭，可那时正如常言所说，木已成舟。因此联盟条约草案以及联盟本身，都是少数领导人自作主张的杜撰。”<sup>②</sup>

1991年8月2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建议开启条约以便在8月20日签署。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说：“签署新的联盟条约对于国家生活意味着什么？这首先是实现3月17日全民公决中所表达的人民的意志。条约主张在继承和革新的基础上改造联盟。联盟的国家将保留下来，它体现着我们祖国好几代人和各族人民的劳动。与此同时，一个新的、主权国家的真正自愿的联合体正在建立起来，其中所有民族都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事务、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化、语言、传统……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全国需要的改革的道路。而新的联盟条约有助于尽快克服危机，有助于使生活走上正常轨道。而这正是当前最重要的，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看法。”<sup>③</sup>

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启程赴克里米亚休假。

到8月中旬，15个前加盟共和国中只有8个准备在条约上签字，其余的共和国或是根本不想签，或是想拖延到有利时机。博尔金指出：“正像专家们认为的那样，这对整个旧联盟是一个相当大的危险。因为只要为数不多的共和国一签署条约，就会消灭作为法律主体的旧联盟，因为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结构。那些没有签署条约的国家就可以认为自己在联盟之外，旧的结构也就不再存在了。”<sup>④</sup>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18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11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63页。

<sup>④</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81～382页。

但是戈尔巴乔夫并不这么认为。他说：“有一种意见认为新的联盟条约跟全民公决相矛盾。但条约确定我们未来的联盟主权的民主的联邦国家。人们投票赞成的正是它。这将是新的联邦，首先反映在共和国的主权上，反映在共和国权力、全权和责任的扩大上。共和国将真正作为主权国家得到复兴。如果有人以为这是什么新的，刚刚发明的东西，那是不严肃的。一切都在 1922 年的条约上载明了。这里反映了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愿望。”<sup>①</sup>他指责党内的保守势力无视了人民的这种愿望！“如果公民投票的结论使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们坚信必须把业已开始的国家体制改革顺利完成（即把它从集权国家变为联邦国家）的话，那么党内的保守分子们则认定，公民投票给他们颁发了委托书，要他们原封不动地保留以前的联盟，不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同时他们完全无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选民们投票赞成保留联盟考虑的恰恰是它与改革的相互联系。不仅如此，因为关于联盟主权国家的新协议草案已经公布，人们对此有意识地表明了态度，心照不宣地赞同向人民提出的新协议草案。”<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以为，在他的阉割下，党已经丧失了反抗的勇气了。然而戈尔巴乔夫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博尔金指出：“据我所知，不容许按照这种方案发展是 1991 年 8 月发动事变的人的唯一任务，他们企图制止祖国解体，警告社会注意这种可能出现的后果，防止可能随着苏联解体而出现的无谓牺牲。”<sup>③</sup>

## 二、保卫联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

任何人都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达成的秘密协议，1991 年 7 月 23 日在新奥加廖沃别墅协商好的新联盟条约最后一稿也没有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158 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344 页。

<sup>③</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382 页。

对外发表,尽管已经有几十人看到了这份文件,但是8月15日的《莫斯科新闻报》却全文公布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条约规定:缔约的每个共和国为主权国家;结成联盟的各国保留独立决定涉及本国发展的一切问题的权利;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权利的主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继承者,结成联盟的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全权成员,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条约自签约日起生效,同时对签约国来说,1922年联盟条约失效。《莫斯科新闻报》特别指出:“这是一份可以改变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文件,本报提前将其公布于众,就是为了让整个社会尽早对它进行讨论。全社会讨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新联盟条约的签字时间就定在8月20日。”

1991年8月16日,苏联所有主要报纸都刊登了新联盟条约草案。“即便不是什么国家建设的专家也看得出来,条约里面迷雾般表述隐藏的目的,不是苏联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而是在事实上消灭苏联这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苏联从前的位置上拟议建立一个新的松散的邦联国家——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支撑联盟存在的民族、政治、意识形态统统被剥夺。”<sup>①</sup>

8月19日早晨6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发表声明,要求先在最高苏维埃然后在人代会上对草案重新审议。这实际上意味着8月20日不可能签署这个条约。随即,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同时对外发布《苏联领导人声明》《告全体苏联人民书》和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第一号令。

麦德维杰夫对此作出评论。他说:

准备签订新的联盟条约,事实上就是解散苏联,这本身就包含着违背苏联宪法的很多内容。1990—1991年间通过主权决议的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违背了苏联宪法。苏联最高苏维埃法律处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都马上着手起草决议草案,但没人理会这些。8月事件所有参加者的行动都超出了苏联法律的界限,解决问题不是按照法律,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4页。

而是按照力量和影响的现实对比关系。要知道，苏联本身就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一个专制国家，是靠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国家。因此，对8月事件哪怕就是做一个一般的定性，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政变、叛乱，篡权、事变，还是背叛祖国，超越自己的政权，还是执行解救伟大国家的神圣职责？克格勃退休少将科沃尔科夫把8月事件称为“克里姆林宫的轻歌剧”。苏联前人民代表阿法纳西耶夫认为这起事件是滑稽的讹诈和抢劫。匈牙利政治学家阿科什·西拉吉把这一事件比作一场戏剧，而且要求戏剧的组织者要有很强的政治决断力和导演技能。西拉吉不同意“轻喜剧”的定性，他更倾向于这是一出“解散苏联的伟大戏剧”。<sup>①</sup>

“这次叛乱总共延续了三天。”<sup>②</sup>

### (一) 举棋不定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1991年8月15日《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公布成为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八一九事件”的直接导火索。但是不同立场的人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看来，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在8月19—21日的行为，是为其自身谋取权力的表现。

叶利钦说：

1991年7月29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了一次带有根本性质的会晤。一切进行的很正常。但一到涉及完全秘密的事情时，我突然缄口不语了。戈尔巴乔夫吃惊地说：“鲍里斯，你怎么了？”我现在很难回忆起当时我有什么样的感受。不过，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感觉：仿佛有人站在背后，死缠不放地偷盯着你。于是我说：“我们到阳台上去吧，我觉得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

有人在偷听我们的谈话。”戈尔巴乔夫不太肯定地答道：“你别胡扯了。”不过，他还是跟着走出来。

下面是我们谈话的内容。我开始说服总统：如果他寄希望于更新的联邦的话，那么只有在他哪怕是撤换一部分他周围的那些非常令人讨厌的家伙的情况下，各个共和国才能加入这一新的联邦。倘若对立陶宛事件负有罪责的克留奇科夫仍然是克格勃的主席，那么谁还相信新的联盟条约？！任何一个共和国都不愿意加入这样的联盟。或者说那个国防部长亚佐夫吧，难道说新的联合体里能让这样一头来自陈旧过时时代里的“鹰”存在吗？

看来，这次谈话对于戈尔巴乔夫真不容易，他很紧张。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支持我说，务必撤换掉内务部长普戈和国家广播电视台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接着他补充道：“亚纳耶夫算什么副总统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我们要把克留奇科夫和普戈撤职。”……3个人一致决定，签署条约后一定换掉当时的内阁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sup>①</sup>

8月叛乱之后，检察机关的侦察员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里找到成堆的文件夹，里边有叶利钦的许多谈话记录，记录了我几年的谈话——早晨、白天、晚上、夜间，昼夜24小时的任何时候的谈话均记在案。对这次谈话也作了记录。或许，这一记录就成了1991年8月事件的导火线。<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说：

7月底，在我去度假之前，我在新奥加廖沃会晤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我们谈了联盟协议签订后将采取哪些步骤。我们一致同意，无论是对于各共和国，还是对于联盟，都必须加紧利用协议所创造的各种可能。……还谈到了干部问题。自然首先谈到的是主权国家联盟的

<sup>①</sup>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45~46页。

<sup>②</sup> 同上，第47页。

总统问题。叶利钦表示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一职务。

在交换意见过程中，提出让纳扎尔巴耶夫出任内阁首脑。纳扎尔巴耶夫说，他准备挑起这副担子，只要联盟内阁有可能独立地工作。还谈到必须大力更新权力机构的上层领导班子——几位副总理，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的具体问题——他们退休的问题。

记得当时叶利钦感到很有些不自在：他好像觉得有什么人在一旁偷听。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应该有目击证人的。他甚至有几次起身走到凉台上去查看一下，这说明他确实感到有些不安。

现在我明白他的敏感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了这次会晤，普列汉诺夫预备了一个房间，平时我在这里批阅报告，旁边还有一个房间，可以在那里吃东西和休息。这就对了，看来一切都“事先经过设计”：我们的谈话被录了音，克留奇科夫听了后，有了证据，这使他和其他的人完全丧失了理智。

所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说，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感情，——这纯系骗人的鬼话。我不愿说他们对于国家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但是他们把国家和旧体制相提并论了，而他们行事的动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功名利禄，甚至一己私利，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sup>①</sup>

博尔金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说法表示怀疑。他指出，戈尔巴乔夫被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逼进死胡同，被迫接受各种条件，甚至在人事安排上也要受他们的影响。由于我说了准备撤换克留奇科夫的事，戈尔巴乔夫便极力让我相信“瓦洛佳”<sup>②</sup>同他的关系比朋友还深一层，有人散布这些谣言，是想挑拨他同战友之间的关系。他还说了一些应该让克格勃主席憎恨的人的名字。“两三年后，我从克留奇科夫那儿了解到，他根本不知道戈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69～370页。

<sup>②</sup> 即克留奇科夫的爱称。——译者注

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谈话的内容，也不知道苏联总统背地里整他的事。”<sup>①</sup>

在博尔金看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其实是戈尔巴乔夫此前政策的延续。“他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促使强力部门的领导人采取了非常措施——在国内一些主要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当他身边的人向他通报安全会议大多数成员的意见——必须承担起防止国家、经济、军队解体的责任时，他并没有感到惊奇。于是便发生了 1991 年的八月事件。”<sup>②</sup>

从 1991 年 1 月起，与日俱增的困难是戈尔巴乔夫圈子里经常谈论的话题。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总统对局势很担心，曾委托安全会议一些成员制定实施紧急状态的方案。

1 月 10 日，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直接发布宣言。宣言指出：“应正视现实并认清造成目前局势的真实原因。它们的根源就在于粗暴地破坏和违背了苏联宪法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蹂躏了公民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力图在民主的口号下推行旨在恢复资产阶级制度和秩序、与人民的利益相抵触的改革。”宣言最后警告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必须充分理解它对共和国和苏联人民所承担的责任而采取的一切措施。但是这个宣言没有发生效力。立陶宛领导深信，莫斯科不会采取任何坚决的行动去实现宣言中提出的警告。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指示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和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克留奇科夫采用武力，并向维尔纽斯派遣国家安全委员会特种分队的一个不大的小组，这个特种分队人称“阿尔法”行动小组。小组应当根据形势，同苏联国防部和内务部的特种分队一起行动。<sup>③</sup>

1 月 25 日，苏联内务部和国防部新闻中心发布通告，将从 2 月 1 日起在莫斯科等重要城市实行民警和军人联合巡逻，以维护和加强社会治安。

1 月 26 日，苏联总统发布《关于在经济领域和经济怠工与其他犯罪行为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7 页。

<sup>②</sup> 同上，前言第 3 页。

<sup>③</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419 页。

进行斗争的保障措施》命令。命令规定,内务部门和国家安全机构有权进入并检查生产厂房及其辅助设置,有权从企业和部门领导人那里得到有关文件和其他资料,有权获取银行的信息、查封现金储蓄,等等。

1月29日,苏联总统发布《关于维护法制和在与犯罪现象作斗争中警察与苏联武装力量分队的相互配合》命令。

2月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向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呈送了《关于全国的政治形势》报告。克留奇科夫在报告中说,由于尖锐的政治危机,产生了联盟解体、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崩溃的危险。“俄罗斯国会的首脑和某些政治力量……显然打算建立‘第二中央’,与苏联国家政治领导人相抗衡。……对‘民主运动’中有野心的派别实行安抚政策……将导致假民主派毫无阻碍地实现其夺取政权和改变社会制度性质的图谋。”克留奇科夫将“民主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宣布为国内主要的政治敌人。他警告说:“在对抗和宣传方面的不均衡在为保留苏联的全联盟全民公决的准备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虽然‘民主新闻媒体’诽谤全民公决早从其宣布之时就开始了,而中央和党的大会传媒几乎没有发表过有利于全民公决的文章。”克留奇科夫的结论是,必须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督。“克留奇科夫的意见通报给了苏共中央政治局所有的委员和候补委员、苏共中央所有的书记,实质上成为以后的行动规范。”<sup>①</sup>

上述一连串的法律规定在后来很多人的研究中被认为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管理的法律基础。克留奇科夫就说:“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经常强调指出,要不惜一切代价,不让国家分裂,不让各共和国脱离苏联。他也曾不止一次地要大家考虑怎样同各共和国内的民族分裂势力和情绪作斗争。说实在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没有想出什么新办法,因为一切决定、行动和呼吁都是在1990—1991年间按照戈尔巴乔夫本人提出的任务研究拟定的。”<sup>②</sup>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86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26页。

戈尔巴乔夫对此极力否认。他对自己批准的1月26、29日的两个命令辩解道：

我特别想谈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两个命令的内容本身好像给人们提供了进行阐释的理由，部分大众媒体也正是这样做的。在过去的制度下，我们的人面对政府的肆意妄为，吃够了法律无边、公民无助的苦头，所有稍有暗示，说法制部门要加强惩罚职能了，就会引起人们的警觉与担心。我想，这种警惕性是有好处的，社会应该有所戒备，应该有可靠的保护机制，防止警察制度死灰复燃。

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越演越烈的政治纷争和政府力量的削弱，严重加剧了犯罪现象的滋生。与此同时，国家机关里贪赃枉法现象也有所蔓延。加上停滞时期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由于公开性目前已大白于天下。报刊发表许多揭露高级官员滥用职权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共和国的领导人，有的是苏联的部长和党的活动家。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理所当然的担忧和愤怒，要求一定要采取坚决的措施。

这就是我在签署有关部门起草的命令时的主导思想。特别是，我没有看出让市卫戍部队协助警察维持城市秩序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当警察对付不了罪犯时，要求军队前来支援，这也不是第一次，而且不光是在我国，其他许多国家都是这样。不过，当然，我不曾想到这项命令一开始就被有关官员们的愚蠢指挥弄得声名狼藉。命令颁布的第一天，他们便把装甲运输车开上列宁格勒的街头，这当然引起人们的愤怒，使他们有理由认为，所有这些行动根本不是用来对付罪犯的——用这种方法当然逮不着罪犯，而是针对反对派的游行集会的。<sup>①</sup>

不过，戈尔巴乔夫的同事们已经习惯了总书记—总统的出尔反尔和言行不一了。克留奇科夫指出：“在那些年代，戈尔巴乔夫显然已经言行不一。

---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26~327页。

他在讲话中口口声声称愿意捍卫党和国家、不允许分裂苏联等等。这肯定把人们弄糊涂了，他甚至在私人谈话时似乎也站在国家强力政治支持者的原则立场上，对极端主义分子的所作所为表示愤慨，威胁要采取措施，可第二天就对这一切刹车了，他用空话哄住周围的人，说什么‘极端分子什么也不会做的’，一切都会顺利解决，他们只是吵闹一阵子，会打住的。”<sup>①</sup>

于是，在决定实行国家紧急状态管制的时候，后面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普戈等人在福罗斯听取戈尔巴乔夫意见时，很自然地把戈尔巴乔夫模糊不清的表态视作其一贯行为——做好了是戈尔巴乔夫的领导有力，做不好就是他们自己的错——的自然表现。

克留奇科夫说：

不出所料，回答既有“是”，也有“不”。握手告别时，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句话是“干吧，行动吧！”博尔金认为，再过几天，戈尔巴乔夫才会一心一意地支持正确的决定。现在，他好像还只是观望等待，要看一看形势如何发展，谁将获胜。总之，结论是：戈尔巴乔夫只要确信实行紧急措施会取得初步的良好效果，他就将公开地，且以最积极的方式给予支持。这伙人飞走之后，戈尔巴乔夫的情绪很正常，晚上他选定了一部惊险片，同家人一起观看了电影，晚餐时还加了他订的酒。总的说来，一切正常。随后几天，戈尔巴乔夫在情绪方面，在作息日程方面，他的警卫未发现明显变化。他对切断电话联络一事表现得镇静自若， he 觉得这是对他“形象”的关心所采取的措施，是希望提供给他一个袖手旁观的机会，一直到国内恢复基本秩序，能向人民提出一个摆脱深重危机的计划为止。他的私人警卫都伴随在左右，行动不受任何限制。他没有讲自己以后的计划。莫斯科方面派人与他协商这一事实说明了很多问题，他的个人安全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对他来说，最后一点是决定性的。<sup>②</sup>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27页。

<sup>②</sup> 同上，第535~536页。

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失败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表现又令博尔金不无揶揄地评论：“总统扮演的是一个可怜的受迫害的角色。他看上去邋遢邋遢，穿了一件粗布上衣，可能是从别人身上扒下来的。我不由自主地想：谁也没把他关在福罗斯别墅的地下室里呀？他扮演可怜角色倒是很成功。但是正如后来事实表明的那样，他已经没有能力提高自己的威信了。看来，总书记及其家人把角色扮演得过头了。”<sup>①</sup>

## (二) 挽救苏联的三天：“八一九事件”

1991年8月18日晚上8时，帕夫洛夫、亚佐夫、普戈、亚纳耶夫、普罗科菲耶夫、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聚集在克里姆林宫等待福罗斯的消息。晚上11时左右，代表团带回了消息。克留奇科夫说，谁也不期望会有什么意外，会对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估计错误。当同志们讲道，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直接批准实行紧急状态，只是在会谈后说：“好吧，干吧，行动吧！”大家也都明白，这符合戈尔巴乔夫的习惯，他总是相信：“不论在怎样危急的时刻，都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sup>②</sup>据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人讲：总的来说，戈尔巴乔夫是平静的，可以说，谈话是同志式的，他拒绝了返回莫斯科的建议，说自己感觉不太舒服，还必须接受几次治疗。大家都清楚：在这种危机时刻，指望戈尔巴乔夫是件不可靠的事。他不会成为障碍，只是等待事态发展，然后视局势的进展再同某一势力一起行动，无论这是他反对的还是支持的势力。“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厚颜无耻和阴险狡猾。”<sup>③</sup>

考虑到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态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第一份文件——《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开始履行总统职责的命令》。文件说：“鉴于身体状况，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无法履行苏联总统的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款(7)，我将于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总统职责。”<sup>④</sup>

8月19日6:25，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从1991年8月19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sup>②</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36~537页。

<sup>③</sup> 同上，第537页。

<sup>④</sup> 同上，第539页。

日 4:00 起在苏联个别地方实行为期 6 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是：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内阁总理帕夫洛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有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和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

6:34，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指出，国家“面临着致命的危险”，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死胡同”，呼吁公民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使国家和社会摆脱危机。但是叶利钦在白宫广场上却登上一辆装甲车，呼吁俄罗斯人民立即举行总罢工予以回击。

9:00，苏军部队开进莫斯科市中心。装甲车和坦克占据国家重要机关附近的阵地、广场和交通要道。数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与士兵对峙。

11:00，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第 1 号命令，宣布确保国内经济活动正常化的措施，对报刊实行严格监督并禁止游行、集会。

11:30，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1991 年 8 月 19 日凌晨，合法选举出的国家总统被解职了。无论用什么理由来为解除总统职务一事辩解，我们都认为这是一次反宪法的政变。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这种武力方法是不能接受的。它损害了苏联在世界面前的声誉，破坏了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威信，使我们回到冷战时代，使苏联与国际社会隔绝开来。所有这一切迫使我们不得不宣布这个夺权的所谓委员会是非法的。因此，宣布这个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和命令都是非法的。我们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要求使国家重新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毫无疑问，必须保证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对全国人民讲话。我们要求紧急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些要求得到实现之前，我们呼吁在俄罗斯全境内无限期地总罢工。”<sup>①</sup>

17:29，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颁布命令，宣布从 1991 年 8 月 19 日起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

---

<sup>①</sup> 《国际文传电讯》1991 年 8 月 19 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1 年 8 月 21 日。

17:30,叶利钦签署成立业务管理小组的命令。该小组实际上是俄罗斯“影子内阁”。它由副总理洛博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克拉萨夫琴科和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委员亚布洛科夫领导。

17:35,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第2号命令,决定暂时限制中央、莫斯科市和州的社会政治出版物,只允许出版《劳动报》《工人论坛报》《消息报》《真理报》《红星报》《苏维埃俄罗斯报》《莫斯科真理报》《列宁旗帜报》《农村生活报》。

17:46,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亚纳耶夫表示:紧急状态委员会“将采取最果断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摆脱危机”,并打算请求将于8月26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确认实行紧急状态的权力。

这次现场直播的记者招待会却让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大失所望。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全国公民“不熟悉面孔”的一伙人,而正是这一伙人打算领导这个国家。代理总统亚纳耶夫向记者们说了一番很不自信的话,他很紧张,手都在颤抖。他占了戈尔巴乔夫的位置,却宣称他非常关注苏联总统的健康:“我希望,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总统尽快康复,我们还将在一起工作。”记者就戈尔巴乔夫健康问题提出了直率的问题,有记者问,总统是否同意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他的回答语无伦次,既不具体,又毫无价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回答引起了记者们蔑视的笑声。“这次新闻记者招待会让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丢尽了脸面。”<sup>①</sup>以恐吓政敌,保证合法地将戈尔巴乔夫政权转向“苏联集体领导”的企盼落空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出现了矛盾,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出了一封信,他在这封发自基辅的信中怒不可遏地说:“头几天的情况使我得出结论:大多数执行机构行动很不果断,缺乏组织性。执法机构实际上没有完成任何任务,导致严重的后果……全国人民,全体军人的目光都投向莫斯科。我们大家坚决要求采取措施,消灭叶利钦之流的冒险家。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必须立即封锁,切断其水源、电源、电话以及无线电通信等。今天国家的命运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所以无论是什么人,什么问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38页。

题都不应该阻止我们达到预定的目标。一切犹豫不决的表现和敷衍的措施都只能促使极端分子和假民主派采取更加严厉和坚决的行动。”<sup>①</sup>

8月20日，克格勃精锐部队——“阿尔法”小组奉命驱散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前的人群并攻占大楼，并定于3时发动进攻，但指挥官们未执行命令。俄罗斯议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卢金说，派去包围俄罗斯议会大厦的梁赞空降师、塞瓦斯托波尔步兵团和来自塔曼近卫部队装甲师的一个营都表示支持俄罗斯总统。驻守在莫斯科周围的多数师的指挥官也以不能向人民开枪为由拒绝出动。驻萨哈林、堪察加等地的远东苏军表示支持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发布政令，宣布从下午5时起接管俄境内的武装部队，直到宪政机构和国家权力机构的活动完全恢复正常为止。命令要求部署在俄境内的所有苏军和克格勃部队必须原地待命。

8月21日凌晨，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等人乘总统座机来到克里米亚，准备接总统回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称，在未接通政府联系前，不同他们中的任何人谈话。联系接通后，戈尔巴乔夫回忆说，我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杰缅捷伊和其他各共和国领导人通了电话。和布什也联系上了。我开始发布命令。首先撤掉亚佐夫的职务，国防部长一职由莫伊谢耶夫接任，并责成他一定要保证飞往别尔别克的鲁茨科伊和其他同志们的飞机安全降落。我指示政府通讯部门领导人切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所有的电话，命令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将克里姆林宫监护起来，把所有留在那里的政变分子隔离开来。俄罗斯代表团到了。这时我才真正明白，“我现在自由了”<sup>②</sup>。

8:00，在莫伊谢耶夫总参谋长主持下召开国防部部务会议。会上多数将军赞成必须从莫斯科撤军，使高度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恢复常备状态，并且建议国防部长亚佐夫退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亚佐夫除了不接受“退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一点外，同意了其他所有的意见。他说：“这是我的苦难，我将忍受到底。”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军事积极性严重受挫，“军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40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91页。

队实际上已经拒绝服从这些‘苏联领导人’”。<sup>①</sup>

10:00,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召开。最高苏维埃支持叶利钦总统的所有总统令,并且批准了那些需要立法权力机关核准的命令生效。议会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并明确指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一切决议的非法性。

16:11,苏联国防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苏联国防部部务会议决定把部署在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军队撤回原地。

19:35,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会议。会上作出决定:“实际停止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履行他的宪法规定的职责并把这种职责转交给副总统的做法是非法的。”

20:17,苏联检察院发布公告指出,鉴于非法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行为中存在着犯有国事罪的证据,苏联总检察长已提出刑事起诉。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季贾科夫在克里米亚戈尔巴乔夫的别墅被拘捕。

21:10,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他已恢复对国家的控制。

8月22日,凌晨3时,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他在机场发表讲话:“1985年开始的事业已产生了实际成果,社会和人民与以前不一样了,这是政变分子遇到的主要障碍。”参与事变的苏军部队根据苏联国防部的命令均返回原驻地。

上午,戈尔巴乔夫颁布《关于废除政变组织者反宪法文件的命令》,宣布废除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全部决定;解除紧急状态委员会所有成员的责任职务;“对参与这场阴谋的人”提出刑事诉讼。同时,叶利钦签署法令,宣布苏军中的共产党基层党组织为非法;暂停苏联共产党《真理报》的出版,其财产转归俄罗斯国家机关;禁止俄罗斯共和国境内武装力量中的政治机构进行活动。

中午,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任命米·莫伊谢耶夫为国防部长、舍巴尔申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别斯梅尔特内赫为外交部部长。8月23日,在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48页。

叶利钦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重新任命叶·沙波什尼科夫为苏联国防部长、巴卡京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潘金为外交部部长。

晚上,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副总书记伊瓦什科的领导下召开会议,其中只有巴克拉诺夫和舍宁没有到场参加。会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冒险行动的决议,然而这个迟到的决议已经无法发表,因为所有党报在8月22日—9月4日期间都已停刊,电视台也没有就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作任何报道。大家等待着最坏情况的降临。党委机关的负责人员认真检查自己办公室柜子、桌子和保险柜中的文件,并销毁了其中的大部分文件。事件的结局一步步临近,老广场和新广场上仍然聚集着愤怒的人群。当戈尔巴乔夫在白宫参加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张布尔布利斯写给他的小纸条,上面写道:“苏共中央正在加紧销毁文件,总书记应立即下令暂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活动。”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正是依照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批示,而并非叶利钦关于取消俄共的那道命令,开始了对苏共中央各大机关的破坏行动。”<sup>①</sup>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称:“这次军事政变标志着戈尔巴乔夫统治的结束和叶利钦时代的开始。”<sup>②</sup>

### (三)“跪着的骚乱”:胜利还是失败?

政变失败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引发了许多问题:为什么这部貌似强大、使全世界恐惧的“苏联领导层”机器会陷于瘫痪呢?就像马特洛所说:“在一个始终是由极权主义政权、而通常是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一个包括副总统、政府首脑、各种武装力量、秘密警察和普通警察领导人物的图谋竟会失败,按照常理判断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更让人费解的是当时那个国家正处于极端的经济困难中,总统不受人欢迎,而这次图谋又得到议会主席的默许,或者说是宽容。实际上,属于和同情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就是苏联政府,只有总统除外。在一个法律细节在政治发展中从来不起决定作用的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4~155页。

<sup>②</sup>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612页。

国家里，他们怎么能失败呢？”<sup>①</sup>

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缺乏坚强果断的核心——领袖。叶利钦指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不仅没有“内部的”领袖，甚至连“外部的”、“充当门面”的领袖也没能找到。<sup>②</sup> 在叶利钦看来，这些成员确实都是职业革命家、高级专家和演员，但几乎每个人都有着别人不能轻易发现的个人缺点，在行为、思维和心理上都存在着某种乖戾的、偏离常规之处。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本人的形象让人阴郁地联想起斯大林时代的迫害。在叶利钦看来，克留奇科夫患有“职业病”——最典型的间谍恐怖症。他经常散布“小道”消息，不停地往戈尔巴乔夫的办公桌上放秘密纸条，这些纸条的实质只有一个——民主派在准备政变。民主派——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叶利钦说：“我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家，但这似乎是克留奇科夫从少先队员时代就培养起来的警惕综合征。他已经不能理解现代世界是按怎样的规律存在着。”

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是一位上过前线的战士，典型而忠诚的老军人。他对一切都以军人服从命令的原则默默而绝对恭顺地接受。但是他绝对不适于一个文职的角色。

苏联内阁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是一个相当内行的大财政家。毫无疑问，还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但是帕夫洛夫因为强行兑换卢布和价格改革而在很短的时间内遭到人们深恶痛绝的唾弃。更为有趣的是：一站在电视摄像机前，他就突然变得难以解释的厚颜无耻起来，开始开些无聊的玩笑，暴怒的时候则满脸涨红。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他的这种不稳定性格就表现出来了：因病而退伍。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卢基扬诺夫虚伪狡诈，引不起人们的任何好感，因为他是一个冷酷而老于世故的人物。

<sup>①</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99~700页。

<sup>②</sup>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86页。

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根本就不适合成为“领袖”。他当选副总统时的表现就已经说明了这一切。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亚纳耶夫语惊四座：在回答关于健康状况的问题时，他公开声明能很好地尽自己做丈夫的义务。这是一种所谓的缺陷综合征。从童年起就有某种残缺的孩子，成人后往往会突然感到自己有超常的能力。正是这种超常的综合征，帮助呆板的亚纳耶夫占据了他力所不及的最高领导层的位置，他能喋喋不休地谈论、争吵，带着非常自信的神情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亚纳耶夫是苏联副总统。在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他可代行总统权力。于是亚纳耶夫被推到前台。

但是“政变者们的希望落空了。”<sup>①</sup>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只是政客，而不是政治家。这一角色决定了他们的一切极端努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勒庞所言：“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形式。”<sup>②</sup>

马特洛克回忆，最初听说戈尔巴乔夫被放逐，他的苏联朋友们是何等的恐惧，但是看完紧急状态委员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们令人惊奇地轻松地笑了起来。“他们所看到的不是自信的领袖，也不是可以恐吓一个国家臣服的暴徒，他们不过是胆怯的、竭力自保的官僚，他们被自己的所作所为吓坏了。俄罗斯人可以原谅领袖们的邪恶，但却永远不能容忍他们的软弱和懦弱。当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作为鄙视对象出现在人民面前时，他们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人们不会跟随他们，他们也没有强迫人们那样做的意志和手段。”<sup>③</sup>

叶利钦指出：“从根本上说，我把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悲剧理解为整个国家公务员阶层的悲剧。旧体制把他们变成了螺丝钉，使他们失去了人的某些本性。在面对新的现实时，一个政治家为能保持自我，必须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良知、自己的发言权和行为。正因为他们缺少这些，所以被打

①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86页。

②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③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92页。

垮了。”<sup>①</sup>

其次,缺乏强力手段的支持——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和内务部三个强力部门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成。但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却失去了军队的支持。这又是为什么呢?

叶利钦指出,克留奇科夫认为把所有的人逮捕起来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第一,这会立即引起人们的抵抗,那么冲突和流血将不可避免。第二,这会过于急剧地丧失“戈尔巴乔夫的”解冻局面。新的领导人不仅将受到大量的国际制裁,还可能面临与世界完全断绝关系。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在全球各个角落都有着众多利益的国家——这是极其有害的。这个狡诈的情报人员考虑得很全面。按克留奇科夫的想法,起恐吓作用的不是克格勃,而是军队。被运往和平城市大街上的大量军事装备,应能涣散民主派的意志。“在武力面前进行反抗是愚蠢的。”<sup>②</sup>

但是马特洛认为,克留奇科夫想法表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思想已经落后于苏联社会的发展了。他指出,组织者们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已经发生了。他们认为他们所应付的还是 60 年代的苏联:宣布夺权,在街上部署几辆坦克就成了。人们就会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事。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但大多数都不会太在意。只要答应他们生活会好起来就行了。他们信不信都无所谓,因为他们对左右局面无能为力。“政变的领导者是其自身偏见的牺牲品。”马特洛克指出,克留奇科夫一直争辩说,只有用铁的手腕才能恢复秩序,保证苏联完好无损,而且他自己也相信这一点。他也许曾以捏造或者歪曲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因为这是他想要相信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它不过是自欺欺人。这个国家再也不是他以及他的同谋们想象得那样了。”<sup>③</sup>

苏联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巴卡京在分析失败原因时也赞同上述分析。他说,叛乱的组织者们在主要的一点上打错了算盘。他们没有考虑到,近几

<sup>①</sup>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64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76 页。

<sup>③</sup>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700~701 页。

年来国内各族人民尝到了自由的甜头，把甘于受人支配的奴性从自己身上一点一滴地挤了出去。他们没有考虑到，最高层的政变已经不会像 1964 年那样遇到死一般的沉默。叛乱分子成了他们自己目光短浅、缺乏远见、对国内发生的变化不能作出正确评价的牺牲品。聚集在“白宫”四周、阻止新的专政到来的普通老百姓制止了他们。拒绝执行非法“新政权”命令的军人制止了他们。<sup>①</sup>

军队的行为表明：“苏联的军队不是用来镇压俄罗斯民众的可靠工具（可以想象，在某种情况下，军队可能会进攻非俄罗斯共和国，一年以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直被这种威胁困扰着）。军队里的应征士兵被训练抵抗敌军而不是普通民众。毫无疑问，指挥官们会找尽借口不进攻白宫。令人吃惊的是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竟认为他们的命令会被执行。”<sup>②</sup>

再次，对戈尔巴乔夫的误判——幻想。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是苏联国内经济危机不断加剧的必然结果。这个国家实际上早已无人管理。国家领土上不断爆发的民族冲突没有一个得到有效制止。军队好比消防队，忙于到处扑灭火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过于顺利地在实践中实现了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基本原则——凡事由党的领导人决定，而责任却由其他人来承担。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总统后，这一原则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经常运用这样的原则必然导致愿意为别人的愚蠢行为承担责任的人越来越少。”<sup>③</sup>克留奇科夫认为，在实施计划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对戈尔巴乔夫的幻想是我们最严重的失误。8月19日，对戈尔巴乔夫“形象”的关心使我们失去了许多，而最重要的是，没有赢得广大居民的信任和积极支持。事情并不在于当时戈尔巴乔夫的威信实际上已经降至零点。此时的苏联总统已死心塌地地走上了一条破坏苏维埃国家的道路，与国内外的某些势力勾结起来。这样一来，他不仅不想退却，而且也无法退却，心里只想着如何以最

<sup>①</sup>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01页。

<sup>③</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54~755页。

小的个人损失从这一境地中摆脱出来。结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失去了一次实行坚定彻底的政策的机会。这样，便向社会与世界展示，戈尔巴乔夫已经与那些把超级大国引向灾难的人决裂了。“遗憾的是，明白这一点时，为时已晚，当时，对戈尔巴乔夫，我们还没有从幻想、疑惑和痛苦的深思中完全摆脱出来，还希望他能整顿局势，及时制止最可怕的后果——国家解体。”<sup>①</sup>

然而原因不仅如此。季诺维也夫指出，对戈尔巴乔夫的幻想在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与戈尔巴乔夫其实是一路的。他指出，没有一个人被逮捕。“叛乱分子”不是三岁小儿，他们应该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假使他们的意图是真正认真的，他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逮捕所有“民主派”的积极分子——首先是叶利钦。他们应该明白，国内是在进行着一场摧毁整个苏联的战争，应该以符合这一现实的方式来行动；但是他们害怕这样做，他们甚至不敢承认这一无情的真相。“他们本身属于改革派，本身因将国家带入这种局势而受到指责；他们想要干干净净地摆脱政变，害怕采取果断行动，担心来自西方谴责，其结果就是：‘叛乱分子’不能完成政变的主要条件——即停止自己对手的积极活动，并将他们孤立起来，这成为政变受挫的主要原因。”<sup>②</sup>

最后，缺乏承担后果的担当——勇气。叶利钦认为，克留奇科夫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一个最危险的人物，一个有着敏锐目光、高深莫测的小老头。但是他很快就识破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缺乏斗争的勇气。

叶利钦说：

在白宫中度过我们生命的每一分钟都会缩短他们的紧急状态的生命，克留奇科夫知道这一点吗？在他的声音中会不会闪现出过于温和的音调？我会不会感到一个已经按下按钮的刽子手露出令人满意的宽容呢？

<sup>①</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36页。

<sup>②</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73页。

我用专线电话打给克格勃主席。我已不能逐字逐句地记起我们的谈话,但情节很有意思。克留奇科夫进行了自我辩解。“难道您不了解在做什么吗?要知道,人们躺在坦克底下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牺牲。”——我说。克留奇科夫回答:“不,不会造成伤亡:第一,这是纯和平的行动,武器里没装弹药,没有下达战斗任务,只是为了维持秩序。一切担心都源于你们俄罗斯领导者;据我们的资料,人民情绪安定,生活正常……”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语。

后来分析克留奇科夫这个本次阴谋的中心人物的逻辑,我明白了:他说的几乎是事实。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1956年在布达佩斯流了许多血,但这是战后欧洲出现的第一次武装入侵,人们对外国坦克的出现反应非常强烈,何况当时共产党在匈牙利也没什么威信。1968年的布拉格情况相似,牺牲却相对不多。是的,也有动乱,也有各种事情发生,但从总体上看,一切都解决得非常快,而且“很好”。而这也是外国的军队!1981年波兰,一天之内就进入了战争状态,装甲车队开上了主要的大街。一切就断然结束了:波兰人害怕战争状态继续下去,选择了勉强的和平。

克留奇科夫正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有过的先例出发,好像选择了波兰方式。假定说,有一天他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是的,我适合多年担任国家首脑的雅鲁泽尔斯基的角色,一个声音温和、戴着眼镜的老军人,安宁而坚定地把国家带出绝境。

因为,我们不是外部侵略,坦克是自己的,所以不应当有反抗。克留奇科夫的错误就在于此。人们对于滑稽可笑的愚蠢的阴谋闹剧的反应,被他们不怕我们的坦克所缓冲了,因为坦克是我们自己的!后来他们才明白应该开枪,但为时已晚。谁也不愿意,也不能开枪,因为开枪只能射向活跃的、沸腾的人群。<sup>①</sup>

还有一个因素也很重要。马特洛克指出,对许多苏联官员来说,罗马尼

<sup>①</sup>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82~83页。

亚是一个震动。<sup>①</sup>但是其中的教训却是模棱两可的。改革派主人为它说明了现存体制抗拒变革将会造成的后果。但是克格勃和苏共保守派明白，“在反共革命中，秘密警察和党魁们的下场将是被钉在耻辱柱上”<sup>②</sup>。

从以叶利钦为首的反对派角度来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之所以会失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叶利钦危机时刻的政治果断。马特洛克指出，大多数人对政变不会公开反抗。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因为莫斯科有足够的力量坚决反对回到过去，阴谋家不经战斗就休想夺取胜利。因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决定而产生的民选机构，使政变在许多共和国未得到轻易的默认。他说：“对政变的反抗就是以许多地区领导人为中心展开的，叶利钦不过是他们之中最突出、所处地理位置最具战略意义的一个。并不是每个人都得走上街头表示反抗，只要能向阴谋家们显示，他们必须流很多血才能执掌政权就足够了。内战并不是政变阴谋者们所希望的那样。”于是，当叶利钦向外界发出反抗的声音，并将这种声音付诸于激烈的政治行动——站在白宫的坦克上发表演说——时，爆发大规模流血的前景有可能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失败了”<sup>③</sup>。就像克留奇科夫反复辩解的那样：“不，不是武力，也不是希望暴力，这些都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治和实践活动的主要推动因素！由刑事案卷的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摆脱武力对抗、避免流血牺牲，这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主要任务。”<sup>④</sup>

其次，苏联国内外政治势力共同支持。从8月19日开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就遭受到了国内外的反对。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呼吁哈萨克居

<sup>①</sup> 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1918年1月26日—1989年12月25日），罗马尼亚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杰出活动家。1965年至1989年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1967年至1989年兼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元首。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第二个十年，其统治个人崇拜、民族主义泛滥，与西方国家和苏联关系恶化。齐奥塞斯库政权于1989年国内爆发革命被推翻，同年12月25日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被枪决，罗马尼亚在处决了齐奥塞斯库夫妇后立即宣布废除死刑。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03~304页。

<sup>③</sup> 同上，第701~702页。

<sup>④</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09页。

民保持平静和克制，强调哈萨克境内不实行紧急状态。格鲁吉亚领导呼吁居民“保持平静，遵循秩序和纪律”。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彼得罗相要求共和国的各政党、社会组织和政治力量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和谨慎”。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吕特尔发表声明称，爱沙尼亚在目前形势下继续奉行“和平恢复爱沙尼亚共和国独立的方针”。美国总统布什对戈尔巴乔夫被免职发表声明，表示不承认苏联新领导人，支持叶利钦要求恢复戈尔巴乔夫权力的主张，并暂时停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德国总理科尔对戈尔巴乔夫被停职表示“极大忧虑”。英国表示将暂停对苏联的经济援助，等等。对1500名莫斯科市民的紧急民意测验表明，仅有10%的人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苏联安全委员会成员普里马科夫和巴卡京反对叛乱。原总统委员会成员和戈尔巴乔夫的亲密顾问亚·雅科夫列夫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和反抗。<sup>①</sup>

在众多的力量当中，叶利钦获得了军队的支持——国防部副部长、空降部队司令帕维尔·格拉乔夫将军的表态和行动。

叶利钦描述了这一过程：

叛乱前不久，我参观了模范的图拉师。空降部队司令员帕维尔·格拉乔夫让我检阅了作战部队。我很喜欢这个人，这位年轻的将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相当果断，有主见，性格坦诚。

于是，我犹豫片刻之后，决定向他提个难题：“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合法选举的政权在俄罗斯受到威胁——若出现某种恐怖、阴谋，企图逮捕人的时候……可以指望军队，可以依靠您吗？”他回答：“当然可以。”

于是，19日我打电话给他，这是我从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打的最早的电话之一。我提醒了他我们曾有过的谈话。

格拉乔夫窘住了，他长时间地沉默着，听得出电话的另一端他有些呼吸急促。最后他终于说，作为一个指挥官，不能违抗命令。我似乎对

---

<sup>①</sup>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他说了一句：我不想把您置于危险境地。

他答道：“请等一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把自己的侦察连（或者是警卫连，我没记清）给您派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我谢过他后挂了电话。妻子回忆说，那天早晨我放下话筒后对他说：“格拉乔夫是我们的人。”为什么？

格拉乔夫的第一个反应没有让我丧失信心。况且，在那种情况下不是每个人都能直接回答的。命令就是命令……何况某种借口是有的，但格拉乔夫没回避自己说过的话。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通常，人们很少有在一瞬间决定生活中的主要问题的情况。格拉乔夫在话筒中喘息的时刻，不仅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我乃至千百万人的命运。当然，作为这样高级别的军官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有着太紧密的联系，他亲自发出军队进驻莫斯科的命令，亲自领导着政变的军事方面，而同时却又支持我们。

在这个职位上有像格拉乔夫这样气质的人——意志坚强、见解独立、敢作敢为，是俄罗斯真正的幸运。

但问题不仅仅在于他的个人品质，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的武装力量似乎有两支军队：一支是训练有素、经过阿富汗战争考验的具有最高世界水准的战斗部队；另一支是庞大的“菜园”军队，它们仅仅维持生计，而未参与过任何国家工作。当时“瘦”将军和“胖”将军之间潜在的内部矛盾冲突已经酝酿起来了。

当我打电话给格拉乔夫时，他得在几秒钟内全盘考虑几个问题，包括政治、道德的问题，还有纯职业的问题。他明白了：他这个“瘦”将军获得了一次历史性机会——把“菜园”军队变成真正的军队。这需要经过磨炼、痛苦和一次十分痛苦的改革。但必须把这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恐怖机器变成永远让俄罗斯感到骄傲的俄罗斯军队。<sup>①</sup>

最后，改革造成人民对国家的失望。戈尔巴乔夫认为，政变失败的根本

<sup>①</sup>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66~68页。

原因在于社会民主力量的成长和崛起。福罗斯之行戈尔巴乔夫的含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在福罗斯遭到第一次失败后，紧接着莫斯科也遭到了失败，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政变必将垮台。分析家的意见是对的，他们看出了这里更深一层的原因：大多数的社会公众不愿意恢复旧的秩序，改革后建立起的民主机制，尽管还很脆弱，但是经受住了考验，站稳了脚跟”<sup>①</sup>。戈尔巴乔夫指出，从后来的民意调查看，毕竟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人是同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些人的，这一点怎么也不能回避。而且，各共和国领导人，除俄罗斯外，都在静观其变，在思考，在动摇。也许阿卡耶夫除外。再说，许多外国领导的人反应也不一样，至少是在等待事态的发展。“政变是失败了，但如果事情早发生一年，不排除结局会是另外一个样子。”<sup>②</sup>

确实如戈尔巴乔夫所说，此时的苏联社会已经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首先，是人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在动乱的三天内发生的，而是早就开始了，但是苏联领导人只是在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年的8月底才看到这个变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了。这种信仰在“铁幕”之后是坚定的，在人们可以谈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个人崇拜的变形作用”的时代，可以将“早期的马克思”同后来的马克思相比较，把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列宁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列宁相比较的时代，在相信“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具有人性特征的社会主义”的时代，这种信仰是美好的。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事情。“公开性的过堂风吹散了这一幻想，使人们看清周围的世界而大吃一惊。”<sup>③</sup>

同时，世界也在变化。“冷战”使苏联大伤元气，国家的经济在这场竞赛中萧条了。皮霍亚指出，苏联“势力范围”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封锁白宫那个包围圈。正是在那里，这个政权的虚弱、腐朽和变节行为暴露无遗。暂且不谈那些参加叛乱的“英明的将领”。后来才搞清楚，他们不过只是一些执行者。暂且不说他们是如何作战的……与谁作战？为了什么？很难不让人想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75页。

② 同上，第390页。

③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55页。

起亚·列别德对俄罗斯总统说的一句话：“他的在白宫前面的空降兵保卫的是他们自己。”许多书写到了关于叛乱分子在政治方面的衰退。其实问题并不在这里。要知道参与叛乱的人不仅仅有亚纳耶夫和克留奇科夫，还有季贾科夫这样一位杰出的组织者，有公认为最勇敢的舍宁，有堂堂正正的亚佐夫和政界老手卢基扬诺夫，其政治经验一点也不亚于他的政敌。“苏联政权的机制烂掉了，最可怕的是叛乱分子闹起了事——是他们把这辆车发动起来了，但这辆车承受不了如此重量的压力，倒塌了，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一点其实他们是应该预料到的。联盟条约是给予生存希望的救命良药，但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车却把它撞翻了。”<sup>①</sup>

就像格拉乔夫评论的那样：无论如何，在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如今在相当大程度上已是迫于激进派的压力）的情况下，要做到在戈尔巴乔夫所开始的过程中仍居领导地位，除了“鞭打老虎”、试图使改革具有不断革命的特征以外，没有其他出路。为此有一个办法：扩大改革的社会基础、基座。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以前所采取的步骤都是冲着这个目标来的。从最初包括赖莎和最亲密志同道合者在内的“小范围”内讨论改革的意图开始，戈尔巴乔夫便逐渐地将为数众多、就对改革的看法和由此产生的期望而言是五光十色的社会类别和阶层推到风口浪尖上。照他的意图，正是改革的民主化、将改革从办公室和别墅里的计划变成“全民的事业”，可使国内的变革具有充分的理由，可保证变革不出现倒退，保证其不可逆转。“严格说来，这个战略证明是正确的，它通过了1991年8月的考验，当时莫斯科在改革引航员被扣留在福罗斯的情况下，独立地挫败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尽管是带有轻歌剧味道的阴谋。俄罗斯议会、白宫保卫者以及在公开性哺育下成长壮大的媒体，向戈尔巴乔夫证明（对它们自己说来也是个发现），对他上的课领会得很好，从此再不依赖他每日每时的呵护了。”<sup>②</sup>

这场“政变”究竟要干什么呢？如果是像利加乔夫说的那样：1991年8月一群国家领导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采取了试图保卫苏联的英勇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55~756页。

<sup>②</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

行动。他们是苏联爱国者，共产党员。他们遵循的原则只有一条，正如我们歌中所唱的，“只想要国家继续生存下去，除此别无他求”。如果要是从左派角度批评的话，他们还不够始终如一，不够果断。爱国者们被关进了监狱，他们被判有叛国罪。“紧委会的行动破产了，实际上，也是与背叛祖国、肢解苏联的现政权的斗争失败了。”<sup>①</sup>

“政变”为何会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像场“闹剧”地烟消云散而沦为笑话呢？佩特罗夫明确地指出：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都是谁？策划政变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是：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部长会议主席帕夫洛夫、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布采夫和工业、建筑、通信联合会主席蒂齐亚科夫。所有这些人都是戈尔巴乔夫分子，总书记的助手和亲信。政变头目亚纳耶夫是戈尔巴乔夫的副总统，其他参与者也都是戈尔巴乔夫挑选和任命的部长和主席，他们承担“改革”的责任。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普戈是总统安全委员会成员，其他人是幕后策划者，他们都是总统（总书记）的亲信。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是戈尔巴乔夫的军事顾问。戈尔巴乔夫的新助手卢基扬诺夫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实际上是扮演总书记的角色。奥列格·舍宁是中央委员会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尼古拉·克鲁齐纳是中央委员会负责行政事务的书记。<sup>②</sup>

他们没有勇气在社会面前承认为什么热衷于“改革”。在策划者采取了一系列毫无起色的行动后清楚地表明，这不是真正的政变，不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斯大林主义者进行的夺取政权的斗争。世界上最差的诠释都会做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称这场政变为“跪着的骚乱”。

为什么“骚乱者”要跪下呢？他们可以得到千百万苏联人的支持、没有来自人民的反抗，为什么停止行动呢？成千上万的武装军人怎么能在一只俄国熊面前投降呢？叶利钦面对坦克，纠集了数百名非武装追随者，其中包括民族主义议员和一群小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流氓无赖，他的表演不是一股

①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371页。

②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0页。

势力吗？

正确的答案是：“这些戈尔巴乔夫主义者处在铁锤和铁砧之间，他们已举起了锤子，但是不敢砸下去，因为他们不知道西方是否站在他们身后，没有西方的支持或者保障，每次打击都可能落在他们自己头上。经济和社会的混乱状态像一包炸药，每一次错误的打击都可能引起人民的反抗，甚至国内战争或具有无法估量严重后果的骚乱。策划者最惧怕的就是这一点。”<sup>①</sup>

### 三、政治的冷漠：危急关头的苏联共产党

1991年8月19日10时50分，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和国党的委员会、州党委会、边疆区党委会第一书记们发出了密电，电报中指出：“鉴于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请采取措施组织共产党员协助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实际活动中，应遵循苏联宪法。关于召开中央委员会及其他有关措施另行通知。”电报署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sup>②</sup>然而陷入分裂的苏联共产党已经根本无法调动党的力量了。

#### (一) 分裂：中央书记处

1991年8月20日15时30分，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份加密电报从老广场发往全国各地。这是一份声明草案，要求各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审阅，而这些书记们就其职务来讲按照苏共二十八大的规定，自然也是政治局的成员，而且在此之前通常也是各共和国的总统。声明草案中指出：“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在苏联一些地区实行紧急状态是国家领导人极不情愿，但又不得已迈出的一步，其目的是应对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

<sup>①</sup>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sup>②</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37页。

内……形成的危机形势。政治局接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关于米·谢·戈尔巴乔夫处于绝对安全状态的声明。”但是这一声明草案遭到反对。哈萨克总统努·阿·纳扎尔巴耶夫说：“声明没有反映出真实情况，没有提到各共和国主权问题，没有提到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转型。应该指出，无论如何不允许流血和动用军队。”<sup>①</sup>

8月21日，苏共中央书记扎索霍夫在记者招待会上称，中央书记处认为不能允许试图建立专制制度。紧接着，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强调不允许利用临时的权力来确立专横的制度，建立反宪法的权力机关。

8月22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决议案，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禁止其活动，没收其财产；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提出议案，禁止其共产党按照苏共中央指示进行活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谴责苏共一些领导人参与了政变阴谋，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的职务。

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发表讲话，要与叶利钦合作，从苏共内部消除反动势力，改组苏共领导集团，重新制定党纲。同时，苏共中央书记处开始查处卷入政变的共产党员。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为什么没有得到苏联共产党的支持呢？亚纳耶夫描述了苏共党内这种普遍性的观望态度。他说：我们在《告苏联人民书》里谈到的权力危机就像是癌细胞一样，已经转移到各处，法律虚无主义就如同巨浪一样吞噬了整个庞大的国家。无论如何，宣布在苏联实行紧急状态的第一天，我在克里姆林宫收到的每千份电报中，就有700~800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8月20日，是50%对50%，21日，实际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历史已经结束了。后来，有人对我说，得知我们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许多州、边疆区和共和国，党和苏维埃领导人举行了不事声张的“宴会”。在宴会上他们友好地宣布为“我们毫无希望的行动成功”干杯。<sup>②</sup>

<sup>①</sup>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41~742页。

<sup>②</sup>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0页。

看来,苏共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原因大概在于:

首先,苏共中央并不认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做法。季诺维也夫指出,“叛乱”失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苏共的中间派和领导人所持的立场。支持政变的,是由在社会中没有影响的人组成的一些组织和集团(如劳动能手和老兵委员会)。“叛乱分子”指望得到中间派的支持,他们本身就属于中间派,而且也正试图扮演这一角色;但是政治斗争的不可动摇的规律赋予他们的完全是另一种角色——努力恢复改革前生活方式的保守派的角色。<sup>①</sup>

其次,苏共中央机关的软弱涣散已经不具备组织能力。1991年6—7月间,苏共中央机关的气氛非常沉重。苏共中央所有办公室的人几乎都是新面孔,而且气氛也不比从前。苏共好像不再是执政党,而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似乎觉得这样更好。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能感觉到苏共新地位的征兆。比如,莫斯科执委会取消了为苏共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高级工作人员在莫斯科提供住房的最低标准。苏共中央委员的工作证再也不能顶替进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机关企业的通行证,内外政策问题在苏共中央机关都无法得到解决。苏共中央已经无事可做了。利加乔夫指出,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下,已经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苏共已经不再具备强大而高效的组织能力了。“在地方,在困难形势下最可怕的是失去对中央组织作用的信心。在所有国家,当出现危机情况时,人们的目光都会转向中央政权。正是中央政权应当担负起艰难抉择的责任。如果中央在危机条件下做出模糊的决策,表现得不果敢,就会导致严重的国内冲突。”<sup>②</sup>季诺维也夫认为,令人惊讶的还有:苏共领导人实际上不支持政变,尽管这是拯救党的最后一次机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够动员国民对正在临近的灾难进行斗争。从这一角度来看,苏共的机关理应受到比公开努力摧毁国家的苏维埃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激进派更多的蔑视。假如苏共的领导人号召党员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结束犯罪的改革政策,就会有比叶利钦的支持者多几十倍的人走上莫斯科街头;但是各级苏共领袖贪图自己的官位,没有这样做,从而就为自己的

<sup>①</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sup>②</sup>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党和整个国家制度签署了判决书。<sup>①</sup>

雷日科夫指出，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5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当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究竟是怎么搞的呢？原来，到了1989年，国内政治局势起了剧烈的变化。夏初召开的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召开的。在代表大会炽热的气氛中，与苏共的活动相关联的一切重大问题全被“遗忘”了，却提出许多针对它的批判和严重指责，而且还号召进行报复。在有些发言中，可以感到发言人无论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一个政治家，都还不够成熟。他们表示，希望能对摆脱了“苏共压迫”的这个国家有所帮助；他们自己还对自己开展公开的批评，揭露党在社会活动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不过还有一些是完全自觉的、专为破坏党的威信而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苏共是通过历史发展而成就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的，它同国家组织已经水乳交融地连为一体。正因为如此，为解体势力的利益而破坏党的威信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但那些导演这一切的人很清楚，为了改变政权和社会制度，必须切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因为那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苏共之所以能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结果当一个统一的机体丧失了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sup>②</sup>

最后，苏共中央的精神蜕化导致失去党内群众的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造成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同时，又使苏联共产党的精神信仰完全蜕化，从而丧失了党内群众对苏共中央的支持。在1990—1991年间，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且几百万普通党员也公开宣布退出苏共。仅从1990年1月至1991年6月，苏共党员人数就减少了400万——从1900万减少到1500万。到1991年的夏天，苏共内部形成了几个相互区别很大的政治和思想派别。有以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罗夫斯克为中心的保守派，有

<sup>①</sup>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75~76页。

<sup>②</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8页。

极端程度不同的几个民主派别和集团，这些派别都谈不上是什么政治中心，倒更像官僚中心。“从实质上说，苏共经受着严重的危机：意识形态的、组织的、政治的。”<sup>①</sup>更为重要的危机在于：人民已经不需要这个党了！

亚纳耶夫指出：

在列宁格勒，戈尔巴乔夫在一个民粹主义的《告人民书》中大概是这样谈论自己的党内同志和高官同事的：你们从下面施加压力，而我们开始从上面施加压力。也许，这是戈尔巴乔夫式蛊惑人心最有代表性的例证，它指望普通公民听到他的话。他们当然听到了他的话，但是他们把类似的话当作耳旁风。报纸的编辑、记者、广播、电视、形形色色的宣传者、我国极富进攻性（同时也是极其卑躬屈膝）的知识分子也听到了这些蛊惑人心的话。

到那时，党的机制看起来还是非常强大的，但它不灵活，充满惰性。毫无疑问，必须对党进行改革。它在极其“舒服”的条件下生活得太多了。当严峻的政治局势要求进行艰难的论战时，党的许多干部对此没有做好准备。最起码他们害怕加入辩论，害怕蒙羞受辱。要知道，媒体许多编辑和“自由主义”记者被视为改革的灰衣主教亚·雅科夫列夫的庇护者，后者获得这种名声绝非偶然和误会。

对于正常人——健康和始终不渝的人来说，党的思想政治变革必须要有新的民主原则和规则（例如，在“多数与少数”经典问题上的相互关系）。然而党的队伍和干部没有民主化，反而是他们的去道德化。他们对针对自己的大规模公然敌对活动束手无策。当州委和区委需要有人站出来保卫的时候，1800 多万党员都各自待在家里，用各种方法躲藏起来，没有派出任何一支“小分队”去进行自卫。<sup>②</sup>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62 页。

<sup>②</sup>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 13 页。

## (二) 辞职: 中央总书记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召集了几名亲信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其中有普里马科夫和雅科夫列夫,还包括格拉乔夫在内的几名助手。戈尔巴乔夫说:“这是我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声明,以及将党委机关大楼和其他财产交由国家保护的命令。我希望不要发生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那样的灾难。我们在毁掉一切东西时很容易……虽然我坚持到了最后一天,但他们最终还是否决了改组苏共的决定。我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是他们背叛了党的总书记。”最后,两份声明合二为一,随即交给了各媒体,并且立即通过电台公布了这个声明。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关于辞去党领导人职务的声明,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戈尔巴乔夫在声明中说:

苏共中央书记处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没能阻止国家政变,苏共中央委员会没有果断地予以谴责并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没能号召共产党员开展反对践踏宪法的斗争,而且叛乱者中不乏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这就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此情况下,苏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这个艰难但又是唯一合理的决定。我不认为我本人今后还能够完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将辞去自己的所有职权。<sup>①</sup>

对戈尔巴乔夫辞职声明和解散苏共中央的建议,雷日科夫指出:“这种情况迟早总会发生。戈尔巴乔夫同党分道扬镳了。但为什么他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苏共自行解散的建议在许多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既定事实,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个谜。我看是潜意识中几十年培养起来的东西起了作用,总相信党的领袖总书记的一切行动不会有错。”<sup>②</sup>博尔金也指出了这种习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sup>②</sup>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7页。

惯性服从在这时的体现。他说：“八月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吓坏了。他很快就放弃了总书记的权力并同苏共划清了界限。正是在他的赞许和参与下苏共被解散和取缔的。如果总书记能多有一点儿勇气和冷静，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尽管苏共发生了这样的骚动，千百万共产党员直到最后一刻仍然忠于自己的总书记。各级党组织和党委会甚至在对苏共领袖的工作或者确切说是不尽职暗中表示怀疑或者公开表示气愤的情况下，也仍然俯首听命，它们大都支持总书记的决定，甚至在它们不理解这些决定的时候，尽管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疏远。”<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的辞职表明苏联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共同社发表评论：“戈尔巴乔夫 24 日建议解散苏共中央和宣布自己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这意味着，共产党本身今后将会走与东欧国家共产党一样的道路。这一事态使苏联国家的性质来了个 180 度大转变。”<sup>②</sup>

格拉乔夫指出：

苏联总统同自己的总书记替身、同早已不再承认他是自己领导人的党的最后的、尽管是迟到的分别，却不仅成为苏共多年历史的悲剧性结局，而且对于整个国家、对于苏维埃国家的完整性都具有致命的后果。立陶宛共产党的一名老党员讲道，他有一次同斯大林谈话时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苏联宪法（正式的尊称是‘斯大林宪法’）中要写上共和国有退出苏联的权利呢？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挑动分离主义情绪呢？这可是会导致国家分裂的啊。”领袖回答道：“统一的党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1991 年 8 月的苏联已经不是斯大林治理国家时的那个坚如磐石的大国了。毕竟只要党的凝聚作用在，它就会避免国家发生瓦解。从政变之后到苏联寿终正寝还有四个月的时间。戈尔巴乔夫总统比那个也叫戈尔巴乔夫的总书记，仅仅多存在了四个月。<sup>③</sup>

<sup>①</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384 页。

<sup>②</sup> 共同社莫斯科 1991 年 8 月 24 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1 年 8 月 26 日。

<sup>③</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214 页。

### (三) 取缔: 苏联共产党

1991年8月22日,戈尔巴乔夫发布《关于废除叛乱组织者反宪法文件》的命令,并在电视讲话中指出:“这几天发生的事,光说‘是对我们大家的重大教训’是不够的,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可怕的教训……我们必须更加团结地、速度更快地沿着彻底改革的道路走下去……看来,近期签署条约的新的日期不久将会确定下来……这项工作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做完,不能拖延,因为过渡时期的拖延,看来对民主改造是非常危险的。”<sup>①</sup>

1991年8月23日,取缔苏联共产党的活动达到高潮,“苏联共产党进入了一个受指控和算账的时代”<sup>②</sup>。

叶利钦签署进一步限制苏共的新法令。命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直到司法机关查清俄共参与最近事件的情况为止”;命令暂停《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公开性》《工人论坛报》《莫斯科真理报》《列宁旗帜报》。根据叶利钦的命令,苏联中央电视台“在法律上已归俄罗斯所有”。

下午3点,由巴卡京和巴兰尼科夫领导的克格勃和警察包围了苏共中央、俄共中央、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莫斯科市委以及对面的苏联克格勃总部大楼。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甚至将这次占领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的行动与1917年的攻克冬宫相提并论,他写道:“20世纪末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极权制度的试验已经结束。我作为经济学家,在很多年以前下了定论,这样的变革迟早会发生。但我不敢相信,这样的变革却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而且是在我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然而这一切的的确确地发生了。即使以后我不再为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工作,那么夺取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这一历史时刻却以事实证明了我本人、我的整个生命、我的所有苦难、过失以及矛盾……我是作为一名民主战士参与了这场斗争,而不仅仅是作为市长。”<sup>③</sup>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

<sup>②</sup> 法新社莫斯科1991年8月23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1年8月25日。

<sup>③</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6页。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戈尔巴乔夫颁布命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在苏联军队、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护法机关、铁道部队、各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在上述机构中的各政党和活动的成员可以在这些机构之外和业余时间参加政治活动;决定没收苏共财产,转由人民代表苏维埃负责保护。有关其今后使用的问题,应严格根据苏联和共和国的所有制法与结社法予以解决。

叶利钦颁布三项命令:没收俄罗斯境内的苏共中央总部和苏共地方党委的档案,以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转交俄罗斯档案机关管理,俄罗斯联邦克格勃接管俄罗斯境内的一切政府联络形式。

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并请求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准许召开全会,以便讨论与党和普通党员的今后命运有关的问题。

叶利钦颁布签署《关于苏共资产的命令》。明确规定:“鉴于苏共中央已经解散,俄共活动也已被停止,因此属于苏共和俄共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所有卢布和外汇资金将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有资产,这包括存在俄联邦境内外的银行、保险公司、股份公司、合资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机构中的所有资金。关于苏共中央在境外的其他资产,将按照各加盟共和国签订的同盟条约来进行分配。”“看来,叶利钦已经将戈尔巴乔夫关于解散苏共中央的一纸声明当成了全党的既定决议来执行。”<sup>①</sup>

1991年8月28日,叶利钦发布命令,宣布苏共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包括各种货币基金和外汇为俄罗斯联邦国家财产。<sup>②</sup>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2~163页。

<sup>②</sup> 注:根据俄联邦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截至1991年8月1日,苏共的财产包括4228栋行政办公大楼、180多个社会政治活动中心、16所社会政治研究院、41所学校、134座宾馆、145个汽车场、840座汽车场、23座疗养院和休养所,还有几千栋郊外的别墅,而苏共在国内各大银行的账户上还有50多亿卢布和大约1.5亿美元的存款。这其中还不包括苏共所属的医院和诊所,因为在苏共所属的其他大部分建筑和设施被查封之后,这些医院和诊所仍在继续对外开放。正是苏共的财产问题引发了新一轮的反共运动浪潮。——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

1991年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决定：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

1991年9月5日，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正式宣布了关于解散苏共中央机关和所有党组织机构的决定，他说此举是“考虑到现实情况”。大约17万各级党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因此失去了工作，他们需要就业方面的帮助。为了找到新的工作或者办理退休手续，他们必须获得一些必要的材料。为此，建立了由瓦连京·库普佐夫领导的清理委员会。<sup>①</sup>

1991年10月2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召开听证会。在一系列反共活动中，许多人呼吁对苏共进行类似于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但却没有得逞。因为所有新当选的俄罗斯领导人其实不久前都还是积极的苏共党员，他们大都是从党政机关、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或者是从各级党报中走上仕途的。最后，人们决定以举行议会听证会的方式来取代法庭审判，听证会的目的在《告俄联邦总统书》中有明确阐述，即“采取措施防止苏共和俄共在俄境内组织强制修改俄宪法、挑起社会和民族纠纷的活动”。议会听证会在白宫举行，听证会由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谢尔盖·菲拉托夫主持。在听证会上第一个做发言的是俄联邦总检察长瓦连京·斯捷潘科夫。代表苏共出席听证会的只有瓦连京·库普佐夫，他被允许在会上发言，但总共只给10分钟的时间。听证会持续了三天之后便宣告结束，会议通过以取缔苏共政党资格为主要内容的告叶利钦书。

1991年11月6日，叶利钦颁布《关于苏共和俄共活动的命令》。命令指出：“事实上正是苏共的领导层毁灭了这个国家，他们将苏共当成是最私人

<sup>①</sup> 苏共普通党员遭到极不公正的社会待遇。反共作家代表列昂尼德·绍罗霍夫叫嚣：“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分清自己人和其他人，即‘我们’和‘他们’。‘我们’是正常的人，是劳动人民，而‘他们’则是共产党员，是寄生虫。没有任何一个公民会热爱这样的当权者，俄罗斯的当权者被人民所憎恶是他们应得的下场。成千上万的人把共产党看成是最凶恶的敌人，是比希特勒还坏的奴役者。那些列宁们，斯大林们，布哈林们，托洛茨基们，佩尔谢们和勃列日涅夫们，他们不是以民族而分的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或者是拉脱维亚人，而都是反民族的共产党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俄罗斯的民族智慧，俄罗斯的民族自觉和俄罗斯的道德精神……他们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异教徒，他们是苏维埃垃圾！”——[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

的工具,这些人应为苏联人民被逼入历史的绝路而负责,应为我们国家的分崩离析负责。苏共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反人民性和反宪法性,并在各民族中挑起宗教的、社会的、民族的纠纷,是对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今年8月19—21日发生的违反宪法的叛乱是苏共领导层支持的……显而易见,只要还存在着苏共这一组织,那么类似的叛乱和动荡就无法避免……鉴于俄共并没有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登记,而苏共的登记工作则是在此前由它直接领导的苏联国家机关中完成的,而且是在严重违法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对于俄联邦来说并不具有审判前决定的性质,因此依照俄联邦宪法第7条和第121条第4款的规定,我命令:1.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一切活动,解散其一切组织机构。2.俄联邦国家权力执行机关对俄联邦公民加入苏共和俄共的事实不予追究。3.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所有资产归为国有资产。”这个命令实质上是对此前所有行动的总结和确认,整个社会对此表现得非常平静,许多人甚至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成千上万的苏共党员很快就转向了新制度的一方。”<sup>①</sup>

#### (四) 自辩: 戈尔巴乔夫

常常有人指责戈尔巴乔夫在关键时候背叛了党,是苏共消亡的罪魁祸首。“党确实忠于他,而他却背叛和抛弃了党。想不到一个准备庆祝自己百年诞辰的党不再存在了。要破坏一个党的威信、在精神上瓦解它和在组织上取消它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一个月前谁也不能想到苏共这个世界大党、这个领导着一个大国走过了7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赢得了人民的尊敬的党竟会这么突然地灭亡了。”<sup>②</sup>但是戈尔巴乔夫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与斯拉文的谈话中描述了他当时做出这项决定的政治考虑。

斯拉文:是什么促使您辞去总书记一职?这不论从心理上讲,还是从政治上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就很难接受这一切。

戈尔巴乔夫:我理解您。大概,俄罗斯很少有人这么说,但西方人总是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7~188页。

<sup>②</sup>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83页。

说，戈尔巴乔夫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控制自己。所以我不能抱怨我的神经。福罗斯这件事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他们想把我弄成病人。他们给我提出了几个方案：或者签署紧急状态命令，或者把权力交给亚纳耶夫，或者干脆退休。一句话，赫鲁晓夫的方案：“请您休息休息！看看病！您累了，干了那么多的工作，生活就是这样。”这是当时的主要阴谋家舍宁和巴拉诺夫对我说的。他们极力说服我。我平静地告诉他们：“我全都知道。我同你们有分歧。请你们或者召开代表大会，或者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在会上你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也谈我的观点，让代表大会来决定。我将坚持我的立场，因为我相信我的观点是正确的。”<sup>①</sup>戈尔巴乔夫说，政治局也召集了会议，要求同总书记见面，但是并没有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就是当时的全部真相。“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够同这些人一起在政治局见面，同他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呢？书记处成员和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这一切情况都明朗化后，我宣布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因为我不可能同搞反宪法武装政变、公开欺骗党和人民的人继续一起合作。同时，我号召共产党员们，在当地组织起来，集体讨论自己活动的组织形式，作出自己的选择。”<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继续辩解说：

联盟协议，将国家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化的联邦，同样，还有总的改革的构想，深刻的变革，国际政治中新思维，——凡此种种，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我的毕生事业，已经走上了付诸实现的道路。我自己会对它亲自下手吗？！

受个人利益驱使的政治上的盲目和短视，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了分离主义者和激进派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行动。他们有了瓦解联盟的绝好理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投掷了一块石头，从而引发了整个泥石流。

①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② 同上，第59页。

我不是个报复心强的人，也不主张在肉体上苛待这些大部分已经年纪不轻、身体欠佳的人。故意拖延的诉讼程序因要求赦免而被打断，1994年2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决定停止诉讼。但历史终究会对阴谋家们作出严厉的判决的。退一步说，即使被告的主要动机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私利和集团利益，而是在为祖国着想，他们所采取的冒险主义行为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这不禁让人想起这样一个例子。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这件事，大家公认扼杀了已经开始的改良势头，使俄国的社会发展滞后了几十年。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决定必须用革命的、流血的、暴力的方法实现业已成熟了的改造。“而八月阴谋的策划者们破坏了用把苏维埃联盟改造成为主权国家联盟的办法保存联盟的现实可能，而苏共的保存办法——则是通过将其改造成为左派力量政党的道路。”<sup>①</sup>

经过反复考虑，苦思冥想，最后才搞出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决定来：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让各个党组织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以后活动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听到不少党的老同志的批评意见。其中有些同志在谴责政变的同时，同意对苏共采取这种步骤的必要性。我在脑子里一再考虑这些问题，但我还是认为我在这里没有犯错误。首先，指责我背叛党，怪我“抛弃了党”，这话缺乏根据。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苏共各次代表大会上和中央全会的决议中都得到了正式的赞同。我始终不渝地，最近一个时期甚至有悖于作为国家总统的身份，在坚守着总书记的岗位。如果说谁出卖了谁的话，那不是我出卖了党，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

至于说“解散”苏共，那么我再说一遍，我只是说，在政变后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党组织本身应该自己确定自己的方位。<sup>②</sup>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97页。

<sup>②</sup> 同上，第398页。

斯拉文：不久前，《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对您的指责令我感到奇怪。该文写道，有一次您在国外——大概是在土耳其演讲时说，早在青年时期您就曾考虑同赖莎·马克西姆夫娜一起从内部破坏共产党，是吗？

戈尔巴乔夫：这完全是一种愚蠢的做法，是我的“同胞”们捏造的又一个谣言。……我认为，刊登这篇“谎言”的《苏维埃俄罗斯报》编辑部遵循的是一条人所共知的原则：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的目的是污蔑作为年轻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戈尔巴乔夫，降低、败坏他在人民中的威信，把自己身上的污点归到他的身上，为自己曾经在他面前奴颜婢膝而进行报复……这家报纸被认为是俄共的喉舌。<sup>①</sup>

#### 四、主权独立：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大分裂

“八一九”事件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土崩瓦解和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些事件注定了苏共和苏联的灭亡”。国家政权又回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手里。但是这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政权。戈尔巴乔夫从福罗斯回来后在机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似乎回到了另外一个国家。”苏联的历史已经结束，1991年8月21日这一天，撕下了苏联历史的最后一页。尽管苏联在这之后又垂死挣扎了几个月，但从这一天起，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已经开始了它的历史计时，尽管这个新国家此前只有一个总统——鲍里斯·尼克拉耶维奇·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做的事，还有他想干的一切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sup>②</sup>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23~224页。

<sup>②</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

“八一九”事件之后，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工作已陷于瘫痪状态，而克格勃、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其他权力机关的工作也都陷入停滞状态。格拉乔夫说，经历了八月地震之后国家的政治景色是一片废墟。旧的苏联体制赖以支撑的台柱——党、克格勃和军队被政变搞得威信扫地，而且实际上已经毁于一旦。戈尔巴乔夫曾经为其设计和基础苦心经营几年的新议会制共和国大厦轰然坍塌，将多层的苏联议会埋在瓦砾堆中，因为议会主席和大部分议员均站到了政变分子一边。不久前在新奥加廖沃受孕的联盟国家组建成以“流产”告终。政变引发了“早产”：“大部分民族共和国匆匆通过独立宣言的结果，是一下子出现了几个主权国家，如今就连将其联合成为经过更新的联邦制结构，也更加困难了。”<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权力控制中心，而这理所当然地要从强力部门入手。根据苏联总统令，原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大将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原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对外情报工作）局长列昂尼德·舍巴尔申中将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时任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的伊万·西拉耶夫被任命为苏联临时总理。然而舍巴尔申和莫伊谢耶夫在自己的新岗位上只待了一天，叶利钦知道戈尔巴乔夫任命强力部门的领导之后便大发雷霆。8月23日凌晨，叶利钦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要求他取消已经颁布的任命。叶利钦说：“莫伊谢耶夫参加过骚乱，而舍巴尔申是克留奇科夫的人。”但他的要求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拒绝。因为这一任命已在电视新闻中播出，并且第二天的报纸也将公布这一消息。8月23日上午，叶利钦来到克里姆林宫与戈尔巴乔夫会面，这是两人自“八一九事件”以来的首次会面，此次会见的气氛相当紧张。叶利钦强烈要求苏联总统在进行任何人事变动的时候必须要与俄罗斯总统协商。戈尔巴乔夫答应“考虑”撤销自己的命令，但叶利钦却声色俱厉地表示，只要莫伊谢耶夫和舍巴尔申还没有被解职，那么他就不会离开苏联总统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叶利钦还将一份新的苏联强力部门和外交部领导人的候选人名单强加给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认为，苏联国防部长应由空军元帅沙波什尼科夫担任，此人在1991年8月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37页。

19 日那天曾拒绝执行亚佐夫的命令；苏联克格勃主席应由巴卡京担任，他不久前曾是戈尔巴乔夫的亲信之一，在 1991 年 6 月举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他还曾是叶利钦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但在“八一九事件”中他没有支持国家紧急状态非常委员会，而是宣布无条件地支持叶利钦。此外，叶利钦推荐的苏联内务部部长候选人是维克托·巴兰尼科大将，当时他已是俄联邦内务部代理部长，深得叶利钦的信赖。叶利钦还推举记者出身的鲍里斯·潘金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此人于 1991 年间任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 8 月 19—20 日期间，他是苏联唯一一位没有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转交给驻在国领导人的大使。戈尔巴乔夫被迫接受了叶利钦的最后通牒。<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承认：“实际上，改革在 1991 年 8 月就结束了。”<sup>②</sup>此时，能够决定苏联命运的加盟共和国领导们，却在叶利钦的鼓动之下，开启了享受苏联解体的饕餮大宴。“从 9 月到 10 月，实际上所有的共和国都宣布了独立。分离主义者们春风得意，感到他们的时候到了。再加上俄罗斯总统心气太盛：苏联总统已经恢复活动，可是叶利钦仍接二连三地发布具有全联盟意义的命令。这就更加激起各共和国尽快脱离联盟中央的步子。”<sup>③</sup>

### (一) 别洛韦日协议

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年代所进行的改革旨在从质上更新社会，在民主道路上克服极权主义制度。“在极端复杂的条件下开始了根本性的改革，但是由于政变和政变之后发生的别洛韦日阴谋而中断了。”<sup>④</sup>

政变之后的中断是与各加盟共和国领导精英的野心膨胀分不开的。1991 年 3 月的公民投票中有 94% “支持” 联盟，而根据 10 月份公投的资料，有 86% 的支持率。总之，毫无疑问，人民不希望破坏国家的完整性。“但问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47~148 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第 90 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405 页。

<sup>④</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39 页。

题解决的关键掌握在各民族的精英人物和政治领导人的手中。”<sup>①</sup>巴卡京指出，“对中央进行报复”的一种特殊愉快心情也起了一定作用。“多年来这个中央即使不是被看作共和国各种灾难的根源，那么至少也是被看作对共和国领导限制和不愉快的监督的机构。”<sup>②</sup>戈尔巴乔夫看出了问题关键：“这件事与其说取决于各个共和国本身，还不如说是由于这些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们、领导人决定的。这些人野心勃勃，欲望极强。他们中有些人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过去一直不得志，而另一些人则希望享受政权，周游世界，拥有自己的外交部、自己的专机和卫队及其他权力象征物。您想想，他们哪里还考虑人民？如果考虑到人民的话，那就无论如何不会思考解体的事。”<sup>③</sup>

但是更为关键的因素则取决于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联盟解体的性质、速度和合法性的问题，现在仅仅取决于各共和国首脑的意志，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sup>④</sup>克留奇科夫说：“29日就要签订条约了，所以当时我们已不可能采取任何其他做法。”在“八一九事件”之后，叶利钦马上放开手脚大干起来。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决定利用“八月革命”的成果。<sup>⑤</sup>

于是，叶利钦收到了由“民主俄罗斯”的“智囊中心”撰写《过渡时期的俄罗斯战略》。文件指出：“八月事件之前，俄罗斯领导人就与原先的极权中央相对抗，因此能够依靠渴望巩固自己政治阵地的绝大多数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支持。原先的中央被取消后，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利益上的客观矛盾就不可避免地被提到了首位。对其他共和国来说，要在过渡时期保持业已形成的资源来源和财政经济关系，就意味着只有依靠俄罗斯才能改造自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06页。

<sup>②</sup>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

<sup>③</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67~68页。

<sup>④</sup>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

<sup>⑤</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

己的经济。而对同样经受严重危机的俄罗斯来说,这是对经济机构的重大额外负担,是破坏俄罗斯复兴经济的可能性……客观上,俄罗斯不需要在它上面有一个专门从事重新分配它的资源的经济中央。可是很多其他共和国都对有这样的中央感兴趣,它们在控制住本国境内的财产之后,力图通过联盟机关对俄罗斯的财产和资源进行有利于自己的重新分配。这样的中央只有在各共和国的支持下才可能存在,因此在客观上,不管它的干部组成情况如何,它都将推行与俄罗斯利益相左的政策。”<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准确地看出了这种构想的实质。根据这种构想,俄罗斯应当放弃自己担当联盟“核心”的角色。给出的理由是:“只要能保持住自己的资源,我们就很快富起来。”<sup>②</sup>戈尔巴乔夫坚决反对这种狭隘的想法。在1991年12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后。戈尔巴乔夫给各主权国家最高苏维埃议员的信中强烈呼吁:“为我们祖国的生存担忧的情绪日益增长,这促使我向你们呼吁。在我们祖国正经受的众多危机中,最可怕的是国家体制的危机。它最严重地影响到各级政权机构履行自己对公民所负职责的能力,它破坏经济,阻碍和扼杀改革,败坏风气,使各族人民互相对立,毁灭文化……现将联盟条约草案提交你们审议。你们的决定也许将使社会走向新的生活形式,也许我们各族人民将要长期地,看来是毫无希望地各自单独地去摆脱困境……因此,我恳请你们这些自己人民的全权代表们,在最近几天讨论一下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并赞同这个条约。”<sup>③</sup>

然而走向分裂的趋势越来越强。俄罗斯独立的想法事实上得到了其他加盟共和国首领的认可。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外的别洛韦日森林签署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定,并就此发表声明宣布:“由于起草新联盟条约的谈判已经走入死胡同,各共和国退出苏联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进程已成为现实”,“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的地缘政治现实,将停止其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69页。

<sup>②</sup> 同上,第170页。

<sup>③</sup> 同上,第183~184页。

存在”。

这次会晤是在不通知戈尔巴乔夫参加的情况下秘密举行的。戈尔巴乔夫说，叶利钦走后，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任何人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也没有人向我汇报任何情况。“我给部长们打电话，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又打电话给沙巴什尼科夫，因为他应该知道。原来，他们同他已经谈过了。我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概是沙巴什尼科夫马上给白俄罗斯打了电话，并且说，戈尔巴乔夫大发雷霆。于是舒什科维奇给我打电话来……”<sup>①</sup>结果可想而知，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别无选择了，只能被迫接受协议内容。他说：“人们也问我，为什么不使用武力，不逮捕别洛韦日协议的参加者。但是要知道这意味着走上可能成为流血的道路。而我自己在期望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采取的立场方面完全失算了。实际上，这些最高苏维埃的决定以及苏联公民因受蒙骗而抱有的期望，使我无权就取消别洛韦日协议作出强硬的决定。”<sup>②</sup>

1991年12月9日，戈尔巴乔夫就三国元首的协定发表声明：“对作为国家总统的我来说，评价这个文件的主要标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公民的安全利益，符合克服当前危机、保留国家体制和继续进行民主改造的任务……无论如何，下面这一点显然是针对我来的，这就是协定直截了当地宣布停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存在。毫无疑问，每个共和国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但是多民族国家的命运不能由三位共和国领导人的意志来决定。这个问题应该通过宪法在所有主权国家参与下来解决，并应考虑到各族人民的意愿。停止实施全联盟的法律规范的声明也是不合法的和危险的，只会加剧社会的动乱和无政府状态。协定的仓促抛出引起了人民的不解。它未经各共和国的居民和最高苏维埃讨论却以他们的名义签署了。尤其是这发生在各共和国议会正在讨论由苏联国务委员会制定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的时刻。在目前形势下，我深信有必要让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既讨论主权国家联盟草案，同时也讨论在明斯克签订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96页。

的协定。因为在协定里提出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国家体制，而这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权限，所以必须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此外，我也不反对就这个问题进行全民公决。”<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在作最后的努力。在接受斯拉文采访时他说：“我发表声明，我说，三个人虽然联起手来，也不能停止联盟的存在。这只能是多余之举。只有人民和人民选举出来的政权才能够决定这个问题。当时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案头上都摆放着新联盟条约。我就此事给代表们写信，提醒大家，这样会导致联盟的解体。代表们在审议别洛韦日协议时，应该权衡和决定一切。乌克兰代表没有经过讨论就急急忙忙地批准了别洛韦日协议。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反对这个协议的只有 6 个人。请问：我能够撤谁的职，逮捕谁？逮捕最高苏维埃吗？”<sup>②</sup>

1991 年 12 月 10 日，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绕开主权国家联盟问题，批准了关于成立独联体的协定。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成立独联体的协定。

## (二) 阿拉木图宣言

1991 年 12 月 13 日，中亚各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元首在阿什哈巴德会晤。会议对成立独联体的倡议表示赞同，但是强调必须保证所有原先的联盟共和国平等地参加制定关于新联合体的文件和决定的工作。为此确定于 12 月 21 日在阿拉木图召开 11 个共和国的会议。戈尔巴乔夫给此次会议的参与者发出的信中说：

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批准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准备成为独联体创始国，这就使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多元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186 ~ 187 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第 71 ~ 72 页。

族大国的国家形式开始了自己的新的历史。在它的领土上将成立好几个独立国家。形成统一国家的漫长而艰难的时期已结束,代替它的将是统一国家被拆散和肢解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不会是轻松的。在这方面不应抱有任何幻想……我给你们写信,不是要重新来争论这个问题。现在是独立国家联合体的主张正在成为现实……我的意见主要是要规定出最必要的,在我看来联合体在现代条件下要具有生命力就必须遵循的原则……第一,必须明确肯定联合体乃是多民族的构成体……第二,光承认人权和民主自由宣言是不够的……第三,建立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以及无障碍地发展和保护所有形式的所有制……第四,关于国家军事战略安全完整体系的问题……第五,联合体的每个成员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立行使主权的活动,都是合法的……第六,如果联合体成员国现在不能在科学、文化、族际交往语言、名胜古迹保护、博物馆、世界级的剧院等领域就进行协调工作及成立协调机构达成协议,那么这将会给它们的人民在精神方面的发展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第七,关于法律继承的程序问题……<sup>①</sup>

1991年12月21日,前苏联11个主权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以创立国的身份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议定书》。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等11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格鲁吉亚的两名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但没有在成立联合体的协议上签字。此前已获得独立的波罗的海三国没有派员出席这次会议。

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首脑签署《阿拉木图宣言》。宣言指出:“自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之日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

独立国家联合体首脑会议致函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通知他苏联已不复存在,苏联总统的设置也已取消。为了表示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积极贡

---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88~192页。

献”的感谢。会议为戈尔巴乔夫规定了终身的养老金,为他本人及其家人提供终身医疗服务,并为其配备 20 名警卫和 2 辆专车——“吉尔 -115”和“嘎斯 -31”。独联体国家领导人“下达命令,由俄联邦政府负责解决上述所有问题”。<sup>①</sup>

### (三) 苏联总统辞职

1991 年 12 月 23 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举行会谈。叶利钦表示,戈尔巴乔夫将于 25 日先以总统身份向全国发表电话讲话,宣布辞职。讲话完毕后就立即把核按钮移交给他。

12 月 24 日,戈尔巴乔夫召集他的工作人员向他们话别。总统办公室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 25 日圣诞节那天当地时间晚 9 点(格林尼治时间 19 时)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正式辞职。

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视台发表告人民书时宣布:“由于已形成的局势,在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之后,我就停止自己担任苏联总统职务的活动。”<sup>②</sup>

莫斯科时间 19 时 38 分,飘扬在克里姆林宫的苏联红旗悄然落下,由一面俄罗斯联邦的白、蓝、红三色旗取而代之。

然而即使是在权力更迭的最后时刻,叶利钦也没有给戈尔巴乔夫应有的尊重。同更换国旗一样,移交仪式也未能按戈尔巴乔夫预期的那样进行。当他回到办公室时,等待会面的并非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而是国防部长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将军解释说,叶利钦对戈告别演说中的某些话不满,因而拒绝按先前商定的那样前来会面。对此,戈尔巴乔夫认为争论或延续这种不快已无意义,就径自将装有举世闻名的“核按钮”的小皮箱交给了沙波什尼科夫。马特洛克说:“其他帝国或许是在战争或革命的压力之下崩溃,但苏联却是悄悄地瓦解。将核武器控制权移交给新主人几乎是漫不经心、悄悄进行的。正当大多数美国人打开礼物或准备圣诞晚餐时,俄罗斯

<sup>①</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210 页。

<sup>②</sup>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193 页。

瞬息之间就取代苏联,一跃成为一个核大国。”<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宣告了苏联正式消亡。一些俄罗斯和西方的观察家就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作用问题作了更为深刻而全面的评价。

阿尔贝特·普卢特尼在《消息报》上撰文指出:“对历史而言,改革的总设计师以何种理由进行改革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革的成果如何。那么苏联改革的成果是什么呢?这就是强大帝国的覆灭、共产主义神话的破灭,以及阻碍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苏联极权制度的结束……戈尔巴乔夫自负地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鼓动者和宣传者,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忠实拥护者,但正是他一步步地将由斯大林主义构筑的坚实堡垒、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制度彻底摧毁了……他的出现比他的离去意义更为深远。”<sup>②</sup>

时任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在自己的政治日记中写道:“一切就这样结束了,我确实没有想到我会亲眼看到这一切的发生。这使我感到震惊,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戈尔巴乔夫所有光环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致命的不足,他没有能力采取强硬果断的措施并将其付诸行动,他是拖延时间、看风使舵的高手。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曾不止一次地遭受攻击、面临绝境,但他都予以了巧妙而有力的回击。然而当需要制定和巩固强硬的经济改革方针的时候,他却像哈姆雷特一样选择了逃避。我把这种摇摆不定的趋势称作缺陷,而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嘉奖。”<sup>③</sup>

---

<sup>①</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页。

<sup>②</sup>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3页。

<sup>③</sup> 同上,第213~214页。

## 结语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 和智慧深化改革

——执政党要有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勇气、智慧和胆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改革，难免触动一些人的‘奶酪’，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不可能皆大欢喜。突破既得利益，让改革落地，需要有勇气、有胆识、有担当。畏首畏尾，不敢出招，怕得罪人，是难以落实措施、推动工作的。”<sup>①</sup>在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执政党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和政治胆略，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建立健全公正、合理、透明、开放的利益分配机制，使改革的红利普惠人民，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夯实社会稳定基础、重塑社会思想共识，确保改革开放的健康顺利发展。

—

执政党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勇气来源于坚定的政治立场。立场决定勇气。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勇气。利益固化筑起的藩篱，本质上是政治权力过度扩张和异化的产物。其带来的直接社会后

---

<sup>①</sup>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4年2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2页。

果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以致成为不可逾越的社会鸿沟。社会向上的流动性越来越小,社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窄,社会进步的动力越来越弱。最终,一个本应该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将会被板结固化的赤裸裸的利益社会所代替。这是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最大不幸!

苏联的瓦解崩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斯大林模式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在册权贵”及其掌握的政治经济利益构成了强大的特权利益阶层,成为苏联社会进步发展的绊脚石。“在册权贵”的形成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干部任命体制——“职务名册”制度。1923年6月12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同年10月,中央委员会又作出了关于登记分配工作基本任务的决议。1925年11月16日,中央组织局又通过了《关于选拔、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条例,并通过了一份重新修订的“职务名册”。“职务名册”各种各样,当时最重要的有3号:第1号“职务名册”是由中央委员会负责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第2号“职务名册”是中央组织分配部负责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第3号“职务名册”,各部委负责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其他则是地方各级机关的“职务名册”。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于8月23日宣布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职务名册”制度被彻底取消。苏联等级不等的“职务名册”在七十四年的历史中,造就了庞大的特权阶层:一方面,在这一制度下,“人只要一进入官僚系统,马上开始使用权利,发放食品购买证和进入各种基地的通告证”<sup>①</sup>;另一方面,这一制度“通过这个官僚系统保护自己”<sup>②</sup>,从而更加强化了制度的垄断性。然而在国家面临巨大变革的关键时刻,苏联的权贵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集体右转,从而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堂而皇之地实现了对苏联人民创造了七十四年社会主义成果的窃取和占有。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调查表明,截至1995年,在新政府中有75%的人是苏联的党政干部,他们曾是苏共、共青团、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高级领导人;有82%的地方领导人和61%的大工商业家来自苏联的官僚机构。俄罗斯新闻媒介便直言不讳地讲,俄罗斯的暴发

<sup>①</sup>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49~50页。

<sup>②</sup> 同上,第49页。

户中,61% 的人靠的是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 90% 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工作小组负责人弗兰克·希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sup>①</sup>

苏联剧变的惨痛教训警醒我们:党内决不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sup>②</sup>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政治准则和发展导向。改革开放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其过程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重组的过程。三十多年的成功实践表明,什么时候正确处理好了社会利益关系,什么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能顺利进行;什么时候没有及时处理好社会利益关系,什么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遇到波折。今天,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的关键时刻,很多容易改的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留下来的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甚至是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更需要执政党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极大政治勇气,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确立公开、公正、公平的社会利益新格局,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中国人民。那么怎样才能理顺社会利益关系,避免社会的负向发展,保证改革在健康发展呢?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执政的根本政治立场和政治目标。只有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才能正视利益固化带来的社会不良后果,才能有敢于担当、勇于任事,排除万难、奋发作为的政治勇气。具体来说,就是要始终扶持人民主体地位,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要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无论遇到什么

① 《在自己葬礼上致富——苏共特权阶层腐朽生活》,《文史参考》,2010 年第 15 期。

②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 年 11 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4 页。

困难和挑战，只要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sup>①</sup>

## 二

执政党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智慧来源于现代的政治精神。利益固化所形成的利益藩篱对社会危害甚大、对党的执政根基危害甚大。它不仅会在经济利益上造成社会分配的不合理、不公正，而且更会在社会心理上形成乃至强化人民对政权的冷漠感、疏远感，从而从根本上销蚀政权的社会根基。

1991 年 12 月 25 日 19 时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19 时 38 分，象征红色政权的镰刀锤子旗从克里姆林宫徐徐下落，俄罗斯的三色旗随之升起。聚集在红场上的人们意识到，苏联从地图上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26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然而令世人意外的是，无论是苏联共产党的党员干部，还是苏联社会的普通大众都平静地接受了苏联消亡的现实。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在一个影响了整个 20 世纪的大党大国消亡的时候，社会竟是如此的平静？27 日的《俄罗斯报》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在苏联人民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实质性的好处，还带来了持续的混乱和不安，其改革的结果是，“留下了一个分裂的帝国，这个帝国曾有一个名字叫苏联；留下了无法遏止的通货膨胀、街头乞丐；留下了百万富翁和据说达到 80% 的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民”<sup>②</sup>。可以说，对改革的彻底失望，最终造成了在苏联共产党最需要人民支持的时候而被人民所抛弃！探究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苏联共产党远远地落后于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对执政党的现代政治要求，即人民对公正、自由、民主

<sup>①</sup>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3 年 11 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41 页。

<sup>②</sup> 俄罗斯政治与经济历史中心：《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政治对抗 1500 天》，王南枝译，新华出版社，1993 年，第 375 页。

的精神需求和现实渴望,仍然沿袭斯大林模式的治国理念,最终使党丧失了对社会的敏锐观察能力和战略适应能力。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绝对大的政治勇气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让人民充分享受改革成果,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命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刻关怀的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这种政治智慧源自于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执政条件下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把握基础上而形成的现代政治精神。现代政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现代认知和自我完善。这一精神分别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体现出了极强的现代制度精神、现代社会精神和现代公民精神:

(1)从国家层面来看,现代政治精神体现为始终坚持中国的根本制度与不断发展完善具体制度相结合的现代制度精神。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进行改革开放,既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件,又是一项极富挑战的艰巨任务。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这场革命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这就是我们始终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可以说,只有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为中国制度的现代创新提供坚定的政治基础。

(2)从社会层面来看,现代政治精神体现为调整完善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规范与培育组织自治相结合的现代社会精神。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改革开放是一个充满活力、富于创新的历史活动,也是一个不断释放动能、社会重组的实践过程。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多元发展过程中蕴含的内在变革要求,又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型政党实现现代转型的必然选择。双重转型的内在要求与现实压力,都表明了在现代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国家—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党必须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积极主动推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可以说,只有遵循现代社会的治理规

律,才能在正确处理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提供绵绵不绝的社会动力。

(3)从公民层面来看,现代政治精神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引导与尊重个体利益相结合的现代公民精神。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改革开放既是现代中国的发展战略,更是现代中国社会凝聚共识和价值重塑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面对这一新情况新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把它作为塑造公民精神的主要思想资源。在这二十四字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实现了国家、社会和个体价值追求的有机融合,成为中国现代公民精神的集中体现。只有尊重、关怀公民个体的独立精神和利益选择,才能在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体的关系中,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生生不息的现代精神素养。

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进程中所形成的上述现代政治精神,使党能够更加自觉、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利益固化藩篱在现代社会的危害,也促使党积极主动行动起来,坚决予以破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推进改革必须一鼓作气、坚定不移,必须坚定信心、增强勇气,不可迟疑、不可退缩。我们要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sup>①</sup>

### 三

执政党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胆略来源于强大的政治自信。“不谋

<sup>①</sup>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0~41页。

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利益固化所形成的利益藩篱,往往涉及领域广、牵扯部门多、社会关注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越来越深的水中前行,遇到的阻力必然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可能越来越多。因此,我们不仅要有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勇气,要有破除利益固化的政治智慧,更要有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胆略。所谓政治胆略,即是说做事情,既要有胆识,又要讲方略,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这种敢于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胆略源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多年来的强大政治自信。

一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理想信念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社会的团结纽带。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广大党员干部是党执政的组织行动力量和可靠政治保证。只要我们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高昂的进取精神,就一定能够实现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政治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言:“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做到的。”<sup>①</sup>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政治纽带。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政治前提和组织纽带。这是任何别的力量都无法替代的!

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治国理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执政经验和执政智慧。执政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治国理政实践,使中国共产党积累了足够丰富的处理棘手问题的方法与经验,并逐步形成了现代条件下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因此,中国共产党有充分的信心、有足够的能力、有多种的办法,能够打破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观念机制束缚,在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综合平衡中,稳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实践证明: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

---

<sup>①</sup> 习近平:“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2013年6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5页。

康社会,就一定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可以说,强大的政治自信和高超的政治艺术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现代升华。它使中国共产党在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时,具备了应对各种错综复杂局面和突发情况的政治能力,能够确保在利益格局进行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只要中央政治局坚定这个信心,只要中央委员会坚定这个信心,只要全党坚定这个信心,只要全国各族人民坚定这个信心,不论遇到什么风雨、困难、挑战,我们都能够坚定不移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sup>①</sup>

列宁说,党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历史的担当、复兴的使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和政治胆略,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清前进中的阻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所言:“我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一定要不负重托,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以自己的最大智慧、力量、心血,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sup>②</sup>

---

<sup>①</sup>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0~141页。

<sup>②</sup>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各个方面工作”(2012年11月),《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军队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第114页。

# 附录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 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记

1985 年

1. 1985 年 3 月 11 日, 苏共中央紧急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同时, 重申了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平和进步的方针”)。指出: “今天人类面临的如此可怕的威胁, 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摆脱现状的唯一理智的出路, 是对立的势力谈妥立即停止大气层军备竞赛, 首先是核竞赛, 不允许在外层空间进行这种竞赛。在诚实和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不去企图‘胜过’另一方, 不要求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

2. 1985 年 3 月 13 日, 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前来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外国代表团团长。戈尔巴乔夫在和法国总统的谈话中指出: “我们已经到了该提出这样问题的时候了: 继续走向何处, 是不是到了该停下来考虑做出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 不让世界滑向后果甚至难以预言的核灾难的决定的时候了。”在和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以及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谈话中指出: “苏联将根据对自己作为一个大国的作用和责任, 推行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政策。在全球范围内, 我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 在我们和所有国家的关系中促进国际局势的健康化, 创造条件拓宽国际联系, 拓宽文化珍品和科技成果等的交流。……每个国家都有始终不变的利益。可能在推行自己政策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利益。不能以有力量就有理作为出发点……”

3. 1985年3月27日,戈尔巴乔夫在工作日记中写道:“1985年3月27日。1.质量,2.反酗酒,3.低收入居民……”

4. 1985年4月10日,戈尔巴乔夫接见美国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正处于冰川时期。我们主张苏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我们的这种立场的基点,是我们理解到了,并不存在两国利益必定要发生冲突的任何可能性。而且我们有一个相互的共同利益——避免核战争,保障苏联和美国的,保全我们国家人民的生命……这个出路就是和平共处,承认每个民族都可以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其他的选择是没有的……”

5. 1985年4月23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会议讨论了组织问题,戈尔巴乔夫提议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委员,索科洛夫元帅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获得了全会同意。同时,全会制定了加速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路线,并且第一次对国家对外政策将要发生的变化做出了界定。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说:“我们主张基于真正尊重国际法准则的,平衡的,有分寸的,也可以说是文明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应该十分清楚的是:只有在帝国主义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两种社会体系之间的历史性争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把国际关系引入正常合作的轨道。”

6. 1985年5月8日,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今天唯一理智的出路,是为着大家和平的未来安排所有国家的积极合作,建立、利用和发展可以找到民族、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最佳的相互关系的国际机制和建制。”

7. 1985年5月15—17日,戈尔巴乔夫的列宁格勒之行成了国内轰动一时的政治新闻。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苏共领导人第一次走上街头与群众见面。他对列宁格勒的党员积极分子发表演讲,呼吁听众改变自己的观念:“……最困难的阶段——心理上的改革……当前需要思想大变革……谁无意改革自己的观念……就应当让路,别挡道……”

8. 1985年6月11—12日,苏共中央召开全苏科技进步问题会议。戈尔巴乔夫宣布了改革经济机制构想,它包括加速科技进步、改造国家机器制造业、生产新型机器和设备以及采取高水平的工艺。

9. 1985年6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事变动政策中的关键一环。会议对党和国家最高层的职务进行了重新分配,力量布局发生了变化。戈尔巴乔夫建议由安·安·葛罗米柯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提议由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出任外交部长。

10. 1985年7月1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发言说:明天要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应当讨论一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候选人问题。罗曼诺夫被开除出政治局,谢瓦尔德纳泽由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叶利钦被提名进入书记处。

11. 1985年7月2日,谢瓦尔德纳泽取代葛罗米柯任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被任命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2. 1985年7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3. 1985年7月9日,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召开了党中央机关全体人员大会。利加乔夫作了题为“关于乌兹别克共和国党组织情况”的报告。

14. 1985年7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正在努力改善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关系。我们说,这是我们头等重要的事;我们表示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主动性,目的在于消除怀疑,提高信任。

15. 1985年9月2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吉洪诺夫“因健康原因”退休的决定。会议决定雷日科夫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6. 1985年10月2—5日,戈尔巴乔夫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他第一次使用了“合理足够”一词,宣布与中导协议脱钩,反对把意识形态分歧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

17. 1985年10月中旬,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初步讨论了新的党纲草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在正式会议讲坛上谈到世界的共同性和多样性问题,讲到和平共处,认为这是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发展规律(而不是我们的策略)。

18. 1985年10月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项关于“阿富汗决议”的建议。中心思想是:应该结束这场战争。

19. 1985年10月22日,戈尔巴乔夫到索非亚参加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戈尔巴乔夫指出:“共产主义运动正经历着一个艰难时期。各国共产党尚需认识当代的进程,并制定新的方针……要用理解的态度对待各国共产党的困难,还有许多新问题,不管各国共产党情况怎样,要尊重它们的独立性。”

20. 1985年11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会晤。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这次会晤时说:“国际关系现阶段的特点是各个国家更加相互依存,在这个阶段上需要有一个新的政策。我们认为,新的态度需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现行政策最好能从当今世界的种种现实中吸取营养。这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富有建设性的最主要的前提。这也将会导致改善世界局势。”

21. 1985年12月2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只有政治局委员、负责党的干部政策的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说,他和格里申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谈话,格里申不得不写信,要求退休和进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组。

22. 1985年12月24日,叶利钦取代格里申就任莫斯科市委书记。

## 1986年

23. 1986年1月16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向无核世界前进的声明。

24. 1985年2月18日,叶利钦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25. 1986年2月22日,戈尔巴乔夫召开将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对外政策方针的“小范围”讨论。指出:“世界是多维的。这使我们想起列宁:在他的论述发表100年之后,我们又重新来理解他关于社会利益往往高于阶级利益这个论断。……我在谈话中多次反复提到世界多维性、它的多样性和多种特点的问题。这是正确的态度。确实应该认识处于各种内、外相互关系中的整个世界。如果对这个共同的东西认识不清,我们就不能制定对内和对外战略。和平共处在每个阶段都要求我们对它做出评价。从这一点出

发,我们不仅要制定对外政策方针,而且还要通过宣传和执行政策来加强它。最要紧的是,我们抓住了转折时刻,并据此制定了我们的路线。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主要的趋势和主要的方向上不犯错误。什么是新思维?要有根据地回答这个问题。四月全会后差不多过去了一年。事情进展得不那么快,但有进展。我们不是上帝,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知道答案。在我们上层信息更多一些。我们更明白需要进行深刻的改革。应该带着这些考虑去参加代表大会。但还有另一种情况。要知道在二十四大上也讨论过正确的东西。这些东西讨论了多少年了,可是始终还是没有实行。出现了新的一族,他们废话连篇,成天谈论新思想而不干工作。而我们需要的是一起‘惹出了麻烦’和准备走到底的志同道合的人。”

26. 1986 年 2 月 25 日—3 月 6 日,苏联共产党第 27 次代表大会召开。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坦率地承认党活动中的问题和缺点:“多年来,不仅由于客观因素,而且首先由于主观方面的原因,党和国家机关的实际行动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和生活本身。国家发展中问题增加的速度甚至快于解决的速度。惰性、管理形式和方法僵化、工作动力下降、官僚主义增长,所有这一切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小损失。社会生活中开始显露出停滞现象。形势要求变革,但是在中央机关以及地方上,一种独特的心理开始占上风:最好改善现状,但什么都别动。不会是这样的,同志们……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不能回避。采取这种立场会使国家、国家机器和党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让我们大声地讲这个问题!”

27. 1986 年 3 月 13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党的最高领导成员的职责进行了重新分工。戈尔巴乔夫亲自掌握政治局工作的组织、内外政策的基本问题、干部配置、总的经济问题、国防和国家安全、外贸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部——组织和党务部、公共部、经济部、行政机构部、国际部、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国外干部工作部、事务管理局。

28. 1986 年 3 月 24 日,戈尔巴乔夫会见法国大使让·贝尔纳·雷蒙。他说:“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行动,这绝不是政治游戏,不是战术上的步骤。这是我们的战略,它符合我们的利益,符合人民、民族的巨大利益……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将进一步优先考虑欧洲和欧洲方向。我们正是将这样

去做。”

29. 1986年3月24日,戈尔巴乔夫就暂停核试验问题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他对局势作了这样的分析:“很难说新思维将什么时候出现。但是它将出现,而且甚至可能迅速地突然出现,因为生活使我们懂得这一点。历史上曾有过许多局势出现突变的先例……我们是被迫中止暂停核试验。我们不能就这么简单地宣布中止暂停核试验。我们不能不考虑来自全世界最广泛的各界人士对我们这一行动巨大的支持浪潮……‘星球大战’计划自然使我国人民感到不安。对此我考虑过,并与我的同事们讨论过:也许不要再害怕‘星球大战’计划?……当然,在对待这一危险的计划方面,我们不能漠不关心。但还是不应该有自卑心理。要知道赌注正好押在苏联在精神、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害怕‘星球大战’。因此,也就在这个计划上使劲,以便拖垮我们。我们决定说:是的,我们反对‘星球大战’计划,因为它使和平变得更加不稳。但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害怕的问题,而是责任问题,因为后果将不堪设想。‘星球大战’计划不会巩固安全,而只会破坏尚能成为安全因素的残余……我决定再次指出,我们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回答将是有效的。美国指望我们将建立类似的武器系统,希望在技术上同我们拉开距离,并利用技术上的优势。然而我们苏联领导人懂得:为了消灭‘星球大战’武器系统,只要有10%的费用就足以反对这种武器的体系了……”

30. 1986年4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继续谈了自己的这些考虑:“二十七大非常正确地确定了对美国的方针:尽管我们两国关系充满矛盾,而现实是,没有他们,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同时,没有我们,他们也将无所作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没有美国,我们不能保持和平。我们承认他们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强有力的脚步。我们的分析是严肃的、有理论依据的和政治性的,它表明了我们对美国的尊重。这就是我们的资本……我们向全世界提出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承认的是美国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霸权主义要求。这就是我们的‘实力地位’……我们不能对美国根据‘以牙还牙’的原则制定的政策做出反应,说什么既然我们是‘罪恶帝国’,那你们也是什么什么,等等。我们的现实政策比任何宣传都强。而宣传应该保障另一点——表明我们的政策是现实主义的和无私的,

表明我们也考虑别人的利益……”

31. 1986年4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改革碰上的绊脚石是庞大的党政机关,它们就像一座座拦河大坝,横亘在改革的道路上。必须对各级干部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32. 1986年4月26日1时23分50秒,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

33. 1986年4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非常会议。

34. 1986年4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消除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事故后果问题的行动小组。其成员有:雷日科夫(主席)、利加乔夫、切布里科夫、多尔吉赫、苏联内政部长弗拉索以及雅科夫列夫。

35. 1986年5月,苏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关于雅库特民族冲突问题的汇报。中央书记处关于这场风波问题的专门决议指出:“这些不良表现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没有用苏联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教育青年,思想教育工作严重薄弱,忽视了民族关系中的某些积垢。党没有关注民族交往问题。对不尊重其他民族的事实往往没有及时给予坚持原则的批判。州党委对一部分社会学家、大学教师以及作家中的不健康情绪没有采取坚持原则的立场。他们相互指责,对雅库特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缺乏科学评价、相互扣民族主义帽子,甚至相互侮辱,所有这一切都对大学生和青年的情绪产生了负面影响……”

36. 1986年5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正统的思想意识妨碍了我们的工作。所有与我们不同的或者我们感到不习惯的东西,都会引起怀疑,对这个或那个活动家是否正派、能否真诚地同他处事产生怀疑。应该停止这样做了。承认选择道路的自由,应该成为实际政策的方法,而不是宣传口号。

37. 1986年5月1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话讲话,介绍切尔诺贝利灾难。

38. 1986年5月23日,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外交部主持会议,讨论“新思维”。

39. 1986年5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议讨论清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的措施。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我们见到了司空见惯和令人吃惊的不

负责任的态度的影响。应该十分严格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处在本国人民和全世界的监督之下。已经发生的事件关系到所有的人。在这儿我们看到了本位主义的后果：人们看待问题时不能超越自己的直接技术责任。而大家都应该知道，谁要是玩忽职守、道德败坏，谁就别指望得到宽恕。我们什么都不会规避。要给轻敌思想最沉重的打击。我们要对全世界公开宣布所发生的事情……在科技革命时期，决定性的因素，是纪律、劳动素养、专业知识和责任心一切都要按科学办事。”

40. 1986年6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消除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事故后果问题行动小组召开第21次会议。会议批准了《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与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4号机组事故原因和消除事故后果有关问题的指示》。

41. 1986年7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原因进行了第一次广泛的讨论，提出了核动力的前途问题。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30年来一直听到你们这些学者、专家和部长说，那里一切都很可靠。你们指望我们像敬神一般看待你们。而结果却轰然垮塌了。原来有关部委和科学中心并未加以监督。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人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政治局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信息应当逐渐增多，以免造成恐慌，从而带来更大的危害。但是另外一种观点占了上风：有关信息随到随即发表，原原本本，不加限制。戈尔巴乔夫明确说：“无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还是向社会舆论说明情况时，我们都绝不同意隐瞒真相。我们有责任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估并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现在是在全国和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工作的。谁要以为可以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提供与事件有关的全面信息。”

42. 1986年夏天，戈尔巴乔夫在会见中央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时首次做出结论说需要革命。“改革——这是革命，是思想、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整个上层建筑、所有方面的革命。”然而他继续视党为革命的“先锋”，并指望它，也只有它能在所有方面——从经济到文化——从事改革的事业。也就是说这里所指的是“来自上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在上述会议上说：“干部

政策——这是现在问题中的问题。不在党内进行‘小规模的革命’，什么事都做不成，要知道党的机关掌握着现实的权力。而我们培养党的干部——有的是已腐朽的老一套办法。在选择干部和干部晋升问题上也是这样。能干的领导人从区委开始培养，而权力不能造就出色一些的人……我们应该经常记住有关一党制的代价。如果无人监督和不会监督的话，党的工作者会变成官吏……如果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那就一切都完了。应该记住，我们刚刚开始这个进程。这涉及党、国家机关、军队、警察局、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到处都需要改革。而党应该既在思想上、又在行动上做出榜样——原则性和坚韧性的榜样。现在明白了召开关于干部问题的全会是多么必要。”

43. 1986年7月18日，戈尔巴乔夫在与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会见中说：“世界处在独特的十字路口，事态将怎样朝前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美关系的状况……正是我们两国巨大的军火库，其中包括核武器库的存在，是今日世界最严峻的现实。如果我们从错误的前提和理由出发，来建立我们的相互关系政策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的话，那么，事情会发展到对抗的极点，以致会给我们大家和全世界带来最悲惨的后果。我想强调说，在苏联社会，而且不仅在领导层，形成了坚定的信念——寻找苏美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找到和扩大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以便最终建立友好关系。……要知道现在形成的是离奇的局势。甚至如果一国将不断地搞武装、扩充军备，而另一国什么也不搞，那么，搞军备的那个国家也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要知道较弱的一方会干脆地引爆所有自己的核弹头，甚至在本国的领土上，这对它自己将意味着自杀，同时也意味着慢慢地杀害对手。所以您说的要取得军事上的优势是无稽之谈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甚至如果美国政府不再对解决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我们是不会让它得到安宁的。”

44. 1986年7月24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关于党的作用问题继续讲话：“所有领域都面临着巨大的改革，但是要从党开始。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原则，而且还因为不这样的话，将一事无成。要改革一切东西。也要改造党。这是具有历史规模的任务，并会有巨大的影

响。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不要怕这个词。”

45. 1986年7月底至8月初,戈尔巴乔夫视察远东。这次巡视带来的更多是失望:戈尔巴乔夫感到人们期待着巨大和迅速的变革,他们充满了热情。但是特别让人感到失望的是,不管是这些人,还是各级领导人,都不会、不知道、也不想按新的方式来做任何事情。戈尔巴乔夫说:“谁也没有现成的药方,政治局没有,政府也没有。大家都要去想,大家都要学习、试验、冒险。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开始!在工作里会领悟到真理。主要的是一切都要凭良心办事,每人都要负起责任,努力战胜自我。我们对缺乏公开性和批评的局面已有所习惯。这里涉及的既有普通的工作人员,也有主管人员。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民主,而现在应该运用它和重视它。如果有人开始折腾人们、把他们的积极性变成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那么,这些人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要给地方新闻部门充分的自由。公开性——这就是社会主义……从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来说,这是真正的革命事业。……很多东西要取决于领导人自己的行为。我们将坚决反对把职权看作世袭领地、看作对权力和真理的垄断的态度……”

46. 1986年9月22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推行我们的路线方面谁也不会帮我们。因此,一方面应该清醒地评价美国人反对我们的行动,同时还要执行理智的坚定不移的政策。我们再次试图让里根参加新的会晤,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47. 1986年9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炮打司令部”的口号。

48. 1986年10月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葛罗米柯公开反对“新思维”。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必须“力求正确解决每一个与为苏联人民服务有关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远非阔绰,还不富裕。是的,我们解决了涉及人的社会地位的主要问题。我们给了人民劳动权、受教育权、居住权、保健权(尽管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以及基本生存权——能在和平中生活的权利。这是我们给予人民的最主要的东西。但是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还很落后。新的任务,加速和改革的任务,使所有这些问题更加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产生了不少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问题。”

49. 1986年10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在关于价格讨论时指出:“所有这些动摇了财政制度。其结果是开始向居民借贷和拼命发行货币。工资与劳动生产率脱节。发行的钱币多于商品。现在的局势使我们喘不过气来。人们不再工作。事实上,如果用工资买不到任何东西的话,为什么要去挣工资,为什么要劳动呢?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某些人要求提高物价。我们不会这样做。人民从改革中还未得到任何好处,也未感觉到改革使他们在物质上有所提高。如果我们提高物价的话,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我们就会使整个改革威信扫地……”

50. 1986年11月1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说:“如果我们将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就不得不打20年到30年的仗!‘奇怪的战争’——不久就会给我们粘上这个词汇。六年来我们没有学会打仗!大家都懂得在哪儿可以摆弄一个坦克军!而那边是另一种战争……就像在越南、安哥拉、莫桑比克一样。人们合情合理地问:我们将结束战争还是彻底地甚至在军事计划方面蒙受耻辱?”戈尔巴乔夫发表愤怒的讲话是针对所有负责阿富汗问题的人的——在莫斯科这里,在当地那边:“我们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帮助加速争取一个友好的(?)中立国家的进程,然后从那里撤离。我们没有想在那里搞社会主义。我们不希望美国在那里驻扎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基地。如果那里没有机场、基地和军营,剩下的一切就由阿富汗人按自己的意愿去安排吧。对此谁也无能为力……可有些人却想一切都由自己来包办,而他们的阿富汗伙伴只能在他们面前‘俯首听命’!战略目标是在一年、最多两年之内结束一切……并撤出军队。”

51. 1986年12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讨论有关干部问题的中央全会的筹备工作时说:“大家以为不会那么艰难,却原来是艰难的——在经济方面、在社会领域、在党的自身、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甚至——在党内。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头,厉害的还在后头……存在着对改革工作的结果的悲观主义。守旧思想、满不在乎、消极怠惰、不愿走新路压倒一切。这些陋习已蔓延到社会,但还未能引起社会的波动。有人认为,我们过分坚决、过分严格、过于急躁。而局势就是这样,我们不能慢慢腾腾的,生活迫使我们加快节奏感。这里就产生了干部问题。它具有关键的意义……如果不创造公开性、

批评的气氛。我们就不可能造就真正的干部。‘上流社会的秘密’会带来损害……干部问题——这是进行领导的道德权力问题。而在我们党的机关里，累积了许多这样的问题，它们削弱了在其他领域调动干部的可能性。也不要害怕正视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情况……社会民主化——这是最困难的过程，我们所有的人似乎都‘赞成民主化’，而当我们自己应该实行民主化时，才感到非常困难。因为这涉及每个人的威信问题。每个人都怕：这场民主化是否会影响我的地位？”

52. 1986年12月10日，在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宣布了关于萨哈罗夫的问题。

53. 1986年12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因年龄和健康原因提出辞职。

## 1987年

54. 1987年1月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进度缓慢的原因在于干部政策和管理机构的错误。戈尔巴乔夫指出：“就拿我们的选举来说吧。投票箱的安置或者领取选票的地方的安排，应该可以做到不会产生任何秘密投票的问题。国外的人士总是指责我们，说我们这儿是没有选举的选举。而问题不仅在于选举的行为本身，应该仔细了解整个过程。主要的是——选举就应该是选举，而现在是没有选举。大家投了选票——就回家了，至于对那里将出现什么结果都无所谓。滋长了漠不关心的态度。”

55. 1987年1月27日至28日，召开了称之为“关于改革和干部政策”的苏共中央全会，后来它被评价为改革时代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它表明了戈尔巴乔夫和国家政治领导人继续改革的意向。戈尔巴乔夫的报告重申了“社会中危机现象增长的危险性”，并力图指出这些危机现象产生的原因。总书记阐述改革性质时，认为它首先是完善社会主义的新阶段，而完善社会主义应当依靠群众，依靠发扬民主，依靠加强经济，依靠坚决地转向科学……

干部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党内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问题，在全会上得到了一致赞同。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召开战后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的原则性决定。

56. 1987年4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在改革之初我们说过，我们给人们一次机会，而现在两年过去了，我们提出问题：这些或那些干部是否有能力按需要办事？有一类坐而等待的人，他们的无所作为败坏了改革的名声。所以谈话和说服教育已经够多的了。应当撤换那些不愿改革或不称职的人……中间环节的抵制……为什么？因为公开性表明：国王是光屁股的，而我们应当考虑，我们为什么要让光屁股的国王待在领导岗位上……在两年之后，我想这样说：愿意改革的人已经改变了，而不愿改革的人永远也不会改变了，这种人应当撤换。”

57. 1987年5月6日，莫斯科爆发了真正的一次群众性游行。叶利钦会见了游行群众。这一举动破坏了党的全部戒律，使他的地位变得非常脆弱。

58. 1987年5月28日，德国飞行爱好者马蒂亚斯·鲁斯特驾机闯入苏联领空。国防部长谢·列·索科洛夫因履行职责不力，被解除职务，稍后又被免去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德·亚佐夫接任他的职务），约一百五十名将军和军官受审判或被免职。

59. 1987年5月30日，亚佐夫取代索科洛夫成为苏联国防部长。苏联空军总司令和许多将军被解职。

60. 1987年6月25—26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将民主和经济改革挂钩；雅科夫列夫进入中央政治局。

61. 1987年6月29日，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在呈送的一份报告中对试验进行了初步总结：选民对州、边疆区代表投反对票的人数是以往选举的9倍，当局第一次遇到大批选民不到选举站，其中包括“无故”不到选举站投票的情况。

62. 1987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了专门研究经济改革构想的全会。全会还通过了另一项重要决定——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应当根据一月全会的决定筹备，即采用民主程序——按差额原则提出候选人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

组成发生了变化。雅科夫列夫、斯柳尼科夫和尼科诺夫成为政治局委员。原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元帅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接替他的是新任国防部长德·亚佐夫。

63. 1987年9月10日，叶利钦和利加乔夫在政治局发生冲突。

64. 1987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围绕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发生了著名的“叶利钦事件”。

65. 1987年11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隆重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会议上作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里面谈历史的部分篇幅很长。后来戈尔巴乔夫本人冷静地对它作了评价：“……报告中有局限性的痕迹。有些东西我们有意识地决定不提……报告经过充分斟酌，依我说有些地方非常谨慎，但是两方面的‘极端人物’都不满意。一些人认为，批判性地分析过去是‘抹黑’……而另一些人则强调说，他们的期望值更大。”

66. 1987年11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列·尼·扎伊科夫接替叶利钦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67. 1987年11月11日，莫斯科市委举行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亲自在会上定了调，与会者竞相侮辱被“灌”了药用汽车拉到会场来的叶利钦。

68. 1987年11月1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戈尔巴乔夫指出：“第一，……叶利钦实质上对改革发起了进攻，对改革的速度和性质表现出不理解。更有甚者，他从蛊惑人心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工作的问题，受到全会的一致谴责。总而言之，应当首先对他进行政治谴责，然后再谈第二个问题，即所谓递交辞呈问题，必须指出，大家并不支持他，虽说当初支持过他，那是在最初阶段，高呼口号的时候，后来就不再支持他了。”

69. 1987年11月18日，叶利钦被任命为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70. 1987年12月1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上作了关于访问美国的报告。他说：“在华盛顿，我们也许第一次这样明显地在国际政治中感觉到什么叫人的因素。在这之前我们只满足于一句老生常谈：在对外政策中国家领导人政府首脑之间的个人接触以及总的说在决策者层次上的交流很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这背后大家仍然认

为,这里说的即使是个别接触,但也是对立阶级的和不可调和的制度的代表人物并且仅仅是‘代表人物’之间的接触。对我们来说里根仅仅是美国资本主义和军工集团最保守的一部分人的代言人。不管怎么说,政治家、包括国家领导人,如果他们真的是有责任感的人,他们也会体现最普通老百姓的那些单纯的人的品质、利益和希望,这一点也是有意义的。特别是体现那些在选举中投了他们的票的人和同胞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个人才能有关系的人的利益和希望,还有国家的尊严和爱国主义。因此他们也有可能遵循最正常的人的动机和感情。我们时代的所有这一切,对做出某种政治决策看来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对此作好了准备——自己也想往这方面努力——以便响应与美国领导人这方面的接触,以及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接触,也就是把直接意义上人的因素带进国际大政治中去。这也是新思维的重要细节。它也提供了自己的成果。这一点我们在华盛顿好像第一次如此明显地感觉到了。”

## 1988 年

71. 1988 年 2 月 8 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计划从阿富汗撤军。
72. 1988 年 2 月 18 日,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被开除出政治局。
73. 1988 年 2 月 21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迅速恶化的外高加索局势。
74. 1988 年 2 月 29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国防部长德·亚佐夫元帅在汇报发生的可怕事件时,讲了这次野蛮暴行的详细情况。根据国防部长亚佐夫的命令,一所军校的学员开进苏姆盖特制止动乱。政治局内发生了争议:要不要在苏姆盖特宣布戒严?拉祖莫夫斯基坚持调兵和戒严。亚佐夫犹豫不决:如果实行戒严,就意味着部队有权开枪。不过他倾向于实行戒严。戈尔巴乔夫像往常一样,试图找出某种妥协办法。他说:“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政治解决上……在阿富汗我们一事无成,而现在怎么办?发动一场国内战争?”
75. 1988 年 3 月 13 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列宁格勒技术学院教师

尼娜·安德列耶娃的信——《我不能放弃原则》。这篇文章出现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夕，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被人称作“反改革力量的宣言”。

76. 1988年3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以及使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局势正常化的一些紧急措施”问题。戈尔巴乔夫说：“如果我们站在社会主义利益的立场上，站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立场上看待这些事件，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它关系到国家兴亡。我想，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亚美尼亚的范围。我们面临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事关我们多民族国家命运，事关我们由列宁奠定的民族政策……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治标不治本，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只要息事宁人就行。现在我们也许没有估计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应当坦率地说，同志们，对危险性估计不足。要知道，我们在克里木鞑靼族人和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中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

77. 1988年3月24—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追究这篇《我不能放弃原则》闹得满城风雨的文章的发表经过。这次会议的积极参加者维·伊·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打开了话题，说这篇文章非同寻常。它带有破坏性，旨在反对改革。不清楚它是怎么出现在报纸上的。中央有没有人看过？戈尔巴乔夫强调说：据我得到的消息，有人看过，据说在发表之后甚至建议在党组织内讨论这篇文章。这是什么意思！”戈尔巴乔夫认为，这篇文章是“反改革纲领”，它发表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所以更具有危险性。

78. 1988年4月11—18日，戈尔巴乔夫分三次召开了全国州委书记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会议。每个会议均有50人参加，就是说总共有150名党的“将军”、党的主力参加。形式上日程安排是准备党的19次代表会议，实际上是解释对尼娜·安德列耶娃文章所采取的立场。1988年4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与州委书记第一次会见时讲道：“苏共的民主化。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性质和作风具有决定性意义。要不要有一个如此庞大的中央委员会？须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按职务原则组成的。一个人刚开始工作，我们就把他送进中央委员会，按其职务几乎是将军级的。应该好好想想

这一点。还有一个职务上任职的年限问题。社会要求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这些党员不应去关心‘我’如何成为这个体制的一员，我能否进入这一体制。应该想想国家……”“我们必须明确建设法制国家的任务。我们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思想。这个思想的核心是大家以法为根据，包括政治局。须知，坦率地讲，党不是通过民主的途径取得它现今的地位的。这一点不仅在西方有人，而且我们的法学家早就‘批评’过了。情况说明，我们是首先破坏法律的。谁应该首先遵守法律呢？以及遵守‘自己的’党的原则呢？难道不是党吗？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没有像我们的党有的那种权力，而制约只有一个——良心和党性。但是正如历史表明的那样，仅此一点是不够的。法律面前人人应该平等，而我们这里事情演变到人们可以把法官本人传唤到州委去，向他指示，此案如何审理，彼案是否应该审理……”“全世界都在批评我们，说我们的党不顾法律管理国家。因为政权只是由社会中一部分人选出来的。而且是现实政权。”

79. 1988 年 5 月 27 日，提倡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苏共十九大“论纲”发表。

80. 1988 年 6 月 28 日，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开幕，它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苏维埃政治体制的改革途径。在戈尔巴乔夫作为总书记实施的所有政治措施中，这可以说是最激进的改革措施。戈尔巴乔夫在代表会议上讲话时，号召实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社会进一步民主化和经济变革，号召扩大公开性范围。他认为美国可能想把苏联拖入军备竞赛，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形势，他坚持党政职能和经济管理职能分家。

81. 1988 年 7 月 4 日，苏共代表大会公布支持政治改革的决议。

82. 1988 年 7 月 25 日，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外交部会议上，反对将阶级斗争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

83. 1988 年 8 月 5 日，利加乔夫在高基市的一次演讲中捍卫阶级斗争学说。

84. 1988 年 8 月 12 日，雅科夫列夫在立陶宛维尔纽斯的一次演讲中宣扬“人类的共同利益”。

85. 1988 年 9 月 8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就机构改革问题作了讲话。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形成了一种传统，一种不好的

传统,行政命令体制产生的传统,党包揽一切。我指的是政治局通过了大量的具体决议。人们已经习惯于认为,如果中央委员会不做出决议,那么谁也做不成什么事。每走一步都要有决议。党的高层决定一切。这种做法应该结束……同志们说得对,机关的改革,特别是党中央机关的改革,最直接地触及权力职能的根本革命性的改变和群众的政治主动性的解放。不进行机关改革和机关职能的转变,我们就不会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任务。即争取使国家权力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机关改革与法制国家的形成有关。我们社会和国家中的所有结构都应该在法律的基础上,即在法律的范围内运作。任何人都无权超越法律的界限,违反法律。有人已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最主要的法律破坏者就坐在这里,坐在这张桌子旁。已形成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86. 1988 年 9 月 30 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利加乔夫和切布里科夫获得新任命,雅科夫列夫主管苏共中央国际部。

87. 1988 年 10 月 1 日,戈尔巴乔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被选举”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88. 1988 年 10 月 13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说:“总的说,情况还没有危急到需要敲警钟的地步。但是也不应简单化。在民主和公开性条件下这样的进程是很自然的。早已形成的许多脓疮被挑破了……由于对共和国事务进行的‘兄弟干预’,人们形成了一种印象,他们给中央的多,而得到的却少。还存在全苏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共和国范围内解决不了。但是应该加以解决。我们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有别人按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反对族际主义和反对我们的联盟。当我们犹豫不决时,有人就会搞投机。”

89. 1988 年 11 月 3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进行上层改组以后,戈尔巴乔夫决定结束新思维政策和军工综合体的实际工作之间日益脱节的状况,在改革的三年时间里,军工综合体的工作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改变。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强硬发言:“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庞大的军队?……在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我们谈到了这个很久以来一直使我们不安的这一话题。在报告中、在党代表会议之前的提纲

中、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中,都说了我们需要质量,而不是数量。现在到了需要采取重大决策的时候了……我们宣布的军事学说与我们在军事建设中所做的不一致。要知道,如果我们公布实情:我们在军事需要上花的钱要比美国多1.5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为军事目的花的钱按人均计算比我们多,而我们把武器大批提供给‘不发达’国家,却得不到任何回报。如果我们把这一情况公之于众,那么所有我们的新思维和我们整个新的对外政策就要完蛋……如果我们和军队一切完全保持原状,我们就解决不了改革任务。最好的科技力量、最好的生产基金依然被送到那里,对那里依然是有求必应的供应……如果我们大家都同意,如果我们决定采取重大解决办法,不仅按照中短程导弹条约和维也纳委托书,而且包括单方面裁军,那么我想在联合国发言时宣布这一点……大家都将看到我们不是在说废话,而是在为和平做实事。主要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做,是为了改革……不裁减军队和军工综合体,我们不能胜任改革的任务……”

90. 1988年11月16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宣布独立,并控制国家财产。

91. 1988年11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宣布爱沙尼亚控制该共和国国有资产的行动无效。

92. 1988年12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新立法,准许公开选举和无记名投票。

93. 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宣布单方面裁军,强调“人类的共同利益”和“自由选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94. 1988年12月27—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指出:“我们在贯彻路线、倡议、落实新思维方面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同志们,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提出的建议已成为强有力的因素,对他们触动很大,它使许多人猝不及防。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对,不仅考虑周到,而且提出了实施计划的策略。我们没有坐等谈判,而是主动出击。……我们这样主动出击使美国政界的保守分子惶惶不安,忧心忡忡,甚至畏惧。不光美国人,撒切尔夫人也是如此。他们议论纷纷,无非是想压低期望值,散布怀疑情绪,阻挡摧毁‘冷战’根基的进程……”

## 1989 年

95. 1989 年 3 月 26 日,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在全国结束。叶利钦在莫斯科大获全胜。

96. 1989 年 3 月 28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事指出:“党通过改革政策培植自己的威信,不是用威胁和恐吓,而是采取公开贴近人民、而且号召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的方法。现在应当去争取另一个阶段的威望了,这是一个办实事的阶段,‘堵住人家的嘴巴’是得不到威信的。选举表明,改革需要维护,但维护的办法只能是深化和发展。现在,主要的就是办实事。不能光围绕自我分析转圈子,也不能成天价陷于内疚自责。我们应该让人们感觉到,对于他们所批评的那些弊端,我们是会作出回应的。我们准备满怀信心地、平稳地行动起来。我们将以此去迎接代表大会的召开。”

97. 1989 年 4 月 25 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关于选举问题,一部分人认为,选举结果对党和他们自己都糟透了。另一些人谈及此事时明显带有指责领导的语气,觉得是上面要进行民主实验而“把事情搞到了如此不成体统的地步”。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对于党来说,当前主要的就是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掌握新方法,“到人民中间去”,到群众大会上去,不要光坐在办公室里,要学习在民主条件下工作。葛罗米柯宣读了 110 名领取养老金者申请自愿退职的一封信。

98. 1989 年 5 月 22 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应该经代表大会批准的最高国家职务的候选人:即他本人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并兼任总书记。

99. 1989 年 5 月 25 日—6 月 9 日,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上讨论了谁该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一问题。据投票结果,戈尔巴乔夫获得了绝大多数选票,支持者 2123 人,反对者 87 人。

100. 1989 年 7 月 29—30 日,跨地区议员团在莫斯科电影之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帕尔姆、波波夫、萨哈罗夫先后担任该议

员团的主席。跨地区议员团纲领的基本原则是：承认私有制，包括土地私有制；权力分散；各共和国经济独立，加强各共和国的主权。

101. 1989 年 9 月 19—20 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当前形势下党的民族政策》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苏共的纲领性文件《当前条件下党的民族政策》的提纲。全会对政治局和书记处进行了改组，解除尼科诺夫（负责农业）、切布里科夫（负责司法安全部门）、谢尔比茨基（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解除索洛维约夫（前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塔雷津（驻经互会代表）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提升政治局候补委员克留奇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马斯柳科夫（国家计委主席）为政治局委员，提升普里马科夫（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普戈（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另外，还有 4 名州委书记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决定二八大提前到 1990 年 10 月召开。全会还作出专门决议，否定利加乔夫受贿的指控。

102. 1989 年 10 月 10 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这次会议专为研究党的第 19 次代表会议关于即将恢复的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决议的执行问题。

103. 1989 年 12 月 9 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发表讲话。他强调，将同企图贬低党的作用、破坏党的威信的做法作坚决的斗争。在谈到修改宪法第六条的问题时，戈尔巴乔夫说，在已经开始的新宪法制定工作的范围内，任何一条都可以修改或取消。但政治改革的经验表明，宪法第六条本身并不妨碍实行自由选择。

104. 1989 年 12 月 12 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戈尔巴乔夫拒绝讨论废除宪法第六条，并将萨哈罗夫带下讲台。

## 1990 年

105. 1990 年 1 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并实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财产法》。根据该法律，俄罗斯联邦恢复了私有财产。

这是同苏维埃共产主义经济关系的彻底决裂。

106. 1990 年 1 月 22 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议程是一个问题——讨论“苏联共产党行动纲领”(取代党纲)草案。

107. 1990 年 2 月 5—7 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 通过了苏共中央提交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决定修正宪法第六条, 消除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108. 1990 年 3 月 4 日, 举行了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的选举。在竞选活动中, 叶利钦号召取消宪法第六条, 该条宣布苏共为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

109. 1990 年 3 月 7 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例行工作会议。戈尔巴乔夫对总统职位有巨大兴趣, 他每时每刻都在怀疑自己的老战友们不够忠实, 而且会注意到他对现实情况的不切合实际的理解。

110. 1990 年 3 月 11—16 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决定将有关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作为立法倡议提交代表大会审议。

111. 1990 年 3 月 13 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修正宪法, 建立总统制, 修订宪法第六条, 以消除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112. 1990 年 3 月 14 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总统。

113. 1990 年 4 月 3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退出苏联法。

114. 1990 年 4 月 19 日, 最高苏维埃向苏共领导发了一份《苏联最高苏维埃所收信函简评》。这份材料称: “……寄信人——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知识分子代表、工人、村镇居民、战争老兵和老职工, 都强烈谴责利用意见多元论来败坏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原则、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声誉。……为什么对社会主义的攻击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呢? 为什么党沉默不语? ……”

115. 1990 年 5 月 15 日, 在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 米·谢·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 还保住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同时宪法第六条被取消了。

116. 1990 年 5 月 29 日, 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117. 1990年6月8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宣布主权独立,其法律优先于苏联法律。

118. 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同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保障新闻自由。

119. 1990年6月19—23日,俄罗斯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改革政策的批评家伊·波洛兹科夫为第一书记。

120. 1990年7月2—13日,苏共二十八大在莫斯科召开。戈尔巴乔夫再次当选为总书记。

121. 1990年7月8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并通过了新建立的俄罗斯共产党书记库普佐夫的简要报告。该报告的名称为《如何看待各种政治组织和运动所发挥的主动精神及其实施的行动》。报告的实质是:确信各反对派势力正在准备于最近几个月夺取全国政权。

122. 1990年7月12日,叶利钦在党代会上以富有戏剧性的演说提出退出苏共。

123. 1990年8月2日,戈尔巴乔夫颁发《关于制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联盟纲领作为联盟条约基础的总统令》。

124. 1990年8月10日,苏联总统办公室领导人博尔金向戈尔巴乔夫呈报了一份《近期劳动者来信简评》。大部分来信请求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整顿秩序,恢复过去“改革之前的”有价值东西。

125. 1990年9月1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试图证明,党应该学会在有反对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他说:“如果我们想在新的条件下成为积极的政治力量,那就请你们注意,运用陈旧的强迫方式,我们将一无所获,只会使自己完全彻底威信扫地……我不止一次讲过这一点,然而在吸取经验教训上,我们大家都是慢慢腾腾的。大家大概都怀念过去……应该变革经济。还应该变革政治程序,摆脱无用的经济军事化,实行非常强大的结构政策。如果连这一点都弄不懂,那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舒适方便,自己的利益好处。”

126. 1990年9月19日,苏共中央召开关于民族问题的全会。全会通过

的决议承认在对待各民族群体的方法上存在严重缺点,呼吁建立一个“革新的联邦”,同时,它特别明确拒绝为建立一个真正的联邦而改变政党结构。

127. 1990 年 10 月 1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信仰自由法。

128. 1990 年 10 月 9 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议程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下的国内形势和苏共的任务》。苏共中央的立场一清二楚:需要的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政治决议,目的就是“加强同反共产主义、极端主义势力的破坏行为作斗争”。

129. 1990 年 10 月 9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立法,确立多党制。

130. 1990 年 10 月 20—21 日,莫斯科最大的俄罗斯电影院举行了“民主俄罗斯”运动的成立大会,从而完成了该运动的组建手续,成为它发展的最高点。

131. 1991 年 11 月 14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例行会议召开。“联盟”议员团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苏联总统作工作报告。总统的活动和政府的工作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132. 1990 年 11 月 16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加强总统垂直管理体制,改组政府,撤销总统委员会,暂缓进行联盟条约的准备工作,作好在全国采取紧急措施的准备。

133. 1990 年 11 月 17 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了改组政权的纲领——新闻媒体称其为“八条”。总统宣布,部长会议改组为内阁,由他本人管理。显而易见,这就要求即将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必须解除雷日科夫的职务。总统委员会很快就被取消了,代之以安全会议。加强总统权力的计划和采用强力手段保存苏联的打算使戈尔巴乔夫赢得了一天以前还攻击过他的“联盟”议员团的支持。

134. 1990 年 11 月 17—18 日,俄罗斯共和党成立大会召开。

135. 1990 年 11 月 24 日,新联盟草案公布。

136. 1990 年 12 月 1—2 日,俄罗斯民主党成立大会召开。

137. 1990 年 12 月 17—27 日,苏联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一系列苏联宪法修正案,解决了将苏联部长会议改组为苏联内阁的问题。同意增设苏联副总统职务。12 月 24 日,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

《关于新联盟条约的总概念及其签署程序》和举行关于联盟命运的全民公决的决议。

138. 1990 年 12 月 20 日, 谢瓦尔德纳泽辞职, 警告“独裁正在形成”。

139. 1990 年 12 月 25 日, 雷日科夫总理因心脏病而离职。

140. 1990 年 12 月 26 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宪法第六条, 改组政府, 赋予总统更大权力。27 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第二轮投票中选举根纳季·亚纳耶夫为副总统。

141. 1990 年 12 月 30 日, 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中央第一书记和各共和国、边区与州的党委第一书记的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苏共副总书记伊瓦什科作《论当前时机与党的任务》报告, 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党丧失了领导权。

## 1991 年

142. 1991 年 1 月 7 日, (拥护苏共纲领的)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按照苏联的一贯做法(“根据劳动者的请求”), 要求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共和国实行总统直接执政。

143. 1991 年 1 月 10 日, 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在立陶宛境内完全恢复苏联宪法的效力。与此同时, 戈尔巴乔夫指示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在维尔纽斯使用武力。“阿尔法”特种分队的一个小组被派赴立陶宛首都, 该小组应该与国防部和内务部的分队共同行动。

144. 1991 年 1 月 11 日, 民族拯救委员会的“工人义勇队”和这些分队一起占领了“出版之家”——立陶宛苏共中央出版社。

145. 1991 年 1 月 12 日夜间, 苏军和国家安全分队占领了维尔纽斯电视中心。

146. 1991 年 1 月 16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 于 1991 年 3 月 17 日在苏联全境举行全民公决。提交给全民公决的问题是这样表述的: “您是否认为

有必要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革新了的平等主权共和国联邦——它将完全保证任何民族的人的权利和自由——予以保留下来?”

147. 1991 年 1 月 14 日,瓦连京·帕夫洛夫被任命为苏联总理。

148. 1991 年 1 月 26 日,苏联总统发布《关于在经济领域和经济怠工与其他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的保障措施》命令。

149. 1991 年 1 月 29 日,苏联总统发布《关于维护法制和在与犯罪现象作斗争中警察与苏联武装力量分队的相互配合》命令。

150. 1991 年 1 月 30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讨论的许多问题当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党的命运和苏联的前途问题尤为令人注目。政治局讨论了《关于就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举行苏联全民公决前党组织应做的工作》。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发表意见:“全民公决的问题是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过于简单地看待它。有人企图吓唬我们,而我们就是想这样提出问题,还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补充。我们大家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这是社会上层人物的情绪。应当向各共和国和各地方的当局、向全世界表明全民公决的性质,这是行动的基础。这是第一。据我所知,多数共和国已决定参加全民公决。诚然,有些共和国此前已经说过,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这毕竟不是全民公决。人民应该对这些至关重要、决定命运的决议发表意见……”

151. 1991 年 1 月 31 日,俄罗斯共产党举行中央全会。这是又一次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中央全会。实际决定党的主张的那些人的意见体现在波洛兹科夫的发言中,随后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了他的关于全会总结的文章。

152. 1991 年 2 月 1 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形势》的重要决定。其中写道:“谴责使军队和军事化组织介入政治冲突的违法事件……规定:未经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同意,而在休会期间,未经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同意,不许在俄罗斯联邦境内采取紧急状态制度规定的措施。”

153. 1991 年 2 月 5 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散发《致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部队、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和铁道兵各级党组织和全体

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中说：“那些所谓的‘独立的’大众传媒正在开展一场系统的运动，诽谤党、武装力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的机关与部队，给祖国的历史抹黑。假民主派在意见多元论的掩护下，煽动人民对自己的军队的不信任情绪，离间指挥员与部属之间、上下级军官之间的关系，损害祖国保卫者的尊严，他们的用意昭然若揭。军人的天职、军人的光荣、战士的忠诚、战士的誓言——这些崇高的概念现在都受到怀疑。有人试图把当地驻军据为己有，阻碍征兵工作的进行。”这个文件的目的是，不让俄罗斯领导人有对苏联武装力量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154. 1991年2月7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确保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民公决和俄罗斯联邦全民公决举行的措施》的决议。该决议写道：“允许俄罗斯联邦中央全会公决委员会在一张选票上列入提交全俄罗斯全民公决的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即是：“您是否认为有必要设立经全民投票选出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职位？”

155. 1991年2月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向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呈送一封冗长的信，题为《关于全国的政治形势》。克留奇科夫报告说，由于尖锐的政治危机，产生了联盟解体、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崩溃的危险。“俄罗斯国会的首脑和某些政治力量……显然打算建立‘第二中央’，与苏联国家政治领导人相抗衡。……对‘民主运动’中有野心的派别实行安抚政策……将导致假民主派毫无阻碍地实现其夺取政权和改变社会制度性质的图谋。”克留奇科夫将“民主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宣布为国内主要的政治敌人。

156. 1991年2月19日，叶利钦通过公开广播猛烈抨击戈尔巴乔夫40分钟：总统欺骗了全国，他的政策是反人民的。他的身上有民族冲突的鲜血。他使国家完蛋。他是使人民贫困的罪魁祸首。他的许诺毫不兑现。他，叶利钦要求总统辞职，把治理苏联的权力交给联邦委员会。

157. 1991年3月1日，苏共中央社会政治组织部副部长瓦·米罗年科向苏共中央领导呈送一份题为《关于国内目前政治形势发展的几点看法》的报告。报告对全民公决前夕的国内政治形势进行了详尽分析。米罗年科写道：“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在著名的电视谈话之后，这次电视谈话实际上是他

争当俄罗斯联邦总统竞选运动的发端……支持率又开始上升了。”因此米罗年科建议——不要批评叶利钦本人，他不但不怕批评，而且这种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提高他的威望，要批评他那“一帮人”的成员。“综上所述，党的一项头等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成功举行3月17日的全民公决。在剩下的时间内，应当尝试营造举行全民公决的适当的热情洋溢的氛围。反对派想方设法宣传一种观点：国家领导人一旦取得成功——甚至只在俄罗斯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就会马上转入‘以人民的名义’的专政。”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上批示：“请认真讨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整个党的领导机构应转入‘紧急’状态。”

158. 1991年3月5日，苏共中央举行了有共产党中央、州、边疆区以及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戈尔巴乔夫指出：“紧急措施太少，俄罗斯的局面需要收场了，搞乱中央的思想来自于美国。”

159. 1991年3月9日，叶利钦在“电影之家”发表讲话，号召自己的支持者回击共产党复仇的努力。叶利钦宣布：“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央——庞大的、官僚主义的中央……我们应当摆脱它。”

160. 1991年3月10—17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讲话。其实质是：事情正在走向结局，我们应该赢得俄罗斯代表大会。必须严厉监督电视台。吉连科在其工作笔记上写道：“公开性”的创造者要求“让我们的观点占据广播电视。赢得全民公决和代表大会。通过了莫斯科的决议。莫斯科应该准备举行3月23日的群众集会。”

161. 1991年3月14日，为了排除反对派利用广播电视的可能性，加强党对广播电视的监督，苏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了一项专门决定：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台委员会的党组织改组为苏共区委一级的全苏国家广播电视台公司下属的莫斯科党组织。

162. 1991年3月15日，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阿·杰格佳寥夫和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雷金在《关于对付西方广播电台教唆活动的几项措施》中提议对报刊实行全面控制。

163. 1991年3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号召人民在全民公决中投票赞成保留苏联。

164. 1991 年 3 月 17 日,举行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了全民公决的如下问题:“您是否认为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一个能充分保障任一民族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被更新的各主权平等共和国联邦保留是必要的?”参加全民公决的有 148574606 人,占登记选民的 80%。其中投赞成票的人 113512812 人,占 76.4%;投反对票的有 32303977 人,占 21.7%。无效票 2757817 人,占 1.9%。关于要不要设立俄罗斯总统职位的问题,70.88% 的选民给予了支持。

165. 1991 年 3 月 20 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会议由苏共中央书记舍宁主持。他说,从 3 月 23 日开始,俄罗斯的局势将更加紧张。对俄罗斯联邦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重新提出了几项任务:要求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作出解释,由苏联总检察长对俄罗斯政府的行为提出质问,保护共产党员代表免受“民主俄罗斯”支持者可能实施的违法行为的侵害。形势继续紧张。这样的氛围为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奠定了法律基础,并在必要时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

166. 1991 年 3 月 25 日,苏联内阁通过了《关于莫斯科市暂时停止举行群众集会、上街游行和示威的决议》。

167. 1991 年 3 月 26 日,通过苏联总统《关于建立苏联内务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总局》的总统令。莫斯科民警机关脱离市和俄罗斯的管辖,直接归属苏联内务部,从而排除了莫斯科民警机关被用于反对俄罗斯当局的可能性。

168. 1991 年 3 月 28 日,俄罗斯联邦第三届代表大会(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叶利钦在代表大会上不但保住了自己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位,而且还得到了代表大会赋予的实行改革所需要的补充权力。叶利钦提出了他在苏联发生了变革条件下的政治纲领。在大会开幕时,军队开进莫斯科以阻止支持叶利钦的示威游行,但游行照常举行。根据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要求,军队于第二天撤出。

169. 1991 年 4 月 2 日,列宁格勒召开了“团结起来——为了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全联盟社会代表会议,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总书记的职务。

170. 1991 年 4 月 9 日,举行联邦委员会例会。戈尔巴乔夫就全民公决中主张联盟统一的人民的意志如何体现为立法文件提出了具体办法:恢复权力机构垂直的从属关系,坚决制止民族冲突的升级,为寻求相互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举行谈判。

171. 1991 年 4 月 16 日,一些英雄城市党的工作人员在斯摩棱斯克举行会晤,表面上的理由是纪念卫国 50 周年。实质上是为了在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前夕制定苏共保守正统派的纲领。会上讨论了戈尔巴乔夫的活动、“改革”的思想,呼吁为“拯救祖国”采取各种紧急措施。

172. 1991 年 4 月 17 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俄罗斯联邦民警机关法》,其第 20 条写道:“民警机关中不允许建立政党及其组织并开展活动。”

173. 1991 年 4 月 18 日,雅科夫列夫致信戈尔巴乔夫,警告说:“据我所知,而且对局势的分析也使我作出这样的预测,来自右翼的国家政变正在准备之中。某种类似新法西斯制度的东西即将出现。1985 年思想将受到践踏。您和您的战友将被革出教门。悲剧的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174. 1991 年 4 月 22 日,帕夫洛夫总理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反危机计划”。

175. 1991 年 4 月 23 日,戈尔巴乔夫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土库曼尼亚和塔吉克斯坦的最高国家机关领导人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会晤。会议起草并通过了共同文件:《关于立即采取措施稳定国内局势克服危机的联合声明》。其中宣布稳定局势的主要手段就是尽快签订联盟条约。

176. 1991 年 4 月 24 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总统选举法。

177. 1991 年 4 月 24—25 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这次会议以党的官员们对戈尔巴乔夫展开严厉而尖锐的批判而著称。经过激烈讨论,全会赞同 9 位共和国领导人和苏联总统的声明,指出“……为了制止即将爆发的灾难,要求必须做到:签署联盟条约,其基础就是关于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全民公决的结果;恢复国内的宪法秩序和法制。”

178. 1991 年 5 月 20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保障国外旅行和移

民权。

179. 1991年5月24日,根据苏联第4次人民代表会的决议建立的筹备委员会会议召开。筹备委员会旨在起草新的联盟条约和确定其签署的程序。委员会设想经过协商后的条约草案可望在6月间提交给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批准。

180. 1991年6月3日,筹备委员会在新奥加廖沃再次举行会议,讨论联盟条约的起草工作。

181. 1991年6月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向最高苏维埃会议通报了联盟条约的起草情况。代表们支持他的建议:不讨论,也不领取条约文本。苏联最高苏维埃中最大的议会党团——实际上由卢基扬诺夫领导的“联盟”议会党团对这个条约持否定的态度。

182. 1991年6月8日,“联盟”议会党团作出了《关于签订联盟条约》的声明。指出:“重新起草的条约规定将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予以取消,该条约有未经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核而签订的危险……这意味着国家政变。”

183. 1991年6月12日,举行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选举。叶利钦获得了57.3%的选票;雷日科夫得票率为16.85%;日里诺夫斯基得票率为7.81%。

184. 1991年6月15日,苏共中央举行了俄罗斯共产党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苏共中央书记舍宁主持会议。与会者认为,造成失败的主要罪人是戈尔巴乔夫。舍宁强调:“大家的发言中对如何签订新联盟条约深感忧虑。根据与会者的意见,不容许无视全民公决的结果和苏联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因为全民公决的结果和决议明确规定了新联盟国家的名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及其组建的基本原则。与会者强调指出,只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通过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决议。”

185. 1991年6月17日,联盟条约草案起草委员会在新奥加廖沃结束工作。该草案当天就分发给联盟各共和国讨论。同日,卢基扬诺夫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政府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在会上发表讲话。这些“强力机构”的

领导人谴责苏联总统的行为同苏联的利益相抵触,议员们纷纷谴责戈尔巴乔夫叛变。最高苏维埃能够动用罢免总统的程序。

186. 1991年6月17日,帕夫洛夫不经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就提请苏联最高苏维埃赋予特殊权力,此举得到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和普戈的秘密支持。

187. 1991年6月21日,最高苏维埃拒绝帕夫洛夫特别授权的请求。

188. 1991年7月3日,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党的任务。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的发言中呼吁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不要总待在首都不动,要经常出去走走,到各个企业、劳动集体看看,大胆地参加政治辩论。同时不要做尾巴主义,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许多党的工作者都犯有这个毛病,这种作风和工作方法好像是从民主派那里学来的。党只有在坚决支持成熟的改革行为时才能够挽回在社会中的威信。

189. 1991年7月10日,俄罗斯总统就职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190. 1991年7月10日,卢基扬诺夫主持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在最近将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听取苏联内阁关于国内社会经济形势的通报。

191. 1991年7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了新的联盟条约问题,通过了《关于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的决议。其中载明:“基本上支持苏联总统以第4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筹备委员会的名义于1991年6月18日提交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各共和国相互协商后,就可以签署条约。

192. 1991年7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针对有组织犯罪问题召开了全苏联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安全局领导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指出,经济危机、政治动荡、执行权力机关瘫痪,以及对现行法律的忽视,所有这一切均为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制定了“行政机构处于瘫痪”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联合行动的种种方案。

193. 1991年7月20日,叶利钦发布命令,禁止政府机关里的党派活动;共产党官员将此举视为致命的威胁。

194. 1991年7月23日,各共和国领导人再次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会晤。

经过艰难争论后决定：1991年8月20日最终签订新联盟条约。当天，《苏维埃俄罗斯报》刊载了一篇政治宣言——《告人民书》，在上面签名的有未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的活动家。他们写道：“我们会神志清醒，我们能悬崖勒马，我们不分老少奋起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对那些危害者和掠夺者说‘不’。在抵抗的最后一线，我们决不退却……我们要团结起来……促进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苏联是所有各族人民以巨大的努力建造的我们共同的家园和堡垒，是在敌人入侵时期我们从耻辱和奴役中拯救出来的家园和堡垒……”

195. 1991年7月24日，戈尔巴乔夫在最高苏维埃遭到了“联盟”议会党团的尖锐批评。

196. 1991年7月25—26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与会者都不知道这是该党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实际上不能驾驭党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不时被打断，与会者当中时常有人同总书记争吵。全会通过决议：1991年11—12月提前举行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会上将通过苏共新纲领。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可以简单地这样回答：以前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有必要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和民主改良。与此相联系，党本身也必须变革。”

197. 1991年7月29日，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在新奥加廖沃会晤，专门讨论联盟条约签订后新联盟如何发展问题。会晤达成了非常重要的协议：副总统亚纳耶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将被逐出新联盟的领导班子。叶利钦感觉有人在偷听。

198. 1991年8月2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建议开启条约以便在8月20日签署。

199. 1991年8月15日，公布联盟条约草案。

200. 1991年8月17日，克留奇科夫、帕夫洛夫和亚佐夫与几名高级党政官员达成协议，要求戈尔巴乔夫向他们暂时让出权力，如遭拒绝，将对他实施隔离控制。

201. 1991年8月18日，戈尔巴乔夫拒绝特派代表团劝他授权采取严厉

措施的要求。午夜前夕,副总统亚纳耶夫同意接管政权,签署命令接管总统权力。

202. 1991年8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发表声明,要求先在最高苏维埃然后在人代会上对联盟条约草案重新审议。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苏联领导人声明》《告全体苏联人民书》和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第一号令。

203. 1991年8月19日10时50分,中央委员会向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和国党的委员会、州党委会、边疆区党委会第一书记们发出了密电,电报中指出:“鉴于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请采取措施组织共产党员协助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实际活动中,应遵循苏联宪法。关于召开中央委员会及其他有关措施另行通知。”电报署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204. 1991年8月20日15时30分,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份加密电报从老广场发往全国各地。其实这是一份声明草案,要求各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审阅,而这些书记们就其职务来讲自然也是政治局的成员,而且在此之前通常也是各共和国的总统。声明草案中指出:“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在苏联一些地区实行紧急状态是国家领导人极不情愿,但又不得已迈出的一步,其目的是应对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内……形成的危机形势。政治局接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关于米·谢·戈尔巴乔夫处于绝对安全状态的声明。”明确反对这一声明草案的只有努·阿·纳扎尔巴耶夫,他说:“声明没有反映出真实情况,没有提到各共和国主权问题,没有提到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转型。应该指出,无论如何不允许流血和动用军队。”

205. 1991年8月21日早晨6时国防部部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会上多数将军赞成必须从莫斯科撤军,使高度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恢复常备状态,并且建议国防部长亚佐夫退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亚佐夫除了不接受“退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一点外,同意了其他所有的意见。他说:“这是我的苦难,我将忍受到底。”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军事积极性严重受挫,军队实际上已经拒绝服从这些苏联领导人。

206. 1991 年 8 月 21 日早晨 10 时,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召开。最高苏维埃支持叶利钦总统的所有总统令,并且批准了那些需要立法权力机关核准的命令生效。议会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并明确指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一切决议的非法性。

207. 1991 年 8 月 21 日 15 时 5 分,塔斯社播发了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声明,指出:“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在乌克兰境内不具有法律效力。”

208. 1991 年 8 月 22 日,戈尔巴乔夫发布《关于废除叛乱组织者反宪法文件》的命令,并在电视讲话中指出:“……这几天发生的事,光说‘是对我们大家的重大教训’是不够的,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可怕的教训。……我们必须更加团结地、速度更快地沿着彻底改革的道路走下去。……看来,近期签署条约的新的日期不久将会确定下来。……这项工作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做完,不能拖延,因为过渡时期的拖延,看来对民主改造是非常危险的。”

209. 1991 年 8 月 22 日,叶利钦发布了《关于确保俄联邦主权经济基础的命令》,规定将位于俄联邦境内的所有属于联盟的企业和组织都交给俄联邦。

210. 1991 年 8 月 23 日,叶利钦签署《关于中止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活动》的总统令。

211. 1991 年 8 月 24 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声明中说:“苏共中央书记处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没能阻止国家政变,苏共中央委员会没有果断地予以谴责并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没能号召共产党员开展反对践踏宪法的斗争,而且叛乱者中不乏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这就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此情况下,苏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这个艰难但又是唯一合理的决定。我不认为我本人今后还能够完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将辞去自己的所有职权。”

212. 1991 年 8 月 24 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为独立的民主国家,并声明从此刻起在乌克兰境内只以乌克兰共和国的宪法、法律、政府决议和其他立法文件为准。这个决议说,这个措施是“根据由于 1991 年 8 月 19 日苏联发生的国家政变使乌克兰面临致命危险”而采取的。

213. 1991年8月25日,叶利钦在其签署的《关于苏共资产的命令》中明确规定:“鉴于苏共中央已经解散,俄共活动也已被停止,因此属于苏共和俄共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所有卢布和外汇资金将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有资产,这包括存在俄联邦境内外的银行、保险公司、股份公司、合资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机构中的所有资金。关于苏共中央在境外的其他资产,将按照各加盟共和国签订的同盟条约来进行分配。”

214. 1991年8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召开。会议由民族委员会主席拉菲克·尼沙诺夫主持。在本次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成立了由来自摩尔曼斯克州的工程师亚历山大·奥博连斯基领导的调查政变原因和过程的委员会。还成立了苏共活动情况调查委员会,由来自彼尔姆州的纸浆造纸联合工厂的厂长瓦连京·塔塔尔丘克担任。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取消卢基扬诺夫的人大代表豁免权问题。8月27日上午,最高苏维埃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取消了卢基扬诺夫人大代表的豁免权,通过了停止苏共在全联盟范围内一切活动的决议。最高苏维埃还通过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的决定,并制定了大会的议事日程和条例。

215. 1991年8月28日,俄联邦领导人宣布,俄罗斯对苏联国家银行和苏联外经贸银行的业务实行监督。

216. 1991年9月1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各共和国领导人,就保留统一的武装力量和统一的军事战略空间、对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以及检察院进行彻底改革等问题达成了一致,并且谈到了起草和签署关于建立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问题。

217. 1991年9月2日,苏联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纳扎尔巴耶夫代表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宣布,今后人民代表大会不再需要了。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政治面貌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被解散。苏联最高苏维埃取代了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最高苏维埃的权力减少了。新的联盟机构——国务委员会组成了,它的成员是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以伊·西拉耶夫为首的共和国间经济委员会。

218. 1991年9月2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决定紧急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宣读了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

声明(有10个共和国签署了声明,而格鲁吉亚也参加了声明的起草工作),声明里提出了使国家摆脱尖锐政治危机的紧急行动计划,并确认必须由所有愿意加入的共和国起草和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大会通过了《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苏联部长会议由跨国经济委员会所取代。为了协商解决涉及各共和国共同利益的对内对外政策问题,成立了由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组成的国务委员会。代表大会之后立即在两个方面展开工作:工作组开始准备联盟条约草案;苏联国民经济应急管理委员会准备经济联盟条约。

219. 1991年9月16日,国务委员会审议经济联盟条约。

220. 1991年9月25日,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相继宣告独立。

221. 1991年10月1日,13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会晤,讨论经济联盟条约,草签了《经济共同体条约》。

222. 1991年10月4日,各共和国草签了经济联盟条约。

223. 1991年10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国务委员会议上坚持恢复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起草工作,坚持签署经济协定,坚持保留统一的军队。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一致同意于10月18日在莫斯科签署经济协定。

224. 1991年10月18日,苏联总统和8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

225. 1991年10月19日,八个共和国签署“独立国家经济区协定”。

226. 1991年10月22日,苏共活动听证会在白宫举行。听证会由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谢尔盖·菲拉托夫主持。代表苏共出席听证会的只有瓦连京·库普佐夫。听证会持续了三天之后便宣告结束,会议通过以取缔苏共政党资格为主要内容的告叶利钦书。

227. 1991年10月23日,叶利钦在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跨共和国机关的使命只是起协商协调作用。现在是各共和国在行使实际权力,因此俄罗斯联邦应该实施独立自主的政策,应该根据民族利益而不是按照强加给它的一套刻板公式行事。”随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事实上破坏了刚刚签署的经济共同体条约。

228. 1991年11月4日,戈尔巴乔夫在国务委员会例会上尖锐提出,要加快签订联盟条约的工作。他说:“……我们目前的处境,不说是最艰难也是十分困难的。给我的印象是,对粉碎叛乱和贯彻根据各共和国领导人联合声明作出的决定所取得的那份潜力,我们支配得太轻率,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头几个星期的起草工作,大家做得齐心协力,和谐一致,使这种信心得到了加强。人们和国家都支持这种态度。但是头几个星期过去后,又开始节外生枝,使工作拖延下来,恢复了政治游戏。经济条约终于在痛苦中产生,但是国家因对这些最主要的问题模糊不清而处于窒息状态。所有这一切是非常危险的。”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国务委员会共和国领导人会议废除苏联各部委,只保留国防、外交、铁路、电力和核能等部。

229. 1991年11月4日,苏联检察院国家安全法执行监督局局长维克托·伊柳欣对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刑事起诉,控告其犯有叛国罪。11月6日,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下令将伊柳欣开除出检察系统。

230. 1991年11月6日,叶利钦签署《关于苏共和俄共活动的命令》,该命令指出:“……事实上正是苏共的领导层毁灭了这个国家,他们将苏共当成是最私人的工具,这些人应为苏联人民被逼入历史的绝路而负责,应为我们国家的分崩离析负责。苏共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反人民性和反宪法性,并在各民族中挑起宗教的、社会的、民族的纠纷,是对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今年8月19—21日发生的违反宪法的叛乱是苏共领导层支持的……显而易见,只要还存在着苏共这一组织,那么类似的叛乱和动荡就无法避免……鉴于俄共并没有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登记,而苏共的登记工作则是在此前由它直接领导的苏联国家机关中完成的,而且是在严重违法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对于俄联邦来说并不具有审判前决定的性质,因此依照俄联邦宪法第7条和第121条第4款的规定,我命令:1. 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一切活动,解散其一切组织机构。2. 俄联邦国家权力执行机关对俄联邦公民加入苏共和俄共的事实不予追究。3. 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所有资产归为国有资产。”

231. 1991年11月6日,叶利钦自任俄罗斯总统。

232. 1991年11月14日,国务委员会审核了根据各共和国的意见进行

修改后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

233. 1991 年 11 月 25 日,国务委员会决定将已拟定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分发给各主权国家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请各最高苏维埃审议本草案,以便准备在今年签署条约。

234. 1991 年 11 月 27 日,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公布。

235. 1991 年 12 月 1 日,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90.32% 的人投票赞成共和国独立。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总统。

236. 1991 年 12 月 2 日,俄罗斯承认乌克兰的全民公决结果。

237. 1991 年 12 月 3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戈尔巴乔夫在给各主权国家最高苏维埃议员的信中呼吁:“为我们祖国的生存担忧的情绪日益增长,这促使我向你们呼吁。在我们祖国正经受的众多危机中,最可怕的是国家体制的危机。它最严重地影响到各级政权机构履行自己对公民所负职责的能力,它破坏经济,阻碍和扼杀改革,败坏风气,使各族人民互相对立,毁灭文化。……现将联盟条约草案提交你们审议。你们的决定也许将使社会走向新的生活形式,也许我们和各族人民将要长期地,看来是毫无希望地各自单独地去摆脱困境。……因此,我恳请你们这些自己人民的全权代表们,在最近几天讨论一下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并赞同这个条约。”

238. 1991 年 12 月 5 日,克拉夫丘克总统宣布乌克兰退出 1922 年签订的联盟条约。

239. 1991 年 12 月 7—8 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科维奇在别洛维日起草了促成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并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停止其存在。”

240. 1991 年 12 月 9 日,戈尔巴乔夫就三国元首的协定发表声明:“对作为国家总统的我来说,评价这个文件的主要标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公民的安全利益,符合克服当前危机、保留国家体制和继续进行民主改造的任务……无论如何,下面这一点显然是针对我来的,这就是协定直截了当地宣布停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存在。毫无疑问,每个共和国都有退

出联盟的权利,但是多民族国家的命运不能由三位共和国领导人的意志来决定。这个问题应该通过宪法在所有主权国家参与下来解决,并应考虑到各族人民的意愿。……停止实施全联盟的法律规范的声明也是不合法的和危险的,只会加剧社会的动乱和无政府状态。协定的仓促抛出引起了人民的不解。它未经各共和国的居民和最高苏维埃讨论却以他们的名义签署了。尤其是这发生在各共和国议会正在讨论由苏联国务委员会制定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的时刻。……在目前形势下,我深信有必要让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既讨论主权国家联盟草案,同时也讨论在明斯克签订的协定。因为在协定里提出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国家体制,而这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权限,所以必须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此外,我也不反对就这个问题进行全民公决。”

241. 1991 年 12 月 10 日,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绕开主权国家联盟问题,批准了关于成立独联体的协定。

242.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成立独联体的协定。

243. 1991 年 12 月 13 日,中亚各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元首在阿什哈巴德会晤。会议对成立独联体的倡议表示赞同,但是强调必须保证所有原先的联盟共和国平等地参加制定关于新联合体的文件和决定的工作。为此确定于 12 月 21 日在阿拉木图召开 11 个共和国的会议。

244. 1991 年 12 月 19 日,叶利钦决定终止苏联外交部的活动。

245. 1991 年 12 月 21 日,独立国家元首会议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签署了支持别洛韦日协议的宣言。宣言称:“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停止自己的存在。”

246. 1991 年 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签署命令,放弃苏联总统的权力,并通过电视台宣布:“由于已形成的局势,在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之后,我就停止自己担任苏联总统职务的活动。”19 时 38 分,克里姆林宫的苏联红旗降下,升起了俄罗斯三色旗。

# 参考文献

## 一、资料汇编类

- 1.《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
- 2.《勃列日涅夫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 3.《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1987)》,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
- 4.《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
- 5.《赫鲁晓夫言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
- 6.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
- 7.康绍邦等编:《苏联东欧近期资料选编(1989—1990.3)》,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内部参考资料。
- 8.柯燕编:《苏联东欧近期资料选编(1990.4—1990.8)》,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内部参考资料。
- 9.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 10.辛华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
- 11.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
- 12.苏群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人民出版社,1991年。

## 二、期刊类

- 1.《参考消息》(1985—1991 年)。
- 2.《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5—1991 年)。

## 三、政治传记类

1. [俄]A. B. 科尔扎柯夫:《我所知道的叶利钦——俄罗斯总统安全局前局长回忆录》,杨藻镜、葛澹云、王文静译,外文出版社,1999 年。
2. [俄]阿·切尔尼雅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
3.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年。
4.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
5.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 年。
6. [美]戴维·阿尔贝尔、兰·埃德利:《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孙成昊、张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7.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 年。
8.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
9. [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 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
10.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全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 2003 年。

11.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
12.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3.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
14.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
15.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
16.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7. [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潘兴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
18.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
19.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
20.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21.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22.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患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23.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
24.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

25.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焦广田等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

#### 四、学术著作类

1. [俄]B. A. 利西奇金、Jl. A. 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 [英]阿奇·布朗:《改变世界的七年》,韩凝等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

3. [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4. [德]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冯文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5. [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张达楠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

6. [英]奥兰多·弗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7. [美]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孟鸣歧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8. [美]丹尼斯·K. 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陈德民、陶庆、薛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9. [俄]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著:《克里姆林宫秘史》,徐芳夫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10. [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11. [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2.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3. 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
14. 郝宇青:《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5.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 年 12 月 25 日》,沈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6.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
17. 李永全:《俄国政党史——权力金字塔的形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年。
18. 李永忠、董瑛:《苏共亡党之谜——从权力结构之伤到用人体制之亡》,商务印书馆,2013 年。
19.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
20.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
21.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22. [法]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
23. 谭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24.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年。
25.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
26.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 年。
27. 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人民出版社,2013 年。